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七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

中央：

现在将这一方面的实际状况报告你们：

一、军 事 情 形

湘鄂西苏区在今年三月间尚有石首华容（江南）和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六县，石首华容两县县城是我们占据的，当时联县政府及特委设在石首之调关，监利沔阳江陵潜江只是占据乡村，潜江只是小块苏区，另外汉川有几块苏区，因为过去汉川的党不是湘鄂西特委所管辖，所以没有与此间打成一片。

敌人围剿，首先就是向江右（即江南）进攻，石首华容调关相继失守，红军段德昌部（新六军）与政府及党特委就渡江到洪湖，以江右地方武装约千枝，以段玉林同志率领与敌周旋。三月二十七日曾与朱河敌人一战，我军略有胜利，但伤亡不小，敌人旋即撤退，我们占领朱河（监利之一大市镇），四月五日我军进攻峰口，伤亡颇大，敌人亦受损失，旋即撤退，我们占铜(领)峰口。自四月五日至十五日，我军整理休息两星期(因为没有子弹)移师向江陵方面发展，占领新沟嘴，缴敌人枪百余枝，敌人即以二团人向我军攻击，被我军击破，获枪二三百枝，获迫击炮四门，机关枪两架。在四月十五日，敌人对我江左江右同时进攻，江右围攻桃花山，江左同时占领朱河峰口（此时红军正在江陵作战）。江右围攻之结果，敌人完全占领桃花山，赤卫队段玉林部大部分下洞庭湖，一部分渡江从江陵到洪湖。

四月二十日前后，我们的估计，敌人在江右即获胜利，必移部分兵力向江左进攻，围剿洪湖。我们认为在军事上已非常危险，当时就想调红军回监利击破朱河之敌人，但是以敌我力量和地势上讲很少把握；如果不能在敌人包围中击破其一点，红军就必须为保全实力起见，实行退却。当时就有两种提议，或由江陵潜江出荆门一带，将来可与二军团容易联络，或由沔阳出汉川，正在讨论中，从接来上海报纸知道二军团已到荆门一带，于是便决心派红军出荆门，规定红军段德昌部（现改三军第九师，实只一团人）九师的任务，仍是在巩固赤区原则之下去与二军团配合，目的地是到潜江。在讨论中也就感觉着出去接二军团与巩固苏区两个任务，就很难兼顾，九师出发游击到江陵之龙湾熊口一带，敌人进扰我们的后方，同时二军团又无确讯，因此九师又撤回后方，后来我们知道二军团已退回远安南漳，因此认为去配合二军团已无希望，决定九师在最近要回监利击破朱河之敌。在五月五日，敌人以一团人进驻黄穴口，正值九师回来，迎头出击，因为战略上的错误，没有结果。

现在军事的情形，是敌人从江陵潜江监利三方来包围我们，大约有八团人，沔阳方面之敌大约一师一旅，还可与这方敌人联络，现在包围洪湖之敌已在十余团人左右。中央分局于

五月七日开军事会议讨论。五月八日又重新讨论，一致认为现在的形势已异常严重，最后决定移师向沔阳方面给敌人以打击，冲破这方面的包围。如果……（原稿空一行字——校者）

一月以来，军事上的结论，敌人虽以大量的兵×力向我进攻大约三十团以上，但是我们实有打击敌人的可能，如新沟嘴、余家埠之胜利，同时我军事上却有许多错误，在调关失守后移师渡江是正确的，去进攻峰口，原则是执行选择敌人弱点的计划，可是因为情形不明（当地群众是反水的，连沔阳县委也不知道），却受了很大伤亡，在四月十五日江右失败以后，我们已估计到敌人必移师围剿洪湖，当时没有趁敌人兵力尚没有集中选择一点给敌人以打击，却移师去接二军团，这是一个错误（这点是我现时的意见，没有经过讨论——夏曦），现时敌人即大举围剿洪湖，我们仍必须下极大决心去打破敌人围剿，要到了万分无把握时，才在保全红军实力原则之下出去游击。

如果红军出外游击，现时后方和江右，主要的是发动游击战争，每县总有几个游击队，并且有统一的指挥，我们务须尽可能的保护医院。

后方现时最感困难的，第一是被迫群众问题，被迫群众就是从石首华容江陵逃兵而来的群众，大约还有五千人左右（从前有万余人现已回去数千人）麇集洪湖附近，靠联县政府发伙食吃饭，现时我们极力鼓动他们回家，和准备安插，但是回家很少办法，因为群众都怕回去，安插也很少办法，一旦洪湖政权失守，这些被迫群众更成问题，现时我们正与各方计议解决此问题。第二就是医院问题，伤病兵达千余人，要保存其安全，现时有部分是散在民间，但是这些伤兵又有大部分在民间滋事，要办，要依群众自然不愿意，这自然是兵士和群众中党的工作不够，也即是因为红军成分问题。

二、经 济 问 题

此间苏区因为水路很多，敌人并不能封锁，小商人亦在营业，输出品为棉花，豆（现在已经很少了），亦可到外面去交换，但是现在的困难问题是金融问题，苏维埃政府一切开支专靠纸币，政府发纸币现已达五十万元，自调关失守后，不能兑现，现在每月开支达十五万元，专靠发行纸币开支，现在一方面尽量节省开支，一方面设法筹集现款。但是苏区不扩大，这些困难是很难解决的，因为纸币的不能兑现，有现金者就完全收藏，因此金融不能活泼，商业就很停滞。第二是粮食问题，洪湖本来米反〔还〕足自给，现在加被迫群众五千人，红军及机关人员六千，每日粮食就要米五十石以上，现在正吸收富农的多余粮食，拿一部分分给雇农贫农，一部分集中储藏为红军之用。

三、土 地 问 题

湘鄂西苏区过去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分，和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雇农与小手工业工人不分土地（如沔阳），没收的土地有的地方是平分了的，有的地方还在原佃农手里，没收之耕牛不拿出分配而拿来发卖，自然还是归之富农，因此贫农分得土地，因为没有耕牛耕具，他甚至不能完全耕种他的土地，还有秘密还租的事（最近调查出），中央分局成立后，即提出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发动春耕运动，加紧反富农斗争。具体办法是没收富农多余耕牛耕具，没收多余粮食，加紧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进一步的没收富农土地

与彻底平分。现在没收富农多余耕具粮食的斗争，已在监利发动，有的富农私藏粮食一家五六十石，盐几石，在这一斗争中，一般雇农贫农，均非常表示积极，现在我们已经决定立刻没收富农的土地，给以坏的土地；分给贫农雇农，预计一个月，在监利沔阳汉川三县就要完全做到。

我们认为彻底平分一切土地，是绝对必须的，没收地主与富农的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雇农贫农，这已经立刻可以办到，这即是彻底平分的一个主要步骤。在某种情形之下，彻底平分就完成了。但在某种情形之下，为了要彻底平分，还要动摇中农（主要是富裕的中农）的土地，则要依照实际情形而定。如果基本农民群众（包括贫农中农）愿意对基本中农不致妨碍时即刻实行。如果要妨碍基本农民群众时则另设法解决（据说在某一乡中农是百分之七十）。我们现在对中农土地以不动为原则，还有些地方，没收地主的土地已经平分了的，现在只没收富农的土地平分，其他一般土地是否重新分配视当地情形而定。

反富农的斗争，必须成为一个群众的，所以现在正在加紧雇农工会贫农团的工作，从斗争中建立和扩大这些组织。

四、苏 维 埃

苏维埃工作非常不够，严格的说没有真正的苏维埃，一方面党代替了许多苏维埃的工作，一方面党没有正确的领导苏维埃的工作。联县政府每日的事务就是应付伤兵和被迫群众毫无组织纪律，一个病兵他就可以找主席团要求两天伙食说半天，乡村苏维埃政府一天忙的是放哨，打路条，开饭。区苏维埃只是一个传达机关，同时苏维埃又什么事包办，不去动员群众，动员群众只是用命令主义，群众做什么事也要等待苏维埃的命令。村苏维埃开会时，什么工会，互济会，党，少共，都派代表做报告，讨论的并不是真正苏维埃的工作，只是一些照例的抽象的演说。改选苏维埃由党规定名单在群众中通过，等于包办，最近我们已注意纠正，要来一个彻底改选苏维埃的运动。

五、群众组织工作

此间一切团体，均是命令式成立的，所有同资格的人通通加入，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差不多都有了，实际没有工作，在反富农斗争中，雇农工会贫农团已起活跃的作用。职工运动过去是命令式的增加工资五成（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又增加三成，机械的规定一个月多少工资，如少共去年规定青年工人每月工资三十串，有的不到三十串的固然增加了，有的超过三十串的反而减少了。现在职工运动还没有××转变。

六、党 内 状 况

现在与中央分局能发些关系之党的组织是监利沔阳汉川石首华容宜昌沙市天门江陵几县，监利沔阳汉川是苏区，石首华容江陵是失败区域，宜昌沙市天门是白色区域。

苏区的党下层非常腐化，照例开会，没有工作，党员发展的速度非常之慢，党内隐藏地主富农分子，如沔阳据县委说富农分子就有百分之十，党内命令主义非常浓厚，丝毫没

有自我批评，党的指导机关只是忙于军事上的应付，最近方开始转变于群众工作和党的组织问题，党内理论水平线非常薄弱，一般同志只知照上级命令做事，根本就没有懂得什么是路线，有些同志借口于反对形式主义，实际就走到杂乱无章，中央分局对于建立党的下层秘密组织已十分注意，现在江陵石首华容都能有秘密组织，监利沔阳亦已建立下层秘密基础，这算是组织上的一转变。现在决定一训练班造就党的干部，并已经派一些巡视员到区委支部去巡视。最近党报也停版了，现在已找到专人负责即可出版，党内材料已出版湘鄂西通讯第一期。妇女工作最近才开始注意。少共工作还没有大的转变。一般宣传鼓动非常抽象。

七、士兵运动

以前对于士兵运动一般忽视，最近派了二三十人出去，约有通讯处。兵运委员会已组织，对于训练俘虏还能充分注意。最近岳维峻兵变一连人来，还有两三连正在接头，我们已特别注意这一工作，我们拟从兵变过来及在此地当过兵的北方人，训练大批派送出去。

八、红军状况

段德昌部先编成一独立团，最近已编成第九师名义，实只一团。另编有一个警卫团（步枪九百），江左我们就有两团兵力。此外汉川游击队约有一营人，预备编成警卫第三团，段玉林部（在江右约枪八百），编成警卫第二团，警卫团之意义就是无论在任何时决不脱离苏区，红军在必要时可以外出，另外还组织有一教导团训练新兵，人数有五百人，尚在继续补充。游击队一县都有几个，作用是骚扰敌人，杀反动领袖。农民武装统编成为教导军，教导军就是一种民兵制度。从教导军中，每于作战时挑选一部分志愿的组成挺进队。红色武装队，现在正加紧注意此种挺进队的形式。红军中政治工作一般都不十分好。

九、与二军团关系及二军团现状

二军团自去年十月到现在，脱离苏区已八个月，与此间关系非常隔阂，三月间曾来一交通，后来中央分局派唐赤英同志同此交通回去，直到现在，唐赤英同志没有讯来，不知是否达到？我们派出的交通，于四月初回来，只是回了一封很简短的讯。据交通说，他们对回赤区非常迟疑，现在我们已派鲁易同志从宜昌方面到二军团去，至于二军团之行踪，我们所得材料，与报上所载相同，他们实力，还有一万人，到荆门时未受什么损失，徐源泉派出二团人就把他们吓退了，二军团现在的问题是失败情绪和政治领导问题。他们预备以远安为门户向北推进，大约他们的主力现在南漳一带，很显然的，他们是由冒险的立三路线进到退守山地，中央分局写给他们的讯已有五六封，现在又派交通去和鲁易同志去，但不知能否转变他们的路线。二军团十七师，听说还在江南松枝宜一带游击，师长是许光达，政委是李剑如，由此地到五鹤或远安南漳，非常不便，现在只是从宜昌方面派人去。

十、总结

湘鄂西苏区的群众基础和游击队，敌人无论如何是无法消灭的。现在党的中心任务是要

积极领导这一反富农和平分土地的斗争，从斗争之中建立贫农团雇农工会，改造党和苏维埃，这就可以保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的前途。从军事上来观察，则现在环境已非常严重了。我们已作从公开转入秘密环境的种种准备。但是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正在用尽我们的力量来打击敌人的围剿。红军必到万不得已时才采取退却的策略。现在沔阳方面，敌军异常动摇，汉川苏区正在发展，洪湖的群众基础，比较巩固，我们完全自信可以取得胜利的前进。在今天说，军事还是在作进攻敌人某一点的准备。

湘鄂西中央分局

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

中央：

一、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是在国焘、泽民、昌浩诸同志到后五月半成立的，到现在约四个半月，在这中间鄂豫皖苏区曾冲破了蒋介石第二次围剿，保障了秋收斗争的胜利，光山罗山北部发展了近百里的新赤区，潢川南部发展了一区新的赤区，恢复并发展了黄陂和孝感北部的赤区，黄冈开辟了数十里新的赤区，矿西旧的赤区不仅恢复，而且如小南京（霍邱属）涧沟（商城属）等反动中心都前后被我们消灭了。豫鄂边及皖西北两个赤区中间，现仅有二三十里路为白色区，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特区区委和商光边革命委员会，光、罗、陂、孝、麻各县苏区周围的反动民团前后都消灭了好多，一般的说赤白对立的现象已渐渐消灭，游击战争经常的围绕着赤区周围的一切县城。在六月二十八号中央分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时，统计全赤区群众约一百七八十万，现在起码在二百万以上，红军在这中间击破二次包剿，从光山泼陂河进犯之敌及黄安桃花肖之楚部队，在援助中央苏区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包剿任务之下，曾南下攻下英山圻水广济等县城，消灭并击破徐源泉、陈调元、王光宗等匪军兵力约七团以上，缴枪约四千支，迫击炮三十尊，机关枪二十架。回赤区来又在潢川仁和集下亚港一带正在进行布置第三次包剿的匪军约两团，缴枪七百余支，机关枪十六架。四军×属之部队除一教导团外，尚有□□的四师，特别在空前的水灾中，鄂豫皖区因分了田和群众努力生产，获得了大大的丰收，冲过了饥荒的难关。苏区和红军这样的扩大与巩固，当然是执行国际及中央正确路线发动了党内斗争的结果。特将工作各种情形，分别简要的报告如下：

二、分配土地的情形：在中央分局未成立以前，这里还是执行对立三路线调和时代的土地暂行法令，集体农庄固然取消了，但是富农的好田地仍留在自己手中，甚至还有地主的田地没有没收的，有些共产党员苏维埃委员机关工作人员（如红军经理处事务长等）都占取了很多土地，大多数的雇工贫农以至于中农是没有获得分土地的果实的，红军士兵亦能有很好的分田，而且许多侵犯中农的利益。中央分局成立以后，即扩大土地法令的宣传解释，并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之七月一号开幕的鄂豫皖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通过这一法令（大会详情另告），经过了许多斗争，现在才一般的得着相当的注意与执行，在整个执行中发生这些现象：第一富农不自认是富农；第二还有将中农认为富农，富农认为中农，中农认为贫农，贫农认为中农的；第三过去已经分得好田地的甚至贫农不愿重新分配；第四一部分中农现在要归还原来的田地（因对中农宣布以不动为原则），贫农又不愿意；第五仍然有些土地委员把持命令不是由群众自己来分的；第六新苏区一般的有先调查好了或由群众都回来再分的机会主义；第七山林池塘分的不快。鄂豫皖党正要坚决的执行土地法令领导群众自己起来解决土

地中复杂的问题，打击富农和占取好土地的共产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反对他们要农民群众代耕，有些党员因为这些错误开除了党籍，苏维埃委员撤消了职务的，这一斗争还要深入下去。这里并照湘鄂西的办法每乡留一石至五石为红军公田，分给红军中由白色区来的贫苦农民和俘虏哗变加入红军的士兵。红色士兵的土地多半由群众代耕。现在分的办法有些是由群众自己开会直接分配的，苏维埃公布凡发现有委员舞弊情事都可以到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控告，若真不好，即召集群众大会改造并预以处罚。不过还没有广泛实行。自从这一法令较[将]分配的具体办法公布了的地方，有些贫农中农过去不愿要田地的（在立三路线下消灭了富农）都起来争着要土地。象去年在麻城田有多的分不了而今年反不够了，这一斗争提高广大雇贫农中农参加革命不小的积极性。

三、财政经济状况：累进税已经颁布执行（另抄告），开始农民对收小烟税（本地烟）不满意，现已取消，税收机关现正在整理，除皖西外黄麻苏区每月可收三四千元，鄂豫皖特苏及皖西特苏各设有一个苏维埃银行，共发有纸币票（一元的）六万元，并发有一串的小票，这些票子在农村中颇有信用，群众感觉比较往日便利多了。皖西银行纸钞在商城被改组派造谣一时不用，现在揭破通用无阻，并正在进行将两个银行合并起来，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对现洋出口也有限制，此外有合作社（群众的）和经济公社，这些建设各乡都有，不过范围很小，而且组织不好，其中有一部分因为党员苏维埃政府赤卫军赊欠而至停滞（在麻城），现都在整理。在九月初要举行合作社的代表会议，改变私人谋利的企图为群众谋利益的方针，秋收前粮食颇恐慌，曾用互济组织割麦队割谷队到白区夺取豪绅反动×的，没收赤区地主富农的，节省（机关吃稀饭等，红军仍吃干饭），加紧生产（种瓜豆荞麦等）等办法勉强过去。在救济特别注意先救济了红军家属，在去年立三路线时代和执行调和路线时代，苏维埃政府为红军给养及救济被难群众，将群众保存的粮食借吃了一部分（如在黄麻）没有还，大失群众信仰，甚至秋收中一部分群众怠工，后来苏维埃当群众大会而承认了错误，并设法归还.群众也转变了。现在严格反对骗取苏区群众的粮食和钱的行为，鼓动群众自动贮藏防备反动抢夺，苏维埃各机关党部用费原定每月都有预算决算，都很严格的执行，特苏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在集中的工作，机关用费多半在累进税中开支，每人另用费都有严格的规定，苏维埃中有些贪污账目不清的事情，现都在整理，特苏事务长因贪污押在保卫局里，各乡各区苏维埃的账目可由群众参加组织清算委员会，专门清算，不过还未普遍实行，经常还有工农监察委员会考查。除累进税外，财政来源由保卫局所指挥的特务队（税局各县分局都有一队短枪便衣）捉了白区豪绅缴款，过去有缴了款就放的错误，现在绝对禁止，岳维峻前后缴了大洋九万元，西药价值不到一万元。此次红军南下也没收约金子十余斤，银子一千余斤。

四、肃反工作：在这一苏区所发现的最主要的反动派是改组派，八九月间又破坏大批AB团第三党，他们准备九月十五号暴动并决定有精密计划，企图抢岳维峻出去，炸坏医院药房，运枪暴动，杀尽红军好的和红军中一部分负责同志，现在计共逮捕的反动分子六百以上（在皖西北约一百余人，在黄麻二百余人，在红四军中约三百余人），其中有红军的团长师部参谋等等，也有党员团员，这都是立三路线遗留下来的一部分豪绅地主富农，在党和红军中没有和他们作坚决斗争的结果，红军中一般的负责同志很少有阶级的观念，不去注意各个人的阶级成分和政治面目，只要有点工作能力就拉来工作，许继慎同志担保在红军供职的军官几乎多数是改组派，军委会已撤消他十二师师长职务，调他到军委会考查。特区苏维埃有一

个政治保卫总局，开有训练班，培养担任这一工作的干部，各县都有保卫分局，有秘密的侦探和公开的武装队员，红军有政治保卫队，分局对于肃反方针发有一个通告（另报），肃反的工作一般的说来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党苏维埃红军都在积极进行淘汰富农分子及其他不好成分红军，并在淘汰一部分坏的俘虏哗变的成分，这一次破坏反动阴谋及其组织后，九月十五号的暴动已经是确定的打破了，现在所要的是继续肃清这些分子和其组织。

五、军事方面：现在红四军按三三编制，足有四师（十、十一、十二、十三），军部直属一教导团，共约长枪一万四千支之谱，各团部有机关枪六架，师部有迫击炮连，马匹配了很多无法成立骑兵。总之，地方新式武装（独立营游击队等）共计长短枪六千支以上。第三期彭杨学校有两百三十人（在军事上我们有很大的物质困难，如没有冬衣医院一千多伤兵没有棉衣，前线更不待说）。赤卫军每连足编以三团为一师，计共一十五师以上（有新的发展，报告还未完全统计），这些都是中央分局成立以后组织起来的。此次红四军在中生同志（四军政治委员）领导之下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抛弃了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忽视红军的政治工作与任务，已被撤职，现暂在军委会担任参谋长职务，他对自己的错误还未真正诚恳的认识与接受（他不通知中央分局，将与中央分局分歧的错误决议自行报告中央，现在分局查出才承认），中央分局还要专门讨论他的问题（另见中央分局对红四军南下行动决议）。余笃三同志（担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委员）也反对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他因病未到分局召集的红四军活动分子会议，现决定撤职，调到分局谈话，再讨论他的问题，承认就遵照中央指示派到下级党部做群众工作。现在红四军一部分干部，反对中央分局的问题已经解决，大部分领导工作的干部同志都承认错误，接受分局领导，还有少数分子有调和倾向，分局重新调陈昌浩同志去担任军政治委员并调了许多地方雇工成分的干部同志补充进去加强党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分局还准备动员大批地方下级雇工干部同志进去充实红军下层，现在四军的问题还是要加紧淘汰并肃清富农及其他派别嫌疑的分子，动员极大数量已经获得分土地利益的雇工贫农以及可靠的中农群众进去，减少俘虏哗变的成分，加紧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同时反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倾向的斗争，现在蒋介石正在进行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包剿，苏区周围有三、二十、四十四、四十八、三十一、三十三等师。红军政治影响一般的说来确是日益扩大，大部分赤卫军有相当战斗力，常配合红军行动，以前到白区有乱拿工农东西的不好影响，经过很多的教育说服的政治工作，加强党的领导，严申革命军事纪律，已部分改正，当然还要继续努力这一工作。

六、工会贫农团妇女青年团的工作都有相当改进，鄂豫皖特区总工会已经成立，并举行了一次全区雇农代表大会，工会干部不大稳定，常调其他工作，所以还有很大的困难来发展工会工作，工人斗争情绪都渐转活跃，组织群众多半是见人就填上名册的形式主义，经过充分鼓动宣传由群众自觉的加入者少，现渐转变，在八一、九七、二十五号的追悼死难烈士等三群众大会上，有些地方有群众到反帝大同盟红军报名处互济会的桌位去报名，妇女拥护红军送鞋袜被子衣服糯米花生瓜菜钱替红军洗衣服慰劳医院红色受伤战士等等都是热烈，妇女一般的工作说来很落后的。

各级青年团同党的关系极不正确，现在一面要反对轻视团的工作的倾向，一面要反对团的先锋主义第二党的倾向，党还要领导团培养工农干部大批吸收工农干部参加指导机关（现有团员约一万）。

七、兵运工作：这里做的不够，分局及各县都办过兵运训练班，还不能利用一切机会活

泼的去做，这里训练班派出去的同志几个都在国民党进攻江西火线上领导过哗变，一般的白区工作多沉于右倾的泥坑之中，现在直接由分局指挥的白区党部，有孝感中委潢川县委等，其它各县都有非苏工作，分局曾专门办过一次白区工作训练班，最近潢川等处的工作稍有转变，这里与豫南特委的关系还密切，河南省委对他们的领导非常软弱，分局曾在政治上批评他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发动群众的斗争，不领导群众的土地革命，不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只企图与土匪勾结布置晚上行动的所谓游击战争。他们离赤区很近，根本不相信能发动土地革命，分局曾给他们一个纠正他们错误的决议。

八、鄂豫皖区的党的组织，是最严重的问题，他有极深远的右倾路线立三路线及调和倾向的根源。

党内斗争自反对特委时代的调和路线以来，也有相当的发动，开除了参加右派小组织活动违反中央调动到河南工作决议的徐朋仁（过去担任特委书记），打击了反对劳动法令的陈定候（担任过四军政治部主任特苏政府秘书）以及和王培吾（过去担任过军区总政治部主任）曹大骏（过去四军政委）夏威林（开除了中央分局委员）等的不正确倾向作斗争，调他们去做下层群众工作。红军中的党也开始了斗争，最近各县虽然开除了不可救药的异已分子，这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党内和平的现象仍是非常严重的。开除的分子，富农及地主的成分较多，在群众大会上党报上公布了这些名单，经过支部工作都有了相当的进步。增加了工作的积极性。

党员成分非常坏，分局成立之时，各县县委书记常委多是富农分子，出身于地主道士的知识分子，现在都有大的改造，多半改变为工人及贫农成分，不过特别区委支部还未很好的改造，现在党员数量成分是有了相当的扩大（连红军一起约在两万三千以上）。

干部缺乏是最大一个困难问题，党团分局经常办有一个区委支书一类的干部训练班，每期约四五十人，三星期满期，现已到第六期，是党团分局和军区×党委会合办的，共六十人左右，现在分局还办个妇女训练班（三十人，六星期满期），训练班成绩不很好，主要的是因分局一般工作人员缺乏，无人专门负责，不能按时授课，及学生成分还未严格选择（白区送来的多地主富农分子），工人成分太少，分局最近并准备征调三百以上的同志和群众（主要的是雇工成分）到红军中去，规定各县党部准备供给红军中下级干部，特别是要雇农成分。

各级巡视工作（从分局起）最近才相当的加紧并转变巡视方法，吸收了一些工农干部之同志参加巡视工作，有代表团，不经过县区委直接到支部乡苏村苏（同时也是苏维埃代表团，团拿苏维埃的介绍信）去巡视，全权解决乡苏问题，再向区委县委或区苏县苏作报告或会同区委县委区苏县苏来解决问题，这一巡视方式已经收了新的成绩。

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反对调和倾向，还是鄂豫皖的党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分局准备在十一月十一号召集鄂豫皖省党员代表大会，成立鄂豫皖省委（决议另报）。

九、其他情形。这里已和湘鄂西苏区及鄂豫边红三、九军发生了关系，彼此都传达过几次文件，相隔都只有一二百里，中间秘密工作若加紧发展，不久都可以联系起来，河南省委前两个月曾有一视巡工作的同志到鄂豫皖苏区来。

十、向中央的要求：这里各种干部异常缺乏，特别是军事人才，专门作分局工作的人也少，多半兼任各项工作去了，今年赤区瘟疫流行，几至三分之一以上的群众染病，国焘、泽民二同志都大病过，国焘同志现尚未好，有整个区委县委区苏机关工作人员害病的更是影响工

作不小。要求中央多派几个军事人才党的工作人才到这一苏区来，做支部工作的也要，以及驾驶飞机（现只有一个同志一个俘虏的）无线电（可惜红四军最近获得徐源泉最新式的一架无线电，四军未注意保护损坏了，中央能设法买一架更好）修造枪械、医生等人才，选送来的人请中央要注意成分，犯了严重错误的分子不必送到苏区，于苏区没有多的帮助，要求中央将刘伯求李铁两同志派到这里工作。

鄂豫皖中央分局

国焘同志病中附注

一、中央分局七个常委，除国焘外，有泽民、昌浩、王平章（知识分子，家为贫农，原在鄂豫皖工作的同志，现担任特苏人民委员会主席工作）、高俊亭（贫农，特苏主席，现调光山担任县委书记）、周纯全（工人，担任特苏政治保卫局局长）、郭述申（知识分子，家为贫农，现在调去担任陂安南中心县委书记）总计七个常委，有两个经常在外面工作（担任县书），经常又有病的又要出去巡视工作，很难形成集体的领导，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申熙同志（贫农）手臂带彩未好，现担任军校校长，实际不能工作，一个副主席卫祖胜同志（贫农）又担任革命法庭主席，其他委员都担任别的工作，所以监委仍是空的。现接中央指示即准备遵照建立鄂豫皖省委。

二、这个报告没有充分分析分局工作缺点，现在各县自区委以下多不看党的文件苏维埃的文件一切报纸，原因是不识字，没有组织党青年团各群众团体的组织系统，非常混乱，党对他们帮助太少，对红军的立三路线到现在才能克服。

党内的斗争发动的速度不快，一切宣传工作缺乏没有系统，红军几次战斗牺牲在两千以上，又清除三百以上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干部，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在红军中当干部，红军干部成为极大恐慌，现从各方面抽调去补充，请中央大大注意并帮助。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

——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在此次红四军内部肃反之经过，非常值得我们彭杨学校全体武装同志及鄂豫皖整个劳苦工农群众严重注意的。这一次肃反，是表示了更巩固和发展了红四军和苏区的伟大意义，每个同志都听说中央苏区都迭次冲破了敌人的包围会剿，缴了敌人的枪械在十万以上。即落后的山西陕西的农民运动也蓬蓬勃勃的起来，扰动了一大片苏区。鄂豫皖苏区更是得了不少的胜利，日益巩固和扩大。这样的革命形势一天一天的向前发展，于是吓得反动统治魂飞魄散，动摇了他们整个的统治。因此，敌人为要维持他们最后的挣扎，于是更加注意对苏区和红军进攻，但是敌人已感觉到用飞机大炮机关枪施用无效，所以使用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打入我们苏区和红军内面来破坏红军与苏区。这个计划非常毒辣，飞机大炮我们容易看见，改组派，AB团，第三党是使我们不容易看见的。敌人对付我们是何等的毒辣，每个同志不能忘记的。现在要说到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他在红军中的活动以及此次我们肃清的经过：

一　改组派AB团第三党来此苏区的路线——他们在十七年就打进来了，如①许继慎，是由上海来的，他当时就与第三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那时中央派人与他谈话，老许表示悔过，结果中央派他来当第一军军长，实际上许继慎又奉了第三党中央的命令而来。熊受暄也是奉了第三党中央AB团命令来担负发展他们的组织的责任。②高建斗，是在张发奎部下当营长，他是从武汉来的，也是受了AB团第三党的使命。③封俊，是在杨虎城部下干过，变节的共产党员，正是红军打信阳时候来的。④李荣贵，是在上海加入了第三党才来的，来了就在第一师当政治委员，潘佛夫的留下和恢复党籍以及提拔当参谋长，是荣贵干的勾当。⑤潘皈佛，在唐生智部下当官夫，奉了唐的命令由信阳到孝感，由孝感来的，并带他的老婆共同做破坏工作。还要报告一件，当高建斗来时，AB团说你去拍熊受暄肩上，拍三下就可以接到头，因此他们一到，就在红军中，地方中形成了组织。

二　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的发展——同志们都知道了他们来的已有很久的历史，因此他们就大肆发展他们的组织，在去年和今年就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萧方，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是他们九个领袖，主席是许继慎，再在下面各师团营连发展组织，但如果下面破坏了，很难找到上面的关系。我再举个例子你们看，周维炯是个英雄，他完全是拿共产党的招牌来替他打天下，他目中没有什么苏维埃和共产党，他曾经杀了两个党代表，和一个中央巡视员，赶走了郭述申刘英两个同志，他老早就在商城有了AB团改组派的组织。因此，改组派又

更大发展，尤其是商光路叶某黎某南下时更大肆活动，现在从整个肃清改逆中，从四军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十三师就可以看出。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一个师政治委员（庞永骏），八个团长，五个团政治委员（团长潘皈佛，吴云三，高建斗，王则先，萧方，王明，魏孟贤，曹光南，团政治委员封俊，江子英，袁×甫，吴精赤，刘性成），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亦有许多，连排长亦有一部分。如皖西军事委员会姜镜堂，皖西北四个县委书记（富农分子）几个党团特委委员（富农地主成分）及圻黄广的组织大半都是。这证明蒋介石汪精卫进攻赤区和红军的企图和反革命组织的庞大，这证明过去红四军简直实际上是改组派领导，而红军主要负责人曾置若罔闻，还向分局报告说红军健全。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这一千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中，计算起来，大半是地主富农流氓地痞青红帮国民党侦探黄埔学生哗变俘虏士兵及开除的CPCY分子，在这些分子内面，工农分子极少，这一千内面有七百多个共产党（混蛋），青年少，同时可以看出乡土观念地方观念感情观念的大结合，如商城六霍多，黄麻较少。

三　同志们！再看他们的策略路线阴谋诡计——我们整个的说出来，就是拖枪跑，杀工农分子及共产党员，投降国民党破坏红军和苏区。我们曾记得老二十八团二十二团打大山寨的时候，那时是高建斗封俊指挥，差不多前后伤亡七百人，一个顶精锐的二十八团在大山寨一下子损失大半，这是他们最得意的一回事。打青区，我们是费了多大力量，怪不得不易打通，周维炯许继慎时常派人与青区民团首领顾金芝接头，什么消息顾金芝都知道，在商光路顾金芝有无线电一架，替他们打电报给蒋介石，报告他们活动的内容，他们是老早要拖四军走的。在新集开第二次会时，姜镜堂许继慎周维炯用大的力量提议断绝长江，当时曾中生（立三路线）极端赞成，结果做了这样的决议案，南下是他们最痛快的整个断送红军的机会，当着攻下英山的时候，第一天蒋介石就派有两个全权代表钟俊钟梅桥等来勾结许继慎等，许他们为暂编第十四军军长，萧方，周维炯都是师长，并许大洋三十万元，准备将英勇武装同志牺牲流血换来的红四军拖到武穴去消灭去缴枪，扯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红军攻下英山后，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全体动员主张与拥护曾中生去占据武穴的计划，在熊受暄公馆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要改变行动到武穴去，同时许继慎立即派钟俊到汉口去见老蒋去接洽一切。老早武穴有三只大兵舰送洋钱等候，并准备徐夏军队夹击。许继慎等又由黄广方面找了两个改组派装着地方农民来接头说那方如何如何。决定到武穴，改变中央分局对四军的计划。曾中生由英山来信说：圻黄广组织派了很多负责人去接头，要求四军去武穴，这些代表就是改组派派来的。蒋介石派的钟俊，他们不说出真名，说他是钟蜀吾，出一个假布告说钟蜀吾是蒋介石派来的侦探，现已执法枪毙。其实老许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还有一个钟梅桥是钟俊之弟，在十二师政治部住了三十一天，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出来的介绍信，并在罗田方面办了一个交通站，时常与夏斗寅郑其玉的代表接头。阵亡数百个战士得来的英山城，竟成了他们嫖吃赌玩的乐园，每天在熊公馆大吃大喝，找小老婆，庞永骏是工人，是苏联回来的，这个混蛋东西也在其内。许继慎熊受暄萧方在英山城公开会议上说，国民党包围会剿厉害，红军太少，只有到国民党方面去找出路，这是十二师的传令兵讲的，一句话也不错，十二师留英山，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整天政治部政治处出去开改组派会，回来说分配了几多的土地，武装的农民是改组派青红帮流氓地痞富农分子，而当时曾中生在反对中央分局的信中，大大说明这次政治工作，分了几万石土地，武装了几万群众，其实都是自欺与欺中

央分局。成千成百的战士流血牺牲得来的枪枝，竟公然交给了改组派，土地分给了地主与富农，这是怎样寒心，看改组派是何等的毒辣！再看四军到圻水的状况，到圻水几天，听说上巴回到有匪军两团，军部即令参谋处派侦探去探查，恰恰中了他们的计，改组派的范沱，即派十一师三十一团参谋长改逆陶溶去，陶溶去的时候，带了几个传令兵，未到上巴河去，实际上到了离上巴河几里的地方，这时他叫传令兵转回圻水，他自己在那个地方开改组派的会议，说四军到武穴去等……在圻水弄的金子，军部封得很紧，送往后方军委会，被许继慎开了一包给他的小老婆去了（王鄂平的妹子，很漂亮的），熊受暄开了一包给他的太太，并将洋元七万六千元准备做四军冬衣费的，被他送给第三党的中央和鄂豫皖区改组派的用费不少，到现在红四军官长，还是有三分之一受冷受冻。更可耻的，当着红军进圻水的时候，有三百多土豪劣绅，穿官布衣衫来鸣炮来欢迎红军，第二天都装着农民穿盥衣服草鞋来接迎红军开大会，圻水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群众报告是大流氓，当时军政部也不管，周维炯的司令部扎在当铺内，大吃大喝，吃喝完就出外跑马开改组派会议。其他还有许多，一时一刻也说不尽。后来到曹家河去解决王光荣第八旅，潘皈佛又违抗命令，打曹家河时，他送死了多少干部和士兵，并且据二十八团报告，他叫杨德胜向徐向前同志打两驳壳枪没有中，后来破获他们的时候，他叫三十团传令排长改逆杨德胜说是打三十团政委封俊，这样的来欺骗我们谁个信呢？后来被武穴大水所阻，同志们！假使不是这大水所阻的话，那红四军就不能回来见我鄂豫皖工农了啊！这次四军南下，改组派 AB 团是得到多大的发展啊！还有更痛心的事，打洗马畈一仗，十师十一师伤亡四百多人，十二师伤亡一百余人，仗未结束，被中央分局命令所阻，召集回来，于是开到鸡鸣河，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反中央分局的保守右倾”，拥护曾中生反对中央分局的掌声之中，改组派又起了伟大的作用。未开大会前，许继慎在洗马畈就提议要开大会，他对改组派说，这次红四军如回去，则我们无用武之地，无论如何要用大的力量阻止四军回去。军部接到了中央分局的命令，为组织上的服从，不得不班师回来。最痛心的是军部令十二师掩护伤兵病号回英山，杀人不见血的许继慎竟不管十师十一师的伤兵病号，先把掩护伤病的队伍开走了，先把十二师开走了，先把十二师的伤兵病号送回英山，使十师十一师的伤兵病号抛弃在白色区域之沟壑中，大路旁，让老二十八团红枪会大刀会屠杀，结果被大刀会砍了的几十人，后来走得的伤兵找得了人搬运的，到了离英山城十余里之古庙，无茶无食，没有那一个人顾问，伤兵体生丛顿，而熊主任，萧师长许师长这些大老爷他却在英山喝大酒吃大烟，那里来顾问伤兵病号呢？不但如此。他们又派了一些改组派的分子来乘机活动，说你们病了没有人抬扶，还是到国民党内去当兵好，这种阴谋是许继慎干的，而当时中生同志对这问题也没有好好注意。其次在经济方面，改组派完全把持，做了不少的破坏工作，军理处长王绍怀（改组派的总经理）乱用经济造假账，说军司令部每天每人大洋四分六厘，军政治部六分八厘，士兵一分二厘，这样的在下面挑拨。十师的陆尊五替刘英弄了一些衣服穿，自己到外面说红军到底不平等，你看刘师长穿得多么好啊！三十三团团长改逆高建斗在三十三团令各营去打土豪要比赛，结果弄了一万多款子，我们只清出来一千六百多元，其余不知用往那里去了，捆他在保卫局的时候，还在他身上搜出四百八十元。同志们！这次南下，改组派每个有钱，到处有吃喝委员会，大吃大喝都是我们红色战士的血汗。改组派在红军经济方面作了一个大的破坏，据王绍怀自己说用了二三万大洋，这使我们红军过去没有油盐吃，没有好食。这是我举的几个例子。其次当四军回来时，十一师走英山的一条路，周维炯许继慎萧方熊受暄，在英山熊受暄家中又开了一个秘密会，九月十五在武穴暴动不

成，就布置同日在麻埠暴动，会议上他们还有一个争执，萧许主张在麻埠暴动有把握些，先消灭皖西北赤区，再与徐源泉夏斗寅等进攻黄麻；周维炯主张到新集来干，说擒贼先擒王，什么中央分局特苏等等都在新集，和在新集干了以后即把赤区破坏，再向京汉路拖走；后来少数服从了多数，周维炯一个争不住，于是有九月十五号在麻埠暴动的阴谋，熊受暄带三十四团坐镇英山暴动，许继慎带三十六团到金家寨——皖西北赤都等候，麻埠事起再暴动来将特苏特委工会一网打尽，麻埠留周维炯指挥全师，十师高建斗，潘皈佛指挥，十一师潘少伯指挥举行大暴动。不料反动派无论怎样的聪明诡计，到底我们有共产党中央分局正确路线的领导，九月十五日暴动，我十三日赶至麻埠，在十三号就破坏了他们的阴谋与全盘计划，开始逮捕了潘皈佛钟新山丁超等二十余人，吓得周维炯高建斗手忙脚乱，终于不敢动作，许熊闻讯，急得要死，也未敢动作。从我们在麻埠大肃清以后，改组派 AB 团的计划已完全找到了线索。回到武庙集时停了几天，他们又在商固边区发动了地方改组派的活动来响应红军内面。皖西北这末大的地方，改组派实有不少的势力，他们动员的参加红军的新兵大半是不好的成分，把富农当中农贫农当雇农的分子混入红军而加紧欺骗压迫工农分子，使之不能大批参加红军，他们不敢来。至于红军中党团组织大半是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包办，介绍党团员多介绍富农流氓分子而抑制工农，提拔干部则提拔改组派的分子而痛击工农，这样使红军党的下层组织与领导完全在改组派手中，如同以前我们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样。我曾记得当中生同志在分局作红军工作的报告时，泽民同志批评红四军中没有党，当时中生同志大不以为然，其实现在看来，当时红军中的党真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中生同志偏是否认。以后红四军回来打仁和集，打潢川南部曾万钟的部队，十师十一师即向砖桥方面移动，周维炯又在砖桥就与改组派的元老夏唯宁接洽了密约，已决定十师解决仁和集之敌，二十八团解决仁和集，三十团向机解决南亚江之敌（如无坚固工事）而牵制此敌，三十团在高建斗封俊领导之下早出发了，而逗留不进，一直到天明，二十八团在仁和集与敌人接触了，他才叫队伍由平坦地直向前方前进，在敌人机关枪扫射之下，有意把改组派两营长带两营冲锋，伤亡了一百五十人以上，而他把第一营停着见死不救，我们那个同志不伤心不流泪！仁和集结束即去围商城，围了十余日，敌人无米无粮，同时又解决了他一营兵力，被我们一个大的政治鼓动，实在动摇得很，本来可以围下，可是，因为周维炯高建斗和内部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之活动——如准备将教导团向敌人拖走，送信到商城去，周维炯令三十一团营长去迎敌，准备好了投降敌军——当时又肃反又围城，而周维炯快要逮捕而许继慎已经逮捕了的时候，蒋介石之援兵三师非常凑巧的由江西昼夜赶到，我们处内外夹攻的时候，的确再不能围困商城了，只有又去围攻草庙集戴民权，主要的是便道把队伍调回黄麻来，当打草庙集时，三十一团团长倪志星之受伤与政委郑则吾之阵亡却是由内部改组派……用枪打的，因此戴民权虽易攻下，但内部敌人如此，虽戴民权已如瓮中之鳖，困守小圩中，而我们终不能待一二日而生擒之，以至明明放出戴民权。更岂有此理的，九月三日许继慎带十二师三团去二次攻打英山，英城之三团频城固守，许继慎已去人与陈调元接头未果，我十二师亦到英山，该敌即弃城全逃，许继慎不追，士兵自愿追进行四十里后，许继慎带四十一团返英山，让三十四，三十六两团自动前进，到了太湖弥陀寺，三十六团已在前面山头缴敌人之械，三十四团后到，明知是三十六团，而萧方指挥三十四团却在对面山头不断把机关枪向三十六团射击，号兵吹号问十几次，三十四团不答复，结果三十六团被自己打死六十余人，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严重情形，当然四军不能用全力去打击外部的敌人了。只有在不断加紧肃反中，特别是四

军主力开到黄麻苏区附近来专门整理，同时又把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两团调到黄麻来一同整理，把所有证据确实的全部改逆分子（极少数战斗员除外）逮捕审讯，这样前前后后把改逆主要的负责人，许，周，熊，高，李荣贵，姜，萧诸人逮捕了，一面加紧肃反，一面加紧全部政治工作，结果造成了我们今日之伟大胜利，而致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反革命严重失败。

四 肃反的胜利——我们这次肃反的胜利，是鄂豫皖及全中国千百万劳苦工农的胜利，是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的伟大胜利，胜利的原因是：①红军中广大的工农战士群众没有被改组派抓去，因为他们是由土地革命而生长出来的，为本身谋解放斗争中出来的，工农群众真正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是他们唯一的领导者，而坚决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广大的参加肃反工作，使改组派在没有工农群众之下遭此惨败。②中国共产党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四中全会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肃反，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及其坚决执行之下，使改逆分子无从藏身，广大工农群众广大动员起来反改，改逆无处立足。③这次红军中肃反是得到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帮助，不但是红军中肃反浪潮更推动了地方肃反工作，而且正在肃反之中，地方有大批工农干部与新兵补充，地方对肃清出的改逆与富农分子严格注意，特别是地方大大动员来配合红军的向南行动。至于改组派，AB团第三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①没有工农群众，动不动红色战士的枪。②改组派反革命的政纲根本破产，而被工农群众所唾弃：因为他们“二五减租”“劳资妥协”“国民会议”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纲根本只是代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用来更进一步的屠杀工农与破坏苏维埃的武断宣传而已。③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宣传造谣阴谋破坏被铁一般的事实打破，特别是苏区的胜利革命高涨，国民党改组派之日益破产与崩溃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我们的胜利，不仅是肃清了一千个改逆AB团第三党分子和将近两千个富农，而且①坚决执行阶级路线，夺回极少数被改逆欺骗的下层群众（组织训练队，生产队，尤其以政治教育工作来夺取）。②发动广大群众个个来审查每个红色战士与官兵，同时又公开审判改逆分子，把他们的阴谋历历公布。③对改逆的首领坚决动员群众来解决，现在前方全体红色战士大声疾呼要求枪毙许继慎周维炯等。④提拔大批的工农干部，现在红军中军政党团的干部全部改造了，新提拔的十二个工人做团政治委员，七八个工农分子做团政治处主任，师团营连排长及政治指导员完全是从阶级斗争中锻炼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好的中农。⑤大大加强了而绝对提高了红军中的战斗情绪与斗争力量。⑥改造了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使从未深入的政治工作现在开始深入到战斗员中去。⑦党的组织根本改造，不断开除了大批的富农分子与引收了许多积极工农分子入党（这些分子以前完全被改组派富农所压住），而且大多数的教育了新的党团干部，真正建立了党的领导与无产阶级的领导。⑧改组了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部组织系统。⑨大大开始了真正实际的军事政治训练。⑩七天工作计划之完就，四军南下围攻黄安之扩大深入的动员。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成立与新成立的第四军之大大加强，及所属第二十五军之成立与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之扩大，使红四军不但未受改组派破坏与损失，而且更进一步扩大的巩固。这是我们的胜利。

五 目前的主要任务——这绝对不是说反改工作已经完全已经胜利到底了，用不着再肃反，或者说告一段落了。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正因为敌人对我们的包剿与进攻，还在继续，红军中改组派的残余还未彻底肃清，富农分子还有极少数存留，无产阶级领导并未到应有的加强，党的工作刚刚开始转变，而地方反改工作还未深入，这都是说明改组派在红军内部还有残余势力。如果我们肃反工作放松丝毫，改组派还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何况红军中还有

极少数几个顽强分子还不想出来自首，还有更少数的被改组派欺骗或崇拜个人的工农分子，还被改逆的威胁住而不敢自首，甚至还有已经有材料而被监视的改逆分子，党要求他猛醒自新而不加深究并给以相当工作，他反而秘密活动说："现在失败暂时停止活动，以后还是要干的"。这一切，都说明，都证明，组织肃反，反富，加深与加紧这一工作，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在纪律上来根本肃清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仍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现在我们要：

① 深入我们全部政治工作，使每个战士都了解怎样分配土地，苏维埃的全部政纲及中央的各种训令决议，使每个战士彻底了解只有共产党的政纲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而国民党改组派根本是屠杀工农与一天天走向死亡道路。

② 经常或定期举行对每一个战斗员及官兵的个别清洗，坚决反富，不让一个富农再混进来，坚决引进与提拔工农干部。

③ 扩大与加强党团员的责任与活动，而成为真正群众的模范与领导者，把好的工农分子吸收进来，加强其政治教育。

④ 地方应充分应用四军中肃反的经验与教训．深入肃反工作，使反革命分子无从立足，即特别改造党团苏维埃工会的全部工作，使广大工人红军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而致改组派无活动机会。

同志们！目前红四军真正是工农的军队了，真正是鄂豫皖赤区的支柱，是去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武器了。但是经此伟大的转变之后，干部是严重的问题。因此我对于大会有以下的要求：

同志们！目前革命形势更进一步的高涨，反革命的统治更进一步的崩溃，当此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东三省瓜分中国进攻苏联，镇压中国革命，而蒋介石汪精卫及一切反革命们正在投降帝国主义以谋内部妥协而一致进攻苏区与包围苏区的时候，我们应丝毫不疲倦的继续肃反，以已经冲破二次包剿的胜利，来准备一切，大举向敌人进攻，进一步冲破敌人第三次包围会剿巩固鄂豫皖苏区，与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中央分局暨省委诸同志：

读了你们许多的文件，我们认为中局在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斗争中获得伟大的胜利。联合的反革命派的破获，红四军的光荣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改造，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群众工作之开展，新干部的提拔和训练上，鄂豫皖苏区在中局的领导之下得到它的成功和进步。我们在这封信中不预备给鄂豫皖区的各种工作以一个总的估计与检查，我们仅仅想提出关于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工作，我们觉得在这目前极端重要的工作上却正是鄂豫皖整个工作最弱之一点。

首先关于满洲事变的估计。中央分局在两个文件上这样说：

“……这一事变充分的证明了以下的两点：

（一）帝国主义的互相争夺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起来。这次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和英法美同时出兵是暴露了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瓜分中国的企图。

（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功，使得国际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恐慌和动摇。帝国主义为要挽救它们的生命，不得不实行预定的一九三一年武装进攻苏联的计划，这次日本占领满洲，炸毁中东路，英美法各国同时出兵……正是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派要实行武装进攻苏联的企图。”（宣传大纲）

“……很明显的，帝国主义实行武装进攻苏联，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首先爆发于武装瓜分中国的可能。这是国际危机已经转入更深剧的一层。”（决议）

在这一分析和估计之中，第一，忽略了满洲事变的另外一个极重要的意义，就是满洲事变是帝国主义从隐秘的武装干涉（供给军火、军费、军事顾问给反革命的军队等等）到公开的直接的武装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着重的指出这点：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区红军的屡次溃败和覆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斗争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步的行动（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能够压迫革命运动之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运动，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和苏

维埃运动。”

第二，在这段模糊的分析之中，没有确定反苏联战争与进攻中国革命是目前最主要的危险。中央在自己的决议中曾经给全党同志以清晰的了解：

“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费军火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极危险的步骤。……目前的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它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之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将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在面前”（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可惜，这一正确的分析没有被鄂豫皖的领导同志所严重的注意。

第三，在整个的宣传大纲中没有一个字说到满洲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的结果。即在决议上亦仅仅说到“党要向广大群众揭破蒋介石及任何国民党军阀的走狗面目。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对苏区红军正在进行的包剿和白色恐怖，一点不见得比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屠杀工农的反动性轻些”。这里，“蒋介石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对苏区与红军正在进行的包剿和白色恐怖”，我们觉得是不正确的。蒋介石的进攻苏区与红军，不仅是为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是为着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着维持国民党的专政，而是为着整个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着维持与巩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地制度。这是附带的，最主要的是：在这决议案与宣传大纲上没有充分的揭破国民党统治的“卖国”和“辱国”的面目。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变之后，只有空口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公开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答应一切日本的要求，解散反日组织与镇压反日运动等等。

由于这些分析上的错误、缺点，使得鄂豫皖的党不能够迅速的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执行国际的指示：“武装民众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与独立统一中国，号召推翻出卖民族利益、污辱民族的国民党政府。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同样亦是这个错误的估计，阻碍着鄂豫皖苏区内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猛烈开展。

最近鄂豫皖苏区省委的决议（二月十七日）虽然在这方面进了一步，指出了“目前两个大战中，最中心而最迫切的危险就是帝国主义列强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指出了：“鄂豫皖苏区党目前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动员广大群众，准备同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是在这个决议中依然有许多原则的、政治的错误：

第一，是不正确的市侩式的曲解苏联的和平政策。决议上这样说：

“当然，苏联的政策目前是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争取帝国主义间的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首先爆发这个有利的前途。只有在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无产阶级祖国的利益的时候，才取军事行动给敌人以迎头打击”。

亲爱的同志们！了解苏联的和平政策为“争取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爆发的政策”,这是极错误的市侩式的曲解和平政策。苏联的和平政策，不仅表现苏联不愿意进行战争（当然敌人来侵略社会主义的土地时，将给以迎头痛击),而且表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强盗分赃战争，所以在军缩会议上只有苏维埃政府提议彻底的废除军备或裁减军备到最少限度，所以苏联的政策不是争取帝国主义间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爆发，而是为消灭世界第二次大战争，为着消灭产生大战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而斗争！

第二，不了解“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增涨，不能够减轻反而只有增加它们对于苏联共同的敌视和反苏联的反革命战争的准备”。而认为：

“……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也空前的紧张起来，但是由于世界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这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互相战争虽是到了最后爆发的片刻之间，也是可以忽然彼此妥协，转过身来对付苏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不，亲爱的同志们！反苏联战争成为目前最迫切的危险，不是因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虽到了最后爆发的片刻之间，也可以忽然彼此妥协，转过身来对付苏联、中国与世界革命”，而是因为“目前已经在反苏联的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而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不能够减轻而且只有增加它们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一致的矛盾”(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将机会主义的偶然论点代替这个真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了解是极有害的，他可以懈怠群众的警觉，妨害我们战斗的动员群众来拥护苏联，因为这不能使群众了解反苏联战争危险的迫切，反使他们可以想到如果最后的片刻这忽然的彼此妥协不成功呢，难道一定忽然彼此妥协么？……

第三，更危险、更错误的是决议中关于国内政治状况分析的一段，这样说：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迁都洛阳证明蒋介石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包围会剿将加紧执行，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武汉，将使鄂豫皖苏区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摆在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

首先，这里对于反动统治的崩溃的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政府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参阅附上各件)，可以把它当做无关重要的偏师么？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应该继续在“一寸土地不让敌人蹂躏”，“为保卫土地革命的利益而战”及“击破阻碍红军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口号之下，来将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战斗的动员起来，击溃敌人的进攻与获得新的胜利。

其次，对于帝国主义的公开干涉与隐秘的干涉的相互关系应该有清楚的了解。完全正确

的，满洲事变及上海战争表明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直接的武力干涉，同样正确的就是“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时期是在前面”。但是假如以帝国主义者已经抛弃他们隐秘的干涉方法而不用了，那是错误的。斯大林说：

> “干涉并不限于运送军队，而运送军队并不是干涉的特点……在现代的各种条件之下，帝国主义宁愿去组织附属国内部的内战，财政上资助反革命势力去反对革命，精神上财政上去援助它们的中国走狗去反对革命，用这些方法来实行干涉”。

在满洲事变前夜的情况正是如此。在公开干涉开始的现在，帝国主义亦决不会抛弃这个巧妙的方法。所以若说在进攻鄂豫皖苏区中帝国主义军队已经是主力，而国民党军队是偏师是绝对错误的。这我们当然绝不是要大家不去组织、准备、领导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相反地，这是目前最切要的，必须即刻进行的行动口号，而不是宣传的口号。

最后，关于领导的工作与方法的转变问题，我们觉得不管中央分局与省委在最近有个别严重的错误，但一般地是执行了正确的党的路线，不过在下层组织中真正的对于这个路线的实行还是非常不够，有许多决议案（特别如中央反帝决议等）根本没有想方法去实行。在这里我们认为建立各级委员会的集体的领导是必要的。不仅每一个委员会或部要有经常的工作，而且必须要有经常的工作的检查，执行程度的检查，为每一个决议的每一条文的实现而斗争。要严格地执行各人对自己工作负责制度。对于每一个大的或小的问题应该给下级党部或同志以最详细的最具体的指导。应该将领导接近区、支部与群众吸收地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参加有关的问题的讨论。用一切方法来改变一切浮泛的纸头上的领导为活的具体的领导，这是争取党和群众工作彻底转变的必要条件。

（下略）

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一）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开展着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更加紧张与尖锐；经济危机影响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一切生产部门；贫困，失业，生产缩减，工厂与银行的倒闭，财政的危机统治着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奠定了它的基础，五年计划的四年完成，使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伟大的工业的建设，集体化的成功，富农阶级的消灭，劳苦工农生活的改善与积极的增长，使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能够为着“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的成份，最后消灭阶级，完全取消产生阶级及剥削制度的根源，克服经济中及人民观念中的资本主义的残余，将劳动群众全体转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的觉悟的和积极的建设者”（联共十七次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令）而斗争。这就空前的尖锐地暴露建设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间的斗争，胜利毫无疑义地是属于社会主义方面的了。这不能不引到帝国主义反苏联反革命的战争危机的空前的紧张。反苏联战争的危险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的危急。在满洲被摧残与蹂躏之后，在上海浴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正是向着苏联的边境前进，大炮的雷鸣，轰响于邻近苏联的满洲的边境；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了派遣大批的军队在满洲之外，更武装了日本在满的侨民，组织屯田军，武装白俄，在韩国建立了极大的兵工厂，改造松花江的商船为兵舰，建筑许多的飞机场，利用在它卵翼之下的“满洲国”的政府来作反苏联的工具。其他帝国主义者集中大量的军队来进攻苏联与中国苏维埃。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同盟者法国帝国主义，正在疯狂般地进行组织与扩大反苏联战争的西方战争，进行最无耻的挑衅的行为（戈洛罗夫事件等）；英国帝国主义正在企图恢复英日同盟，美国帝国主义积极的赞助与组织反苏联的战争，法意协约的订立，多瑙河同盟计划等等都是最明白说明帝国主义者积极的准备反苏联战争的冒险正狂热地进行。裁军会议与社会法西斯蒂的和平主义的空谈，只是掩饰战争准备的积极进行与社会法西斯蒂的公开无耻的参加反苏联战争的热忱。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最公开与无耻的出卖中国给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它们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用枪口向着中国苏维埃与苏联。它们公开的出卖淞沪，使日本帝国主义者能够将大批的军队去进攻苏联，它们出卖满洲给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所谓“开发西北”，“充实西北边防”，实际上是国民党准备在这方面进攻苏联的步骤；所谓牛兰案件的武断的煽动，以及一切国民党报纸的咒骂与挑衅，南京的禁止登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消息的密令，都显然是反苏联战争在中国的舆论的准备步骤。最后，应该记得国民党新的对于苏区的总进攻是帝国主义在积极准备武装进攻苏联行动中的不可分离的必要步骤。一切反革命派别——特别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无耻的宣传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冷淡，及否认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的存在，实际上是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来进行反苏联战争的舆论的准备，企图阻滞在全国劳苦群众中增长着的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同情与信念，企图麻痹群众动

员拥护苏联的警觉。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矛盾的尖锐，是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同时它极大地加紧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一切矛盾的紧张。它激起千百万的无产阶级起来争取危机中的革命的出路。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极猛烈的发展着，造成了许多国家间的革命危机的成熟。在经济恐慌的面前，国际帝国主义列强间为着重新分割市场（特别是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亦在增长起来。这种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与冲突，不但不能减弱，反而只有增加它们共同一致的进攻苏联的斗争，企图牺牲苏联，求得从危机中解脱起来。

在紧张的反苏联战争危险的面前，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面前放着伟大的历史的任务，积极地组织、领导千百万工人与劳苦群众起来反对反苏联战争，反对战争的斗争。应该首先十倍、百倍的发展与加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战斗，扩大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消灭阻碍民族革命的胜利与投降帝国主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组织军事工业、铁路、海员、兵工厂的斗争，从拒绝运兵、运械直到他们的同盟罢工，千百倍地加强在国民党、在"满洲国"及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军的工作。

北方会议认为在我们反对反苏联战争危险的斗争的程度与速度远不能赶上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程度与速度。反对反苏联战争的宣传煽动工作还缺乏经常的系统的进行，在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着对于反苏联战争的机会主义的轻视，而在目前反苏联战争危险空前危急的时候，对于这种危险的估计不足是最有害的、最可怕的机会主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及社会法西斯蒂的思想在我们队伍的影响，因为它将麻痹、阻碍我们的战斗动员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来保卫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

北方会议指出：在紧张的反苏联战争的面前，特别的加重了北方各省共产党的组织的保护苏联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满洲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之后，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前线，另一方面，在"开发西北""充实西北边防"的武断煽动之下，明显的看到国民党等军阀将从这方面企图反苏联与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冒险。所以，我们必须十倍、百倍的加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国民党满洲国的反苏联的企图与挑衅，开展广大的群众的保护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运动。这个任务的执行，是与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组织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与建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不能分离的。

(二)中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专政与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尖锐的对立。这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这是全国革命危机生长的最主要的标志。增长着的苏维埃运动在蓬蓬勃勃的发展着。在冲破"三次围剿"之后，工农红军在进攻的战斗之中，在一切战线上获得了决定的胜利，击溃了敌人十数师的兵力，缴获了敌人四万余枝步枪与几百挺机关枪与迫击炮，几架飞机，夺取了许多城市，大大的扩展了苏维埃区域，在漳州、汀州、龙岩、六安、正阳、霍邱、潜江、应城、华埠等等城市飘荡着赤色的大纛。

中央苏维埃的成立，更加尖锐的表现出了两个政权的对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只是它统治着的近一万万人口的区域中的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且是全国的革命运动领导者与组织者。经过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中国无产阶级在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是更加巩固了。

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大踏步地向着铁军的道路上猛进。由于胜利的扑灭内部的反革命组织与立三路线的错误政策之肃清，苏维埃政权的改造与巩固，苏区是大大的巩固了；它克服了灾荒、饥饿与敌人的进攻，而开始了新的苏维埃建设的初步。由于没收来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的平均分配与劳动法的坚决实行，工农生活是有了初步的改善，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苏维埃与红军的威信在全国劳苦群众中是大大地增高了。在广大的劳苦群众之间，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热忱是在增长着，成千成百的工人群众要到红军中去，募捐慰劳红军的运动是猛烈的发展着。

(三)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巩固和扩大面前，在整个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半殖民地反动统治动摇的面前，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更加积极地起来直接干涉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与瓜分中国。满洲的占领，上海战争，法国的侵入云南，英国的组织藏兵侵入西康，都明白证明帝国主义者公开的最后的瓜分中国的政策是在积极的进行。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是瓜分中国的参加者，日本暴行的同谋者与共同犯，国际联盟与其调查团更明白的是瓜分中国的机关与组织者。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完完全全是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污辱民族的政府，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与清道夫。他们以“不抵抗”、“逆来顺受”将满洲的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蹂躏、践踏、屠杀与剥削，当着上海十九路军自动的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时，国民党政府及军阀自觉的采取失败主义的政策，以屠杀与恐怖来逼迫抗日士兵退却，以后并公开的无耻的签定停战协定出卖淞沪，且与帝国主义者一致地进行大上海的计划——就是说将中国无产阶级中心交给国际帝国主义共管。

帝国主义侵略的激进，国民党统治的无耻的卖国，引起广大的千百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强烈的高涨，反帝斗争增添了新的千百万群众的参加，群众的反帝运动的多少开展，马上就转变成为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斗争，与军警剧烈的冲突与捣毁国民党的统治机关(上海、广州、福建、山西、河北等)。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初的阶段，虽然工农群众积极性是剧烈的增长，而表面上这个运动以学生运动表现得更加激烈。在目前的阶段上，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沪西纱厂工人的罢工战斗，十九路军士兵的自动抗日，满洲义勇军的英勇战斗，明白的表现出来工人阶级与农民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而英勇的工农红军的光荣胜利与上海战争的教训，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与推翻了反革命的国民党统治之后，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因之，满洲的义勇军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与完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在中国的面前放着两条路：或者是被帝国主义瓜分而沦于悲惨的殖民地地位，或者独立自由的解放的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平民式的消灭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劳苦群众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经济浩劫、饥饿、贫困、死亡的唯一的道路。

一切在野的反革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国民大会决定对日宣战”，“断绝邦交”，“对日经济绝交”等等，在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国民党的出卖与投降的烟幕弹，而且实际上是同样的出卖民族利益的必要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的领导者，它的各省组织都成为群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唯一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北方各省党的组织在积极的领导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了许多成绩；但是在这方面依然是有许多错误、缺点与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首先表现在满洲党的组织机会主义的忽略争取发展着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个别党的组织在反帝运动中或者拒绝反日运动的领导的关门主义，实际上是取消反帝运动的倒过来的取消主义(如

陕西），或者是公开的向资产阶级的投降，放弃党的独立的领导与彻底的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如河南与陕西有些县委）。

今后北方党在这方面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开展北方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用一切力量争取群众的领导权到我们手里，揭破国民党改组派的欺骗，动员工人和得力的干部去参加和领导满洲的反日战争，要十倍努力的组织工人群众的反日罢工，发展抵货运动，将抵货运动的领导争取到我们手中来，发展与创立反帝的与反日的广大的群众组织，保证在这些组织中的无产阶级的骨干与领导，武装工人与劳苦群众，开展、组织、领导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的战争。最广大的告诉群众：只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民众的劳苦的苏维埃政府，才能够顺利的实行民族革命的胜利，与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四）国民党五年来的统治，不仅以自己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引导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与中国的完全遭受它们的瓜分，而且以自己反动的经济与政治的方策，引导到全国的国民经济的浩劫与几万万劳苦群众的饥寒与死亡。轻工业的部门（丝、纱、烟、面粉、火柴等）完全处于衰落与恐慌的状况之中，重工业更加紧的非民族化而完全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之下。由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的罪恶而造成的空前的灾荒，使农村经济的崩溃更加急剧而猛烈，几千万万亩的土地，几千万栋的房屋，完全被大水所冲没，几千万农民完全处于非人的饥饿、寒冷与死亡的境地。地主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更用灾荒与“赈灾”的名义来加紧对于农民的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将满洲的许多城市及上海的工人区域（闸北）变为一片的瓦砾场，使着千百万的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在国民经济浩劫的情况之下，资本家更利用此种情况来向已经极端恶化的工人生活进攻，工资是大大的减少了，赏工、米贴等等许多地方亦是取消了，工作时间许多是延长到十六小时以上，对于学徒与青工的奴隶的剥削更加紧了。劳苦群众的生活是绝对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

同时，统治阶级亦是到了不能再“照旧统治”的形势：财政的危机发展到极端严重的状况，统治者阶级虽然用一切的力量来加紧对民众的剥削来企图挽救，但是由于苏区的扩大与国民经济的浩劫，使他们在这方面亦是更加的困难了；由于反革命统治的危机与帝国主义间矛盾的紧张，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冲突与矛盾是在增长；这表现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政客的活动与军阀间冲突的紧张，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将削弱他们的力量与造成对革命势力发展的有利的条件。同时应该清楚明白的知道，在野的反革命派的假的“激进”的词句或“反”国民党统治的把戏，实际上是为着怎样更好的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军阀内部的矛盾，不会减弱他们对于进攻苏区的积极，相反地，他们企图在正进攻苏区中获得自己本身间矛盾之解决。

在这种情形之下，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它的下层分子之革命化，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国已经到了革命危机的阶段，革命危机是在日益增长与尖锐化起来！

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与劳动群众生活的极端的恶化，在北方的各省是更加锐利而猛烈，在陕、甘、晋、豫、直、鲁各省，由于历年来的军阀混战、封建剥削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长期延长到四五年的灾荒，田地荒芜，广大的农民群众饥饿、死亡，而且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在农村中更因灾荒而繁酷起来。工业与手工业的破产、商业的停滞、物价的高贵，随着满洲事变、天津的扰乱与上海战争而更加尖锐起来。在天津、唐山、青岛、郑州等等大城市及铁路工人的生活，亦更是不堪设想的恶化，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欠薪、取消加点等等，残酷地打击着工人的生活。由于小军阀割据的局面，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亦是十分紧张，

军阀间的冲突和战争是没有间断过(如陕西)。财政的恐慌与困难，在北方亦更加的厉害，苛捐杂税在北方是更多、更凶，国家主义派及其他的反革命派别亦积极的在北方活动。因之，会议最坚决的指斥北方“特殊论”与北方“例外论”，这是没有根据的机会主义的胡说，实质上是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北方的存在。

(五)在这种情形之下，罢工斗争疾风暴雨般的高涨着；高涨着的罢工斗争的浪潮波及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主要队伍。工人阶级以罢工的武器来回答资本家的进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罢工斗争给全国反帝运动，灾民、农民斗争以坚定的信念与胜利的决心，斗争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上海沪西日本纱厂三月之久的坚持罢工，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新的光荣的一页。虽然斗争广大部分是经济的性质，但是经济与政治的口号的密切的关系与罢工的革命的意义更加明白。反日与反国民党的政治罢工(沪西纱厂，全国邮工)亦在增长起来。在工人斗争的紧张的情况之下，黄色工会不管它在工人群众中影响的削弱，而他们积极性亦增长了。他们用一切的方法来阻碍和破坏工人的斗争，常常利用领导斗争来使斗争失去真实的领导，以便出卖斗争。正因为赤色工会——尤其是它在黄色工会内工作的薄弱，在许多情况之下他们能够时常的运用这个策略。党的赤色工会在领导罢工斗争上虽然是有了一些成绩，但是许多的罢工还是没有得到我们的领导，罢工战术上有许多错误，使着开展着的罢工斗争，有一部分因为没有我们的领导或领导错误而失败。

在农村经济崩溃与群众生活恶化，工农红军的胜利与罢工浪潮的影响之下，农民与灾民的斗争亦如野火燎原一般的爆发起来。高涨着的农民斗争是很快的从抗租与分粮的斗争转变为革命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开展，配合着工人与士兵的斗争，迅速的长成为新的苏区与新的红军队伍。同时有许多农民的斗争，因为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党的工作，虽然开展到极大的群众运动（如长乐甚至占了县城),便很快的消散或失败了。更有一部分的农民斗争还在富农或小地主的领导之下，带着明显的原始性与缺乏明显政治旗帜与土地革命的彻底口号的。虽然许多党部（如陕西党）领导了许多农民斗争，与发动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是一般的说来，党的工作是极大的落后于农民积极性的增长，个别的党员与党部还有害怕游击战争的发动，与企图联合富农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工农红军的胜利，罢工斗争的高涨，土地革命的影响，不能不促进国民党军队的瓦解，兵变的潮流极大的开展着。接近红军的区域与民族革命战争开展的区域(满洲)，士兵的叛变是更加多，范围亦更加大。国民党军事力量之瓦解与兵变，是红军与革命斗争发展的有利条件。

革命运动在中国的北方各省亦是突飞猛进的发展着：唐山、天津、青岛、郑州、沈阳、哈尔滨的罢工浪潮汹涌的高涨，满洲革命工人、农民、兵士进行着残酷的反日战争，陕甘边区红军二十六军的成立，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主要特征。罢工从重要的城市普遍到偏僻的区域与小城市中去；罢工潮流的激越，工人群众的顽强、坚持，经济口号与反帝、反国民党的口号的密切联系，重工业的产业里爆发着同盟罢工（铁路、矿山、邮务),农民、灾民的斗争在北方各省在最广大的地区开展，从陕西到山东，满洲河南都一样到处爆发着分粮吃大户、抗租、抗税、夺取土地与农民游击运动。在满洲的反日义勇军中，在北方其他各省的红枪会、大刀会、黑旗会……等组织中，包括着许多穷苦失地的农民。士兵哗变的潮流，在满洲、陕西是特别的猛烈：苏维埃运动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的平原上燃烧起来，陕甘边区红军二十六军的成立，海洲、盱眙、河南游击运动的勃发，创立了北方新苏区的最初的根基。

革命运动的发达，向党迫切的提出了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北方会议号召各省的党，为实现北方苏维埃区域而斗争。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已经放在北方各省的工作议事日程之上。坚决的指出北方落后论的机会主义实质，所谓北方落后论，是实际上企图将中国的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这种理论的结果，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

（六）革命危机的紧张，红军苏维埃运动的光荣胜利与扩大（这胜利是全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使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的危险更加增长起来。满洲事变是帝国主义从隐秘的干涉到公开的武力干涉的开始，而目下帝国主义军队集中汉口、厦门、汕头等口岸，及漳洲占领后，帝国主义的军队的集中厦门，都明白的指明，在工农革命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摆在前面，同时，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完全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了满洲、淞沪，同时，更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集中自己所有的力量，向着早日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区与红军作新的第四次的总进攻。新的第四次“围剿”的特点是：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于“围剿”中的作用更加加强，战斗范围更加扩大，战线更加延长。国民党将一切主要军事力量（近一百万的军队与全部的航空队伍），向着各个苏区进攻，这与三次“围剿”集中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时，是大大的不同了。而另一方面，新的“围剿”是在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的状况之下进行的，这就是说：国民党的财政危机更加剧烈，内部的冲突更加紧张，军事力量一般的比前削弱，及全国革命斗争风暴般高涨的情形之下，国民党在进行新的进攻。显然，在当前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上，优势是在红军和苏维埃方面的。英勇的工农红军，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之下，得到全国的工农群众的拥护，将无疑的能够击破敌人的新进攻，并且必然地要用向敌人进攻的路线，来争取联系一片的苏区，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

会议指出：发展最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进攻红军的运动，是一切党的及革命的群众组织面前最紧急的战斗任务。组织工人群众的反抗的关车罢工，拒绝替国民党运输军队与军火，反抗一切用来进攻红军的捐税，组织邻近苏区的游击战争与破坏工作，瓦解进攻红军的部队，组织革命兵变，这些是一刻不能延缓的工作。会议特别指出河南在进攻红军中特殊的地位，号召河南同志发展最高的积极性，组织劳苦群众，来反抗国民党的进攻和配合工农红军的英勇的战斗。会议号召陕西的同志与工人群众，用一切力量来帮助甘陕游击队的发展，反抗国民党进攻红军二十六军！到红军二十六军中去！

在地主资产阶级向着红军苏区及全国革命运动作新的总的进攻之中，在野的反革命派的积极活动，成了这新的进攻的支流。这些反革命派别（孙科派、第三党、社会与教育派、国家主义派、托陈取消派），玩弄“左”的辞句，以民主政治的烟幕弹来维持反革命的统治，它们的“国民大会”、“取消党治”、“实行宪政”、“全民政治”与“国民会议”，实际上都是企图吸引群众不去进行革命的斗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是去与反革命的统治妥协。它们更企图在“对俄复交”、“允许共产党公开只要共产党不暴动与解散红军”等等的无耻的武断煽动之下，来帮助国民党作进攻苏联与中国红军的偏师。所有这些反革命派，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奴役统治的拥护者，同时它们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残酷的无情的揭露它们，不消灭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工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七）北方会议认为在中央的正确的领导之下，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与党员群众，在极端

艰难的环境之中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并获得一些成绩；在陕西，在坚决的残酷的斗争中，建立了陕甘边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与红军，发动与领导了栒邑、三原、蒲城等处的农民斗争与陕西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组织了几次士兵的兵变；在河北，恢复了屡经破坏的组织，组织与领导了唐山的同盟罢工，组织与领导了北平的反帝示威与建立群众的反帝同盟组织；在山东，在最近的时期中，在撤换机会主义的领导之后，加强了在中心的产业区与工人中的工作，领导了许多罢工斗争与反帝运动；在河南，领导了孝义兵工厂的两次斗争，发动了豫中的游击战争；在满洲，虽然由于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可观的成绩，但是许多的党员在积极地英勇地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战斗。但是这些成绩是丝毫的不能满意的。党的工作一般的落后于群众积极性的增长，工作中有许多严重的缺点、错误和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最主要的表现在对于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争取的忽视(满洲)，在领导反帝斗争中，缺乏明确的阶级的立场，常常修改与曲解党的口号与纲领（河南、陕西、满洲)，对于反苏联战争危险的估计不足，与实际反对反苏联战争的斗争的缺乏，党的组织一般的没有成为罢工运动的组织与领导者，对于组织游击战争与兵变的消极无能，以及对于反革命派别斗争的极端不充分。在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深入，领导方式的恶劣，培养提拔干部的不足，与严重的关门主义的现象，所有这些，在革命危机增长的现在，成为极端危险的现象。

会议认为：必须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成绩，纠正和肃清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根据目前全国革命危机的尖锐，与北方革命运动的猛烈的发展，为着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北方的新的苏维埃区域，为着进行真实的拥护苏联，拥护中国苏维埃红军的斗争，夺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必须：

1． 加紧的准备组织工人阶级的反对资本家进攻与帝国主义侵略的罢工斗争。“没有任何时候罢工斗争比现在更有严重的革命意义的了，无产阶级不但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家对于工人的进攻，而且只有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信心、决心与革命的坚持性”，“罢工依然是革命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主要的武器之一”。经济斗争意义在目前特别的重大了，因为“只有经济斗争及只有为着自己生活状况即刻的直接改善的斗争，才能够激动被剥削群众的落后阶层，给他们以真正的教育，在革命时代的几个月内将他们变成为政治战斗员的军队”(列宁)。中国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领导权的巩固，应该由红军苏区的坚固与罢工斗争的范围来决定，因之，对于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应该给以最无情的打击。这种机会主义表现在：“从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的屈服与投降，走到企图复活立三路线组织方式，最后，一直到纯粹的工团主义及将经济与政治分开，走到纯粹的经济主义，拒绝参加与领导政治斗争”。同样是机会主义的变形，就是对于工人经济斗争的忽视与轻视。反对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小心的准备、组织与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战斗，广大组织赤色工会内的革命的反对派，是目前战斗的任务，与这个任务不能分离的真正的开始在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之中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

2． 发展农民与灾民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日常斗争，发动革命的游击战争，并尽量的在游击队的积极行动之中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在灾荒极端严重的状态之下，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之下，一切的农民与灾民斗争，都迅速的转变到武装的斗争上去，党在组织与领导农民斗争时，应该清楚的估计到这个斗争发展的前途。畏惧与企图阻止农民的游击战争的开展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自然，这不是说党不应该为着农民的日常要求与利益而斗争，相反地，

党应该是农民日常要求的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同时，为着斗争的开展与胜利，党对于农民中各种社会阶层必须有正确的关系，即使在斗争开始时对于富农有任何幻想与妥协，这将是断送斗争的可耻的机会主义。估计着在北方许多“大刀会”、“红枪会”与其他一切秘密宗教性的农民团体的积极活动，党必须参加到这些组织中间去，争取它们的下层群众，猛烈揭露它们的领导分子的反革命的面目。在满洲、陕西、晋北，特别应该注意到少数民族——韩、回、内蒙古——的工作，吸引他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

3．组织国民党士兵的革命兵变，瓦解反革命的武力：兵变潮流的开展，在党面前放着这个严重的任务。这里首先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部队，组织“剿匪”军的大部队的叛变，是给苏维埃与红军最有力的帮助。在其他的部队中的工作与组织兵变，必须有准备的使他们能够与当地的工人与农民的斗争配合起来，开展与帮助农民的游击运动。应该严厉的反对以勾结军官来代替艰苦的士兵工作的机会主义。同时，对于轻卑的盲动主义与准备进行兵变，亦应该加以严厉的反对。

党的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游击战争与士兵叛变之中应该用一切力量在宣传鼓动之中，解释各种斗争形式中的关系。“用一切力量来准备三个斗争的支流——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军事‘叛乱’——汇合成一个巨流”（列宁）。北方新苏区的建立，主要地是要依赖于这三个潮流的汇合。在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口号之下，组织与领导这些斗争，并将它们汇合起来，是对于进攻苏联与武装干涉苏区的国际帝国主义有力的打击，将是真正为着脱离帝国主义奴役、经济浩劫苏维埃道路而斗争。

为着真实执行这些严重的伟大的任务，必须实行党与群众组织的队伍的彻底的改造。这里首先应进行最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粉碎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犹豫，发展广大的自我批评，揭露一切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为着工作的转变与其速度而斗争。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广大的发展党和组织是极端严重的任务。一切关门主义对于革命是极危害的；应该尽量的把千百万的劳苦群众用各种形式组织起来，应该最大限度的吸收几千万的觉悟的工人、雇农、贫农到党里来。同时，消灭官僚式的僵化的领导方式，创立活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仔细倾听群众意见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是保证顺利执行党的战斗任务的先决前提。

北方会议号召全党的同志，在共产国际与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之下，用绝不倦怠的工作，来为着拥护苏联与中国苏维埃，为争取脱离帝国主义奴役与经济浩劫的革命的苏维埃的道路而斗争。工农革命运动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夺取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许多主要的堡垒，建造了将近一万万人口的苏维埃中国，我们今后将更进的不惧艰难、不怕牺牲、不知倦怠的工作，将更加团结几千万的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旗帜的周围，实现独立、自由与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审查了你们寄来的一些文件，认为你们在执行过去中央所给予你们的指示上，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尤其显著的是闽浙赣苏区的发展与巩固，红十军行动的积极化，苏区内的工农群众积极性的提高，以及白区群众工作与游击运动的开展。党在红军、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是很大的加强了。无疑的，赣东北省委是坚决的积极的为了实现国际与中央的路线而斗争着。

对于你们的一般指示，我们认为在现在没有这种需要，因为这种指示，在过去指示信上已经一再说及。中央方面，正在汇集苏区方面的各种材料，准备以后在某一个问题上（如象工会会员问题，肃反问题）给你们以更具体的指示。这封信指出就你们寄来的文件中所看到的一些缺点与错误，以唤起你们对于这些缺点与错误的注意。

第一，必须指出你们对于苏维埃工作的注意是非常不充分的。在你们寄来的所有报告与决议中，你们很少说到苏维埃的工作。譬如在你们“关于发展红军胜利进攻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决议”（五月二十五日通过），你们说到了红军，说到了游击队等。但是对于苏维埃的工作只是附带的说到：“在苏区内苏维埃政府必须严格的执行劳动保护法，切实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兴奋苏区与白区广大工人群众拥护苏维埃斗争的热忱”。除此以外，就没有一个字说到如何转变苏维埃的工作，使苏维埃转变为广大民众的政权机关，使苏维埃不但是土地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在你们“为打破敌人新的进攻计划的具体工作布置”的紧急通知（六月二十二日）上，在“关于红色五月的工作的决议”（四月五日）上，以及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二月二十五日）上，都是一般的，没有能够把彻底转变苏维埃的工作放在全党的前面，采取一切办法使苏维埃更进一步的变为群众的政权机关。

我们没有得到你们关于苏维埃工作的报告，我们不能有什么更具体的批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若苏维埃政权不能在一切工作上表现出它是工农民众的政权机关，吸收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在工作中，教育成千成万的民众自己管理自己，那苏维埃区域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第二，关于肃反问题，我们虽是已经一再说及，也已经唤起了你们的注意，而且你们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成绩，然而我们认为在赣东北苏区，反革命组织的领导机关，还是没有破获。估计到反革命改组派与AB团，罗章龙王克全派等在赣东北的活动，以及他们过去的力量，我们不能相信在赣东北苏区内没有象闽西、中区、鄂豫皖，湘鄂西各苏区那样的领导机关。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一直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

我们认为在肃反方面，除了你们在肃反决议案中所说的，还需要更多的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与坚决性，不放松在每一事件中反党的反苏维埃政权的分子，而把一切可疑的事件，追究

到底。这一工作，是同为了国际与中央路线的彻底执行，为了苏区内一切工作的彻底转变，而反对一切"左"右机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完全不能分开的。对于反党的反苏维埃的分子，必须最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与苏维埃的法律。最公开的同他们作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广大的党员群众工农群众。一切腐朽的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不但帮助"左"右机会主义的发展，而且也帮助了反革命分子与对革命派别的活动，在机会主义的背后常常站着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组织，这在苏区肃反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但在另一方面，必须使肃反不但不造成群众的恐怖情绪，而且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不但不使群众惧怕党与苏维埃，而且使群众更积极的来拥护党与苏维埃。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加紧肃反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密切的联系起来。依据苏区肃反的经验，反革命分子，一般的都利用党与苏维埃工作的缺点，来影响群众，或者有意曲解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来造成群众的不满。因此同反革命分子作坚决斗争，必须同时发展下层工农群众的自我批评，来同党与苏维埃一切缺点与错误作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孤立反革命分子与组织，我们更容易的去根本消灭他们。

这是在肃反方面赣东北的党所特别应该注意的。

第三，在白区（或灰区）的群众工作中，我们认为你们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的注意是不够的。虽是你们对于白区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注意，开辟了五大游击区域，然而你们在白区的工作中，许多地方还限止在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方面，而没有使游击运动与群众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你们给各白区县委的指示信中，虽是说到游击运动与群众斗争的联系，然而这只是一般的与附带的，还没有把开展对于广大反苛捐杂税抢粮分粮等的斗争放到第一位，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有些地方的群众斗争（如馀干），往往由游击队来代替，或由党去包办，而没有群众参加。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现象，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群众组织赶不上党。

同时，我们认为你们把贫农团当做"农村中群众的基本阶级组织"的观念（见你们五月九日给鄱阳县委的信）是不正确的。依照国际与中央的历次指示，白区农民群众的基本组织，应该是农民协会。而不是贫农团。这种组织应该吸收乡村中广大的中农、贫农与雇农等加入。党必须在内部组织党团来领导它的一切工作，雇农应该在内部组织他们的雇农工会小组。这种农民协会应该禁止土豪劣绅与富农加入，在斗争中把这些分子洗刷出去。

除了农民协会之外，党必须在某一斗争中，组织吸收广大农民群众的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不是什么上层的组织，它应当在日常的斗争中与农村的革命群众及农村无产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农民最切身的利益，要实际上成为农村中最有力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要集中一切农民群众之革命精力在这种斗争中，农民委员会要引导所有的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农民协会而巩固我们的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要成为争取反动组织中的农民的重要工具"（一九二九年六月国际决议）。

"农民委员会是为了某一斗争（如抢粮分粮）由全体农民（富农除外）大会选举出来的。一切它的工作，应该完全采取公开的民主的路线，而且应该向大会报告它的工作，从大会上得到各种指示，在这种委员会下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部分，如交通队、自卫宣传队等，尽量吸收广大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应该组织它的党团在中间实现它的领导。在没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党应该使农民委员会变为经常的组织。但不论在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中间，必须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贫农身上，所以贫农团在这些组织中是不需要的"（中央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

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九月十五日）。

你们把贫农团当“农村中群众的基本组织”，你们自然把农村中其他分子如中农、雇农排斥在农民基本组织之外，你们自然不能执行农村中的下层统一战线。这种关门主义的策略，不能使我们在农村中团结广大的农民在我们的周围领导他们的斗争，一直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在你们给馀干特区委的指示信（四月十日）上，更说到“要使贫农能切实领导斗争，在未公开前实际的掌握农村中的政权，在公开后即是苏维埃的骨干的组织”。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根据上面我们所说的，在白区乡村中领导群众斗争的，应该是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至于我们能实际的掌握农村政权（不论公开前或公开后）的机关应该是革命委员会，既不是农民委员会或农民协会，更不是贫农团，当然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我们才能开始组织贫农团，但这是地方的贫农积极分子的组织，它不能如工会一样，有它独立的组织系统。

无疑的，不论在白区或苏区，我们在乡村的策略，是依靠贫农，但这不是说因此要组织贫农团，象你们那样所做的，贫农团的组织，只在有苏维埃政权之下，它的任务是帮助苏维埃，执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

开展白区农民群众的广大的日常斗争，组织吸收最大多数的农民委员会，使农民的斗争与游击队运动的开展，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是赣东北党在白区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四，我们认为加紧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与红军中的领导工作上，赣东北的党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中央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接到赣东北党关于工会工作，关于如何动员工人、雇农参加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的报告。而且在有些地方表示对中央前信所指示的苏区工人群众的拥护苏维埃政权是站在最前线的一点表示怀疑。

在你们四月五日所通过的“红色五月的决议”中，没有能够把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危机中的领导作用的加强特别提出来。在具体工作的布置方面也没有特别提出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到苏维埃中间去的口号，以加强无产阶级在中间的领导作用，只是一般的说到“积极的发展赤色职工会运动，加强工会的领导，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已。在白区工作方面，也是一般的讲到发展工人斗争，而且错误的提出了，在重要城市中加紧“建立工人苏维埃”的宣传鼓动。至于领导赣东北苏区周围的那些工人斗争，集中我们的力量到那些地方去，在那些地方建立我们的工会，则很少说及，甚至完全没有说及。许多决议案中说到普遍的建立贫农团（其错误，上面已有批评），然而没有一个字说到普遍建立雇农工会，也没有一个字说到在农民的组织中加强乡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由于同志们的善忘，而是由于对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忽视，与对于目前工人斗争形势估计不足。

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你们的工作，应有很大的转变。不论是在苏区或白区，省委拿更多注意来讨论如何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与发展工人斗争与工会工作的问题，更具体的来布置你们的工作。对于劳动法的实行，应该更加坚决，并且应用更多的力量给不了解的农民群众做解释工作。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

——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 日本占据满洲后一般的状况

满洲已经被日本占据一年零四个月了，日本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把满洲变为它垄断的殖民地，变为进一步的进攻中国革命，公开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进行冒险主义的反革命的反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战争，以及为着争夺太平洋的霸权，而与自己极大的竞争者——美国，彼此进行强盗战争，而最后是对本国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等等的大本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计划能完成到什么程度和如何范围，这首先要依满洲的内部为转移，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因有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完全可耻的投降政策——“不抵抗”而能在短期间占据全满洲，那末现在它不得已而承认了，须要十万武装整齐的正式日本军队，用十年的功夫，才能在满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来，这个承认是十分有价值，和十分值得注意的。满洲现在的经济状况，正和侵略者所应许的“经济兴隆”相反，而是沿着经济危机继续加紧的道路前进着。危机几乎扩大到了灾难浩劫的状态。抚顺、穆棱等煤矿井关闭了一半。铁路（南满、北宁）不但减少了运输，而且还不经常的通行。奉天的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九个商店关闭了七千余个。北满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二分之一。在整个的北满这项损失超过了农产品的商品余额，这些余额通常是出口的。因水灾而受害者在八百万人以上；城市和乡村中的失业者，贫民饥民逐日的增加。在政治管理方面，借口铲除军阀而进行着真正的殖民地制度，保存着一切军阀官僚的国家机关系统，更加上日军直接血的统治。满洲国傀儡政治的压迫，不但未按着侵略者的应许而建立“廉洁政府”，和减轻捐税，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捐税和直接抢夺农民的土地等等。不但没有侵略者所应许的“和平秩序”，反而进行着不断的战争和各样的扰乱，劳动者所受的压迫竟如此之深，农民甚至不能自由的种高粱和使用器具家什（如三五家许可共用一刀等等）。日本帝国主义野兽般的白色恐怖竟如此之甚，如抚顺煤矿的成百甚至成千的工人被活埋了。

“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它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社会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

因为这个，以及因为国际方面以及日本内部许多其他的原因，所以日本国内不但经济危机猛烈的加深和扩展，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以及意见纷歧日益趋紧张起来。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不满意，以及革命情绪和波动迅速的增长起来（工人罢工运动发展着，农民不

断的骚动，而且有些地方竟变成了武装斗争，先进工人和农民及知识分子中的反战争情绪正在加紧，日本共产党的发展等等），这些教训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分宝贵，而且对一切想用战争走出危机的人都十分宝贵。

虽然国际间和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日本帝国主义却继续用加紧的速度准备着满洲的大本营，首先是为着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和实行武装干涉苏联的计划，占据山海关和进攻热河以及准备割据中国北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抢劫和侵略计划的有机的继续。

二　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的性质和前途

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在上海工人及十九路军士兵所实行的英勇的民族革命的防守推动之下而一天天的更带群众性质。现在各游击队的数目约有三十万人，这些队伍因其社会成份政治领导及影响的不同而带着各种不同的色彩。现在主要的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纯由旧吉林军部队所组织者，其领导属于张学良部下的各将领（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他们服从国民党的指挥而依靠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这一些人，在另一帝国主义（美国）影响下，同时在广大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及其自己的军队中兵士和一大部分军官反日情绪威胁之下，而且为着自己剥削者的利益，才实行抗日的战争，然而，他们却绝对仇视工农的各种带群众性质的革命运动。他们枪杀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解除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压迫劳动者，他们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在适宜的条件下和必要的时候，能够叛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而且现在已经阻碍着满洲真正群众游击运动的发展了。他们的战斗力较低，及其失败（马占山、李杜、苏炳文）和投降（几乎完全没有激烈的战争，而把阵地让给日军），主要的是由他们仇视劳动者的政策产生出来的。

苏、李、马等的失败，绝对不是表明满洲反帝国主义游击运动没有希望或是低落，这只是又一次的表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以及一切军阀将军在反帝斗争中的无能，这只是又一次的证明，我们说的：只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话的正确，这只能使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们相信，他们应该违反国民党张学良及一切军阀而自己来保护中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同时也必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奸细。在这些军阀失败和投降之下，有更大的可能在满洲热河中国北部及全中国吸收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真诚反帝分子，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中国北部而参加反日反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二)第二种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部队，不是大部的旧吉林军，而大部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种程度内，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这些队伍的领导者企图各种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而能依靠在农民小资产阶级身上。最近在上级和下级军官间，在政治方面看出了内部分化过程的开始，这个队伍的命运，是首先要看他对工农的政策如何。(三)第三种游击队，是各种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参加，其成份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政治的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点，一部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部分是在革命分子的影响和领导之下，他们对于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还未能找着正确的彻底的革命的方法和道路。(四)第四种游击队，赤色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

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子的队伍的，他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的纲领中彻底反帝的要求。他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进一步的开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作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色游击队的本身的政治影响不断的增加（比如许多的游击队不断的找我们的领导），然而赤色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在准备进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及为着瓜分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方面尽着奸细的作用。对满洲的反日运动，执行着最可耻最狡猾的策略。

所有一切反动派别在全国广大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怒潮威胁之下，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面上处反对的立场，对满洲的反日运动假装着同情，他们提出援助反日运动的口号与空谈，不仅是为着掩饰自己民族革命叛徒的真面目，而且是有一定反革命目的：(一)为着借口“肃清后方破坏分子”而加紧进攻苏维埃中国和英勇的工农红军。(二)借口“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各阶级为救国而牺牲”“不允许阶级斗争”“维持后方和秩序”等等，而对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子加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进攻。(三)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以求挽救自己腐败和垂死的政治。(四)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以保护自己反革命伙伴——军阀的统治，把反日游击运动限制在国民党监督下的个别军队的“单纯军事行动”，并且不但不援助群众真正的革命反日运动，而且直接的用“铁和血”来压服他。并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认为适合的时候，而完全叛变满洲一切反日运动。(五)为着夺取和垄断广大群众们的为给满洲游击队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企图这样使满洲游击队没有真能从外面得到此种帮助的可能，并借此次减小满洲和全国反日运动的程度和范围。

因此便是借保护民族利益，而实际限制这个运动，并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来破坏它。挂革命的招牌来行反革命的政策，这是国民党各派别对满洲问题政策的一致的实质。同时国民党各不同派别因其与各不同的帝国主义主人的基本联系，而且对满洲问题所玩的手腕中也本着各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派逐渐倾向于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谈判，以及强盗国际联盟的提议，而同时大喊反对日本在满洲的侵略，其目的是在执行美帝国主义的命令。以陈济棠胡汉民等为首的广东派，武断的喊反对日本侵略满洲时，其目的是引诱群众视线和注意脱离所谓康藏纠纷，以便英帝国主义能安心执行在中国西北的占据西藏西康等计划，另一方面取得些政治资本以作反南京之用。北方国民党（冯玉祥阎锡山）及非国民党的（段祺瑞吴佩孚）军阀官僚们，口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侵略者及国民党南京派，实际共同的是建立所谓北方独立及变相的第二个满洲国。

上述的事实，又一次证明共产国际及中央对满洲事变的策略与立场绝对正确的，即是“推翻国民党这个背叛民族羞辱民族的政府，是武装民众顺利进行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保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统一的条件”。所有这些事实，毫无疑义的是说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领导，是阻碍满洲反日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的基本事实。就是，国民党这个影响和局部的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较弱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它能使满洲的游击战争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前失败。因为实际情形如果继续不变，则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失败的前途，不仅由

旧吉林军将领及国民党的必然叛变投降而产生，而且还可以因为运动本身致变成散漫和政治绝望及组织瓦解而产生出来。

为避免失败和瓦解，为使反日游击运动胜利，那便须要坚决的为夺取和巩固我们党——无产阶级唯一的彻底革命的党——在满洲反日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领导权而斗争。它，并且只有它，能够组织和动员满洲本部及全中国成千成万的民众作武装斗争，从满洲，西藏和全中国赶走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极广大的民众，是战胜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而我们党是他们唯一的可靠的组织者和领袖，满洲事变使我们党负起极大的任务。

三　我们党在满洲的战斗任务

满洲问题，有了很大的全世界的意义。满洲的命运不仅是与反苏联武装干涉及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着，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党胜利的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拥护苏联。

我们党应该十分清楚了解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是自己手里的任务，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在阶段上的基本任务之一。即除此之外，更有发展和联合苏区，巩固红军，推翻国民党和扩大群众革命斗争，而首先是工人阶级罢工的斗争，目的是在吸收黄色工会及无组织的工人，而把赤色工会变为真正广大群众的组织底任务。事实的整个过程完全证明了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央关于用革命方法解决满洲问题总策略的方向的正确，以及根据这个策略方向而规定的及由其中产生出来的总政治口号的正确。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在这个策略基础上所提出的总政治口号——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总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扩大广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者，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政权，——这些口号毫无疑义地，将得到满洲和全国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同情。然而实现这些总的政治口号的成功，首先要靠着我们党正确的和灵活的实行“特殊的”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并且要靠着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我们党利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在这方面已有的极丰富的经验，计算到满洲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现在阶段上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和配置的特别情形，在执行这个策略时，对下列的情形应当严格的注意！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

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如对上述的第一种游击队（朱霁青本人的队伍，这里不包括群众的反日义勇军，这些义勇军是暂时的和形式上的服从他的指挥）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行动的协约。对第二种游击队，除下层统一战线外，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对第三种游击队，根据其反对反动领袖的斗争，以及我们在他們中间的革命政治影响的程度而决定具体的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甚至可与他们订立某种反帝联盟的形式。然而，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們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只有这样的分别对付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能使满洲的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能够得着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统一战线策略的效果。

第四，必须慎重的计算到这一点：即是，如果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那么，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来与这资产阶级奋斗。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尽量扩展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人）的政治教育和组织，基本的是借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们党现在在满洲的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满洲的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伟大的政治力量（在数量上，工业，运输，小手工业内约六十万，乡村工人约一百二十万，在质量上主要的干部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奉天、大连、哈尔滨、抚顺等等，和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铁路、煤矿、兵工厂，百分之八十的大产业工人，和大部的林木工人，是直接在日本的企业上作工，与乡村的关系密切），虽然它有一定的弱点（没有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阶段上的直接经验，在政治上，阶级觉悟和组织性较小等等），然而，无条件的它是革命和民族革命战线最基本的动力，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不断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人的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完完全全证明无产阶级伟大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基本还带着自发的性质。党的任务就在于尽量扩展和指导无产阶级各式各样的群众斗争（特别是罢工和武装斗争）而首先是在他们日常迫切的部分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例如：按时发工资和发现洋，同等劳动同等工资，成年八小时工作日，青工六小时，并保留已有的工资标准，反对裁人和关厂，在裁人和关厂时，业主须付工人六个月工资，反对用白俄和日本工贼代替中国人，要求增加林木工人和雇农的工资，并且业主应当供给工人及其家属满意的住所。满洲国当局及业主须给失业工人免费的饭食、衣服、烧柴、住所；反对宪兵警察在兵工厂、作坊、矿井上的压迫，反对逮捕和屠杀工人，要求工人言论集会和组织工会的自由，组织工人拒绝运输和服务于日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工人劳动，并在反帝及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尽量的把工人组织在上述的革命群众组织内，找出，提拔和训练工人先进的分子作为党、团、赤色工会、民众革命政权的骨干，并这样来保证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必须十分清楚的认识，反日斗争一天天发动起更多的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因之而一天天与反对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配合起来。

我们保持最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但要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须明了独立的组织我们的武装力量，及无产阶级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是靠着巧妙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

东三省党的组织，必须坚决的反对其队伍间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得不够（如说满洲有很多荒地，因此土地问题不紧张）以及对土地革命运动已达到的程度估计得不够。必须计算到满洲作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程度比中国其他部分都大，并且它在中国是农村经济商品性最发达的一部，在乡村中，无论反日斗争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速度都更快。

根据这种情形我们必须对组织满洲的农村工人特别注意，经过他们来实现我们在农民土地运动上的领导权。除了斗争没有方法挽救农民脱离饥饿贫困与死亡。党的任务在于提出最切实的要求和口号——譬如：百分之八十的收成归农民，不向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及军阀纳任何的捐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政府大批的屠杀农民，反对焚烧农民的住宅及抢劫农民的财产和牲畜，停止还高利贷，自由种高粱及农民所愿种的其他东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对待奴隶的法律（禁止自由使用刀、锤、铲等农具和工具）并在这些口号的周围组织和联合农民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并把他们的斗争与城市工人斗争联系起来。党应在扩展农民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在各种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内，尤其是农民委员会，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它应该调节农民与游击队间的关系，经常的供给游击队以食品，组织武装自卫队，党应用全力使雇农和贫农成为农民委员会的指导力量，并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组织广大的中农群众。

因水灾和战争而受害的饥民难民为数极多，约由八百万到一千万，而他们正在为米为高粱，为衣服，为烧柴，为住所而作着生死的斗争，那些能动员他们和组织他们与侵略者及剥削者斗争的口号，如：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财产和货物给饥民，没收民族叛徒的财产给饥民，饥民自动的打开财主的米仓和高粱栈拿来吃，大家合力来抢财主的煤、木柴、衣服、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饥民难民建筑铁路，修飞机场汽车路工厂制造厂等等，如作这个建筑工作时，则日本侵略者须给他们和铁路及工厂工人适合的工资，反对关饥民在收容所里等死，要求日帝国主义和满洲国政府无代价的发米粮、衣服、煤、劈柴、住所等等，所有这些口号，我们党必须广泛的传播，他们的组织形式可以是“饥民会”“饥民灾民联合会”等等。

对满洲国的军队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谁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当兵就是可耻的民族叛徒！兵士们！满洲国军队中的弟兄们带枪到反日的游击队方面来，杀死你们的长官民族叛徒，暴动起来反对屠杀中国民众的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而对反动军官所领导下的尚在斗争着的旧吉林军兵士们，可提出下列的要求和口号：兵士弟兄们组织兵士委员会来监督各种反帝团体为我们捐来的几百万几千万元的进款和用途。不要压迫和杀害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学生和饥民！和工农联合及友好，不服从反动长官的反革命命令，去投降和压迫工农！小心你们的长官和国民党党官的叛变！最后，兵士选举长官的口号要小心仔细和有准备的提出来实行等等……便把他们夺取到革命方面来，并加紧武装革命与全副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

对小资产阶级提出停止和减少各式各样的捐税（首先是盐税粮食税户口捐），无代价的退还当铺里的衣被器具，反对城市里戒严，要求言论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对于学生和知识分子提出反对关闭学校，反对屠杀学生和新闻记者，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学习的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式的教育计划，因为这是对学生的污辱和讽刺，反对孙文主义，因为它

是流血的白色恐怖和卖国辱国的旗帜。不要忘记，在民族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它的最初阶段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学生，在扩展群众反帝运动上能起很大的作用。对高丽人（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中国人，而另一部分先进的工人农民经常的与中国劳动者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对蒙古人（日本帝国主义根据其已定的使满洲及蒙古殖民地化的计划，而进一步进攻的最近和最先的对象）须提出特殊的斗争的口号，即是一方面借此可以揭穿和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内蒙自立，间岛自立区）的武断宣传，和它之利用及故意挑拨民族恶感及冲突，以利于自己的帝国主义强盗事业；另一方面组织和联络它们与中国劳动者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应当提出如下的口号：第一，一致抵抗日本国政府及满洲国政府的捐税和命令；第二，中韩蒙及其他劳动者共同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奸细——中韩蒙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第三，苏联的工农与中韩蒙民众的友谊联盟万岁。为朝鲜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大致是：朝鲜的农民们，日帝国主义抢去了你们的土地，并把你们从故乡赶出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归还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不给中韩日地主缴租。为蒙古人所提出的特殊口号，组织游击队武装反对日帝国主义侵入热河和内蒙！中国革命，外蒙人民共和国及内蒙群众友谊的联盟万岁。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北方军阀的压迫，不给国民党及一切军阀纳税，不给本地王公督统纳税。反对喇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蒙古民众的民族叛徒政策。

计算满洲有一万到一万五千的日本工人，他们比中国工人及其本国日本工人都处于特权地位，并且顾及建立他们的革命斗争与日本国内斗争的联系，而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组织共同的罢工，在满洲的日本工人中间，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同时必须提出共同的要求，在满洲有建立工会组织之权。

根据上海所有的经验和满洲的事实，满洲反日会等等，能成为联合广大民众的组织，同时必须夺取这个组织的领导到我们的手里。满洲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都必须提出那些是群众最感奋，和在各地都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斗争的口号，并把他们日常部分要求和斗争与我们党总的政治任务和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联系起来。此外，党还必须慎重的估计到满洲的复杂国际关系与无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还必须进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的正为着压迫和奴役满洲的中国和其他民众，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竞争着，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必须尽可能的不怕是极小的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强盗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它有利于革命的群众运动。

党必须经常的和广泛的传播苏联的工农和中国工农友谊联盟的口号，以及中国民众和外蒙人民友谊联盟的口号，同时党必须在满洲的民众间作广泛的解释运动，来解释苏联所坚决执行的和平政策（特别是关于满洲事件）的实质和意义。

最后，党必须根据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一二八上海防守以及满洲游击运动的实际经验和朱霁青等将军——国民党张学良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冯玉祥等等每一件具体的反革命事实，来进行广大的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张学良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对于满洲事变投降叛卖政策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广泛的宣传苏维埃的中国在解决一般的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问题方面所得到的成绩，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已经对日宣战的问题，以便向广大的群众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它的英勇的红军是中国唯一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军队。假如国民党不是四面围攻我们的苏区，那么，我们的红军早已和全国反日游击队及义勇军在一起在第一道战线上直接的和日本帝国主

义作战了（参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日宣战的宣言）。并且要指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声明同任何的军队和队伍缔结作战的协定，共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有两种条件：(一)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二)给他们自己领土内的民众以一般的民权（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示威的自由）和武装民众的自由。这样，党不但能粉碎国民党的武断宣传，而且会得到满洲民众对我们党广大的同情和拥护，并且真正准备满洲革命发展的基础。

只有正确的灵活的完成上述的任务，我们党才不仅能夺得和巩固自己在反日游击队内的领导，而且只有在我们的直接领导之下，目前的反日游击运动，才能变成千百万武装民众反日的及反对其他帝国主义的真正的彻底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才能造成真正民众的和真正由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民众（工人、农民、兵士、城市贫民、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军官）所选举出来的政权，有一定的适合的领土基础，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由最好的游击队所构成的民众革命军，并且只有在我们领导之下，满洲的反日游击运动和革命运动，才能得到完全胜利。

此外，党必须在全中国这运动中灵活和勇敢的利用各种公开的可能，以便把援助满洲游击运动的发起和领导权夺到我们手里，以便一方面揭穿国民党的手腕和欺骗，而另一方面利用这运动而公开的派革命分子和我们的人、钱，去帮助满洲的游击队，在全国特别是华北党必须立刻在群众中广泛的进行一种运动来解释，组织所谓“北方独立国”，即是变相的满洲国。这运动的实质在于：借此可动员广大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热河及内蒙古的全部领土，和进一步的进攻中国北部和全中国。在我们的苏维埃区域里，党应当发起一种运动和举动，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帮助满洲国的游击队。这运动不仅给满洲的游击队以有力的帮助，同样也会掀起和提高国民党中国里反帝运动的战斗精神和情绪，而同时也提高苏维埃中国里的红军兵士和劳动者的精神。募捐援助游击队，不应当只限于金钱，而应该普遍到各种东西——米粮、衣服等等。

四　我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了，满洲民族革命斗争胜利的前途，在基本上要看我们党如何的执行目前阶段上伟大的基本的革命任务，因此我们党在满洲必须有自己的能执行上边为满洲指出的任何的组织。然而可惜，在满洲我们党的组织，在最近一年中虽然有发展，然还远远的落在客观可能之后，党员和团员数量不大，群众组织非常薄弱。因此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在满洲的组织，是目前我们党最要紧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应当加倍和巩固满洲党的领导，以便这领导真能和真会应付这复杂的环境和极端重大的任务。顾虑到军事的环境及在满洲省委和地方党委员会间时常没有必须的联系，省委须在各地建立起强健的和有独立及自动的工作能力的党委员会，譬如在南满北满等处，以及在各主要游击区域和抚顺等，同时在各大城市——大连、哈尔滨、奉天、长春等等。所有满洲党的组织，从省委到支部以及每个党员都必须用全力和一切政治方法，努力的打入一切游击队伍（首先是最大的）和一切重要企业（首先是南满铁路，抚顺、穆棱等煤矿，大连、松花江的航业等等）以及一切群众组织（反帝同盟、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大刀会、红枪会等等)去，

以便和群众发生联系及在其中建立党的支部。这些支部要十分的秘密，然也必须能扩展革命的群众工作。对于找出，提拔，和教育，以及正确的利用党的组织干部的问题，特别要严重的注意。应当消灭那种以为满洲"无人"可作我们干部的不正确的意见，在满洲天天有更多新的力量被吸进游击队和反帝运动中来，为什么能说在满洲没有先进的工人和劳动分子呢？满洲党的组织须在群众反日游击战争，罢工斗争，群众的农民骚动等发展的过程中，找出，训练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党的教育工作，经过党校训练班，研究组和个人的帮助，教育每个党员以基本的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知识，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满洲党的组织须有计划的和有系统的进行这个工作。在正发展着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中，党员和积极分子能很快的了解马克思列宁的理论。

在满洲目前极复杂的条件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方法，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材料（如满洲省委关于五一运动的决议案），省委本身对这问题也没有正确的提出，他简直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对立了，从他们的决议案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是公开工作，或是秘密工作"。这是无疑义的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现在在满洲，一方面因为日帝国主义直接警察统治的关系，我们必须深深的加紧我们的秘密工作；另方面，因为群众反帝国主义运动广泛的发展，我们就能利用很大公开的可能，在群众中作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作。在游击队的区域里，这问题的作用，也不比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直接统治的区域小。

在两条战线上无情的斗争，首先是反对右倾（对满洲的形势估计得不足），对游击和罢工斗争采取取消的态度，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为着与其他阶级统一的战线、而失去我们党独立的政治面目，对国民党有幻想等等——这是主要危险。同时要反对各种的"左倾"（如对游击队抱关门主义的态度，反日及反其他帝国主义的统一民族革命战线上的估计得不够，李立三路线残余），必须成为一切行动及其指导的基础。同时必须顾到满洲党组织与苏维埃中国和中国南方中部比较要年幼得多，和经验少得多，因此在批评某个同志特别是年青幼稚和少经验的同志们的错误时，要多有忍耐心，而说服之和给以解释。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和托陈派的斗争，必须是不留情的。和反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奸细一样，不但在思想上与他们宣战，而且在组织上也要断绝我们组织和他们的一切关系。只有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在组织上政治上发展和巩固我们党在满洲的组织。只有我们在满洲强固的党的组织，才是革命运动彻底的唯一的和有力的领导者。

满洲党组织的基本弱点之一，在于他未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学校。然而满洲党是我们不可分离的及组织的部分。因此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极丰富的教训，以及最近几年中国中部及南部胜利的苏维埃革命极丰富经验，和联共伟大胜利的经验，都应当有系统的被我们在满洲的组织在中央指导之下所利用。

同志们！满洲的客观环境对于扩展胜利的群众斗争是十分顺利的。

我们相信满洲的党和全体同志坚决执行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案和中央这一指示，在广大的劳动者工人武装的广大群众中进行着无量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而首先是最勇敢最牺牲最努力的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奋斗，在满洲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 * *

国民党签订卖国的"华北停战协定"承认了"满洲国"，最后出卖了满洲、热河、平津华

北，进一步的更无耻的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彻底瓜分中国，造成更严重的民族危机，除发表反对“华北停战协定”的一切文件以外，中央认为把本年一月给满洲党的信公布出来是必要的，希望一切组织，首先是华北的党把这一信中所指出的任务与策略适宜的应用于目前各地实际斗争环境中，去组织与开展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

全中国同胞们！

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们！

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以"防共自治"为借口，夺我黄河以北五省，更以"日华提携"欺世盗言，想要实现吞并我全中国。日本寇贼近来更加紧向和平的苏联国屡屡挑战，同时又与意、德两国勾结，作对抗英、美、法的大战准备。日寇险狠，益见暴露。

日寇企图军事的冒险，必造成世界二次大战，使我国四万五千万同胞生命财产做大战的牺牲品，完全变成亡国奴牛马奴隶。

每个有热血，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除抗日以外无生路，因此自去年秋天以来，全中国南北各地勃发抗日救国运动，中间经过虽有曲折，可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成为全中国同胞一致的思想行动。

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宣战……"这一抗日救国运动，实为我中华民族国家解放自由发展的关键。

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各军，各反日游击队，为收回东北领土，为保卫中华祖国，四年以来在全东北反日总会领导下与我各反日救国武装同志及反日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作游击战争，誓必奋斗到底。现在顺着全国救国运动之转移，使抗日军队组织越加巩固与行动统一。因此，不但将我各军军队建制，名称不同，完全到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同时并揭扬左列各条：

(一)东北抗日联军在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紧密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

(二)凡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不论政治派别，不论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分性别，不分穷富，只要是抗日救国，我东北抗日联军便与行动一致，因此对于海内外同胞，暨南京政府内反日派别，在野政党军政名流以至中国苏维埃红军，最近抗日救国对日宣战一切主张，均竭诚拥护。

(三)我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国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并由公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四)凡被压迫民族、高丽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或军队，我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弱小民族联合战线，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并愿与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友好提携，同时与目前在国际政策上对日寇立于反对地位，例如英、美、法等及其他反日国家，均为我联军所同情，互为赞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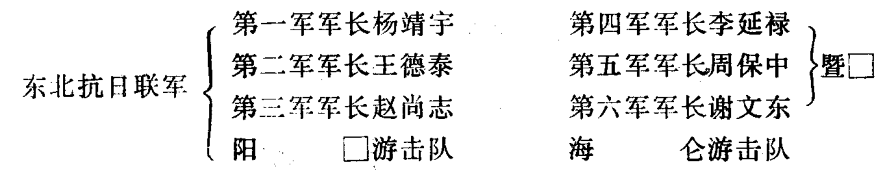
(五)昨日即为国贼汉奸，做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

亲爱的同胞们！抗日武装同志们！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它并不是什么真正强盛的国家。

而是一些少数人的财政寡头，贵族，地主，军阀，吸吮一切普通人类鲜血的寄生虫集团，他们——日本帝国主义处在国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阶段，只有对自己本国内民众更加压迫、榨取，对国外进行强盗战争以便市场抢夺，寄生虫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才能生活；它好比吗啡鬼，表面上蒙着红绿彩色的人造丝织物，遮盖自己的吗啡针眼，它又好比“盲人骑瞎马”，夜半走哈塘（陷坑）希图侥幸往前乱闯。

我们中国海内外同胞应一致团结起来，铲除穷凶极恶的寄生虫、魔鬼——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我们从古今中外一切历史事变以及最近阿比西尼亚反抗意大利的侵略战争的例子来看，我们深信，中国抗日救国，终久必能达到成功胜利。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东北抗日联军
第一军军长杨靖宇　　第四军军长李延禄
第二军军长王德泰　　第五军军长周保中　　暨□
第三军军长赵尚志　　第六军军长谢文东
阳　　□游击队　　海　　仑游击队

〔附〕关于抗联历史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冯　仲　云

东北抗联历史与东北地下党工作必须联系起来，因为东北党直接领导着抗联的斗争，这是党的光荣，中国人民的光荣。东北抗联的斗争与关内八路军新四军的斗争是一样的，是我们党的光荣。我讲的是自己想到的，不是总结，我讲从我一九三〇年到东北来以后，我所知道的问题。

党的创始与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东北党的历史是很长的，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在东北就有了党的组织；当时主要党的组织，在大连有一个地委，沈阳有一个地委，北满党的工作是很少的，刘少奇同志（到过哈尔滨）曾领导过东北党的工作。当时党曾领导了两个运动：①一九二八年学生运动，主要是反对日寇修五路问题，日本当时要在东北建立五条铁路，延长吉敦路、天图路、长大路、洮崇路、吉海路，以便侵略东北，这次运动当时主要是学生反帝反军阀运动。②反对中国军阀向苏联（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进攻。这个运动是在工人学生中引起来的，这次运动规模虽然还不很大，影响却很大。此后东北党吸收朝鲜党加入中国党是一个大事情。朝鲜党内的派别是很多的，内部斗争是激烈的，共产国际解散朝鲜党后，允许朝鲜党员个别参加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在接受朝鲜党员时是不分他们的派别（一九三〇年开始吸收）。那时我们党仅在大城市内有工作，对农民尚未工作，朝鲜党过去在农村中（松花江下游、汤原等地）有工作，对党也是个新问题。

当时党的路线及党的组织变动：东北党是中国党的一部分，党史上那时的错误，（立三路线时期）在东北也是不例外的；如组织赤色游击队，朝鲜农村都实行暴动，结果是失败了。立三路线以后，四中全会时满洲派去的代表唐洪经（他是最好的工人），但是四全会后，满洲省委组织问题没有解决，那时唐圃到北满成了罗章龙右派之后，唐便被捕入狱。后来罗登贤同志代表中央到北满解决了罗章龙右派问题，成立了北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在沈阳，那时（九一八时）有很多同志在军阀监狱里，我们用二千元买出许多干部，如金克、漱石、李延禄、王鹤寿、赵尚志、杨靖宇、许恒新、金策等同志。虽然如此，但以后遭到两次破坏，赵新民同志，就是那时被捕的，经过这两次破坏，工作不好坚持，一因沈阳是古城，封建势力深厚，二是经过二次破坏内部有了叛徒，沈阳呆不住了，所以在当年（一九三一年），满洲省委就搬到哈尔滨来了。哈尔滨有三个好的条件：①哈市复杂，易于掩护。②日本势力到的晚。③离游击队近。这次搬家对于东北游击运动是很有影响的。

“九一八”事变与当时对形势的估计与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对满洲的估量，我们那时有错误，认为日军打到米沙子，苏军就要出兵，那时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时期正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案中，所讲的第三次左倾时期，而当时我们是莫明其妙的执行了左倾的指示。“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没有及时的提出统一战线，一九三一年嫩江江桥之战（马占山队）是很出名的，那时在群众和学生中，情绪很高要援助马占山，而我们那时就没有利用这种形势进行工作，并且当时在党内还提出“打倒马占山”的口号。后来下石同志提出意见，才转变了些。江桥战争失败后，马占山退到克山一带，以后即投降。这时我们也没有揭穿他，一九三二年初日军进攻哈尔滨，李杜等军先入哈市，他们的部队装备很好。但我们没有和李杜，丁超、马占山利用这个时期讲统一战线，而仍是一贯反对军阀的。那时党内有些糊涂思想，认为当时军阀垮台，日军还未来，是无政府状态，就号召抓住这个时期，可以组织苏维埃，举行工农兵代表会议。我们那时曾召开了七次会议，都没有召集成。甚至以为各工厂抽出十几个人专组织一下就是工农兵代表会议。当时虽有这许多错误，但罗登贤同志还是有他的功绩的，罗登贤同志是中央委员，香港罢工的领导者，一九三〇年来东北，到三二年回上海在总工会工作，被叛徒出卖了。罗登贤在敌人（英人）法庭上说：“你们说我是反动的，我来报告报告我的历史，香港罢工是我领导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在东北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在上海纱厂领导罢工也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叫反动吗？”后来罗登贤同志被解到南京，他在监狱里告诉人们说：“我是永远忠实自己的阶级的”，后来被枪杀了。罗登贤同志这种英雄气概，深深的印到我们同志的心里，所以后来东北党抗日联军的同志们，在监狱在断头台上和敌人斗争，弹尽粮绝时，都能发扬罗登贤同志的精神，如杨靖宇等同志就是这样。东北党是永远记着罗登贤同志的。

一九三一年时周恩来同志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号召东北党武装抗日。那时在哈尔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是有很多悲壮的故事的，人民的抗日情绪是很高涨的。那时省委下面有青年团（包括儿童）、军委、满总（联工会）等组织，发动武装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那时我们与国际侦察系统配合起来，发动过有名的陈高子炸车事件，炸死敌人多名和师团长（那是赵尚志和一个学生干的）。发动学生下乡发动群众，进行反日斗争，我们那时的力量，乡村只有韩国农民，城市只有革命工人与学生。那时我们也不会作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想打入武装队伍内抓武装，但力量不够，不会讲统一战线，有些革命工人与学生到队伍里去，后来被杀的不少。在城市中我们有些左倾，在城市里我们有不少地下组织和工作，那时提的

口号是五罢（罢工、罢课、罢教、罢市、罢耕），"进行示威游行"、"飞行集合"，在工人中散传单也干的非常冒险，那真是有点教条主义。

东北义勇军的高涨与失败：我在省委秘书处工作，有些材料知道的不少，义勇军活动的最高潮是在一九三二年度，三三年低落，那时我们也作了些工作，我们那时（一九三二年——三三年）有：

一、南满盘石赤色游击队：盘石有蛤蛟河子，有朝鲜农民，"九一八"后就把朝鲜农民组织起来等待着，一九三二年就组织成为红三十二军。台辽游击队的游击区，领导者称之"三光"，李红光同志为大队长。

二、东满游击队：东满我们党的力量很大，因为是朝鲜住民区，由东满特委书记佟长荣同志在那组织的。

三、台辽游击队：当时因为不懂政策、路线，没有很好领导，就失败了。

四、巴彦游击队：是北平大学生张甲洲看到巴彦很好组织队伍，就到北平利用同乡会的关系，领回来一批大学生，就组织起来了，先有六七百人后来发展了一千多人了，党知道了，派去几个人（当时有赵尚志、老胡——外号叫蒋介石等），老胡有毛病，思想左倾，赵尚志还正确，和胡有矛盾，胡就回到省委说赵尚志有错误，当时省委正执行左倾路线，听了胡的话，把赵尚志开除党籍。这时赵尚志在游击队作战时负伤。

五、通河游击队：是江省学生为首组成的。

当时反日武装失败的原因：

(一)这些游击队失败的原因：①地主儿子作了领导。②缺乏革命经验。

(二)马占山投降后，各地义勇军失败。主要原因：①没有共产党领导。②反日纲领不明显。③脱离群众。④内部不团结，日本人各个击破。之后，李杜、马占山、苏炳文等头子到苏联去了，剩下的变成胡子。在这个时候，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才发展了一部分。

一九三二年八月北方局会议：第一、反对北方落后论。第二、建立苏维埃红军，这是□□□回来传达的。一九三二年我被组织派到汤原就是组织苏维埃红军的，到那一看全是朝鲜人，也没有枪，就组织成一批拍巴掌队，那时有马占山的残部向我们联络，我是左倾型的，当时都拒绝了，以后有五、六十人，也得了十几条步枪。因为缺乏经验，缺乏军事干部，子弹又少，就把枪埋起来，以后让胡子挖出去了。我在汤原工作半年只作了一件好事，就是派朝鲜女同志到中国屯子里去宣传，发动他们共同抗日。在汤原实在搞不通了，就回哈尔滨省委。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指示信：一九三三年是最重要的一年，这时接到了一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经过了苏联的讨论，传到东北，起了很大作用。信的主要内容总精神为：①组织抗日民众政府。②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③发动东北人民武装抗日。

"一·二六"指示内容：1.对东北形势的估计，日本人占东北，引起人民的反对，它在东北还未建立起它的社会基础。日本人在东北缴枪缴照，引起东北人民的猛烈反抗，即是证明。2.指出东北四种反日武装的不同，当时满洲省委老魏根据这个指示作了个决议，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成立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我到红三十二军游击队巡视兼传达这个指示和省委决议，与李红光在盘石红石拉子开的会，当时那里的同志都很高兴的说："这回可有办法了"，因为在以前和各方面（对敌伪、胡子）都有磨擦，都采取打的政策。

当时间岛朝鲜同志就不接受"一·二六"指示和省委决议，说韩国人民程度高，可以在间

岛建立苏维埃，这是想让间岛与东北人民分开，这正是中了敌人的奸细政策。

执行中央指示建立人民革命军：一九三四年将盘石游击队改为人民革命第一军，以杨靖宇为军长。

将东满游击队改为人民革命第二军以口口口为军长。

珠河游击队改为人民革命第三军，以赵尚志为军长。

李延禄第四军。

宁安第五军。

汤原第六军。

虎林第七军。

这些武装都是党所领导的，有政治教育，纪律好，与群众关系好，战斗情绪高，在群众中有信仰，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当时执行的各种政策：抗联群众工作，开始很好，采用中央苏区一套办法，有根据地有游击队，如在珠河南到莽牛河，东到一面坡，西到帽儿山，北到黑龙宫，这一大片根据地。当时地方群众组织有：①抗日救国会。②农民委员会（内分侦察、交通……等部）。③农民自卫队。④农民游击队。⑤青年义勇军。⑥儿童团。⑦妇女会。一九三五年前的口号是反对国民党的，当时的减租减息是无所谓的。对农民提的口号：①抗日；②反对土匪抢夺；③组织抢粮队，解决粮食问题；到非根据地抢地主粮食，分逃亡地主的粮食；⑤军队纪律好，到老百姓家不住炕，铺草在地下睡。赵尚志曾给老百姓推包米渣子，军队吃粮到非根据地，主要吃地主，到那吃那，不给钱，在根据地吃饭打条子，由农会征粮补还。

敌人进攻的办法：实行无人区、归屯并户和奸细政策。在一九三九年发生民生团事件，互相残杀，上下相杀，死的干部无数，以后魏承民同志到后，主张不杀人，才渐渐结束了。

一九三五年王康指示信：王康指示信经过吉东特委转来的，提起来今天还要打官司的，因为北满省委没有取消，为什么由特委给省委下指示？信的主要精神使人看了生一种灰心丧气的想法，给人的影响是等待大事变。为什么说灰心丧气呢？因为信内提出苏联不能援助，中央不能援助，当然要'保守实力，待机而行'是对的，但未明确指示具体作法。对部队我记得说过：'如实在坚持不了，可以出根据地到别的地区活动'。当时在北满开了一个会，主要有我和赵尚志，当时大家坚决反对王康指示，认为他们总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大胆的作了决议，我和赵尚志的意见中心是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杨松冒充中央代表来了一封指示信，有两个问题是我们大会上不同意的，一是'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二是'反满抗日不并提'。

一九三六年我到下江在铁道南布置地下工作，是用珠河工作方式组织抗日救国会，起了很大作用，会员最多时到过二万多人，吉东和我们就不同了，他们是秘密组织的。

一九三七年反日情绪非常高涨。这时抗联总司令是赵尚志，他是在下江召开的四军、八军、五军开会时选出的，但惹起别的同志不满。中央当时决定是李杜当总司令，大家都不满，为什么用一个别人呢？不要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呢？赵尚志的工作主要是脱离群众，单纯的军事观点，如膛子战斗、黑林子战斗，都是很著名的战斗，但是和群众没有联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连饭都吃不上了。赵尚志讲统一战线，是为了收拾人家，吃掉人家。

后来部队都集拢在三江省境内，内部对立，互不团结，领导不统一。我过去反对过王康指示信，现在又觉得这种情况下是对的，我开始动摇，以为错了。但是赵尚志始终坚持着，

认为是对的，因之开会没开好，会就散了。

第三路军失败的原因：我们失败的原因，一句话是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办事。军队缺乏组织工作，政治工作，是游来游去没有根据地。一九三五年前的游击区被敌人烧杀光了。敌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的烧杀，死的同志和群众很多。

珠河游击区不能发展有二，①南方有‘宋五阎王’大封建势力，不能发展；北方有杨木岗大封建势力，我们受到限制。②敌人的烧光、杀光。

抗联失败的原因基本上有二：第一、脱离群众——又分两种原因①主观的，政策掌握不够。②客观的，敌人的三光政策，无人区政策，归屯并户政策。第二，党内不团结。

一九三九年部队离开了三江省，走到黑龙江，这时部队是低落时期，但是还有一部分力量。王明贵等在克山一带，开辟了很多地区，一直坚持到四一年，苏联来信，让满洲所有的干部到苏联开会，以后就没有回来。在苏联时，我始终想把部队调整到大兴安岭一带，坚持游击战，因为李兆麟等不同意，没有实现。直到‘八·一五’后回到东北。

最后，我希望同志们都要纪念哈尔滨，因为东北地下党曾在这里遭受二次大破坏，比如一九三四年哈尔滨大破坏，一九三六年哈尔滨大破坏，在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及第四军管区内曾牺牲的同志在一千人以上。

（注：冯仲云同志，原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委员）

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一、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时我们所犯的错误

（一）党与军事指挥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之初，对于敌人的力量与计划是估计不足的。他们没有看到这次“围剿”是决胜负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最后消灭苏区。另一方面他对于红军最初的胜利又估计过分。这些胜利实际上具有地方的和战略的意义，以这种对于环境的不正确估计中，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指挥，完全没有充分的准备苏区，以便进行军事上的抵抗，特别没有进行广泛动员农民群众，去积极的参加作战。保护苏维埃领土，不仅是红军（常备的和游击的部队）的事情，而且是全国一切劳动群众的事情。就是说，他应当发展成为真正民众战争。只有这样抵抗，才能战胜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力量。

（二）在八月十一日和十六日黄安附近胜利之后，本来应去努力追击被击破的敌人部队。无论那一个袭击的进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已经消灭敌人，只有无情的追击敌人的方法，才能获得胜利的，红军不去这样做，反而退却了，和给了敌人有充分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部队。

（三）敌人的用兵计谋，主要的就在于：（1）以三方面（西南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集中的进攻以包围苏区。（2）占领一切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路线，以打破通盘的苏区，使其成为许多彼此互相隔离的小苏区。

红军要企图抵抗这种计划和到处打击敌人。这便成为偶然的无计划的进行战斗。弄成在苏区周围之很大的行军。这便使纵然打破了敌人许多部队的红军。不能将敌人任何一个部队完全击溃。当时最好是在一方面集中一切常备的兵力，去反对一批敌人，直至把这批敌人最后的和坚决的消灭为止。同时当用牵制、政治的分化与游击队的袭击等方法，去骚扰和削弱敌人其余部队，直至常备的红军消灭第一批敌人和能够打击第二批敌人为止。在这种战略之下，我们便能够顺利的利用占有内部交通线与战场之苏维埃结构所给与我们的优势。

（四）最初对于敌人估计不足，以及没有充分的动员群众，弄成后来相当的慌张。这表现在对于敌人过分的估计，表现于领导干部动摇，表现于红军无根据的消极。敌人九月中旬起赢得了约三个礼拜的时间，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时间来实现自己的集中进攻。而没有遭到我们方面重大的抵抗。人们借口说，红军不能继续不断的斗争，以此来宽宥上述的消极性，这正表示出对我们武装力量之机会主义的不信任。反之对于后来作战活动的先决条件都在我们方面了，敌人几次被我们击破了，他们遭了几千死伤，失了数千枝枪，他们的战斗精神降低了，我们的战斗精神提高了！这样的消极行动是丝毫没有理由的。

（五）由于上述一切错误，在十月间在麻城与黄安苏区中行军疲竭之后，红四方面军遂处

于极困难的地位：

受白军的包围和没有充分的物质积蓄，这是红四方面军"不定战术"和兜圈子结果。但是就算有这种情形也不能证明放弃苏维埃领土——虽然是暂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样的决定反映了领导中的取消主义的情绪。

应当把有常备军基本苏区与游击区分别清楚。前者是我们的政治的和物质的基础，应当尽一切可能保持起来。而且在保护这些苏区中的军事战略，应当具有进攻的性质。后者依军事上的必要，可以暂时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党、苏维埃政府与军事指挥之决定红四方面军无目标的西进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六）根据鄂豫皖苏区现状，党应当指出，国民党第四次包剿的目的已经部分的达到了：（1）鄂豫皖苏区被包围了；（2）他们部分的已被扰乱了，诚然敌人此刻还不能把他们恢复起来；（3）苏区的主要武力即红四方面军被排出了自己的根据地，而在今后为这个领土而作战的战斗中，已经不能再指望这个武力了；（4）保留着的苏区周围及其内部的一切的重要城市交通路线，都操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

他方面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府统治下，及国民党军队的痛苦的教训之后，农民是大大地倾向我们方面的，游击运动正在生长造就着常备红军的新干部。在正确的战略之下，我们有充分的可能去支持保留着的苏区和重新扩大与联络这苏区。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准备反攻，以反对国民党的占领部队。

二、目前的军事形势

（七）中国的革命危机比去年更进一步加深着，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放弃一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集中自己的莫大的武装部队去反对苏区。试简单说明各省的军事形势。

（八）四川。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东北开始创造新苏区，而依靠着农民革命运动，南江、通江，巴中，诸县操在红四方面军手里。川军两师已被我们击溃，一团投到我们方面，与川东游击队的联系已经恢复起来。敌人集中川军和陕西湖北两省军队的大部分的力量，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得到丝毫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再不属于鄂豫皖省委的权限，而是由中央直接领导。

（九）湘鄂西。以汉口之西为根据地的，贺龙第二军团完全被扰乱了。现在长江南北进行顺利的作战（镇坪、鹤峰、五峰）。

（十）中央苏区（江西和福建）。在十二月和正月的过程中，红军不但能够保持基本的领地，而且能够夺取礼河与信江间新区域。这样便能与赣东北红十军取得联络。我们的军事力量大大的增展了。现在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之下又开始了国民党的新的围剿。蒋介石集合很大的兵力，这次的围剿是第五次"围剿"，因为他是在完全新的政治环境之下，部分的在新的领土中，按照新的计划，在另一种方面，用改造过的军队而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以有力的反攻去回答这个第五次"围剿"。

（十一）革命的农民峰×起和较少的游击战争，存在于陕西南部，鄂西北江西北部和山东。

（十二）关于留存着的鄂豫皖苏区的环境，必须特别指出下列各点：

1. 苏区及其武装力量，现在专门建筑在华阳山（即鄂豫边界的山脉）的山地带及其南

北倾斜面上。这些地理的条件给予天然的保护。因为它们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深入。另一方面，缺乏适宜的道路，人烟密的地方和充足的积蓄。这便使我们的武装改组，增加和作战的活动，发生很大的困难。

2． 敌人不但包围着我们的苏区，而且除此之外他们握有战略要点和以前我们中心，如黄安新集和商城。敌人占领麻城黄安这道路，把商城以南苏区（赤南）和黄安以北的主要苏区隔离起来。最后，敌人占领了在苏区腹地，本身中如此强固地点，如黄安、河口、七里坪。这种分布给敌人一种可能逐渐侵入现有着的苏区。他方面，这种分布又是敌人力量相当的分散。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3． 近来国民党的军队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七十五师和七十六师开到河南北部去了。十师和八十三师开到江西去了。此外国民党手里又缺少了五十八师和新编二十师。留下敌至多不过七师或九师。这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我们的地位。

（十三）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并没有完结，仍在继续着，也绝不是你们可估计的，他们已完全陷入失败地位。在最近数月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如不遇到充分的抵抗，必然虽然优[攸]慢的，归结到苏区之继续缩小（消灭整个的乡村与整个的区域的收获，对于农民大批屠杀等等）。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空喊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而忽视目前完全冲破国民党的围剿的任务，那是完全错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就是努力的继续与加强和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以便保持现有的和恢复以前的苏区，并且在这个基础扩大苏区。

三、目前的军事任务

（十四）基本的任务就是：1.保护与巩固保存着苏区这是鄂东北的第一个责任。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2.联一这些区域而为一个统一整体。3.扩大现有区域和逐渐恢复他们过去所有的区域。

用各方面游击战争的方法，彻底解决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只有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在一方面反对一部分敌人方法，才能解决这些任务。游击队的行动是须要方面的补助形式。为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动员苏区一切居民给予各方面军事布置，武装他们，统一各种现在独立师和队伍而为一军。并且按照一定用兵计划而动作。

（十五）为的要领导这种全部的活动，必须在党的省委之下，立即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当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以下同志……此外，以前任十二师师长的同志很快要到你们那里。

（十六）武装力量的改组应当这样进行：一切的常备的武装有组织的联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第六独立师、罗山、光山、麻城、黄安和黄陂等区独立师）都归编到二十五军里去，在改组以后二十五军应当由三个充足的师部组织而成。每师应有三个步兵团，每团至少应有一千步枪。重机关枪和过山炮(如果有的话)应当组织为特别的队伍，而并入师部或军部中。二十五军的全数至少要有一万至一万二千步枪，和现有的机关枪与大炮。我们便成立强固的突击的军队，用这个军队我们可以顺利的进行必需的进攻的军事行动。

（十七）我们认为在河南的东南部创造新的二十八军，在从前是不适宜的。此刻有好的组织和武装的一军，胜于在几方面分散我们的力量。如果二十八军已经存在那末无论如何不应当拿二十五军的力量去加强二十八军。

（十八）一切其余的武装力量、赤卫军、少先队、民警应当编成游击队。在二十五军中应

有最大限度的固定武装。而在游击队中，这是不要的。如果在游击队中没有充分的固定的武装，那末必须应用一切补助的手提武器，剑、刀和一切劳动器具，都是革命农民手中很有用处的武装。甚至现代作战条件之下，拒绝这样武装是政治上的错误。

(十九)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建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任务如下：

1. 在苏区内外的劳动居民中进行政治工作，吸收群众加入红军和游击队，以便经常扩大我们武装力量。2.在红军兵士与指挥员和游击队中进行努力的政治工作。必须特别趋向于使红军指挥员入党，并且使他们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指挥他们自己的下层。3.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广泛的政治工作，以分化他们。这种工作每次应当集中到敌人的那些部分中，即我们常备军的主要打击所向的部队。为进行这工作，必须集合训练可靠同志们的部分的专门干部，把他们时时派到敌人部队中去，在这里，他们和士兵发生联系，利用士兵们直接需要（薪金和伙食问题，军官过分要求等）以引起他们的不满。组织秘密的支部和散布革命口号。

(二十)因为没有充分详细的报告，我们不能从此给予确切的指示。以下的指令只带有一种方针的性质。其余的地点，你们应根据目前的情形再加以详细的研究。

第一次的军事行动。1.改组后的二十五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此后应当恢复和巩固河口，在湖北的东北部我们苏区内部的这些重要地点敌人已消灭之后，二十五军应当坚决去打击在黄安的国民党的十三师，以夺取现在苏区的中心的这个城市，尽一切可能去巩固和保持这个城市反对一切将来敌人的进攻。

在这第一次军事行动时游击的任务是：1.用牵制袭击和埋伏的方法，去骚扰宣化店、新集、麻城、黄陂的敌人卫戍兵，以障碍敌人侵入苏区和障碍被我们二十五军所袭击的敌人队伍之增援。2.用重复袭击敌人的运输，破坏电话线，桥梁和其他道路设备的方法，去截断黄陂麻城和黄安间光山七里坪和黄安间以及罗山和宣化店间的敌人交通线。我们特别指出这些游击动作，不应当用了我们武装力量的大部分。我们军队基本群众，应当集中起来去解决基本的军事行动的任务。

(二十一)依这种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结果适宜的进行，第二次进攻反对新集八四师。这种第二次行动目的就是：1.夺取新集；2.夺取光山与麻城间的重要道路的中间地段；3.准备把黄安与麻城东北的苏区和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联络起来。

这种进攻应由新的二十五军的全部力量去进行。地方游击队帮助这种第二次军事行动的最好方法，就是骚扰宣化店麻城黄陂和光山的国民党的卫戍兵，以障碍向新集的一切行军。

(二十二)二十八军（或驻在赤南的红军）在这两次军事行动时的任务，就是骚扰金家寨和商城的敌人五十八师和八十师。为的要帮助对新集的进攻，二十七军一部分应当向新集进兵，其任务去发展新集以东的游击战争。

(二十三)将来作战的行动，只有依照这两次军事行动的结果才能详细决定。在原则上说，他们应当恢复一个通盘的苏区为目的。所用的方法就是急激的扩大东方的领土和消灭商城区域中的敌人。要做到这点必须把二十五军统一起来在一个军事行动领导之下，以及经常数量上增加，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完善。

在我们西及南边界上（即对宣化店、铁路、黄陂和麻城）此刻只要保持现有区域和打破敌人侵入我们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企图就完全够了。

(二十四)关于选择时间以转为反攻，那必须注意到每天都是很宝贵的。改组二十五军不

能作为推迟第一次军事行动的原因，对于我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是现在。一般的环境是有利于我们的。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现在忙于江西之战，忙于四川之战，忙于鄂西之战，或忙于中国北部之战。国民党现在要加强河南与湖北之卫戍，是有很大困难。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有很大的机会去恢复鄂豫皖的苏区和保持这些区域，在将来去反对国民党的军队，如果你们现在能够充分迅速和坚决去执行我们所提议的军事行动的话。

中　央

中央致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这封送给你们的信，是根据你们所送的文件，及你们代表口头的报告写成的。前次送给你们的秘密训令，是关于再组织你们的军事力量，及你们立刻要执行的军事计划，希望你们以最大的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和积极性，把它们完全实现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去年九月间所开的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对于目前国际情势及共产党的任务曾有最清晰的分析与指示；至今时逾半载，一切过渡，完全证明了这一分析之正确。十二次全会告诉我们：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之尖锐化，猛烈地向前进展，危机已到了新的阶段。目前世界情势中基本变动的事实便是：

1．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间的力量关系上表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动。首先是苏联以惊人的速度实行了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伟大计划。在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中，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愈益确立了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之经济独立性，这使苏联相对的重要性大大增加。现已在实施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改造和向前发展全部的国民经济，消灭阶级及产生阶级的因子，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基础的意义，更加增大了。

2． 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1）经济恐慌日趋尖锐化，工业缩小，使失业或半失业的占工人阶级一半以上。美国这次金融风潮，更加深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的财政恐慌。农村的经济危机与农民赤贫化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2）这一险恶的形势，就不得不引起革命高潮的生长，普遍到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西班牙是在革命的漩涡中。在中国——有革命形势的存在，在很大的地域上，苏维埃革命胜利了。在德国——有阶级对立之非常尖锐化：一方面有法西斯主义之生长，他方面有群众革命斗争的生长，革命危机的前提是在加速度的增高着。有些国家或接近着革命的危机（波兰），或在国内国外对立非常尖锐化的事变中，在最近将入于革命危机的情势之中（日本）。在印度和拉丁美洲诸国中，革命危机的发展是在停滞着。……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的力量，是在坚强的生长着；但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中，如美国、英国与法兰西，革命危机之高涨，虽比前是有了发展，但还远远落在国际情势的高度紧张的后面"（十二次全会）。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省委紧急临时会议决议案对国际革命运动的情况，估计实有过分之处："……证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在各个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走向成熟"。（3）帝国主义国家间冲突之更进一步的尖锐化。帝国主义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之剧烈的斗争，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日美、英美和法意等国间的关系之尖锐化，关税战争，军备竞争，如最近军缩会议之僵局，凡尔赛制度的震撼，但泽问题之紧张，与德波备战及德法关系之紧张，已经引导了新的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到直接的危险的场合。（4）反苏联的反革命战争的准备加强。这一愈见尖锐化的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是不能孤立去理

解的。苏联之存在与其力量之迅速的增加，世界革命运动之发展，使帝国主义想以暂时渡过他们自己间增长的对立，去在进攻苏联上找求共同的计划的期望，已愈增加了。在远东，日本已将满洲和热河变为准备进攻苏联与外蒙的军事根据地，集中军队于满洲，创立白俄的武装，拒绝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的条约，最近且指使"满洲国"积极向苏联挑衅，企图完全占据中东路，英法美都在竭力促使日本开始反苏联的冒险。同样，法国的远征军之组织，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芬兰军队之热烈的准备，德国之法西斯蒂的专政及其对苏联的恶感，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之"和平共居"的时期，行将完结。"这一切事实，完全证实了第十、第十一两次共产国际全会的决议对于发展形势估计之正确，指示着资本主义总危机过程中一个一定的转变，一种敌对的力量之独特的转变。这在有些地方，如暴风雨般的进行着，在有些地方，则比较缓慢的进行着。这敌对的力量，在某些非常重大的关键上，已经开始了冲突。资本主义暂时的稳定已经终结了。但在最重要的与决定的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的冲突的新阶段（即革命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十二次全会决议)。

(二)在中国，战争与革命已是实际的事实，这主要的表现在：

1. 苏维埃革命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获得了胜利。在最近一年中，江西中央苏区是大大的扩大了，红军的数量和战斗力是大大的增加了。去年一年中，江西红军在数次的胜利中获得了十万左右的枪枝，最近又给蒋介石对江西的"围剿"以严重的打击，击败白军九师兵力，完全消灭了五十二、五十九等师，于此可见中区红军壮大之一斑。围绕中区的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闽粤赣各苏区，亦着着向前胜利。在川陕边境开辟了新苏区，这对于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将发生很大的政治兴奋和组织的作用。鄂豫皖苏区虽因领导的错误，而受到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仍保有数百里上下的苏区与两万以上的武装；近且由于广大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党的艰苦工作，得到许多胜利。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深信，在你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之下，不仅能恢复旧有苏区，且更将扩大，以震撼敌人的要害。湘鄂两苏区虽也受到相当损失，但二军团的主力依旧存在，而且正在湘鄂边胜利的进行战争。整个说来，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实已成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劲敌。在目前广大群众贫困破产及民族危机的环境中，它已成了赤化整个中国的伟大革命因素。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之尖锐对立，正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中国两个发展前途的斗争。这一斗争，在目前已经进入了残酷的长期的国内战争和决定胜利的战斗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国民党不惜出卖国家、出卖民族，集中一切财力，人力，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之下，来反对这个所谓"心腹之患"。党在这种情势之下，只有清楚的了解和抓住此种尖锐对立的形势，才能真正动员和组织广大劳苦群众，来开展胜利的革命战争与冲破敌人的"围剿"。但我们审查你们的文件，对于这一形势之认识直至最近仍然是不正确的；如省委第一次扩大会的决议案写道："目前国民党的主力还未完全消灭，而苏区红军反包剿的胜利，虽然暂时激起了局部的军阀战争，必然终于要促进在死亡之恐怖前面的地主资产阶级各派互相团结。所以扩大会认为目前我们的反包剿的斗争，依然是在紧张的关头"。试问这种分析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有何相同之处？从这里可以完全看出用空洞的"左"的词句来模糊甚至否认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因此实际上忽视了反包剿的重大任务，正是鄂豫皖省委在这时期所犯错误之基本来源。

2. 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阶段。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是在全力进行着，在征服满洲和血洗上海以后，现又占领了热河与河北大部；英法除掉积极赞助日本这一

行动外，也正在进行囊括西南诸省的计划；美国为着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正在企图变整个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切完全说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如何在疯狂的进行着。国民党始终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它不仅不派一兵一卒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加紧白色恐怖，镇压和屠杀一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群众；最近热河的出卖，完全是国民党预定的计划。目前正在“抵抗”的烟幕弹下面与日本进行秘密的谈判。国民党这种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主要的就是要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的广大劳苦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是在迅速的开展着（各地工人、学生之反帝斗争，东北义勇军之苦战，前线士兵英勇的牺牲……）;而共产党与苏维埃对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也就日益扩大。无疑的，此种群众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只要吾党能给以正确的坚强的领导，必然能配合红军的胜利，形成大规模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3．全国国民经济之总崩溃，实已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大批失业的工人与灾民难民得不到丝毫的救济；在业的工人在资本家残酷的进攻之下，时时都有停工开除的危险；农村的破产，更不用说了，去年的收成虽然较好，然因物价狂跌，农民更加破产。全国群众处在这种水深火热，颠沛流离的下面，真是忍无可忍了;城市中工人之罢工运动与失业工人的斗争，汹涌激荡，乡村吃大户抢粮的斗争与游击战争正在猛烈的开展，苏维埃的土地革命已经在许多新的区域开始了。

国民党的政权的崩溃，及其各派别的对立，是在日益加深，现在它要更加依靠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它的真面目。然而从这里，绝不能作出统治阶级可以自然倒台之结论。相反的，国民党正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尽它所有的能力来挽救它的血腥的统治。目前的革命危机是否能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那就要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对于广大劳苦群众的夺取了。正是根据此种形势，国际十二次全会就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六个任务：“(一）在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争取中国之独立与统一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二）发展并联合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三）为推翻国民党制度而斗争。(四）坚决的采取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组织，并夺取组织在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人的路线。(五)开展游击战争，在满洲要提出并进行成立农民委员会，抗租、抗债，并拒绝政府一切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组织选举民众政府的口号。(六)普遍的宣传和解释苏维埃区域的成功，宣传中国工农民众与苏联兄弟联盟的口号”(十二次全会的决议)。

(三)我们仔细审查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种错误的实质，便是“左”的空喊代替了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与准备来冲破四次“围剿”,以后所表现的狼狈惊慌与掩饰自慰，乃是这一错误必然结果。一切想把军事的错误与政治的错误分开，或将后来的错误与开始的错误分开，都是不正确的。要知道这一错误之所以形成，正是因为鄂豫皖的领导同志，没有真正了解和纠正在四次“围剿”开始时中央所指出的错误（即关于敌人的力量错误的估计)。固然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否认个别负责同志所犯错误有轻重之不同，但这对于整个问题，并不有什么改变。现在让我们把你们的主要的错误，一一加以分析和指导：

1．轻视敌人的力量，毫无持久应战的准备。“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国民党便又动员几十万的大兵来“围剿”苏区，对于几方面威胁武汉的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尤其是首先攻击之例，尚在这一“围剿”开始之先，中央曾警惕过各苏区的党要严加准备；可是你们在初步胜利之后，便昏头昏脑起来，以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

更何畏于“偏师”？故甚至退出七里坪的时候，消灭了敌人很多的军力，便题曰：“国民党匪军全线总退却”。这一恃胜轻敌的情绪，自然使你们感觉到一切准备皆是多事。一方面你们只想到“红四军无战不胜”，但并不是去积极准备足以取得“无战不胜”的条件，不知红军所以能战胜在技术上、数量上占着优势的敌人，正因为他有广大劳苦群众的援助；另一方面你们只想到国民党匪军望风披靡，却不想到敌人也会顽强抵抗，以持久耐战来挫折你们的一股“趾高气扬”的骄气，转使你们陷于狼狈的情况。这里，要了解：“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一往直进在在胜利的……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是那些在胜利的暴动时期，表现自家的英勇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的进攻时，既会打胜仗，同时要能在革命退守时……一样会表现自己的英勇，不垂头丧气。……不要张皇无所措手足”（斯大林）。列宁也说过：“不仅要学会进攻，而且要学会退守”。在这次“围剿”中，你们起初只是逞一鼓之勇去冲锋，并没有作战的计划，和广大群众的动员，追后遇着顽强抵抗，遭受一些挫折，便“张皇无所措手足”，乱兜圈子与无目标的西逃。

这一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之不正确估计的残余观念，仍然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可以看得出来，譬如你们以为：“国民党的主力军已损失过半……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包围会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紧急会议在这方面只是重复这一观点；如说“以鄂豫皖为中心的第四次包围会剿的陷入失败地位与主力军大部分丧失，和全国工农斗争猛烈发展，使整个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有立即死亡的危险”。又说蒋介石“在江西中央苏区红军胜利进攻之下，搜集他的残余主力，去对付中央苏区”。另方面，对自己的估计则是：“农村苏维埃已经巩固起来，在反包剿的斗争中，已经站在胜利中不能失败的地位”。这是明明白白抹杀鄂豫皖苏区受到了相当损失的事实。

我们号召你们要立刻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过分的估计。很明显的，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妥协之下，动员了全国军队之精锐，来攻打红军，有细心的准备，筑公路、建堡垒，并不能视为“残余的主力”；中央苏区的红军，近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予敌人以重创，但还不能认为这次“围剿”“已经陷于失败的地位”。这种脱离实际的观点，只会松懈我们的战斗动员，再重复你们轻敌的错误。

我们从你们的报告中和决议中，可以见到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中，因为红四军的退出，城市失守和目前的困难，发生了一种恐惧、失望的情绪，这正是狂热后的反映。征服这种情绪固是开发今后斗争之必要的条件，但你们在决议上主要的还是用空谈一般“客观的顺利条件”来安慰自己，而没有真正提出许多切实的办法来打破暂时的部分的困难，去发展同志们的积极性。这同样是表示你们在观察和处决问题时，缺乏阶级的锐敏性。

2． 无计划的运动战，无目标的兜圈子：

正因为你们没有持久的应战的准备，对于黄麻苏区“似乎没有任何的信心”，及对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发展的目前阶段，没有充分的了解。故“化整为零”，决定了在苏区周围乱兜圈子的战略。追根究底，你们这一“战略”的决定，是从你们的整个政治估计中产生出来的。

目前最大的危险——决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是不愿爽爽快快的依照一定的计划，配合游击战与正式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在从前的时期，为建立并巩固苏区以反抗敌人，旧的游击战争是充分的，因为当时的敌人还没有很好的准备，用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但只是这个策略，决不能破坏敌人强

大的力量，决不能防止敌人在我们苏区周围筑起堡垒与交通网。起初，我们军队还缺乏强大而有组织的单位，便使我们在当时难于作正式的战争。但在这数年之间，我们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军备和组织上也大大进步了，游击战与正式战的适当配合，已为可能之事；这个配合作战，更因为敌人之变更策略而成为必需。

可是你们既没有在战争一开始，即用各种武器（原始的也在内）去武装民众，发动他们的游击行动；另方面又不曾利用有组织的集中的方法去反抗敌人，而主要的却是无计划的作战，遇到敌人时，即进行所谓“运动战”。因为没有计划与合作，使战胜白军时之猛烈的追击，也成为不可能了。省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以及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错误的策略，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只把责任嫁诸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那是错误的。你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去学习。

在接到省委二月二十一日的信后，使我们不得不再着重警诫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飘忽的游击战略”。据信说：“敌人正在找我们的主力作战，以求消灭我主力”，而我们并没有制定一定的反攻计划，仅用“飘忽”的战略去对付。这引起了我们严重的不安。我们责成省委根据中央此次之军事指令，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不要重犯以往的大错。

3．没有战到最后的可能，轻易的放弃了苏区根据地。

因为我们主力的领导，固执于“不定的战略”和“兜圈子”，使敌人能够深入而威胁我们的根据地，缩小我们的区域，而在苏区中作战了。在这种情势之下，党的任务只有团结群众，集中武装力量，来为防御苏区作猛烈的斗争。根据你们的报告，你们先前对于敌人军队，是为一种轻视的估计，而后来投向到悲观惊慌的观点，终至狼狈撤退。可是如果有同志为这种错误的策略企图寻“理论的”根据，认为“苏区没有什么大意义，但是武装力量必须保存”，那么，这不仅是策略的错误，而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路线，我们必须与这种危害革命的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不能把苏维埃与红军作为两个分离的实体。苏区是红军之存在、维持和壮大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红军是苏区之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权之柱石。没有苏区，红军不是瓦解，便会溶化于游击的集团；没有红军，敌人就要粉碎苏维埃。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后的力量。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决定就是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

此外，我们认为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且会要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使他们置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前而得不到红军的保护与适当的防御手段。这样，在我们恢复原有苏区与扩大新苏区的事业中，将要受到更多的困难。加上我们个别的队伍行动中的错误，如刘士奇同志所领导的队伍的行动，打骂跑反的群众，乱抢东西，这对于群众会发生最不良的影响。

总结上述，我们应该承认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鄂豫皖苏区方面，已经部分的达到了目的（详见军事指令）。鄂豫皖苏区，因为从前的苏区在战略上的地位讲，是有最大的重要性（控制长江，围困武汉，威胁平汉铁路），占中国中部之中心，逼近国民党统治权力的要害处，而对于帝国主义的利害关系，有给以致命的打击之可能的旧苏区，对于敌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对于我们是一个宝贵的强大的基础。你们应用一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不要等着红四军之归来。我们不能同意你们“令其全部或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的请求，因为红四军已经在西北开展了革命的战斗，创造了新的壮大的苏区；我们是不应该将这块千辛

万苦打来的苏区，再送给敌人了。第二，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已成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第三，红四军从四川经过陕西打回鄂豫皖旧苏区，是一种长途行军，很有招到巨大的损失的危险。第四，你们现有根据地及武装，能在广大群众拥护之下，创造强有力的红军。这里需要的是艰苦工作，你们应该动员党、苏维埃、工会和广大群众来完成这一任务。

4． 在四次“围剿”以后，苏维埃的建设，党与工会等的群众工作是大大的削弱了。巩固与扩大苏区，创造强有力的革命军队，都不能不建筑在广泛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列宁说过：“要使得革命政府努力依靠着人民的下层，工农群众——非如此，则它便不能支持下去，没有人民革命的自发性，则革命政府等于零”。列宁又说：“革命政府应该提高‘人民’而组织其革命的积极性。”（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二一一页）可是你们在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对于苏维埃工作是很少有真正注意的……很少分配干部担负苏维埃工作。现在省苏维埃与下级苏维埃的工作，几乎仅成为一个空架子。”“苏维埃的代表一般的没有向选民作报告，而代表仍然有指定的现象。……群众对于苏维埃委员会很小有自动的热烈参加……”（你们的代表报告）。这样，苏维埃并不是由广大工、农、兵士群众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的政权机关，而弄成了第二个党的模型。没有发展群众的德谟克拉西以启发群众参加工作的积极性，而群众的积极性在解决了土地问题，取消了苛捐杂税，推翻了反动统治的苏区里，是非常伟大的。但你们并没有经过党、苏维埃的群众工作，去组织它。工会工作表现着严重的忽视，在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上，仅是空而又空的写道：“建立京汉路和汉口、武昌等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丝毫没有一点具体的东西。你们对于群众工作这一严重的疏忽，是大大削弱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而且这也使一切反革命派容易活动。把这一切，皆用缺乏干部来说明，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向你们建议：立刻举行苏维埃改选的运动；很勇敢的提拔工农干部到苏维埃机关中工作，切实考查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实际工作，给以很大的革新。而这一些工作之进行，要与冲破敌人“围剿”，扩大红军和苏区联系起来。

5． 对于伤病士兵的处置，是绝对不可容忍。

对伤病士兵的处置，于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工农红军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根据你们的代表报告，你们对于伤病兵的处理，真是不可容许的罪恶。“第一次想将伤病兵捆起来，将他们抛弃；第二次又将他们关在一个祠堂之内，又企图抛弃他们；第三次又想将伤病兵的粮食夺来另行分配。这样行动的结果，使一万多伤病兵回到苏区的仅有二千多人。此外，对于随军的看护和医生亦采取同样的办法，设法丢弃他们”。这是近乎公开的反革命的罪恶，而省委仅给罪魁以严重的警告，这是最腐朽的自由主义。省委完全不去了解这一罪恶的行动，会在群众中发生最不良的影响与结果。现在事虽过去，但我们依旧向你们严重提议，立即逮捕罪魁，交群众革命法庭审判，依革命法律严办。并将这一处置的结果，在广大的群众与红军战士中宣传。若长此掩盖下去，就是省委的莫大罪过。——我们要求你们向全党和革命负完全的责任。

6． 没有健全的党的生活，缺乏充分的阶级警惕性。

根据你们代表的报告：在鄂豫皖苏区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斗争方式的表现，即在最高指导机关中，亦表现极不正确的现象。领导同志如国焘与泽民之间的关系，是不经常的。这不能不影响到苏区的全盘工作。在下层的斗争，则往往成为吵架，

特别是上级对下级，并不是对错误的纠正，采取教育与解释的方法，使干部了解。一般都以撤换工作来代替两条战线的斗争，所以调换工作好像就是对于每人错误表现的标准一样，这也就是不能切实培养大批工作干部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对于错误的自由主义。在引进的干部中，“经常发现反动分子”。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集中制都没有充分得到正确的应用与发展。对于党组织的发展，严重的表现着自流的现象。党的领导不具体，省委送来的两个决议，就是最好的“一般空洞的领导”的标本。我们认为若不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生活，开展布尔塞维克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彻底采取新的具体领导的方式，则鄂豫皖苏区的党将不能完成它的伟大任务和使命。

关于干部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的解释。我们认为鄂豫皖的干部所以如此困难，完全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你们完全不了解下层干部的情形，脱离了下层干部。列宁说过：在斗争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家、组织家，即以自发罢工之层出不穷，即是证明群众领袖之丰富。试问苏区经过了伟大土地革命，难道还没有几千或几百个群众的领袖吗？你们没有真正去认识和提拔他们，你们与下层是隔离的，试问有什么根据来说下面没有干部？第二，你们提拔干部只限于小家庭式的小手工业范围内，对于广大的新的工农干部是惧怕的，你们宁愿把许多工作放起来，而不敢分配给新的积极分子去做。在这里，若以“防止反动派别的活动”为理由，那正是说明你们的肃反工作恶劣之原因。试问关起门来有什么方法来开展与反动派别的斗争？固然在提拔干部错误中，可以混入不良的分子，但因此就对一切新的干部惧怕起来，那当然是绝对不正确的。

(四)我们指出你们这些错误，并不是为抹杀你们在工作中许多伟大的成绩。而且要坚决反对认为鄂豫皖苏区已经完全失败，工作中没有一点成绩的悲观的情绪。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集中你们的注意力来克服这些错误与缺点，而完成目前的中心任务。

根据目前全国的形势及鄂豫皖的具体条件，中央认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的内部敌人，将这一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所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和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结豫南、皖西北的整个苏区向前发展。为执行这一任务，就必须在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开展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来消灭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和缺点，同时，以最大的顽强性来执行以下的任务：

1． 党及其他群众组织之加强：我们必须立刻改造并扩充省委员会，要坚决的引进在数年斗争中表示坚决与精力的新的干部，就令这些干部在许多方面还未发展，我们也决不疑迟的提拔他们到党的领导职务来。在地方与县的组织方面，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路线，坚决的吸引新的党员来到党的领导机关，我们必须完全打破只有识字的同志能做领导工作的观念。必须发展最好的工人阶级的分子与最革命的贫农，来巩固党组织的干部。对于支部工作必有最大的注意，要知道脱离支部和不了解支部情形，是没方法转变党的一切工作的。

我们必须引入革命的分子，大开入党之门（尤其是工人与无产阶级的红军战士），他们长年同敌人作战，且在这艰难困苦与残酷的敌人之前，表示了这样英勇的行动。我们要求你们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不必一般的采用候补的制度，对于某一些分子可以采用一种试练制度，即在允许入党之前，分配他以特别的任务与工作（这特别适用于教员、知识分子与农民等）。对于工人，我们采取一切方法，使他们成为党员，同时要为教育并训练他们作巨大的努力，

当工人在党的工作上犯了错误之时，我们在任何条件之下，不许再继续形式主义的惩罚制度。我们必须用学习用教育制度来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必须区别各种的错误：是忠实的革命者，因为缺乏经验与学习的错误，还是阶级的异己分子和反革命者的有意识的活动。由这一工作，我们可在群众基础上发展党，并可以解决坚强的干部的发展问题。有能力来领导工农群众与红军及游击队的一切活动，我们也必须在引进妇女来做党的工作上特别努力。

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有力的群众基础上去发展。团不许成为党的副本。真正引进青年工人和基础农民群众的青年到队伍中来，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来担负革命的任务，注意他们经济的和文化的兴趣和需要。

为加强无产阶级在青年中的领导权，为保护并防御工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比从前引起更大的注意来形成阶级的工会。我们苏区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农业工人和苦力的事实，给予发展有群众基础的农业工人和苦力的强有力的工会的可能。这种工会的任务——除一般的革命的教育工作与帮助苏维埃工作——是为实现工人某些基本要求，如八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帮助解决粮食问题等而作精力的斗争。而整个劳动法令之实现，亦必须在我们的目前苏区基础上有步骤的来实现。过去的停滞状态，是再也不能容忍的了。

贫农团应该在真正的群众基础上来组织，它是保护基础农民的利益的独立组织。再用很大的注意去巩固工人与中农的联盟，在平等的基础上去对付中农。

在农业工人工会与贫农团之间，要建立紧密的联络，为的是表示对中农能表示最大的统一战线，为的是加强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

其他群众组织问题，你们已经写在你们的报告和决议之中。我们只有再力说一句：领导机关必须由选举来形成，不可用指派与命令。

2. 扩大和加强红军、游击队和少年先锋队：在军事任务的秘密指令上已经说到，这里只说到少许一般的任务。在党省委员会领导之下，立刻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有非常之大的需要。这一军事委员会，必须开展我们一切武装力量的领导，配合并指导一切我们军队与游击队的军事的力量，发展他们的创造性。至于其他工作，概说于军事指令之中。

我们必须开始徵收红军、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的广大的运动。有进攻力量的真正军队的形成，必须与动员广大群众和原始的武装工作相携并进的（用剑、刀、戈、枪及武器的一切种类）；这使我们有可能给敌军以军事的致命打击，并同时可以实际的阻止他们的更加前进。省委必须严格纠正过去忽视甚至拒绝原始武装的错误。被破坏苏区的难民，必须吸入红军之中，以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土地。我们所俘获的普通的士兵，不应给资遣散，或使之归“家”，应向他们作宣传，在我们监督之下，利用他们进行群众军事教育；同时可依照他们的觉悟程度编入他们在我们组织的军事单位之中。

3. 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我们必须立刻重新形成全区的苏维埃政府，在迅速完备的准备之后，我们应召集地方及县苏维埃大会，其目的是讨论最近将来的工作与选举苏维埃政府。立刻要组织能进行工作的一切部门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但苏维埃政权必须再行集中起来，为的是吸引群众来做防御的工作，分配土地，实现劳动法令，解决种子、收获与粮食问题，以及其他经济与行政之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打破过去的错误，把建设国家做为第二等的问题，我们必须吸引成千的工农群众——不仅是党员，而且是非党的同情者——在领导地方及县的苏维埃工作。同时，必须最大的用心注意有没有反革命分子、富农、第三党、改组派等潜入苏维埃或我们的群众组织。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也须加强，但是政治保卫局必须有群众

为后盾，党必须吸引群众去做反对反革命派别的工作（特别案件的群众审判，群众参加处理反革命派，对于反革命的走狗与被欺骗的工人或贫农等处理及惩罚应该有区别）。

粮食问题目前应严重注意，只有在耕种时厉行最大的组织的努力才能克服，其他再没有出路。游击的行动，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而常要影响——如果无区别的实行——围绕我们的白区农民对我们的敌视；自然我们不能完全放弃这种出征的方法，但我们工作的主要路线，必须发展乡村的经济的活动，在苏维埃领导之下工人、农民的努力。另外在粮食储蓄须有一定的计划，按照阶级路线去完成，不应该一般的空叫“群众有饭吃，不怕红军没有给养”。行军作战的粮食基础是应该有准备的。

同志们！

你们的任务是这样的繁复，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这样的重要，对统治阶级的堡垒保留着极大的威胁的作用，你们就该不顾一切艰苦，根据中央的指示，取得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来完成摆在你们前面的恢复和扩大鄂豫皖苏区的光荣任务。

全党和全国的工农，是在热烈的注视着你们，兴奋的期待着鄂豫皖的战线上的佳音。

中央向你们和转战经年的英勇战士与为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到底的劳苦群众，致极诚恳的热烈的革命敬礼！

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和你们断绝了交通关系，将近一年，只从报纸上和个别的捷报中，一般的知道了你们斗争的情形。曾由中央转给你们一个短短的指示，许多问题，自无从谈起。这次四川省委已与你们打通了关系，并由省委转来了昌浩同志简要的给四川省委的信，仍旧无从了解你们的全盘工作。因此，我们只提出几个个别的问题，促起你们的注意。至于整个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指示，尚有待于你们迅速交来详细报告之后。

一 胜利的冲破四次“围剿”与第五次“围剿”中党的任务

帝国主义国民党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由于红军的英勇善战，苏区及白区中广大劳苦群众对苏维埃与红军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正确的领导，是被我们彻底的与完全的粉碎了。我们巩固了原有的阵地，并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使苏维埃的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红军在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中，增强了自己，覆灭敌人十几师，粉碎了敌人全部计划。这一伟大的胜利，更加尖锐化全国的革命形势。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在二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黄陂、东陂的惨败后结束了。东黄陂惨败后，蒋曾几次企图根据原有的力量，不变更四次“围剿”的总计划，向我们作新的进攻，但这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蒋介石不能不暂时改变积极进攻为防守政策，调遣新的军队，组织新的力量，以较长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

四次“围剿”的冲破，指示给全中国的劳苦群众：苏维埃革命有强固不可消灭的力量，一切企图以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免的受到惨败。同时，在四次“围剿”中，我们还有许多异常重大的弱点，主要的是未能将白区中的反帝斗争及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更大开展与红军胜利的配合起来，军事上未能建立全国集中的军事领导，来配合各地进行战斗任务，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非常不够，战略与战术的活泼性很差，红军的组织还赶不上战斗开展之需要。这许多工作中的弱点，妨害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实现。

在中国前面，放了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或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或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帝国主义正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完全瓜分中国，使陷于完全殖民地化的计划。在这个整个计划之中，五次“围剿”是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一步。四次“围剿”粉碎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即刻开始新的五次“围剿”的准备：签订了出卖东北四省与华北的“塘沽停

战协定”，以便抽调劲旅南下“剿共”；南京政府经过宋子文向英美帝国主义者大借款，购买大批飞机大炮；法西斯的德国，且专为国民党兴办了两个兵工厂，制造屠杀中国劳苦群众的武器；近且向日本直接乞援；大批法西斯蒂干部的培养与调赣参加“围剿”；发行大批“航空公路”公债，剥削民众的血汗，以充实“剿赤”的军费；拟定三年军事建设计划，开始招募与训练五十万完全法西斯化的军队，五千架战斗机与两千架坦克车等，以大规模进行反革命的战争；同时，召集新的五省“剿匪”会议，和对苏区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封锁，重新确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帝国主义的作用更加强了，成立了共管中国的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步骤。因此，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更加进一步的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国民党及其各派军阀，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都在一天天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走近崩溃，更加使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

中央认为全党应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战斗任务：

(一)苏区的党的组织：

1．必须立即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领土及争取苏维埃在中国胜利等等口号的周围，号召与动员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

2．继续猛烈的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团，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扩大与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以实际准备过渡到徵兵制的步骤。

3．极力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4．红军各部间须在整个的战斗意志下进行战斗的任务。

5．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组织与援助白区的群众斗争，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加强工人对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

6．在胜利的冲破五次“围剿”的口号下，来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

7．为保障红军的给养与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开展合作社运动，秋收与粮食收集储藏的运动。

8．党必须加强附近苏区的白区中的工作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大的中心城市及工人集中的区域中去。

(二)在国民党区域中的党的组织：

1．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反国民党的煽动，号召并组织反对进攻苏区的示威、抗议、罢工与群众会议，尤须加强在码头和运输工人中的工作。

2．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信，注意争取我们对于满洲、河北及其他各地的游击运动的领导，使他们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及在广大群众中普遍中国民众与苏联的兄弟联盟的口号，加强拥护苏联的工作。

3．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广大的群众工作，组织无产阶

级的反攻。

4．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灾民、难民、兵士的日常斗争，并引导到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

同志们，中国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火焰中。在完成这些任务中，你们光荣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实负有重大的使命。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将加多整个革命战争胜利的机会。

二　目前四川的形势与红四方面军及四川党在冲破五次“围剿”中的具体任务

目前四川的形势，对于开展四川的苏维埃运动，是非常有利的。你们应用一切力量，抓紧这一历史的时机，把革命的火炬烧遍整个的西北。这一顺利的形势决定于：

(一)红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与川陕边苏区的扩大。据“申报”所载，红四方面军已增至十万人以上，而昌浩报告，则谓苏区现已包括通、南、巴、庆、万、绥、营、宣、阆、苍、宁、城、西、镇共川陕十四县，通、南、巴全为苏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的革命运动，奠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

(二)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更加兴奋了四川劳苦群众的斗争，抗捐、抗税的斗争在许多地方演成了武装战斗的形势，树立起声势壮大的抗捐军和川中及川滇边的游击战争，这是削弱敌人，有利于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最有利的条件。

(三)四川各系军阀间的冲突，又一次的酿成了全川的军阀战争。刘文辉固然败退岷江西岸，或更被迫去入康边，但刘湘所领导之下的联军，亦已受创不小。而四川的统一，除我们的革命战争来完成外，对任何的一个军阀都将是梦想。联军内部的冲突，依旧是存在，防区割据的制度，并不会就能消灭，这将继续牵制各派军阀彼此削弱自己的力量。

自然，对于这个基本顺利的客观形势的分析，并不能使我们因此可以忽略四川整个形势之其他各方面。这一种忽视会造成你们自满自骄，过于看轻敌人的力量，以松懈我们的工作和动员，而重复你们在鄂豫皖苏区曾经犯过的因轻敌而使鄂豫皖苏区遭受部分失败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中央同时要求你们严重的看到下面的几个事实：

1．据天津日本军事情报处报告：英公使蓝博生到四川重庆去的主要目的，是同刘湘讨论划定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和这两处贸易的可能；并且谈判二千万的英国大借款，用以购买飞机、军火和其他商品。同时，法国总领事梅礼霭也曾到过重庆，进行怎样把法国势力更深入到四川而巩固起来。这些事实，使英文“密勒评论报”的记者，都不得不认为：“……四川军阀……接受新的借款，英国人就不但得以统治西藏，而且可以统治四川了。此外，联合进剿四川东北边境的红军的事实，也很有可能性。”

红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与四川革命运动的壮大，使得四川的统治阶级更直接的乞援于帝国主义；而且使帝国主义自己也感觉到他们在西北统治的致命威胁。英国之实际占有西藏与向东进展，实在积极准备着就近的军事根据地，以企图直接武装干涉四川的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法帝国主义者，则虽与英有利害的冲突，但在压迫苏维埃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你们应当看到这种逼近的危险，来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2．最近四川军阀战争，以刘文辉之惨败渐趋结束，而刘湘等反动军阀在帝国主义与国

民党积极督促与帮助之下，对你们大举进攻的危险更加紧张；并将首先驱使四川较小的军阀为“剿赤”的先锋，以消磨我们的力量，而造成他们的“优势”。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则更多倚重刘湘，资助他来与我们为敌。你们决不要轻视这一个反动的武装所给与我们的困难与威胁。

3． 四川党的薄弱，没有很好的群众工作，游击战争还没有普遍的开展起来；这些游击队伍中，有的还在反动豪绅操纵之下，没有完全夺取到我们领导之下，把他们的行动汇合起来，统一起来，很有被军阀武装暂时击败的可能。

这些事实，虽不能改变目前基本上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但要求你们很锐敏的估计到这些我们发展中的困难与障碍，并用一切力量来以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克服这些困难，才能使你们在开展你们的整个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目前的形势，给你们取得进一步的胜利以极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变成实际的。自满于胜利的可能性，而不以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可能，不算是真正的革命政治家。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的指示，是值得你们深刻的去了解的。

根据这一形势的分析，你们的具体任务就应该是：

(一)巩固现有的苏区，与将这些苏区联合成为一个不互相隔离的整体。在这里，中央要求你们深刻领略你们过去轻易将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而没有为保卫苏区根据地战到最后可能的错误。你们应当了解：红军是苏区的支柱，没有红军，则苏维埃政权无从树立得起。苏区是红军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红军不但将无从壮大，而且必流成散漫的游击队伍。因此，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执行中央给与你们要在渠江与嘉陵江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将现有苏区内敌人一切残余的力量，完全肃清，把其他苏区，都变成通、南、巴一样的整个的苏区。

(二)为巩固苏区与向前扩大，必须加强和扩大红军。中央认为你们有一切可能与必要在今年内创造真正富于战斗力的主力军五万人，这样，才使你们能打碎任何敌人的优越部队和夺取中心的城市。

(三)必须动员你们一切力量和整个的四川党来争取十数县以上的抗捐军的领导，及发动川中和川陕边及川滇边的游击战争。报载川滇边（古宋一带）的游击队有四千余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务必派人去沟通关系，使他们在整个计划中行动，以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

(四)你们现拥有三千里以上的苏区，范围已经很广，因此，使红军各部间的行动统一，非常必要。

(五)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加强各级苏维埃的工作，确立正确的经济政策，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六)加紧反帝的工作。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将于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开幕，你们和四川党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加强反帝工作，来拥护这个大会。应加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及到处建立反帝的群众组织，筹备召集救国御侮的代表会等，以动员群众。

(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于“广暴”纪念日在中央苏区举行，你们必须动员广大群众来拥护二苏大会。在川陕各苏区举行各级苏维埃代表会，并选举出席二苏大会的代表，务须于十月底即派来上海。

中央责成你们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加强全线上的工作，工会工作尤居首要。你们应巩固与省委的关系，即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亦不应断绝。

三　赤化四川全省的任务很迫切的摆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在执行这些任务中每一成绩，都将增加革命势力的比重。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国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亦遭到‘赤祸’之蹂躏盘踞，将来发展，宁不可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

中央向你们和红军四方面军全体战斗员致极热烈的革命敬礼！

中央给闽浙赣省委信

（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

亲爱的同志们：

因为交通上联系上的不敏捷和其他的原因，下面的信，我们仅仅是根据万永顺同志的口头报告，及一些五六月份材料来写的。关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全国政治环境及党的紧急的战斗任务，中央已经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上，给了全党一个明确的分析与提出了严重与负责的政治任务，我们不预备在这封信上再重复它，而想根据那个决议来给闽浙赣的工作作一个检查。在这个检查之中，我们将只说到一些重要的中心的问题（因为我们还缺乏各方面的详细的报告与材料），希望你们能够根据这封信，更仔细检查你们最近一时期的全部的工作。

无疑的，由于闽浙赣的党的组织一般的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依据于闽、浙、赣区域中广大劳苦群众之革命积极性的增涨，所以，虽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在与敌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及组织苏区内部的反革命阴谋的坚强不挠的斗争中，胜利地保护了苏区的根据地，及时地破坏与扑灭了隐藏在苏区里面的反革命组织，开展苏区内的经济建设，相当地发展苏区与白区间商品流通与贸易，巩固与发展了党的组织及周围苏区的白区工作之建立。这些当然是不可否认的重大的成绩，并且其中有许多的经验是可以供其他苏区的参考与学习的。但是当着我们在检查整个闽、浙、赣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信不仅应该指出这些成绩，而且必须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着的许多的严重弱点，这种严格的自我批评，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自我批评是克服我们的弱点、巩固党的组织、开展我们工作的各方面的必要的前提。

（一）中央在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中，在详细的分析了五次“围剿”中的各个问题之后，曾经锐利的在苏区党的前面提出：“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中，完成中革军委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时期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同时，应该指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党早已在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提了出来，江西的党的组织已经在这个口号之下，真实地进行了布尔塞维克的动员，而获得了极大的成绩。在这方面应该指出，闽浙赣的党的组织，对于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忽略了。在长久的一个时期，完全、差不多完全没有大量的扩大红十军，而且在六七两月的突击计划上写到了一切，甚至缴枪亦做出了预算表，可是没有一个字、一句话说到扩大红军?!这几乎是令人不能相信的，然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当然不是偶然的遗忘（即是遗忘这样重要的头一等的任务亦是不能允许的），而是表示着闽浙赣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机会主义的了解与忽视。根据永顺同志的报告说：闽浙赣党内有些同志认为在苏区扩大红军将要妨害苏区的生产，使劳动力感觉缺乏，因而这些同志认为目前扩大红军的中心，应该放到白区或灰区去。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与有害的。这是阶级敌人武断宣传的影响在我们队伍中直接的表现。如果在闽浙赣几十万劳苦壮丁中扩大

二三万红军就会影响生产力的减低，那末如何解释中央苏区个别的先进县份（如兴国等），它的人口要比闽浙赣苏区少几倍，已经动员到红军中去的壮丁要比闽浙赣多几倍，然而兴国的生产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在今年反而增加了两成收成。所以问题并不在以机会主义的借口来妨碍红军的扩大，问题是在以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提高群众的革命的积极性与劳动热忱。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最大限度的扩大红军的队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支柱；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经过发动劳动妇女积极的参加生产工作之各方面，经过农村中劳动互助社的普遍的建立和党与苏维埃对于耕种运动各方面的经常的注意与努力，则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将农业生产提高到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所梦想不到的地步。为避免误解起见，我们应该指出：吸收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革命的劳动分子，首先是产业工人加入红军是必要的。然而这不能够用以与在苏区内部扩大红军对立起来；成为放松后者的借口。另外一个同样是有害的见解，就是以为我们暂时还缺乏现代的武器（步枪、机关枪等等），所以红军扩大了亦没有用，因之，红五月中已自动报名几千人，我们并不把他们集中起来，同时雪片般的电报向中央请械。亲爱的同志们！这里你们忘了我们在今天环境下，当着我们暂时还没有大的中心城市与大的兵工厂、制造厂的时候，我们的枪枝子弹及一切武器是在残酷的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的，当着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新式武器时，那我们亦必须被迫的利用一切旧的武器、刀、梭标等等（在这方面闽浙赣的劳苦群众有着令人钦佩的伟大的创造力），把我们队伍——不但赤卫军与游击队，而且有时候正式红军部队亦是一样——武装起来，以便在战斗的胜利中解除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这是国内战争的规律。不说在鄂豫皖、湘鄂西、井冈山及赣东北苏区本身的发展的最初时期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即使中央苏区在最近还是一样的。在五月中我们扩大了二万五千红军，创立了几个师。开始时，这些队伍，差不多多数是没有良好的新式武器的。直到今年夏季及秋初东方军与中央军的胜利后，我们才能充实了他们的武装。这是在目前我们大量的扩大红军中所不可避免的阶段，革命的军队正是在这种与敌人残酷的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过程中生长、强大与锻炼出来的。可是，借口没有武装或者等待中央苏区的大批武器输送，而将那些已经表示热烈的愿以头颅热血来捍卫苏区，发展苏维埃运动的赤色战士闲散在乡村中，而不把他们集中起来，这不但是使红军不能实际的扩大，而且使我们保卫苏区的工作更加困难，这些机会主义观点的存在，是妨碍我们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最大障碍。我们再一次警觉你们，就是红军是苏区的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权的柱石，没有坚强壮大的红军，是使我们难于胜利的保卫苏区，使它不受敌人蹂躏，与发展和扩大苏维埃区域。战斗的布尔塞维克的口号，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应该放到闽浙赣党的工作的首要的地位上去。应该在这个口号的周围，进行最广大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的工作，利用中央苏区的许多经验，在最短时期内，扩大红十军为充足的、新编制的一个师，以便在以后向着创立一个军团的目标前进。

其次，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包括着不仅红军之数量上尽可能的扩大，而且是应包括着红军部队之军事技术、政治工作及阶级自觉纪律之最大限度的提高，使红军成为常胜的铁的红军，这里应该和部队中的各种游击主义之残余，轻视现代战略战术原则的应用之倾向作严格的斗争。在这方面红十军还是非常的落后，不论在军事技术与政治工作，这两方面都还极大的落后于我们的主力红军。“提高与学习军事技术”，“以政治工作来保障军事技术的提高”，还没有能够普遍到各部队中去，战略战术的灵活的运用与深切的了解，在干部中还极差，这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是军事指挥员能力强弱的问题，而是党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没

有能够给与应有的注意。国内战争中的党，应该是军事化的组织，整个的党的组织，应该最大限度的注意和学习军事问题，这里需要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强不屈与具体性来为着创立和锻炼壮大与强固的铁的红军而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国内战争中的胜利，而不是闭门造车的决定某个部队每月应行动几次，或会计式的制造缴枪预算表之类的荒唐事业，以及用一般的有时在原则上甚至有错误的空洞话（如完成七八两月突击月计划的具体工作上说的："在每一行动时，应很精细的估计敌人的行动，敌人的能力，敌人的接济，敌人的优点和缺点，然后选择最适宜的时候，最敏捷的路线，最优越的地形去进攻敌人，歼灭敌人"之类)，来代替有步骤的具体的对红军建设与战争的领导。

重复的说：要没有壮大的有战斗力的红军，要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党的任务，就是为着创立这样的队伍而用最大的努力——这是在今天环境中我们的第一等任务。

（二）国内战争的猛烈的环境中，而国内战争又是这样的艰苦的性质，使得我们不能不把我们一切苏区内部的生活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不能不把"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这个列宁的口号，当做我们一切工作的指标，尤其在今天的苏区的环境中，当着我们还只在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上胜利的时候，这尤其是重要。一切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服从战争的利益，为着争取前线上的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在目前正当着我们还只在一部分中国领土上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的任务，就是巩固苏区、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卫苏区、巩固苏区，而这里最重要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决的发展与扩大苏区，苏区的扩大将使我们能够更好保卫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是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政治上，消极的防御政策，不能使我们巩固已经得到的胜利，更加不能完成我们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指出：在闽浙赣的党的一部分同志中，浓厚的存在着保守主义的情绪。在军事上，我们始终不敢进行较大的白区中间的作战，战略战术上我们时常因为要堵防的原因，将部队放在敌人分进合击点上，因此，许多时候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胜利，游击战争之开展，非常的不够等等。而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在我们对于积极向外发展的极端的缺乏注意，我们依据着闽浙赣群众的积极性的发展上，在防卫苏区方面，我们尽了很大的力量，发扬了群众的创造性，发明与采用各种的防卫的武装方法，然而我们的弱点，亦正就在这种单纯的防卫。所以，虽然我们所费的力量是不小，然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们的苏区非但没有大大的发展，而且还遭受着敌人的几次的部分的蹂躏与烧杀，这就是因为单纯的防卫决不是真正的巩固苏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

其次，正因为这种浓厚的保守主义，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的胜利，这个列宁的口号，并没有能够在闽浙赣党的全部工作中反映出来。自然，在经济建设或其他方面，闽浙赣的成绩不容忽视的，可是，有些时候，这种建设没有能够在上述的列宁的口号之下进行。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工人的休养所的问题，据说这个休养所还办得不坏，工人群众很满意它，这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多少是一种奢华的举动，当着今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设备上能强差人意的红军伤病战士的医院或休养所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保证这个相当良好的休养所，给赤色战斗员与指挥员，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工人群众经济生活与文化水平之提高，相反

的，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努力为着这个而斗争，但是我们应该告诉工人阶级，苏区的巩固与发展是工人阶级一切福利增进的基础，而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的统治，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彻底改善与解放的最重要的保证。

这些是说明着：在闽浙赣党的组织中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政治的倾向，这就是保守主义。我们的领导者并不了解目前全国情势之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以及积极的为着巩固发展联系苏区成为一片的任务，而以狭隘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区域，兢兢业业的保守它。正因为这样，我们忘却了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将我们全部工作服从于国内战争前线上胜利的口号，而实际上这种单纯的保守与防御的态度，却并不能真实地巩固我们的区域。

这种保守主义倾向的来源，我们不能同意万永顺同志所解释的，似乎因为闽浙赣苏区是由农民暴动产生起来，所以保守主义是必然与不可避免的，这是无稽之谈，用以来减轻我们在领导中的错误的借口。这个倾向之政治上的来源，很明显的还是在我们，首先是领导的同志，对于日益尖锐化的全中国革命形势之估计不足，对于红军的军事力量之估计不足，对于苏区与环绕苏区周围之国民党区域中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之估计不足而来的。这个倾向是危害与有害的，而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其危险与有害的性质是更加增涨起来了，因为目前我们正处在全中国存在着、而且日益尖锐化的革命形势之中，我们正处在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剧烈斗争的关头。正如中央七月二十四日的决议所指出来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殖民地化的最具体与凶恶的步骤，它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与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出路的斗争，即是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目前的状况正是这样紧急的情况中间，要胜利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只有与保守主义的倾向作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克服这种倾向，使全党的同志了解这种倾向的错误及其害处，这是今后闽浙赣工作转变的必要的前提。反对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没有能够在闽浙赣党内广泛的开展，这便使得保守主义倾向有滋长的可能。我们认为必须在这封信的周围，开展最广泛的解释工作及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来保证我们工作上之必要的转变。

(三)最后，我们觉得必须说到的，是关于领导方式、思想斗争及自我批评的问题。

为着新的布尔塞维克的活动的具体领导而斗争，是改善我们工作的中心的主要一环。中央在一年来曾经用极大的力量，为着改变与消灭那种旧的、空洞的、一般的、恶劣的领导方式而斗争，许多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成绩，自然这些成绩，还是非常之不够的。说到闽浙赣这方面，那么应该说，必要的转变还是没有达到，而且有些曲解与庸俗化了新的具体领导的问题，从六七两月的突击工作计划中就可以看到我们把活的具体的领导，一变而为呆滞机械的数目字的领导，整个的突击工作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会计式的表格，而不是布尔塞维克的计划；我们不去仔细的考查每一个工作的具体的情况，群众的情绪和意见，对于每个政治事变与问题之反映以及真实的群众工作，不去给每一个下层组织以必须的具体指示，而空洞的计划着一般的数目字，甚至制定缴枪预算表，决定每个部队必须行动几次等等。我们不是具体的去进行扩大与锻炼红军及游击队，教育与训练他们，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而以决定必须要几次行动与缴几次枪为心满意足。而结果呢，自然可以预料到这个计划是不能完全的完成的，到那时候，我们再来检查指出一些成绩，指出一些缺点，从防卫保守、一直到太平享乐等等，以后再来规定计划，制出会计式的数目字等等。亲爱的同志们！这不是具体领导，而是具体领导的讽刺，布尔塞维克的具体领导需要的不是空洞的表

格，而是经常的检查，真实的、实际的领导，不以一种数目字而心满意足，而是要实际的工作计划与为完成计划而进行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说到自我批评，在闽浙赣的发展是异常不充分的。有许多时候，甚至压制着自我批评的现象亦是有的（如对畴西同志），即在永顺同志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到。严格的对于我们工作之自我批评是缺乏的，似乎除了军事工作太差，军事领导者应负责外，其余一切都差不多没有什么问题。同志们！这是有害的，自我批评之需要正像空气一样，我们要尽量的发展自我批评，这是克服我们工作中弱点与错误的唯一的方法。

思想斗争的开展是不够的。我们已经说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闽浙赣党内是若无其事的过去了，保守主义的倾向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说明我们虽然喊着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而怎样具体揭发在我们队伍中的不良倾向，还没有真实的注意。要使我们的工作能有全部的迅速的转变，重复说：开展反保守主义的斗争是其先决条件。

这就是我们觉得必须指出的几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你们能够在中央各种文件上得到一般的指示，这里不再重复。

中央向着艰苦斗争的闽浙赣的共产党员及千百万的劳苦群众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

鄂豫皖省委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有如下之指示：

自前年四方面红军西去后，省委再组织我们武装力量，创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并领导着这些军队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为保卫鄂豫皖苏区与敌人作了最艰苦的斗争。正由于这种坚持不屈的英勇奋斗，才使国民党军阀对鄂豫皖苏区凶恶残酷的进攻和摧残，遭受了极大的阻碍和困难，苏区得以支持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并没有像阶级敌人所预料那样容易和顺利来荡平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来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但我们若冷静的来估计斗争的形势，则我们不能不说经了去年一年的困苦奋斗，最后鄂豫皖苏区是受到了暂时的失败。

在四次"围剿"前一时期，鄂豫皖苏区和四方面军领导上的错误，中央在去年三月十五日的指示信上已详细指出。四方面军西去后，省委在困难的环境中坚定不动摇的领导是完全必要而值得赞扬的；但指出这一点，并不能丝毫减轻我们对于省委领导上的错误批评。四方面军西去时，当时敌人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虽然部分的达到了它的目的，但基本苏区大部分仍保存着，正如中央指示信（去年三月十五日的）上所指示，省委当时的基本战斗任务在集中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然而省委并没有了解和执行这一任务。省委由于反对四方面军的西逃，而走到了另一极端"死守""与土地共存亡"的倾向，这样自然不能恢复与巩固苏区。而且是在这倾向底下轻视敌人的进攻，在刘镇华进行五次"围剿"的积极进攻面前，还空谈些"一般的客观顺利条件"来代替实际的战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没有去积极领导群众的斗争，没有坚决执行一切为着战争、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列宁的路线，没有以最大力量以一切可能去强固红军，红军中政治工作薄弱万分，尤其是不能活泼的运用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集中主力去击破敌人的弱点，而仍然袭用"兜圈子"的战略，分散红军的力量，认为反对"退却逃跑"便应死守不动，一些正确的关于红军转移地点的意见，都被指为"退却逃跑"而反对，结果是陷红军于敌人重围中，困守硬碰，苏区既困守不住，红军亦渐削弱。

跟着这种错误，党内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极端的缺乏；即在省委方面，虽然常常在某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同志没有能坚决站在党的路线上开展布尔塞维克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党内和平的空气弥漫着。地方党部的组织极不健全，支部生活的呆板没有生趣更是难于容忍。新的活泼的具体领导完全缺乏，官僚主义的现象严重的存在着。这一切都使党的生活和工作，陷于不经常的状态。特别是由于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自己力量，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走到了肃反中心论的错误，甚至以肃反代替了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在党内

及群众中，部分的造成了恐慌现象，大大妨碍了革命战争和一切工作顺利进行，而同时，反革命却正利用着我们这种错误，施行种种的阴谋和破坏，这一错误给我们的损害和恶果明显的摆在面前。

由于上述的错误，使得鄂豫皖苏区受到了暂时的失败。认为暂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群众不好，或是由于敌人力量过分强大，或是由于鄂豫皖苏区的地位逼近京汉路与武汉，必然引起敌人以最大的力量来进攻，终是难以巩固等等，一切这些观点都与党的路线是不相同的，都是庸俗的机会主义观点，不肃清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是无法来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历史上这一痛苦的血的教训的。

清醒的估计了目前的形势与过去这一时期的教训，可以明白的看到，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为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革命事业。没有问题的，这不是革命对于我们的要求，而这恰恰是敌人的希望。在新的形势面前要有新的改变。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重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大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乎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存在的力量完全掩没于敌人血手之下。

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的条件：(一)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三)地势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央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

在执行创造新的根据地这一任务上，应在迅速彻底解决新区土地问题，深入阶级斗争，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提高和组织群众积极性与觉悟程度，动员他们最积极的参加革命战争，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在战争胜利中去深入赤化工作，巩固苏维埃政权，造成可靠的根据地。根据地里面必须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坚决与一切非阶级的路线与脱离群众的现象斗争。特别在肃反斗争上，须彻底纠正你们过去的错误。对于工人经济斗争、保护工人利益与工会工作之忽视消极，不能容许一分钟的继续，必须把这一工作列在党的议事日程的前面，从激进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上，去动员工人最积极性的参加革命战争及红军和苏维埃的建设，强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党须加强对青年团及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使这些组织成为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桥梁，经过他们把党的每一个口号在群众中实现。借口战争紧张而把一切组织取消，成立独一的领导机关（战时工作委员会），这是立三路线的复活，这是荒谬绝伦的错误，须坚决反对。

为着创造新的根据地，省委首先应集中一切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八军一年来的斗争，的确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但他们还没有成为有坚强战斗力的正规的红军。第一等任务在于加强红军中党与工人的骨干，确立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其中政治工作，纠正"民主化"的现象，提高军事技术，充分的补充和扩大，从这些具体的工作上将现有的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组织和锻炼成为坚强的无敌的红军。在领导战争上，须清楚的估计到中国国内战争的特点和几年来的血战的经验，活泼的运用新的战略和战术，彻底肃清过去"兜圈子"的战略和一切坏的遗留。为着集中和统一指挥，应在省委领导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同时在原有的苏区应划分几个作战分区，指挥地方武装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各分区受军事委员会指

挥，但在隔绝难于联络的情况下，各分区应能独立作战。

为着执行这些首要的紧迫的任务，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之广大的解释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目前正是鄂豫皖苏区受了暂时的失败，正是巨大转变的关头。新的任务和新的困难同时摆在面前，党内不坚定的一些分子，必然要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失败面前，垂头丧气，对困难投降屈服，而走到悲观失望，消极退却。必须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时，那些"死守"拼命的情绪，已经给了我们的事业以极大危害，亦须同样的坚决反对。开展这一斗争，深入下层，深入支部，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这些机会主义的观点的实质，指出党的路线之唯一正确性，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胜利信心，为着党的路线坚决斗争，并在这一基础上，广大开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与肃清过去的错误。任何"党内和平"与压制自我批评的观点，是极端有害于党的，而一切不负责任的"自杀批评"以及嘲怨的现象，与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党和革命的危害，都须坚决的防止和肃清。只有在真正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条件下，党才能坚固的团结一致，为着当前的光荣事业和任务而斗争。

中央认为：为了保证领导的彻底转变，必须改造省委的组织。中央决定新省委由□□□、□□□、□□□等同志组织之。中央责成新省委立即根据各地的具体的情况，改变各地党的领导组织和成份，保证各地工作的必要的转变。

目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正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之下，红军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英勇战争已经获得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现在正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残酷决战，更伟大更光荣的胜利，就在前面。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央完全相信在新省委领导之下，鄂豫皖的党必须能给我们的要求和指示以布尔塞维克回答，我们等候着这种光辉的回答。最后，并向我们艰苦斗争着的同志们致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审查了你们送来的各种文件，并听了□□同志的报告，写给你们这个指示信。此外还写给你们关于职工运动和关于反日游击战争的两个专门的指示。

一

一年来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斗争的发展，显示出下面的特点：（一）“华北停战协定”签字后，日本强盗更集中力量向满洲反日民众与游击队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屠杀，同时疯狂般的进行着进攻苏联的挑衅与军事准备，现在满洲已处在进攻苏联战争的前夜的形势。国民党南京政府是日本强盗这种行动的最忠实的拥护者。（二）在大部分义勇军中，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将军们相继叛变，国民党的影响大大的缩小，而共产党的影响则日益扩大，它们更多的吸收了劳苦民众到自己队伍中来，与居民的关系比以前更改善了，新的游击队正在继续生长。就因为这些原故，它们能够继续的与日本强盗进行残酷的战争。特别是共产党直接组织和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多次的打败了日本强盗的“围剿”，它的胜利告诉了全满洲的民众，只有共产党是唯一彻底反日反帝的政党。这些新的有利的因素，使满洲反日游击队成为一种不可消灭的力量。一切认为国民党将军们的相继叛变之后，满洲反日游击战争已经开始下降和失败，都是违背事实的反革命派武断宣传的应声虫。（三）在估计到这些新的有利的因素的时候，必须着重的指出满洲反日游击队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部分的队伍还在国民党反革命派领导或影响之下，大部分几万人几千人的队伍，自从它们的首领叛变投降后，分散成为无数数量比较小的队伍，虽然共产党在它们之间有了日益扩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但它们还是散漫的，不统一的，没有联络的，各自为战的。总之，它们带着浓厚的自发性。工人和农民的群众继续投到队伍中去，也多是自发的。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组织上去巩固自己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如果这种散漫的自发的形势继续下去，国民党等的反革命派别的影响以及它们的部分的领导作用不能消灭，反日游击战争在日本强盗积极的各个击破的政策之前，有遭受暂时失败的危险。

为着胜利的开展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为着实际的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满洲党必须积极的参加一切群众的反日运动，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实际运动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提出我们的主张与纲领，并实际的揭露与孤立国民党和一切其他反革命派别，把散漫的自发的游击队在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之上组织起来，成为尽可能统一的真正反日的武装，扩大人民革命军，建立临时的人民革命政权，组织工人农民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团结他们参加反日战争，争取满洲反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也就是真正实现在游击运动及各种革命群众运动中共产党的独立的领导，能够使

满洲反日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彻底的胜利。

二

检查一年来满洲省委，在执行中央去年一月的指示方面，进行了许多工作。然而实行统一战线策略时，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存在着。这里主要的便是浓厚的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们的活动限制在极狭小的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之中。这种倾向的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我们的反日纲领上，常常写上“拥护苏维埃红军与联合苏联”一条，磐石人民革命军纲领上，还加上一条“拥护人民革命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有些工人斗争的纲领中，机械的摆上许多政治口号。除此我们同志还时常把反日会等群众组织变成第二党的模型，个别的反日会曾经因此解体。至今反日会的组织不过□千会员，哈尔滨□□□个反日会的单位，总计会员不过□百人。满洲的同志必须了解，在满洲反日运动中卷入极广大的群众，他们的确是诚心要反日并且实际的参加了反日战线，但他们之间有部分的甚至大部分的群众，对于反革命派的武断宣传还没有完全识破，对于我们还不能完全相信。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采取上述这些关门主义的办法，无疑的只有“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须的统一战线，并且在客观上实际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应当站在群众外面空喊，我们首先重要的是参加一切群众的反日运动，争取与群众打在一起。只有我们能够接近群众与群众打在一起，群众相信我们是和他们一起去反对日本强盗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更广大的发动群众运动，在运动中有一切机会使群众认识反革命的欺骗而接受我们的主张。

我们党在坚决的打进了自己队伍里面的关门主义倾向，走进反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一刻不许忘记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当这一部分人还用武装的方法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不仅是表明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特别是表明为着夺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而用特殊的方式与这资产阶级斗争”。所以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必须坚决的领导工人的阶级斗争，在反帝及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组织和武装工人，以保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骨干；在任何时候，必须坚决的拥护农民的要求，灵活的和及时的援助和组织加入反帝统一战线及正在斗争着的农民；在任何时候，必须坚持和保持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伴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投降的企图和事实。所以“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上层统一战线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反对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

这一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没有被满洲同志正确的了解，而发生机会主义的曲解，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例如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传上，有的同志认为主要的要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之上，而把“拥护被压迫民族的朋友——苏联”与“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如在工人群众中空喊反日，而对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表示消极（甚至在电业罢工中，我们同志拒绝工人提出经济要求），在农村中没有积极组织“二八分粮”和拒抗捐税的斗争，对于广大的失业工人和数百万流离失所的

灾民，没有工作，在义勇军中时常拿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的统一战线等等。这种尾巴主义的倾向，在满洲党内所以没有能够克服，基本的还由于省委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有了曲解，这表现在省委去年六月"论全民族反日反帝的统一战线"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指示信的上面。那封信分析在满洲应当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统一战线时，认为是由于"群众政治经验幼稚，未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洗礼，未有直接苏维埃革命的经验，他们刚从政治上觉醒过来"，由于"全体民众是反日的"，由于"满洲党政治上和组织上还非常薄弱"。这种分析，很明显的是有它的缺点和错误：第一，这里说"全民众是反日的"，显然忘记了中央指示信所分析的满洲有产阶级对侵略者采取敌视的态度，只是他们之间的一部分，而且是为着它们自己的目的，它们时刻准备着投降叛变，并且拿着改良欺骗的空谈来掩盖自己投降叛变的企图和事实。第二，分析中只看到主观的弱点，对于群众的政治觉悟估计过低，特别是完全忽视了满洲无产阶级在反日运动中伟大的政治力量和作用。"满洲的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伟大的政治力量，虽然它有一定的弱点（没有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及苏维埃阶段上的直接经验，在政治上阶级觉悟和组织性较小等），然而无条件的它是革命和民族革命战线最基本的动力，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不断的罢工浪潮，以及工人的积极参加游击战争，完完全全证明无产阶级伟大的政治力量"。中央在这方面的着重的指示，完全被满洲省委忘记了。总结起来说，省委指示信表现着过分的估计了有产阶级"敌视"日本强盗的作用，过低的估计了反日群众的阶级觉悟，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因为这种基本分析上的模糊和错误，所以省委指示信上没有能够清楚的提出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的问题（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反对领袖动摇等），而只简单的空洞的说"工厂作坊是我们基本阵地"，"在农村里发动农民斗争特别是秋收斗争"等。

与这个问题密切联系着的便是孤立反革命派别的问题。"国民党张学良在满洲游击运动中的影响和局部的领导是阻碍着反日运动及一般革命群众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的基本事实。就是国民党这个影响和局部的领导在满洲目前反日游击运动中政治方面很不成熟及满洲我们党较弱条件下是主要的危险"（中央去年一月指示信）。因此满洲党必须经过统一战线的策略去争取和巩固反日群众斗争的领导到自己的手里来。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本意义，就是为着团结一切愿意反日民众（不分党派的）去共同的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在斗争过程中反对反革命派一直到孤立它们，而完全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但是满洲的同志对反革命派别的作用的估计是不足的。许多文件上虽然写上许多"反对改良欺骗等词句"，但实际的行动是极缺乏的。甚至有些同志根本否认反革命派别的欺骗作用。例如说"国民党在群众中没有什么影响了，其他反革命派没有什么活动"，"黄色工会被解散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满洲国都没有什么欺骗"等等。这种说话，实际是减轻了以至否认了统一战线，特别是下层统一战线的必要。因为如果在反日群众运动中没有反革命派的改良欺骗的影响，统一战线便失去了意义。然而事实是与这种估计相反的，国民党在满洲民众和义勇军中的影响虽然比以前缩小了，但并没有消灭，而且没有我们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也不会完全消灭。在某些部队中（如陈东山等所领导的），国民党还占着领导地位。另外有许多队伍中，有我们的影响，同时也还存在着国民党的影响，特别是上层分子的中间。在工人之中，虽然有许多黄色工会被日本强盗解散了，黄色工会的影响以及部分的黄色领袖还留在工人当中，黄色工会形式上的解散，有时反增加了黄色领袖欺骗群众的可能。中东路还有华工事务所，海员中也有黄色工会的组织，中国资本家还会利用民族武断宣传来缓和阶级斗争（例如电业罢工中），日本强盗和其走狗也曾

利用欺骗的手段来挑拨中韩民族间的恶感，在某些区域（例如磐石）之中，他们曾进行过对劳苦民众的欺骗行为（发救济费、药品等）。所以满洲党在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中，必须把反对反革命派的斗争在思想上和实际上都提到重要的地位来。首先在党内克服对反革命派的欺骗估计不足的倾向，在工人农民中，义勇军中，反革命军队的士兵中和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对于任何一个小的欺骗的事实，都要努力去揭破。

在满洲反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不仅要在保持宽广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能够坚持布尔塞维克的政策去孤立资产阶级肃清反革命派别的影响，为着争取反日游击战争以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同样重要的还要为着实际创立民众政权而斗争，就是说在整个运动中党要努力争取适当的条件，如在我们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比较固定的区域等，去建立临时的革命政权。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政权的创立与扩大是团结和组织全满反日游击战争和反日群众运动最有力的杠杆，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实现的最重要的工具。但满洲省委对于经过统一战线去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问题上面的模糊和曲解，同样在缺乏建立革命政权的观念上面表现出来。照□□同志的声明，省委认为现在只是建立群众的反日会与农民委员会并使之成为事实上的政权，经过了这些步骤才能建立政权。这种意见无疑的表现出政权阶段论的倾向。当然我们要建立广大群众的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会议等，使之成为革命政权的基础，但如果认为必须经过这些阶段就错了。此外省委认为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在今天是过早的。当然在满洲现在情形之下，要防止死守根据地不发展，但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反对在可能条件下争取革命政权和根据地的建立。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所坚持的真理，磐石人民革命军与间岛人民革命政府（刚从报纸上看到），不仅在满洲民众中而且在全国都起了极大的影响。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

总结起来，中央指示信到了满洲后，省委曾经反对了过去满洲党内显明的“左”倾的错误，如在今天就要建立满洲苏维埃和红军，拒绝与反日义勇军联合，甚至围缴反日胡匪的枪械等。但省委没有能够正确的了解中央的指示信，对于统一战线基本问题上，省委自己作了右倾曲解的错误，所以不能正确的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放松了反对右倾尾巴主义的主要危险。因此，不能够粉碎右倾，也不能肃清“左”倾。“左”右机会主义倾向同时并存的最好的标志，莫如反日游击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或则没有统一战线，或则只是上层联合，放弃艰苦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群众工作。满洲党必须真正正确的开展反对主要危险的尾巴主义，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最重要的要在实际问题上，具体的指导和开展这个斗争，这样来保障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

三

根据上面关于实行统一战线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批评和分析，对于现在散漫自发而缺乏中心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满洲党必须坚持下层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到他们中间，首先是主要的和我们影响较大的部队中间去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详细解释中央最近所提出来的对日作战纲领，说明统一作战的必要等等，随时揭破一切任何反革命派的欺骗和武断宣传，就是很小的机会都要利用着来作反对反革命派的武器。对于首领的任何动摇，都要无情的批评。必须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和士兵代表会议的组织，建立坚强的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团结投到义勇军

中的城市工人的分子到反日组织和我们党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在下层士兵群众中建立了巩固的政治的和组织的基础，才能够实现我们党在游击战争中的独立的领导，为着共同的反对日本强盗及其走狗各个击破的政策，我们不仅不应该拒绝某些反日队伍联合作战的要求，而且应该尽力号召一切反日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去反对共同的仇敌。应该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现象，分别的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如中央去年一月给省委指示信所指出的。但实行上层的联合，建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就只有那种愿意接受我们反日作战纲领的部队，而我们在这部队中有了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能和有效。并且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也要尽可能的经过士兵代表会议来选举指挥机关，尽一切力量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和巩固政治的组织的工作，以便当首领企图叛变时，有力量去打倒他。

为着实现这种任务，必须首先纠正党内在这方面所作的许多错误。这首先要反对那种学究式的背诵“四种游击队”的公式，这不是说关于四种游击队的指示是不正确，而是反对你们不去具体的分析每个队伍的实际情形，定出每个部队中的具体的策略，而死板的在四种游击队的模型中兜圈子。这种学院的方式，需要立即唾弃！其次你们分析某个部队属于某一种，或某种与某种的过渡中间的时候，多半只看部队首领的面貌，不去分析部队的下层状况，士兵的成份，政治觉悟及我们的影响与力量等，而拿首领的态度作测验整个部队的标准，这种非阶级的分析方法，无形中帮助了某些地方党部把联合战线当作上层周旋去运用的错误。他们为着怕得罪上层领袖，不敢进行公开批评，甚至连反日会都秘密起来。最后，省委估计磐石“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正确的组织，这个司令部的破产，只是由于磐石党没有注意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见省委给磐石县委信），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因为“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是上层统一作战的机关，它只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当时参加这个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宋司令与毛团只能算第一种游击队，对于他们应该如中央去年指示信所指示的方式:“主要是从下面和兵士组织统一战线，并且在有共同作反日斗争必要时，订立具体的作战的行动的协约”。磐石人民革命军与宋司令毛团组织的联合军总司令部，其结果是上层勾结代替了下层统一战线，而至于完全破产。这些错误都必须迅速的纠正过来。

中央同意你们把□□□□□□□□□区当作我们工作的中心。但是要在这些区域里有效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除开正确的在各个部队中进行政治和组织的工作外，必须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第一，要坚决的创造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而在政治上同样在军事上能够领导和影响一切反日游击队伍的中心力量——人民革命军。在□□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已经存在着的人民革命军，在□□□□□□与□□进行创造人民革命军。当人民革命军还是数量不大的游击队的形式的时候，必须利用一切旧式武器作辅助的武装，必须在自己的周围尽量武装工人农民，组织工人义勇军农民义勇军等，并号召他们加入人民革命军。在人民革命军中要最高限度的进行政治工作，建立有健全生活的党的组织，必须微调最好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去担负领导工作。磐石人民革命军在这些工作上都表现很大的弱点，必须迅速的克服过来。第二，在暴动胜利的区域或我们领导下的游击战争胜利的区域，都有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机关（临时的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可能，党应争取这种可能，首先在□□应尽可能的建立起来，对□□的革命政权，应迅速给以指示和帮助。临时革命政权在建立的第一天，就必须宣布革命的政纲和法令，实行武装工农群众，镇压反革命，保护工人农民的斗争和一切反日的行动和组织，动员群众参加反日战争，以真正实施民族革命战争和

暴动的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第三，在游击区域里面，必须坚决的实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连土地在内），没收来的东西，主要充作反日战费之用，但同时要尽可能的拿一部分给群众，使人民革命军和游击战争得到更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必须十分清楚的认识作反日斗争一天天发动起更多的广大劳动农民群众，因之而一天天与反对中国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农民土地运动配合起来"。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对满洲土地问题估计不足的倾向，在一切游击区域和我们有工作的农村，必须根据中央去年指示信所指示出来的关于领导农民斗争的策略、口号和组织方式等去实行，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的阶段。这就是说：我们要在领导反日斗争中根据群众迫切要求提出没收反革命卖国贼的财产，拒绝满洲国的一切捐税等等口号，以走向土地革命的阶段去。

四

为要建立极广泛的群众的反日统一战线，并保障在这一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骨干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除掉坚决的执行自己在游击战争中和农民中的战斗任务而外，满洲党在基本上必须用极大力量去进行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极大的转变。必须清楚的认识"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

满洲无产阶级虽然在反日运动中表现了伟大的政治力量和作用，但基本的还带着自发的性质。满洲党的任务就在于尽量去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各种各式的斗争，而首先是在他们日常迫切的部分的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基础之上，去组织和开展阶级的和反帝的斗争。尽量把他们组织在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之内，提拔和训练工人先进的分子，作为党、团、工会、民众革命政权的骨干。满洲党对于中央去年一月这个基本的指示，一般的来说，是没有执行的，许多决议和指示文件中，虽然常常写上了组织罢工打入某某等处大企业等，但实际都成了空喊。□□□□和有些重要□□与□□，虽然在那些地方仍然有着下层的组织，但省委与他们没有关系。在我们有工作的地方，赤色工会仍然限在□□人□□□人的极端狭隘的组织之中。农业工人工会的组织，也是只空喊，没有动手作。就在我们有基础的游击区域，也没有建立起工会工作的机关。有些同志和地方党部还把职工运动当作只是为着徵调工人到义勇军中去的目的。特别不能容忍的，是满总的同志对于□□□□□□的指示信采取了极端不尊重的态度。总括起来，满洲省委对于职工运动采取了极端忽视的态度。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你们对于满洲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五中全会严厉的指斥许多地方组织及个别党员的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并且认为忽视和躲避工会工作的人不能算作共产党员"（五中全会决议）。满洲党必要给五中全会这个指示以布尔塞维克的回答，根据着五中全会的指示和中央这次给你们的专门的信，从省委到支部定出具体的工作的计划，把党的工作放到工厂工会罢工的上面，坚持厂内的群众的组织与宣传的工作去建立群众的工会和准备罢工。依照中央另外的专门指示所提议的几个主要的企业，首先集中力量去作。从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和游击队中徵调工人的积极分子派到这些主要的企业中去工作。省委要具体的指示和帮助地方党建立工会工作的领导，在几个游击区域中应当建立满总的代表机关，以准备建立群众的工会。对于失业工人的工作必须立即开始。各级党的组织从省委到支部，对于工作的计划，必须定期检查，绝对纠正过去空喊清谈的现象。必须耐心的培养

工会工作的干部，提拔在群众中有密切联系的积极的工人担任工会工作，对于满总的成份必须重新审查和改造。

在满洲现在的形势之下，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反对资本进攻，"二八分粮"，抵抗捐税，反对高利贷等的斗争，失业工人和灾民的斗争，都不可免的要同时成为反对日本强盗的斗争。我们应该去影响和组织这种斗争。我们必须学会把群众日常部分斗争与反日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党必须随时随地能够揭破一切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如剥削阶级借口反日来缓和阶级斗争，用"共产党破坏反日"来中伤党与群众的关系等等。党必须反对党内对反日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估计不足的关门主义倾向，真正到群众中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这里要采取许多深入群众的宣传和组织的方法：

（一）（略）

（二）"反日会"本来是团结反日人民的最好的方式，但因为我们同志曾经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关门主义的错误，如提出过左的纲领，如把它变成第二党的模型等，以致至今没有能将它变成群众的组织，因此我们去进行团结一切赞同右面纲领的人民的时候，不要机械的提出"反日会"的形式，组织的名称完全可由人民自己选择。

（三）□□□□□，□□□□□□□□□□□，要把重心放在群众中去，基本的要在工厂、作坊、矿山、铁路、学校、兵营、商店、马路等去建立群众的组织。要在各城市农村游击区域去建立地方的委员会。我们要经过下层的工作，选举坚决反日的分子到领导机关之内。但我们不要企图包办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对于个别动摇不可靠的领袖，如果群众还不明了还拥护他的时候，不应机械的拒绝他加入领导机关。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经过这些方式去团结极广大的群众以至在各种反革命派别影响下的群众在反日战线之内，在群众特别是工人中和游击队中建立巩固的党的核心以及党团的组织，注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去孤立反革命的动摇的首领。

（四）要经常运用下层的各种代表会议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反日的工作。代表必须是经过选举出来的，要保持广大的群众性，绝对不许运用指定等方式。特别要注意去发起和领导游击区域里面的游击队士兵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城市的工人代表会议，学生代表会议等。

（五）要在右述纲领之上，尽量武装群众，号召一切反日群众，自动武装起来，利用各种各式的武器武装起来。

五

满洲一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中央去年一月指示信的正确，并且一般的总的方针，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所以中央这次写给你们的信，只根据着一年多斗争的发展中的特点和满洲党在坚苦斗争中所作的许多错误，给以分析和指示。中央完全赞扬满洲党在艰苦的复杂的环境中的奋斗精神和所得的某些成绩（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创造了人民革命军，以及在几个主要游击区域里的工作有了进步等）。但满洲党领导机关中所作的许多重大错误，必须坚决的改正。

关于满洲党的组织上的任务，我们同样坚持去年一月给你们的许多指示。首先重要的是建立起强健的和有独立自动的工作能力的地方党委员会。

最后，中央向着你们及艰苦奋斗的党员，在反日前线上的战士和民众，致极诚恳的热烈的革命的敬礼！

中央致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信

（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日）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党的五中全会总结了四中全会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了党在这个时期里忠实的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的反对了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领导苏维埃运动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在领导白区工农群众革命斗争方面也获取了不少的成绩和进步，并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给了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向全党提出了下面的中心的政治任务：

"尖锐的革命形势的存在，要求党千百万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展他们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出路而斗争，为着苏维埃中国而斗争，这个斗争之胜利紧密的联结于完全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五中全会决议）。

在冲破五次"围剿"以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伟大决战中，河北党是处在一个非常负责的地位，担负着光荣的任务——抓紧日帝国主义侵略华北，资本的进攻和农村的浩劫，来开展群众的反帝运动、罢工斗争、士兵斗争，和抢粮、抗捐、要土地的斗争，并汇合这些革命的支流为反帝的土地革命，以走向创造北方苏维埃。这要求河北党对日益开展着的罢工斗争——特别是开滦罢工，农民灾民的斗争，士兵的不满和哗变及广大群众反帝斗争，建立自己的领导。应该认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塞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五中全会决议）。

在两个政权异常尖锐对立的中国，在这开展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流血的国内战争的时候，党内的不坚定的分子不可避免的要表示出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以右的或"左"的倾向来阻挠党把革命引上胜利的大道。李铁夫同志在"挽救党的危机"的旗帜之下所提出来的政纲便是在目前革命斗争阶段上右倾取消主义的标本，他根本否认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巧妙的抹杀已成为中国革命之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的苏维埃运动，他看不见群众的革命化及其英勇的斗争，否认中国革命形势之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便是过分估计反动统治的力量而对革命之胜利的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他否认党对中国革命之领导的作用，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的领袖，认为"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不健全"，否认党在群众中威信的提高，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而认为党脱离了自己的阶级基础，渐为群众所唾弃；他认为党自四中全会后只在"决议上"有了转变，否认四中全会在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中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一口咬定中国党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党，因此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是企图证明四中全会遵照国际的指示在两条战线上粉碎李立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和右派及采取调和态度的两面派

是不应该的、没有必要的、没有效果的，这样来拥护立三路线的死尸和已跳到反革命国民党营垒中的罗章龙派，这样来与国际和党对抗；另一方面他说“党现在仍是继续着立三时代的现象变相的行动委员会”，又企图在反立三主义招牌之下来进行反党的阴谋；他认为“党的领导机关是被官僚主义、异己分子和未来的叛徒所把持”，这是企图煽动党的群众来反对忠实执行国际指示和四中全会的路线的党的领导，因为这一个领导与一切机会主义及其代表不能相容，一点也不肯放松布尔塞维克的火力向这些革命和党的败类描[瞄]准；最后铁夫同志便断定“中国党已为恶倾向从各方面所包围”，“埋伏着极大的危机”，因此他认为今天有无客观革命形势是无关重要的，而是要整顿主观的力量，“把党从危机中救拔出来”；因此今天不能“空谈”冲破五次“围剿”，开展反帝斗争，而是先要肃清党的恶倾向，因此提议放下革命战争和工作“先来争取真正布尔塞维克化”，而且这一任务之完成不能依靠现在党的领导，只有立即“召集七次党大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担当起改造党的任务；不然象现在这样的党，照他的意见，只能领导日常斗争，也只有领导日常斗争才认为是“现在党的工作任务，反帝拥苏等口号都是空谈”，或者都必然成为空谈；那末河北的党，也就不能过于奢望，因此他认为“北方会议决议还不是北方党今天的战斗任务”，这里他把党的日常群众工作与日常斗争与党的政治任务分裂和对立起来，而走到取消总的政治任务，在组织上他在“确立党的限制性和阶级基础”的旗帜之下主张党不能容纳反帝反封建的分子，而分截为所谓“阶级立场和一般的反帝立场”，这样来关起大门并写着“反帝者不许入党”，他并曲解和捏造列宁的意见说：“一个可靠的得力的干部胜于一万群众”，这样来将先锋队与阶级对立，将领袖与群众对立，站在绅士的立场来看待革命的群众，因此主张不要建立群众的党，主张只要一个少数的老练的英雄集团；他并且进一步的把我们党分成两半：“指导者和被指导者，有能力并有进步前途的高级分子和无能并无进步可能的低级分子”，“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并提议专门组织一种“动摇分子支部，”这简直是孙中山的“先知先觉”的“理论”的俘虏，只有社会民主党才把自己的党员分为活动分子和只缴党费受人指挥的被动分子，我们的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是活动分子，领导群众的斗争，但是铁夫同志既认为目前党的领导者都是未来的叛徒和异己分子，不是他理想中的“高级分子”或“老练的布尔塞维克”，因此便提议组织监察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便是监督他们的领导与工作。这一切“理论”与“建议”，都发源于在基本上不信任党仇视党的领导的反革命的立场。这样不是壮大党，而是取消党，这样不是强固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是从削弱以走到完全瓦解主观力量。同时铁夫同志坚决反对“把党自己本身的组织问题——转变基础的任务（转变到无产阶级的基础来巩固的意思）直接运用到非阶级的组织——群众团体”。这里他认为党自六次大会以来在“转变阶级基础”方面没有任何成绩，党内工人的成份没有丝毫的增加，另方面把群众团体变成“非阶级的组织”，在那里可以容纳异己分子，把赤色工会和反帝组织等都变成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包括各个阶级的团体，这样来取消我们的阶级路线——在一切群众团体中建立无产阶级骨干和领导的任务，这样才不是关门主义，这样才不是党的包办，把党在群众团体中建立自己领导和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分开、对立，而终于走到取消党的领导，这种右倾取消主义与“左”倾命令主义必遭到同样的结果。

铁夫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和党的各个基本问题上已形成了一贯的右倾取消主义的系统，反国际和反党的路线。在其机会主义动摇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走到对于党中央的诬蔑与仇视，走到公开取消党取消革命的群众团体，取消党的中心政治任务的取消主义的道路，偷运托陈派和罗章龙派等反党与反革命的思想和武器到党内来，企图进行反党的号召”。中央以十二万

分的坚决态度同意中央北方代表□□同志这一正确的估计，并认为铁夫同志右倾取消主义如果胜利，那就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胜利，反革命的胜利。

铁夫同志在右倾取消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左倾主义的反动性”，企图在这一块招牌之下把全党正以一切力量来号召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展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和农民要土地的斗争，都当做是“空贼”，企图把全党在布尔塞维克的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工农红军和全国劳苦群众来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都当做是“盲动”，以为这一切都是在“冒着共产党的假面目来玩弄革命，危害党的威信”。这正是右倾取消主义者来瓦解党的武装以帮助蒋介石国民党来镇压中国大革命的最大阴谋。中央认为完成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中心任务——冲破五次“围剿”，建立苏维埃中国是与粉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不可分离的。

中央完全同意中央驻北方代表致河北临时省委的信，并责成□□同志及河北省委在河北全党内开展极残酷的斗争。

中央坚决指斥河北省委个别同志在这一斗争中所采取的不可容忍的调和派、两面派的态度。实际上这也就是右倾取消主义的同党。“右倾机会主义不常提出公开的政纲反对党的路线，更多的将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五中全会决议)。□□同志认右倾取消主义者的铁夫同志为“老练的布尔塞维克”，同情他，帮助他，这无异以出卖党和革命的利益来与党的敌人为友。中央认为必须给铁夫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领导工作，□□同志必须给以严重警告，并撤消他在省委中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要他们立刻解除一切反动的宣传与活动的武装。中央责成北方代表□□同志及河北省委必须把这一斗争在党、团、工会……开展起来，“只有坚决的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中全会决议)。

中央号召河北党省委及全体党员在开展残酷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成绩，特别是用最大的力量克服河北党的许多严重现象——中心城市工作的薄弱，革命职工运动没有得到坚决的转变，农村里党组织的散漫和领导农民灾民斗争之极端薄弱，士兵中工作没有得到最大的改善和应有的加强，没能运用最广泛的下层统一战线开展反帝运动，及党组织本身之不严密和工农干部的缺乏。河北党应该向这些严重现象宣战。“必须广泛开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真实的实现新的活动的领导方式，坚持不屈的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我们能够在伟大的事变前面，担负起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光荣任务”(五中全会决议)。

此致

布礼！

陕甘边区特委关于
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七月）

英勇的工农红军与澎湃着的群众斗争，已经粉碎了大部分的国民党的绝望的五次“围剿”，苏维埃政权有空前的扩大与巩固，全国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与游击运动普遍的扩大，军阀矛盾的急剧的深刻化，形成国民党统治的根本动摇。

在这一形势之下，无耻的国民党已深深的了解自己本身的力量是绝对不会维系垂危的统治，遂极端的出卖中国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好叫帮忙自己作最后的统治。因此，向帝国主义者公开与秘密的借来大批的借款与大批飞机、大炮、军事干部等等，在同一的利害关系上，协同帝国主义作五次“围剿”红军与苏区，以镇压中国革命运动。

但在这五次“围剿”的当中，除中央红军的英勇的胜利外，鄂豫皖红军解决东北军六七团人，川陕苏区和贵州苏区的扩大，国民党军阀一定要更进一步的加重城市工人与农村劳苦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一定要更进一步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这样一来，会促成工农兵为苏维埃彻底胜利与反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而作坚决的斗争，整个掀动了中国革命浪潮猛烈的向前推动，象当前唐山、上海等地的工人的大罢工，各地农民的暴动，就是铁的事实。

尤其是在占据西北的杨虎城及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残酷的压迫剥削之下，一般劳苦群众不断的发动一切斗争，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开始便是武装冲突，如同陇东群众自动的杀死催款委员，陕北成千成万有组织的农民，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要粮要款，一直到开展游击战争与分土地，更进到新红军与新苏区的创造的阶段中。同时，一般白军兵士也是同样的受不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欺骗，一批一批的哗变出来，到红军中为自己找出路。

在这样形势之下，更加强了我们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因为党的领导太薄弱，一切的工作远远的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党的组织除了各部队所有的支部外，在地方党，仅仅只有华池苏区内三个不健全的支部，三淳耀的党，自赵金苏区失败后，边特委倒台，直到现在还是塌台的现象，甚至边特委还是在最近才恢复的。同时，部队中的党，在这个期间的领导，仍然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的不深入，没有把许多消极怠工、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从党的正确路线上肃清出去，党简直做群众的尾巴和空架子，不起核心作用。对游击队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路线（如合水游击队），而不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只是招兵买马式的组织游击队。由这些错误，形成了西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特委根据目前革命的客观形势与主观的领导力量，对边区党的任务，有以下的决议同布置：

（一）党的工作：

1．加强华池苏区的领导，在最短期间，必须把现有的三个支部充实起来，并成立一个区委，以巩固苏区内的各种群众组织，形成苏区的核心。

2．恢复保安党的组织，尽可能的找过去同志的关系，并以脚柞川、五堡川、百宝川为中心，建立农民支部。

3．在平子原、四村原、三家原，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雇农、贫农分子大批入党，成立三个支部。

4．三水找□□□等同志的关系，详加考察，如无问题时，再恢复一个支部。

5．耀县的特支和淳县瓦解了的支部，应该领导，各成立一个正式的支部。

6．加强渭北游击队的领导，以恢复渭北的党。应当以新武两区及二台为中心区域，找旧日同志并新介绍，暂时成立一个支部。

7．由□□□负责建立三路的区委，并提拔得力同志担任区委书记，三原、耀县、三水、正宁、淳化的支部都归该区委领导。

8．四十二师及各路游击队的党，应该纠正过去的错误，彻底转变部队的领导，使党真正的成为群众的核心。

9．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必须发展一倍党员。

10．每个区委和各队委，在加强领导的过程中，必须选择一个中心支部。

11．特委成立一个训练班，提拔最有认识的农民同志以及各连队派两个最好的同志受训练。各部队也尽可能的成立短期训练班，以培养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深刻指示领导方法，以锻炼干部。

12．党的工作的进行，应该立即转变领导的方式，主要的是一切领导机关须深入下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党的关系，严密党的组织，并用启发式与革命竞赛的方式去领导。

13．特委责成全党同志以最大的努力发展团同志，在建立团支部的过程中，成立团工作委员会。

（二）政权问题：

1．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立即成立革委党团，以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整顿各部门的工作。各委员会应该马上颁布一切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对于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雇工队、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也须颁布条例与简章。扩大政治保卫队，最近必须发展成为五个保卫分队，担任警戒苏区，并宣布戒严令。在这样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即以此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开展。

2．恢复赵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我们建议四十二师要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赵金苏区，特委责成第路三游击队于十月革命节恢复革命委员会；同时，建议四十二师要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更要四十二师、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与赵金苏区打通（即是由三原的武字区起一直到绥远的边境止），彻底解除国民党、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与肃清一切的反革命分子。许多苏区打成一片，并且四十二师与各路游击队经常要互相呼应，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三）为扩大与巩固部队而斗争：

特委为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保障无产阶级的政权，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

成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同时要扩大四十二师为一军人的号召。要扩大部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四)普遍的开展游击运动：

要扩大与巩固苏区，只有在普遍的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提出最彻底的办法，在目前，各路游击队要完成红军团的任务之下，各支队务要产生第二个游击队，产生的办法是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一切斗争，以开展游击战争。特委最近要用各种方法把洛宜游击队和鄜州游击队组织起来，并且坚决的反对过去招兵买马的组织游击队，而各游击队必须根据特委制定的游击队行动纲领去行动。

(五)深入土地革命：

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围去开展，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如五堡川、百宝川、平子原等处。

(六)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在发动群众日常的抗粮、抗租、抗债、抗捐、抗款、分粮，杀豪绅地主、催款委员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到反帝斗争。全党的同志们要抓紧目前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新形势，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又积极的进攻察哈尔，鼓动内蒙组织自治政府，更进的(而)和国民党订定秘约，共同开发西北；英帝国主义驱使藏兵进攻西康，鼓励新疆南部独立，和日本取同一步调，所以促成英日同盟；英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深入内地，给国民党帮助大批军火和军事干部，最近又有抵押正太路的借款等等。国民党镇压群众的反帝运动，极端的投降帝国主义，更在开发西北的欺骗口号之下，做帝国主义从西北上进攻苏联的清道夫。同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屠杀劳苦群众，抓住这些事实在广大劳苦群众面前作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以引起群众的反对与仇恨。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冲突，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号召之下，决定派一得力同志去领导延川的义勇军。

(七)群众工作：

我们过去一贯的错误是政治工作的不深入，在我们目前的任务之下，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了，各部队转变的关键也在这里。

1． 工人工作：许多同志认为西北产业落后，没有工人，因此把这一工作也就忽视了。今后对边区的手工业者要特别注意，如修械所的工人和乡间的木匠、铁匠等，组织工会，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并且要把他们训练成党的干部。

2． 农民工作：

甲、组织群众：要在深刻的宣传鼓动的过程中组织农民联合会，并且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要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以及儿童团，要了解儿童是将来革命战线上的主要分子，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一工作；同时要组织妇女联合会，边区的妇女还没有拥护红军的认识，现在要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对妇女群众作深刻的宣传鼓动，以组织拥护红军的

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

乙、武装群众：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许多地方都是形式上的，不起作用。必须动员群众自动的打梭标、大刀、买土枪，或集股买快枪，并且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

丙、领导群众的斗争：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日常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各地都有它的特殊情形，如五堡川、洛河川的群众，要求分土地和牛羊，合水、正宁的群众，最需要的是抗捐、抗粮、抗款、杀豪绅。在发动斗争以后，必须组织斗争委员会和党团，以及斗争指挥部，这样才能避免紊乱与坏的影响。

3．士兵工作：在中国不断的军阀混战与长期的“围剿”红军的过程中，一般士兵生活的恶化同动摇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因此，陕甘各地兵变的事实到处都是，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领导过。特委为了瓦解国民党的武装力量，粉碎五次“围剿”，要各级党委抽调一部分同志打入周围的白军民团中去，组织革命兵变。

(八)肃清欺骗群众与出卖群众斗争的右派：

自去年察省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张慕陶、王霖等叛徒勾结革命战线新旧的逃跑分子，组织反革命右派。他们的政治路线主要是“联日反蒋”，利用小军阀反对法西斯蒂，加紧军阀矛盾，造成军阀混战，冲破国民党“围剿”苏区。他们在党内的阴谋是混入党内，争取下层工作领导，说中央及省委以上的领导机关，纯粹的官僚化。他们在党内的伎俩是抓住缺点，从侧面攻击，夸大官僚主义的领导，挑拨离间等。硬说苏区和红军不是中央领导的成绩，企图号召一切叛徒和他们所抓紧的下层同志，开七次代表大会，改组中央及省委以上的领导机关。在这反革命右派积极的活动之下，要全党的同志们艰苦的在广大群众面前，拿出我们党正确的路线，来揭破反革命右派的无耻欺骗。他们是军阀混战的罪魁，是屠杀劳苦群众的刽子手，黄色政客集团，他们不主张革命兵变，和领导群众斗争，而是欺骗群众，出卖群众斗争，充当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走狗。不但要在口头上揭破反革命右派的阴谋，必须把反右派的宣言大量的印刷，派人散发到国民党的中心城市，并且严防右派混入党内捣乱。

(九)为了要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深入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要各同志集中火力向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悲观失望的动摇分子以及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作残酷无情的斗争，使党的路线正确的执行，顺利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这个决议就是陕甘边区党最近的路线，特委希望全党的同志必须深入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的去执行，并把执行的程度告知特委。

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中央：

七月二十一日，中央交通到达贵州沿河苏区，我们才接到了中央的指示信和一切重要文件。八月一日与四日两次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完全接受，并在中央指示的基础之上，规定了我们工作的具体任务（见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附件一）。本来我们想而且应该将从湘鄂西失败到今天三年来的经过，详细报告中央，但是现在还未来得及做这一工作。所以这次报告比较着重在一九三三年到现在状况的叙述和目前的工作方针，这个报告分成下列各段：（一）湘鄂边（时期）；（二）二、三、四次肃反（报告）；（三）游击〔经过〕（湘鄂川边时期）；（四）黔东苏区（的创立与）现状；（五）红三军现状（红军中略情与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问题）；（六）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七）其他。

一　湘鄂边时期

从我们到湘鄂边起（一九三三年一月），我们的企图是恢复和开展湘鄂边苏区，我们到鹤峰、施鹤一带，川军已退走，我们在毛坝休息了一星期，就决定进攻桑植，消灭桑植之敌。当时这一决定，是存心以鹤峰为后方向湘西发展，与中央苏区击破敌人四次“围剿”的任务相配合，同时觉得施鹤的粮食人口都不如湘西，对于湘西的敌情，则觉得朱旅，周团、罗团都容易对付。这一过早进攻桑植的错误，是由于忽视了自己的弱点（从洪湖失败出来，经过一、二次肃反，部队没有整理），和轻视了敌人的力量。到了桑植，桑植是占领了，发动了群众分粮的斗争，建立了县、区、乡的革委，但是被敌人周燮卿打败出来。在作战中七、九两师师长、政委是改派分子，阴谋破坏，特别是段德昌，但是当时我们估计了主要的失败原因，是部队没有整理休息。所以退到走马坪，决定了以鹤峰为中心发展周围的苏区。到鹤峰以后，约近一月，就爆发了三次肃反。三次肃反，主要是从逮捕段德昌开始，同时肃清从荆当远转回五鹤峰之独立师，这个独立师之干部基础，是王炳南独立团的，这个独立团团长王炳南，政委陈业平，均是改派，以前单独在湘鄂边，经过改派几年的活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三），全部干部都差不多加入改派，到这时才开始全部的肃反。在三次肃反以后，当时主要感觉到，下层党部（甚至有战士）加入改派之多，特别是党团员多，与部队恐怖情绪之重，一般战士觉得政治工作干部、党的干部、党员、团员多是改派，对于党的信仰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当时金果坪中央分局会议，一面纠正肃反中“左”倾的错误，另外一方面，感觉必须解散党及团的组织，重新登记（附记二、三）。本来因为一、二次肃反，暴露出改组派把持了党和团的组织，所以在二次肃反以后，就有清党的提议，到了毛坝，就决定红军中举行清党。到了三次肃反以后，感觉到党在没有清党以前，党的活动（反）供了改组派的利用。

当时觉得改造党已经不能依靠旧的干部，因此决定解散，重新登记（见关于肃反和清党决议报告大纲与清洗条例，见附件二、三）。当时七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沈（盛）廉均，九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宋盘铭，这两个都是改派。沈（盛）廉均当时就利用清党来提拔改派分子，来打击真正的党员。宋盘铭则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他把改组派组织又恢复起来。对于宋盘铭、陈培荫的错误，我们曾经严重地指出他们是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帮助了改派反革命，可是没有在群众中公开斗争和撤销他的要职。所以当时改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到了四次肃反，才暴露出来，政治部的政务科长（当时负责肃反工作）也是改派军委之一。在四次肃反中，第一次清党已经流产了，所以当时政治机关也没有了。党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当时就以肃反为中心，清党也迟缓了，直到从黔江退出在西章休息时期，才加紧清党的工作（由中央局委员分头去清），因为肃反路线的错误，没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而解散党及团的组织，没有党的警惕心，及时地撤销动摇分子有嫌疑分子的要职，所以造成在湘鄂边还继续三次四次的肃反，造成了湘鄂边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在洪湖及时取消了段德昌、王炳南的领导，那么三次肃反是可以免掉的；同样如果开展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及时撤换了动摇分子的要职，那么四次肃反的主要人物（宋盘铭、业光吉）就可以早暴露出来了。同时在湘鄂边这一时期，还有别的错误。当时在湘鄂边苏区是发展了，建立了鹤峰、宣恩、恩施、建始大约二十几区包括一百几十乡的苏区，创造了各县游击队七八百人，自卫队能够作战阻止敌人的进攻，土地在苏区已经平均分配。苏维埃运动影响扩大了（才到鹤峰时，群众见了红军就跑），克服了被过去王炳南独立团所破坏了的影响，可是当时苏区的粮食是很困难的，人口也少，参加红军也比较难得动员，所以当时因为粮食的困难，部队分散，部队也不能整理，成天到几十百数里以外去搬给养，这种困难只有苏区更进一步发展，才能解决。如果当时以主力来开展宣恩、来风、龙山一带的苏区，给养与补充问题比较容易了。所以当时在金果坪以后到麻水的这一时期，就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个时候徐源泉来进攻湘鄂边苏区的准备，也一天紧迫一天。可是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只是机械的集中给养，整理部队，但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固守鹤峰一带的苏区，给养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对于当时五次“围剿”之缺乏警觉，与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敌人进攻鹤峰时，我们还没有明了全部的敌情，当时就决定以主力开展新苏区，留七师来巩固后方（夏曦留后方）。敌人动员了十四团以上的兵力来进攻苏区，我们正在四次肃反，又没有给养，在这种条件之下，烧巴岩中央分局才决定了主力退出湘鄂边的策略（见中央分局烧巴岩会决议——附件四）。当时军部带九师及教导团到宣恩、利川、来凤一带游击，吸引了将近千人参加红军，组织了当地的游击队，扩大了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分化了神兵的组织，军部各部处及九师各部处大部分已清党完毕。可是因为当时部队没有集中，军部为找七师回到鹤峰三次，至于没有能够夺取胜利，在敌人主力进攻之下，七师击败了从慈利来的朱团，但七师在力量上自然不能巩固苏区，当时只能傍着苏区游击，牵制敌人，以便军部及九师在上面发动群众。七师对于牵制敌人的任务，开始是达到了，但是军事上以后犯着冒险的错误（游不远而且在西斋攻坚）以及牵制的任务不能达到了的时候，以及敌人向上面转动的时候，应该及时地集中自己的力量，但是以后七师就逗留在湘鄂边苏区没有去集中。因为当时夏曦觉得集中也不能击破敌人，就有分开游击的企图。夏曦当时对于鹤峰失败以后的布置，没有组织秘密组织与游击战争，当时把游击队及工作人员一起编到七师，主要的是觉得没有可靠的干部，怕把游击队不巩固，枪枝及武装了团防，这便是由于不相信同志不相信群众的

错误。夏曦当时在七师也没有清党和帮助七师的政治工作，仅仅想加强特务队的政治训练来培养干部。这些错误，是没有遵照烧巴岩、银石坪会议决定，一直到七、九两师会合，中央局会议，才了解和揭露了自己的错误。

二 二、三、四次肃反报告

一次肃反是在敌人四次围剿的时候，常常是在前方作战，同时在后方逮捕反革命分子。在一次肃反当中，改派在红军中的组织系统（军委、师委、团委、支部）差不多粉碎了，还剩了一部分上层改组派的领袖如段德昌、王一鸣等。在一次肃反过程中，改派主要的阴谋，是秘密地发展组织，用恐吓的手段干涉自首，在行动上加紧破坏阶级路线，在作战(中)破坏战争的胜利（如勾结敌人，绘图送给敌人，破坏战略战术）。关于一次肃反，当时曾给中央报告过，同时一次肃反材料，完全在洪湖，没有带出来。

1 二次肃反开始于六房嘴，是一九三二年八月，此次正是我们失败之后，差不多每天有敌人追击，每天战争和行军。部队的建制也是破坏了，完全失却统帅的机能，完全不能听从指挥，枪一响建制都完全紊乱。所以每天部队中丢枪抛弃军用品，以及少数抱枪投向敌人都随有发生。军旗都在此时被改组派分子抛给敌人，尤其严重的是阶级路线的破坏，在农村中破坏了阶级利益，到小的街道上，所有的东西完全没收一空。

二次肃反，亦是这时开始，本来一次肃反，已经粉碎了改组派的组织体系，但是从军校毕业的学生中补充军事政治负责人，特别是李人一、唐赤英、李强、齐素卿等补充到红军中，在军事系统内，政治制度政治机关内和党的组织里，增加了这一部分人改组派的分子，故这些人又把粉碎了的改组派组织领导恢复起来。在此时最严重的是破坏阶级路线，以及涣散军事组织，是改派当时的主要阴谋。

在改组派最狠毒的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计划，将七师拖走，这一个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共同商议的。改组派这个计划的未实现，是因为与八、九两师和军部会师才没有实现。二次肃反一直继续到长途行军的终结。我们的长途行军，是在苏区失败之后，部队的政治情绪失败主义的非常厉害，改派利用这一条，更大的来破坏我们，所以他们有组织放火队，专意来烧穷人的房子，阶级路线在长途行军中完全破坏了，敌人跟踪追击，每到放火的时候，部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即在内部打枪，以致枪杀我们自己的战士，所以每次放火部队就破坏到不成建制，甚至跑到宿营地才能将建制归还。

二次肃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个师长王一鸣，一个军参谋长唐赤英，其次即是团长、营长以及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连长这一级是少数的。

2 三次肃反是退出桑植后在恢复与发展巴东、建始、施南的苏区过程当中。当时改组派的口号："应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在桑植两次作战，完全被段德昌、宋盘铭等改组派分子破坏的，那时二十七团团长周海成领导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把枪送与敌人。

从桑植退出后，在走马坪与独立师会师，独立师主要的是湘鄂边独立团编制而成的，湘鄂边（五鹤峰）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部队的主要地位完全为改组派把持，这些改组派的领袖如周小康、陈业平、杨英等，在湘鄂边的改组派差不多是公开活动，如象在支部会的讨论"红军好呢？还是白军好呢？"如果说白军好，就可以介绍入党，以及讨论联合团防与换旗

帜的问题，在湘鄂边改派活动最积极的时期，是唐赤英到湘鄂边巡视之后，湘鄂边的阶级利益简直是破坏完了，甚至一斗包谷，几升黄豆就可以取一个经济案子，以致于夜里强奸的事件。

所以三次肃反的开始，从破坏独立师的改组派的组织，一直到段德昌，在逮捕段德昌前夜的时候，段德昌在刘家集企图将九师拖走，可是这一阴谋计划未有实现。

三次肃反共逮捕了二百三十六人，主要是段德昌与军参谋处长和湘鄂边独立团的改派分子。

在三次肃反中还发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常德国民党市党部派进来的，一个是湘鄂赣改派派来的。国民党常德市党部派来的戴世杰一进来，在二、六军时代就与柳克明发生了关系。

3　在三次肃反以后，党的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一百七十二人，主要是宋盘铭以及七师师长业光吉同师政治委员盛联均和军政治部政务科长以及军管理科科长江器也。

这一肃反的开始，是起于九师二十七团以及师部各部处联合着反对师长拥护宋盘铭，这一个事件的里面，是二十七团团长联合二十五团团长等主要的反革命分子企图进行一个军事叛变。他们已经派了人与施南保安团接头拖过去。这个派人接头的事情，宋盘铭是参与的，这个时候在九师里面提出一个口号来在下面讨论："改良主义好呢（还）是烧杀主义好？"

事后又发觉在金果坪时，改组派已经派人到宜都与国民党发生关系。

4　一次肃反的材料，失败时没有带出来，逮捕的约计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这些分子最大部是一九三一年以前加入的。

二、三、四次肃反逮捕的总数，共六百四十九人，二次二百四十一人，三次二百三十六人，四次一百七十二人。

这一些数目中加入改组派的时期，一九三一年以前的八人，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九人，一九三二年上半年的二百二十九人，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的二百零九人，一九三三年上半年的七十人，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一人，时期不明的一百零三人。

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改组派主要负责人中如王一鸣、唐赤英、刘昌运、汪洋、段德昌、李人一等。段德昌是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全国军事会议时在上海由周逸群介绍的；王一鸣在未来红军前就是改组派，他负改组派使命来的。

审判的结果：二次十四人（不确）处死刑，三次处死刑的五十六人，四次处死刑的四十一人，因病死的共二十八人，其余大部分自首释放，有四十余人开除红军军籍送出苏区。二、三、四次未书明如何判决的：二次一百九十八人，三次六十九人，四次二十六人。未书明如何判决（的）中（间），在二次里有一部分是处死刑的和逃跑（的），三、四次（里）则（是）立即开释的和开释未明的。

在肃反当中，三次肃反，举行大的公开审判两次（段德昌、吴玉堂、沈子祥）。四次肃反举行公开审判一次（宋盘铭）。

对于下层的干部，一、二、三次从连长以下大部分准其自首，战士完全不逮捕。至第四次，团长有几个准其自首，恐怖情绪也减弱了。

关于改组派加入时期的材料，是凭他口供，实际是不完全确实的，因为改派分子都隐瞒加入时间，来企图减轻对于他（的）处罚。

三　游击湘鄂川边时期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七、九两师会合于鹤峰之石灰窑。当时中央分局谈话，向应提出了两个办法：一个进酉、秀、黔、彭创造新根据地，同时要看湖北敌人是否跟我们追击；一个是向两大苏区靠拢，以保存革命的力量。过了几日到了宣恩大村，开会讨论湘鄂边失败的教训与当前的任务，决定向酉、秀、黔、彭发展，创造新根据地的策略，并指出向两个苏区靠拢是错误的。向应自己也取消了这个提议。从大村有了这个决定，于是我们又把恢复湘鄂边的口号就改成创造湘鄂黔川边新苏区中心口号，当时决定在军事上占领黔江，以后取得了占领黔江的胜利。黔江有神兵联英会的组织，他们是与当地驻军作过武装斗争，我们在黔江住了一个礼拜，吸收了几百人参加红军，以后还有几百人没有赶上。可是我们当时没有积极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布置，因为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企图在军事上巩固的占领以后，才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如果当时加紧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就可以创造成为一个游击战争的区域。当时只是在退出时留了几个人在那里作秘密工作，以后这几个人就成为鄂川边独立团的基础。在黔江退出以后，当时企图游击川边，消灭小的敌人，及到利川之小河，就受到川军压迫，于是当时只是企图摆脱鄂川两方敌人的"围剿"，于是回到湘边，才在龙山境内休息了半月，这个时候，正是湘鄂军阀陈渠珍去参加黔战的时候，所以我们得在湘边休息。在这个时候，即进行清党的工作，九师清党，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可是我们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时机来发动群众的斗争去组织群众。所以在这个时期游击永顺、龙山、桑植、大庸、慈利五县境内。在两个多月限于无目的的流浪，以后湘军抽调部队来"围剿"，经过几次作战，我们就受了损失，在这一时期内，部队内的失败情绪增加了，老战士开小差的几十人，改派残余又复活动，造出谣言来离间破坏党的领导。在这个时期，党的支部能反映出一部分情形，中央分局一致的将改派残余破坏党的阴谋粉碎了，逮捕改派残余十多人。

最后在江桠作战以后，中央分局才决定重复回到酉秀，并企图创造鄂川边成为一游击中心区域，主力部队以后要围绕游击的中心区域游击，所以又由湘西游击到酉秀咸丰利川与鄂川边独立团会合，在四月举行十字路中央分局会议，十字路中央分局会议的主要意义，在于：（1）企图创造游击中心区域成为新根据地；（2）要用大的力量做群众工作；（3）要有目的的游击。在这个会议以后，由鄂川边独立团会合，才决定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任务（见中央分局关于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议——附件五）。但是主力部队还不能在鄂川边屯住，所以又从利川游击到酉阳稍得休息，继续完成了七师清党的任务。在酉阳又受到川军的进逼，所以才突出彭水，从彭水渡河进贵州。到贵州先到后坪婺川等地，敌情薄弱，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之极，于是由沿河到乌江东岸，在沿河、酉阳边境游击。这次在内部的工作，办了第一期干部大队，军政治部，军党务委员和两师党的工作，才逐渐地建立起来。

四　黔东苏区的创立与现状

自从六月十五日到了印江，沿河交界之沙子坡，我们与当地的神兵斗争取得了联系，到了枫香溪以后，我们估计到：（1）群众的斗争与情绪；（2）敌情的薄弱。就决定了在印江、沿河发展苏维埃运动，就决定调集一批干部把军委会的机关建立起来，即刻成立军委会的宣

传队，印江、德江、沿河、婺川一带，去年有神兵的组织，他们的发动是反对派苛捐杂税而起，他们到处设有神坛，神坛设有佛祖，练有神兵，俨若政府，神兵与当地驻军战争失败，于是就逐渐瓦解，但其组织还没有破坏。

我们认为神兵是农民斗争的原始形式，但是被地主豪绅领导出卖群众的斗争。我们的策略，首先是接近他们，在接近了他们以后，主要的是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夺取下层群众，同时我们在群众中，还直接的单独的组织农民的团体，当时采取了这个工作路线，我们当时组织群众的方式是两种：（1）是组织游击队同着红军行动，（2）是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斗争纲领是抗租、抗税、抗债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发动土地革命；会员是雇农、贫农、中农，这是苏维埃政权没有建立前白区组织农民群众的一个方式）、雇农工会。在这一个地方群众斗争发动了以后，就组织革命委员会和建立苏维埃。以后在建立两个区的革委以后，已经有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农民协会的形式就不用了。到了一地就直接组织农民小组，这种小组都举有代表，以后就转变为苏维埃，在红军占领的区域，我们才去的时候，群众还跑兵，经过宣传以后，群众才回家，我们就去组织农民小组；组织以后，就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乡苏维埃成立以后，就开始没收土地，分配土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大约快到七、八天，迟缓约两星期，我们就可以将驻地范围建立乡苏维埃，分配土地，成立游击队。这个快慢，主要的是依据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数量与质量。有的区域，是成了游击队以后才派人去组织群众，或者因为神兵关系，群众已来参加红军。该地还没有实行土地革命，主要的是以前干部准备不充分。在开展地方工作（中），红军成为发动地方工作的骨干。现在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干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队，连有流动宣传队，从红军中调去参加苏维埃的约一百人，参加独立团游击队的约近三百人。

现在我们把黔东苏区的现状叙述一下：现在的黔东苏区，包括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境，建立了十七个区革委，约百多乡苏，约有将近十万人口，纵横约二百里。在这个区域土地已经没收或分配了。没收和分配的原则是根据全国苏维埃土地法，将豪绅地主（土地）全部没收，富农土地亦予以没收，分配以坏的土地，中农的土地没有动摇，少地的中农还分得土地，红军家及雇工均分得上等地，较普遍的劳动力要加三分之一，红三军的老战士每乡分配十个，得到土地。除此以外，每乡还有红军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及苏维埃公田（约十挑至二十挑）。

一般的说，地主富农的土地转移到贫农中农手里来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消灭了地主经济。但是解决土地问题当中，地主富农的土地有遗漏的隐瞒的，经（过）了第二次查田，又增加了每个劳动力的劳动份地，例如沿河五区白石乡第一次每个劳动力分得五挑零五升，经二次查田，每个劳动力分得六挑了。土地问题之没有彻底解决，主要的原因，是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而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现在已极力纠正这个错误，发动广大群众查田运动。

劳动法的执行，还没有系统的进行，不过在有些区域，工资已经增加，例如洪滩市镇的挑水工人，每挑水由五十文到一百文，刀坝的手艺工人他们自己提出增加，由八百增加到一千二百文，零工由三百到六百文，增加百分之百。

苏维埃的组织，现在仅成立乡的一级，十个公民举代表一人，每乡有三个总代表。现在照中央苏区办法，改造并进行建立各区的苏维埃，现在是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肃反的斗争，在群众中还是不充分，在部分的苏区群众自动的捉拿乡长闾长，现在乡长

区长一部分被红军捉了杀了，一部分还在苏区边境积极组织反动武装向苏区进攻。

黔东第一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是七月二十一日举行，到会代表共一百三十余人，贫农三十一，工人五十四，中农八，士兵四，小商三，其他不明七，红军二十余人。在大会上讨论了下列决议：（1）土地没收和分配条例；（2）农村工人保护条例；（3）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决议；（4）优待红军家属条例；（5）肃反条例；（6）苗族问题决议。当选举八十人的执行委员，三十二人的常务委员，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在大会以后，苏区发展了二分之一，地方武装也加强了。

苏区的地方武装分为三种：（1）红军独立团；（2）游击队；（3）赤卫队与少先队。红军独立团已经组织，有（已）吸收新参加的战士约一千余人，独立团曾经取得几次小的胜利，最大的一次是击溃王家烈敌军一营。除了独（立）团外，还有独立的游击队约十个，吸收新的战士约四百人。至于自卫队，则大部分乡苏均已建立，能够放哨守卡。但是还没有进行军事训练，人数不详。少先队还只在几个中心乡开始，没有成绩。

在苏区内党的组织还只发展新党员二十八人，已经建立特区党工作委员会、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群众组织，各乡大部分建立雇农工会，贫农团，少年先锋队，农妇代表会议的工作，亦已开始。

五　红军中略情与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问题

1． 全军人数约□□余人，此中包括新的成分增加，在咸来利的游击过程中，吸收新参加红军约千余人，可是这千余人还是不巩固的。老战士的削弱，主要因为没有巩固后方，每次作战伤兵不能归队，部队内部政治情绪，还部分的有失败情绪与自由主义和军阀制度残余的倾向以及肃反的恐怖情绪。老战士开小差的事件现在才没有了（在老战士中，现在还有时发现阶级异己的分子，如地主富农甚至还发现地主官僚县知事的儿子，父亲同娘都是被组织上杀了的，土地亦被没收了的，还隐藏在红军中）。

2． 政治系统在一次肃反中就破坏了的，如政治部和政治处在一次肃反后，只剩少数的次要的工作人员，在六房嘴的时候，政治工作人员虽增加了些，但是很少的。在二次肃反中，政治系统完全破坏了，到桑植后才开始补充指导员，以及到鹤峰苏区的时候，在清党的过程当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组织）解放（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工作。但还是不健全的。

3． 党的解散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重新登记又经过多少延缓，这中间经过第四次肃反，登记党又被改组派宋盘铭、盛联均利用来提拔改组派分子。在一九三三年八月间，军部各部处的党才初步的登记完毕。九师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开始登记，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在西库时才初步的登记完毕。七师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在腴地方才初步的登记完毕。

4． 干部的补充：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

5． 红军报纸，以前是“战士的话”，出小册子，现在改为单张，名“红星”。

6． 目前在部队当中，最感困难的是给养问题，给养的搬运完全由战士负担，由每连派差事出去搬给养，甚至出去搬给养由部队掩护差事达一百多里远的地方去搬。

7． 清党以后的党员总数及成分如下：

(清党开除的共产党员三十人，团员十三人，内一部分是临时开除的没有总结)

(1)全军党团员总计四百六十三人。党员二百六十七，团员一百九十六，内新加入的约数十人。

(2)贫农二百五十五人，雇工一百一十二人，中农十六人，手工业者三十六人，苦力工人四人，小商八人，牧童二十四人，学徒八人。

8. 红军在创造黔东苏区的过程中，战斗情绪与军事技术也相当提高了，最近几次与敌人接触，已经取得了几次的胜利。

八月十五日第一次与沿河傅恒中旅战，俘获八十余人，获枪七十支，敌溺死河中无数。

八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与黔军廖师黎团战，俘获敌八、九十人，得枪一百五十支，毙敌七、八十人。

八月三十日第三次与秀山杨卓之保安团战，俘获敌四十多人，得枪三十余支。

六 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已见中央分局八月四日决议，这里只补充几个实际问题：周围的敌情，印江原来是廖怀中的防地，廖又是反王家烈的，我们在印江活动，以及王家烈部队的前进，廖部移防松桃，现在部队涣散，只有数百人了。沿河县是蒋培绪之傅旅及杨旅，战斗力亦弱，我们曾激（击）溃其一团。现在进攻苏区的主力，是王家烈派来的李成章旅，约计步兵三团，时常配合团匪来进扰苏区，再则桐仁驻有柏辉章约四团，西秀驻有田旅约二团，战斗力较强。黔、彭驻达旅（？）约三团。

我们现时的困难是粮食，苏区小了，又遭天灾，收成只有一半，这种困难，主要从扩大苏区解决。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猛烈的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关于粮食，我们现在正在发动群众夺取附近白区的地主秋收。

为了加强苏区内的工作，夏曦决定留在苏区指导党、苏以及军事工作，重要问题则到前方召集中央分局会议解决。

关于白区工作已指定一个同志专门负责，还须建立专门的委员会。

关于干部的培养，军委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学生百五十人，尽是苏区本地的，已训练了一个多月，可派出四十人工作。

七 其　　他

我们有向中央请求各项：

1 请加强中央分局的领导力量，现在分局只有三人，两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既不集中又不能应付后方，甚难工作，请中央至少派两人加入中央分局。

2 请少共中央派一代表来。

3 中央分局与军委会的领导工作要分开，本来从洪湖出来至黔东，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有机关，仅仅有一个委员会，以后委员只有四个，也没有开会。现在苏区发展，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建立起来，现在由我们三人组织主席团，后方军事工作还是由夏曦兼负。由夏曦兼负其责是照顾不来的，反致妨碍党的工作。但是在前方一时又抽不出人来，请中央对于革命

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问题，给予解决。

4　请中央加派理论的军事的干部来，特别是军事干部，有专门技能和知识的军事干部，以及参谋人才，需要得非常迫切。

5　请中央通知四川省委设法与我们取联系，并加强酉秀黔彭涪州一带工作。

6　对于洪湖，请中央设法去建立秘密组织和游击战争，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亦当准备一批干部派回。

7　关于保卫局工作，特别是红军中建立政治保卫工作，请中央详细地指示。

有向中央声明的两点，即黄德标所说：提拔干部要经过保卫局；介绍党员是经干部二、三人介绍，旧党员统统不要。并没有这回事，当时的清党条例可以看见，最近关于党籍和团籍问题的决定和自首分子的决定，均寄上一份（即附件六、七、八）。

关于交通关系已在设法建立，由李同志面谈，我们过去对这一工作的疏忽，是非常错误的。

关于鄂川边独立团方面的情形，因为交通断绝，没有报告，正在与他们建立交通关系。

湘鄂西中央分局

中央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的经济危机，在日益剧烈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之下，空前的扩大与深入。农村经济空前的崩溃，工商业的衰落与大批的工厂关闭，普及全中国的水灾，以及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地主、资产阶级残酷的搜括与剥削，造成了大批失业失地的工农群众，使他们的生活日益陷入绝境。全中国工农的革命斗争在这样情形之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在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中，尤其表现得明显。但中国工人阶级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的发展，当然也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指标。

从党的四中全会以来，尤其在满洲事变以后，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显示以下的特点：

（一）罢工斗争带着浓厚的政治性质，反对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斗争日益剧烈，日益正在爆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

（二）罢工斗争的反攻中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这在最近的斗争中更明显的表现了出来。

（三）罢工斗争包含了整个产业（丝厂）及各主要产业的工人（上海市政、纱厂、印刷、北方铁路、矿工，以及纱厂工人）。斗争一开始就带有几个工厂同盟罢工的形势，而且在许多产业部门正酝酿着同盟罢工。

（四）斗争大部分还是自发的，经济的；猛烈的发动，还缺乏持久性与组织性。

因为统治阶级的崩溃和革命危机的成熟，一方面推动了工人斗争的发展，同时使得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更加残酷的使用暴力来压迫工人的斗争。主要的在以下的事实上表现出来：

（一）国民党使用强迫仲裁与工厂法、工会法来压迫工人阶级，几次命令禁止工人阶级为切身利益组织工人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进攻的一切“劳资纠纷”，逮捕斗争的工人。

（二）资本家使用开除政策（整个的部分的开除罢工工人）来对付罢工；要求工人赔偿罢工怠工的损失；日本资本家更以关厂政策对付工人。

（三）国民党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到处收买流氓工贼，在企业中组织法西斯蒂队伍，分裂工人的战线，鼓动工人起来械斗，利用失业工人及灾民来破坏罢工。

（四）在工厂配置武装厂警，施行严格的检查，架设机关枪，实行在工人区域戒严。

（五）在“一致对外”及“增加生产”的口号之下，加重工人工作，减少工资，进行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在“退职”的口号之下来反对工人的反日罢工，解散罢工工人，禁止工人的“违法行动”，枪杀游行示威的工人。

国民党资本家这些压迫的政策，是直接在黄色工会的积极拥护之下进行的。黄色工会拥护国民党资本家进攻工人阶级的一切政策，与国民党资本家及帝国主义结成联合战线来压迫

工人的革命斗争，因此黄色工会在工人中的信仰大大的缩小，主要的依靠工厂中的法西斯蒂队伍及国民党的警察维持自己的地位。同时，因为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加紧，黄色工会的派别斗争也剧烈起来。改组派正在想利用工人阶级对南京政府的不满，利用工人的经济斗争，进行欺骗群众的工作，企图夺取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打击蒋介石派。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右派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严重进攻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应该罢工，也就是和黄色工会一样帮助统治阶级来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仅仅只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赤色工会是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组织工人阶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进攻。党和赤色工会在最近的工作中得到了以下的成绩：在几次反帝示威中提高了工人的情绪；党的政治影响在工人中扩大；有些企业中增加了党员及工会会员，并团结了部分的工人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始建立了工厂委员会；领导了一部分的罢工斗争；组织了一些工人的反日的义勇队及辅助组织；在工作中开始运用公开工作的方式及下层统一战线等。

但是党和工会组织还是落在客观形势发展的后面，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还非常不够，还暴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有：

(一)在组织反日罢工中充分表现出我们组织的无能和不积极，不会将工人的经济要求与反帝口号联系起来动员群众，许多日本企业的罢工与辞职没有去领导，使罢工还没有成为目前反帝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成绩极少，缺乏有计划的耐性的准备，很少去领导工人的自发罢工，甚至有人说，工人只有在组织赤色工会，打倒黄色工会之后，才能举行经济罢工。同时赤色工会又不会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的影响和已得的胜利。

(三)赤色工会在企业的组织，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重要产业部门。缺少经常工作；不能将企业中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领导大多数群众；散漫和会员的流动现象，没有消灭。

(四)空有广大的上层工会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的雇佣化，对工作的敷衍，以及悲观消极和清谈的现象，还非常严重。没有将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企业里面。

(五)不了解工会工作的中心是解决工人切身的日常问题，不会利用工人的切身问题来联系到党的主要任务，常常使工会的工作与党的工作完全一样，用建立党的方式来建立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不善于运用群众工作的方式去接近和领导群众。

(六)不会运用下层统一战线来吸引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没有组织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或者由少数赤色会员推举罢工委员会，脱离广大的群众。不会利用公开并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

(七)在黄色工会中还没有建立有力的革命反对派，不愿在黄色工会的群众中去工作，不注意研究黄色工会欺骗群众的方法，并拿住每个事实来揭破黄色工会的欺骗。同时，投降黄色工会的倾向还时常表现出来。

(八)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忽视建立工会和参加工会工作的重要，许多工厂的同志不加入工会，认为建立工会仅仅是工会工作人员的事。

(九)对于失业工人运动及青工女工工作一般的忽视。

(十)在苏区的工会工作，在有些主要区域内（如湘鄂西、鄂豫皖两苏区）已经有了不少的成绩。但是，在有些苏区(如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等)一般的是忽视了工会工作，工会还

是空洞机关，没有领导工人斗争，及大大的改良工人生活，甚至劳动法及八小时工作也不能充分实行。并有认为在战争紧急时期必须放弃工会工作的理论。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就是使党和赤色工会落后于客观形势的主要原因。

党为着完成自己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动员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成为目前的反帝运动的中坚领导力量，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及完成土地革命斗争，就必须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使这些斗争与党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消灭党和工会在职工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保证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完全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准备力量来迎接当前的伟大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执行下列各项：

(一)党与工会的组织，应以极大的紧张和毅力来组织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开始发动那些日本中心工厂，利用日本资本家的关厂政策来组织工人的进攻；努力使罢工扩大到一切工厂，同时反对国民党并竭力保护工人的本身的利益，使工人的经济罢工与反帝反国民党的罢工密切的结合起来。应坚决反对国民党借口“救国”来禁止“劳资纠纷”,反对资本家借口“提高生产”来进攻工人阶级。应广泛的利用公开来建立广大工人群众的反日组织。应很好的解答工人对罢工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救济费等)。同时应宣传只有工农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才能战胜帝国主义。

党和工会应采用各种方法去领导那些反日的自发罢工与辞职，使工人的行动转向积极的有组织的斗争。

(二)党和工会组织应集中力量来领导日益发展的经济斗争。这是夺取工人群众到党和工会周围所必须拿住的关键。赤色工会及革命反对派应在群众的经验中去证明自己是群众切身利益的拥护者，与黄色工会的欺骗、拍卖和背叛完全不同，证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不但是对远大的政治问题有办法，并能使群众从赤色工会和反对派那里得到一切切身问题的满意的回答与解决。这是吸引工人的自发斗争来寻找赤色工会领导的最好办法。

党和工会的组织应使自己不落后于群众，就应经常查明和表白群众的情绪，把群众的不满变成简单明了的要求，时时都准备来领导斗争。

应提出各产业部门的要求纲领来准备每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应扩大工人的每次罢工组织，群众的“同情运动”,来发动同盟罢工。同时赤色工会还应该动员自己的组织及在自己领导之下的工人去援助自发罢工，用写信、慰劳、招待、派代表组织后援会等办法与罢工工人发生联系，在刊物和印刷品上向罢工工人作各种提议，用这些办法去扩大自发罢工并给予领导。

（三）党和工会应该用种种方法使罢工政治化，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的罢工。我们的组织应该在罢工进程中提出各种为工人群众所了解的政治口号（如反对用军警压迫工人罢工，反对把机关枪架在工厂门口，反对公安局捕人）来使罢工政治化。应该组织群众来反对禁止罢工、逮捕工人领袖、解散工人团体及封禁报纸和搜查，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等的自由等，反对国民党的仲裁调解，反对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一直到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的直接斗争。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使工人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了解我们的口号的正确。我们的口号只有忍耐的、经常的、向工人群众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才能为广大的工人群众所拥护，才能使广大的工人群众为了我们的口号而斗争。

(四)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经济斗争必须广泛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应在于下

层群众的共同要求（首先就是工人的切身要求）上建立起来。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应该普遍成为领导斗争的组织形式，应该号召全体工人或大多数工人来选举罢工委员会，使罢工委员会一分钟都不要脱离群众。秘密的赤色工会应依靠自己在罢工委员会的小组来领导罢工委员会，完全采用群众工作的方式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黄色工会有力量的企业中，更必须采用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的方式来夺取经济斗争的领导权，努力使这些委员会脱离黄色工会和国民党而独立领导。

（五）应该努力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利用各种可能来徵求会员（尤其在罢工时期），召集赤色工会的代表会，建立各种产业委员会等。党的地方党部和工厂支部应该把工会工作放在工作日程的重要地位；尤其在没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党的支部应该担负建立工会支部的责任。

党和工会应该集中力量克服一切的困难，在铁路、海员、五金及重要矿山中工作，建立组织，夺取这些重要产业下面的群众。

赤色工会应利用一切的可能跳出目前的秘密状态，应组织群众的力量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利用罢工委员会在结束的大会上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在可能时直接把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群众的赤色工会。利用各种临时紧急问题（如大的罢工，目前的反帝高涨等）来召集各种工人团体的代表大会并成立联合的组织。赤色工会应积极参加这种联合的组织握住领导权。

（六）党和工会应在各地建立各种公开辅助组织。这些组织以适合群众的需要，经过党员和会员在群众中去发起来建立。应在这些组织中扩大党和工会的宣传影响，吸收党员和会员，并利用这些组织来帮助工人的斗争。

（七）为着与被收买的流氓工贼及法西斯蒂队伍作斗争，应组织罢工纠察队及工人自卫队。

（八）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是党和工会主要任务之一。应采用各种方法和步骤去进行。切实推动在黄色工会中的同志和赤色小组去工作，训练他们的工作方法，在与黄色领袖长期艰苦的斗争中争取群众。联合赞成赤色工会纲领的工人来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反对派应在每次斗争中，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利用各种事实揭破黄色工会的纲领和欺骗。当着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就可从黄色工会分裂出来。

党员和赤色会员，参加黄色工会的执行委员（只有群众选举的才允许），主要的目的，是在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而说话，是在不断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并揭破黄色领袖们的欺骗作用与他们的出卖行为，把群众夺取到赤色纲领之下。党和工会对于被选者应有严格监督与领导他们，不应脱离企业，不应领受国民党的津贴。

（九）应该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取消派、罗章龙派等，在斗争中揭破一切这些派别的阴谋与欺骗，指出他们反对工人阶级投降统治阶级的实质。这一斗争在目前尤其重要。

（一〇）应特别注意组织失业工人运动。建立失业工人委员会，用它来组织和帮助失业工人，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来解决目前切身生活问题联合向政府和雇主要求救济，住到空着和公共的房屋中去，联合不失业工人自动分配公共的和私人的粮食等，组织失业工人及一般失业群众的团体，把失业工人运动与在业工人联系起来，反对资本家的收买，反对关厂，反对资本家的开除政策。应宣传工人失业的原因和出路，应向工人解释水灾的原因及其与工人生活的关系，号召工人援助灾民的斗争，使失业工人运动与灾民斗争打成一片。

（一一）整个组织应重视青工女工工作。在青工女工中发起组织读书会、体育会、音乐队、儿童团等。召集青工女工代表会。在斗争中提出青工女工的特殊要求，并联合全体工人为这些要求斗争。号召青工女工加入工会及纠察队等。加强对青工女工的教育，组织特别的训练班。还应在工人家属中工作。

(一二)应注意建立工人的报纸，工厂小报及画报等。抓住企业中每一个工人的切身问题和斗争问题来讨论分析。注意揭破黄色工会纲领及国民党的武断宣传。组织大批工厂通讯员并教育工人投稿。使报纸大部发到工人手中去。应宣传苏维埃区域及苏联工人的生活，宣传苏联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人的关系。

(一三)党和工会应将一切工作重心放在企业里面，坚决执行“面向生产”的口号。应帮助得力的同志去参加生产，经常检查支部，派最有经验的同志指导支部工作，从企业中培养大批干部。短期训练班应普遍到许多工厂、矿山，并提拔新干部到指导机关负责。

应与工会会员的流动性作斗争，就应该建立工会生活，使企业中的组织有经常的实际工作，绝不容许到支部中清谈，应力缩小工会的上层空机关，把工作人员分配到企业中去，消灭工作人员的雇佣现象。

(一四)应该加派职工运动的干部到苏区。严格训令苏区同志，执行国际中央和全总对职工运动的决议，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和改组苏区的工会，发动工人斗争来大大改良工人生活，实行劳动保护法，增加工资，八小时工作，救济失业及社会保险等，在苏区应训练大批工会干部，尤其注意雇农工会的组织和建立。在战争紧急时更应加紧工会工作，经过工会发动群众来参加战争。

在国民党的后方应动员群众来援助苏区和红军，扰乱国民党的后方，破坏军事交通等。应在工人中组织“红军之友”,募捐慰劳红军，徵调工人到苏区和红军。

(一五)为着执行上述任务，党必须坚决的在两条战线上作斗争：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保证工作方法和方式的彻底转变；尤其要集中力量来反对右倾危险，各种黄色倾向，投降黄色工会的主张，和平合法的观念，及消极不动的情绪，与清谈敷衍的现象。每一个具体的错误，必须与之作最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来教育同志。应尽量使两条战线的斗争具体化并且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

——中央职工部报告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初——

刘 少 奇

1 最近的工人斗争和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

（一）经济恐慌继续的深入，资本家更厉害的向工人生活水平进攻，本来是极可怜的中国工人的生活程度，不断的往下低落，广大的失业工人更是无处谋生。由对日经济绝交所产生的痛苦，几乎全部是加在工人劳苦群众的身上（由经济绝交而营业发达的民族工业，借口"国难"更加重工人工作，延长工时；由经济绝交而营业低落的民族工业，也借口"国难"来减低工资，延长工时，裁汰工人，以至关门停业，不给工人救济费等），因此，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断的向前发展。同时反帝运动的高涨，红军和苏维埃的胜利与发展，也给了工人斗争一种有力的推动。但在另一方面，资本家与国民党帝国主义更加联合一致来压迫工人的斗争，更加采用一切的暴力与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斗争的工人，黄色工会更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来破坏工人的斗争，因此使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的失败经常威协着压迫着要求斗争的工人。赤色工会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群众的力量去克服客观所给予的这一切困难。

目前的形势是：工人斗争更加困难；可是斗争的推动力更伟大了，在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普遍了（不仅上海的黄色工会有四十九件未决的劳资纠纷，差不多每个产业部门每个工厂中都蕴藏着群众极大的不满与愤怒，都有许多迫切要求），斗争的锋芒更尖锐化（都有一触即发的形势，一爆发就成为武装冲突），一切斗争都带着极浓厚的政治性（一切斗争都是违法的，都与国民党的统治直接冲突）。目前最主要的就是用赤色工会的正确领导和群众的组织力量，去冲破客观上一切的困难，打开阶级斗争的顺利的前途。

最近同志估计"工人斗争的情绪还不够"，取消派在困难的前面投降，要人"不应罢工"，和立三主义者不估计到客观的困难与主观的力量，去玩弄罢工，都是发展工人斗争的前途的障碍。最近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工人群众的生活处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之下，胜利的希望那怕是如何的微小，可是工人还是要起来不断的斗争；统治阶级所给予斗争的困难是完全消减不了工人的斗争。同时工人群众绝不愿意玩弄罢工，不轻易发动罢工。我们的煽动家许多次得到工人这样的回答："你们所说的是对的，可是我们暂时还不能照你们说的那样做。"

（二）资本家国民党用一些什么办法来对付工人的斗争呢？主要的更多的是采用赤裸裸的对罢工暴力的压迫，但统治阶级的欺骗的宣传并没有减弱，而且是加紧了。尤其在满洲事变以后，国民党几次命令和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及一切劳资纠纷，甚至以死刑来镇压工人（汉口），同时国民党"劳资一至共赴国难"的宣传更加紧了，改组派黄色工会更在工人中提出许多欺骗工人的纲领（如上海总工会主张民众运动的独立与自由，取消工会法、工厂法，一切工人

有组织工会的权利，救济失业，工人有罢工自由等。取消派认为这是改组派黄色工会的"一个进步"）。

每个罢工和斗争，资本家和国民党都采用以下各种办法来对付：（1）当工人准备斗争还没有好的时候，就坚决向工人进攻，开除工人领袖，分裂工人；（2）宣布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无理取闹"、"捣乱"、"不顾困难"、"破坏劳资合作"、"摧残民族工业"，把罢工的责任加在工人身上；（3）宣布罢工是"少数不良分子"的捣乱，大多数良善工人是被威胁，使工人与领袖分离，把罢工责任加在少数领袖身上；（4）宣布罢工怠工是"违法"，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命令工人复工；（5）如果还不能屈服工人的话，就限期工人复工，过期全体开除，另招新工；（6）警察巡捕保护工贼及新工上工，逮捕工人领袖及积极的工人；（7）如果工人反对逮捕，对付工贼及包围资本家和示威等，国民党帝国主义不惜以大队武装来枪杀大批工人，施行军事戒严；（8）在工人中，组织法西斯蒂队伍，收买流氓工贼及失业工人，破坏罢工；（9）再没有办法就答应一部分工人的经济要求，而否认那大部分工人的经济要求，分裂工人，或者布告答应工人的经济要求，否认工人的代表权，不与工人代表谈判，打破工人的团结；(10)资本家互相间成立共同对付工人罢工的契约（如上海华方纱厂与英日纱厂），资本家彼此间的相互援助；(11)在报纸上作宣传，在工人中制造各种谣言，制造假的共产党的证据动摇工人；(12)再不然竟假意承认工人的要求，等资本家准备好了，否认自己所承认的条件，开除工人领袖，向工人进攻；(13)用关厂政策来对付罢工。

除开上面各项资本家所经常采用的办法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国民党的劳资调解仲裁机关。国民党宣布一切的劳资纠纷只能由它的调解仲裁机关来"解决"，宣布调解仲裁机关"能公平解决一切劳资纠纷"，但劳资纠纷一到国民党的机关里去，就保障资本家的胜利。国民党在调解仲裁机关里，这样来对付工人：（1）要工人立即复工，不作轨外行动，静候解决；（2）要工人遵照国民党的指导及工会法成立工会之后，方有资格派代表提出条件来请求调解或仲裁；（3）拖延至很长的时间（常至六个月以上）不解决，以衰弱工人，可使资本家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对付工人；（4）用各种恐吓及托事订条来对付工人；（5）调解不成，可以完全不顾工人的愿意与否，执行强迫仲裁；（6）调解仲裁机关一方面提出解决纠纷的条件，一方面又要资本家不履行这些条件，使工人受尽各种牺牲之后，一无所得。

除此以外，国民党资本家还在工人的内部造成很多的黄色工会和狡猾黄色领袖，主张拥护并执行上面各项破坏工人斗争的办法。

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和破坏工人斗争这一切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是从工人群众的内部与外部齐来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击破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使之失败，那斗争的胜利，就是很难得的。试问在工人群众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付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呢？

（三）国民党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的进攻是遇着了工人群众不断的反抗的，工人群众还是不断的提出要求，向资本家国民党斗争。工人斗争的反攻带着了更多的进攻的性质。上海工人是用许多罢工怠工（印刷、市政、纱厂等）来答覆国民党禁止罢工和纠纷的命令，用捣毁工厂与巡捕武装冲突来答覆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压迫（永安纱厂、大新织厂、商务等）；特别是工人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更不断的爆发起来。工人对于反帝运动已开始积极的参加，反帝斗争正在酝酿着。主要产业工人牵入斗争中间，同时那些小城市的手工工人也不断的举行罢工（如陕西、直南），而且还更多的得到胜利。但在工人斗争中还表现了许多缺点，这些缺点

是：（1）斗争还是各个的爆发，工人群众还没有自觉组成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联合许多工厂起来同盟罢工，并在工人中还流行“等人家胜利之后再说”的情绪，所以敌人就得以各个击破；（2）斗争大部分是自发的，没有很好的组织和领导机关；（3）在工人中还保存一些“合法”的观念，比如以怠工来代替罢工（怠工虽然也是工人必要的斗争手段，但最近的许多怠工，并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而采用怠工，而是因为怕罢工犯法更大，所以才怠工），以退辞来代替反日罢工，在罢工后宣布“严守秩序”、“静候解决”、“不作轨外行动”，最严重的最能打击资本家的部分不罢工（如英电怠工照常供给电灯、电车等）不作游行示威，不向各厂工人请求援助及鼓动各厂工人罢工等；（4）不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向敌人作武装的斗争，许多武装冲突都是无准备的突然的爆发。工人中的这许多缺点，表示黄色纲领在群众中还没有完全被群众所抛弃，是许多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最近两月来，工人是更多采用直接斗争的方式罢工、怠工，包围和捣毁是要多过从前，请愿派代表交涉比从前要少。斗争的发动还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的一部分工人，下层统一战线在工人方面是完全没有作到，甚至整个产业的工人都有斗争（如上海印刷、水电、纱厂等），但完全没有联系起来，只是分开个别的发动。斗争的大部分是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主要的产业工人的罢工和怠工胜利的是很少，但是那些部分的极小的斗争，倒是有许多胜利的（如工联和海总所领导的），要求条件有很多的斗争，极大多数是失败的。工人经过武装冲突及屠杀之后，工人情绪更高涨，斗争更扩大的是没有，都是工人散漫，没有继起的领导者，由国民党包办来“解决”。这是我们统计最近几个月来的工人斗争所得到结论，至于由日本企业中送出来的工人，除开彩印还有组织的，其他的工人都走散了（参看“斗争”统计表）。

（四）赤色工会和党领导工人斗争的情形是怎样呢？完全在我们领导下的整个主要企业的罢工（上海大东、公共汽车、冷作、彩印与河南兵工厂），只是冷作胜利外，其他都是失败的。而冷作工人的胜利是因为工人全体罢工，几次包围，只是向大包头要求增加工资。以后工联所给予工人的领导，大体上虽是对的，不过罢工委员会有许多没有执行，但在后来（十三号以后），恰是罢工要胜利时，工联疏忽了对工人的指导，而且是错误的指导，以致完全失败。本来资本家以罢工损失太大无法雇用新工，各股东责各经理处置失当，巡捕房也告经理不要延长罢工，各方对工人均表同情，客观上工人完全占着优势，只要能坚持罢工，资本家是可以屈服的，但在这时候工联没有看见资本家的阴谋。黄色工会与资本家的勾结，恐吓工人不应参加十三号示威，将领袖吓走，将工人从房屋中赶出来，断绝工人的伙食，工头就来（资本家叫他来的）号召工人跟他去，他给工人房子住和饭吃，领导工人退出黄色工会到工厂复工。工人复工还抱怨我们。工联此时没有将工人领袖拿住，没有反对黄色工会赶工人出来，没有揭破工头的阴谋，并且还赞成工人退出工会。

河南兵工厂的罢工，我们是完全没有运用罢工的策略，完全没有组织工人，完全没有准备工作，而得到失败。这个罢工如果在主观上不错，是完全有胜利的可能。公共汽车罢工的失败，虽然主观上是有错误，但新工人的上工，资本家破坏罢工厉害，是给我们很难解决的困难。彩印罢工虽然现在是无法解决的，但我们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胜利的。工人有个时期不听我们的话跑到国民党去，但是现在事实上完全证明了，工人完全回来了，认为我们的话是对的，表示完全愿听我们的指挥。

研究上面几个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主观上的策略上的错误。此外，还有许多与我们有关系的工人斗争，我们总是不能把工人的斗争组织起来，表现我们组织斗争的无能。

比如上海法电的斗争，电话的斗争，商务、民智、报馆的年关斗争，海员、驳船的斗争等，这些斗争经过我们很长期的准备，至今不能发动起来，实际的准备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固然在企业中没有我们得力的干部是很大的困难，但我们也就不能够说服那些活动分子，说服工人，告诉工人许多具体的办法，把斗争的环境前前后后告诉工人，很好的来运用罢工的策略等。工联和海总的同志还不能够对每一个斗争来从各方面作全般的估计，还不能从各方面告诉工人要如何才能使斗争胜利说服工人，缺少具体的实际办法。

“工联对于工人斗争的领导和布置，比以前是进步些”（工联报告），中央认为这是对的。他们已开始把领导工人斗争问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不比以前专门忙于纪念节的工作；有几个同志已开始来运用罢工策略说服工人，开始用些实际的办法告诉工人，经常在工人中指出到国民党部调解仲裁是毫无效果的，实际上领导了一些小斗争得到胜利，并且他们还开辟了一些工作（如大东、冷作及青工等），运用公开路线等。但他们还只是在开始转变，在斗争中来学习国际路线的实际运用。

我们是领导了许多斗争，还有许多斗争与我们有关系，参加了我们的领导，但一般说来，我们是领导的不好，尤其我们在组织上没有收到显著的成绩。学习领导和组织斗争，是党和工联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我们在领导斗争中发现了些什么缺点？

（1）不会准备斗争，没有一个斗争我们要群众在各方面都有过准备工作的。有些同志还以发动斗争为目的，甚至借口不要“等待”来反对在罢工之前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固然有许多临时问题的爆发，使我们来不及准备就要发动罢工的，但在目前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们是要慎重的来准备罢工，选择时机来发动。比如有许多罢工已经酝酿了几个月至半年，当工人已决定罢工，要工人有几天在罢工之前进行某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完全不是等待主义。在目前没有准备的罢工，是很难坚持到底的。相反的，在许多临时问题上可以发动罢工的，我们又常常拿不住，把机会放过了。

（2）对于工人自发斗争的领导是不够的，大半是没有去领导。我们没有对每个自发斗争来讨论分析，提出许多办法告诉工人。我们的工作还有些限制在狭隘的秘密组织之内，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

（3）我们的组织还不彻底了解企业中的情形，不能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还有些同志以为要求愈多愈好，尤其河南省委提到兵工厂的斗争纲领有十几条，把拥护苏维埃等口号都写在纲领上。

（4）没有提出共同的要求纲领来组织同盟罢工，没有说服工人必需斗争的配合才能克服敌人，不能把许多个别的斗争配合起来。我们还限制在领导那些零碎的个别的斗争上。相反的有些同志忽视小的部分斗争的发动，专门来“空叫”同盟罢工（如凭声）。

（5）我们还没有能够组织起有工作能力的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等。

（6）我们还没有调集一切的力量来争取某些罢工的胜利。组织同盟罢工，扩大罢工，我们还没有任何成绩。

（7）组织失业工人来同情和援助罢工，还没有成绩，只有大东罢工，上工的新工是自动辞工了。

（8）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向工人提议，要工人有组织的有准备的与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武装作斗争。我们只是简单的要工人毫无准备的去示威与包围和武装冲突。

(9)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揭破国民党调解仲裁机关的作用，没有告诉群众怎样去反对调解仲裁。

(10)我们不会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和进攻，不会利用敌人的弱点，不会临机应变，不会补救自己的弱点。

总而言之，我们领导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方法，还远不足以应付敌人。我们并且还落在群众后面，群众到处起来斗争，我们不能站在前面去领导，与群众联系不起来。

(五)党和工会动员工人群众来参加反帝运动，还非常不够。工联海总最近才有一些工作。我们组织反帝罢工，还没有一个地方有成绩。从日本企业中退出来的工人，除上海彩印外，我们都没有工作。日华纱厂的罢工，我们的工作也很弱。在工人中封立反日的组织，在最近上海才有一点成绩。如申一、永安、驳船、码头和印刷工人中已有了公开的群众反日会，并加入了民众反日联合会，起了相当的作用。几次动员工人来参加反帝游行示威，虽然没有很多的群众，但是多次都是成功的，参加的人情绪更提高了。不过大东工人参加十三号大会后，因为黄色工会的恫吓和罢工的失败，没有好的结果。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的联系，我们还作的不好。开始我们没有努力的来反对国民党资本家借国难来压迫工人经济斗争的理论，没有许多经济口号来发动工人的罢工，没有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号召和组织工作来准备反帝罢工。对于黄色工会在反帝运动中所宣传的口号，我们没有给与致命的打击。对于国民党的改组派企图引起工人与学生运动对立的阴谋（如汕头、山西、北京、上海兵工厂等），没有在群众面前揭破。

2 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

赤色工会的会员，因为没有材料，无从作出完全的统计。现就各地报告有数目字的，统计会员一千一百四十八人；计上海六百六十六人，厦门七十二人，海员三百十九人（码头驳船在内），哈尔滨七十一人，胶济路二十人。除此以外，海员有线索三十六人，津浦济南站有线索四十一人。附属组织上海有六百九十一人，青岛二十人。连会员线索，附属组织共一千九百三十七人。这个数目是除开河南、满洲各地，及铁路矿山未计算在内。在全国估计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与我们有联系的大约有三千人，我想这不会过分的，当然这还除开有些党的支部不算在内。

我们在企业中的支部有很大的领导作用的，有河南兵工厂、北宁路、关外及胶济路，只有这几个支部能领导几百上千的工人。其他我们有领导作用的如上海的印刷、法电，海员的驳船，哈尔滨的皮鞋工人等。在上海工会的会员非党员占多，会员还是流动的。同时还有些工厂虽然没有我们的组织，但到斗争的时候，工人还是来找我们领导（如大东）。工会支部和小组大半是没有经常生活的，与上面的关系又不很好，作用是非常小的。在城市除上海工联外，有哈总，厦门和奉天都预备成立总会，而哈总大半是在业，还没来参加工作。在天津、北京、汉口、香港、广东、唐山等工人多的地方，没有我们的组织；香港派去恢复关系的人又被捕了；天津派去了人，无成绩可言；武汉虽然苏区派有人去，但与我们无关系。

会员流动的原因，工人个别的入会又出会的现象还少，主要的是整个支部的建立和丧失。比如有些工厂，我们的基础很好，但过一时期，我们的基础完全丧失了。丧失这些支部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错误使斗争失败，由于敌人的破坏，或者是同志、会员的消极。在立三时

代许多支部的塌台是由于盲动。至于新支部的建立,大半是由于领导和帮助工人的经济斗争,或者是得力的同志参加了生产。这个现象在上海表现得很明显,是值得严重研究的。但我们在海员方面的现象,会员还是保留在旧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对于那些好的支部如河南兵工厂、胶济路等,更应慎重的指导他们,使基础能变更巩固扩大,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不要一下子又把这些好的支部塌台了。

在企业中的干部能执行我们的路线的是非常少,工会和党又没有注意来培养企业中的干部(须有集中的计划)。派同志参加生产的成绩,现在还很少能看见。

发展赤色工会的方式,我们现在还是一个个的介绍加入小组支部的办法,和介绍党员差不多。我们还没有能够利用各种可能来建立工厂委员会及群众的工会。上海工联曾经在冷作、彩印建立包括大多数工人的工会,但现在还没有成功。许多同志对"小组"还不认识,常把它独立起来。怎样来争取企业中工人的大多数,怎样来建立群众的组织,我们同志还是很少办法的。

附属组织我们所收到的效果很少。许多附属组织还是不公开的,群众很少的。或者我们没有派得力的同志去担任这个工作。如上海组织了有四五十人的工人学校,也没有在组织上收到效果。我们没有组织能适合群众需要的有很多群众加入的公开的附属组织。

发行工作是最不能令人满意了。发行的东西是很少的,还不能发到群众中去,群众不看我们的东西,影响几乎没有。但在哈尔滨那个地方是比较好点。工会和党的文件在工会支部小组中很少看见,甚至工会工作人员不看上面的文件,至于研究这些文件更是少极了。

(七)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最近是到处起来反对黄色工会。改组派利用群众的情绪来夺取黄色工会的机关。可是我们的纲领和口号在群众中还是看不见,仅仅只有空洞的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口号。我们提出"从工会中驱逐一切国民党员!工会与国民党各派脱离关系!剥夺国民党员在工会的选举权!"等口号,下层是还没有来执行。工联也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来对抗国民党上海总工会的纲领,甚至还有人去联络改组派(如商务黄色工人)。

反对黄色工会在胶济路、北宁路我们是得到胜利的。同志对黄色工会的策略还有许多错误观念未弄清楚。有人不去个别的分析某个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里面组织赤色工会的支部小组(五次劳动大会决议),在里面组织革命职工反对派(职工国际五次大会决议),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独立工会),三个口号我们各地都在应用,并且同时提出,写在一张传单上。同志还分不清楚这三个口号有什么不同,要用在什么时候才恰当。我们还没有在那些有力的黄色工会中建立有力、有组织的革命职工反对派。

3 苏区工会

(八)在苏区组织工会是有了不少的成绩:工会数目已统计有九万七千多人,这是除开中区、鄂豫皖、闽西三个主要区的未计算。我们估计会员数目总要超过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在苏区那样闭塞的地方,组织十万多人在工会里,的确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在苏区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有工会的组织。雇农工会是最好的,湘鄂西与鄂豫皖又要好过其他的地方。工会在平分土地运动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并领导了一些工人的经济斗争,派遣工人到苏维埃和红军中工作及征调工人到红军,也有相当的成绩。过去工会被AB团、社会民主党及改组派把持的,现在差不多都肃清了,换上真正工人来工会负责。但是缺点还是非常多。严格的说来,许多还

不是阶级的工会，没有严格的执行阶级的路线，老板富农还没有完全清出工会，小贩、独立生产者还有些是加入工会的。八小时工作在许多地方还未实行；彻底改良工人生活，工会还未努力做到。我们简直得不到一个报告，详细说到苏区工人生活状况的，如工资问题，工时问题，社会保险及失业救济工人住宅等问题；我们还不能详细知道，苏区工会有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来建立自己的经常工作。苏区经济破坏是给了改良工人生活很大的困难，但工会应保障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失业救济，建设生产合作社，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及监督生产等还完全没有举办。在组织上只有雇农工会是按生产来组织的，其他工会都是按地方来组织的。苏区工会这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应该得到城市产业工人和全总的帮助，但是我们所帮助的还很少。职工部已有一个苏区工会任务的决议，全总也起草了苏区工会组织法大纲和雇农工会的小册子，并正在研究社会保险、生产合作社及苏区工会经济斗争等问题，预备弄好之后寄到苏区。（下略）

九月半起至十二月止中国工人斗争统计表

（此表是凭我的记忆和各地报告作成的）

地方厂业	斗争方式	要　求	人　数	结　果	领　导
上海铅印	仲裁同时自动实行八小时	加工资八小时工作		半胜利	黄
上海英界公共汽车	罢工	加工资改良待遇	二〇〇	失败	赤
上海冷作工人	罢工	加工资	八〇〇	胜利	赤
上海中华书局	怠工（停止工作）	要求被开除工人复工	一二〇〇	失败	黄
上海民智书局	怠工	同上	二〇〇	失败	黄
上海华界电车	怠工	加工资及开除工贼	一〇〇职员	胜利	自发
上海同兴纱厂	退职	反日	三〇〇〇	无结果	自发
上海电杆业	退职	反日	四〇〇	同上	同上
上海海员	退职	反日	二〇〇	无结果	资本家停航
上海码头	不起卸日货	同上		同上	黄
汉口大安纱厂	包围	反对关厂要求救济	三〇〇〇	无结果	自发
天津裕元纱厂	关厂	反对关厂	七〇〇〇		同上
唐山矿工马家沟	罢工	反对黄色工会	三〇〇〇	不明	自发
贾班矿	同上		二〇〇〇		
镇江荣昌火柴厂	同上	反对苛薪及开除工人复工		半胜利	
南通复兴面粉厂	怠工	加工资及例假		胜利	
汉口兵工厂		加工资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	请愿	要求年赏	二〇〇	加二天工资	黄
上海永安第二纱厂	罢工打厂	要求花红	七〇〇〇		赤色工会
上海英商公共汽车	罢工	恢复被开除工人	二〇〇	失败	自发

		工作			
上海日华纱厂	怠工	反对开除，减工资	四〇〇〇		赤有关系
上海英商电汽	交涉	年赏			黄
上海招商局职员	交涉	年关双薪			职员工会
上海兵工厂	包围打毁	年赏	五〇〇〇	胜利	自发
商务印书馆	怠工	反对黄色工会	四〇〇〇		
上海大东书局	罢工	加工资改良待遇	三〇〇	失败	赤
大新染织厂	与巡捕冲突	失业救济费		半胜利	自发有黄会
胶济铁路	打黄色工会	反对合作社扣工资	六〇〇	不扣了	赤
北宁路皇姑屯	包围	要工资	五〇〇	胜利	赤
哈尔滨电车	罢工	要求成立工会及保障	七〇〇	半胜利	自发
河南兵工厂	同上	加工资	二〇〇〇	失败	赤
信阳土木工人	同上				赤
海员阿旦毋斯船	与警察冲突	反对开除	七〇	失败	赤
上海驳船七次斗争	打和包围			五次胜利	赤
香港煤炭工人		加薪	三〇〇	半胜利	赤
芝顺船海员	包围	反对去大连	八〇	失败	赤
俄皇后船海员		改良伙食	一〇〇	胜利	赤
天津肥料厂	罢工	组织工会及恢复被革工人			
门头沟失业矿工	抢米		二〇〇〇		
山西太原工人	打国民党部	与学生联系	二〇〇		
陕西印刷工人	罢工	工人帮口冲突		失败	赤
陕西盐摊工人	罢工			失败	赤
上海炭轫汽车公司	罢工	反对开除	七〇〇		自发
上海法电公董局工人	怠工	反对开除		无结果	自发
上海法电	罢工	反对巡捕打人	七〇〇	失败	自发
上海彩印工人	罢工	反对开除工人	三〇〇	无结果	赤
上海申一纱厂青工		出厂吃饭		胜利	赤
上海北门公司青工		吃饱饭		同上	赤
上海黄浦铁路青工		加工资不许打骂		同上	赤
上海光陆印厂		反对关厂		同上	赤
上海码头	包围	反对头子吃钱	一〇〇	胜利	赤

（原编者按：此文曾以仲篪笔名在“红旗”三十一期发表，月日无考，大概应在一九三二年初。）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上海事变后，职工运动中，许多机会主义的观点，必须予以无情斗争与彻底的肃清的！

（一)武装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工作，是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消极。

帝国主义大炮飞机轰炸屠杀的凶焰，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压迫反帝运动，是遭受着上海无产阶级的激烈反抗的。

许多工人自动的到前线上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如沪西面粉厂等工人)，许多工人到战区中去，夺取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警察保卫团的枪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斗争（如沪东码头工人)。工人武装起来，成为上海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工人不愿徒手的让帝国主义大炮轰击的粉身碎骨，赤手的让国民党屠杀拘捕。

反动统治阶级，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帝国主义派大批军队巡捕搜查工厂反帝工人的武装。国民党封闭工人的反帝组织，禁止工人义勇军的组织，阻止工人到前线上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社会局押解工人出境。在几十万工人的威胁中，吐出一点口中的肉骨，派工贼走狗到沪西去发米票子，使工人为一升米，终日在马路东奔西走的找米铺，企图使工人在它那一升米之下驯服，以解除工人的武装斗争，消减工人的组织。资产阶级的先锋队——托陈取消派，是用这样的好话来答覆工人的武装问题：

“王——说到武装，枪在那里，饷在那里？

李——不错，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有办法。我们的团体组织好了以后，马上就成立工人政府，军饷、军械，就向地方征发”（见取消派工人报第五期“对话”）。

为了工人武装问题，取消派替帝国主义、国民党向工人慷慨的允许了一个“工人政府”（？）。但是它已经清清楚楚的警告工人，现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是一毫也不能动的，不能夺取武装来反抗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工人的武装要等待取消派的“工人政府”成立之后，“就地征发”的。

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用尽了一切屠杀、恐怖、引诱、欺骗的手段，来企图消减工人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解除工人的武装组织。国民党竟尽了日本便衣队的任务。

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从扩大在业工人的罢工运动，坚决的领导厂内的失业工人要救济、要饭吃、要房住、要米的斗争中，努力开展武装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广大的组织工人义勇军到前线去，联合革命的士兵，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到战区中去，夺取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武装自己，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杀拘捕，夺取它们的武器；武装保护工房，武装保护苏联的工人组织，武装工人；没收日货，没收投机奸商的粮米来救济工人。……彻底的揭破国民党社会局取消派一切反动派别的欺骗，使工人了解彻底的挽救工人的死亡、失业，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

权，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有些同志用工团主义的观点来领导失业斗争，以为失业斗争唯一的问题，就是要米，有了米什么问题也解决了，米就是斗争的目的。对武装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消极。这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放弃武装工人的任务，而只是领导工人每天在米袋里兜圈子，这恰恰是中了国民党的阴谋，作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的俘虏。

我们重复的说：领导工人要救济、要饭吃、要屋住，这些斗争，我们一刻也不能放弃，而且要加紧领导的。我们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放弃了群众的切身问题而空喊罢工，空喊反帝；但同时我们仍必须反对那些放弃武装工人、发动工人武装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机会主义。那些人只看见米袋米票子，看不见帝国主义的大炮飞机；他们只知道米可以烧饭，不知道米不能抵抗大炮的轰炸与屠杀的。

(二)放弃了组织在业工人的罢工，是一刻也不能允许的。

"强有力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只有开展在业工人的罢工运动之基础上，才能上升和组织起来"。但是许多同志将职工运动的中心，只限在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中，而对于组织和发动在业工人——特别重工业市政交通工人的罢工，来配合失业工人的斗争，以扩大反帝运动，是放弃了的。电车、公共汽车、中国纱厂、印刷业、卷烟业中许多可能实现的罢工，而我们没有努力去组织的。邮务、报馆、法商、华商、出版业等黄色工会的斗争，我们是置之不理的。对于黄色工会的工作的怠工，已至无可允许的程度。有许多区委没有真正的去推动支部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罢工。许多工会工作同志没有将罢工问题摆在他的工作日程里。对于黄色工会，即使连黄色工会的会址是在何处，也是不晓得的。许多罢工的教训，是不研究的；许多罢工中错误的，根本不去注意。许多同志在会议上可以说出许多批评，乐意接受一切决议，但是他以为这些决议与他领导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他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放弃总同盟罢工的口号，他可以不必去实际的坚决的进行罢工运动的一切工作的。这不仅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而是根本不相信只有开展无产阶级的罢工浪潮，才能强有力的组织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战争。这种现象是一刻也不能允许。党与工会必须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放弃罢工，空喊罢工、罢工运动的一切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根据中央屡次指出的一切策略和方法，(参看"红旗"、"斗争"关于罢工的文件)，到企业中去，到黄色工会中进行坚决的工作，这是比任何时候都迫切的。

(三)坚决反对取消青工女工工作的倾向。

在会议上在口头上，谁也说青工女工工作的重要。提起纱厂工作，谁也说，女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厂在沪西登记的工人，有百分之九十的女工。事实尽管如此，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一样可以将青工女工工作放弃。如果青工女工自动走来工作，还可以骂他们与整个工作对立。青工女工之选出代表到工厂去，负责人可以回答他们没有工作分配的。女工代表到罢工委员会去，可以骂她"只会吃饭不会做事"。女工的代表到工厂去解决问题，我们的同志可以置诸不理。工厂在沪西的工作，一方面将百分之九十的女工群众放弃，而同时常常怀疑，为什么他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呢？有的同志不去积极的指导作青工女工工作的同志，却天天怨他们，为什么不来作"一般的工作"呢？工厂的章程可以漏去青工女工的组织，这样竟是可以在代表大会中通过的。取消青工女工工作的倾向，不仅是个别的同志，几乎整个组织是这样的。这种现象，是要彻底的肃清，一分钟也不能延缓的，必须立刻动员上海整个的党、团、工会从观点上、思想上，肃清青工女工工作的取消主义，坚定的在企业里、黄色工会里

进行青工女工的工作，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的成绩。随时纠正党与工会的同志在工作中的错误，努力去领导青工女工工作同志，随时加以工作上策略上的指示。厂委、罢委、赤色工会，要努力的吸引青工女工来参加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团结广大的青工女工在厂委、罢委、赤色工会的组织里；建立强有力的青工部、女工部，建立青、女工的代表会议，成立下层的青、女工的组织，发动青、女工为特殊利益而斗争；吸引积极的分子到厂委、罢委、赤色工会作事；用极大的努力组织少年先锋队，组织女工反日战争救护队、慰劳队，发动女工到兵士中、伤兵医院里去宣传士兵；向男工说服忽视女工、青工的错误；举办青工女工单独的刊物，从实际工作中来彻底肃清取消青工女工工作的错误。党、团、工会要时时检查青工女工工作的成绩，经常来讨论计划青、女工的问题。

（四）放弃组织赤色工会，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有些同志，以为现在的工人反日会，就是赤色工会，因此不必去另外组织工会，这完全是取消了赤色工会的错误，这完全是不了解它的意义和性质。工反绝不是赤色工会。它是在反帝的纲领上，下层统一的基础上，一个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反帝的组织。它是要向着争取工人苏维埃的前途去发展的。所以它的任务、纲领、组织，是与赤色工会不是相同的。加入这个组织的工人，不一定是赤色工会的会员，即使不愿加入赤色工会，而赞成反帝国主义的，是一样可以加入。它完全不能代替了赤色工会，相反的赤色工会要在工反中起中心领导作用，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加入赤色工会的组织。正因为我们把工反当作一个赤色工会，所以一方面使工反没有克尽它反帝国主义的主要任务，而另一方面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是放弃了的。另有一种观点，以为当赤色工会尚不能公开存在，还是没有广大群众的时候，工联可以名议上存在，实际上可以不要，作工会工作的同志完全可以到党内作工作去，只要党、团作职工运动就可以的。至于深入黄色工会建立革命反对派的工作，去夺取黄色工会的会员到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现在是没有开始。上海事变后，全总、工联、省委，即使一个企图也没有的。这些取消赤色工会的错误必须无情的斗争，立刻的在工反的广大的群众中，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公开的活动，吸引工友积极干部及广大群众大批的加入赤色工会。深入各个企业里，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赤色工会，坚决的在黄色工会中进行建立反对派的组织，是不能再推延一分钟的。要反对那些不敢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敢去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不去广大的吸引群众加入赤色工会，而采取脱离群众，秘密狭隘的方式，在亭子间里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同时一样要反对口头上赞成赤色工会，而不去真正的到群众中努力组织的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五）包办一切，官僚主义，代替了群众的积极性。

一切工作“面向群众”，发展群众最大限度的积极性，是我们领导群众斗争最大的关键。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是“面向群众”，而是背着他们，代替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是以包办来代替一切的。罢工委员会不发动广大的群众选举，可以由一小部分工人或委任产生之。即使群众选出来的委员，也毫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也不去团结他们在罢委中领导工作，而用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代替一切。全上海的代表会，真正能够代表多少群众，每个代表是否都是群众选举的，这个我们是不问的。代表大会，我们可以包办的：各种问题，照着我们工作人员所准备的说一遍，即可了事；群众要详细讨论救济问题，援助他们本厂的问题，我们是不管的；群众通过致苏维埃政府、职工国际的电报，我们可放在腰包里；大会选出的委员，我们并没有真正团结他们在委员会中作领导工作；我们要派人去包办一切，即使买一张纸，刻一

图章，我们也不放心群众去作，但是我们同志去登一个广告却要两星期。工厂的同志会发命令，群众的情绪他是茫然的。工厂的纠察队的会议，可以不经过同兴罢委、同兴纠察队决定，取消同兴纠察队的维持费。我们的同志，不坚决的与各厂工人发生关系，而只相信我们派去各厂的组织员，要他们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各厂的领导机关的影响，至多仅及于一部分的群众，而与大多数的群众是脱离关系的。这样怎么希望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呢？我们必须与不相信群众，包办群众的工作的官僚主义的方式和委派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一切的工作向着群众，发动广大的群众来讨论他们的问题，选举他们所相信的领袖到斗争的领导机关中去。工人反日会、罢工委员会，必须是群众的。要经常召集群众大会代表会议，各车间各部门的会议，青工女工的会议，纠察队等等的会议；它每天向群众作报告，一分钟也不失去与群众的联系；它感觉着群众的脉息，它了解群众的情绪，它知道一切缺点和弱点，即使群众发生一点动摇，它会马上的消减下去。党的领导，不是包办，要运用党团的作用来领导的，对于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要依据广大群众来解决的；群众一切的提议和决定，我们是要十分的重视。我们完全用不着官僚的方式，用不着包办来代替群众的积极性的。官僚方式、包办，是障碍群众积极性的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只有群众自己从斗争中工作中才能提高的。

这一机会主义的来源，主要的是对于目前政治上的估量不足，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不相信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也就不能在工人运动中加紧扩大深入的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使反帝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与罢工运动失业斗争密切的联系，不能在工人群众中彻底揭破国民党资本家一切反革命派别进攻欺骗工人的阴谋，特别是反黄色工会的工作是完全怠工的。这样，我们便不能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党的政治主张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党与工会，只有彻底的与一切工会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作无情的斗争，彻底的肃清工会工作中的错误，才能在这胜利的环境中完成国际所指出的“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任务。

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职工运动的严重的不可忍耐的现状，我们在组织与领导罢工运动中的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战斗上的消极与无能，与罢工斗争领导中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

共产国际执委以最清晰与尖锐的形式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任务：建立真正的铁的红军，建立强固的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在非苏区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经济政治战斗。共产国际执委特别着重的指出了：必须坚决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对于中国的职工运动的决议。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屡次着重地指出，“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职工会在目前发展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必须动员群众去为日常要求而斗争，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系起来：增加工资的问题——正当现在银钱跌价，物价腾贵资本进攻减少工资的时候；工作时间的问题——正当着现在苏维埃区域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后；社会立法的问题——正当苏维埃实行这些立法之后；失业津贴的问题——正当着现在失业增加的时候；还有劳动条件工人待遇以及一切关于工人的问题——都可以并且应当成为斗争的出发点。现在工人武装队的问题，当工人群众看见红军正在发展的时候，自然和以前更不同了。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赤色工会的扩充会员，共产党的征收党员，可以并且应当比以前更不同的去进行，因为苏维埃的胜利，以及一般的政治经济的环境，都提高了工人斗争的情绪”（共产国际）。“目前最主要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最大的工业中心组织无产阶级的群众，吸收他们加入赤色工会，及扩大阶级斗争。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对苏维埃运动最实际的帮助与巩固它的胜利，并且把苏维埃政权发展到主要的工业中心去”（赤色职工国际）。

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这些指示，到中国来已经一年多了，党和赤色工会实行了这些决议没有？在这猛烈的罢工巨浪中，赤色工会到底领导了几个重要罢工，和怎样领导了这些罢工？赤色工会发展和巩固怎样？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方面有什么成绩？在黄色工会中建立了几个有力的反对派？对于迅速增加着的失业工人群众中，进行了些什么工作？怎样组织他们的要求失业津贴的斗争？怎样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斗争的联合战线？赤色工会怎样地去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在目前极端胜利的环境之中，我们对于武装工人具体地做了些什么？假如这样的考察我们的职工运动，那末就不能不承认目前赤色工会的工作，是在极端严重的绝对不能再忍耐的状况之中。首先从罢工战斗的问题说起：客观环境是十二分的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的，革命危机正在全国的范围内以极大的速度生长着、开展着，工人罢工斗争的强烈的浪潮与革命危机一般的增长密切的互相错综着，而成为革命危机

生长组成部分与主要标志之一。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的加紧，空前的水灾，中国的经济危机深入到我国民经济的总浩劫，帝国主义及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正以一切经济浩劫的痛苦的重担，放在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的身上，企图以更残酷的惨无人道的榨取与剥削劳苦群众的血汗与骨肉来抵偿经济危机的损失与找寻经济危机的出路。资本疯狂般地进攻着工人的生活水平线，减低工人的异常微小的不能一饱的工资，取消月赏，延长工作时间，大批的开除与掉通班。这使几十百万的工人群众失业、流浪、饥饿，使别的几百万在业的工人，在机器的轮子橡皮带压榨之下，度着半饱的生活。这不能不唤起工人群众的愤怒、抵抗与斗争的决心。别一方面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光荣的胜利，苏区工农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更加提高工人群众的战斗的情绪，给他们以斗争的信念与决心。苏维埃与红军以自己的光荣的斗争给全国工人阶级指出脱离灾荒、失业、饥饿与资本剥削的革命出路，吸收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走入坚决战斗中去。最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侵略，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投降，直接地打击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满洲、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军事行动与日厂的关闭，使几百万工人及其家属失掉生活的维持和简陋的住室，号泣在风雪之中，承受着空前的灾害、饥饿、疫疠与死亡。这不能不使工人群众与失业工人的经济战斗，十分密切的关连到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统治的总的斗争上去。

国际与国内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环境决定了目前全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有力的高涨。恰恰与机会主义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不能罢工的胡说相反，中国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队伍（上海的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矿工，天津的市政工人与纺织工人，河南的兵工厂工人，津浦与北宁路的铁路工人，外洋与长江船的海员，四川的盐井工人与纺织工人），都卷入于汹涌的罢工浪潮之中，在许多产业部门之中爆发产业的同盟罢工（上海丝厂，招商局海员，唐山五矿），在别的一些部门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纱厂与市政工人）。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黄色工会的一致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罢工的浪潮粉碎了国民党政府接一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冲破了警察的弹压与黄色工会官僚的破坏，而在全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心与部门中震荡着。斗争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常常转到与警察肉搏与冲突，在某些罢工中，罢工工人甚至企图解除那些去弹压罢工的警察的武装（如吴淞永安等）。工人阶级依据着自己的团结、坚持与英勇，在许多罢工中得到了胜利或者部分的胜利（北宁路，唐山五矿等），无情地揭破了赤色工会中某些领导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罢工或一二厂的单独罢工不能胜利的胡说的机会主义的性质。在高涨着的罢工浪潮中，一切经济的斗争都带着很尖锐的政治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个别的城市中爆发了反日的总罢工（太原）；在日本经营的企业中不断的发生反日的罢工与退职。所有这些都证明着，不管在剧烈的经济恐慌之下，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的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罢工斗争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退资本对于工人生活水平线的进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的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信心、决心与革命的持久性。"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运动，在非苏区之中不仅是进到组织群众的第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第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我们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之中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恐慌之下，只能进行总同盟罢工与同盟罢工而不能组织个别工厂罢工，与个别工厂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观点，是极端危险与极端有害的，同样是腐朽的机会主义的观点——陈独秀主义的观点认为工人

阶级的斗争在现在的阶段上只有资本进攻的防御的性质，或者工人群众不愿意斗争，即使斗争时亦只进行合法的斗争。不坚决无情的打溃这些可耻的机会主义观点，那我们就不能“在非苏区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争，并且在这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组织群众”这方面前进一小步。

而我们的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却正陷于这种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因之使赤色工会不能成为猛烈高涨中的罢工斗争的组织者与发起者。极大部分的罢工成为自发的，没有我们的领导，有一部分的罢工并且在出卖工人的黄色工会的“领导”之下。赤色工会机会主义的领导的消极与无能，帮助了黄色工会官僚可以用假的领导来使斗争失去真正的领导，来阻碍斗争的发展。与引导斗争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有一小部分的罢工斗争是在赤色工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但是这些斗争多数是失败了的——不仅在斗争的直接的物质上的结果方面，而且最主要的是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去提高群众的政治自觉方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罢工的准备与进行之中的许多错误与缺点，许多“左”的右的机会主义的犹疑和动摇。

真实的布尔塞维克的准备工人阶级战斗是没有的。党与工会的领导机关没有成为罢工的组织者与发起者。在我们队伍之中，还存在着领导罢工是赤色工会的任务，不是党的任务的观念。工厂支部或者一般的没有提出与讨论罢工的问题，或者只抽象的总的罢工的问题，而不与该厂的实际的条件配合起来，甚至在许多时候支部在罢工斗争紧张的时候，还站在斗争的旁观地位。工会的指导员常常轻视支部，不经过支部去“领导”争斗。因为没有企业中的艰苦工作，因为支部没有经常的讨论罢工问题，因为党和赤色工会没有成为罢工组织者与发起者，所以罢工斗争常常成为自发的，出于我们意料之外。党和赤色工会只有事变已经采取了锐利的性质的时候，才想到准备罢工。而机会主义者，却在斗争已经极端尖锐的情况之下，以罢工须有长期准备的口实来阻碍罢工的爆发。我们必须打击罢工必须准备的观点，及以准备罢工的口实阻碍罢工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党和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应该成为罢工斗争的组织者，工厂支部应该成为准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战斗的保垒。“准备罢工首先就是和一切工人和女工讨论一切使他们不安的问题，拟定具体和清楚的要求，创立选举的斗争机关，吸引一切利害相关的工人和女工来决定与罢工有关系的问题，提拔最好的最积极的工人参加罢工的领导机关，发动革命职工运动的一切力量”（洛佐夫斯基）。

清楚、具体，为每一个罢工工人所了解的罢工口号与要求，这对于罢工的胜利有决定的意义。而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则常表现着许多党和工会的领导者完全不知道怎样去提出具体而清楚的要求，常常不去深入群众，不小心了解一切工人不安的问题，不仔细去考察群众的要求，不经过群众，不依据在群众的积极性上，而在脑子中与亭子间中来替工人群众决定罢工要求，以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强制地“联系”在要求之中，要工人为它斗争（如神州国光社的罢工要求中），甚至在这些口号与要求之中，可以完全的抛弃工人的日常的小的或大的要求（兵工厂的罢工要求等），而要求工人为着那些机会主义的政治口号而斗争（如三友三月五日的口号，没有一个经济要求而放着许多机会主义的口号，如工人劳苦群众自动接收反革命武装等等），这当然不是领导斗争而是破坏斗争的最好的方法。

许多党部和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还不懂得党的基本的政治口号、赤色工会纲领与每一个具体的罢工要求的区别，常常将他们混合在一张纸上而成为不可分辨的糊涂账。在提出罢工条件的时候，常常有愈多愈好的倾向，以至每次罢工的要求，至少有一二十条，使工人不

知道为那一条而斗争，实际上是这些领导者不知道工人真正的要求是什么。罢工要求常常是最空洞、模糊、浮泛的空条件（如"年关双薪"不说多少时候，一月？一星期？"增加工资到能维持一般生活费"(上海女工代表会议的要求纲领)，"反对工头与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海总)，"反对无故开除工人"之流的谁也不懂得的要求)。一般情形之中，青工女工的特殊要求是没有包括到罢工要求之中的。罢工要求常常是不经过群众讨论的，或者是在所谓"赤色群众"中形式上讨论一下就算了事。

经济斗争带着明锐的政治性质是目前罢工浪潮中的明显的特点。所以和经济斗争相关联的正确的政治口号，提到对于罢工斗争之政治要求，有极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许多的错误，常常将党的总的政治口号强制地放在罢工要求之中（在河南兵工厂的罢工中，省委提出的要求中，将打倒出卖中国工农给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打倒压迫中国工农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及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等等，都一起的放在罢工要求之中；又如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要求中有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总同盟罢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上海，及建立反日宣传刊物，反对社会民主党主张等五六条，这一类的例子是很多的，很多同志认为这就是政治口号与经济要求的联系，这是使罢工政治化，实际上这是糊涂账，这是破坏罢工)。我们的任务并不是把每一个党的基本政治口号强制地放在罢工要求之中，而是在于用一些具体的政治口号，或者是对于这些罢工的有明显联系的，或者对于所提出的经济要求有明显联系的，来扩大斗争的纲领，以便能加强经济罢工的斗争，并提高它的革命意义。

群众选举的，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罢工委员会，是罢工胜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罢工委员会应该是群众选举出来的；它每天应向罢工工人报告；它一分钟也不能脱离群众；它应该知道罢工工人的情绪，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一切运动的强处和弱点：只有这样，罢工委员会才能领导罢工走向胜利。但是在我们职工运动的实际中，常常不发动广大的群众来选举罢工委员会，而由少数的工人选举之，或者简单的委派之，即使由大多数工人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我们亦不会去团结他们，使他们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而是轻视他们，忽略他们，由我们赤色工会的"工作人员"来英勇地包办与代理一切，即使最小的技术工作，亦不让群众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来做。这种不相信群众的委派与包办的"领导"，在工友中发展到不可忍耐的地步。这种机会主义的轻视群众，官僚主义的对付群众间真正的领袖，是在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中扩大地流行着，他们悲观失望地呼喊"干部恐慌"，而在几千几万罢工浪潮中流现出来的新的干部，积极的工人，都被机会主义重担压制着不能发展。

在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方面，情形同样是十分恶劣，特别是与敌人组织之中的会员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与工厂中的统一战线。在许多罢工中间我们对于熟练工人常常采取蔑视的态度，因而罢工不能得到胜利的结果（海员，公共汽车)。在黄色工会与其他敌人组织中的反对派的工作还没有真正的开始。这里表现着或者是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黄色领袖，主张在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罢工委员会去加入黄色工会(上海)，派自己的会员去加入为工人群众所激烈反对的"官僚机关"中去建立"赤色小组"革命反对派（全总)，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与黄色工会委派的代表团建立统一的战线(上海永安)，或者是表面上"左"的而实际上一样机会主义的放弃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主张以少数的赤色反对派自动退出黄色工会(上海大东)，与宗派主义的敌视一切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反对黄色工会领袖的斗争，常常仅仅限制在最普遍的一般的空话，"他们是出卖工人利益的工贼"等等，反而对于黄色工会官僚的

具体的出卖工人的行动和把戏不加丝毫注意。而实际上，我们应该最具体的揭破黄色工会官僚的每一个提议，每一个具体步骤，不使他们能够休息，使他们难于玩把戏。在一切地方，在企业中，在工房中，在黄色工会中，我们应该将革命的职工运动的政纲和策略与国民党的政纲和策略对立，将群众动员起来，环绕在工人运动的许多基本的问题周围，并且将这个问题与国民党的政策联结起来（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问题，反苏联问题)。广大的在群众中宣传与解释苏维埃的法令（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等等)，将他们与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对立起来，在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上，在揭破黄色工会的官僚上有决定的意义。因之，特别有害的是那种轻视苏维埃法令的机会主义观点，以为劳动法是争取工厂法实施的“参考材料”(全总党团)，这是公开的向国民党与赤色工会的投降。

赤色工会应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反对派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目的绝不是占领黄色工会的机关，绝不是单纯的反对或驱逐几个黄色领袖，而是争取在黄色工会中的广大的会员群众。在坚决的反对与揭破黄色领袖的叛卖工人利益的时候，我们必须以同志的态度来对待黄色工会普通的会员，将黄色领袖每一个把戏、活动、言论，在这些会员面前揭破他们，争取这些群众到反对派方面来。必须在统一的斗争纲领上与黄色工会，及其他敌人组织中的会员群众进行下层统一战线，一分钟也不放松反对他们的叛卖工人的领袖。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坚决的为着工人的经济的日常要求而斗争上，在坚决反对叛卖工人的改良主义的领袖的斗争中，赤色工会才能够夺取大多数的黄色工会会员到自己方面来。

赤色工会是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桥梁。巩固现有的赤色工会的组织，把散漫的各厂组织集中起来，组织地方生产工会，用一切力量与革命速度去征求会员，建立新的工会及工厂的小组——特别是大的重要的企业之中，这是职工运动的主要任务之一。然而目前赤色工会的没有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在罢工斗争极端尖锐的现在，赤色工会的会员数量是没有增加，许多地方反而削减了；与群众联系非常薄弱；组织上的散漫、混乱的状况依然存在；赤色工会的工作没有深入到企业中间，在重要产业部门中，赤色工会的发展是特别的恶劣。全总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绝对没有了解巩固和发展赤色工会的重要性，存在着许多对赤色工会的消极观念，认为工人反日会就是赤色工会，以为秘密的赤色工会是不关紧要的，因而主张取消赤色工会，取消全总，甚至提议恢复立三路线组织的方式。

利用目前胜利的环境，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存在，组织工厂委员会和一切附属的组织来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个任务在目前是比任何时候来得急切，但是机会主义者对于这个任务的执行是消极的。他们不去为实现这一任务而斗争，反而提出各种奇怪的机会主义的主张，提议组织介于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公开工会”(“灰色工会)。最坚决无情地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观点，艰苦地创造与组织地方的生产工会巩固赤色工会的组织，发展会员，组织工厂委员会与一切附属组织，是真正的保证党及赤色工会对于开展着工人斗争领导的前提，是保证在黄色工会工作开展的先决条件。

取消主义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取消女工和青工工作方面。不管在轻工业之中女工与青工占工人成份的绝对的大多数，及他们积极性的增长，机会主义者对于青工女工在阶级战争中的作用不可允许的轻视，而且表现厌恶青工与女工的态度，认为女工与小孩子是没有用的。全总在几个月的过程中，不与青工部发生任何关系；工会的章程没有一个字说到青工女工；女工代表会选派自己五个女工代表到工会理事会去，工会认为无事可做而拒绝了。这些情形

是再不能忍耐的。党赤色工会和青年团必须以极大的力量为争取广大的青工与女工而斗争，为提高青工与女工在斗争中的积极性与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斗争。

在严重经济恐慌打击之下，几千百万的工人群众被赶出了工厂。在这广大的饥寒交迫的失业工人之中，赤色工会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领导失业工人争取失业津贴斗争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没有系统的领导失业运动；没有定出失业工人要求纲领；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斗争的联合战线，完全没有建立；在罢工的要求之中，没有包括失业工人的要求，没有吸收失业工人参加罢工的领导机关与纠察队等等。没有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的一致联合战线，则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这在许多痛苦的经验上已经证明了（公共汽车，阿坦姆船），但这还没有被赤色工会的领导者所了解。在上海关厂的日本工厂的失业工厂工人中的工作，虽然有了一些的进步，但是在这个工作亦发展着机会主义的路线，将失业工人的斗争限制在募捐与要求的斗争，而不将群众斗争引导到反对整个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上去。

机会主义者从对于目前革命情绪悲观失望的估计出发，走到对于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走到向黄色工会领袖屈服与投降，走到企图复活早已破产了的立三路线组织方式，最后，一直走到纯粹的工团主义的将经济与政治分开，走到纯粹的经济主义，拒绝参加和领导政治的斗争。对于蓬蓬勃勃在全国范围内高涨着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工会的机会主义领导完全采取了冷淡与旁观的态度。在全总的职工指南——指导职工运动的理论刊物上没有一篇关于组织和领导工人反帝斗争的论文，甚至上海民众要求工联去参加与领导的时候，工联的机会主义者回答说："我们忙于经济斗争的领导，没有工夫"。这完全不是偶然的现象。三友的领导可以用发米的口号来抛弃三八纪念的工作，二七的纪念可以在因为旧历新年而没有任何工作，甚至在日本的巨炮隆隆中，下层的工人组织中在繁琐地争执着用经济的口号去组织罢工？或是反日的口号？而全国总工会呢，在一个月之久曾经开了一次会议，任何具体的组织与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步骤，没有讨论它。当然很明显的，一切国际和党所提出的许多战斗的任务，利用目前的情势开展反日罢工，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组织以工人为骨干的义勇军，开展独立的抵制日货运动，向广大的群众进行拥护红军和苏维埃的宣传，反对进攻苏联等头一等任务，机会主义者也是不了解的，忽视的，丝毫地没有进行任何坚决的斗争来实现这些任务。

上面所说的便是在工会的领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这个路线是与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机会主义者采取惯用的两面派的手段来对付国际和党的指示，当着中央和省委批评工会领导者错误时，他们口头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完全同意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而实际上则对于执行这些指示完全怠工。机会主义者同时又用官僚主义者的压制手段来对付工会中的下层积极分子的正确的自我批评。

这是目前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这机会主义路线阻碍职工运动彻底的转变，制造成目前工会工作的严重现状的真实原因。向着右倾机会主义，集中布尔塞维克的火力，是实现国际和党的总路线的先决的前提。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对于倾向的嫉恶，来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及对它的自由主义的态度的斗争，反对一切对于目前情形的估计不足，反对一切对于职工运动的悲观失望的情绪。

中央认为职工运动的真实的彻底的转变，应该在工厂工会与罢工的口号之下进行。应该将我们的工作深入到企业中去建立我们在企业中的强固基础。应该将党和职工运动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赤色工会，发展赤色工会会员及争取黄色工会会员群众方面去。应该将一切我们的力

量用来准备和领导工人阶级经济政治的罢工上去，一切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应该成为工人群众经济政治战斗的组织者。

中央坚信全党同志将一致的团结在国际和党的路线周围，给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克服这些机会主义的动摇，开展着对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走向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鲁　迅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

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象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

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象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象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理论纲领

（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

从二月十六日由仃留上海的新文学运动者开了一讨论会，在会中产生了一个组织国内左翼作家的筹备委员会，只二星期间便有一个“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三月二日开的，加入联盟者有五十余人，当日到会者有四十余人。大会上的情形，是在诸联盟员的热烈的演说后，即通过联盟的理论的纲领，成立常务委员会，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创刊联盟机关杂志，参加革命诸团体等等的提案。

兹将联盟的理论纲领录载如下。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大会通过）

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倾向进步的方向勇往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艺术才能够焕发它的明耀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家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然而，我们并不抽象的理解历史的进行和社会发展的真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那么，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新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

联盟正式成立之后，即已开始积极工作，如各研究会均已相继成立，并机关杂志亦

不久即可出版，杂志名“世界文化”，代发行所为泰东书局。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我们期待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伟大前途！

（原载《萌芽月刊》1卷4期，1930年4月1日出版）

〔附〕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和反动政治的斗争[1]

丁 易

自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新文艺这支文化部队，就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随着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这部队就被反动势力分割开来，一支在苏区，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和兵农结合。另一支则以上海为中心，在地下党领导之下，和反动势力作顽强的斗争，这就是一九二七年以来的革命文学运动。

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大概是这样的：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率领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农红军深入农村，领导湘赣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的根据地。半年工夫，就在闽西、闽中、赣南等地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和游击区，组织了几十万地方武装。同时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一些同志纷纷的在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起义，创辟解放区，建立了人民革命政权和红军。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毛主席亲自起草了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决议，确立了建党建军的整套理论与原则，在文学方面则确定了和兵农结合的方针。等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解放区已建立有大小十五个，散布在江西、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安徽、河南等省，每区占有一县到数县不等，正式红军有十三个军，六七万人，到一九三一年竟达十万以上。

这一革命胜利的高潮以及文学和兵农结合的初步的具体实践，在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区域内引起了新文艺运动更进一步的高涨和发展，这高涨和发展便是要求新文艺运动必须配合革命胜利的形势，使之深入群众，更有效地来执行它的宣传革命的斗争任务，不能再停留在书斋讨论纸上空谈之中了。

标志着这一高涨和发展的，就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内与党外进步作家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

必须指明，没有这一革命胜利形势的鼓舞，左翼作家联盟是成立不起来的。

当然，除了这一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因素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这首先是一九二八年以来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特别是苏联的文艺理论的书籍大量的输入。鲁迅说得好：“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列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以这些理论为基础，互相切磋探讨，提高了中国作家的政治水准和艺术水准。首先指出这种理论输入重要性的也是鲁迅，他说：“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涂。对于

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的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这样鲁迅便先后译出了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以及蒲列汗诺夫的《艺术论》，这些书在今天看来，观点方法上都存在有一些缺点，但在那时对中国新兴文学理论基础的初步建立，仍是有着很大帮助的；这以后，太阳社、创造社和其他进步人士也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这些对左联的成立都有很大影响，也是"左翼"成立前的理论准备。

其次通过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发生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大家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检讨了过去的一些错误，意见也渐趋一致。而这时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新月派，也大举向革命文学进攻，对太阳社、创造社和鲁迅都表示了敌对的态度。于是大家都认为一个小集团或个人的单独活动是减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也不能和社会革命运动的步调配合一致，因此就感觉到迫切需要在同一的目标之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了。这也是促使"左翼"成立的一个因素。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大家就迫切地感觉到有仔细商谈研究一下的必要了。于是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下午，鲁迅、沈端先等邀集了在上海从事新文艺运动的人开了一个讨论会，到会的有十二人，讨论题目是"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对于过去的运动讨论结果，认为有四点应当指摘：(一)小集团主义乃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的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而文学的运动。其次对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认为最重要者有三点：(一)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的严厉的破坏；(二)新社会的理想的宣传及促进新社会的产生；(三)新文艺理论的建立。讨论结果，全场一致认为必须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从事这一运动。于是在讨论会上便成立一个组织国内左翼作家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组织一个左翼作家的团体。

筹备委员会工作了只有两个星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便正式成立了。成立大会是在三月二日下午二时开的，参加联盟的有：鲁迅、茅盾、郁达夫、沈端先、画室、钱杏村、丁玲、蒋光慈、冯乃超、田汉、李初梨、柔石等五十余人②。当日到会的有鲁迅等四十余人。大会上通过了筹备委员会拟定的纲领，成立了常务委员会，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生左翼文艺的国际关系、发动左翼艺术大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等十七件提案。

当时通过的理论纲领全文如下：

社会变革期中的艺术，不是极端凝结为保守的要素，变成拥护顽固的统治之工具，就倾向进步的方向勇往迈进，作为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只有和历史的进行取同样的步伐，艺术才能够焕发它的明确的光芒。

诗人如果是预言者，艺术如果是人类的导师，他们不能不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然而，我们并不抽象的理解历史的进行和社会发展的真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变成人类进化的桎梏，而其"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负起其历史的使命，在这"必

然的王国”中作人类最后的同胞战争——阶级斗争，以求人类彻底的解放。

那么，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这是当然的结论。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的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其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我们的理论要指示运动的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新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外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

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

这理论纲领后面还附了一个行动纲领，其主要点是：(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同时决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针是：(一)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二)帮助新作家的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三)确定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四)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五)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

总括这个纲领看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有两个重要意义：首先它是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去领导并发展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其次是加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透过文学这一艺术武器，去做宣传鼓动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走向革命阵营。

至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的任务，鲁迅在成立大会上曾经很正确地指出③：“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第二是“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是“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第四是“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提出这四点，在当时都是极其重要的，后来左联同人也都朝这方向努力，有的是很好的完成了，如新的文艺战士的培养就做得很好，左联时期出现了大批的新的优秀作家。这些作家，绝大部分到现在还是文艺岗位上的勇敢的战士。也有的做得不很够，如战线的扩大，由于当时受了左倾机械论的影响，形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战线是并没有怎样扩大的。

鲁迅指出的这四项任务是带有一般性的、原则性的，至于文艺理论的建设方面，潘汉年更具体地指出了四点④：第一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宣传与斗争。……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介绍外国已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可是一方面一定要加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在这两重工作中，才能够产生与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配合一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同时只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宣传，才能更快的摧毁一切反动文学理论的存在，……我们丝毫不能忽略这一理论的斗争”。二是“确定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理论的指导。我们单是发展文学本身的理论还不够，一定要注意到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理论的指导，就是说文学运动与政治斗争任务的联系实际要怎样？举例说，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过去我们的运动与这配合是非常不够，……总言之，

要确定斗争的策略与路线"。三是"发展大众化的理论与实际。作品大众化应该成为目前运动的中心口号。……目前中国工农斗争的勃发，正需要我们创制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作品，就是说，经过文学艺术的煽动与教育，加紧的鼓励他们斗争的勇气和情绪。当然，同时我们并不取消争取与鼓励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作，但是在目前工农兵大众斗争长足发展的时候，用合于他们文化水准的文学艺术去鼓励与煽动，是迫切主要的工作"。四是"自我批判的必要。自己阵营内工作的检讨与批判，将加强我们运动的成果。要防止整个阵营中发生那些不正确的错误倾向的发展，只有坚决实行自我批判，才能够不歪曲我们前进的大道"。

这些任务后来大体上也都实现了。如对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研究，当时便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以及普罗诗社、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和以后的一些进步文艺社团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中心指导的。而当时左联机关刊物如《萌芽》、《拓荒者》、《文学月报》、《北斗》等⑤也都在这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至于大众文艺的研究，当时曾作为中心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而反动文学斗争如和"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和"第三种人"文艺的斗争，都有很好的成绩。

不过，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左联和当时的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以及和反动政治顽强斗争这一点。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提案中便有：参加革命诸团体，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分会，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参加工农教育事业等。左联成立后便加紧这项工作，如五月间便派代表参加上海五一筹备总会，还组织了分会，发动参加种种纪念五一的活动⑥。又派代表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筹备组织苏联文化参观团，帮助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的斗争活动⑦。而且有不少的作家走到工厂里面从事实际革命活动。

当然，左联这些革命活动，并不是无组织无领导进行的，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当时简称文总）对于左联的领导作用，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它是由左联、社会科学作家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新闻记者联盟、世界语联盟、电影员联盟、话剧演员及美术工作人员⑧等联盟合组成的。成立后，它便领导并且发展了当时的中国文化运动。到一九三二一三三年间，它所领导的每个单位都拥有数百或数千余盟员不等，北京、广州等处都设有分盟。其中以左联成立最早，阵容声势也最大，而成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主力军。

左联既然有了自己的组织、纲领，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它就成为当时整个革命运动的一环，和当时许多革命团体一样，与国民党反动政治作坚决无情的斗争。当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左联的压迫也就越发厉害，而左联就在这残酷的压迫之下，顽强地反抗，顽强地斗争，而且就在这反抗斗争中成长起来，壮大起来。

国民党对左联的压迫是和当时政治军事上的"围剿"互相配合进行的。这首先是对于进步的文艺作品和刊物的出版自由，加以种种剥夺和限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在这个"出版法"里面，对于报纸、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品的限制，无微不至。到一九三一年十月，又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把"出版法"中的办法和原则，加以具体的规定。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有"宣传品审查标准"的公布，在这个"审查标准"里头，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便被认为"反动"；凡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者，便被认为"危害中华民国"。凡对国民党政府有些微不满的，便被认为替共产党张目，一律严予禁止。这还不够，一九三四年六月，又有"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的公布，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

委员会”审查；如果不送请审查，就要“予以处分”。“审查委员会”可以随意删改稿本，印出后如果发现没有照改，又要“予以处分”。这样一来，全国出版品便被压制和阉割得不成样子了。而且这些反动的“检查官”们又毒辣得很，规定凡是被他们删去的地方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使读者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使一切糊涂恍惚不通之处，都归到作者身上。

其次，便是对于图书杂志的禁止发行，左联机关刊物如《萌芽》等都相继被迫停刊。以后更大批的禁止，一九三四年二月上海一地就有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被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出售，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以至巴金的作品，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初，上海出版的《文学》、《作家》、《中流》三种文艺杂志还被禁止发售⑧。

再其次，便是对进步文化机关的破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自称“影界铲共同志会”的特务捣毁。跟着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文化机关，先后被破坏了。同时，上海所有的影戏院和书店、报馆都接到恐吓信，如所谓“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警告文化界宣言中就明白无耻地说：“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村及其他赤色作家的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和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这些暴行，都是和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事围剿”是互相配合的。

再其次，便是对于文化工作者的摧残和捕杀。一九三一年二月，著名的优秀作家共产党员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一九三二年秋，上海反帝同盟被破坏，所有到会的人都被当场枪杀了。一九三三年夏，一百五十个反法西斯大会的参加人，也被送到南京去屠杀。同年五月十四日，著名的作家潘梓年和女作家丁玲在上海被特务队绑去，监禁在南京的监狱里，并当场枪杀拒绝被绑的优秀作家应修人。而对于鲁迅的压迫和谋害更是无微不至，统计鲁迅后半世，无时无刻不在蒋介石的特务走狗们追索下过活。有的是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许绍棣请南京通缉鲁迅呈文中的话） 有的是在天天刺探鲁迅的行止，以便逮捕。直至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侦探走狗所追索的名单上，才少了一个位置。

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样压迫摧残左联，当时左联是以顽强不屈的斗争来回答它的。国民党严格地执行反动的“出版法”，但是我们的进步文艺书籍，还是可以利用种种关系印出来，送到读者手中。它查禁进步文艺刊物，捣毁文化机关，但我们的杂志和书店却采取游击式的战术，此仆彼起使它穷于应付。它严格执行“检查”制度，但我们却非常巧妙的运用文字的技巧使它检查不出来；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鲁迅的杂文在这斗争中表现了卓越的艺术天才。关于这些顽强不屈的斗争，鲁迅曾有一段极好的说明：

> “统治者……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所罗列，我们这几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

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文化"围剿"的结果，也是左联和当时革命运动紧密结合的成功。

如上所说，左联无论在革命运动方面或是革命文学运动方面，都是有着很大的贡献的，但这也并不是说它就没有缺点，今天看来，左联是存在着一些缺点的，这主要的是表现在当时左联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作风上。关于这点，后来雪峰曾予指出，说这种作风曾大大缩小了当时文艺运动的统一战线，减弱了我们的斗争力量。他说：

"这一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上的统一战线，便大大缩小，首先，我们除了显明地同情我们运动之外、便很少去策动广泛的一般作家振作起精神，来与我们共同奋斗了。那时留在左翼之外的文学者和作家就有很多，他们虽然有些消沉，对于斗争采取旁观的态度，但他们并不属于反动的文化阵营，他们也都深刻地不满于反动的政治和文化，其实都在苦闷里的，不过战斗的意志不很强；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怎样去策动他们战斗，以致没有造成更广大的统一战线。自然，在那时，这些所谓中间的人们，在当时的那种高压之下，战斗性的确是非常有限度的；但任何程度和任何形式的广泛的战斗都有力量，同时发动它是我们的责任，而统一战线是必须包括任何战斗力量在内，尤其必须发动任何的战斗力量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至于造成这种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原因，大约不外：一、由于那时反动派的大屠杀，造成空前的白色恐怖，使一般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起来，甚至和反动势力妥协，这就不得不使左联提高警惕，因而就不免狭隘一些而形成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其次呢，是受了当时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后来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在革命指导理论中，虽然不久就被克服，但在文艺理论方面，由于反动政治的阻碍，交通传达的不便，这些错误就没有能够及时的很好的被纠正，因此那时文艺理论方面也有着左倾机械论和主观教条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形成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原因。

这一缺点，当时左联自己也曾纠正过一些，象在"第三种人"问题的论战中，何丹仁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左翼批评家往往犯了机械论的（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的（策略上）错误。"(《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但这纠正当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显然是不够彻底的。这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天，应着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左联自动解散，才彻底被清算过来。

---

① 原载《新中华》第十四卷第十四期，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华版。

② 《拓荒者》(月刊) 第三期《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团体自动解散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已于三月二日正式成立了。当时到会的有冯乃超、华汉、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村、鲁迅、画室、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四十余人。……当选定沈端先、冯乃超、钱杏村、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蒋光慈、周全平为候补委员。"

③ 见《二心集》，题：《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原载萌芽第四期)。

④ 见《拓荒者》第三期，题：《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

⑤ «萌芽»由萌芽社编，光华书局出版，刊行五期被查禁，第六期改名新路，出一期又改出«文学月报»由蓬子主编。«拓荒者»由蒋光慈主编，现代书局出版，是原先的«新流»月刊改组的，第六期改名«海燕»。

«北斗»由丁玲主编，湖风书局出版。

按：左联机关刊物尚有«前哨»、«文学导报»、«巴尔底山»、«文学»、«十字街头»等；外围刊物则有«文艺新闻»、«大众文艺»、«现代小说»、«南国月刊»、«引擎月刊»、«文艺讲座»等。

⑥ "左翼作家联盟除派代表参加五一筹备总会，一方面组织分会以外，并发动以下种种纪念五一的活动：一、召集上海各左翼杂志联合出版纪念五一的号外；二、发表五一宣言；三、漫画研究会出版五一画报；四、制作五一歌。"（«萌芽»第五期）

又各杂志联合出版的«五一纪念特刊»一册，连署的有«新思潮»、«新文艺»、«艺术月刊»、«巴尔底山»、«萌芽月刊»、«环球月刊»、«文艺讲座»、«社会科学杂志»、«新妇女»、«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等十三个单位。特刊内容为«左翼作家联盟"五一"纪念宣言»、«无产阶级的五月节»、«今年五月国际的意义»、«今年的五一»、«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由五一想到四一二»、«五一纪念中两只"狗的跳舞"»——«王独清与梁实秋»等七篇，共印三万册，每一读者可索取一份。（«出版月刊»第五期）

⑦ 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斗争纲领，全文见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萌芽»第五期。

⑧ （同上）："为青年左翼画家之结合的时代美术社，是和左翼作家联盟先后成立的。成立之后，曾举行过一次公开演讲会；其后又发了对全国青年美术家的宣言（全文见«文艺界»消息）。"

又«拓荒者»（月刊）第三期«国内外文坛消息»："时代美术社是由美术家许幸之、沈叶沉、王一榴诸君所发起，这是中国的最先的一个普罗美术的集团，已经于二月正式成立了。"

⑨ 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民国二十五年时，因许多刊物抗战意识浓厚，致被禁售者日有所闻。例如是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尚有十四种杂志，遭到政府查禁，其中计有：«文季»月刊、«通俗文化»半月刊、«新世纪»半月刊、«青年文化»半月刊、«国际导报»、«时论»、«作家»月刊、«中流»半月刊、«生活星期»刊、«世界文化»、«读书生活»等。至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下旬，北平方面禁售的刊物达六十余种。"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①]

（一九三〇年）

在全世界革命斗争日益紧张。中国革命巨浪正在高涨之际，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遂成为中国每个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的切身的任务，“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句名言，是我们所应当牢牢地记住的。在这样紧张的时期，中国的一切社会思想家，实在是负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上占着胜利，在社会科学上，不必说，就是在自然科学上，也是如此。只有根据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然科学方能获得稳固的基础，脱离现在西欧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的危机，而进入新的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已经证明是贯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唯一正确的基础。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限于理论，它的伟大的特点，还在它是和实际运动相联系的，理论与行动的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谁要是空谈理论，而不作实际行动，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了。以生产手段私有制、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把否定这一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看做洪水猛兽似的死敌，资本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想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它既不能以整个思想的体系，来和马克思主义相抗，于是就假冒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使之成为自由主义的学说。这种企图，形成了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反过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引起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如取消派，托洛茨基派；他们想以表面“左倾”的辞句或明显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来涂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现时在全世界上，在中国，这都是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切身的危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幼稚的“左倾”，反机会主义的“右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谁要是不和社会民主主义作斗争，不和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托洛茨基派及机会主义派作斗争，那末，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决不能不有一种团结来光大和发挥革命的理论，以应用于实际，所以我们发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

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

三、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

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在目前要积极争取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等等的自由，我们相信只

有这样，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运动，方能扩大与深入。

我们很诚挚的希望中国一切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努力的人们，和我们一起，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来光大和发挥这个伟大的革命的理论，来促进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

---

① 原载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世界文化》月刊创刊号。

中国社会科学作家联盟简称社联，于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开第一次大会。"这次大会主要的是庆祝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成功，……联盟秘书把工作分开两方面作报告：第一方面，除开建立办公处、募集基金的工作外，主要的是筹划出版机关杂志及建立和各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关系。出版事业则决定出小丛书、杂志，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丛书等等。第二方面要把文化主义的倾向，成为真正斗争的文化机关，所以特别要注意和各革命团体的关系，就是和上海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发生很好的工作及组织的联系，使中国文化运动有平衡及普遍的发展。"（摘录《世界文化》创刊号）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

（一九三〇年）

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闭，集会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求改进自己生活的罢工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真达于极点！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

发起人：郁达夫　鲁　迅　田　汉　郑伯奇　赵南公　周全平
陈剑仇　彭　康　画　室　胡鄂公　董健吾　董维键
邓初民　予生仁　宁惇武　萧　苇　潘念之　邹孟晖
王任叔　江　朗　王学文　王安之　龙滕之　潘汉年
蓬　子　顾凤城　张磬佛　叶灵凤　陈自耀　向尧三
吴　辉　罗伯农　沈侬非　石炼硕　陈波儿　徐　华
唐晴初　沈端先　王　弼　蔡宿侯　徐耘阡　潘用之
缪长青　张人权　田寿康　张心之　黄　素　徐诚梅
彭太冲　陈正道　鄢治能

（原载《萌芽》月刊1卷3期，1930年3月光华版）

〔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一九三〇年）

一

中国的文艺界近来深深地陷入于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进程中。这种现象，在稍稍留意于中国今日的艺坛及文坛的人必不会否认。在今日，当前的现象，正是中国文艺的危机。

我们试一看我们今日的文坛艺坛，我们便可以发现这种混杂的局面。我们会看见在这新文坛时代下，还竟有人在保持残余的封建思想。中国新文艺运动底历史还不甚悠久，其被一般所接受，虽已不能否认，但从新文艺运动发生以后，至于今日，因为从事于新文艺运动的人，对于文艺的中心意识底缺乏，努力于形式的改革而忽略于内容的充实，致一切残余的封建思想，仍在那里无形地支配一切，这是无可讳言的。

同时我们看到那自命左翼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他们将艺术"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而以"……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觉为内容。……"同时，我们又看到那所谓左翼画家结合底运动，在他们的宣言里是："诸君，请看那些拜金主义的画家们，他们除了为自己的名誉和黄金，除了为自己的地盘与奢华的生活以外，从没有为了我们谋利益吧！……青年美术家诸君，诸君应该认清他们的欺骗和榨取是他们压迫阶级一贯的政策。……"因此，在我们中国的旧文艺已倾圮，而新文艺建设的过程中却产生这样意识的阶级的艺术运动。

在这样的两个极端的思想中，我们还可以看见许多形形式式的局面。每一个小组织，各拥有一个主观的见解。因之，今日中国的新文坛艺坛上满呈着零碎的残局。在这样的局面下，对文艺的中心意识遂致不能形成，所以自有新文艺运动以至今日，我们在新文艺上甚少成就。

假如这种多型的文艺意识，各就其所意识到的去路而进展，则这种文艺上纷扰的残局永不会消失，其结果将致我们的新文艺运动永无发挥之日，而陷于必然的倾圮。当前的现象正是我们新文艺的危机。

但我们又如何而突破这个危机，使我们的新文艺运动演进至于灿烂辉煌之域？在前，我们认为现下中国文艺底危机是由于多型的，对于文艺底见解，而在整个新文艺发展底进程中缺乏中心的意识。因此突破这个当前的危机底唯一方法，是在努力于新文艺演进进程中底中心意识底形成。

二

艺术，从它的最初的历史的纪录上，已经明示了我们它所负的使命。我们很明瞭，艺术作品在原始状态里，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在艺术作品内所显示的不仅是那艺术家的才能、技术、风格和形式；同时，在艺术作品内显示的也正是那艺术所属的民族产物。这在艺术史上是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了。

从那辽远的古代艺术上，我们便可以看出艺术之民族的基础。金字塔及人面兽之所以发现在埃及，因为这种艺术是埃及的民族精神底展露，他们所显示的正是埃及的民族意识。金字塔是坟墓建筑，它之所以勃兴，足以映示埃及人对于死人观念的宗教信仰；人面兽及其他的艺术形态，均是埃及民族宗教底表示。希腊留下来的伟大的建筑物和雕刻，也正是希腊民族性底表示。因为希腊民族有勇猛活泼的精神，有美丽强健的身体，有兴奋热烈的感情，有物质享乐的要求，有现世思想而非出世思想的宗教观与人生观，有爱好运动的兴趣；故在希腊艺术上所表现的正是希腊的民族精神；一般人所最易见到的维娜丝像，正足以反映希腊民族象征人生底宗教观念；较普通的铁饼投手，也很明显希腊人爱好运动底精神。在希腊艺术上，我们看见希腊民族性底充分展布。即使就是在中古世，在那政治不安定，充满了封建主

义而缺乏民族意识的中古世，在当时所流行的建筑、雕刻和绘画，也多少各有其民族的色彩。

艺术之民族色彩，益趋明显。当中古的封建制度底渐渐倾圮之时，民族的意识愈见勃长。文艺复兴的热烈运动，其所以为近代艺术开了端倪，便是它之从中古的峨特艺术底羁绊中，为民族艺术底创造。由于它，我们看见文艺复兴及其后的白罗克并罗哥哥艺术，都是新兴的民族意识底显露。

在文学上，文学之民族的要素，也和艺术一样地存在着。文学的原始形态，我们现在虽则很难断定其为何如，但可以深信的，它必基于民族底一般的意识。这我们在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日耳曼的《尼贝龙根》，英吉利的《皮华而夫》，法兰西的《罗兰歌》，及我国的《诗经国风》上，很可以明瞭的。文艺复兴时代之所以为近代文学开了端倪，是因但丁及却塞各努力于把他们所属民族底民族语文为他们文学表现底手段，在英国，由于却塞的努力，我们看见有以利沙伯朝及其后底灿烂的文学时代。

于此我们很可以从这些文艺的纪录上明瞭文艺的起源——也就是文艺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一句说：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

三

民族主义文艺底充分发展，一方面须赖于政治上的民族意识底确立，一方面也直接影响于政治上民族主义的确立。

就前者言：民族文艺底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艺底发展必伴随以民族国家底产生；所以我们在近代，看见民族文艺有充分的发皇。

自从一八一五年的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各处都充满着民族主义的思想。那个时候，在欧洲的地图上还没有独立的有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及芬兰等民族国家。所以在当时，民族主义的运动非常澎湃。民族主义底目的，是在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匈牙利是在海斯堡铁蹄之下；德意志充满了封建制度的遗风，在同一民族之下，有许多小小的封建的郡主；意大利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施锦尼 Szechinye 之流的匈牙利民族运动，终于被海斯堡所征服。海斯堡帝国是当时欧洲政局底霸主。在他的主宰之下，有匈牙利人，神圣罗马帝国所遗留下来的许多封建的郡主，所谓意大利的许多政治组织底单位。这种情形之下，努力于民族主义最烈的要推普鲁士及萨丁尼亚；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说明他们如何的奋斗。至少自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的民族，已经认明他们唯一的出路是民族主义。他们开始向这方向跑，这条路不是康庄大道，当然是崎岖异常。

一八七一年是很可纪念的一年。在那一年不但是法国被德国打败得狼狈不堪，他之所以可纪念，是欧洲民族主义底成功。德意志自一八一五年以后，就认明这条民族主义的道路，因为小的郡主太多，不能不推出普鲁士来做他们民族运动的首领。结果便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底建立。

一八七一年之所以值得纪念，还有意大利民族底产生。虽则意大利在这年前已经有民族国家底产生，但那时罗马还在法国占领之下。普法战争底结果，便是在罗马占领中的法国军队底召回，使民族的意大利国得以奠都于罗马——意大利的必然的首都。

自一八七一年以后，日耳曼人及意大利人虽则实现了他们的民族运动。但欧洲的民族运

动便不因此而停止。巴尔干问题自柏林会议以后，一直到现在不曾有满意各方的解决，而为战争酝酿的原因，便是在该处的民族运动。同时，屈伏于海斯堡下的斯拉夫民族，自一八七一年后，便开始有政治的民族运动；一直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以后的欧战，才实现了他们的企图。欧战底结果，我们看见有更多民族国家底产生，和两大帝国底崩圮。在海斯堡铁蹄下的斯拉夫民族，实现了他们的企望；我们看见有巨哥斯拉夫、捷克斯洛夫基亚等民族国家底建立。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革命的结果，我们不但看见罗门诺夫帝国主义底倾覆，并且同时看见民族主义更多的成功。不但是芬兰、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及爱沙尼亚等民族的都已挣开了俄罗斯的羁绊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并且，我们看见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突厥和乌兹贝克各民族，都建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即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也是由十一个自主国和十二个自主州所组成，于此足见民族主义的力量是恒久的伟大。

最近象中国的国民革命，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爱尔兰的自治运动，菲律宾的独立运动，朝鲜、印度、越南的独立运动，更充满了民族运动的记录。故近代文艺，因此也满呈着民族主义底运动，诚如政治上的出路是民族主义，故文艺发展出路也是集中于民族主义。

现代法兰西的艺术，最初的一名运动员是塞尚奈。他将当时流行于法国的各派艺术底主张，如印象派光的现象的注重，殷格莱Ingres底《画的万有说》，和柯尔贝Courbert底《实际论》，总合起来，而加添了他自己独创的主张——所谓自我的表现和线的形式的注重；演成所谓后来的立体主义，及野兽运动Fauves及最后演进于所谓“纯粹主义”；在这多种多样艺术界中，中心意识，却还只是一个，就是法兰西的民族意识。

在德国，德国人另有他的民族艺术，他们的运动集中于表现主义底旗帜之下，所谓表现主义，是日耳曼民族底民族精神，及民族意识底表露，故表现主义尤其富于浓厚的民族特征。诚如白令顿教授Prof．Brinton所言：“日耳曼人的现代艺术是所谓表现主义；满呈了日耳曼的民族特征。”

此外，意大利人对于民族艺术的努力是集中于未来主义，俄罗斯人对于民族艺术底努力是集中于原始主义。这种主义都是他们民族精神及民族意识底表露。如前所述，我们很可以明瞭，文艺底进展随着政治底进展。故民族文艺底确立，必有待于民族国家底建立。

就后者说，文艺上的民族运动，直接影响及于政治上民族主义底确立。这我们在巨哥斯拉夫底发展上是很明瞭的。巨哥斯拉夫底民族艺术运动较巨哥斯拉夫民族国家底诞生为先。巨哥斯拉夫底民族艺术运动集中于麦司屈洛维克Mestrovic，一九〇五年成立底南斯拉夫艺术家联盟，是巨哥斯拉夫民族艺术具体的组织的活动底开端，他们集中他们表现于南斯拉夫民族底历史的烈风和其民族的意志。由于巨哥斯拉夫民族艺术的确立，我们在欧战后就看见有巨哥斯拉夫民族国家底出现。

艺术和文学，因之必须以民族为其基础，这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了。但是民族主义的文艺所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四

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这种人种的集团底形成，决定于文化的、历史的、体质的及心理的共同点，过去的共同奋斗，是民族形成唯一的先决条件；继续的共同奋斗，是民族生存

进化唯一的先决条件。因之，民族主义的目的，不仅消极地在乎维系那一群人种底生存，并积极地发挥那一群人底力量和增长那一群人底光辉。

艺术和文学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为了某一民族，并由某一民族产生的，其目的不仅在表现那所属民族底民间思想，民间宗教，及民族的情趣；同时在排除一切阻碍民族进展的思想，在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底意志，在表现民族在增长自己的光辉底进程中一切奋斗的历史。因之，民族主义的文艺，不仅在表现那已经形成的民族意识；同时，并创造那民族底新生命。

属于第一义的民族艺术，表现民族的情趣，我们看见有现代德意志的表现主义，俄罗斯的原始主义，及法兰西的纯粹主义。

属于第二义的民族艺术，我们看见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及巨哥斯拉夫的现代艺术。未来主义的中心意识，在物质或机械文明的赞扬。我们看到意大利在西洋是物质文明落后的国家，唯其如此，所以未来主义出现于意大利；以创造意大利民族对于物质文明底意识。巨哥斯拉夫的民族艺术，在麦司屈洛维克 Ivau Mestrovic 领导之下，不仅表现了他们民族的过去的奋斗；并努力于南斯拉夫人民族底意识底建立。

五

现今我们中国文坛艺坛底当前的危机是对于文艺缺乏中心意识。那末，我们要突破这个危机，并促进我们的文艺底开展，势必在形成一个对于文艺底中心意识。从历史的教训，我们须集中我们此后的努力于民族主义的文学与艺术底创造。我们此后的文艺活动，应以我们的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同时，为促进我们民族的繁荣，我们须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创造民族的新生命。我们现在所负的，正是建立我们的民族主义文学与艺术重要伟大的使命。

---

* 原载«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鲁迅«二心集»有一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是揭露文化特务、文化流氓所谓"民族主义文艺"的真相的，摘录第一节："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使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浮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

（一九三五年）

在帝国主义间利害冲突日益加甚的今日，处在被侵略的地位的我们自不能不打算自救。而自救运动发生的当儿，议论纷纷是必然的。不过，不问病人的症候如何，只是胡乱用药，其结果不但不能把病减轻，甚至会招来更大的危险。近来弥漫各地的复古的呼声，我们以为并不对症的一味药。

我们相信复古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假如读经可以救国，那末“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可以救国，那么，李鸿章、张之洞早已成了大功了。时势已推演到这个地步，而突然有这种反动现象发生，我们虽然明白其原因并不简单，但不能不对这种庸妄的呼号，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促其反省。不错，中国民族必须有自信心，信赖我们的自立的能力；我们不愿作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要从现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挣扎出来，我们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但这一切，并不是憧憬于过去的光荣就可以成功的。一切破落户捧着废址上的残砖碎瓦，以为这就可以重建楼台，谁都知道只是一个愚妄的梦想！

我们以为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维新”的路上走去，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一切建设事业，军事设备，都需要最进步的物质文明的帮助，惟有文化工作却故步自封，不愿受外来的影响，这岂是可能之事。

凡伟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来的文化。罗马帝国是全盘的承受了希腊文明的。中国的文化到底有几分之几是纯粹的“国粹”，也大是疑问。国乐器的胡琴便是强“胡”物；所谓长袍马褂的礼服也是“胡”服；最初的床，被称为“胡”床；民间的“烧饼”就是“胡”饼。如果除去外来的成分，样样都要国粹，就非恢复“席地”“鼎食”“车战”“汉衣冠”不可；这是谁都知道的。那末为什么对于‘文化’生活，却非要求读经作“古文”不可呢。

我们相信救国不必读经，读经和救国没有关系。这并不是说“经”书绝对的不可读；如果在大学里，研究古文史而读《书经》《春秋》。研究诗歌而读《诗经》，那是没有人反对的。可是，把读经作为“救国”的一种方术，那就浅妄得可笑。“经”是什么呢？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便知道所谓十三经只是古代一部分著作的结集。抱着二千多年前古人的著作，以为熟读了便可以救国，若不是相信那经书有通天的魔术的作用，便无法解释这可笑的举动了。

假如以为从群经里可以取得许多道德的教训，作为立身处世界的标准，那也只是妄想。二千多年前的道德教训能够范围现代的人么？而且道德教训之类果能改造一个人的人生观么？

近世的伦理是进步得很快的。奉二千多年前的伦理观念为金科玉律，恐怕只有退化的人群才会这样办。我们相信民族的自救，贵乎知新而不贵乎温故；我们知道我们的传统的弱点，我们必须勇敢的去补救。

同时，我们相信民族自救的责任不是少数人所能担负的，必须大众来通力合作。怎样普及知识于大众，是今日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改革汉字的运动觉得是必要的。

我们相信文字与文化运动有极密切的关系，文言文或古文早已走上了末路，那些僵硬了的文章组织，实在不足以表现现代的生活，依照口头语写成的“国语文”，在修辞学上看来，其精密详审的程度，比较文言文进步得多，决不是浅陋苟简的东西。

要提高一般学生的国文程度，只有提高“国语文”，如果专教“古文”，便是阻止了他们的进步，在课堂上作诗词歌赋，更是反时代的愚蠢的举动。

通一经一史能作诗词的人物，不是现代中国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现代的人，我们也需要能够表白现代人的情思的现代文。

所谓经史以及诸子百家都只该让专门家去研究，而不是一般学生所必读的。

我们相信，从提倡读经到鼓吹以经史百家为“挽救”学生国文程度的主张，全都是不明白文化运动是什么的，全都是不明白危急的中国需要什么的；他们虽然未必是“王道”政治论者的同群，而其结果却是一致的。

所以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我们不忍坐视这愚妄运动日渐发展，故敢竭其微忱，宣言如右；希国人注意！

发表意见人：

（团体）文学社　文学季刊社　文艺画报社　中学生杂志社　太白社
世界知识社　芒种社　青年界社　东京杂文社　东京诗歌社
东流文艺社　现代杂志社　新小说社　新生周刊社　论语社
译文社　读书生活社

（个人）大　戈　王伯祥　王志瑞　王承志　王特夫　王　琳　王集丛　王淑明　王鲁彦
王文川　王西徵　方之中　方光焘　白　丁　史国纲　艾思奇　艾寒松　伍蠡甫
任白戈　江天蔚　老　舍　向觉明　伯　韩　沈起予　沈志远　沈百英　辛　人
何家槐　沙　汀　宋　安　吕鉴平　汪虚若　汪静之　汪馥泉　余楠秋　李公朴
李青崖　李炳焕　李华卿　李辉英　杜　衡　金仲华　吴研因　吴俞岚　吴文祺
吴组缃　吴清友　林　庚　林焕平　孟　克　孟式钧　邵宗汉　周建人　周曙山
周木斋　周予同　郎鲁逊　袁　冰　姚雪垠　姚名达　姚非厂　柳亚子　柳　湜
郁达夫　胡仲持　胡　绳　施蛰存　孙佷工　孙　用　孙起孟　孙克定　翁同书
韦　休　马千里　马国亮　马宗融　奚　如　殷佩斯　徐调孚　徐公美　徐懋庸
徐应昶　徐霞村　夏丏尊　夏征农　倪文宙　高　滔　张明养　张天泽　张仲贤
张天翼　曹聚仁　曹宇君　曹养吾　陈望道　陈子展　陈大悲　陈端志　陈康白
章靳以　康嗣群　毕云程　陶亢德　郭建英　陆衣言　陆上之　庶　谦　符竹因
叶圣陶　叶灵凤　叶作舟　叶籁士　叶　青　焦　风　黄芝冈　黄觉民　傅东华
贺昌群　万家宝　葛　乔　杨东蓴　杨霁云　赵景深　赵景源　赵家璧　黎锦明
潆琪生　潘光迥　潘震亚　郑振铎　郑伯奇　樊仲云　蒋建白　乐嗣炳　欧阳凡海
刘大杰　钱歌川　钱子矜　谢六逸　应　人　蹇先艾　聂绀弩　谭勤馀　萧　乾
顾君义　顾均正　顾仲彝　顾　燧

〔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

一　没有了中国

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馀光，乞一点馀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师的脚，希望传教师放下一根超度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索的晚秋导入凛冽的寒夜；传教师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日本的画家常常说：“西洋人虽嫌日本画的色彩过于强烈，但若日本画没有那种刺目的强烈色彩，那里还成为日本画！”我们在文化建设上，也需要有这样的认识。

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我们应在这三方面尽其最大的努力。

二　一个总清算

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曾占过很重要的位置。从太古直到秦汉之际，都在上进的过程中。春秋战国形成了我们的希腊、罗马时代。那真是中国文化大放光彩的隆盛期；但汉代以后，中国文化就停顿了。宋明虽然还有一个新的发展，综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来的佛学，然而并未超出过去文化的范围，究竟是因袭的东西。直到鸦片战争才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动。巨舰大炮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带来了威胁中国步入新时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动摇，我们乃从因袭的睡梦中醒觉了。

随着这种醒觉而发生的，便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曾李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梁

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这都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见解，虽在当时也自有其除旧布新之历史的使命，然毕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办法，不能满足当时的要求，于是有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以把中国固有的“从根救起来”，把人家现有的“迎头赶上去”为前题，主张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作彻底的改造。

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的中国陷在革命停顿，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中，一般人以为政治不足以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文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

新的觉醒要求新的活动，引导辛亥革命的中华革命党遂应时改组，政治运动大为展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声浪遍于全国，由此形成一个伟大的国民革命。其间虽有种种波折，但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改造终于达到了相当的成功。

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但将如何建设中国的文化，却是一个急待讨论的问题。有人以为中国应该复古：但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决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的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难道能让他们去混战么？

三　我们怎么办

不，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在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

(一)中国是中国，不是一个任何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二)徒然赞美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是无用的；徒然咒诅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也一样无用；必需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咒诅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需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

(五)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个健全的

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要而言之：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这认识才算得深切的认识。

循着这认识前进，那我们的文化建设就应是：

不守旧；

不盲从；

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

检讨过去，

把握现在，

创造将来。

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辟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王新命　何炳松　武堉干　孙寒冰　黄文山

陶希圣　章　益　陈高佣　樊仲云　萨孟武

① 原载《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一九三六年经纬版。

按：《文化建设》月刊是国民党反动派CC系所主办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机关刊物。一九三五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四省后又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察东谈判”等卖国政策，而北京上海文化界掀起爱国救亡运动的时候，CC系嗾使所谓“十教授”发表这篇宣言，借以转移文化界的目标，所以整篇宣言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深重的国难。宣言发表后，马望首先在《新生》周刊第二卷第三期严正指出：“……十教授的宣言中说：‘这时的当前问题在建设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设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这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工作自然都是中国本位的。但我们以为今日最迫切地应讲中国本位的事情是：中国本位的领土保全！这就是说，中国应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以反帝图存为标准，否则侵略日亟，抵抗不施，将来弄得领土都不见了，还有什么中国本位？还有什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过了几个月，所谓“十教授”又在《文化建设》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篇《我们的总答复》，不得不被迫承认：“……最后，民族的生存需要保障。鸦片战争以还，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断侵入：从城市到乡村，密布了帝国主义束缚中国民族自由的网罗，蚕食鲸吞下中国领土，何止日蹙百里，巧夺豪取下中国主权，也早已痛切剥肤；加以经济榨取，没有止期，整个中国民族的血液，行将枯竭。这更是当前的一个生存问题。”当然，还是不敢正面提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

依照军事与政治命令，特发下列的政治指令：

（甲）进行整理、补充与解释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与巩固部队。

1． 在“迅速的整理、补充、配合友军与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的口号之下，进行部队的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

2． 根据张闻天同志“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论文（《红色中华》第二三九期），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应分别召集干部会与连队军人大会作报告；并应与目前整顿、补充部队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另有战斗员政治课材料发下）。

3． 加强巩固部队，特别是新战士与后方勤务部门的工作，进行严格的反逃跑投敌的斗争：（1）军团和师政治部，应派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突击军团所属的医院和兵站工作。特别注意审查干部与考查人员，必须加强其中的政治干部与政治组织。从部队中抽调部分得力的给养人员，到军团所属医院兵站工作，鼓动轻伤病员随医院行动，与争取轻伤病员健康归队。在军团政治部组织部之下，应指定一个得力科长管理后方勤务部门的政治工作。（2）帮助所属补充团工作，进行对新战士军事政治训练的突击；发动反对逃跑和不请假的运动，巩固全部新战士；注意补充衣服、调剂被单与改良营养、卫生工作；进行群众的检举与肃反斗争；对于补充团中，未经训练与战斗的连长、指导员应即调换。（3）对于补充到部队的新战士，应照总政治部以前指示(九月八日)进行。特别应迅速补充到原有的连排战斗单位中去。必须拆开补充团原来的组织与同乡、同族的封建关系，适当的重新配备新老党团员，并发动连队巩固新战士的竞赛。（4）发动下层的反逃跑投敌的公论，健全十人团、政治战士与反逃跑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进行严厉的反逃跑投敌的斗争。对于逃跑的组织者、煽动者与逃跑专家及企业投敌分子，应采取坚决的镇压，以至枪决的手段，特别应注意经过区域的战士的巩固工作，发动不请假不回家的斗争。（5）检查各级政治机关与人员，勇敢提拔与补充干部，尽可能给新提拔的连排长、政治指导员与政治战士及新从红校回来的干部以相当训练。特别应经过团政治处给他们以具体工作的指示与帮助，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与独立工作的能力。（6）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应加强对保卫局的政治领导与干部的帮助，并检查一次保卫局的工作，使保卫局的工作能完全的与政治工作协同进行，把巩固部队工作成为保卫局的中心工作。

4． 政委与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供给、卫生部门工作的直接监督与检查。保证武器、弹药、衣服、行军锅、米袋、草鞋等物质材料的必要补充，与适当的分配和调剂。发扬连队中经济协助委员会的作用，教育战士爱惜与节省一切的物质资材，检查连队中的卫生工作，应特别加强防止疾病的办法，与疾病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各军团自己的医院和军委指定各军

团负责的医院，必须加紧的突击，争取伤病已愈的归队，和轻伤、轻病随队行动，争取突击计划的完成。

（乙）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 经过整顿补充之后，在得到行动命令时，应即适时的提出政治口号，主要的应当是“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并应根据各兵团具体的战斗任务，灵活地提出鼓动口号。

2． 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的适合战斗环境的转变，与坚决的改变政治工作的方针。必须正确的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战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怕、迟缓、不惯行军、大批落伍、失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疾病的现象。必须预先采取有效的克服办法。

3． 应从政治上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充分解释行动的意义，加强对战士的军事教育，应特别注意夜间动作防空、侦察、警戒与进攻战斗的训练和演习。必须作到行动要敏捷、迅速、秘密与隐蔽。夜间动作要肃静与不失联络。攻击要迅速、突然与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同时对新战士，要特别注意使用武器的训练，对后方部队，应特别注意防空、伪装与行军的训练。

4． 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长途行军与战斗情况中，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必须保证由政治上最强的部队担任侦察、警戒与后卫的任务。政治机关必须派出得力政治工作人员，加强这些部队的政治领导，同时应注意工作薄弱的部队中的工作。

5． 根据过去行军的经验与教训，健全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在行进与大小休息的空隙中，经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与党团员，来不疲劳的进行政治工作与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以保证每个战士的不疲劳，与随时准备战斗的情绪和旺盛的攻击精神。

6． 在行军中，应特别注意行军卫生，保持行军序列，尽量减少行军中不必要的疲劳。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队与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

7． 必须根据各兵团的战斗任务，灵活的提出政治口号与政治上的号召和竞赛。并须从政治上保证上级指挥机关命令的绝对执行。

（丙）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

1． 健全军团和师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加强对中央派来的地方工作团的领导与教育，必须把居民的工作真正的开展成为连队的群众运动。使每个连队的地方工作干事与“地方工作组”能积极的进行居民工作。总支委必须加强对居民工作的指示与检查。

2． 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本部另有政治课材料发下），进行进出宣传与纪律检查。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特别要注意对给养、事务与前站人员的教育与工作检查。

3． 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在墙壁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坚决的对付与肃清敌探、反革

命分子与豪绅地主的势力。

4．严格的执行阶级路线，发动连队进行扩大红军与搜集资材的革命竞赛。对于扩大来的新战士，应集中补充团，加以短期训练与检查工作。在搜集资材的工作中，必须严格的遵守阶级路线，除红军必须的资材外，应尽量发给当地群众。对于分发部队的资材，必须有计划的注意到战士运输员的衣服、被单、黄烟与打草鞋材料的适当的分配与供给，并应注意食物的调剂。

5．尽可能的应在沿途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与党的支部。

(丁)各兵团政治机关，应根据上列的政治指令，分别订出“整顿补充工作”、“行军工作”与“居民工作”的具体计划，并采取有效的实施步骤。同时应保证与本部的经常联系，用电报或书面的报告工作。

此训令只限于发到军团和师政治部止。根据此训令分别定出适时的工作与口号，迅速传达到连队中去。

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

副主任　贺　昌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一、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二、第一纵队的组成及集中计划如附表。

三、为使纵队顺利的遂行任务，必须将下述事项深入地使全体人员彻底了解和执行。

1. 保持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

2. 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

3. 每一伙食单位应派设营员一人，由各梯队派员率领设营（第一第二两梯队由第二梯队派员负责分配）。

4. 各梯队在平行道路前进时，应在出发前两小时派出道路侦察队，侦察和修理道路，但第一梯队则于九日晚派工兵连一连先行，为道路侦察队。

5. 应严格遵守集合和出发时间及行军次序不得迟缓和紊乱。

6. 部队及行李的集合场，应分开选在路旁空地不得遮断道路妨碍通过。

7. 各梯队应妥觅向导，但须绝对隐蔽自己的企图。

8. 行进时要确实保持距离，不得任意伸缩。

9. 在苏区内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每一伙食单位准点三把，伕子六担一把）。

10. 道路侦察队，应在道路分歧处设石灰方向路标。

11. 休息或道路发生故障时，应通知后方部队，免致久停，增加疲劳。

12. 各梯队应派收容队，收容落伍病员，最后梯队负责消灭路标并派拦阻队，防止逃亡。

13. 应带四月份米粮。

14. 所有重病员一月难治好的，概送第四后方医院（九堡之下宋），务于十日午前十时前送完。

15. 各梯队首长应严格检查行李文件担数，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

16. 到达集中地后，即用有线电话联络，在万田与万田麻地间接长途电话线，架设电话，并置总机。

右　令

诸梯队长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项　英

部队组成 / 行军日程		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		第四梯队
		彭雪枫	罗彬	武亭		陈赓、宋任穷
		总部一二三局、无线电三台、电话一排、通信队、警备连、工兵连（已先一天出发）、运输两排	总部四五局、总政治处、警卫营（欠一连）、总政治部、医务所、运输一排	工兵营（欠一连）、炮兵营、运输一大队另两排	附属医院（欠三所）	干部团、医务所、运输一排
第一天	出发地点	梅坑	田心圩	石门圩	洋溪	九堡圩
	出发时间	十日十七时	十日十八时	十日十八时	十日十八时	十日十七时
	经过道路	沿坝 麻地	沿坝 麻地	西江小密	九堡	里田 坳杉星
	宿营地点	万田（约50里）	万田、麻地间（50）	黄龙（50）	九堡麻地之间	洋田（50）
第二天	出发地点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出发时间	十一日十七时	十一日十八时	十一日十八时	十一日十八时	十一日二十时
	经过道路	宽田	宽田	梓山北岸（不过花桥梓山）	万田	榆山、松树坪
	宿营地点	塅屋（60）	塅屋（60）	新圩（50）	黄龙（60）	宽田（40）
第三天	出发地点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出发时间	十二日十七时	十二日十八时	十二日十六时	十二日十六时	十二日十七时
	经过道路	岭背	岭背	岭背		塅屋
	宿营地点	古田（50）	田寮下（40）	禾溪布（40）	新圩（40）	岭背（50）
附记		电话两排明十日另带长途电线80里取捷径直往雩都待命。		1.第三天出发可早在十六时得先行渡河（因该梯队行程较近）以免拥挤。 2.沿雩都右岸前进时不要渡河。 3.附属医院10月14日到禾溪布。		注意：第二天为避免与一、二梯队交叉，其出发时间可迟至二十时。
部队名称的代名字		红星	梅坑	小松		公馆

中央政治局
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十八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是经你们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决定：

1．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2．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收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段〔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3．在向遵义方向前进的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4．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坚决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5．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中央政治局
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

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十二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一部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甲）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乙）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的战斗意志与胜利信心。并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丙）不论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向我们迅速追击，或相当推迟时日，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丁）同样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适当的使用我们的部队，但以不违背基本作战方针为原则。

（戊）在目前转入反攻，已具有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这种形势之下，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的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的取得胜利。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己）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连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庚）责成总政治部，根据这一决定起草新的政治训令。

政治局认为这一反攻的彻底胜利，五次“围剿”的最后粉碎与川黔边区的建立，对与我们胜利的粉碎蒋介石正在布置着的对于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新的“围剿”计划，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此，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实现这一决定而斗争。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彻底的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那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

术，则战争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的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的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的恰当的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的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其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它，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的有利的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通通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由敌人逼迫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的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的变动，就不能积极的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

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是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的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数十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与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造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战略的内线作战情况之下，只有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取得胜利，才能使红军经常握住主动权，敌人则迫使他陷入被动地位，而最后打破他的整个计划。

但是过去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主要是一三军团的分散）兵力。这种分兵主义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就使我们的兵力处处薄弱，而便利于敌人对我们各个击破。五次战争中，许多次的战役（如洵口战役，团村战役，建宁战役，温坊战役等）都由于我们主力不集中而未能得到伟大的胜利。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给红军的中心任务，是阻止敌人的前进与企图以“短促突击”消灭部分的敌人，而不是争取主动权，不是争取决战的胜利。其结果就是红军消灭敌人的数量极少，而苏区也终于受敌人蹂躏。

（七）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下，我们虽没有象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采取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洵口、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各役，特别是十九路军事变时）。然而五次战争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只有在堡垒不坚固或孤立的情况下，为了打击敌人增援部队，或为了调动敌人的情形下，才容许攻击敌人的堡垒。五次战争中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

对于五次战争中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因而把敌人五次“围剿”与过去一二三四“围剿”绝然的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

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的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了堡垒即失去其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在堡垒线内即是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在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做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而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的领导战役，并正确的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领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物力及军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拼消耗，见××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个“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毛丁山、三溪坊、平疗、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即使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我们立即应拒绝这种战斗。要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

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的不停止的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和训练，就不能好好的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拼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于疲劳情绪与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于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于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消灭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到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个“围剿”之间的严重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的裂痕，使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

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个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的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补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部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

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的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经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而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物，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弊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的轻巧的与径直的干法，在短短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坚决的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领导是非常不够。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的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经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方，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色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的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的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的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南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是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则必须灵活的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斗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的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修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的扩大自己。严肃自己的纪律，红军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的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开始。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证。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被敌人战胜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政治局扩大会号召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张惶失措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更号召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门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人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人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争取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于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以扩大。

(五)为了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的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以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

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主要条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以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的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走到，红军大批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它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到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到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目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要胜利。

书　记　处

〔附〕论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七日）

林　彪

（一）敌人在五次围剿中，在军事上，放弃了他过去长驱直入并进穷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持久战略与堡垒政策的战术。敌人深知红军有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深知红军勇不可挡，行动迅速，长于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等。故敌人在其战略战术的决定上，极力避免与红军的长处斗争，与红军在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斗争，而极力抓着红军在物质上和兵器技术上的弱点来进攻，极力夺剥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这是敌人在五次战争中他在战略战术的决定上的最基本要点之一。但"战争的最终命运不是由技术来决定的（苏联的仇敌曾以大批军火供给台尼金和高却克），而是由正确的政策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来决定的"。（斯大林）这个真理是那些国民党走狗和蠢猪们所不能够了解的呵！

在持久战略与堡垒战术下的敌人，他为着首先缩小苏区，以便最后与红军决战，他依照其总的计划，分路向着苏区军事政治上的要点前进（不是向着红军主力所在地前进）。每路约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其每一次前进的距离和速度，是随着群众条件，随着对我主力行踪的了解，随着他本身兵力的大小，随着当时红军打击他轻重的程度，以及地形情形等条件而变动的。如：陈路军进占广昌以后，汤周纵队进占建宁以后，他们的前进，较其过去在边区要进得慢的多了，较其在白区前进时则更慢了。最近薛路军在龙岗，一遇到我主力，和给予他的打击；以后他就不进，而采取在其堡垒火力完全可以掩护下的推进。又如：陈路军向广昌前进时，他虽然发现红军在其附近，然而他已集结了充分的优势的兵力，同时在地形上也容许他大兵力的使用，所以他依然前进而占领广昌。

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连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路的连络与策应，以裁割和封锁苏区，以取得后方的接济。

敌人在其前进中，非常注重侦察警戒。在其与红军战斗中，则极力发扬其多量轻重机枪及炮兵火器的威力，和极力利用集团飞机的侦察与轰炸。在战斗中，虽然达到占领某个地点，但并不积极向与其对战而退走的红军追击。敌人在苏区前进，是短距离的前进，他每次前进大约走十里左右，行进时多半是沿着制高的地点向着他预定的目标前进。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

敌人的这些动作方法，都是根据他过去失败的经验教训来的。为了避免同红军进行运动战，为了抑制红军的猛烈冲锋，为了避免红军的突然袭击，为了对付苏区群众的坚壁清野，为了避免陷于孤军独战和被红军截断后路的危险，所以敌人才采取以上的种种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并将其过去在战术上的缺点极力纠正（如侦察警戒之疏忽，筑垒之迟

慢……等)。

短促突击的战斗，是从上述的敌人战略战术条件，及其他种主客观条件下产生的。这种战斗有很多特点，这种战斗，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我们应如此来了解这个问题。

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

如：洛阳堡战役,新桥战役,都有求得战役胜利的极大可能的。因为，敌人士兵的动摇，战斗力的薄弱，他不得不采取多量人数的密集队形。同时，他利用我军火力的薄弱，故亦敢采取密集队形。所以有时虽在短的距离，窄的地域内，却拥挤了敌人大的兵力。如果我军能迅速击溃敌人，并截断其退路，则可取得战役上的大胜利。这种战斗需要最好的配合，最好的组织，在这种战斗中如发生小的缺点，都会造成失去胜利的恶果。

敌人现在已经进占我们基本苏区的门户了,今后敌人在苏区中当更彻底的,更标本式的,运用他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了，我军以后将更会要多遇到要采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去消灭敌人的战斗。我们在这种战斗中，应该不以取得些战术上局部胜利为满足，而应极力为取得伟大的战役上的胜利而斗争。

(二)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在战斗前，应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对于敌人前进的时机，到达地点，经过的道路和阵地，兵力部署，和动作方法等，予以确切的判断。

2． 在战斗前，指挥员或派得力参谋，应实地的绵密的侦察敌情地形，并由参谋处进行实地测图，如单凭调查路线，和现有地图（不详细并有很多错误),在进行这种战斗，是万万不够的。洛阳堡战役,某兵团事先不实地侦察地形与道路，等枪已打响了,临时仓卒把队伍出动，把大的兵力拥塞在一条隘路上,被敌人一部兵力将进路堵住,以致结果没有达到截断敌人退路的任务,这种教训,是不应当忘记和再重复的。调查路线和请响导也是战斗前必要的工作。

3． 根据地形侦察和敌情判断的结果，受领战斗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应预定作战的方针和计划。这种方针和计划，要判断到敌人有那些可能的变化，而其最大的可能是那一种，自己的方针和计划要能适应各种可能的情况，但不可以平均主义的精神来决定自己的计划，而应以适合主要的可能为主。在根据计划着手进行作战准备工作时，亦不应犯着平均主义，而应当准备应付主要的可能。部队待机的位置和部署，亦应当是以应付主要的可能为主。这个计划为了使部属能事先进行准备，和战斗中在通讯联络万一中断时也能适合上级的企图，独断专行和协同动作，须将这个计划通知所属的必要的指挥员。

4． 必须注意的，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和计划，这只能作为战斗前进行战斗准备的根据和战斗中独断和协同时的一种参考材料。战斗的实际指导，则仅依照一个明确的方案以命令行之。如各部单凭事先预定的作战方案去动作，则最容易发生错误，和动作的不协同。因为敌情的变化，有时不是事先所能料到的,并且有些情况,介乎两个或三个预料的情况之间的，有的指挥员在他看的情况是相当于预料的甲种情况，如是他采取对甲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在同时同一情况下，有的却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属于预料的乙种情况，他如是采取对乙种情况所预定的动作。错误，岔子，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

5． 如果是在山地，则在这种战斗中敌人是沿着制高地前进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

根据情况的判断，占领敌人前进方向而在敌人堡垒火力以外的制高地点，配以少数兵力（一营左右）固守之。占领这个阵地，应当极端秘密，不使敌人知道这个阵地上有我们的兵力。守兵进入阵地不应过早，免致暴露企图。这种阵地的火线，应设在山顶的前斜面上，以便万一放弃时，敌人不能利用我们现成的工事，在山腹、山脚，应设重层的射击。这种阵地要有极好的伪装，使飞机与地上之敌不能发现，要有充分的障碍物，使敌人停在我障碍物的下面，受到我火力的严重杀伤，掩蔽部和战壕，要能抵抗敌人炮弹和飞机的轰炸。担任守备的要是政治上坚定的，有顽强战斗力的部队，如守阵地的部队是质量差的，不能达到固守任务的部队，则在战斗时将使主力失去突击敌人的有利条件，并且有时还有受到敌人打击的危险。担任守备的部队，事先应进行充分的提高政治情绪的工作，要有在敌猛烈的、野蛮的，飞机轰炸炮兵机枪的射击下，和步兵进攻中死守阵地，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同时须进行守备的战术训练，并须补充守备队的子弹，特别是手榴弹，如没有现存的子弹，也可从突击部队身上抽拨。

6． 在预定突击敌人的地域，如没有现成的，便于突击部队用平行路前进的道路，而又为非要路不能运动的地形，(如密林……) 则须预先开路。但所开之路的末端，不应太接近敌人的行进路，因为这种自己开的路，多半是在敌人前进路的侧方，如太接近敌人的进路，则有暴露企图的可能。但不应因无道路，放弃执行机动，而要用战斗队形在道路外前进。

7． 对于预料敌人前进路附近的原有工事，如旧寨子、堡垒，应先拆毁，以免被敌利用。在我军所占的制高点前的高地，应以我制高点上的火力控制之，如在我火力外，则须设以竹钉自发地雷等障碍物于向敌方之斜面上，并应有很好的伪装以免被敌人过早发觉，使敌人不易占领等方法控制之，或作能迅速恢复之准备。

8． 这种战斗需要有最敏捷的通讯组织，因为战斗动作须要迅速和很好的配合，过去历次的短促突击，大部分由于动作的配合不好，而未取得圆满的胜利。电话应为主要的工具，而以其他通讯工具为补助的工具。这些通讯工具应并行使用，使通讯无断绝之可能。

9． 在适当的高地上，应设观察所。有些观察所，如有好的地形，能将数十里以内的敌情地形，了如指掌。观察所应派参谋携带望远镜去观察，并与司令部保持电话的联络。

10． 对于前进之敌，应采取利用敌人仰攻我制高点时行反突击的方法，抑应采用单纯的埋伏的侧击夹击，或采用让敌人占领某些不难攻的地点后，乘其立足未稳时而攻击之，或采用其他种战斗方法，这要根据地形，敌人离开堡垒的远近，敌人的数量、质量，及其他条件来适当决定的。

11． 敌人前进的时机，可以根据他堡垒马路完成的程度，兵力的调动，及其他谍报材料判断之。在判断敌人将前进时，则须将部队隐蔽的进入进攻出发地隐蔽起来。这个出发地，要能保障部队能在一小时，至多两小时以下的时间，即能到达预期的地域突击敌人。但敌人并不能一定恰如所料的时间来进攻，所以这种待机有时成为空待，有时接连数日都是早出晚归的空劳往返，这当然使部队有些疲劳，但不能因此而发生动摇，而避免疲劳，而松懈起来，而不作紧张的待机准备。否则，如果一旦敌人前进，临时才从远的地方出动去进行突击，则往往已失时机。但在判断敌人确在其时极少极少前进的可能，则亦不应天天将部队进到进攻出发地，以免无益疲劳和暴露企图。并且应估计到逼敌待机过久，企图必被暴露，故敌有改变前进路线的可能。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不致暴露秘密之下，应当进行教育的工作，这种教育应与当时战斗任务连系起来。

12． 敌人前进的目标，他是有预先的确定的。在当地之我军，当时的任务如不是迟滞敌

人的前进，而是在求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则应让敌人按照其原定计划前进，用不着去抵抗他，阻滞他（但并不取消以原任守备部队的游击侦察与引敌前进）。因为敌人一遇到我军的阻滞，他即停止不进而做堡垒，这就减少我们在更有利的条件下（但也有例外），使敌人更远离其堡垒的条件，消灭敌人。如待敌人向其原定目标前进，待其进至我军预定的突击地域再行突击，这样就更能干脆的消灭敌人。这种方法不算是诱敌深入，要知道，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

13． 如敌已进至我预定的突击地域，或敌停止前进，或敌仰攻我制高点，已受我火力的严重杀伤，和已吸引了他多的兵力在我制高点的下面，在至少有了这些情况之一时，且在我军所选定突击的地域，已不会受到敌人的堡垒有效火力射击时，则应依照命令，开始进行突击的战斗。这时无论敌有无后续梯队，无论他的后续部队是否已完全脱离了敌堡的火力掩护，都应不迟疑的开始突击。

14． 战斗的部署，通常应以一部与敌的先头部队战斗，吸引敌之先头部队，以主力取平行道路（但不一定是走路上），突击敌之某一侧面，如在我兵力优势，及不致分散兵力条件下，最好采取夹击敌之侧面，另外须以精干有力之一部队，担任截断敌人的归路。如不将敌人退路截断，则全部胜利是极少保障的，因为敌仍能退回堡垒，这种战斗消灭敌人主要不是靠在追击中，而是靠包围敌人于战场就地歼灭之。在我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如虽已脱敌堡之有效火力射击，但距敌堡仍不甚远时，则我主力不可在截断敌人退路的战斗地域，因这样很容易被在堡垒继续出来的敌人，将我主力抓住，致陷我主力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在部署中，如估计我突击敌人时，敌人还有后续部队有来包围我在战斗中的部队的可能时，则须留出足够的兵力，保障战斗中自己翼侧的安全。

15． 突击时机成熟后，最好首先以担任截断敌人退路的部队，出敌不意的突然的插断敌人后路，主力接着或与插断敌退路的部队同时动作，突击敌人的侧面。担任在敌正面战斗的部队，必须等待担任在突击敌侧面和截断敌退路的部队，已开始突击，才配合着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无论如何在正面部队不应单独过早行反突击，或反攻，或攻击前进，只有在为着巩固自己必要的阵地，有时才可行局部的反冲锋动作。

16． 突击开始以后，应最迅速的动作，最猛烈的连续冲锋，乘敌人在立足未稳时，未做好工事时，和后续部队增援未到时，迅速干脆的歼灭之。在这种战斗中，动摇、犹豫、迟缓，都是不应有的。在广昌战役中，和洛阳堡战役中，都曾有过这种严重的现象。在今后的战斗中，是决不可再发生这样的错误呵！

17． 突击部队的第一线的战斗队形，应当采用以班为单位并列的战斗群，或排的并列战斗的队形，应当避免用大队伍走一路前进的行军队形，或用密集队形的集团冲锋，在第一线应展开优势的兵力，以期一举决战。

18． 在敌侧面突击的部队，通常应不经过预先火力的准备，而直接冲锋。在敌退路上战斗的部队，主要是用火力阻止敌增援，阻敌后退，和准备在胜利条件下向敌堡追击，以火力向敌堡射击并夺取之。

19． 当战斗胜利时，如已消灭敌之主力，如敌堡垒守兵动摇，应乘胜向堡垒追击并夺取之。如胜利不大，敌堡尚无动摇和夺取之相当可能时，则应毫不迟疑犹豫的结束战斗，将主力迅速脱离敌人。

20． 敌人的侦探，和侦察部队经常出来活动，我们应当布署我们的侦察员捕捉敌人的侦

探，并最好以埋伏的方法去捕捉。对付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应经常有消灭他的准备，最好采用值班部队的方法，每个值班部队（一营以内的兵力）担任一个区域，在那个区域内发现敌人出来的侦察部队，即由他负责立即出动，去以包围迂回的方法消灭之。如不用值班部队的方法，待发现敌侦察队出来以后，才临时命令某部队出动去打，则往往已失时效。这个值班部队，还有对付敌人突然来袭击的作用。

21. 敌人在构筑工事的时候，多成连成营成团的密集队暴露在阵地上，我们应派出一、二挺机枪，以伪装与隐蔽的动作接近敌人，予以短兵式的火力袭击，这也是有意义的。

22. 对防空问题，应有很正确的方法，各时机各部队除注意伪装和隐蔽外，担任扼守制高点的部队，应构筑防空隐蔽部，应有对空射击设备。在进攻出发地待机的部队，在待机时对空以隐蔽伪装为主，若到突击开始，则无论飞机凶猛到如何程度，都不应停止自己的冲锋和追击，这时只有与敌进入肉搏，方不致失掉战斗的胜利，才不致受到飞机的猛烈轰炸，对空射击在这种时机也是必不可少的。

23. 狡猾的敌人，往往故意先以一部在某方向进行佯动佯攻，待将我军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之后，则以其主力遂行其本面目的战斗，因此我们要经常明察敌人的真伪，切勿受其欺骗。三溪战役，王都寨东华山的失守，是不应当忘记的教训。"不应被吸引于次要方向使我们屈从意旨与他作战而应征取并保持主动权在我们手中"（见《革命与战争》四期十一页华夫文）。

24. 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在于能保持军事秘密。在我主力兵团企图进行这种战斗时，则必须使敌人不知我主力兵团在其附近。封锁消息，捕捉投敌分子，捕捉敌探，对空隐蔽与伪装，都必须严重的注意，并采取具体的方法和布置。部队在正式战斗前的一切准备动作，都要注意不致泄漏秘密。

25. 进行这种战斗，必须对敌情有经常的明了，故必须用观察所窥望敌人的一举一动，或派侦察不间断监视敌人。另外应当注意警戒的问题，防止敌人乘我在待机中，因久而发生松懈中，而向我军行突然的袭击。

26. 由于敌人离开他后面的堡垒并不甚远，堡垒与出堡垒的敌人之间的地域不宽，容不下我军过大的兵力进入战斗，正因敌人前进的距离不甚远，他一发即至，我军须乘其立足未稳，与兵力劣势时突击他，所以战斗的发生是突然的，战斗的经过是短促的，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的战斗，是用不着要过大的兵力的。否则就发生部队拥挤，遭到无益的伤亡，及减少在别方面寻求机动的部队，和发生协同配合的更大困难。

（三）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最后让我引用华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

"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简单化及机械化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的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估计每次战斗的经验，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见《革命与战争》四期第七页）

注：华夫即李德，德国人，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渡江的作战计划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于总司令部）

甲、情况估量：目前敌人正以何徐两敌围攻我二六军团，以川陕之敌围攻我四方面军，而另以湘敌主力及粤桂黔川滇之敌，配合薛岳兵团向我野战军实行进逼包围，企图束缚我野战军，在乌江西北地区以便各个击破我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与我野战军，并成为蒋介石新的围攻的预先步骤。在贵州方面，黔敌主力约六个团于昨十九日占领遵义，并向我三军团实行追击，判断薛岳兵团吴周各一部正协同黔敌主力向仁怀茅台两方实行追击和堵截我军，侯敌部队似在仁怀茅台土城官店赤水地域企图阻我西进，滇敌则将进驻毕节。四川方面，刘湘判断我军将入川，并渡江深入川中。因此，刘敌第一步正调集约三个师八个旅在彭水、重庆、綦江、合江、泸州、叙州之线，企图堵我入川与渡江，并加紧对四方面军的进攻，阻其与我配合，我们判断其第二步将更调集主力阻我渡江或在川中地域乘我立足未稳与我决战，而以次要部队扼守堡垒牵制我四方面军，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将逐渐沿长江进入四川，实行其新的围攻部署。

乙、作战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丙、初步任务：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初步任务应是：

1． 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兰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2． 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

3． 在尾追之敌紧逼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4． 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丁、实施计划拟定如下表：（附后）

戊、在实施计划中的战术要点：

A． 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B． 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C． 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面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D. 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则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E. 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船渡，当取得某一渡河点，并已开始船渡时，应即扩张船渡范围，可能时野战军应改在同一地域内渡河。在其一部队先到渡河点而不能渡河时，应机动的转到另一渡河点，一般的应向泸州上游延伸。

己、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秀、黔、彭、松、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风、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活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庚、总政治部应根据此作战计划，在“实行反击”“消灭敌人主力部队”“创造新苏区”的中心口号下进行最高度的战斗动员，并在每一重要的作战阶段发出政治训令。

辛、这一计划只发给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妥为保存。

军队区分		右纵队	中央纵队			左纵队	附注
兵团		1 K	9 K	军委纵队	5 K	3 K	
任务		迷惑和抑留綦江合江之敌驱逐和消灭温水黔敌并迅速夺取赤水纳溪。	迟滞和脱离可能的尾追敌人驱逐官店车皇场。	土城之敌迅速夺取赤水并掩护我右纵队左侧后方。		迅速脱离尾追和侧击之敌并准备在土城江门及江安之线于必要情况下与尾追和截击之黔军一部或协同其他兵团与黔军和薛岳兵团作战。	
行进日期及到达地点	十七	松坎	火烓舟	遵义	清溪水	赖板凳	依上表如情况变动与实际不合得由总司令部单独命令修改之。
	十八	休息	绥阳	遵义	高坪	赖板凳、遵义	
	十九	休息	青光林	四渡站	板桥、娄山关	牛皮场、桐子坪	
	二十	休息	栗子坝	桐梓	桐梓	芝麻坪	
	二十一	石壕口	官店	九坝	车子坝	大塘口	
	二十二	区水	温水	大坝市	官店	火石岗	
	二十三	狮子口	良村	温水	双场	回肠	
	二十四	鳛水	风村坝	良村	温水以西	土地垭	
	二十五	休息	猿猴	东皇店	东皇坝	土城	
	二十六	石笋	↓	土城	风村坝	猿猴、土城	
	二十七	百箦厂	↓ 180		猿猴	-	
	二十八	赤水	赤水	↓			
	二十九	↓	赤水	赤水	↓		
	三十	↓		赤水	赤水		
	三十一	纳溪、蓝田坝			赤水		
	二月一日		↓	↓		↓	
	二日		大渡	纳溪	↓	江安	
					纳溪		

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应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薄，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政治局及军委

中央及军委为粉碎
湘鄂敌人"围剿"给二、六军团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健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部、郭汝栋等部，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的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急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需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中央及军委

军委关于各军缩编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于扎西）

（甲）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并规定具体办法如下：

一、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成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四个团；

二、五军团将现有的三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编为两个团；

三、九军团将现有人数（军团部在内）以五分之三的人数依新编制编为一个团并入五军团，为其第三个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数编入三军团；

四、一、三军团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五、五军团部应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处理与上项目同。

（乙）为实行上项编制，各军团应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必要解释的充分准备工作；

（丙）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战斗连中去，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仍留新兵连训练；

（丁）各军团应利用休息的间隙期中进行缩编，其日期由军委个别命令规定之。

右　令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

党中央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全体红色战士们，指挥员们及政治工作人员们：

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

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告诉全体同志们，只有消灭贵州、四川、云南以及蒋介石的追剿部队，我们才能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是在革命战争的许多胜利中创造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和平的创造苏区，完全是一种幻想。没有流血的战争，就没有苏区。

放在我们全体同志们面前的是这样个问题，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完全决定我们的努力与奋斗。

全体同志们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要必须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百倍的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我们的战斗单位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千百万云贵川的工农劳苦群众，正在饥寒交迫的中间过着非人的生活。拯救他们劳□与组织他们的斗争，号召他们起来加入红军，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

全体同志们！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历史的源泉，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

的。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并不是苏维埃革命的失败。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他正在以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创造新苏区，扩大自己的力量。保卫与恢复老苏区。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全国革命形势的尖锐化，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阻止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中国是在革命与战争时期。

把全国红军的胜利与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为胜利的中国大革命。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我们作战的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全体同志们！为着这一光明的前途共同奋斗呀！

党中央委员会
中 革 军 委

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

(甲)敌情另电。

(乙)我野战军决以九军团在桐遵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则西进遵仁路上突击周敌。

(丙)主力之第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今五日应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其具体部署由前敌司令部直接指挥之，行军部署应如次：

1．第三军团上午停鸭溪待命，以下各兵团应依下述行军序列由现地取道忠庄铺、马坎向鸭溪运动。

2．前敌司令部六时半由遵义老城出发。

3．一军团七时由遵义新城北门外出发。

4．干部团十一时由高桥出发。

5．第五军团十时由董公寺出发。

6．第三军团后方部十四时由遵义新城南门外出发。

7．第一军团后方部十六时由遵义新城出发。

8．野战军司令部停遵义。

(丁)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一三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朱　德

中央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的敌人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内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一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党　中　央

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甲、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据此我军部署如下：

1． 行进路线：

A． 三军团为右纵队分两路，右经河脑村、河尾村、甸沙村、万希古江边、核桃箐上色马，左经寻甸海头村海获得，狗街以才得法相戛上包土司前进。

B． 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鲁口哨中发厂鲁土村可郎、乐郎大石桥耿家村，老诗戛石桥河马厂前进。

C． 一军团缺一个师，经嵩明岩、峰场核桃树、小新街、肖家村、截劝、德明村法基大小黑山或自乌花出前进。

D． 一军团另一个师为先头师，于五一到禄劝以便赶往江边架桥，同时三军团亦须派出先遣团带电台赶往架桥。

E． 九军团则于相机占领东川后，西行至盐厂盐坝域干盐井渡江。

2． 渡江口第一地段选在云南境内之白马口及太平地，由一军团先头师架桥，第二地段之鲁车渡志力渡，由三军团先头团架桥。

3． 在渡江前一般应采取较急行军，远离追敌使先头能较敌隔三天以上，后卫应较后隔本队一天至一天半行程。本队期于五月五号达到江边。

4． 各纵队前进中，遇阻敌应迅速消灭之。城不易攻则绕过之，遇敌追应尽量迟阻，逼近则以相当兵力击退之。

5． 各兵团应严格执行此计划之规定，关于路线行程及作战部署每一步的实施均关渡江大计，应力求协同动作不得违误。

6． 万一上述地段渡河不遂则应迅速转入元谋西北地区设法渡江，届时野战军主力应控制在武定元谋之线准备打击滇敌。

丙、关于渡江转入川西的政治意义，应向干部及战士解释(内容另告)，使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应克服疲劳与不正确情绪，行军中应争取少数民族，携带充足粮食，注意卫生与收容掉队。

中央军委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于十二日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日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朱　德
毛泽东
周恩来
张闻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一决定各政治部负责一直传达到团，但须绝对保持战役的部署的秘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儿盖会议——

一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经济总崩溃的深刻化，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农村经济的崩溃与毁灭，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严重形势。国民党反动统治不能消灭或暂时削弱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相反的，他使这些原因更进一步的紧张化了。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

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是继续存在着，虽然许多斗争往往带着自发性，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是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的形势。

苏维埃革命运动，虽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几个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而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这些苏区中广大的游击战争是继续坚持着。湘鄂赣与福建沿海的红军得到许多胜利。红二六军团击破了陈渠珍一路之后，现在又消灭了张振汉一路，巩固了原有苏区根据地。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国民党正在以空前的仇恨与疯狂，向着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苏维埃革命进攻。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的绝对的削弱，促使它以更大的积极性更进一步的出卖中国。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进攻苏维埃革命。一、四方面军在西北的发展，使华北的军阀更直接的与积极的参加围攻苏维埃与红军的斗争。有计划的追击、截击、特别是堵击我们，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

但是敌人向我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部队的远离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交通的不便，给养的困难，内部的不统一与冲突，减员、疲劳、冻饿、不满意，与失败情绪的增长，财政支付的空前不敷等。而在另一方面，全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强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的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

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切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

二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的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六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一决定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彻底的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平创造新苏区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努力与牺牲去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争的最高利益，才能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才能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为了建立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必须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经过革命委员会的阶段建立真正工农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必须普遍建立赤卫军少先队独立师团游击队等民众自卫的武装，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要使反革命统治区域变为真正革命的苏维埃区域，必须坚持地执行上述各项基本政策。

三　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开的）在他的决议案中曾经清楚的指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的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在思想方面指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坚强了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

后走上了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必须指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会同时指出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使主力红军退出苏区，受到部分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这种军事上的错误，不但对于党中央的总的政治路线说来是个别的错误，即对于这一错误的主要负责者，也"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清楚的了解，党的总路线的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的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的提出了并执行了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军事指挥问题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上是基本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在军事问题上却在一个时期中犯了错误，那这一错误对于党只是部分的错误，虽是严重的政治的错误。

关于一方面军的减员的原因，党在遵义会议上已经在全党内充分的发展了自我批评。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丝毫的隐蔽。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指挥上固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实际工作中还有某些弱点，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部队中政治工作的薄弱，首先是总政治部没有尽一切可能给下级政治部以适时的指示与推动，使下级政治部得不到坚强的领导。反右倾的斗争没有很大的开展起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没有利用机会来及时整顿一方面军。

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以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四　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

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败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

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给与他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脱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内(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的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间的缺乏，更由于政治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表现在：部队组织的松懈，纪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的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思想。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的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的过左或过右的估计。过左的估计可以掩盖目前必须立刻整顿部队，加紧反右倾的斗争，严紧纪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计则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军力量的不相信。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间与补充扩大，不但可以恢复过去的战斗力，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自馁。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给一方面军以最切实的兄弟的帮助。

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灭阶级敌人。

五　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

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

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另外一种民族中，或在阶级斗争深入的阶段中，则可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

在一、四方面军没有会合以前，四方面军在帮助番民组织游击队，在建立革命政权上，发动番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上，得到了相当的成绩。但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

因为目前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应首先帮助他们的独立运动，成立他们的独立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公开号召蒙、回、藏等民族起来为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斗争，并给这种斗争以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他们自愿的原则，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联邦，在这个时候，联邦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在许多其他问题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

六　目前的中心工作

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应该是：

(一)立即在一、四方面军中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胜利信心，与刻苦耐劳的精神，准备大量消灭当前敌人，取得北进战略中各个战役的完全胜利，以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二)利用并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进行军事政治的教育训练，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三)为了加强红军党的领导，必须使政治委员制度更加确立，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政治部的工作，把政治工作的重心深入到连队与支部中去。

(四)大大提高与严紧一方面军的纪律，必须采取严厉办法以保障纪律的执行。同时应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了解红军的纪律，主要的不是依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级的觉悟。极大发扬党员间与红色指战员间阶级友爱与服从纪律的精神。

(五)加紧对于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间的基本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苏维埃革命斗争到底。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的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

(六)番民中的工作必须有迅速的转变。总政治部应搜集各地番民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教育自己的干部。用一切方法争取番民群众回家，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革命政府等。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主力到甘陕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族须作更大的努力。

(七)广大的白区的工作，首先是邻近白区工作，目前应该有计划的开始，发动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与游击战争，响应与配合红军的行动，创造游击区与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党中央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去加强川陕甘三省白区党的领导。同时对长江下游及华北华南各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及农村中的斗争，应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及新的有利的环境中极力加强自己组织与领导的力量。

(八)必须立刻开始白军中的士兵的工作，以瓦解国民党的部队。当地白军工作委员会，必须广泛的□□□工作组以□□□休的材料（□□军要标语）适合于当前环境的简单指示，使每个红色指战员了解瓦解白军工作□□□□部，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如何进行白军工作。

(九)必须加强川康省与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真正集中地方工作与游击战争的领导。要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

地□□□的工作。

（十）建立保卫局的组织系统，加强同反革命的斗争。

（十一）吸收四方面军中党的最好的干部，参加党中央及其他军事政治机关的负责工作。

（十二）采取必要方法，加强对于其他苏区与游击区的领导，使各方面的行动更能取得相互的呼应与配合。

七　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战线的斗争

□□□义的□□□川陕甘新苏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碰到许多困难，敌人决不放松我们，他必将加强他的战斗力向我们进攻，同时高山河流草地□□□□□□□给我们许多困难。虽然如此，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发扬我们的创造精神，我们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不敢大胆的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惧怕少数民族中工作的困难，没有决心在少数民族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不了解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伟大意义，甚至根本怀疑到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动摇具体的表现在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示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与自暴自弃。这种动摇更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苏维埃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

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这对于□□□□□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在这种斗争中，必须向每一党员与红色指战员细心的解释目前的形势与我们胜利的前途，使他们确信苏维埃革命现在虽是遭遇到一些困难，但苏维埃革命必然要胜利。必须使反倾向的斗争同最具体的实际工作的转变密切的联系起来。必须在反倾向斗争中加紧肃反的工作，反对任何对反革命活动的放任与宽恕。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左”倾的空谈，这种“左”倾的具体表现于以“吹牛皮”来代替敌我力量的正确的分析。因此便自然造成对于目前形势的过“左”的估计，这种“左”的估计的结果，或者是走到轻敌的冒险主义，或者是掩盖自己惧怕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

党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冷静的来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与目前的形势。只有这种正确的估计，才能使我们正确的提出党的任务与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拥护真理而反对欺骗。

因为两条战线的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一切努力与牺牲来完成他们所负担的历史任务，只有对于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迟疑的采取纪律的制裁。

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确信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及军委领导之下，我们必然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创造川陕甘西北苏区，取得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政治局通过）

（此决定为保守军事秘密暂时发到师止）

政治局听了毛泽东同志报告之后，对于六月二十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有如下之补充的决定：

（一）在目前的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

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用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反革命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地战斗力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帝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顺利的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一般的远离其军事战略及政治军事的中心地区，凡此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重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的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反捐税争土地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此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及其邻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汇流于苏维埃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求。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

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对不是能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的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与政治上保证克服堡垒封锁以前，将是不可避免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消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令张国焘速即北上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于俄界）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一）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示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三）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

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的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

〔附〕张国焘致中央电（摘录）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凯　丰

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因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而遭受失败。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封建军阀残余，残酷的压迫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坚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继续打倒帝国主义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在当时不得不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阶段，即实行土地革命，以苏维埃为民主革命的政权形式，并建立起工农的武装——红军。中共在九年来坚持这个方针，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团结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成为中国革命中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新的革命高潮中主要的发动力和主要的条件。

从日本侵略东北四省后，尤其是进攻河北后，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在激烈的变动，阶级力量在重新的结合，党的政策也依据这种客观的情势而有了根本的变动，即一切新的政策的出发，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以解救目前亡国灭种的空前的民族危机为中心，今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成绩，只有过去九年坚持不动摇的奋斗才可达到。

党过去九年奋斗的成功，最初是在一方面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一方面反对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中所获得的。最后又在反对苏维埃运动中各种倾向而使党更加巩固，使革命力量更加团结，党坚持自己的方针的奋斗，是今天在民族危机的前面能够给全国人民以自信力，能够挽救中国空前民族危机的坚固的基础。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正是全国民族危机深入，国民党南京政府尚无改变自己的政策的表示。党仍是坚持自己的方针，依据那时的情势，一方面仍坚持巩固自己的力量，团结自己的队伍，但同时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挽救中国民族的危机的方针，当时中央极力主张红军北上，以便领导全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以便促成全国统一战线更快的进行。中央在这时的方针仍以巩固自己的力量，团结自己的队伍作为实现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因为自己的力量不巩固，自己的队伍不团结，就没有方法在狂风暴雨似的政治舞台上争取胜利。为着这个目的，中央用一切力量首先使党内和红军团结一致，在一致的方针行动之下，当时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国焘同志，虽然在委曲求全，屡次的会议之下算是在口头上决议上同意了这个方针，在实行时又动摇这个方针，结果造成党内和红军内的分裂。

国焘同志在最近写的《从现在来看过去》一篇文章内，虽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并没有将过去他所犯的错误深刻去检查。这样不能不使许多不明真象的同志不能了解，而有些过去犯过同他一样错误的同志不能改正，而许多了解他的错误的同志又不满意，在这里不得不将过去的争论加以叙述，给国焘同志的实质加以分析。

先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争论说起。

一、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曾经这样估计那时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势，在分析了当时日本进攻华北和全国的革命运动发展之后，作出这样的结论："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了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沙窝会议决议）。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是在一九三五年六月，那时正是日本进攻华北组织《华北国》，在国际上法苏协定正在谈判中，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举行关于战略问题的会议后，接着又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对日本进攻华北的问题发表过宣言。

在两河口会议上党中央关于战略问题的决定，是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当前的敌情而想定的，党对当时的战略问题曾这样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扩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两河口会议决议)。

在当时党中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对于军事战略的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包括国焘本人也在内，他那时在会议上在口头上是同意中央的这种估计和决定的。可是在事实上在行动上他是不同意的，虽然当时他不敢发表公开的反对的意见，然而在他自己的行动中有与中央相反的估计。

在一、四方面军分开行动后，他就把他的整个反对中央的意见发表了。国焘同志认为当时的情势是这样：

"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这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显然中央与国焘同志间有基本的原则的分歧，中央估计五次"围剿"的失利，退出中央苏区，这是革命部分的挫折，但同时着重指出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国焘同志认为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

国焘同志继续在他同一报告中说：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观察，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末在今天我们还不能做这种过份的估计"（同上）。

依照张国焘同志的分析，民族革命的高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才"来临"，这已经是倒退了五年，因为"九一八"后中国的民族革命大高潮已来临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如果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暂时挫折的停止；不估计为是苏维埃运动继续的发展，那么这种会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不作这种估计，那么已经不是"冷静的考察"，而是"冷血的考察"。

国焘同志在自己的同一报告中继续的说：

"…………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当指出当时我们

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是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

在国焘同志看来，当时不但是“处在两个高潮中间”，而且是总退却！根据他对于当时政治形势这种黑暗的估计，所以不得不有他自己的退却的军事战略。

这就是当时对于政治形势估计的原则分歧。虽然国焘同志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在会议上，在口头上没有公开的说，但是他并不是衷心同意当时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战略的决定，所以在他的行动中总是推延当时中央决议的执行，而将他衷心所要说的，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后，他在道孚会议上就已公开说出来了。

很明显的，当时争论的基本点，是对于当时整个形势的估计出发的，就是国焘同志也曾公开承认：

“我们与陕北同志基本分歧，就在于对五次‘围剿’的估计，五次‘围剿’后的整个形势与当时的战略方针”（同上）。

国焘同志在他最近写的一篇《从现在来看过去》文章内，却把这个原则问题一句不提，它认为当时的分歧只是由于：

“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估计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现在想来，这是我的错误观点得着发展的开始发动”。

国焘同志只认为他在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的损失以及一方面军在长征中减员和疲劳现状。当然他确是过分估计了这些，下面将论及，但这不是我们分歧的基本点。我们分歧的基本点是在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

国焘自己也曾公开承认，“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既是进攻与逃跑路线，何能缩小到“减员和疲劳的程度”，很明显的他这里是想躲避中心问题。国焘曾公开宣言反对逃跑路线，而自己则以进攻路线自居，可是他又说：“我们都是在退却”，这是他退却中的“进攻”路线。

因为有了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分歧，在决定军事战略时，也不能不发生基本分歧。

二、军事战略问题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和敌情，一贯的主张北进，在上面我们曾引了两河口会议所通过的党中央的战略计划。在国焘动摇此计划时，党中央坚决领导一、三军团（陕甘支队）实现此计划，因为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敌情的估计，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国焘同志在会议上在口头上虽承认这一计划，但是在行动上却不愿意执行这一计划。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另一个战略计划。他认为当时“我们都是在退却”，所以他的战略计划是继续的退却，他的战略计划就是退到西康去，他的计划就是川康计划。

在两河口会议上，已经一致决定了北进的计划。但是国焘回到理番、杂谷脑后，却不公开反对这一计划，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部队的调动，中央不顾一方面军的疲劳，继续向毛儿盖开动，以便求得先机占领松潘。在芦花会议又与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经几次

的曲折才到毛儿盖。到毛儿盖后国焘又提出组织问题还未完满解决，于是又延宕占领松潘的计划。在这种怠工执行决议之下，敌人已先机巩固松潘，于是又有沙窝决议，“完满解决组织问题”。在这时不能出松潘，但北进还有可能。国焘又提出出阿坝的计划。如是他又单独率领一部出阿坝，以延宕北进之实现。中央在当时委曲求全，总想一、四方面军同时北进。中央为达此目的，不得不督促右路军（一、三军团，三十军、四军）先向班右、阿西、包坐开进，以待左路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五军、三十三军等）之到达。但右路军达到阿西、包坐后，国焘同志又借口昆都伦河水涨不能过，而折回阿坝，同时密令徐、陈准备南下，以破坏中央的北进计划而达到他的川康计划。

国焘同志的川康计划是根据他对于“我们都是在退却”的估计来的，在他认为，我们还应继续退却，退到西康去！

国焘同志不主张北进，除了根据他的政治估计出发外，他确是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尤其是对于骑兵的恐惧，形容得是不可战胜的妖精，国焘同志对于当时敌人的恐惧，曾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后，发表如下的意见：



“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上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政治局’会议国焘报告。——黄超记）。

在他看来，北进只是一团黑糟！幸而马克思有灵，一、三军团没有被骑兵活捉去。

阿坝会议的决议，就是国焘同志同一的观念之下写的，阿坝会议决议这样估计北上的问题：

“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天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也是靠列宁在天之灵，一、三军团还没有冻死饿死。

国焘同志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从对政治形势的右的估计，与对敌人恐怯的观点出发，可是在他《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内，并没有从这里去揭发他的错误，他反认为：

“……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

这种假定当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的事实是从政治的分歧出发的，而且国焘曾经屡次在自己的报告中说明南下是进攻路线，北上是逃跑路线，何能在这种不存在的假定之下，忽然一变而为“军事策略的争论”？这显然是想把当时争论的原则问题掩盖起来！

国焘同志虽没有公开承认他当时的川康计划，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已吞吞吐吐说了：

“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役的意见”（《从现在来看过去》）。

当然比较川西更西北的地区只有西藏、西康。如果还想再西，那就只好到西天去！

国焘同志的战略计划，就是在他的“我们都是在退却”的观念之下，退到更“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对于土司确是安全，对于革命者一点安全都没有，也不会有。

他曾屡次的主张在川康建立根据地，虽然在两河口干部会议上有人反对他的这种意见，他故意把反对他的意见加以曲解，把“瓮中捉鳖”一个比喻，曾认为这是悲观失望。后来从没有放弃在西康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后来他更发挥他的理论：

“外蒙已经可以得到了胜利，我们就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地区能否建立革命政权了，再拿这地方的民族做例来说罢，如果我们看看他的建筑、经书、军队、骑兵等，那么我们怎样可以说他是最落后的地区？”

“如果认为这里是最落后的地区的话，那么这是取消主义，对中国革命悲观的哀号。”（均见《干部必读》）。

国焘同志的川康计划，当然他不得不留恋这些地区。他虽然援引外蒙为例可以建立根据地，但实际上却没有建立他的根据地。

当然党中央与国焘在战略上的分歧主要是从两个问题出发：第一、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的分歧；第二、对于建立根据地选择上的分歧。

中央认为在川康番民区域，事实上不可能建立根据地，即使能建立根据地也要使党与红军脱离全国革命的领导。

这是战略分歧的基本点。

三、南下北上的问题

本来南下北上就是战略里的问题，因国焘特别发挥他的南下北上的理论，他认为南下是进攻路线，北上是逃跑路线；他认为南下是胜利，北上则为失败；他认为南下和北上是争论的中心，后来他又认为争论的不是南下或北上，而且他现在还坚持：“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因此不能不说一说这一问题。

所谓北上就是党中央所决定的北进战略计划，国焘同志认为北上是退却逃跑路线。他说：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须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红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见四月一日报告）。

如果北进真象国焘同志所描写的又有骑兵，又有堡垒，又有飞机，又有敌人雄厚的兵力，天气又冷，人口又少，回民又不好对付，那么我想一个真正的退却逃跑主义者，决不会往这样的地方去逃，我想国焘同志所指的是说北上是：“一直想到苏联去”（见记录）。

虽然国焘屡次想把他的南进描写成为是进攻路线，可是他的南下只是为着有大米吃，所以他在南下动员的口号就是：打到天全、芦山去吃大米！

实质上他的南下只是为着实现他的川康计划，或者就是他的所谓“要回马枪”，在他自己的报告中说：

“…………因此，就使当时的北进成为无组织无准备的瞎闯，虽然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可是河终是没有办法渡过的，这样只有要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

南下是对退却逃跑主义的坚决反抗……”(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如果照他自己的说法，南下是“耍回马枪”，他的进攻路线却是与“耍回马枪”相等，如果照中国戏子的“耍回马枪”，那么总是在自己准备退却时，给追击者以回击，或者是在退却中给追击者以回击。不知道他的回马枪是否是这样一种耍法？

一、四方面军在阿西分开后，一方面军坚持自己的北进方针，经过俄界、腊子口、哈达铺，那时还希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反省，随一方面军后跟进。一方面军为什么要单独北进，有两个主要理由：第一，坚持中央既定的方针；第二，想用一方面军的先锋作用，证明给国焘同志看，北进是可能的，而且为四方面军开辟道路，以便他们在一方面军后跟进。



中央九月十四日给朱、张的第七电中，明确的说：“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在到达哈铺后，又有数天之停留，等候国焘并劝国焘率部北上。

当一、三军团开始北进时，国焘预料一定不能北出，因此屡次表示他的“诚意”。要一、三军团“如遇阻则折回，并准备来接”。一、三军团出哈达铺后，他又预料一定会被消灭。因此他也曾表示“猫儿哭老鼠”的哀悼！

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经详述南下的不利(详见给国焘第四电)，并劝其仍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在第五电中中央指出：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国焘同志对中央的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见给徐、陈指令与给国焘第六电)。

国焘这时仍是一意孤行，向南开进，在达到天全后，国焘来电证实他的南下进攻路线的胜利。在退出天全、芦山后，又对南下胜利作了许多莫明其妙的估计：

“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地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与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南下，钳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够顺利的到达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顺利的发展运动战……”(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不知他的“相当意义”有何解说。如果他的胜利，仅在他的“预定目的”是为了作为一、三军团的钳制队，那他的预定目的确是达到了，那么红军全部推进，作为一、三军团的突击队，其帮助不更大吗？如果当时全部北进，我想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更要急转直下，而我们的统一战线的成绩将比今天更大。

我想南下不但完全失败，而且是南下路线破产崩溃的开始！南下的失败完全证实中央当时的估计：“南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见《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可是国焘在最近的文章中还不承认这种错误，他还认为“南下也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如果要这种艰苦卓绝的奋斗，何不把红军带到黄河里吃水呢？他仍认为“如果认为南

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如果南下不是失败，为何又倒向北上呢？

国焘同志想用一种外交的言词把过去中央对于“南下是绝路”的估计的正确，来抵消他对于北上估计的污蔑。他这样说：

“……当南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南下是死路，来掩盖他的继续逃跑。在这些的估计下，当然他们要求组织上的结论，但是真象并不如他们的估计，我们南下以来得到极大的胜利，建立了苏区，并开始形成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不知在何处？不知是否是指与喇嘛的统一战线——凯），自回师西北以来，使我们部队在质量上都有极大的进步……毛泽东同志的话，当然没有说对，现在当然是要收回去的。也许这里会有人说毛泽东输了罢，当然，当然，倘若他说对了，他只能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不会有丝毫好处的，他的没有说对是非常之好的。”

“其次，当毛泽东同志向陕北去的时候，也许有人估计在这样机会主义的路线之下，必定会葬送一、三军团（国焘当时就这样想，而且预先表示过猫儿哭老鼠的哀悼——凯），其实这句话由于新策略的执行，这句话也没有说对，倘若这些人的估计是对的，那也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见六月六日报告）。

中央对于南下是绝路的估计，是依据客观环境情况的分析，并不是预祷四方面军要消灭，而是在警告南下的同志，可是事实上完全证明了这种估计，国焘对于北上的哀悼，都是从对当时形势的悲观失望，对一方面军力量不相信出发，党中央不是江湖的预言家，而是根据政治的分析，和实际情形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在南下失败后，仍不得不倒回北上，因此国焘又发表他的高论，认为过去的争论，不是南下北上的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见三月十五日报告）。

这样才把他的北上路线转了一个弯，中央的北上则为逃跑，而他的北上则为进攻。

“……在今天来说纵使南下得到更伟大的胜利，始终也还要向西北伸张我们势力的……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预定的目的地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同上）。

当然他预定达到了他的川康计划，但做上司的目的则没有达到。

这是一个何等的无原则性的人！

这是一个何等模糊的人！

不顾革命的利益，不顾客观的环境，一意孤行，拿红军开玩笑，一定要把红军达到他的“预定目的”后，才再北上，如果他是这种“主动向北发展”出发，那可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罪过。国焘怕红军不能“艰苦卓绝的奋斗”，因此把红军南下“去发扬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也是他的预定目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奋斗只是被迫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如果环境允许中央红军不退出中央苏区，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把中央红军拿去作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奋斗的“预定目的”。从这里也可看出，当四方面军在通南巴胜利时，而退出了通南巴这是错误，也许国焘想把四方面军拿去向西发展，作“艰苦奋斗”，以完成“预定目的”，这是何等的儿戏？

四、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

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一直到两河口会议时，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干部士兵间都是互相亲爱。但是自两河口会议后，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回杂谷脑后，召集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当时会议的精神，并不是促进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而是挑动两方的对立。从此以后，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歧，而他又不把问题提出中央，而私自在四方面军中间鼓动，以造成当时不正常的现象，怂恿四方面军的某些坏分子向一方面军挑衅、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等无耻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

当时一、四方面军不正常的现象，主要的由于国焘的挑拨，这只是他与中央政治分歧中所采取反布尔什维克的办法。这里的根源还是由于他对一方面军长征中的错误估计出发。他认为："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退却战"，而这种退却"一直到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才终止"。同时他又过低估计一方面军的作用，夸大一方面军的减员和疲劳，想找着这些事实来作为反中央的资本。

中央在八月的决议中，曾经着重的指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并具体指出团结的任务和工作，很诚恳的自我批评，批评了一方面军的弱点。中央关于兄弟团结曾这样指出："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倾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中央八月决议）。但是国焘同志还不以此为满足，想在一、四方面军不团结的借口之下，改变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而想把一方面军拿在他的手下，中央坚决拒绝这种方针，因为一方面军是久经锻炼的红军，有党的立场，有政治立场的队伍，他从来是在中央意志之下行动的。

后来一、三军团离开后，留在国焘那里的一方面军还有五军团和三十二军，国焘仍旧采取他过去对三十三军和十五军的办法去解决五军团、三十二军，结果许多久经锻炼的干部，忠实中央的干部，遭受残害虐待。这种军阀的手段，竟在共产党领导者发生，何能不使一方面军的干部义愤填胸，这是与党中央兄弟团结的口号简直相距数百万里，而且相距数千万里。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对于这种罪恶行为一字不提，这还能使一方面军受冤屈的干部心悦诚服吗?!

五、红军和苏维埃建设问题

党中央对于红军建设的问题上，一贯是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四中全会的路线，那是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中央在一方面军中的工作，就是这样。因为要有战斗力的铁的红军，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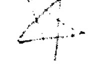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又从新把这个问题提出，因为国焘对红军的建设却并未执行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因此党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在自己的决议中特别提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问题。为了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党中央的唯一的绝

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八月九日决议)。

党中央在当时把党在红军中的领导问题这样郑重的、尖锐的提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中在红军建设上，确是没有执行党四中全会对红军建设上的指示。红军中党的观念和教育不可容忍的薄弱，政治部没有成为党在红军中的工作机关；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是不经常的现象；军队内党的生活不健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没有，培植个人的威信高于党的利益；红军的纪律不是建立在阶级自觉上。因为在红军建设没有实行上述这些原则，加以客观原因，中国军队制度的存在和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不能不使军阀主义在红军中得着发展。

国焘同志自己对于党与红军的关系就根本不了解。在中央争论的问题没解决以前，可以私自召集红军的干部会议，进行反对中央的工作，自己身为总政治委员可以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和指令。因为总政治委员的职权，只是中央在红军中的代表，他的权限并不能超过中央政治局，他的责任一定要服从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如果不懂这一点常识，不但不配做一个总政委，就连普通党员的资格也还缺少。

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在二、四方面军达到甘南时，当时的西北局决定北上会合一方面军，国焘也可以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私自改变为向西开进。如果照国焘这样做去，还要党做什么用处？党还有什么作用？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国焘同志自己不执行政治局的决议，反污蔑中央破坏红军指挥系统：“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阿坝会议决议)。中央指挥一、三军团北上，为着贯彻自己的方针，一、三军团的干部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这都是正确的。虽然当时中央也有命令给国焘和指令给徐、陈，要他们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但他们没有执行，这是不对的，中央在那里破坏指挥系统？

国焘的军阀主义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第一、红军中的肉刑制度发展到顶点。因为没有阶级的自觉的纪律，不得不依靠打骂枪杀以维持命令的执行。随意可以打人，随意可以枪毙人，这在过去四方面军中到处可以看到的。

第二、对居民的纪律不是建立在与居民的亲密联系上，因为红军是工农的人民的军队，他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

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红军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只要他们服从、盲从。

第四、培植传令兵系统，这多少是从冯玉祥军队中学来的。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曾批评打骂制度，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还觉不应批评他们，他们还认为不打人还行得通？你看一方面军不打人，多无纪律，多散漫，多自由行动！他们用这种根据作为反对的理由，他们似乎见得中国的俗话：“铁不打不成钉，人不打不成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国焘在最近他的文章内虽承认"军阀主义倾向得着发展"，但他没有指出军阀主义的实质和表现在那里。

在苏维埃的建设上，因为国焘同志在红军的建设上没有党的立场，而在地方工作的人，又多由红军抽派，因此他的军阀主义不能不在苏维埃工作中反映出来，这主要的是军队干涉政权，在通南巴退出时，在"坚壁清野"的口号之下，烧毁房屋，不能不引起群众的反感，"摸夜落士"成为合法的行为，打土豪不归公。虽然有苏维埃的名义，但无苏维埃的工作——群众的工作；对红军家属没有执行优待的条例；一个有工作能力的政权机关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通南巴退出后，不能保存必要的游击区域。

六、根据地问题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那时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而川西北地区，依据政治、军事、经济、居民等条件，都不适宜于造成根据地，于是选择根据地的问题，又成为当时争论的一个问题。

党中央当时的北上方针，也就是与创造新根据地相联系，党中央以川陕甘作为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党中央对于创造新根据地的选择依据下面的几个条件：

第一："……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

第二："……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他的存在足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工农劳苦群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

第三：这一个根据地是："团集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见中央八月决议）。

当时的情形，川西北是没有足够具备这些条件。中央认为川西北不能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于是选择川陕甘作为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国焘同志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央不要根据地，说中央大规模运动战是逃跑。确实中央与国焘对于根据地的问题有分歧：国焘要在川康建立根据地，中央反对这种意见。国焘坚持自己在最落后的区域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他认为反对他这种理论的都是逃跑主义。国焘开始提出川、康的计划，后来虽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的北上也是与中央的北上基本不同，他的北上是向青海、西宁发展，在他这次到达甘肃后，仍把部队向西开进，也可得到证明。因为国焘根据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他认为现在是退却的时候，他认为向西退却才能保存力量，如川西北、西康、西宁等等。

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在"取得陕、甘两省广大地区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有力的根据地"，"有计划的、大胆的向东进攻"（均见给国焘第一电）。中央在与国焘争论最厉害时，为了顾全党内和红军的团结，曾经允许迁就国焘向西宁的计划，但他一刻也不放过向东发展的计划，在给国焘第五电中说："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在这电中为着求得当时的团结，中央认为：在东出不利的条件下，可以向西宁、青海发展，但并没有放弃再行向东发展的计划。

国焘所提出的根据地计划，主要的是由他对当时政治形势悲观失望的出发点，他的根据地计划是为着躲避革命、找寻"安全的地区"。西康、西宁虽可能较安全一些，但与中国政治生

活隔离，在这些地区里面，不但苏维埃运动要变色，而且中国共产党也会要变色。因为中共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如果与中国政治生活隔离，怎样能去领导全国的革命，而且那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区域，要与自然条件作斗争。

这就是在根据地问题上与国焘的分歧。

七、肃反政策问题

苏维埃政权之下设置保卫局工作，原为保卫部队和政权机关，以肃清反革命的破坏工作。保卫局是一个权力的机关，只有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能保证保卫局去正确的施行他的权力，如果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就会发生滥用权威。

肃反工作是为着巩固党和政府，因此必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肃反是为着团集群众到党和政权的周围来。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绝对的党的领导才能做到的。

国焘同志的肃反政策就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因此滥施权利。在鄂豫皖时，因当时中央分局的正确领导，尤以泽民同志的坚持正确的党的立场，曾经是起了不少的作用。但到后来，国焘总想把肃反工作成为个人的工具，因此滥用权力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凡是与国焘个人有意见不同的，他就利用这个权力的机关去加以压制，结果使党内生活成为不可容忍的现象，许多好的干部，曾经与国焘有意见分歧的干部，都遭他的这种滥用权力的压制。在这种情形之下，党何能有进步，何能有党的生活，何能有党内的思想斗争?!

当一、四方面军分开后，国焘又采取这种办法，对付留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一方面军的干部。随意可以加干部一个罪名，名之为“日本侦探”，或“蒋介石的侦探”，或“准备投敌”而遭摧残，五、九军中许多英勇的干部在小组织的名义之下，或在动摇的名义之下而遭压迫，这种反党反革命的罪恶是每一个忠实于革命的同志所不能容忍的。

国焘的肃反政策发展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干部，以及四方面军中的一些忠于革命的干部，谈及国焘的肃反政策无不泪下。

虽然在我手中有许多这种材料，我想这是每个同志很明白的，用不着在这里来多说。

可是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一字不提，这能使过去受冤屈的干部心悦诚服?这能够去教育那些过去与国焘犯同样错误的同志?

国焘想用他的“肃反政策”去达到党内团结，这是绝对不可能，只能对于无知识的、无党的立场的分子，暂时拉拢，但终必崩散。党的团结只有在思想上的一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才能达到。他的“肃反政策”只能暂时维持实力，但终必崩散，这是历史上一切旧政权的教训。中国一句古话说得最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国焘的肃反政策，不能不是从他的军阀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多说，而主要的靠国焘自己去深刻的反省，国焘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错误当然是罪恶的行为!

八、党的建设问题

这里所说的党的建设，并不来叙说党的建设的一般问题，因为这是党校的事，而国焘同志是中共的一个老党员。我这里要说的只是国焘在这问题的错误。因为这个问题内包含许多问题，因此，为易于明了起见，分别的叙述:

1　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问题——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在布尔什维克基础之上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即是无产阶级的农民战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的失败和以前历史上一切的农民运动的失败是一样，因为他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不能单独的胜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但太平天国终究支持了十五年，因为他是一个群众的运动。

如果中国农民运动不获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或这种领导薄弱的地方，就会表示他的农民的坏的方面出来，这已为近来中国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运动所证明。

国焘同志在苏区党的建设上就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深刻的了解，国焘在苏区党的建设中表示对农民落后意识的投降，而且他利用这种落后意识以达到巩固个人的威信，没有党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去教育苏区的党、红军、广大群众。结果造成党内一些干部盲目的服从，反对理论的学习，专以"打"为能事。理论与实践的分开，结果造成盲目的蛮干，而失去指导的方针，采取"愚民"的政策。结果国焘同志一个人反对中央时，可以一手笼络下面，这具体表现了没有党的生活，无产阶级领导的薄弱。

也许有人会反问，何以解释四方面军会打胜仗呢？这种回答是很容易的，因为四方面军是从群众运动尤其是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他的干部和士兵全体都是抱着满腔革命的热血。太平天国那时还不是所向无敌吗？如果照国焘路线继续下来，他是不能胜利的。

只靠满腔热血和满腔热情，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严厉的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疯狂的革命性，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性、纪律，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2　组织原则问题——国焘同志最近在自己的文章内批评了自己对于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组织路线的错误"。但没有揭发自己与中央对立所采取的手段，没有说明组织路线的错误与政治路线有何关系。

国焘是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代表，在红军中他是中央指派的总政治委员。无论他在那方面他不能超过这种权限，他应当服从中央的决议。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内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争论，但必须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下级服从上级，这是集中。只有这种有组织有纪律有民主集中制的党，才能领导革命。国焘同志完全不遵守这种原则，他一个人可以破坏中央全体的决议，他可以私自召集反对中央的军官会议。他是总政委可以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反而污蔑中央破坏红军指挥系统，如果大家看过政治工作条例，懂得红军中党的原则，那末大家应知道当红军中的指挥员不执行党的路线时，红军中一切党员都应听党的命令，这是每一个党员的责任。

国焘用这种理由来反对民主集中制：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倘遇到革命的紧急关头，能否希望每人都是老实人呢？倘若都是老实家伙，这些人要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列宁指出：党的纪律要建筑在党内路线的正确，倘若多数的中央继续执行不正确的路线，结果有可能使革命受到大损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起而反对。是以党的一致，是基于党的正确路线上……"（六月六日报告）。

国焘在"正确路线"掩盖之下，反对党的组织原则。如果中央有错误当然可以反对，但须得国际的同意和党内大多数人的赞同才能改组中央，如果不是这样，中央依然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因为他是受全党和国际的委托的。国焘自称中央，既无全党的赞同，也无国际的同意，他有何根据行使中央的职权，这只能是"自封"中央，岂不可笑？

3　党内思想斗争——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就是健全党内生活的。党内没有思想斗争，就要使党走向腐败，党内思想斗争不走上正确轨道，就要造成党内不健全的生活，国焘在领导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就是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他把思想斗争与肃反相同一，这就不能不造成党内生活的不健全，使党的干部不敢发表意见，使党内发生恐怯的现象，使党不能进步。

4　党对知识分子——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是经过共产党来实现。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不允许其他阶级的出身成分加入，经过挑选，那些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而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事业、忠实于无产阶级的事业的分子可以吸收入党。

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工作中，在提拔工农分子的名义之下，采取"吃知识分子"的政策，把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党员排斥。在国焘看来，似乎我们的党是"工农的党"，因此知识分子在党内无立足之地。我们的党不是工农的党，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党对于优秀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并不关门，只要他们服从党纲党章，参加工作，坚决为党的任务而斗争。国焘的所谓提拔工农干部，并不是从真正提拔工农干部出发，而是从他的愚民政策出发。

5　自我批评——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工作是中央的代表，有权力指挥一切工作，但中央代表并不是家长制度，可是国焘把中央代表的职权发展成为家长制度。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工作，从来不发展自我批评，也不愿意有自我批评，因为他觉得有人批评他，就是破坏他的威信，凡是与他有不同的意见，他都认为与他不利，不能不加以压制。甚至于他的家长制度发展到每一个干部讲话都要学他"江西老表"的声气，他不但不允许下面的批评，就是中央对他的批评也是抵制的。

他曾屡次的公开的用这种理由反对自我批评，他说：

"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红军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要受到相当限制的。"

当他说这话时，正是南下失败，重回北上的时候，四方面军的党，尤其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不得不在实际经验中，领悟到党中央的正确，与国焘同志的错误。因为南下证实了中央预先的估计，即"南下是绝路"，"战略上没有出路"，"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只能到西康去"。下面议论纷纷，觉悟中央正确的同志，不得不发表意见和批评。国焘为压制这种批评不得不创造一个理论。我想中国的党恰恰相反，在有政权与军队的条件下的自我批评，更应比秘密条件下的可能和限度都要大些。因为在秘密条件下即使想发展自我批评，也是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的。因为没有可能来召集大的会议，也没有公开的刊物□□。国焘用同一的理由也反对党内民主："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

我想也是同样的原因，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民主更能发展。因为在秘密条件下的党，既不能召集大的公开的会议，又无公开刊物。这种党内民主是有限的，因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都被统治阶级剥夺，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党，他的党内民主也一样受到限制。既然在自己的政权下，党内民主更可发展，因为可以召集公开的大的会议，有公开的刊物，每个同志对党有意见都可在适当的会议上、刊物上发表，而且可以在适当的会议上讨论。

国焘反对自我批评，反对党内民主，不但用这种理论，而且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压制自我批评：

"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到铁锤的打

击”。

国焘又用“暗中”，“三五成群”，“铁锤打击”，当然不止“铁锤”，还有肃反的保卫局，想用这种办法来团结党的队伍是不可能的。

上面是国焘从南下倒回北上时压制自我批评和反对者的意见。在南下时国焘则采取如下的办法压制批评。

阿坝会议决议更用所谓“纪律制裁”，来压制自我批评和不同的意见，决议中这样写着：“在斗争不愿意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象一个人一样”。象这样的“纪律制裁”，永世也不会使党团结。

在卓木碉的会议上，国焘用这样的办法压制批评：“现在红军中顶危险是保留北进意见，如果南进困难，就表示高兴”（黄超记录）。

国焘虽然用尽一切方法压制批评和反对者的意见，但也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6　对中央的态度——国焘认定中央一定会被消灭，至少也不过是“剩得几个中央委员”，因此他以为成立新的中央的时候到了。

后来中央安全“到了陕北”，他又觉得怎样办呢？！于是又来一道的挑拨，听信敌人的造谣，说毛、彭与刘子丹、徐海东分裂，责备中央是“自杀”政策。

给张浩同志一个这样挑拨的电报：

“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他以为党中央也是和他一样，可以随意强奸人意。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对中央也造过不少的谣言，说中央“退却逃跑”，说中央“腐化”，说中央“怕飞机”，后来分开后，更公开的在会议上说中央是“牛皮家”，说中央是“大炮客”，说中央是“书生”，说中央“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才来革命。”（均见“干部必读”）。

这种造谣、挑拨、离间、污蔑，只有在“社会新闻”上看得到。在共产党内是一文不值，反足以表现国焘的无聊！

7　关于“鄂豫皖”与“通南巴”的争论——当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后，中央也移到中央苏区去了，后来上海中央给国焘的指示信，说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是过早”，国焘就利用这一点对中央大不满，中央与国焘会合时曾讨论他的工作，适当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当国焘要离开鄂豫皖时，泽民与国焘间是有争论的，国焘不经过中央分局的决定，私自把红军带走，没有把保卫苏区着重的提出。

退出通南巴时，恰好是四方面军战胜刘湘以后，中央曾根据这种情形，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不应当的。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国焘想把退出通南巴的责任放在中央身上，说中央有命令要他退出，这完全是凭空造谣，中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指示，当中央决定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时，曾经要他们向西南发展，配合一方面军，并没有要他退出通南巴。

九、民族问题

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正是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区域，所以民族问题成为当时争论的开始，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的问题。

党中央反对当时空虚的“联邦政府”，而主张民族自决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的必要一项。党中央认为在当时提出“联邦政府”是空虚的，而且根本就要混乱我们党在当时解决民族问

题的基本策略。

党认为在争取中国内部各非汉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解放中，有提出解决他们自己的独立问题之必要。中国共产党应当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之自由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独立权，即是说他们有完全的自由脱离中国和帝国主义，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对他们的解放运动是没有意义的。

党中央对于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依据辩证的了解，认为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同时也不是一个东西。这完全是依据列宁的指示，"承认民族自决并不是说将一个大国分成许多复杂的小国，他只是顺次表示反对各种民族压迫的斗争"，同时他又说"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是等于承认联邦主义，或绝对的反对联邦主义"。

联邦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正如列宁所说的"是各民族劳动者完全统一之过渡形式"。我们不但主张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而且我们主张各民族间劳动者之接近与融洽。列宁曾经指出要达到这种联邦，不是用武力，而依据于各民族间互相信任，所以列宁又说："无产阶级政党企图在可能范围内建设最巨大的国家，因为这样对于劳动群众更为有利，他企图实现各民族间的亲善和进步的融洽，但他之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用武力，而仅仅是用各民族工人和劳动群众之间的自由和友爱的联合。"

当时国焘提出"联邦政府"就是没有懂得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因为"没有民族自决权，自由的联盟将是成为一句骗人的话。"（列宁）。

当时曾把西北联邦政府取消，改为川康革命委员会，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则组织自治政府和独立政府。

后来我们走后，国焘还觉金字招牌老，又把他抬出来，并继续发挥他的联邦政府的理论：

"少数民族的政权，与汉人与红军必须在自愿的原则下联合起来，西北联邦政府建立的原因也就在此。当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反对这一政府的形式，我起来声明说这一政府的性质，一如当初苏联远东共和国一样，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国焘同志的自愿原则不知建立在何处？建立在枪杆上，还是建立在任何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处？很明显的当时红军与番人间还没有互相的谅解，也没有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还在武装的敌对。因为过去大汉族主义的悠久历史，不能不使番民对一切的汉人仇视。我们共产党的主张，过去对他们毫无影响。如果在那时就由上而下的强制联邦政府，是不能取得番民的信任的，番民觉得过去是刘文辉、邓锡候来管我们，现在又是你来管我们。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只有主张无条件的番民自决，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觉得过去是别人管我们的事，现在是自己管我们的事，这样才能取得互相的信任和融洽，这是将来联邦的先决条件。

如果在当时提出联邦政府只能促进民族的反感，实际上只能是大汉族主义的掩盖。

国焘对于民族问题上的分裂与联合完全是机械的了解，他说：

"…………分裂与联合的原则是没有矛盾的，绝不是如书呆子所理解，以为少数民族应先行分离，然后联合，因此必须先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这里，第一，他对分裂与联合的了解是机械论．分裂与联合不但是没有矛盾，而且也是不相同的东西，如果只了解它没有矛盾，而不了解他不相同，这不是辩证法。第二，国焘以为只有联合，才是表现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分裂则是主张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这种理论不

知是从那里学来的，主张民族自决与联邦制都是要有无产阶级领导才可以的，而且民族自决与联邦制的关系，并不象国焘所了解的就是等于分裂和联合的关系。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分裂，民族有权自己决定他们这一民族的分裂独立，或者与别一民族联合更为有利。这何能把民族自决权了解为单纯的分裂，更何能了解分裂就无须乎无产阶级的领导!?

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国焘也是采取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我们说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的解放是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不能分离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少数民族运动没有独立的意义，这只是说明少数民族解放与中国革命的正确关系。

国焘怎样去了解这一问题呢？他说："少数民族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得到解放，就是说中国革命附带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

这就是把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完全依附于中国革命，而抹煞他的独立作用，外蒙就是在中国革命未胜利以前而求得解放的，恐怕将来也还有个别的少数民族先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独立也不一定。我们对少数民族解放与中国革命的正确关系的了解是辩证法的，而他的了解则是大汉族主义的。

以上是民族问题上一些争论。

十、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当中央到达陕北后，使他的工作环境更加固定，有更大的可能来领导全国革命运动，当时正是日本进攻华北，全国反日运动强烈的发展，尤其是全国学生反日运动的发展。自党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全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非常高涨，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酝酿与发展。党中央根据当时的环境的分析出发，于是有十二月决议。并将此决议电告国焘，当他接到这一决议时，还惊奇的说："这一决议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后来经过朱德同志劝解，他才又重新考虑，认为"陕北同志是不敢也无能来决定这一新策略路线的，大概是国际的指示"，于是就把这一决议当作国际的指示而接受。有这样无原则的人，不去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与从新结合，而把中央与国际对立。

在讨论了十二月决议后，又来一长电责备中央没有事先与他商量，责备中央隐瞒国际指示不寄给他，其实当时中央并没有接到国际的指示。国焘又责备中央不应提出"国防政府"，因为这是法国革命时的反动政府，而且也是中国反革命派所提出的，因此自作聪明提出了"抗日救国政府"。

虽然当时他把十二月决议当作国际指示而勉强接受了，但他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的从新结合，因此他也不能了解当时党中央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这在他关于民族统一战线许多报告和论文中可以看到。

1　民族统一战线——十二月决议，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把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错误的观念和机械的了解，用辩证法的方法给予解决，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不是同一的，也不是对立的，他是辩证法的统一。

国焘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保存老的观点，在那"阿弥陀佛"的念着，上层统一战线，下层统一战线，而更增加一个中层统一战线。

国焘同志了解民族统一战线是把上层统一战线除外，他至多只承认有中层统一战线的可能。他说："只有广泛的下层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

国焘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只有下层的统一战线，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的同意十二月决议，并不是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他以为十二月决议只是抄袭国际指示，如果国际指示不表示同意，岂不失去反党的资本，因此，他曾再三责备中央隐瞒国际指示不给他。

正因为他对当时政治形势没有具体的分析，所以他不得不仍旧抄袭过去老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公式，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原为下层统一战线，因此他不得不把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对立，而反对上层统一战线，他说："只注重抗日反蒋的上层联合，看不见联合战线的策略，主要是争取群众的下层联合，都必然是断送民族革命战争领导的机会主义的重复。"

因为国焘同志同意十二月决议并不是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所以他看不到当时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因此他认为十二月决议估计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这是一种幻想，他认为争取南京政府内部一部分参加抗日也是幻想。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参加一些反对日货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热忱"至多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民族革命倾向"。他认为："有些同志在民族革命的高潮面前发生过分的幻想，以为现在著名的军阀也可以来抗日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有害的幻想。"他们"更不能有什么民族革命的作用"。

国焘除了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原为下层统一战线，把下层统一战线与上层统一战线对立，而反对上层统一战线外，他又发明所谓中层统一战线，他说"除了革命与反革命外，还有所谓中间势力，包含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等等。""但是否可能与民族革命中的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呢？是可以的。"

国焘当时虽然口头同意十二月决议，因为他只是单纯的当作国际指示而同意的，他并不是具体的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同意，虽然他口头上同意十二月决议。但他对于十二月决议的了解却完全与中央不同，他过低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他看不到当时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原为下层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至多加上中层统一战线；他机械的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而反对上层统一战线。他没有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是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的统一体。

2　对党新政策的了解——党从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后，基本的新政策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焘同志又怎样来了解这一新政策呢？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紧急关头，积极组织工业中心的无产阶级，发展苏维埃和红军，发动广大农民和士兵的暴动，组织抗日救国军，大大发展基本群众抗日反帝的积极性……"。

这里很明显的看到国焘对于党的新政策是没有了解的。第一、如果照他的意见，党没有采取任何新政策，还是停留在六次大会的政策上面，国焘根本不看到党的基本的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国焘把以抗日为中心的政策，散布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他说："…………彻底的进行抗日反蒋战争，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即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认为抗日战争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抗日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才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是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完全不懂得。

斯大林同志在策略指导的原则中确定第一个原则是“必须在紧要关头集中主要的革命势力打击敌人最脆弱的一点”。他又在策略指导的原则中确定第二个原则：“必须从过程的链锁中找出特别的一环，务使拿住这一环，就可擎起全串锁链，并可准备到达战略上成功的条件。”

3　对日本的恐怯——中国前进的言论界，在“九一八”后，就坚持反对“中国无力抗日”,反对“唯武器论”的观点。可是国焘却比中国前进的舆论界还落后,他说：“…………但是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是简单的,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胜利,就是十倍于我们现在的力量,我们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他这种恐日病，当一方面军过山西时，他来几个电反对过山西，“劝”即回陕北，否则就会被消灭。当中央提出全中国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的口号时,他说：“这简直把红军拿去开玩笑，是冒险主义，作孤注一掷!”后来因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东进，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当时中央曾宣言为“保存国力，停战议和”，国焘又说：“自己站不住脚,还说什么保存国力”。这很明显表明国焘丝毫不了解中央曾一贯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如果照国焘这种恐日病，既不能抗日，而我们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只是一种宣传作用。国焘全没有了解列宁所说的：“党的策略是政党的政治行为的方向和方法”。

当着在沙窝会议时，泽东同志曾提出我们先夺西北，然后向东南打，曾经也受到国焘反对，这不能不是从他的恐日病中出发。后来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后，他仍然坚持把红军退到西宁去，他认为三个方面军集中是会吸引大量敌人进攻的，这也不能不是从他的恐日病出发。

*　　　　*　　　　*　　　　*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上说到“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后，我执行十二月决议”“但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事实并不如此！国焘虽口头上同意十二月决议，但在实际的了解上就在当时与中央还是分歧的。

十一、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问题

“中国革命的内容是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汇合”(国际决议)。但这并不是说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是同一的,也不是说他是对立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的主导矛盾,并不是死的不变的,他是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国内阶级力量结合的变动而变动的．现在民族革命占据着主导地位。

国焘同志怎样去了解“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关系的？他说：“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两大任务是互相联系着的，不可分离的(这当然是对的)。只有彻底进行土地革命才能组织广大工农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的出卖。也只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土地革命才有保障，才算得真正的胜利，如果土地革命离开了反帝国主义，就会是较长期的停留在乡村的革命战争，如果反帝国主义没有土地革命做内容，就根本不会是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见国焘论抗日反蒋与土地革命)。

国焘对于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关系的了解，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形式逻辑的，这只得出“土地革命不忘反帝革命”，“反帝革命不忘土地革命”的公式。从这种公式出发得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出来。

我们应当把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有横的联系、辩证法的联系、活的联系，即在他的发展中运动中来联系，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机械的、平衡的、相等重要的提出，而要看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的环境，国内阶级力量的结合，而应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那一个是中心的一环，推动中心的一环就可使他们活的联系起来，解决中心的一环，“就可使其他的任务势如破竹的解决下去”（斯大林）。中心的一环也如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动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目前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动，国内阶级力量的从新结合，应当是反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一环，这样才有党的新政策。

公式主义的机械的把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系，一方面是得不出今天党的行动方针，另一方面必然走到或者土地革命，或者是民族革命。因此他不能不认为土地革命是乡村的，而反帝革命则是城市的，也不能不一方面对党提出新政策时表示惊谔，另一方面没有前提之下“把苏维埃的旗子卷起来”。

十二、与苏联的关系问题

列宁曾经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指出以后各国的革命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就是苏联的存在。斯大林曾在他许多的著作中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国际意义。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是随着苏联的发展而变动的。斯大林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就是与苏联毗连。

国焘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是不了解苏联胜利对于世界革命的国际意义的。党中央在选择川陕甘作为新根据地时，就指与苏联的更接近，是其中优越条件之一，当中央执行北上计划时，国焘污蔑中央是要“一直逃到苏联去”，甚至那时有人诬骂中央是要当“苏联走狗”。国焘说中央失去了自信心，想依靠苏联的飞机、大炮。他说：“西北毗连外蒙与苏联，使我们能得到无产阶级的援助，虽然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主要的依靠我们自己，而与机会主义者之专门依靠苏联之飞机、大炮完全不同。”

当中央提出与苏联靠近，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时，国焘说这是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以口实，并援引察哈尔事件为例证。这是国焘完全不了解今天的苏联，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国防力量的巩固，国际地位的提高，可以防御任何外来的侵略者。

十三、党的统一问题

国焘同志在最近的文章内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提到，“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完全没有丝毫分歧……”。这当然是很好的，全体同志都是很高兴的。可是国焘并没有彻底揭发自己过去的错误，今天既已一致，那么过去的错误就应当毫无保留的揭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真正统一。如果还保留过去的错误，今天的一致是没有基础的。国焘认为他今天检查他过去的错误时，只是为着去掉“因过去有过分歧，不能不留下一些余波和痕迹”。这当然不能使国焘自己去深刻检查过去的错误。

同时他说：“……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这与事实不完全相符。这里不来重复对十二月决议了解的分歧，因上面已经说过。在十二月决议后，党中央为着暂时求得党内一致，以便对外，当时朱德同志也有同样的提议，如果决定他们取消自称“中央”，改用西南局名义，中央用西北局名义。在那时并不是党内真正统一，而

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以便一致对外，在那时国焘并没有放弃反对中央，西南局并没有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只是承认横的关系，而直属国际代表团。国焘在自己的报告中也曾说到："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使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

当时国焘认为中央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路线，所以能够统一，他说："共产党的行动是站在原则上的，我们斗争的是错误路线，倘这条错误路线不存在时，我们就可以趋于一致了。"

当时国焘是认为中央回到国际路线之下，所以能够统一，他说："陕北同志已经坚决为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我们反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回到国际路线之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

当时国焘是保留他反对党中央的意见留交国际或党七次大会解决的，他说："以后这争论可以用党七次大会或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形式去解决，我们原则上是反对不正确的路线，这是必须坚持的。"

当时国焘并不是承认中央，而是采取让步，以求得党的一致，他说："过去我们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让步，也是为着原则上的。"

总括的来说，当时国焘认为中央"承认"了错误，放弃了"逃跑路线"，回到国际路线下来，所以能够一致。当时国焘并没有承认中央，而是双方取消中央，所以国焘说："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证明国焘到今天还没放弃反对中央的武器，还保留他过去的错误。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承认他过去的错误，"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这当然是比较十二月决议时进了一步，但这还是不能使同志们满意的，因为政治与组织不是对立的，组织路线的错误不能不是从政治路线上发展下来的，国焘屡次声言他与中央的争论是政治路线上的争论，而且他曾反对中央的"右倾逃跑路线"，后来又反对中央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再后又反对过中央的由"'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发展到右倾逃跑路线"。在今天声言只是"政治原则性的错误"，这或者是没了解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还保留反对中央的武器。

当时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时，也曾声言他与中央有路线的分歧，所以他不得不成立"中央"。虽然国焘由电报中向"陕北同志"声明："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但是他在成立新中央的那天却宣布开除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的中央委员。

国焘在最近的文章内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提，他当作中央不知。国焘现在声明与中央在政治上与组织上与中央完全一致，这是非常之好的，但是如果不彻底揭发过去的错误，这种一致是与十二月决议后的一致相同的，是对于党没有利益的。

十四、我们的结论

上面只是把党中央与国焘同志分歧的主要问题提出，至于许多次要的枝节的问题，我不能一一详述。

总结起来，过去的争论是政治上、原则上、路线上的争论。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与当时党的任务出发，国焘在当时要采取

继续的退却，向西继续的退却，在红军苏维埃建设上，在党的建设上，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都与中央分裂。

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则由于中国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是由于国焘同志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彻底肃清他的错误，他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国焘在鄂豫皖工作时，基本上是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因为那时有下列三个条件：

1　鄂豫皖是老苏区，有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的基础。

2　有中央分局的集体领导，尤其是有沈泽民同志的帮助。

3　那时与中央有直接的关系，获得中央及时的指示。但在最后一个时期已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1）在肃反问题上开始采取脱离群众的办法。

（2）在反对四次“围剿”的问题上，没有积极的准备与群众的动员，而是“左”的空谈。

（3）在退出苏区的问题上，没有慎重的态度，而轻易的放弃苏区。

因为这些错误没有及时的纠正，因此在西征中及到达通南巴后，这些错误都更加发展起来，在通南巴从打败田颂尧后，就形成了一种路线的错误，到与一方面军会合时就发展到顶点。

国焘路线的社会基础是：

1　农民狭隘意识与流氓的破坏性的反映。

2　中国军阀土匪主义的反映。

国焘路线的历史根源是：

1　与国焘过去一贯的错误相联系。

2　与他的思想方法论相联系，即他的狭隘经验论机械唯物论相联系。

3　与他的高漫的宗派主义与派别成见相联系。

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

二月二十七日写完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同志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认为：

（一）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二）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三）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四）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组织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塞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五）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

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斗争而得到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六)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党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七)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联系着。

(八)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九)中央更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表现自己的机会。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

一　张国焘脱党的经过

（一）四月二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二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在七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同志报告之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二）张到武汉后，未去八路军办事处，亦未找党，在党外人的秘密保护之下，开旅馆居住。当中央同志将他找到与之谈话时，他公开表示自己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总路线与党均表示不信任，对革命前途表示绝望，不愿再干革命。经中央同志多方劝导之后才勉强搬入八路军办事处。

（三）他住办事处时，曾见蒋介石先生一次，开始即向蒋介石先生说"在外糊涂多时"，完全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回办事处时，又中途逃脱，经办事处同志多方寻找之后，才找回办事处。在办事处期间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并遍访当地要人，到处进行破坏民族抗日团结与党的团结的各种挑拨离间的活动。最后他自己决定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见面，并由该负责人派武装汽车将他接去，从此即不知其所在。

（四）张到武汉后，中央曾多方设法劝导，促其悔悟，要他回党工作，万一不愿回党工作，亦望他向党请假，暂时找一适当地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或到国际去，以便改变其思想。但均被拒绝。而在他于四月十七日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负责人后，即以书面申明自己最后脱党的决心。于是中央乃于十八日最后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此决定。

二　张国焘脱党的历史根源

（一）张国焘是中央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他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因他历次的严

重错误，曾被留国际三年余，给他学习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在国际不但不曾改正错误，反而参加了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并联合过托派分子。后来，几次写悔过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国际方才允许他回国工作。

（二）他回国时已在反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之后（一九三一年），当时，他在工作中表示积极，以图取得中央的信任。不久，即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开始时，尚能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但在工作中又进行其小组织活动，以个人的野心为出发点，用无原则的官僚政客手段，拉拢干部，打击坚决拥护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沈泽民同志。这些事实均证明张国焘始终以两面派的手段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面目。

（三）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渐发展。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最后形成整个错误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线。从退出川陕苏区到与中央会合，又与中央分裂，成立伪中央为止，是他的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关于他那时的错误，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他在那时犯了无数为一个共产党员所不应犯的错误，造成了很多不可宽恕的罪恶，违犯一切党纪军纪，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四）由于他的错误领导的无出路，军中党内大多数干部的不满意，与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宽大政策，所以最后他不能不被迫取消伪中央，率领队伍北上与中央会合，表示暂时屈服。后来他又写了几次声明书，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对于中央当时所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表示怀疑与不满。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谋害蒋先生及发动内战的方针，同中央的和平方针相对立。在这期间，他仍然处处以两面派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

（五）张国焘的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

三　张国焘何以在统一战线成立之后与抗战紧张之时脱党

（一）与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自卫战争，其中必然要经过与克服无数的困难与曲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张国焘在抗战未发生之前，即对革命表示悲观，对抗日表示绝望，因此形成了他的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发生之后，他经不起这种残酷的长期的斗争，以至在日寇的横暴的进攻前面表示投降，而离开了最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求得最后解放的唯一正确路线。本党是这一路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与执行者，因此，本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出于至诚的，而不是暂时的与敷衍的。但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为彻底实现民族解放的任务以及将来共产主义的任务，本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保持是绝对必要的。但张国焘始终不了解这一点。在国共合作尚未成立以前，他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表示怀疑与不满，在国共合作已经成立之后与正当抗战紧张之时，他又转到另一极端，走到投降国民党。

（三）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长大起来了，党的影响也扩大了。无数纯洁的革命分子要求在党的领导之下工作奋斗，并大批的加入党。但是，在另一方面，党内最少数最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这个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在其挑拨离间与各种诱惑之下，发生动摇腐化，丧失了阶级的立场，以至个别的脱离党。这种个别脱离党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最近如周昆、张绍东、李龙贵等的逃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的。张国焘的脱党，外界对他的这种影响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对于资产阶级这种影响，我们不能有过分的夸大的估计，因为

这只能够影响个别的动摇分子。党就要在清洗这些投降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的斗争中来巩固自己的团结与力量。但对于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

（四）党在中央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党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八路军在抗战前线的胜利与模范的作用，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的威信。全党同志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过去受过国焘路线影响的同志，也因中央正确的开展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都能了解到国焘路线的错误，而拥护中央路线了。因此，在两面派掩盖之下的反党的张国焘路线得不到党内任何同志的同情与拥护。他的反党的言论与活动，处处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张国焘在党内是孤立了，他在党内寻找群众的一切企图是失败了。于是他只有从党内跑出去，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他的会见陈独秀，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张国焘脱党以后的前途。

四　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一）中央对于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曾一贯的采取了教育与说服的方针，就是在他犯了成立伪中央的那样严重错误之后，中央仍本宽大精神用一切方法多方诱导，并仍分配他以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一切这些仁至义尽的方法终究挽救不了这个腐朽的机会主义的没落。中央过去对于挽救一个犯错误的党员实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二）张国焘的出党对于本党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这使我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的与巩固的向着自己光荣的前途迈进。

（三）在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更应该坚持民族抗战，坚持扩大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后战胜日寇的总路线，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个人野心的派别的无原则的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同志，巩固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

（四）在反对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应该加紧向全党同志解释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作用与意义，使他们清楚了解，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是和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不可分离的。应该加紧对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们能够灵活的使用这个尖锐的武器去为民族解放的事业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

（五）中央对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叛党行为、与坚决拥护国际和中央路线、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张国焘的影响与是否犯过错误，都是一致爱护的。各级党部不得因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而无根据的牵涉到或怀疑到任何忠实同志。同时，估计到张国焘出党之后必然从党外千方百计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警惕性，严防张国焘的挑拨离间欺骗煽惑与破坏。

（六）让张国焘等这类腐化的叛党分子滚出去吧。更加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加强党的团结与一致。吸收成千成万的优秀的革命分子到党内来，回答这些东西的叛党吧。

让我们全体忠实的共产党员高举起马克思与列宁的旗帜，为最后战胜日寇，为民族的、社会的与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

〔附〕张国焘声明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阅读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之决定一节，本人特为如下简单之声明：(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二)当此国家民族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感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之力量。(四)本人曾本以上主张，用至诚态度，与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同志初步商讨，不料此项商讨仅于开始进行，中共中央突有开除本人党籍之决定，公布极端。本人与中共关系极深，该决定内所说各点，均不必急于答辩。甚望中共中央和中共诸同志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并与本人诚恳商讨，不使稍有遗憾，俾吾人与全国人士，均得共本抗战救国、抗战建国之主旨，向前迈进，则幸甚矣。

〔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

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诟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般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到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先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

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而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励。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变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近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相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谬误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界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岂以为人尽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

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二十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照然，当可复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

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势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共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亦全体民族之福也。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的完成了党所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苏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面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久日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堡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为我们的会合震憾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就在）前面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
支队全体指战员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决案

（一九三五年九月）

（一）全体同志们！这次听了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同志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所作的报告，这一指示信与报告给陕甘党许多宝贵的指示，并揭发陕甘党过去的很多错误，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一正确指示，我们把中代的指示信和朱理治同志的报告一致的通过，作为我们的决议案。陕甘党号召全体同志，坚决的为实现这一指示而斗争。

（二）正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所正确估计的，陕甘党在中央五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以及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具体的指示之下，以及在全党同志的艰苦奋斗之下，已经“开始的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初步的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在这一基础上获得许多光荣的成绩。但是，必须着重的指出，陕甘党目前正存在许多严重的弱点与错误。这主要表现在：（1）在二次“围剿”开始的时候，在军事上表现的退却逃跑，虽是以后纠正了，但是，在目前还是在一些地方残余的存在着；（2）对扩大红军的意义，机会主义的估计不够，红军数量的稀少；（3）对地方暴动的完全忽视；（4）土地革命中犯了许多的错误；（5）苏维埃的民主制度，尚没有广泛的执行，苏维埃内部的反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的斗争，异常的不够；（6）苏区中工会工作的忽视；（7）白区城市、农村、士兵反帝工作的忽视等等。这些弱点与错误的存在，使我们不能在这有利的条件之下，获得到应有的胜利。这种错误的发生，正是由于陕甘党执行中代正确路线的不够，所以发生。因此，扩会全体同志坚决指出过去陕甘党对于领导机关指示的不重视，甚至污蔑中央驻北方代表为“尾巴主义”的严重错误。

（三）目前西北形势，完全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以前的分析，帝国主义国民党它们为了在西北争取干涉中国苏维埃运动，及进攻苏联的根据地，为了要阻止西北革命，对陕甘苏维埃红军游击队作拼命的残酷的进攻。最近出卖华北，更布置大规模的三次“围剿”。陕甘党不能轻视帝国主义在西北的作用，然而，国民党在这一次的进攻中，增加了许多的困难，武断宣传破产，经济崩溃，士兵哗变，他们内部矛盾的加深，特别是我们的力量数倍的增加，红军苏维埃的扩大，党的影响扩大，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增加，所以说，目前阶级力量对比上，对于我们更加有利。只要我们党能够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我们不但能冲破这一“围剿”，而且可以与全国红军在一起，争取全中国苏维埃的胜利。我们应当打击在这一“围剿”的前面的惊惶失措、退却逃跑，那些无气节的右倾取消主义的动摇；同时，我们应当打击那些“左”的乐观主义，他们因胜利冲昏头脑，觉得我们什么都做好了，敌人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三次“围剿”不可能了，或者说这一次“围剿”只不过是“照例围剿”而已，而忽视动员群众，去冲破这一次“围剿”。

（四）在这种情势之前，我们认为除总的完全执行中代的指示上所布置的工作，必须特别着重以下的中心工作：

（1）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三次“围剿”，与红军配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

(2)领导群众政治经济斗争，在斗争上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红军；(3)组织地方暴动；(4)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与游击区域，彻底实行苏维埃民主制度，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5)彻底深入土地革命，实行查田运动，纠正过去许多错误；(6)领导白区群众工作与白军士兵工作，特别是加强城市工作。

(五)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执行中代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暗藏在党内以蔡志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他们的主张是实际对党的路线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革命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他们不但认为目前陕西革命尚未胜利，而且认为目前争取陕西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常常惯用煽起党无原则的斗争，他们反对陕甘党是立三路线，很显明的，他们利用反立三的旗帜掩盖他们右倾取消主义的真面目，进行反党的活动。这种错误特别是陕甘边区与陕南区，因与上级关系断绝一时期，容易受右倾取消主义的影响。陕甘党没有认清楚右倾取消主义对党的危害，对右倾取消主义采取一种调和主义的态度，影响工作的发展，停滞、阻碍党的工作进展，使陕甘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明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所以陕甘党站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正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的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陕甘党才能很顺利的完成一切光荣的任务。

(六)同时，扩会着重指出：目前陕甘党内的领导方式是很错误的，这主要的表现在领导的脱离下层，缺少个别的具体的指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领导上的无计划，无检查，无个人负责制，不去研究经验与教训，自我批评的不开展等等。这也是使我们得不到应有成绩的一个原因。扩会一致认为必须立刻纠正这种现象，并根据朱理治同志在扩会所指出的具体方法，来转变陕甘党的领导方式。

(七)为着要更加顺利的领导陕甘的工作，成立陕甘省委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省委全体党员在中代所提出的以下四个光荣工作，使其早日实现，来迎接新省委的成立：(1)开展反对右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上；(2)要实现完成实足铁的两军红军(九千人数)；(3)争取到数县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4)创造几个模范支部。

陕甘党动员全体同志一致的执行这几个任务，争取陕西省委的建立。

(八)扩会一致的表示自己的愿望，要在坚决反对党内的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中，要在艰苦奋斗执行中央的总路线之下，由开始的走到布尔塞维克的道路，走到最后布尔塞维克的道路，和全国党的新进队伍一样，来争取苏维埃全中国的胜利。

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西北局详细的审查了陕甘区域内张慕陶反革命派案件之后，指出：

（一）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

（二）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的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关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三）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目前具体的工作应该是：

1．继续开展与深入反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思想斗争，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欺骗阴谋和散布在党内外的影响，组织群众的公审大会发动群众的斗争，提高群众反对反革命的仇恨，发扬群众的阶级警觉性与积极性，在这一群众动员的基础上，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最后的消灭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

2．立即改组过去省保卫局，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加强党对保卫局的领导，健全保卫局的组织与工作，调选政治立场坚定的从群众斗争中出来的干部，担任保卫局的负责工作。保卫局委员会须有同级党的书记政府的党团书记参加，这个委员会要经常检查与讨论保卫局工作，保障肃反工作中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执行。

3．深入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消灭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基础，这是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最基本方法。除保卫局应充分发扬与反革命斗争的作用外，党、团、政府、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都要加紧与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这种斗争应该同彻底分配土地、扩大红军、整理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等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4. 为着保障党的路线正确的执行，必须继续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为了团结反右倾的取消主义斗争的火力，必须不放松对左右倾向的斗争。思想斗争中的平均主义，把每个同志各种轻重不同的错误都认为右倾取消主义的倾向，应该立刻纠正。同时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和地方观念，也必须予以打击。只有不调和的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作斗争，才能集中斗争力量来顺利的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肃清反革命派在我们队伍中的一切影响。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毛　泽　东

一、直　罗　战　役

一、此次敌人进攻的严重性：

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后，敌主力由西边进，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

二、我们胜利的原因：

(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三)战斗准备的充足；

(四)群众与我们一致。

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没有第一个条件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不能使董英斌五个师(西边四师东边一师)，在其先头百〇九师消灭后，主力即溃退，我军又于追击中消灭百〇六师一个团，使百〇八、百十一两师，不得不退到甘肃境内，东边侵入羊泉二百十七师也不得不退出鄜县城。没有第二个条件就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而让敌人占去了葫芦河与直罗镇。没有第三个条件，则部队没有休息、训练，士气与战斗力不能提到这样高；张村驿东村等五六个民团土围子不消灭驱逐，便不能荫蔽主力与便利战斗；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署的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没有第四个条件则荫蔽主力与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的这样好。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这次大胜利的原因，而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的实现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一)两个军团更加团结。(二)抓住战略枢纽去布署战役，抓住战役部署去布署战斗。(三)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四)努力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这次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

这次胜利最后的解决了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布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时间与地区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我们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

四、这次胜利的影响：

(一)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得到进一步的团结。到现在人人都相信这种会合与团结是很好的，是必要的，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二)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在胜利影响之下，当红军的也更多了，指导扩大红军的同志们也更起劲了。

(三)巩固了苏区。苏区群众人人高兴，群众拥护红军帮助战争的积极性必定更加提高起来，"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真不错"，这种舆论是在沸腾着。

(四)容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在胜利影响之下，必会更加积极起来。

(五)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与全国的，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卖国的国民党请滚开，全国人民的救星——红军与苏维埃要同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国民党，打倒卖国贼总头子蒋介石。全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

(六)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你们看：我们在北方最后的粉碎了三次'围剿'呢！二万五千里远征的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战场上会合了，并且活捉了牛师长呢！你们勇敢的向前吧！"

(七)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八)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他的侧翼和后路的，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同志们，这次胜利的影响是大得很的，我们要发挥这些影响出去，要向每个红色战士说明，要向前方后方苏区白区一切工农群众与一切白军的兵士官长解释清楚，使他们了解与同情我们。

二、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一)在世界

——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东方、西方)。

——无产阶级及民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法国七月十四日的四十万人大示威，今年美国的空前的大罢工，西班牙与希腊的民主革命、各国的革命形势)。

——殖民地的反帝运动（阿比西尼亚的民族战争，中国的高涨的革命运动，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苏联的独立与生产赶上与超过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又一个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红军的新任务——"胜利是定了的，现在只是用小的牺牲去换得大的胜利的问题，红军在进行技术与战术的突变"。

——世界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二)在中国

——日本的行动（独霸中国的严重局面）。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英美与日本）。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蒋系与反蒋系的酝酿与展开）。

——以陕甘红军为领袖的三个主力红军（我们二、六军团、四方面军）。

——恢复了及发展了的游击战争。

——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

——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三)在西北

甲、在敌方

——张学良三个主力军的击破（王以哲军、董英斌军、何柱国骑兵军）。

——于学忠、万福麟两军的徘徊。

——刘多荃的孤军。

——杨虎城的防御地位。

——阎锡山是辅助作用。

——蒋介石在待机位置。

所以三次“围剿”彻底粉碎了。

乙、在我方

——红军不可侮的力量（莫以为队伍比过去小）。

——游击战争的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表现着与蕴藏着的力量）。

——党的正确领导（中央）。

——白区群众的同情。

——白军士兵与下级干部的同情。

——少数民族的同情。

所以我们是有良好阵地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向前发展着。

(四)四次“围剿”问题

——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卖国政府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使张学良下不得台。

——我们的发展使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寝食不安（特别是阎锡山他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的两个主要敌人，四次围剿中阎锡山必从山西向陕西打来）。

三、新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内去，完成与苏联及外蒙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

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未有的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

二、猛烈发展游击战争

——使游击战争向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内广泛的有力的发展去。

——四个月内游击部队扩大一倍。

——使游击战争的发展增加计划性。

三、一方面军的任务是：

(一)继续消灭困守苏区境内的敌人，并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以求得人员武器的补充与苏区的巩固。

(二)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的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

(三)切实训练自己，提高方面军的战斗力到很高的程度，一方面着重射击教育与战术教育，一方面着重基本的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我们的射击和射击指挥还有严重的缺点，我们的战斗指挥还非常之不精熟，一定要求得一个彻底的转变。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摆在红军面前的迫切任务。

(四)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这有地方党政力量与我们配合去作。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要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拿命令的甚至骂人的态度去对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对的。

(五)猛烈破坏敌军，把破坏工作变成红军与居民的群众运动。改变对付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的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兄弟看待，严禁报复行动。

所以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任务，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这里提出消灭敌人的任务，不会妨碍也不应使它妨碍其余工作（尤其是扩大红军）的完成，即不去追求不可必得的战斗。不跑到很远的白区去求战斗。提出的这些任务与工作虽然是红军经常的任务与工作，但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目前时期内是有它的特殊的内容与意义的。

四、我们拿了这些去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我们拿了这些去取得对于全国红军游击战争与抗日反蒋战争的领导，我们拿了这些去具体的准备着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直接作战——我们领导着用武装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华北并吞全国与进攻苏维埃。我们的神圣的责任，要求我们的同志拿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去进行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这样做，伟大的胜利是我们的。

(附注）这是毛主席自己起草的，干部大会报告的提纲，他的详细讲词就不发布了。

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一九三六年七月）

任 弼 时

关于行动的方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自桑植刘家坪出动，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江入西康到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七个月零十天，行程约一万□里。整个长征经过可分下列四个时期说明：

A　由刘家坪至石阡江口为第一时期

B　由石阡江口至黔（西）大（定）毕（节）退出为第二时期

C　黔大毕退出至中甸为第三时期

D　中甸以后为第四时期

第 一 时 期

（甲）二、六（军团）冲破敌人“围剿”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形势和退出苏区的决定：

1．二、六军团在龙来宣地区将敌人“围剿”冲破后，主力进入津、醴、陵、石地区补充整理，开辟东西广大游击区域威胁常岳。

2．敌在围剿失败后，继续布置新的大举“围剿”，一方面以原有的兵力(共约八十七团)巩固和增筑南西北三面封锁线，另由鄂赣增调新的兵力（约四十二团）从东面向西压迫，企图逼退我军于龙、桑、永间狭小地区，包围封锁而聚歼之（这时南西北面敌为防堵性质，东方为攻势）。

3．当时各方面的条件：

A　日本正积极图华北，白区反帝斗争高涨，宁粤冲突呈现紧张；

B　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开始突破敌之封锁进入成都雅州附近活动；

C　我主力经半年战斗后，在津、澧、陵、石地区得到约六千新战士补充，计有十二个团（四、六、十七、十八）红校（约一个团）四个独立团（约等两个团）及少数游击队。

D　原有活动地区，东西约三百里，南北百余里，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粮食缺少，地形上不利大兵团进行战斗。

E　二、六军团及湘鄂边苏区位置长江中部，接近武汉长沙，他的存在发展对一、四方面军配合作用与对敌威胁均颇大，故蒋以大力决心进攻。

4. 行动方针决定的经过：

A　最初拟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当时一、四方面军尚无行动)，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地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桑永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破其他方向之敌。但因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和东部地形关系以及主观方面条件(如上述者)，认为在当时敌情下，依据活动在不宽广地区来打破敌新"围剿"是困难，因此向军委建议主力转移到石镇黄地区活动。

B　当时军委对我们行动的指示是："在现小地区内因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十月十五日。"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十月十九日。但在说明这是一些建议，由我们按实况决定。

C　按当时情况，北面封锁外，地形极坏，且有清江、长江，西面附近地区敌兵力较大有碉网，且西北有乌江、长江，东面地区狭小，南面有澧水、沅水之隔，且主力突出封锁线外，敌必进入苏区不易再回原区。而在附近虽可能取得战斗上的一些胜利，但难能久停。因此最后决定突出封锁线向湘黔之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本拟由西南突破向湘黔边前进，因敌特别防我由西南面突出，故决由东南渡澧、沅水)。

(乙)出动前后部署与经过：

5. 出动的布署：

A　原有区域内留一个主力团，并以地方游击部队在主力出动后，集中编为一个团，担任龙、桑、永地区游击战争，尽量吸引周围敌人，掩护地方组织工作（准备秘密条件下工作)。

B　将地方独立团分编为五师及十六师部随主力行动，以后方机关裁员补充主力，出动时全部人员近一万七千人。

C　当时估计敌在我军突出后，重新布置追堵，有短时间间隙可利用，决采逐步向湘黔边移转(不直接走到)，尽量避免部队减员，拟首先分布在湘中沅、资两水地区进行补充、筹款，扩大抗日反蒋号召，发动群众斗争，并争取在广大堡垒稀少地区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集中力量求得（在）运动战中击敌，并预定可能的先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

6. 突出沅水南后的形势与经过：

A　顺利的渡过澧沅水之封锁线后，二军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占辰溪、浦市、溆浦等城市，六军团同时期内占新化、锡矿山(长宝震动)。

B　敌在我军突破澧水封锁时即开始新的追堵布置，其大要是：1. 以樊纵队四个师，李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敌经慈利渡沅水，向新化、溆浦间进，李敌由沅陵、卢溪向辰溪、溆浦进，以陶纵队三个师，郭纵队八个团进沅水西岸，为堵截部队，以汤纵队两个师（十三团）调长岳防守并作预备兵力，新溆以南较空虚(仅几个保安团)。敌似防我西进，在不能给我打击，则极力将我向南（两广）压迫。

C　在我军占领新溆辰后之二三天，李纵队先头即逼近浦辰，樊敌进至新化以北地带，我军当即放弃辰新，集结主力（四五六及十七师）远出迎击樊敌之六纵队，调集余部在对敌

钳制之任务。但因情况变化，樊敌未打到，而李敌乘虚进占溆城，当时樊李靠近，陶郭分布沅水西岸溆新间地区不断停留。

D 依据军委当时电示："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大意如此）之指示，我军分途向东南（宝庆、新化间）移动（曾企图打击南追之樊敌，但因敌迅速靠拢之情况未果），造成再渡资水之形势，迷惑敌人(当时樊李两敌靠拢尾追)，汤敌由长沙向宝庆开进，陶敌到溆浦南沅水之东岸(龙厚)，再向西急进(陶敌向南急伸阻我)，并决心侧击阻我之陶敌，瓦屋场战斗因陶敌先一日到达布防，战斗无结果(我伤亡三百余)，我军继往绥宁洪江间□北转渡沅水（此时桂廖磊部约六个团进入桂湘边会同绥宁等县境防堵），转入全部追堵敌军之西面，进到湘黔边广大地区。

(丙)湘黔边活动与继续西进之决定：

7．适应我军在湘黔边创造新根据地之总目的，(当时敌情)，决心在晃芷间反击尾追之敌，以求得新的有利局势之开展。但便水战斗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仅给急追之敌以创伤(敌我均伤亡在一千左右)，表示我军有战斗能力与决心，使其不敢轻于猛进。

8．便水战斗后，我们向西北转进，占领江口、石阡并准备休整几天，打击敌与西打阻敌。敌对我军估计与调动是：

A 敌防我由湘黔边北进再转回原有苏区，同时防我在湘黔边境创造新根据地；

B 其部署是：以李纵队尾我进路后追，以樊郭陶三个纵队绕出我军东北，防我北进，以许绍宗及徐源泉之一部巩固酉、秀，开始调动驻黔部队从西面防堵，汤纵队则调回防粤桂，此时在不能打退我军，仍企图将我军向桂黔边压迫。

9．我军向北迷惑敌人，在敌重新部署下，大部在石江线得到一星期之休息，依据下列敌我形势和各种条件放弃在湘黔边创造根据地企图：

A 因便水反击敌人未能给敌以决定意义之打击，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

B 敌依据原有碉线（已成碉网地区）已成包围逼进形势（当时敌情），我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

C 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

D 军委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离敌军较远活动，但勿入大荒野地带，敌兵力虽多，亦能进退可（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小，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势……"。

根据上述情况及军委指示，乃决继续西移，要求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并拟在黔省西部争取创立根据地。

第 二 时 期

(甲)由石阡到黔川滇边——黔大毕：

10．我军突破镇黄余庆封锁线后，占领瓮安平越侧击黔敌未收大效，进入黔省中部逼近贵阳（占领扎左修文），有北渡乌江形势，当时堵我之黔敌急赶贵阳，李敌随后跟进，郭樊纵队向遵义地区转进，郝敌沿乌江北岸防堵。但陶纵队停止在松度线，追敌此时不甚积极。

11．军委指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根据地"。据此

我军即渡乌江进占黔大毕等城市。

12．到黔大毕后，军委指示“关于你们行动有二：(一)在黔滇川境广大地区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二)入川……与我们会合作战，一、三军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

13．根据军委指示及我们估计，在全国革命形势激烈开展条件下，二、六军团应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决心在长江南岸活动。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反动统治力量等条件上，均有利我军活动，故决在该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乙)黔大毕根据地布置及斗争经过：

14．敌之布置是：以万郝两纵队为主力，配合郭樊敌由遵义向黔西追进，以九九、二十三等师及李纵队位置乌江上游防堵，以川敌约三十团位赤水河北及长江一带防我入川，以滇敌孙纵队（八团）在威宣地带堵我入滇，企图包围消灭我军于黔大毕地区。而以东面之万、郝、樊等蒋系部队行动较积极。

15．我们除以一部任钳制方面并担任掩护地方工作外，集结主力迎击东面急进之敌，争取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灭东西敌人，消灭其一部，以开展有利局势。

16．与敌战斗经过：(1)有力的阻止了东南面敌人，但未能迅速占领东北面有利地势(三重堰)，又未能坚决打击首先急进之敌；(2)西南移动及东北伸出击敌之计划；(3)对万敌估计之错误；(4)几次迎击敌人因敌情变化未收大效；(5)最后敌靠近，而我成被动局势。

(丙)黔大毕之退出：

17．因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定三路靠拢逼进毕城（地形上毕城不保），周围约一百二十团敌人，包围线内之活动范围狭小，而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故决自动退出毕城。

18．在黔大毕时军委曾指示：“(一)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二)你们即可取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我们当时选定（东、南、西南三方向）向安顺地区转移，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

19．我军退出毕城后，敌企图逼我在毕威道上（该地带粮极少，居民稀，山大，而道路面简单）而歼灭之。当时李敌进水城羊场，郝郭由毕、大急向水城协同李敌堵截我军南进，樊万敌由毕向西急逼，滇敌孙纵队集中威宁及附近坚工防堵，川敌西移防我渡长江及北进。

20．因情况变化，南进困难，改向滇东转移，李敌急由水城伸入威宁与孙敌会接防堵，西南进未成及被逼于毕威道北之彝良、镇雄间狭小困难地区。在天候给养困难情况下，敌以高度积极动作企图在该区域内消灭我军，亦为我军长征中处境困难时期。

21．我军在追击樊敌未收大效后，即以急行军拟向东再南移，突破敌之包围进入安顺地区，但敌迅速东调（防我东向）中途遭遇（则章×财神塘）而未果乃继以急行军乘虚绕过威宁进至滇东，至是乃最后脱离滇川边而开始进入黔滇边广大地区。此时敌我均疲劳，敌比我更甚。

第 三 时 期

(甲)滇黔边的活动：

22．我军神迅进入滇东时，敌主力(樊、万、郝、李等）尚在毕镇里地区，仅孙郭尾我跟进。宣威战后我军东移滇黔边界并占盘县，有东渡盘江姿势。此时疲劳之敌主力不甚积极，拟移盘江东岸防堵，似有暂隔江休整，重作进攻布署之形势(敌一部万传等师移贵阳安顺地带整理）。

23．我军根据下列条件拟在滇黔边活动，并创立根据地。

甲　盘江以西，□江以北，□江以东乃一广大地区，群众地势粮食条件均有利我军活动。

乙　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滇军作战经验少，战斗力不甚强，黔西为孟国材统治区域）。距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武汉）较远，交通不便增敌进攻困难。

丙　当时周围敌兵力减少，——只孙郭李樊郝纵队约五十余团，□——川敌在长江北岸及附近黔敌一部(如99、93、23等）退出追剿，巩固黔防（对桂），且极疲劳，减员大，士气坏，且一时无援兵，宁粤矛盾下桂敌不致积极，且兵力并不大，李郭自称减员过半，早请调回湖南，仅孙较积极，有利我军，各个击破。——是我军远征过程中最有利环境。

我军曾拟集全力首先击溃孙郭两敌，以开展新的局势，创立根据地。

(乙)北渡金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之决定经过：

24．宣北战斗以后，军委指示："……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之前，设法渡过金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队接应你们，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二十五日)。

25．因军委无肯定之指示，我们不知是因战略上的要求必须渡江会师北进，或恐主力将来北进后二、六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过于孤立困难，而要我军及早北渡，或是军委估计我们现在处境很难战胜敌人而要我们北上，当时要求军委决定我们行动，其电文如下："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最后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应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三月二十九日盘县)。

26．军委三十日发电："(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应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因为军委复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江与主力会合。

(丙)北渡金江之经过：

27．当时敌主力在盘江东岸，距我有四五日行程以上，孙郭两敌在我西北对倚停止状况，我军决经昆明以北渡普渡河，争取在元谋北渡金江经华坪永北北进。

28．我军突过孙敌逼近昆明，孙敌以急速行军赶至昆明普渡县会合昆明及遒西驻军扼阻普渡河，严防我入遒西地带，企图压迫我至于功山地带消灭之，与敌接触后再逼昆明乘虚在

富民西渡因求脱离追敌（孙、郭）防川敌北阻顺利渡过金江，以急行军到达金江（□最后路线)之江边，虽接应部队未能赶到，亦顺利北渡。

29．我军北渡后孙敌达江南岸停止，李敌继到，樊敌赶到永北华坪。我军乃赶至中甸集结休息，与主力会合计划大体告成。

第　四　时　期

蒋敌“追剿”决心之失败与我军继续北进：

30．当我渡过普渡河进入鹤庆、丽江时，蒋敌尚决心消灭我军于长江天堑以南之狭小地区，并有万一北渡之后消灭我军之布署，迄我军进入中甸后，因番区物质地形上限制，追剿部队过于疲困，乃停止而成防我南进之布署，另以川军（刘湘部李家钰）及驻川西蒋军由大渡河及理化、巴安截断我们与四方面军连系，并向西南金江边逼进，在四方面军配合接应受阻后，其追剿消灭二、六军团计划乃全归失败。

31．自中甸以后，乃继番民区域气候生活习惯全异汉民地区，番民性强悍，给养困难，我军在中甸短期休整即分途经得荣、巴安、白玉及经定弓、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北进。中途只与番骑接触。

32．中甸以后行军最缓，但因粮食困难，居民逃避及生活不惯，部队一般的情绪虽好，但病亡大增，体力甚疲劳。

二、六军(团)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

(甲)这次远征的成功：

1．二、六军（团）突出敌之包围封锁后，蒋敌要以最大力量与决心企图乘我脱离根据地用“穷追猛剿”办法消灭我军（在第一时期追堵兵力计有七十余团，第二时期内前后计一百三十余团，第三时期内六十余团，最后时期尚有五十余团，努力阻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万余里长征中敌曾几次努力“包剿”(溆新间，江石间，黔大毕，彝镇间，金江边等)，我军并未受到损失，虽未能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但仍给敌人一些小的打击(瓦屋场，便水，平越，将军山，黄家坝，以则河，则草坝，宣威，六家口，小松元等战)，最后能胜利的与四方面军会合。蒋敌追剿消灭我军之企图一般是失败的。

2．七月来经万余里之长途远征大小十余战，一般的尚保存了有生力量，行军作战中虽有不小的减员（二军团共减员约七千□百，内（含）伤亡)，但沿途曾有很大补充，黔大毕退出时两军团共比桑植出发增加三千余员，盘县时尚保存桑植时数目，盘县后的急行军到中甸比桑植时约减少一千名，特别进入番区后得不到补充乃成减少趋势（比桑植时)，现在两军人员计有一万四千，比桑植出发时少三千余，武器虽沿途落伍逃亡中有些损失，然现在尚保持桑植出发时的数目，部分的是增加的（如五师增加一倍)。

3．这次远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三十余县城，是广泛的传播了党和苏维埃政策，特别是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组织和发动一些群众斗争，揭破了国民党卖国殃民罪恶，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摧毁的力量。

(乙)我们未能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原因与错误：

4．我们脱离湘鄂边苏区转入湘黔边创立新根据地的决定一般是正确的，这一企图失败的原因：

A　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不能迅速追进，未估计到敌新围剿布署已成，兵力集结易于转为"追剿"布署。

B　因此在湘中时我军兵力过于分散，失去消灭敌人时机（如打陈光中及李敌之时机）。

C　瓦屋场、便水战斗又未能给敌有力打击，致成被动局势。

5．放弃湘黔边及转入黔大毕，在川黔滇边创根据地的决定亦是正确的，未能成功的原因：

A　进入黔西后，未能乘胜占领有战略意义之地区，又未能以坚决的战斗夺取这些地带。

B　未能乘敌调动兵力部署未妥之有利时机，坚决各个击破敌人。——东北出动计划过迟。

C　对敌估计上的错误（如万敌之急进），以致失去战略要地（如大定飘光中），各方敌已逼近，我成被动局势。

6．几次战斗中某些战术上的错误（未有总结）。

（丙）我们所得的主要经验：

7．在不可免的脱离根据地而采取长距离之转移，为保持有生力量，可采取逐步转进，这一策略：

A　可以减少部队远行军的疲劳，减少落伍和疾病。

B　可在中途停留时，争取人员物资的补充，可能使部队扩大——惟须避免进入过空僻地带——。

C　但力量不宜过于分散，要准备在有利时机消灭敌人。

D　更便利做群众工作散布政治影响。这种策略下完成远征计划不一定是削弱有生力量，正确的运用甚至可以壮大部队，造成创造根据地更有利的条件（我军若□中甸后番民地区关系，原二、六军团可能比桑植时还要壮大）。

8．为着顺利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

A　在到达预定工作地区前，求得在运动中取得有利战斗的胜利，求得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并可采取曲线的行军以迷惑欺骗调动敌人，造成有利消灭敌人良机，握住主动地位以疲困敌人。

B　既到预定根据地区后，必须抓住敌进攻部署未妥善时机克服暂时的疲劳，集结主力乘敌调动而各个击破之，巩固战略要地，必要时应伸出基本根据地带以外远出迎击单个前进之敌，或调动敌人于有利地带求得击灭之机动。要力求连续胜利的战斗，以挫追敌，使之疲困而停止急追转入缓进包围或不得不重新布署，这才能保持基本根据地区，并使我们能得到休息与补充，和开展根据地之基本群众工作，聚集力量准备迎击敌人新来的积极进攻。

9．我军在远征中，不应避免有利的战斗，并应抓住有利时期求得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总能取得大小胜利为前提，不可避免的战斗自在外），这不独不致损坏战士情绪，反可增高勇气，同时使敌不敢轻于猛进，取得休息的可能。但须避免无利的战斗，若处处避免战斗，见敌即走，反增部队之疲劳，降低战士情绪，增大敌人勇气，实际是一种退却逃跑。

运动战特长的发扬

只要有决心信心，是可以克服任何困难。□□创造与发扬运动战中巩固与扩大部队的经验与推动——党领导力量，政治工作威能。

原注：这个报告提纲系任弼时同志的工作日记，原题为红二、六军团长征总结。原文未写时间。因二、四方面军系于一九三六年六、七月先后会师。推算该故件系于一九三六年七月所作。

第四方面军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胜利完成长征

与一方面军懋功会师北上

西渡嘉陵江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纷纷溃退。方面军为贯彻既定向川西和甘南发展的方针，遂乘胜发起彰明中坝战役。但就在这个期间，张国焘已擅自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从此，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

彰明中坝战役

彰明中坝战役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旬开始。当时敌二十八军邓锡侯部，以三个旅布防于梓潼、魏城和江油、中坝地区，军部率机动兵力一部驻于绵阳。北面松潘、碧口、广元一线为敌胡宗南部；南面三台、射洪、盐亭地区为敌二十九军孙震部。依据当面敌情，方面军决定首先攻占江油、中坝、彰明及涪江以东地区；相机占领青川、平武进出甘南，寻求战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根据这一决定，九军、三十军、四军一部，以迅雷之势分由梓潼、菁林口直向江油挺进；十日，九军渡过涪江，包围江油，直逼中坝。三十军另一部北出，十日占青川，在摩天岭歼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十四日克平武。

江油、中坝为川陕大道的咽喉，是邓锡侯老巢——绵阳的门户。邓锡侯为解江油之围，乃拼凑十八个团，在空军配合下向江油大举增援。方面军遂以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集中三十军八十八师、九军二十五师全部及四军十师、十二师各一部于江油、中坝之间打敌援兵。十四日，红军与敌激战于塔子山、雉山关一带，予敌重大杀伤。十六日八十八师一举攻占塔子山主阵地，二十五师迅即向敌右侧后猛插包抄，断其退路。敌立即动摇，方面军乘机展开全线反击，将其击溃，全歼逃敌四个团，俘敌官兵三千余人，邓锡侯几被生擒。接着于十七日克中坝，十八日克彰明，二十一日克北川。四军一部乘胜经北川向北挺进，与敌胡宗南部激战于镇江关，另一部由梓潼出彰明与三十军会合。

党在川西北地区有着长期的工作基础。红军渡江前，中共南（部）阆（中）中心县委曾领导升钟寺、保成寺地区农民游击小组积极打击敌人区乡政权，破坏敌交通联络，配合红军渡江作战。渡江后，方面军立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的配合下，积极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南部县的升钟寺、保成寺及江油县界石坝等地区，先后建立起区乡革命政权，并建立了南阆县工农民主政府。同时组成了升钟寺独立师，辖七个大队一千五百余人，余岱生任师长。红军攻占梓潼、彰明、中坝后，当地群众在红军胜利鼓舞下热烈参军，成批的新战士涌到红军中来。这时方面军乃决定将升钟寺独立师和原川陕指挥部所属四个独立师，组建红军第三十四军，任命张广才为军长，余岱生为副军长。但不久，为加强主力，又

将各独立师分编各军，撤销了三十四军番号。

彰明中坝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解放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为方面军向川甘边继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牵制了在川西北地区的大量敌人，配合了转战于黔滇边并准备北上向川西进军的红一方面军。但是，正当方面军主力在徐向前指挥下取得彰明中坝战役胜利和大力开展新区工作的时候，张国焘却在忙于指挥后方机关、部队实行“大搬家”。原在江东的三十三军已撤过嘉陵江进至剑阁、梓潼一线；敌人控制了嘉陵江以东地区，正向西逼进。这时方面军前方同志始知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张国焘的这一严重罪恶行为，不仅影响了胜利的巩固与发展，使原定之川陕甘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而且使方面军陷于失去根据地依托的不利处境。

四月下旬，蒋介石调兵遣将，积极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围攻。刘湘第六路军王缵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一部共十三个旅为右纵队，出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前进；第一路邓锡侯部为左纵队，由绵阳地区出动，沿涪江右岸前进；胡宗南主力则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另外第五路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第三路李家钰部在东起阆中西经左壁庙至店垭子一线，防止红军南出。

在此形势下，红军继续在当地坚持极为不利，重返嘉陵江以东已不可能，北出也有极大困难。此时方面军已得悉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为摆脱不利处境和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师，方面军遂于五月中旬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途中九军、三十军于墩上、土门，击溃了邓锡侯部陶凯师五个团的堵击，十五日占领茂县。继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直逼汶川。另一部强渡岷江西进，占领理番。

这时，方面军仍有五个军。其中四军辖十、十一、十二师，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另一个团，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两个师（以上各师均为三个团），三十三军辖九十九师（两个团）。总计十个师三十个团，连同妇女独立师、机关、学校、修械厂职工等在内共约八万余人。这是方面军长征开始时所拥有的全部兵力。

懋　功　会　师

五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率领下，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动，渡过云南省北部的金沙江，进入西康省。继经会理、冕宁，于下旬在安顺场、泸定两地击溃敌人堵击部队，渡过天险大渡河，向天全、芦山挺进，准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方面军在江油、中坝地区出动时，即开始进行迎接中央、准备与一方面军会师的动员。到达岷江地区后，两个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这一即将来临的伟大事件，激起全军无比的热情。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纷纷展开竞赛，决以战斗、工作、学习的实际行动，作为迎接中央和两个方面军会师的献礼。当时考虑到一方面军长途跋涉、艰苦转战，物资条件比较困难，部队还展开了捐献衣物鞋袜的活动，准备了大批慰问品。妇女独立师的同志们，拿出个人长期积攒下的旧布和好容易收集来的羊毛，密针细线作鞋织袜。这些行动充分表明方面军指战员，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爱戴和崇敬，表现了人民军队的阶级情感和团结友爱精神。

五月下旬，方面军命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该军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一方面军北上。六月八日三十军攻克懋功，歼灭守敌

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地方武装近千人，继占懋功南面夹金山下要镇达维。至此，松潘以南，理县、茂县及懋功小金川流域之广大地区，全为方面军控制。两个方面军前锋业已接近。

六月十二日，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代表四方面军，在理番致电中央，详细报告了当面敌情和方面军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了当前作战的意见请中央决定。并表示：四方面军全体同志，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十三日，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和四方面军二十五师之七十四团，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两支兄弟部队的指战员，紧紧握手，拥抱、狂欢，激动得热泪盈眶。喜讯立刻传遍整个方面军，人们一堆堆一群群，到处询问会师的情况，到处议论会师的盛事。驻在达维镇的部队更为活跃，积极整理内务，张贴标语，腾让房子，准备粮食，充满了欢乐的景象。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四日在部队欢呼声中到达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驻当地的部队，共同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当毛泽东同志步入会场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全场。毛泽东同志向部队作了亲切的讲话。他以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指出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他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互相学习，亲密团结，成完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使全体指战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接着，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剧团，为大会演出了精彩节目。晚会中，歌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落，充满着团结和兄弟友谊的气氛。

六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致电红四方面军热烈祝贺会师的胜利。电称：“亲爱的兄弟们：……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到达懋功，又亲切接见了李先念同志，详细询问了方面军的情况，并通过他向四方面军转达中央亲切的关怀。

懋功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企图，为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使毛泽东同志的影响直接地传播到四方面军中来。

中央北上方针的确定及与张国焘的斗争

懋功会师正值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步步向华北进逼。五月二十九日，日寇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扬言中国如不答复其无理要求便“自由行动”。随着日寇侵略的加紧，国民党卖国投降活动愈来愈露骨。六月九日蒋介石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向日寇奉送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控制权；此后便按着日寇的要求，把驻于河北的于学忠等东北军撤出，调往西北“剿共”前线。十日，国民党政府又奴颜卑膝地颁布了“敦睦邻邦令”，严格取缔一切反日言论和行动。这些可耻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促进民族民主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预示着伟大事变立刻就要到来。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共有雄师十多万。而敌人主力，由于远离其统治中心，交通不便，补给困难；追击一方面军的薛岳等部已被拖的疲惫不堪，北面胡宗南部二十余团尚未全部集结。四川军阀屡遭重创，士气颓丧。同时在川陕甘地区敌人派系庞杂，存在着许多矛盾。这

些情况说明：一、四方面军的会师，造成中国革命运动在川陕甘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当时的形势早作了精辟的分析。为了打开新的局面，有力地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在会师前即确定两方面军会合后应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六月十六日，中央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目前计划宜在岷江以东坚决打击敌人即将到来的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阻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但是，张国焘却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他认为反五次"围剿"失败后，革命已进入低潮，处在"总退却"的阶段。他反对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而主张向边陲地区退却，一味想苟安一隅，躲避斗争。同时，他又企图乘着中央红军长途跋涉力量减弱的机会，阴谋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还在会师前，他就卑鄙地认为"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该当领导"。为了给自己的逃跑和篡党作准备，五月十八日张国焘在茂州擅自成立"西北特委"，内设政治局等，俨如中央组织；三十一日宣布组成"西北联邦政府"，向全国以至全世界发布文告，一面暗示今后中国革命重心将向康、藏、青、新地区转移；一面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红军游击队都划入自己率统之下，妄图以此造成声势和既成事实与中央对抗。

两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之后，张国焘首先就拒绝了中央六月十六日关于向东、向北发展的指示。在其致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北川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央两次复电，指出张国焘上述意见的错误。说明两个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南向川康边之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地发展，"即一时得手，也绝少继进前途"。指出"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懋功县属之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仍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主张依托懋功地区向川康边发展；认为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即便到得那里也"站不住脚"。同时，他根本不管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仍然借第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对中央进行攻击，狂妄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本着以革命为重、从团结出发的原则，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教育和说服，进一步阐明中央既定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唯一有利方向是北上甘肃南部，首先尤应攻占松潘地区，消灭胡宗南部。否则滞留当地或向后退均将遭极大困难。同时强调指出，红军应当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张国焘理屈辞穷，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方针。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规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会后，中央派出由李富春、刘伯承、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贯彻中央决定。

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两个方面军当即分组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七月十日，先头部队占领毛儿盖，守敌两团溃逃。一军团侦察连和三十军二六八团两个连在追击中俘敌三百余，缴轻重机枪三十六挺，电台一部。这时，胡宗南之二十七个团尚布于文县、松潘、平武地区，兵力分散，碉堡亦未修成。红军如果集

中力量向东突进，将会迅速取得松潘地区，胜利打开进入甘南的道路，从而避免西绕千里茫茫的草地北上。可是别有野心的张国焘竟阳奉阴违，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有解决，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当他参加两河口会议返回之后，就在杂谷脑召开会议，蒙蔽真象，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并对中央派来之慰问团实行封锁。七月九日和十八日，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康省委”等，分别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建议由他来任军委主席。并且要挟中央：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在此期间，张国焘唯恐其一贯错误行为被揭露，还曾亲将一直同他作斗争、当时仍在扣押中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秘密处死，事后卑鄙地伪称曾已“逃跑投敌”来迷惑群众。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松潘战役计划迟迟不能实施。到八月初，敌胡宗南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部策应。懋功、绥靖、茂县、威州先后为敌占领，各方敌人步步进逼，企图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这样，不仅松潘战役计划由于张国焘的破坏而流产，而且红军也处于危险境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接着，八月四日又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由于张国焘破坏松潘战役计划后所造成的危局。在此之前，中央于七月十八日曾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八月五日，中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了两方面军会合后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重申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之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并针对张国焘反党和破坏红军团结的活动，强调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加强两个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党和红军，坚决与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缺乏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前情况又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确定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东进取，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决定中具体阐述了贯彻这一方针的重大意义和有利条件：在政治上，能与陕北、通南巴之红军和游击队取得配合与汇合，可在短期内造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在敌情上，几个军阀系统存在着矛盾，战斗力一般比较弱；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刀锋前——河北调来，他们中间的反日与反蒋情绪，正是进行革命工作的顺利条件。在群众方面，当地迅速生长着伟大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便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同时那里又是富庶之区，能保证供应。另一方面，决定中还批判了要红军主力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等省的错误主张（张国焘的主张），指出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退却方针”。因为：(1)少数民族革命斗争虽在酝酿着，但汉族红军之全部地长期地深入这些地区，必然会引起民族间之误解，这在粮食给养困难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2)客观上正适合敌人压迫我于不利地区，然后沿黄河封锁，切断中央和主力红军同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的阴谋。(3)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

显然，这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战略方针问题所作出的完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它的伟大远见和无比正确性。中央北上方针得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迫使张国焘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随后中央军委即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以贯彻实现这一方针。至此，中央在懋功、理县、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之久，经过同张国焘的多次斗争，方使红军北上方针开始付诸实施。

越过草地和包座战斗

夏洮战役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北上，占领甘肃南部之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央军委决定，以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并决定左路军北上到达阿坝后应当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然后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八月十五日和二十日，左、右两路军的先头部队分别向阿坝和班佑地区挺进。这时摆在红军前进道路上的是纵横数百里的大草地。在这个地区内，野草丛生，沼泽遍地，往往百余里内渺无人烟，也没有道路，间或仅有为数极少的藏族人民过着游牧生活，粮食十分缺乏。红军出动以前，尽可能地准备了一些青稞麦制成的干粮，但为数甚少，每人每天仅能分食一把到两把。沿途多数的水源都含有毒汁，不能饮用。加以气候变化莫测，时晴时雨，不时还会受到狂风和冰雹的袭击。在这异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和一方面军在一起，并肩行进在茫茫的草原上。途中，全体指战员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官兵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为了照顾伤员和体弱的同志，许多人宁愿自己吃野草充饥，却把仅有的一点干粮匀给别人。多数人员的干粮吃完了，就不得不宰杀战马、吃野菜野草。走在后面的部队连能吃的野菜野草也找不到了，就把皮带、马鞍作食物。在寒冷潮湿的草地上，不仅没有房屋，就连一块能够露营的干地也不容易找到。大家只好背靠背坐在地下，支撑起褴褛的单衣来挡雨遮露，燃起半明半灭的篝火来抵御草地夜间的酷寒。这样，经过五天左右的艰苦行军，右路军终于胜利走出了这个被敌人称为绝境的草地，于八月下旬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也到达阿坝地区。

八月二十六日，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即令其四十九师于二十七日由漳腊营向包座疾进，企图在包座河一线堵击红军东进北上。右路军到达班佑等地后，为开辟前进道路，决定夺取上包座，歼灭当面之敌。

上包座位于四川松潘的北部，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也是胡宗南的重要补给线。地处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西有包座河，南有银戈河，又有当地土司构筑之集群式碉堡，形势十分险要，当时驻有守敌一营。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之二六四团攻击上包座之敌，以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上包座以南地区，准备歼敌援兵；以四军一部包围救吉寺之敌两个营。一方面军之一军团主力则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待机。

二十九日，二六四团向上包座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将外围碉堡全部占领，守敌两个连被歼，残部固守大戒寺后山碉堡顽抗待援。三十日下午，敌四十九师三个团进抵上包座以南三十里之松林口，企图乘红军尚未完全占领包座之际与守敌会合。红军为诱敌深入，正面阻援部队即边打边退。当晚，敌两个团进至包座河以西，一个团进至大戒寺。三十一日拂晓，敌以两团沿包座河两岸向北猛犯，另以一个团位于包座河西岸、大戒寺西南作预备队，师部进到大戒寺。三十军正面部队凭借高地进行坚守，在给敌以严重杀伤后，于下午五时向敌发起反击。八十八师之二六八团直扑包座桥，楔入敌三个团的中间，将敌分割为三

块；八十八师二六三、二六五团协同二六八团一部，猛攻沿包座河西岸进犯之敌二九一团；八十九师之二六四团由北迂回，协同二六八团一部进攻沿包座河东岸北犯之敌二九四团和大戒寺之敌师部；另八十九师两个团围攻敌之预备队二八九团。英勇的红军战士，忍着饥饿和疲劳，猛烈地连续向敌突击，前仆后继，与敌肉搏。激战至晚，除大戒寺之敌约二、三百人乘浓雾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困守大戒寺后山高地之敌二百余人，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上包座遂告占领。是役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七十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

上包座战斗，是方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越过草地时部队有很大减员，但是全体指战员为实现中央北上的方针，不顾一切困难和疲劳，英勇果敢地投入了战斗，取得了全歼胡宗南主力一个师的重大战果，粉碎了敌人企图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

包座战斗之后，位于松潘、樟腊地区之胡宗南部，因其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固堵截，但行程千里颇需时日，且胡又要待薛岳部到松潘、樟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面于学忠部，尚远在宝鸡西南的徽县、两当。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甘南广大地区，敌人兵力极为空虚，碉堡也未修成。这时红军右路军已出了草地，从下包座到西固、岷州仅五六天行程，沿途多为汉人区，路大、粮多、房多。在此情况下，如果左路军能迅速向东靠拢，红军集中全力向东北挺进，将能迅速打开新的局面。因此，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电张国焘，提出如下作战计划：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第一步以一、三两军团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置包座），平行向东推进，以便随时与胡敌五个旅进行有把握的作战，而不致被敌截断。待左路军到达，即以两个支队分别向东南之南坪、文县佯动，而集中主力向东北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但是这一英明的计划，又遭到张国焘的破坏。

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阴谋篡党并坚持逃跑路线的张国焘，一到阿坝便又与中央百般刁难，继续阻挠北上计划的实现。中央原本要他到阿坝后迅速率左路军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而他却要红军全力出洮河以西，企图越黄河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曾电张国焘，再次阐明八月二十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到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封锁，则我将处于……大不利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黄河以东大相悬殊。”坚令其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也先后于二十四日和三十一日电张国焘，力请左路向右路靠拢，指出“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另外告其“此方粮房甚多，(供)左路有余，前进更多。”

在中央一再催促下，九月三日，左路军先头部队五军团进抵墨洼附近。但张国焘竟又借

口噶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强令部队返回阿坝。九日，他更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等地的退却逃跑计划，以反抗中央北上方针，并说："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地区亦甚无益"，南下决不会作"瓮中之鳖"。中央于九日和十一日连电张国焘，再次指出"目前只有北进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不利，将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因此"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是张国焘无视党纪军纪，公然违抗中央命令，并电令右路军之四方面军部队南下，还企图以武力危害中央。

在此情况下，中央为了迅速脱离危险境地，遂率一、三军团毅然北上。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于俄界召开会议，对张国焘反党错误专门作出决定，发给各中央委员。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估计不足，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力量，因而主张向中国西南部边陲地区退却，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张国焘有着严重的军阀主义，他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不注意红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无原则的方法去团结干部，并以大汉族主义对待少数民族。决定还指出，张国焘不但对中央的耐心说服诱导完全拒绝，而且组织反党小团体，公开反抗中央。中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中央还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只能向康、藏退却，结果是白白挨冻受饿，牺牲性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大声疾呼的警告："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

但就在这个时候，中央仍期望张国焘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九月十四日，中央再电张国焘，恳切说明率军北上的原委："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他们北上。"后来，中央到达哈达铺又曾等待七天之久。可是无论中央怎样仁至义尽，谆谆告诫，终未能使这个卑鄙龌龊的阴谋家野心家，放弃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

中央北上后，张国焘即在阿坝召开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污蔑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为"机会主义"和"右倾逃跑"，而把自己向南逃跑的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同时，为贯彻其错误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妄图以此来堵塞别人的反对。接着，张国焘就对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肆意迫害，大批调换五、九军团的干部。并且以"蒋介石侦探""日本间谍""小组织活动"等等"罪名"，逮捕杀害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干部。

九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张国焘先后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张国焘还公然扬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十月五日他更公开揭出反党旗帜，在松冈（现大金县东北）宣布成立伪中央，并且作出开除中央主要领导人党籍等决定。这一系列的罪恶事实说明：以严重的逃跑主义和军阀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张国焘路线，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

在伪中央成立时，朱德和刘伯承同志明确地表示反对，以党的高度原则性回击了张国焘的猖狂气焰。此后，张国焘便不断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所谓斗争。在这些会议上，朱德和刘伯承同志义正辞严，反复说明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一再当面驳斥张国焘的谬论，坚持全国只有一个中央，即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朱德等同志这种原则态度，在方面军干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张国焘军阀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统治下，由于广大群众被蒙蔽和觉悟不高，遂使张国焘的反党活动一时得逞。但历史是无情的，群众是不可能长期被欺骗的。正象中央一再指出的，张国焘南下方针无论在政治、军事、群众以及地理自然条件上都是不利的，它的失败已是注定了。

绥崇丹懋和天芦名雅战役

九月中旬，方面军各部队和五军团、九军团（时已改称三十二军），分别自阿坝和包座地区，沿着原来北进道路，再经草地南返。高原秋风凛冽，战士衣单鞋缺，大军连续往返粮食更为缺乏，其困难尤胜去时数倍。许多英雄的红军指战员，由于张国焘罪恶的分裂活动，又被这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宝贵生命。九月下旬，部队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冈、党坝一带。

敌人为阻止红军南下，仓促沿大小金川布防：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丹巴一线；二十军杨森部四个旅另一个团，位于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达维；二十八军邓锡侯部一个团驻守抚边以东之日隆关。为消灭当面之敌，打开南下天全、芦山的道路，十月七日，方面军发出《绥崇丹懋战役计划》，以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三十、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一部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地区进攻，夺取崇化、懋功；五军团、三十三军及二十七师另一部，驻守马塘、梦笔山地区，掩护后方。

十月八日，左、右两纵队均按预定计划行动。开始，右纵队九军二十五师在绥靖以东渡河受阻，方面军遂以左纵队之四军从侧翼强渡。十一日，渡河成功，右纵队即沿大金川右岸疾进，十二日克绥靖。左纵队三十军一部亦于十一日渡过党坝河，十五日克崇化，十六日克西康省之丹巴县城。左纵队之二十七师于十五日夜向绥靖东之两河口守敌杨森第七旅发起攻击，经三小时激战，将其全部击溃，星夜跟踪追击，于十六日克抚边；十九日夜袭占达维，又击溃杨森之第四旅。二十日，三十军一部攻克懋功，守敌杨森部两个旅向夹金山以南逃窜。进占达维之红二十七师，当即主动截击，俘获甚多，接着该师迅速向东南发展，连占日隆关、巴郎关、火烧坪、邓生等地。至此，绥崇丹懋战役宣告结束，总计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俘获人枪三千，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

大小金川地区多深山狭谷，到处是悬崖陡壁和湍急的河流。红军两过雪山草地之后尽管未得休整，减员很大，但仍能以疾风骤雨之势克敌致胜，有的部队还创造了七天五战、疾进五百里的突出事例，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绥崇丹懋战役后，懋功、丹巴等地溃退之敌，猬集于宝兴、金汤地区防守。刘湘忙调模范师郭勋祺、教导师杨国桢部和第一师，加强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守备。敌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则布防于泸定、康定、雅江。为攻占天全、芦山，打开通向成都平原的道路，方面军乘敌立足未稳、仓促调整部署之际，跟即发起了天芦名雅战役。兵力部署是：三十、九、三十一军各一部为中纵队，抢占宝兴、灵关，相机攻占芦山；四、三十二两军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南下，占金汤后取天全；九军之二十七师为左纵队，在攻占邛崃以西之大川场后积极向邛崃、大邑发展；五军团及三十一军一部为右支队，驻守丹巴地区，积极向康定佯动；三十三军仍留驻马塘、懋功以北地区，开辟地方工作。

十月二十四日，红军以迅猛之势穿越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中纵队于十一月一日，一举攻占宝兴，击溃杨森二十军之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接着连续打垮敌刘湘教导师之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总计沿途俘敌千余，缴步枪两千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左、右两纵队这时也从两翼日夜兼程疾进。七日，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抵近邛崃县境；右纵队攻克西康金汤设治局所在地金汤镇后，继下天全以西之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模范师之一个旅，于十日攻占天全县城，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地区增援。红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当即分两路对敌钳击，将该敌全部歼灭，继克名山西北之五家口镇，又全歼守敌一个团。十二日，芦山守敌弃城逃窜，该城遂为红军收复。十余日内，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俘获人枪五千以上。

天芦名雅战役发起之后，刘湘为阻止红军攻势，屏障成都平原，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之穷山僻野，遂急调其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以及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地区。方面军占领天、芦时，当面敌人兵力业已十分集中，连同原在当地防守之敌，共约八十余团。张国焘南下方针之行不通已开始显露，但他仍要与刘湘主力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军竭尽全力向名山、邛崃推进。十一月十三日，方面军以四军配属中纵队，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由五家口向朱家场、太和场之敌发起攻击，十四日占领上述各地，击溃敌暂编二师两个团。十六日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接着打退敌六个旅的反扑，沿百丈通邛崃大路攻击前进，至下午四时，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但攻势很快即在敌优势兵力的顽强阻击下受挫。

十一月十九日拂晓，敌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地区突出的十余里长环形阵地反扑。红军此时虽自草地南返已连续作战六十余日，但广大指战员仍然忍着疲劳寒冷与优势之敌浴血苦战。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手榴弹拉火索将炸弹拉响，与冲到跟前的敌人同归于尽。敌人经过两天一夜的轮番猛烈攻击，终未能占红军一寸阵地。但是长期在固定阵地上与敌拼消耗，对居于劣势、缺乏补给的红军来说，显然十分不利。因此，红军乃于十一月下旬撤出百丈一带阵地，转进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五家口，迄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山地，扼险防守。至此，天芦名雅战役遂被迫结束。

百丈战斗历时七昼夜，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是南下以来最剧烈的一次战斗。红军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是，由于张国焘整个战略方针的错误和敌人主力的全部集中，红军尽管英勇战斗，付出了极大代价，伤亡约四、五千人，依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后，方面军为分散和钳制正面之敌，曾以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分别在天全、飞仙关渡过青衣江上游南进，十一月二十五日克荥经，继占汉源，歼守敌一部。十二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之雅洪地区向荥经进攻，红军在予敌以大量杀伤后于中旬撤出荥、汉地区。

在与敌人艰苦战斗的同时，方面军还抽调了大批干部，在懋、丹、宝、天、芦各县开展地方工作。先后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组成了大金独立师、宝兴和芦山两个独立团（共三千余人），并发动不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但是这一地区，特别是作为后方的懋功、丹巴，多为藏族聚居区。由于中国反动政府长期以来的大汉族主义统治，造成藏汉

之间的隔阂甚深，加上大军云集一地不可避免的形成“与民争粮”，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又利用这一切诱迫群众不与红军合作，因此红军在群众工作上也遇到极大困难。所控制的区域，实际只是若干点线，不能成为巩固的后方。张国焘企图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央方针的胜利和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

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待机大举进攻。方面军这时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被动。所控制的地区，不但内部不稳（有许多反动地方武装），而且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兵员、被服、粮食补给，发生极大困难。最好的情况下，部队每日也只能吃两稀一干，且时日一长难乎为继。当地人民虽有一些参军，但补充不了大量战斗和疾病减员，有生力量日见削减。更不用说这些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向这里推进，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这些事实说明：尽管方面军南下以来取得不少战术上的胜利，但是由于张国焘路线的错误，不可能打开一个胜利的局面。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到此已得到完全证实。

与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自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由川甘边出发，经过四十天的艰苦转战，沿途俘获敌军人枪三千以上，于十月间安全到达陕北。与当地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不久前由陕南转移去的红二十五军会合，并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个多师，击溃两个多旅。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到二十余县，红军不断壮大，斗争声势日益高涨。当时在方面军中发行之《红色战场》刊物，曾连续刊载陕北红军的胜利。这些动人心弦的消息，不仅大大鼓舞了艰苦转战中的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而且启发他们认真考虑究竟怎样的方针是对的。不少人在窃窃议论：“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

全国政治形势在此期间也在急剧变化。日寇侵占了冀东二十二县和察哈尔北部，又在酝酿着“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亡国灭种的大难越来越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十二月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标志着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业已到来了。

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决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论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述党的决议中指出：“目前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政策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方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一决议随即发给四方面军。在此之前，中央也与方面军保持着密切联系，

一面转告敌情，指示行动方针，表示了极大关怀；一面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中央在得悉张国焘成立伪中央之后，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电令其立即取消这一反党的非法组织，并在全党公布其错误。同时，林育英同志代表共产国际，也于一月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中央的决议和中央对方面军不断的关怀，在部队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尽管张国焘仍对中央进行污蔑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示怀疑，但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央正确路线和眼前活生生事实教育下，已经逐渐看到了张国焘的错误。要求维护党的团结、结束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增长。在此情况下，由于朱德等同志的积极推动，张国焘遂被迫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央，表面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但实际上他的分裂活动仍未停止。

此后不久，方面军即被迫撤离天、芦地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遂告完全失败。

与红二方面军甘孜会师，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北上，结束长征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天全、芦山地区的形势日益严重。敌薛岳部之第五、五十九、六十一、九十、九十二、九十六等六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开始向天、芦地区大举进犯；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也由康定向丹巴进攻，策应东线敌军。方面军这时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根据地，部队得不到补充，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于是在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被迫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过懋功向西康东北部转移。

西进甘孜和准备北上

三月一日，前卫三十军一举攻占道孚，十五日占炉霍，继乘胜前进，占领西康省东北部要镇甘孜。四军到达炉霍即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三十一军及九军二十五师，则分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守敌李抱冰五十三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地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跟即进驻道孚、炉霍。至三月下旬，红军已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广大地区。

西进中，部队不仅同沿途敌人进行战斗，并且经历了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丹巴、道孚间，横亘着拔海五千米的折多山（大雪山脉中段）。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时有冰雹、狂风、大雪降临。为了避开风暴的袭击，必须在每日十二时前通过顶峰的党岭。这样，部队不得不在头天下午开始行动，连夜接近主峰。指战员们在漆黑的夜里步履艰难地行进在陡峭山路上，有时还须刨开冰雪辟路前进。上山时汗流浃背，浸透军服；到得山上一经严寒侵袭，全身衣服顿成冰筒。有时大风夹着积雪卷得人立脚不稳，有时天空虽然晴朗，但冰雪反射着强烈日光又刺得眼睛失明。稀薄的空气，使人呼吸困难，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更发挥了高度团结友爱的精神。一人晕倒，几个人抢去扶持，许多伤病员被安全抬过山去；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帮助别人背东西和照顾年幼体弱的同志。红军这种不畏艰险的钢铁意志，永远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在方面军主力向甘孜地区转进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陕北红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又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二月间，中共中央组织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到三月底，连续消灭了阻挠红军东进抗日的军阀阎锡山的大批军队，占领了晋西广大地区。同时，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显著进展。张学良已表示同意党的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主张，其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已与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中央路线节节胜利和张国焘南下碰壁被迫向西康转移的事实，进一步在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思想上引起重大变化。特别是许多中高级干部，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这一罪恶行动的严重性，认识到继续停留在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出路。部队中到处议论纷纷，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更为普遍地增长起来。人人心里向往着陕北。

张国焘为平息和打击部队正当的不满情绪，继续坚持其错误路线，这时又要其惯用的两面手段。一方面，他以伪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作出所谓《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的缺乏"使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并提出"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他又于三月十五日和四月一日，先后在道孚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与活动分子会议，继续对中央进行攻击，恬不知耻地吹嘘南下"正确"，百般为其错误的战略方针辩解；一再强调在康、藏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可能性"，并把这说成是"取得向西北行动的顺利条件"。同时，对部队的不满言论和批评横加压制，胡说什么"有了政权和红军的党"，批评要受"相当限制"，"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从此可以看出，尽管张国焘在事实和群众的迫使下，不得不承认南下行不通和准备向西北转进，但他仍不想北上与中央会合，而是企图继续在川康边甚至西藏偏安一隅，以坚持其分裂活动。其所谓夺取西北，也是准备在当地行不通时向青海、甘肃、新疆等边远地区逃跑，而绝不是中央所说的以黄河以东为重点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到甘孜后，张国焘一度打算西北出玉树进入青海，并且一再强调回族工作等等，就是他向西北逃跑企图的反映。张国焘这种一味向边陲偏僻地区逃跑的路线，此后一直成为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严重障碍。

但是，从事实中获得深刻教训的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与张国焘的想法并不一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主张越来越深入人心。就在这时，红军第二军团和第六军团，正从黔滇边北进，准备与方面军会合。这一消息更加振奋了全体指战员。四月初，方面军制定了四、五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划，接着，便在"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准备工作。

自懋功会师以来，部队北上南下又西进，往返草地雪山，连续进行激烈战斗，遭到很大减员。为了充实连队，适应新的任务要求，各军都进行了整编。有的取消了师，有的取消了团。整编后的序列是：四军辖十、十一、十二师和独立师，九军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和模范师，以上两军各师均直辖营，不设团部，实际每师相当一个大团；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两师，以上两军每师各为三个团。三十三军已于一月间与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合并编为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原五军团部队编为十三师三十七、三十九团，原三十三军部队编为十五师四十三（原二九五）、四十四（原二九七）团，各团由军直辖，不设师部。另外，还集中各军骑兵共二百余人组成骑兵师，许世友任师长。总计连原一方面军之部队在内，共约二十八

个团四万余人。与南下时约八万余人相比，减员一半。红军半年多遭到如此严重削弱，是张国焘分裂活动所造成的重大恶果之一。

部队整编之后，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据将来北上时的敌情和地形，着重学习强渡江河，打骑兵、打堡垒、夜间战斗等战术。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方面军还专门建立了领导部队体育文娱活动的组织——红场委员会。五月一日，结合纪念国际劳动节，全方面军举行了战术表演和体育、文娱竞赛大会。在进行紧张训练的同时，还以购买和动员殷实户乐捐等方式，积极筹集粮、盐、牛、羊等物资，并且人人动手，打草鞋、织毛衣，缝制帐篷，以备北上之需。

部队在甘孜、道孚地区，曾进行了许多群众工作。大批红军干部被派到农村市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指明少数民族的斗争出路，组织“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部队还帮助藏民生产、医治疾病，开展清洁卫生工作。五月一日，在红军帮助下，甘孜、道孚、丹巴等县藏族人民还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在统一战线政策上，这时也收到一些效果，四月二十三日，红军与德格土司（甘孜西北）建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上述这些工作，在广大藏民中间传播了革命影响，使红军与藏民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保证了筹集物资任务的完成。以后红军北上时，留在当地的伤病员，得到了藏族人民的保护。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此期间曾不断来电，继续对方面军表示着极大关怀，热烈期望方面军迅速北上。三月二十六日，指示方面军“第一步宜向川陕甘三省及陕南行动为宜”；五月二十六日，又电询方面军“今后具体行动方针”。中央的耐心诱导和亲切关怀，更促进了部队渴望北上的心情。张国焘被迫于六月十日电告中央，准备于六月底北上。但他仍不愿按中央要求行事，而企图向夏河、洮州西北行动，以遂其继续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张国焘分裂阴谋失败

一九三六年四月中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红二、六军团横扫滇西北，连克牟定、姚安、盐丰、楚雄、镇南、祥云、宾川、鹤庆等县；四月二十四日攻占丽江，二十八日在石鼓、巨甸之线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沿大雪山西麓及金沙江东岸分两路北进。蒋介石慌忙飞往成都，急令位于康定、雅江地区的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向南堵击，企图阻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

为了迎接二、六军团北上，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胜利会师，方面军于四月中旬以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由道孚出动进攻雅江，阻止李抱冰部南下。十六日占领东俄洛，十九日逼进雅江，守敌两团逃窜，三十二军在追击中歼其一部，占领雅江城，继占西俄洛。至此，遂将康定之敌阻于雅江以东，保障了二、六军团北上道路侧翼的安全。

这时，方面军在部队中广泛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准备。全体指战员怀着对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的无限敬意，又一次热烈地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缝制皮衣等。在甘孜等地群众中也进行了欢迎二、六军团的宣传。

五月中旬，二、六军团胜利通过了雪山地区。奉令迎接的三十二军即向西发展，攻占理化。六月三日，三十二军在理化以南之甲洼寺与六军团先头部队十六师会合。二十二日，六军团到达甘孜以南之普玉隆。七月一日，二军团亦在甘孜以西之绒岔坝与三十军之八十八师部队会合。二日，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胜利实现了。

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受到了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当地藏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在二、六军团的驻地，方面军部队为他们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腾出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木柴和开水；一批批的慰问品送到战友们手中，并且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心情激动，充分显示了两支主力红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

甘孜会师后，二、六军团即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时，两方面军面临着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创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和迎接全国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当时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全体指战员的一致愿望。如前所述，在同二方面军会师以前，方面军即进行了北上的动员和准备。为了争取在夏季通过草地，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曾多次建议早日出动。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由李先念率领的先遣军——骑兵师和八十八师即行出动，二方面军也积极进行北上的各项准备。六月二十五日，方面军在朱总司令领导下，作出了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前进的部署。二十七日，右纵队五军一部攻占崇化。二十九日，方面军颁发了二次北上的政治命令。

但是，张国焘却不顾党和革命的利益，违反广大指战员的意志，继续进行他的分裂活动。会师之后，他一再施展其挑拨离间、蒙蔽欺骗的伎俩，向二方面军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六军团中散发反党反中央的文件，并用卑鄙的手段拉拢二方面军的干部，企图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反党路线。所有这一切，当即遭到二方面军领导干部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七月一日，朱总司令亲电徐向前，要部队“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时机”。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到达甘孜。接着，就召开了甘孜会议。这时张国焘虽然内心别有打算，仍不愿与中央会合，但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持，会议明确决定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在此之前，张国焘已于六月六日被迫宣布取消了他的伪中央，准备按照中央的指示组成西北局。张国焘进行了十个多月的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至此遂告失败。

甘孜会议后，方面军政治部于七月三日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部队分别召开了支委会、干部会、军人大会以及供给、卫生、事务人员会议，进一步深入动员和加强各种安全越过草地的保障工作，并组织了团和营连的收容队和收容组。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向甘南挺进。三十二军、四军十师十一师、三十军八十九师为左纵队，由朱总司令率领，七月三日从甘孜等地出动，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九军、四军十二师独立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方面军总部为中央纵队，由徐向前率领，七月二日从炉霍地区出动，经诸科、让倘向毛儿盖前进。五军及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七月十日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动，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二方面军则沿左纵队行进路线前进。

方面军部队，第三次穿行在茫茫千里草地上。这次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远，时间长，依然经历了严重困难。所带粮食不足沿途食用，指战员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皮带、牛皮来充饥。为了给部队找到吃的，朱总司令和五军军长董振堂等，曾冒着中毒的危险亲尝野草。广大指战员由于渴望早日与中央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走上抗日前线，情绪特别高涨，行动也很迅速。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八月一

日到达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于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表示极大欣慰。在部队通过草地的艰苦日子里，不断给予宝贵指示和深切关怀。七月十三日，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来电指示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并指出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势”。二十二日又来电称：“我们正动员全体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二十七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志等又来电责问张国焘是否有西出青海的企图，并强调指出：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八月一日方面军到达包座，中央即来电祝贺，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基于上述指示，同日朱德、任弼时联名致电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三日，中央复电谓：“接八月一号电，为之欣慰。……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于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引导方面军沿着正确的道路北上、鼓舞部队的士气和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岷洮西战役和岷州会议

敌人为阻止二、四方面军北进，即在甘南仓卒布防。王均第三军之第七、第十二师在文县、武都、天水、西固；毛炳文三十七军之第八、第二十四师在陇西、定西；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在岷州、洮州、西固；企图构成西固至临潭（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但敌人战线长，兵力分散，部署尚未就绪。蒋介石虽急令在同年夏两广事变时南下的胡宗南部，由湖南长沙兼程北进，但一时尚不能赶到。中共西北局依据上述情况和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决定以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当即以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九军、五军组成第一纵队，其主力由包座、俄界经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县，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之线相机夺取西固和向武都佯动；以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尔后主力向临洮方面活动，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以保障左侧安全；以二方面军组成第三纵队（此时三十二军已归二方面军指挥），出哈达铺，策应一、二纵队。

八月五日至十二日，各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九日，一纵队之先头部队三十军八十八师抢占天险腊子口。十日，八十九师攻占哈达铺、大草滩，歼敌千余人，缴长短枪千余支、轻重机枪六挺，随即包围岷州。第二纵队之四军沿洮河北上，经杨华桥、新里堡向洮州旧城进攻；二十日，十师在妇女先锋团（妇女独立师缩编）一部配合下，一举攻占该城，歼守敌一营。与此同时，十二师占临潭（洮州）并继向临洮发展。十师攻占洮州旧城后，曾遭敌马步芳骑兵第一旅的猛烈进攻，经一周苦战将其击退。二十六日，第一纵队之三十军八十九师克渭源；五军与九军一部继续围攻岷县。九月七日，第二纵队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克通渭。在此期间，红二方面军于进抵哈达铺后向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略阳地区发展。岷洮西战役从八月七日至九月七日，历时近一个月。红军先后攻占漳县、临潭、

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阻止红军北进的计划。

这时，党中央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组织的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已进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并准备组织静会战役。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指示："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石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当时如立即执行这一指示，必能胜利实现中央静会战役计划，给胡宗南西进部队以有力打击，更好地完成三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的任务，开创西北更伟大的局面。但是，张国焘却又企图分裂红军，继续向西逃跑，以独树一帜同中央对抗。他违背甘孜会议决定，坚持要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黑错、夏河、循化到西宁，然后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甘肃北部。在这紧急关头，中共西北局于九月中旬，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上，朱德、任弼时及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对张国焘再次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力主北上同中央会合。经过尖锐的争论，重新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接着即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十九日，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可是，张国焘竟妄图推翻岷州会议决定，二十日星夜跑到漳州煽动前方将士反对北上，并于二十二日、二十六日连电中央，说"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因此，"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了对中央封锁，防止其他领导同志反映真实情况，他还卑鄙地命令机要部门，凡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拍发。尽管这样，二十二日，朱德同志仍向中央发出了反映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的电报，并通知西北局委员兼程赶赴漳县。接着，西北局于漳县再行召集会议，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的行为进行斗争。二十七日，中央明令停止西进，并要原在通渭的部队立即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同时，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西进命令，也表现了极大的愤懑与抵制。在这种种情况的逼迫下，张国焘遂不得不放弃西进计划。他再次阻止方面军与中央会合，继续进行分裂的罪恶活动，又遭失败。二十九日，方面军指挥部重新下达了北进命令。

会 宁 大 会 师

从九月三十日起，方面军分作五个纵队，先后由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第一纵队为四军，经通安驿、华家岭攻占青江驿、翟家所；第二纵队为三十军，经鸳鸯铺、榆盘镇袭占通渭；第三纵队为九军，经杨华桥、中堡里至新市镇；第四纵队为三十一军，进至通渭、马营一带；五军为第五纵队，随九军之后向庄浪、威戎镇方向发展。红一方面军部队十月二日攻占会宁县城。

在克服张国焘的阻挠之后，方面军北上终于实现。但也因此迟滞了时日，以致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均蜂拥赶来。这样，不仅原拟在占领通、庄、静、会诸县后主动打击胡宗南部的计划落空，而且红军处境极为被动，通过西兰公路时险些被敌截断。

十月八日，四军先头部队在会宁之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九日，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受到一方面军部队的热烈欢迎。十日，会宁城内万众欢腾，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一方面军把久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等纷纷送来。此时，红二方面军也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经秦安、通渭进入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部队会师。

与一方面军会师，回到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这是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渴望已久的心愿。会师前，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讲话大纲中曾这样写道：

“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眼睛望穿了。……听到了党和军委决定要四方面军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消息，我们……个个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不放松一秒一分的准备：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准备铲除任何企图阻拦我们的敌人，来会合你们。不管蒋介石的计划和碉堡封锁线怎样严密，不管胡宗南、毛炳文怎样费尽气力，不管少数民族地区雪山草地怎样的困难，……都没有能阻止我们的前进。……环境越困难，我们的斗争与会合的决心越坚固。就这样，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的会合。当会合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在行军中，在宿营地，在火线上，……没有一个人不在欢喜的庆祝这件事。

现在我们会合了。……不论在任何人的眼睛里看起来，这都是一个惊人的胜利。……蒋介石想阻拦我们的会合，企图消灭我们这一个、再消灭那一个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我们三只铁拳在一条火线上合起来作战，一定有把握打更大的胜仗。……我们的力量团聚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验结合了。以我们这样巨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仅可以打大胜仗，而且可以……使抗日战争迅速发动，更顺利地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我们已经一致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为执行当前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再没有任何人能够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红四方面军全体战士，准备好了用心地学习一方面军哥哥们的长处。希望我们一方面军的哥哥，能够纠正我们的缺点，多多指示我们。

同志们！携手前进吧！卖国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我们伟大会合面前发抖了！胜利就在眼前。”

这分热情洋溢的文件，充分表达了当时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克服张国焘的种种阴谋阻挠后，对于三大主力会师的狂欢心情。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署发出了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并且指出：

“我们这一抗日前进阵地之会合，证明强盗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信心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新阶段了，也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会宁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历尽艰难险阻、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转战一年另七个月的长征。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战胜张国焘错误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在中央方针下同张国焘不断进行斗争的结果，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斗的重大成就。

小　结

方面军从一九三五年三月西渡嘉陵江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会宁大会师的十九个月中，举行了艰苦的长征。由于张国焘路线的统治，这一时期的斗争，经历了极为复杂和曲折的过程。

与一方面军懋功会师，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两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促进抗日民主革命高潮。而张国焘却基于他的军阀主义的个人野心和对形势的右倾估计，对此百般阻挠。经过中央几度与其斗争，这一方针才得以开始执行。但正当红军越过草地、取得包座战斗重大胜利打开北上的道路、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之时，张国焘竟公然违背中央命令，擅自率军南下，实行分裂党和红军，成立伪中央。张国焘的这一罪恶行为，不仅在战略上把方面军拖入川康边极为不利的境域，而且使方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不断地推动着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而方面军转战川康边天、芦、名、雅地区却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一鲜明的对照下，广大指战员日益觉悟，认识到中央路线的正确，对张国焘路线纷纷表示不满，坚决拥护中央，要求与中央会合。特别是与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的会师，更增强了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这样，尽管张国焘野心不死，但也不得不取消其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领导下，方面军长征途中曾屡遭险境：三过草地，四越雪山，迭遭强敌进攻。但为党所培养起来的广大指战员，表现了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奋战，忍受不可想象的困难，历尽极端艰苦，克敌致胜。在十九个月的过程中，进行了五次战役，大小战斗千百次，先后打击了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终于在党同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结束长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宁大会师。

十九个月的长征历史生动证明了：循着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方向前进，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否则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实践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指针。

（转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初稿）

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彭司令员兼政委、贺总指挥、任政委、徐总指挥、陈政委，一、二、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

（甲）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张国焘同志、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林彪同志、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王稼蔷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肖克同志、徐海东同志之前；敬之于各军军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师师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团团长同志、政委同志之前；致之于各级参谋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各级政治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

（乙）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丙）我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国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

（丁）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万岁！
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 中央 政 府
中央革命军 事 委 员 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
布　　告　（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

白军士兵弟兄　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　才来进攻红军
三年离乡背井　永别儿女双亲
残杀自己兄弟　究竟为谁牺牲
修筑马路堡垒　天天辛苦不停
干饭两顿不饱　军饷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　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　当做牛马畜牲
可恨国民狗党　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州华北　半个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　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　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　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　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　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　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　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　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　你我本无仇冤
协同群众游击　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　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　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　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　胜利就在眼前

主　任：陈　毅
副主任：梁柏台

〔附〕 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资料汇集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又开始对我中央苏区的五次“围攻”，红军因第三次“左”倾路线对五次反围攻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其他错误政策，未能击破敌人的“围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实行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时，为了继续发动和组织南方各省人民的抗日力量，中央决定将红军二十四师及三个独立团留下，在中央分局和陈毅、项英、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同志领导下，坚持斗争。

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并没有放松对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仍以强大兵力向我红二十四师猛扑，企图彻底消灭我红军，摧毁我苏区。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加强地方武装，以利坚持游击战争，决定将部队分散活动，部署如下：

一、二十四师以：

四个连随陈潭秋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同志会合，坚持闽、粤边区游击战争；

四个连随汪金祥至寻南和平、焦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四个连随李天桂、孙埃力至寻南原有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

二个连向三角地区（即瑞、会、雩、宁之间划为三角地区，为最基本地区）挺进，并与培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七一团（约九个连）由八营石友生率领，从安（远）南经油山转湘南建立游击区；

七〇团随司令部，从雩（都）南向信（丰）南挺进，在中央苏区游击活动，并与其他苏区联系，指导工作。

二、独三团由徐鸿、张凯率领，从雩南出发，经油山、上（犹）崇（义）到湘赣边。

三、独六团留在雩南，由赣南军区指挥，坚持斗争。

四、独七团随李才连由会昌穿插封锁线至汀、瑞边转入闽赣军区，开展游击战争。

（以上根据项英向中央报告材料整理）

（二）

为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长征）至一九三七年十月（新四军成立）的三年时间中，我红军游击队在赣、粤、湘、鄂、豫、皖、浙、闽等八省边界地区，开辟了闽赣边（又名中央苏区）、粤赣边（又名天南）、湘南（又名湘粤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桐柏山、鄂豫皖边、赣东北（又名皖浙赣和皖南）、浙南（又名闽浙边）、闽北（又名闽浙赣）、闽东、闽西、闽南等十三个主要游击区，并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坚持着极为艰苦的游击战争。

这十三个游击区的具体情况：

一、闽赣边游击区：

这个游击区原是中央苏区所属的一部分地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大部分地区为国民党所侵占，又在汀、瑞、会等县边界山区，还有我红军游击队在坚持斗争。

闽赣边游击区的武装力量，原有红二十四师，三个独立团（以上两部分属中央办事处指挥）、瑞金独立营和五个区的游击队。起初大部集结在九堡之同钵山一带，后受围攻，红二十四师及三个独立团突围转入其他地区活动，这里所留的武装力量就不多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由钟得胜同志率领，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后期他们又合编为汀瑞游击队。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中央苏区游击区的"清剿"部署是：以其十八师驻宁都，十师驻长汀，十六师驻雩都，二十四师驻石城。一九三四年十月敌人开始"清剿"时，十八、二十四两师沿大路南犯，十师由长汀西上，十六师由雩都东进，总目标指向瑞金。古历十月十四日，十师首先侵入瑞金（后又去会昌），十八、二十四师相继到达。一九三五年冬敌人的正规师陆续他调，至一九三六年三月会昌自欧阳光的保安团接替瑞、宁、石等县则由三十三旅驻扎，且不断向我游击区进攻。

新四军成立后，这支游击队共三百余人，一百五十余支枪，奉命到福建龙岩县北面之北都集中，随闽西南游击队一起，经瑞金（城南三十余里处）、雩都（城南六里处）、赣州、吉安至清江乘车抵皖南岩寺，编入新四军二支队。

（据江西军区支会所提供的材料等整理）

二、粤赣边游击区：

分布在粤、赣边之梅林一带山区，共由两个部分五个地区组成。一部分是北起大庾、池江、南康一线，南至虔南、龙南、定南一线，其中除中心区、油山区外，还有南山（以粤北的南雄为中心，在南、龙、定、信边）、北山（南雄以北）信康赣（信丰、南康、赣州边界）等三个地区，另一部分在上犹、崇义一带，叫上崇区，地区较小，后失联系。

油山座落在信丰、大庾、南雄三县的边界上，原是老游击根据地。陈毅同志曾在这一带工作过，并成立了中央红军二十二军。二十二军走后，留李乐天同志在这里领导斗争。一九三四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乘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便对我中央苏区展开了极为恶毒的"清剿"和屠杀，部队在苏区已无法活动。十二月间赣南军区（原属中央苏区）奉命成立"粤赣边游击司令部"将部队编为一个营，约五百余人（有说三百余人），由李乐天同志率领，冲出重围，进入油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苏区全被敌所占，部队被围困在安、云、会交界之仁风山区的云岭一带，陈毅、项英、贺昌等同志率七十团突围西走，贺带两个营在前，当他们渡云都河时，被敌包围，部队受重大损失，其本人亦在此役牺牲，陈、项两同志率一个不完整的营（约百人左右）在山上与敌人围旋数天后，只得和部队分开，化装成商人来到油山区，并约定部队到油山会合。

当陈、项到达这个地区后，便加强了对这个地区工作的领导，更好的开展了这一带的游击活动。

三年来敌人对这地区的进攻亦很猖狂。国民党广东军余汉谋部（约一个军。番号不详）的军部驻大庾；一师李振球部在南雄；二师叶肇部在信丰；四师在南康。到处筑碉堡，设封锁线，不断侵入我油山、北山、梅山、南山等地区进行恶毒的摧残。

新四军成立后，该部游击队共四百五十余人，长、短枪二百一十五支，轻机枪一挺，与

桂东游击队一起，在大庾之池江集结，于一九三八年春经赣州、吉安、青江转浙赣线至皖南岩寺军部，编为新四军一支队。

（据陈毅同志“三年回忆”、江西军区支会、八一杂志154期张日清同志“南山三年”和湖南军区支公所提供等材料整理）。

当时在湘南的桂东和江西的崇义等县交界之山区，也有一支游击队在活动，其主要根据地是桂东县东面的寒口一带。游击队约三百余人，九十支枪，在蔡会文等同志领导下坚持斗争。新四军成立后，该部奉命在桂东之沙田集结，经八面山，转江西大庾之池江，与粤赣边游击队会合一起北上，编入新四军一支队。

三、湘南游击区

湘南游击区以宜章县为中心，分布湘、粤边的乐昌（坪石）、临武、郴县（江口、良田、华堂铺、金狮岭）、永兴（树头下、香枚、仙水桥）耒阳（大义上架桥小水铺、东湖墟）常宁（衡头）、安仁（承平、华王市、关王庙）等县交界的山区，以粤北乐昌的坪石和湘南的宜章边界地区为主要根据地。当时在宁远、兰山、嘉乐边界之香花岭一带，亦有一支几十人九支枪的小游击队在活动。

湘南游击队，原是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一个团，团长李宋保在情况恶劣时，率部叛变投敌。当时该团三营营长李林同志，因负伤在休养，当他得到该团叛变的消息后，便将六名伤病员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其中还有两名年轻的孩子），取名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进行扩军，曾增加到三十余人，一九三六年春在柳县一个山上，遭敌人袭击，伤亡达二十余人，这样只剩十人了，下半年又扩大到二十余人，后在宜章地区与敌遭遇，受到损失，结果又剩十余人（其中还有三名是女的），这十余人后又遭敌包围，全体同志除李林、杨绍良和一位女同志因有事外出未遭毒手外，余均被陷害，一九三七年部队又扩大了，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已发展到三个班。三月敌人才停止对这支游击队的进攻，这时中央派王涛同志去联系，传达了形势和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接着部队才下山在良田集结，共三百余人，组成一个教导营，进行短期休整，五月经东边岭、岭、至耒阳乘车至皖南岩寺，和闽中游击队一起编入军直特务营（闽中编一、二两连，该部编三、四、五三个连），李林同志任副营长。

另在湘南游击区北面亦有一支游击队，和湘南游击大队同属湘南特委领导，该部与湘南游击队大队一起北上，亦编入军直特务营（人数已包括在上述三百余人内），其领导人刘厚忠。后回家被俘失节叛变。

（据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湖南军区支会等所提供材料整理）

四、湘赣边游击区：

这里原是一个老苏区，老革命根据地井岗山就在这个地区的宁冈县境内。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六军团从这里长征后，留下湘赣边红军独一团在坚持斗争，该团团长曹开福、政委谭余保，部队战斗力较强。

这支游击队大都活动在湘赣边的茶陵、攸县、安仁、莲花、永新、宁冈、萍乡、宜春等县山区，其主要根据地在莲、永边境。

游击队人数三百三十五人，二百支枪，北上时，奉命在莲花集结，经永新、吉安、清江、沿浙赣路东进，抵岩寺军部后，被编入四军一支队。

（据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所提供的材料整理）

五、湘鄂赣边游击区

这里原属湘鄂赣苏区，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长江以南，株萍路以北，南浔路以西，粤汉路以东，包括湖南省的平、浏、醴、长、湘、岳、临；湖北省的通（城）、崇、通（山）、阳、大、蒲、咸、嘉、鄂；江西省的铜、修、万、宜（春）、萍、宜（丰）、武、靖、德、奉、高、上、永、瑞等县广大地区，全境横三百余里，纵一千余里。罗霄山脉伸入境内，在湘东有幕阜山、连云山；在鄂东南有九宫山、七峰山；在湘鄂边有岳姑大山；在赣西北有龙门山、黄茅山等天然后方，便于游击活动。根据地除平江县的黄金洞，通山县的九宫山，湘鄂边的岳姑大山，万载县的小源、高村，修铜宜奉边的铜官山外，在游击区的边沿还有若干小块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六月这个地区的主要红军十六师在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曾遇到国民党的五十师的进攻，加以指挥上的缺点，结果主力垮了，损失很大，湘鄂赣苏区亦被分割成许多小片，这就是“六、七”月事变。一九三四年九月傅秋涛同志根据省委指示，带了七人的短枪队去鄂东南，中途遇敌，有四人回黄金洞省委机关去了，只有四人坚持到了通山县的冷水坪，会合了湘鄂赣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同志，一起带了一支游击队转平江方向行动，中途打了几个小胜仗，动员了一些群众参军，这时部队又扩大到一千一百余人的队伍，恢复了红十六师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部队在省委书记陈寿昌同志、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同志率领下，继续向鄂东南行动，在献钟打了一仗，损失了一、两百人，后转通城、崇阳间的老虎洞又打了一仗，部队又受损失，不幸，陈亦在此次战斗中牺牲。陈牺牲后，傅继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职，当时省委对红十六师的恢复工作又作了决定，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的将近半年的时间中，在群众中发动了几次扩红运动，共动员了新战士一千五百余人，编为红十六师的四十七团。在这段时间里，红十六师还打了许多胜仗，曾在崇阳、修水交界的大源附近击溃敌五十师戴岳部一个团，俘二百余人，缴重机枪四挺、步枪三百余枝、弹药一部；在高相又歼灭敌一〇五师刘多全部一个连，缴轻机枪九挺、步枪七十余枝；接着又在高相歼灭一〇五师一个营，缴轻机枪三十六挺、步枪二百余枝，俘敌四百余人，这些人经过政治争取，也全部参加了红军。这时红军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全师有三个营扩大为四十六、四十八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

经过几次战斗后，红十六师转回黄金洞根据地休整，又恢复了四十七团，一九三五年四月部队继续向鄂东南行动，途中在虹桥与敌十九师陈铁侠旅两个团及湖南两个保安团打了一仗，取得胜利，俘敌二百余人，缴各种枪四百余枝。虹桥战斗后，红十六师又返黄金洞。目的是拔除位于我心腹地带，虎附敌之大碉堡，因构筑较坚固，未攻下，又转向鄂东南，在三界尖地区又打垮了敌五十师的三〇〇、三〇一两个团。

从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五年上半年，这是敌人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时期，湘鄂赣苏区敌人力量较空虚，省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采取积极行动，大量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使红十六师扩大到五千余人，这是三年中的一个全盛时期。

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月间省委转移到南江桥、钟、坪地区，集中了许多干部，在南江桥一带恢复苏区工作，红十六师亦集中在这里作短期休整。这时反动派从中央苏区和其他地区集中了数十倍于我的兵力，向省委机关及红十六师形成重重的包围圈，由于警惕不够，敌人的行动未能及时发觉，待发觉后组织突围时，敌人已在该地区周围修建了许多碉堡，设立了层层迭迭的封锁线，步步向前推进，因此，在突围中红十六师遭到重大的损失，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同志牺牲，四十八团只剩十六个同志，四十六团也只留下六、七十人，仅四十七团一

千七百余人以巧妙的办法突出了敌人的重围，转到了浏阳、长沙、醴陵附近，深入敌后活动，这就成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唯一的一支骨干力量了。

突围后，湘鄂赣的局面恶化了。敌人从大举进攻后转入了分兵、分区、分期的所谓“清剿”，遍地建起大小碉堡和一道道封锁线，分兵把守，并将全区划分为三个“清剿”区，这三个“清剿”区的范围是：

第一“清剿”区：以平、浏、铜、修边区为主，中心点是平江县的黄金洞、义江、芦洞、辜家洞、徐家洞、白水、胡洋、周坊、横江；浏阳的大江洞、萤火洞、金坑、桃坪、大围山；铜鼓的双坑、幽居；修水的召庄等地。由罗霖指挥，配属敌十五、四、七十七、六十三、十九等五个正规师及湖南的几个保安团和七个大队，另外还有一个叛徒编成的特务队。

第二“清剿”区：其中心点是阳新、大冶两县交界的七峰山、大湾、小湾、龙角山、百庄园；武宁、通山交界的九宫山、三界尖、冷水坪；临湘、岳阳交界的岳姑大山等地。由陈继承指挥，配属四十、三十、三十五等三个正规师另一个纵队，还有地主武装等。

第三“清剿”区：以万、宜（春）两县为主，中心点是万载的小沅、株木桥；铜鼓的高村；宜春的慈化、桐木；修铜宜奉边的铜官山等地。由谭道源指挥，配置十六、十八、五十等三个正规师和江西省的保安团，此外，每县还有一个保安团及地主武装。

敌人的“清剿”活动是极频繁的，手段是极恶毒的，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起行动。这样一来给我游击队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在省委的领导下，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终于坚持到胜利。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团结抗日，与当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达成停战协议。因此，部队得以下山。在平江县进行了半年工夫的整顿，共有一千一百余人，二百十一余枝枪，三挺轻机枪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一团，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从平江出发，经长寿街、浏阳的东门、官渡，到了宜春的慈化，当时按军部通知，敌人有两个团在袁州准备伏击该部，因此便改从萍乡坐车直赴玉山，转开化，太平等地。

（据傅秋涛同志“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等材料整理）

六、桐柏山游击区：

桐柏山游击队和鄂豫皖游击队同属鄂豫皖省委领导。其活动地区在鄂、豫边的桐柏山区一带，并建立了根据地。游击队的领导人是周骏鸣同志，一九三五年冬，他们在省委领导下，以四枝枪起家，以后发展成为六百余人的队伍。

一九三七年五月鄂豫皖主力一营来鄂、豫边，配合这支游击队在信阳地区活动一个时期，袭击了当地民团，连破围寨十余处，尤其在蔡家围子，以伪装战术，消灭恶霸一百余名。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借谈判为名，企图消灭这支队伍，幸早被发觉，部队立即转移至竹沟地区，跳出敌人包围圈，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这支游击队，后在竹沟集结，转鄂豫皖，到皖北银屏山一带，编入新四军四支队八团。

（据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提供等材料整理）

七、鄂豫皖边游击区

这里原属鄂豫皖苏区，是鄂豫皖省委领导的主要地区。一九三四年八月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后，这里只留下几片不完整的苏区，在皖西有赤城，赤南及六安的六

区三个苏区；在鄂东北尚有红安与光山之间鄂、豫边的较大根据地。境内大别山脉分布其中，适合游击活动。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这块苏区的大举进攻。以二十五路军之三十二师等约十三个团兵力分布在皖西一带；十一路军刘镇华部的两个步兵师，一个独立旅及补充团等约三万人在赤城东南；张学良一〇八师驻固始，一〇五、一〇七、一〇九、一一二等四个师分布在鄂东北；中央军十三师在鄂东，尚有保安队等合计十余万兵力，向我鄂豫皖苏区连续地猖狂地进攻。军事上以搜山为主，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并到处厉行极其恶毒的"三光"政策，强迫根据地人民移民并村；遍地筑起碉堡，设封锁线，政治上则进行欺骗宣传，推行保甲制度；经济上断绝根据地人民的粮、盐及日用品的供应，我游击队活动大受限制。敌人此次进攻延续到一九三五年五月，我苏区除皖西金岗台、窑沟，鄂东北红安的老军山一带，尚有我游击队坚持外，其余均被摧毁，当时，一切机关行政人员亦不能坚持活动，只得退出苏区，随军行动。

鄂豫皖的游击队，原是红二十五军的底子。当红二十五军离开皖西时，省委便将该军留下的手枪团一分队及40余名伤病员；八十二师之一、四两个连；七十四师之九连与生产队等合编为二一八团，坚持苏区武装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方永乐以鄂东北少共遵委名义，率罗山独立团五、六百人与二一八团合编，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八军，方任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之政委，该师三个营约一千三百余人，深入太、潜、霍、英四县交界处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以后又在该地成立四路游击师（地方武装）。八十二师在潜山县的官庄与敌人遭遇战，师长牺牲，部队又转移潜、霍、舒三县交界外活动，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后，又成立了四十六团，以徐庭基为团政委，该团建成后，便留在潜山建立根据地，方曾率一营去潜山西界岭消灭了十一路军朱团的一个营。一九三五年三月部队又在太、霍边会合，编成了四个营。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商城三里坪子消灭豫保一个营，后在罗山杨万店消灭一一二师两个连，缴步枪二百余枝，轻机枪六挺，接着又到罗山之白玉山与罗山独立团五、六百人会合，将该团编入二十八军之四十六团，一九三七年五月曾从孝感过铁路，在桐柏山消灭国民党三十二师四、五百人，后又回鄂豫皖罗山、光山一带，在湖子铺歼张学良部一〇九师两个营，缴步枪三百余枝，轻机枪十八挺，迫击炮二门，俘敌二百余人。一九三五年七月在霍山花滨亭又歼三九〇团二个营。这一时期，鄂东北、鄂东南、皖西等地区，我又普遍建立了便衣队（即武工队），在鄂东南有九队，鄂东北十九队，皖西八队，共约四百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月，敌人在鄂豫皖区又增加了一〇二、一〇三两个师于红安、光山一线；三十三师于麻城一线；八十二师于光山、麻城一线，除设置封锁线外，在战术上采取"追剿"、"围剿"、"驻剿"等办法，由于我采取外线出击，大大发展便衣队，依靠了群众，展开统战工作，使敌"五月清剿"又告失败。而我主力反而获得了大发展，部队活动极为广泛，使游击区范围扩大到五十一个县之多。

一九三七年四月敌人又增加了三、三十八两个师及十个保安团，与原部结合，共达二百余个团约三十余万兵力，进行所谓"三月清剿"，这次"清剿"以我主力和便衣为主要对象，在战术上，对我主力则采取远距离的层层包围，对我便衣队以移民并村，修寨子、搜山、放火、夜晓宿路……等办法。当时，由于我对敌人的"三月清剿"缺乏警惕，没有充分准备，因而损失很大，二营的二百余人，罗山战斗营一百一十余人全部损失，鄂东北独立团三百余人大部被歼；特务营损失三分之二；手枪团三分队损失三分之二，数年建立起来之便衣队大部被消灭。

新四军成立后，这支游击队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在林维先等同志的率领下，尚保存着

一千五百余人的实力，后被编入新四军四支队七、九两个团。

（据二十八军斗争史等材料整理）

八、赣东北游击区：

一九三四年冬方志敏同志所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太平和赣东北德兴一带失败后，部分部队则分散在这个地区坚持着斗争。

一九三五年秋，这里成立了皖浙赣省委，关英同志任省委书记，省委下辖五个特委：

赣东北特委——休宁、祁门、婺源、浮梁、都昌等县。

皖南特委——泾县、宁国、昌化等县。

浙西特委——遂安、开化等县。

浙西北特委——淳安、分水等县。

赣北特委——都昌、彭泽、湖口等县。

这时期武装力量，在省委领导下，也已发展到八、九百人，编成了一个独立团(三个营，团长刘志标，政委李步新），此外，各特委也有一个独立营，各区委亦有十至几十人的小部队。

三年来，这个地区亦不断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复令刘建绪在江山设“剿总”，以八十八个师驻开化，五十五师驻歙县，一九二师、新四十六旅驻屯溪、休宁、祁门一带，一九三师驻贵溪，六十六师驻东流、至德，新四十九旅驻婺源，浙江保安两个团驻开化、遂安、安徽保安一个团，江西保安三个团驻浮梁、婺源，另外还有江西的别动队（即特工队）等十余万兵力，先向开化、遂安、淳安地区进攻，后转泾县、宁国一带，最后集中兵力向我休宁、祁门、浮梁、乐平、婺源地区展开全面进攻，使我受到很大损失。

新四军成立后，该部游击队约四百余人，在江西浮梁集中北上，编入新四军一支队。

（据南京军区战史编辑室提供等材料整理）

九、浙南游击区：

一九三〇年前后，在浙南的水、瑞、平、清等县境内，曾有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红十三军在活动，但闽浙边游击战争的开展，还是在红军挺进师到达之后。

一九三四年冬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失败后，当时在粟裕、刘英同志率领下突围出来的一支四百四十余人的队伍，奉命组成挺进师进入浙南长期行动。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参谋长王文瑞、政治部主任黄富武，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率部先入浙西南活动，曾在龙泉县西之斋即地方，首战告捷，击溃浙保一团李秀部、闽保二团马洪深部，这一战后，便大大改变了浙西南的斗争形势，减轻了敌人对我活动的阻力。

为了开辟新根据地，原决定挺进师二纵回江山、浦城、龙泉、衢县、云和、常山等地区活动，以孟宗平为党代表；一纵及政治部分布在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交界，以黄富武为政分会书记，其余由粟、刘率领去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等县进行游击活动。后因反动派宣铁吾、俞济时率浙保六个团，十一个大队，一个税井团来攻，而改变部署如下：

1． 以一支队为南路，由黄富武、王书瑞等率领，从遥岭出发，向龙、遂、江、衢一带行动。

2． 以三、四支队，直属队为北路，由粟、刘率领到达广岭头、袭汤溪城。

一个月后，计划又完成，各支队又会合于龙泉之小吉，召开政委会，再确定：四支队扩大为四纵，率十、十一支渡龙泉河南下，到庆元、龙泉以南，政和、寿宁、泰顺之东北行动，

由黄富武任政委会书记；二纵仍在江山、常山、衢县、浦城、龙泉、遂安一带活动，以孟宗平为行动委会书记；一纵到浙东之永康、青田、缙云、丽水、仙居、东阳及永嘉北部，配合浙东游击队，以刘达云为行动委会书记，许信焜为副书记；成立浙西南特委以孟宗平为书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前后，发动各地群众示威游行。一纵袭击仙居的奏章；二纵袭击龙泉之八都，占住溪、王村口，又袭遂、汤城，迫浙赣路；五纵占龙泉县，这时期总计袭十九县城，开展了游击战争，地区扩大到纵横二百余里，占领了碧湖、住溪、王村口等中心市镇部队扩大到千七、八百人（连地方武装在内）。

挺进师的扩展，大大震动了敌人，这时，蒋介石令刘建绪在江山设“剿总”，并调罗卓英的十八军和其他部队约七个师数万兵力来对付。

一九三五年九月，挺进师除留二、五纵及广浦独立营在浙西南坚持斗争外，主力南下袭安仁镇，抵庆元之林园；留九支在庆、景、云以南，泰、寿西北活动；主力掩护一纵北上渡瓯江到永康、缙云、义乌、仙居、新昌大盘山一带。主力完成任务后，转向浙东南，十月五日与闽东特委会合，开了联席会义，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刘英为书记，粟裕为组织部长，叶飞为宣传部长。这时，省委随军在泰、寿、松之间行动两个月，后即留鼎、平、泰间，主力复去浙西南。省委和主力分开后，只留一个特务班，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曾击溃敌第九师的二个排，缴轻机枪一挺。接着又击溃浙保安四个连，一个便衣排，因此，省特务班便获得了扩大到一个排。

一九三六年七月挺进师又与省委会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地区迅速扩大，温、召、外、衢各属及杭州以南至奉化附近，均有红军足迹，使龙、丽、青、温以南，宣、武、永、缙、金、义、东、仙及浙东等三十余县的群众，无不欢迎红军。

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这是一个较安定的时期，两广事变后，蒋军他调，省委除进一步巩固浙南、浙西南外，而又开展了浙东南，并打通了浙东原来的基地。这时，我挺进师主力已发展二千余名，在浙南特委所领导的地区，随时随地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配合红军作战。

一九三七年初，省委二届扩大会议决定，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以适合当前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令二纵回浙西南，一纵回浙东；三纵挺进至浙东南；师直留浙南；特务队随省委行动；其余各部及闽浙边之独立营、连统一编为挺进师三个团，采取分散活动集中指挥的策略，同时，还成立省委办事处，由粟裕任主任，统一指挥。

此次来犯之敌，是以刘建绪为首的，我则在鼎、平交界处给浙保、闽保以重创，后又与敌十九师李觉部打了两仗，我无甚损失，而敌人却伤亡较大，后敌人便大量集结在鼎、平、泰一线，我为了辟开主力决战，采取分散活动于敌后，使敌之进攻归于失败。

一九三七年六月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为了团结抗日，发出呼吁，一致对外，共赴国难，七月十三日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此时各部便集中大办党训班，救亡干校，恢复地区工作，组织抗日救亡团体，训练抗日群众武装，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

一九三八年三月，闽浙边共组成了六百余名游击队，二百余枝枪，从平阳山门出发，沿瓯江北上，到达新四军军部后，被编入二支队。

（据刘英同志“三年回忆录”等材料整理）

十、闽北游击区：

闽北游击区原是一块老苏区，其范围大致是：东到浦城；西至资溪、光泽；北达钻山；南抵邵武、南平。

闽浙赣游击队的前身，原是苏区的一部分武装，和一九三四年秋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这里留下坚持斗争的一个营，当时共有部队约六七百人，后在闽北党委和黄道等同志领导下，成立了闽北独立师（师长吴长喜、政委曾镜冰、政治部主任王助）。

一九三四年底闽北分区党委因闽浙赣省委受损失且失去了上级领导。当时国民党调新十一、十二、五十六、七十九等师及独立四十五旅，江西、福建两省的保安团，共十余万人，北至江西钻山，南至福建崇安分两路向闽北分区领导中心崇安之大安街夹击，我游击队被迫退至武夷山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游击队为了保存力量，对付敌人的进攻，曾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这时，闽、赣边除崇安、邵武、浦城、广丰、建阳尚有一些地区外，其余都被敌人占领，年底得悉建瓯、政和、吉田、屏南、将乐、顺昌、泰宁等敌后地区较为空虚，将部队从武夷山挺进至敌后活动，开辟了闽东北根据地及抚州一些地区。

一九三五年十月，这个地区又重新成立了闽浙赣省委，以黄道同志任书记，下辖闽北、闽东、闽中、闽东北四个地区，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贵溪、寿宁、古田、屏南、政和、浦城、广丰等四十余县和闽东联成一片。

一九三七年二月师长吴长喜带两个连在资、光、贵地区活动受敌包围，部队遭到损失，吴亦牺牲。吴牺牲后由黄立贵继任师长。五月黄率一个营去将、顺、泰地区活动，又被敌人两个团包围，后将部队化整为零，黄自带一个排与敌周旋二个月左右，结果在邵武附近又牺牲了。

新四军成立后，该部共约六百余人（有说一千五百余人）在崇安北之坑口、长涧源集结，经温陵关、石塘、钻山、上饶、玉山、华埠岩寺编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

（据范式人同志一九三七年七月“福建工作综合报告”和黄和真同志“闽北三年”等材料整理）

十一、闽东游击区：

一九三一年邓子恢同志到福安、连江等县领导过秋收斗争，当时曾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五支队。

一九三四年一月德安成立了苏维埃，同时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由叶飞同志任政委；连江县也成立了县苏维埃，在该地区活动的游击队，在杨而昌同志率领下，亦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三团。

一九三四年六月福安、罗源、连江等地，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闽东特委，以苏达任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北上抗日先遣队经闽东，在宁德的赤溪与闽东武装立师，曾留下攻打福州时的三百余名伤员，和二、三百支步枪，因而壮大了闽东的武装力量。同年十月在宁德、支提，特委决定将红二团及红十三团合编，成立了闽东独立师，下属三个团，先遣队留下的编为一团，独二团编为二团，独三团编为三团，全师约一千五百余人，师长冯品太，政委叶飞、副师长赖金标。这时，闽东地区共有福安、寿宁、霞浦、福鼎、德安、宁德，罗源、连江及闽侯部分地区，并成立过苏维埃政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国民党集中了新十、七十八等师约三十个团兵力，进攻宁德、霞浦地区，以十个团兵力进攻连罗苏区。闽东独立师与敌人作战虽获些胜利，但力量损失也不少，

一九三五年一月副师长赖金标同志牺牲，二团损失很大，地区也相应地缩小，只福鼎、霞浦一带尚存在，闽东特委只剩叶飞、阮英平两同志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霞浦召开各县委书记会议，重新成立了特委，并以叶飞同志为书记并兼独立师政委。九月特委与刘英、粟裕同志在寿宁边会合，曾成立过闽浙边临时省委。

后反动派对霞浦、寿宁等地区进行摧残，情况较困难。一九三六年秋他们又找到了闽北黄道同志，曾成立过抗日军政委员会，开展通战工作，局面逐趋好转。

该部共九百余人（有说一千六百余人），后被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其集结点是宁德县的桃花溪，北上时经屏南、政和、松溪、浦城、广丰、玉山、华埠到岩寺。

（据闽东向中央报告等材料整理）

十二、闽西游击区：

闽西游击区，共由闽西、粤东各一部组成，以闽西的永定、上杭、龙岩等县为主要活动地区。

这里的游击战争，从一九三四年便已开始。当时为了牵制敌人向中央苏区的进攻，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红军独立八团在丘金声、丘织云、魏金水、伍洪祥诸同志率领下，于一九三四年春便到达了龙岩，在漳岩公路沿线积极活动；同时在永安、宁洋、漳平、连城之间，又有吴胜、方方、谢育才诸同志率领的红九团在活动；一九三四年冬，敌进占长汀前后，又由朱森（后叛变）、罗忠毅、赖荣传、贺万得诸同志率领明光独立营转入岩、连、宁边界配合红九团活动；红十七、十八团在大田被敌击溃后，还有百把人由温含珍、丘尚聪两同志率领到达龙岩溪口与方方同志汇合；另外还有上杭、永定、龙岩等地方武装力量；一九三四年底张鼎丞同志奉命回永定时，带回少数永定留汀难民武装；一九三五年三月中央局派谭震林、邓子恢同志来闽西时，亦带来了一个支队。（有说一九三四年冬中央局派陈谭秋同志来闽西南时，也带来了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以上共有一千二百余人，是当时坚持闽西地区展开游击战争的主要骨干力量。

谭震林、邓子恢同志到永定与张鼎丞同志汇合后，便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同志任主席，邓子恢同志为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同志任军事部长，郭义为同志（原杭永地委书记，不久被俘牺牲）任党务部长，朱森同志任参谋长。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便大大加强了领导力量，使闽西各县的游击战争，逐渐的全面开展起来了。

当时在党组织上，成立了永定（书记范钦洪）永东（书记马发贤）、上杭（书记廖海涛）、龙岩（书记魏金水）等四个县委，（有说是上杭、永定、龙岩、永和靖、岩南漳、岩连宁、永埔、岩永靖等八个县委）。

军事上布置：以红九团的第一营和岩连宁独立营（即原明光独立营）成立闽西南第一军分区，以罗忠毅为司令员，方方为政治委员，温含珍为政治主任。这个分区仍在岩连宁（即龙岩、连城、宁洋）一带活动。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成立闽西南第三军分区，以丘金声兼司令员，丘织云为政治委员，魏金水为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仍在岩南漳（即龙、南靖、漳平）一带活动。上两分区的任务，是要尽可能扩大游击区，选择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以红九团的第二营、第三营和永东游击队成立闽西南第二军分区，以吴胜兼司令员，谢育才兼政治委员、赖荣传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分区的任务是开辟永定、平和、大埔、饶平、云霄、漳浦各县边区，由闽南红三团取得联系。谭、邓带回的支队除编入杭、永两县的游击队外，还拨一个重机枪排编入红八团。岩、永、杭各县游击队则在本县境内活动。

三年来敌人对闽西南游击队共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清剿”,在龙岩城内设立了“剿指”,由李默庵、李玉堂分任正、副指挥，不断驱使匪徒，对我们疯狂的“清剿”。

一九三五年，是我闽西游击队面临着积端严重困难的一年。敌人大军压境，仅在龙岩、上杭、永定、长汀、宁化、清流、连城、宁洋、漳平、南靖、平和等几个县，新布置了八个正规师（即三、九、十、三十、六、八十、八十三、五十二、七十五等师),并纠集地方民团，壮丁队。铲共团等一切反动武装，对我闽西南游击队进行“清剿”。他们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在战术上采取所谓“追剿”、“围剿”、“搜剿”的方法。政治上主要是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以“移民并村”，“计口购粮”，“连坐法”等极端残酷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同时，还进行造谣欺骗。对我们内部则以“自首的新条例”来勾引个别意志薄弱，思想糊涂立场不坚定的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并强迫这些人来破坏我们的党组织、交通站、接头处、采购站等，有时还强迫红军家属，到部队里来拖腿，但在我闽西南党的领导下，敌人的疯狂进攻，终于被粉碎了。

一九三五年的严重局面过去后，便转入了比较发展的一九三六年了。这时期闽西李默庵主力第十、第九、八十三、三十六等师先后调走，只有第三、八十、七十五、五十二、新十等师在活动了。敌人的力量比前大大减弱，这就有利于我游击队活动；我红八团击退新十师增援白土民团，我上杭部队在杭城以北之草鞋岭，夜袭敌第三师一个排获全胜，这时各地群众斗争情绪亦很高涨，地富恐慌，反动民团动摇。为了团结抗日，整个闽西地区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局面，当时，曾发布过“六言布告”编写“抗日反蒋四字经”等到处开展宣传。这时我闽西的部队亦有很大发展，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事变前，部队已编为一、三、五、七四个支队，连同各县的义勇军，游击队将近两千人。广东事变结束，陈济棠被迫宣告下野，十月底蒋介石又调广东军一五七师三个旅和一五八师一部到闽西南地区。十二月间，三五、七支队集中到永定，在陈东坑、湖雷一带和粤军打了一仗，这一仗虽然粤军受挫，而我亦损失不少；接着七支协同上杭游击队，在上杭中华山同粤军一个营打了一天，杀敌百余，敌被迫撤退。这就打乱了敌人的“清剿”部署，大大振奋了部队和群众。

粤军到闽西南后，仍坚持执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双十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更变本加厉对我南方游击队进攻。这时，粤军仍以中央军新搞的那套恶毒办法对我游击队进行“清剿”,给我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至一九三七年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所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改变了原定“抗日反蒋”的方针为“联蒋抗日”的新方针，又到处开展宣传，散发传单，这样使敌人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而我统一战线的面更大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与国民党的谈判达成协议。这时部队便下山集中，待命开赴前线，一、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各县地方武装，先在白沙集中；五支队于永定、永东、永埔各县地方武装，在金丰集中，八月十三日各部集中完毕。游击队改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支队长谢育才，参谋长罗忠毅，部队一千五百余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该部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下属三、四两个团，张鼎丞同志任支队司令，谭震林同志任支队副司令，罗忠毅同志任参谋长，王集成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调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三团由白沙集中的部队编成。由

丘金声同志任团长，廖海涛同志任副团长，四团由金丰下洋集中的部队和闽南收集回来的部队（即红三团被编入漳埔城内缴械后，由于我方抗议和群众舆论的压力，而又交还部分人枪），汀瑞游击队等部编成，以卢胜同志任团长，黄火星同志任副团长。一九三八年一月，部队集中在龙岩白土宣布番号，然后北上抗日。

（以上根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所写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等材料整理）

十三、闽南游击区没有详细资料可查，一般情况已包括闽西游击区内说明。

附注：

（一）安、南、永游击区（未列为十三游击区之一）

这个游击区范围较小，在福建的安溪、南安、永春等县边界，属当时中央厦门市委领导（图上编入闽西南），原有游击队二百余人，称闽南工农红军第二游击支队，支队长刘伊东，政委彭德清。后这块地区基本上被敌人摧毁，部队被打散，彭等便转入闽南坚持斗争。

（按东海舰队副政委彭德清同志口述记录）

（一）闽中游击区（未列为十三游击区之一）

这个游击区分布在福建的双溪、福清、莆田，仙游等县边界地带，有游击队约一百余人（有说二百余人），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已宣告成立，该部已奉命编入特务营，而国民党反动派还骗他们到泉州城内，将其缴了械，闽中特委书记刘突军同志亦在此时牺牲，后经我方交涉，才被迫交还部分人枪。这支队伍后由雷光熙同志率领，经莆田、福清、福州、古田、建瓯、崇安、玉山至皖南和湘南游击队一起编入军直特务营（该部编为一、二两连，湘南游击队编为三、四、五三个连）。

（据福州军区分会所提供等材料整理）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国内政治形势大事记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月

四日，日寇关东军首脑在大连会议。十八日发表声明书，声称将“讨伐”热省内中国驻军，大批日伪军云集热察边境，并进攻独石口、双栅子，察东形势紧张。

十九日，黄郛到京与蒋介石、汪精卫商讨华北政局。蒋谓日寇进攻察东系“地方事件”，就地解决。二十一日派秦德纯、岳开先与日代表谈判。

二十二日，日外相广田在六十七届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演说。三十日，日使有吉见蒋介石，说明广田演说意义。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怀玉山为七倍以上之国民党军队包围。二十四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领导者方志敏同志不幸被俘。（此后押往南昌，七月志敏同志慷慨就义。）

二　　月

一日，蒋介石对“中日亲善”发表谈话云：“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其议会所发表对我国之演辞，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谅解，……我全国同胞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义。”

二日，国民党代表秦德纯与日代表在大滩会议，订大滩口约，规定察东各地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兵。

十三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取缔排日”。十四日，蒋介石对新闻记者谈：“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中日经济提携，应先从改善两国间之现状，并恢复其正常关系做起。”

十六日，日本外务省拟就对华经济提携原则六项，允对中国“在上海设立二万万元借款”，诱使国民党上钩。

二十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谈外交方针，谓：“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精神是大致吻合的……我们愿意以满腔诚意，以和平的方法，正当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的一切纠纷，务使……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行动，一天天的消除。”

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王宠惠赴日，交换“亲善”意见。

各地报纸反对“中日提携”。“申报”十八日社论云：“国民党应觉悟……中国只有在经济上采用自力更生政策，外交上采用民族利益至上主义。”

四　　月

一日，蒋介石在贵阳对记者谈话：“欲挽救今日民族危急，解除全国民众的痛苦，须有一

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各地随即组织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

二十二日，美国经济考察团来华。

五　　月

八日，英哈蒙德·罗斯来华，谈商中国加入英镑集团。

十七日，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日公使晋升大使。是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谈话云："中日两国……此次双方以最短时间与最简单手续，将彼此所派使节同时升格……实堪欣幸。同时以日广田外相之努力及诚意，使中日邦交得一划期的改善，尤足值吾人之感佩。吾人深信中日邦交之增进应以互相尊重为原则，而此次使节升格，即为互相尊重之最明显表示。"

二十九日，驻华北日军武官借口中国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提出苛刻要求。驻津日军分赴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公署及北洋大学示威。三十一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妥善办理"。

六　　月

一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以日人压迫迁往保定。六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允日寇要求罢免河北省政府及天津行政长官职。

四日，华北日军司令梅津与何应钦谈判，九日，秘密签订"何梅协定"。中国在冀察主权大部丧失。十日，依照"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东北军调陕"剿共"。

五日，日寇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借口张北中国军队拘留日本特务人员，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要胁，并派飞机飞平示威。七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允日人要求，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七日，日领事及武官以"新生"二卷十五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及南京政府提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向日谢罪"，"派亲日作家检查图书"、"禁止侮辱'满洲国'"，"处'新生'作者、编者徒刑"等。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一允诺，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道歉，撤换沪公安局长，取消图书审查委员会，封闭"新生"周刊。

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敦睦友邦令"，公开声明将严惩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和反日的团体。

七　　月

"新生"主编杜重远被捕，判决处徒刑一年二月。七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政府联名发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

蒋介石授意丁文江在"大公报"上发表"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一文，曲解布列斯特和约，主张日寇要我华北，可连华中给他，退到云贵去"复兴"民族。

八　　月

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二十四日，日驻华北军总司令多田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华北当局应消除华北之一切排日排满行动"，否则"日方或采用武力以处理之"。日寇在华北晋绥各地组设特务机关，在太原、归化、宁夏等处设置军事委员会。

九　　月

十日，蒋介石发表“中日关系的回转”一文，谓“中日两国无论自那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协力，以图亚细亚的繁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可以‘和平’两字尽之……在东亚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不一定不可能”。

二十日，英国派李滋罗斯来华，帮助国民党进行所谓币制改革。

二十五日，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发表“我帝国对支的基本观念”小册子，公开宣言吞灭全中国。

十　　月

六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吴鼎昌率领经济考察团赴日。十七日，日本经济考察团抵北平。

二十一日，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偕厦门市长王国磐，赴台湾庆祝日寇占领台湾四十年大典（陈等在台湾与日寇对华南问题曾有密谈。蒋介石以王国磐“有功”，不久即将王国磐调升南京警察厅长）。

二十二日，日寇指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据县城。

吴鼎昌在日商讨成立中日贸易协会。

二十五日，日驻华海军武官在台湾开会，讨论对华南方针。

十　一　月

一日，国民党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汪精卫遇刺受伤。

同日，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下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

五日，平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等十余校通电云：“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各地舆论呼吁救亡。



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币制改革”、“白银国有”令。又公布紧急法令，以中、中、交三行钞票为“法币”，禁用现金。

七日，日寇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抵津，策动宋哲元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

十二日，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幕。十九日，蒋介石在大会上谈“对外关系”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以蒋介石为罪魁祸首的国民党政府，……泰然不以为耻的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轻轻把整个华北，整个中国出卖了！这是空前的出卖，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二十八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与工农红军军委会又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再一次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者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

二十五日，殷汝耕在冀东成立所谓“防共自治政府”。

二十六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撤北平军分会，又令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任委员。

十　二　月

九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冀东汉奸政府成立，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要求停止内战。途中为宋哲元部袭击，水龙皮鞭木棍枪刺齐下，死伤被捕无算。宋哲元更下紧急令，全城戒严，加派大刀队把守各校门口，不准学生出入，大搜学校，逮捕学生领袖（北大六人，东大十二人），强迫学生复课。

十六日，北平学生市民数万人举行更大规模示威。宋哲元动员全城军警，加派武装军队两团镇压，并下令对学生可以“自由行动”。示威队伍行至二区警署时，军队即行开枪，刀棒交加，群众伤亡甚大。二十二至二十七日，上海禁止学生游行开会。

十八日，上海各界救国会宣言成立。二十日，妇救、职业界救国会、工救、国难教育社成立。

日寇密派岗本、土桥等至厦门，发起“自治运动”。三日，开成立大会，各自治委员会，以林振成、黄南鹏等为委员。华南汉奸组织到处设立。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及国防政府问题，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一 九 三 六 年

一　　月

一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大意云：全国人民若能发扬“固有道德”，中国自会强盛。

四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出卖安溪矿产与日人，委赵修晋司其事。据赵谈：事前均得蒋介石及铁道、实业各部核准。二十七日，日人在闽南各地组织所谓“农民自治军”。

五日，蒋介石手令平津各学校放假，强迫学生离校。十五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招待各地学生代表，欺骗学生云：“于热诚爱国之外，更须守纪律负责任，……勿受人挑拨离间。”二十八日，蒋介石训令教育部严禁学生活动。

十一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言，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十二项。

十三日，广州学生举行反日游行。国民党指使流氓击毙学生一人，伤者逾百。

二十一日，日外相广田在议会演说称：国民党政府已接受他所提出的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二十六日，南京外交界表示：“我方对广田三原则虽未接受，但亦不拒绝。”

二十五日，红军将领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希望共同协商，联合抗日。

二　　月

四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行“复兴”“统一”两公债，共十八万万元。

七日起上海、天津各日人纱厂中国工人纷纷罢工，响应抗日运动。

十七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为实现抗日，遣军渡河东征，发布“东征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共三十万入晋堵截红军东上抗日，又下令东北军、

西北军进扰红军后方。

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军警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为“合法”行为。

二十一日，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电平津当局，谓学生运动为“共党暗中操纵”，令饬镇压。国民党平津当局奉命后，分派大批密探，赴各校院秘密调查，分头逮捕，计先后被捕者达一〇九人。同时日寇关东军亦电令北平日领署帮助调查学生运动。二十四日，日寇警务主任走访国民党北平市长秦德纯和公安局长陈希文，商谈“肃清北平共产党”。

二十七日，国民党驻日参事丁绍级奉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正式向日本提议在南京召开中日谈判会议，“促进中日提携。”

三　　月

六日，日本新任大使有田抵南京递国书，十六日至十九日与张群迭开谈判，共讨论十一小时，十九日双方共同发表公告云：“双方见解虽未能全部一种，但……有裨于彼此意思之疏通。”

八日，冀察政委会外委陈中孚与多田商谈“防共”问题，决定派二十九军得力部队在冀察晋交界地，扼险驻防，防堵红军东上抗日。

二十二日，日寇嗾使德王以察北蒙旗为根据地，成立伪蒙古自治军政府。

八日，国民党济南警察包围山东大学，捕学生多人。二十四日，沪复旦大学救国会七人被捕。三十一日，北平学生示威，抬郭清棺游行，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和镇压爱国运动，被捕三十余人。

五　　月

五日，中国人民红军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谓：蒋介石派大军阻拦抗日去路，倘与之决战，必为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五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公布所谓“宪法草案”。

六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订立“华北防共协定”。（按：此协定系秘密的，据英日通讯社透露有如次内容：国民党中央军不得开入冀察“剿共”，两省关于“剿共”军事应请日军协助，日军驻扎华北铁路沿线，华北国民党军队聘请日人为军事及政治顾问。）

五、六两日，日寇走私货物运津总数达三千吨。十三日，海关报告华北税收因走私所受损失的统计，九个月来达二千五百余万元。

国民党派陈光甫出使美国，十八日订“中美白银协定”。

华北日军大量增兵，日本公然改天津驻屯军为华北驻屯军，作为侵略华北最高机关。二十四日，新增日军均改照战时编制，古北口等处筑炮台，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路驻重兵。

日寇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中日防共协定”。二十五日，张群在外交部纪念周发表演说，谓“共匪之侵扰，日本常引为关心之事”，“中国政府处于任何形势之下，决不须臾放弃剿共政策”，“现在大部分共匪，已告肃清”，请求日本“稍假时日，必可完全消灭”，并望日本“共同努力，确保东亚之和平”。

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增兵。二十九日天津学生并举行示威。

三十一日，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于上海，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纲”。

六　　月

二日，国民党两广当局标榜“抗日救国”。四日，国民党西南将领发电响应，请蒋允其出兵。八日，进兵湖南。

七　　月

一日，保定汉奸五百余人，请愿“自治”。

十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开于南京。十三日，蒋介石讲演谓：“我们要解决外交问题，就先要解决内政问题。自从‘九一八’以来，中央一贯的方针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我们要有整饬纲纪维持统一的决心和勇气，负起责来弥乱定变，决不能因外患之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之工作，决不可因为顾虑外患之压迫，就听少数人破坏纪律，自由行动……正惟有外敌之压迫，中央更不得不先彻底肃清内乱。”（按：这些话系为两广事变而发。当时蒋介石对于两广力主武力对付，南京与两广战争已箭在弦上，幸赖全国人民反对，舆论一致要求和平，两广事件始和平解决。）同时蒋介石对“最后关头”有所解释，谓“最后关头”即“最低限度”，“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又声明：“这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这半年来较之以前形势，还有一线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

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指出中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要有三个条件。“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并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决抗战到底，“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八　　月

七日，伪蒙边防军（李逆守信部）进扰绥东。十六日，察北伪军犯绥。十日，日军开抵张北，绥东形势紧急。

二十四日，成都群众反对日人在蓉设领，殴毙日人两名。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呼吁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提出国共各派代表谈判以实现国共合作。

九　　月

三日，广东北海发生日侨中野被杀事件。十九日，汉口日警吉冈被击殒命。

十三日，川越到南京，十五日开始与张群谈判，川越坚持广田三原则，又提出四项具体要求，谈判无结果。

十六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重申“睦邻令”。

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为了“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

十八日，上海民众纪念“九一八”游行，国民党派军警禁止，民众受伤被捕者甚多。

二十三日，上海日水兵一名遭人狙毙。

十　　月

八日，川越见蒋介石，蒋谓："中日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长协商。"

十九、二十一、二十六日，张群与川越继续谈判，以日方要求苛刻，仍无结果。

二十二日，蒋介石由南京飞陕"剿共"。二十八日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若何"，"政府决贯彻勘乱方针。"又以西北、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调蒋鼎文率国民党中央军入陕，监视张学良杨虎城行动。

二十六日，华北日军开始大演习。

二十六日，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及西北各将领，谓："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

十 一 月

日伪军再犯绥，傅作义率部抗战。十三日，日机轰炸平地泉。二十四日中国军队克百灵庙，全国声援绥远抗战。

十三日，中英成立十万镑信用借款。

二十三日，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被捕。

十　二　月

一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致书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三日，日海军在青岛登陆，占领国民党市党部。

四日，蒋介石赴西安，对张、杨表示"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九日，西安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令军警开枪镇压。

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十三日发布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十六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军占领华县。

十七日，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同日，日外相接见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表示南京若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则日政府将不能坐视。二十一日，川越会见张群，声明张学良杨虎城所提条件，与日本根本方针不合。二十二日，日寇嗾使察北伪军发停战通令，愿与南京合作"反共"。

亲日派竭力煽动内战，电召汪精卫回国，以便共同进行亲日反共倒蒋阴谋。二十二日，汪自意大利热那亚启程归国。

十五日，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盼"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之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十九日，中共中央通电提议召集和平会议，向双方提和平条件四项。

二十四日，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次日被释，由张学良等陪同离陕飞洛。二十六日，到达南京，蒋即背信扣留张学良。

（转自《从"九一八"到"七七"》）

〔附〕 何 梅 协 定

（一九三五年六月——七月）

（一）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二）何 应 钦 复 函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附〕国民党政府颁布之“邦交敦睦令”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我国当前自立之道，对内在修明政治，促进文化，以求国力之充实，对外在确守国际信义，共同维持国际和平，而睦邻尤为要着，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此令。

（转自《国民党军政部训令总仁字第一一三二号》，
《军政公报》207号）

〔附〕新 生 事 件 概 述

（一九三五年）

司 马 卒

（上略）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刊载易水（艾寒松）著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有涉及日本皇帝之处原文如下：“……现在的皇帝呢，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实的了，这就是说，他们虽拥有皇帝之名，却没有皇帝的实权，就我们所知道的，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这篇文章当然也同其他文稿一起是经过“审查”通过才刊登的。不料出版后，日

本驻沪总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口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严重抗议，同时提出几个条件：一、必须封闭新生周刊社并没收载有闲话皇帝这一期的新生周刊。二、必须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及闲话皇帝作者易水，并要法律起诉。三、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该周刊出版也负有责任，必须惩办。四、要求撤换上海市长吴铁城，要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党政府正式道歉。国民党反动政府自从“九一八”以来，一直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相勾结，里应外合地镇压人民爱国运动，扼杀人民救国言论，借以谄媚日本军阀，遂其卖国投降的阴谋。他们对于新生的出版，早已视同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领事提出的抗议条件，实际上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意图的，所以当时就表示全部接受。首先命令伪上海市政府将新生周刊社封闭，并命令伪上海市党部委员潘公展、童行白两人亲自找新生负责人提出：一、将来法律起诉时，在法庭上新生出庭代表不得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是经过“审查”的。二、要求把这一期的“审查证”交还给图书杂志审查处。三、要求新生周刊社将来如请律师出庭辩护，所请律师要经过他们同意。四、赶快通知在江西的杜重远本人要他亲自出席法庭。谈话中还带威胁口吻说，如果事态扩大，对生活书店亦将不利。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又另派萧同兹、齐世英两人来沪专门处理新生事件，目的就是要牺牲杜重远并消灭新生周刊，所以第一步就是设法说服杜重远亲自出庭听候判决。萧、齐两人并欺骗他说，只要你能够出庭，敷衍应付一下日本方面就可以，决不判刑，就是判刑的话也是暂缓执行，你还可以做你的工作，并无妨碍。另外吴铁城也请杜吃饭，当面保证说，只要去出庭一下就没有事了，一切由国民党负责办理（以上系根据艾寒松同志的回忆）。杜氏没有怀疑他们是一种欺诈行为，是一个圈套，就同意了这样做。于是在七月初由伪上海市政府命令公安局向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提出控诉，经该院首席检查官郑钺开庭，对新生发行人兼编辑人杜重远、著作人易水予以侦查；因为易水住址不明，迭传无着，侦查结果认为杜重远应负刑事罪责，着令交五百元及随传随着商铺保证，听候公诉。七月九日由高二分院刑庭长郁华，推事周翰、萧燮棻开庭审理，杜偕律师吴凯声（就是国民党指定的律师）到案，审理情形十日申报曾有记录：“略谓：本案被告，为新生周刊编辑兼发行人，该新生周刊第二卷十五期内有易水所作闲话皇帝一文，对各友邦元首，均有论及，而于日本天皇所述尤多，且有诽谤之言词，经上海市公安局请求本处侦查，由本检察官侦查之下，以著作人易水，屡传无着，而本案被告既属编辑兼发行人，自应负其全责，合依新刑法三百十条第二项，旧刑法三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诽谤罪，及依新刑法一百十六条之规定，加重本刑三分之一，请求庭上依法从重处断。诘之杜重远供：向在东北创办实业，自东北事件发生后，即来沪任新生书店主办新生周刊之发行及编辑人，该刊物为生活书店所代销。本年四月初，我即赴江西举办实业，辑务委一名陈向者代理，故此稿未见。此时杜之律师吴凯声即提出信函一件，以证明杜当时确在江西。旋由杜继续供称：事后我以该文曾见于新生周刊内，观其内容之结果，知作者实系用学者之目光，来批评各国的君主主义之制度，但可确定作者并非为留日学生，故不明日本与各国之情形制度大不相同，惟文内似极崇拜天皇之学问，我为留日学生，若当时我在沪，此稿决不能刊出，但失察之责，我应负担，故表示遗憾抱歉；至易水其人，因所投之稿，为不受酬者，故无地址可稽，该稿原文亦无从检寻，彼现在是否得悉本案之发生，亦未知云云。讯至此，庭上即命开始辩论，郑首席即请求依法处断，被告吴律师之辩护，略谓因被告当时实不在沪，故发生此不幸事件，失察之责，固难避免，但被告已当庭表示抱歉与遗憾，且检察官起诉条文，似不相合，应请谕知无罪，如庭上认被告应负刑事责任，亦请依照刑法七十四条四十一条之规定，予以

缓刑或易科罚金之处分云云。郁庭长乃宣告辩论终结，宣告判决主文：杜重远散布文字，共同诽谤，处徒刑一年二月，新生周刊二卷十五期没收。被告律师请易科罚金，庭上不准；请予上诉期内交原保，庭上以依刑法六十一条之规定，不得上诉，故即认为确定，不能交保。"

杜重远就是这样被骗，当庭扣押送到漕河泾监狱执行。(下略)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的经过，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这一事件采用手段的卑鄙毒辣亦可概见！但厚颜无耻的伪中央宣传委员会还电令伪各省市党部转饬当地出版界及报社通讯社说："本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按日本国体以万世一系，著称于世，其国民对于元首皇室之尊崇，有非尊崇所能想象者，纪载评论，稍有不慎，动足伤日本国民之感情；一年以来，本会迭次告诫，所幸尚能恪守；不意该新生周刊，有此意外之记载，除业经另案处分外，并为防止将来再有同样事件发生起见，兹特再行切实告诫，着即转饬当地出版界及各报社、通讯社，嗣后对于此类记载或评论，务须严行防止；再关于取缔排日运动，中央迭经告诫，应遵照本年六月十日国府明令，转告各级党部同志，并随时劝导人民，切实遵守，是为至要。"

(转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

〔附〕国民党政府颁布之维持治安紧急办法

(一九三六年二月)

国民政府令

现代一切国家凡以充实国力复兴民族为任者无不以严维秩序为首务社会秩序一经扰乱不待外侮之来亦陷国家于危亡之地近年我国忧患频仍尤应上下整齐奋发共为有秩序之努力惟公安之维护各种法令虽已详有规定诚恐禁制之条散见诸法执行者易于疏怠兹特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使全国军警当局知所注意对于蓄意危害社会国家之人在动乱萌发时间即得依以迅速处理凡所禁制均属违反现行刑法及其他法令之行为一切指示均属公安机关依法应尽之责任命布之后应即严格施行俾公众之安宁以及恪守法律之人民同得坚强之保障此令

主　　席　林　　森
行政院院长　蒋　中　正
内政部部长　蒋　作　宾
军政部部长　何　应　钦

一、遇有扰乱秩序鼓煽暴动破坏交通以及其他危害国家之事变发生时负有公安责任之军警得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制止

二、遇有以文字图画演说或其他方法而为前项犯罪之宣传者得当场逮捕并得于必要时以

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排除其抵拒

三、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抵拒解散之人

四、军警遇有前述各项之事变时应将当场携有武器者立即缴械及逮捕之并得搜捕嫌疑犯

五、明知为违犯本办法之人犯而藏匿容留或使之隐避者得逮捕之

六、军警于处理事变时应立即报告该管上级长官

其所逮捕之人犯应立即解送较近之宪兵队长官公安局长、县长或检察官讯问后分别情形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或其他刑事法规办理

七、依本办法处理事变之军警对于严守纪律之人民应特予保护并应注意维持治安恢复秩序

(原载1936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公报)

〔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外交方针演词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原编者按语：何梅协定成立不久，日本又利用英、法等帝国主义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国的所谓"自治"。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即高唱所谓侵华"三原则"：(一)中国应抛弃依赖英、美政策；(二)中国应尊重"满洲国"事实之存在，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之经济关系；(三)中国应与日本合作防俄防共。

日本灭亡全中国的蛮横态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爱国示威大游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走向新的高涨。日本帝国主义见到事情不好，广田弘毅又在日本议会发表这一外交演说，更加阴险地阐发了数月以前的"广田三原则"，并以反苏反共为幌子，骨子里仍然是以霸占全中国为实际目的。

"……试观中、日、"满"三国，其关系虽次第改善，然未能谓之归于常道，故吾人深觉更进一步使此关系完全变为常态以强固安定东亚之基础，至为必要。于是帝国政府经慎重审议结果，树立确定的对华方针。此方针大体由如此三项而成：

第一为根本调整中、日两国关系者。即中国勿论在任何形态，不采取以前之非友好的行为及政策，此非仅应舍其消极的此种行为及政策，且更进而以举亲善提携之实，积极的加以协力。中、日两国互相对立之事，非独为双方不利，即就东亚大局观之，亦诚属不能忍受者，如中国对于日本出以非友谊行动，或故意利用第三国而行其常套手段，以为逆行东亚安定之事；则此诚属遗憾者不能忍受者也。然中国如在此点能充分觉醒，则日本对于中国发展，有意为有形无形之支援，自不待言。日本由从来如上之大局起见，隐忍自重，以促中国之自省，诱发其对于东亚责任之自觉，以俟其对日转向，然华方亦渐次看透此大局，约一年前即表示中、日关系改善之意思。

日本政府在昔日第六十七议会时，即阐明对于邻邦立不威胁不侵略之根本政策，更利用

此机，恢复两国国交于常轨，努力进行于两国利害之调整，关于此点，迄今仍无充分之成果，实为遗憾。查中、日两国关系，为完全恢复其常轨，当然须将中国与“满洲国”之关系，就于常轨之必要，就中、日、“满”三国各种利害在直接接触之华北方面，尤特别感其必要。然而中国尚未承认其接壤华北之“满洲国”。加以各方久已基因于地方的特殊传统，在华北一时出现相当之不安空气，然至最近依河北、察哈尔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形势遂大为缓和。前述种种，非仅应为中、日关系之调节，如中、日、“满”三国关系不能同时调节，则终难求东亚之安定。为达成此目的者，实为我决定方针之第二点也。

中、日、“满”三国关系，为完全调节起见，首先应使中国承认“满洲国”之存在，从此树立国交，进而调和双方利害关系，否则不能根本解决，因此希望其能从速一日到来其时期。然而在此期间，华北方面对中、日、“满”三国关系应采取无使其何等恶化之手段方法，实为必要之趣旨。中国今日遭遇最大之困难者，为共产党之运动，而东亚之不安定，实为赤化运动将来可乘之机会。如中国边境地域固不待言，即内部社会组织，亦甚感其威胁。中国之赤化分子跋扈，当在想象以上。查赤化运动之危险，非限于东亚，不过东亚天地，今日特见其活跃耳。故吾人在此，为东亚世界之安定，应阻止此东亚之赤化运动，使中国免去此种危险一事，非仅为中国之重要问题，且系各国共同之最大事件，此乃为此次决定方针之第三点。日本为防止赤化，愿与中国缔结种种协定之主旨，即此也。以上三点，为日本政府之确定方针。”

（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日本政治外交之指标

（一九三七年二月）

近卫文磨

（上略）

中日两国，不仅是二千年来邦交特密的善邻，现在将来，以东亚方面的安定力，推进力，又或以亚细亚民族的先驱者而言，两者的关系都是非携起手来同进不可的。因此，从理念者说起来，高唱中日亲善提携，中日共存共荣等等，而且其目的之能够达成，乃属自然趋势。

不过事实却和这完全相反，那些结局仅被看作是一束标语，和一片口头禅。现在中国国民的大多数，口有所言，都是抗日侮日，打倒日本；其所奉为目标或所期其具体化者，都是排日排货的运动。此种理论之飞跃，显示出结局中日甚至不能不一战的情势来，看到这一点，也便略可想象到中日关系的现状，是如何地不安了。尤其从“满洲事变”勃发以来，“满洲国”的出现，日本脱退联盟等等，东亚的事态发生了划期的变化。同时，中国采取所谓欧美

依存主义，向新中国建设运动迈进，其国势现已骎骎日上趋于充实结果：中国朝野的对日反感，愈益增大，遂至招来了和我日本所望完全相反的事局。其所以弄到这个地步的理由，自然应归之于中日两国各自的许多缘故上罢。中国侧的暂置而论，就关于我方的思考一番，觉得应该指摘出来的当前的问题，便是日本的中国观没有原则的一贯性，同时其一贯"事务策"缺乏适切。非认清这一点不可。

关于政治的问题，我们暂信赖依存政府之所为，单由东亚的平和与繁荣的大见地上，每有机会，我们便高唱中日国交调整并中日经济提携的急务，陈之于中日两国的识者之前，今日也仍无限地衷心祷望着此事早日得以实现，我们对此信念，约节起来，大体如下：

我们所主张的中日国交调整的目标，非如中国朝野所猜疑、嫉视、曲解："是毫无包藏着对于中国的领土的侵略之野心的。"我日本四十年来提倡保全中国的大义之真意，除了阻止因外力之侵略，而其领土遭瓜分之外，绝无他心，昔今毫无变动。我日本所望于中国者，只是和中国互相提携，结为善邻盟邦，以期东亚之平和与繁荣而已。除此之外，再不会有什么别的意思。又我们所提倡的提携，决不是一方强另一方供其牺牲，双方由于受其祖国的见地先握起手来，即因为日本人爱日本，中国人爱中国的缘故，握起手来，才是真的提携的发足。爱日本、爱中国的心，扩充起来，也便立刻是爱亚细亚、爱亚细亚民族的心了。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也自然不外此例。有利于日本及日本人，同时又利于中国及中国人，这才是具永续性的提携的纽带。譬如中国的棉花、煤炭、铁矿等等的天然资源，至今仍然是无尽藏的，资本技术由日本侧提供，中国侧也协力合作，以从事于开发时，中日两国的利益是不待言，交情也自然而然地非增加亲密的浓度不可了。实行这种具体的结合，是促进中日亲善的最有效的方策，远胜于百个交涉，千个声明，这一点，恐怕不致有一个人持异议罢。

以白眼来看中日关系的人，总说这便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然而今日的日本断非视中国作殖民地的，日本的所望只是实施国际的相互扶助，中国经济界的现阶段上，欲以其独自的资本独自的技术，尽量开发其天然资源，究竟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的识者层也应该十二分明悉的，自己没有开发的力量，竟将天赋的资源弃置之而不顾，所以说是冒渎于天。日本因友谊心的发露，才想来开发的，若对此而有何种猜疑，则不能不谓猜疑者本身，是自己侮辱自己了。

我们上述的主张，中国识者恐怕也大半首肯，而有共鸣罢。然而所以不能率直地表现者，是因为有所谓中国对日舆论，国民的感情严存之故。若剖开来一说，则"打倒日本"的大的国民的感情，使会兴起无数辞严义正的道理和一切正论来了。所以不问其理由如何，若此中国的国民感情，多少向日本侧好转的话，中日关系便必不难渐次正常化，还于旧轨；否则欲打开现在的中日关系的圆满的局面，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业。我们的任务，非先着手解决这个前提条件不可。

那么第一不能不先对中国朝野所怀抱的新中国建设运动，与以真挚的同情，供给如实的利益，尤其为了达到前半的目的，有借国民外交的巨力的必要。可是截至今日为止，我国国民对于这方面的努力，异常之微弱不振，真是遗憾万分。关于这一点，希望为中日国民的楔子之东亚同文会，并其他对华关系诸团体，务必蹶起，唤发为了国家和东亚之故，寄与绝大的关心及注意。

最后关于这次西安事变后的对日动向，并应付之的我国外交国策，稍论数语。而此际我们应该特别考虑的问题，便是所谓"反日抗日"的情势的演变如何？

不幸我国有识者对此的观察，似乎一致认为中国的抗日态度，今后依然有力地继续下去；国民的对日感情，益将趋于恶化。他们的理由是：南京政权如欲和英美法乃至苏联等维持着从来的关系，恐怕便不能把抗日的招牌摘取下来，而况欲维持现在国民的舆望，无论如何怕不能不标榜抗日，遂致招来这样可悲的现实来了。

复据有力的其他方面的观测，则以为中国侧的从来的“打倒日本”“反日排日”仅为一种国民的舆论和风潮，而今后的中国，有了一种照应中国全体的环境，将中日关系加以新检讨的新机运发生了。

但这种脚下照顾，不仅是中国的朝野为然，在第三国也以同样的观点来检论。中国方面的抗日问题，似更有发展强化，而益趋于重大化之虞。要之，继续抗日态度，仿佛是各方面一致的见解。若果如此，我日本的立场，今后不仅将越趋困难，而苏联在第三国际指导下的行动不明，华北方面的情势似须加上外蒙，日本在华北的立场将濒于危境也说不定。如此，赤色的魔手说不定立即侵入冀察更威胁起“满洲”来。

此中有远大的危险性，这里潜藏着不容忽视的祸源；所以欲应付善处这种情势，将来我国和中国共同携手，决行防止赤化一举，实为东亚的安定势力的根本，而且可以看做是确保东亚的平和增进人类的福祉的日本的使命。因此，我们须以冷静的态度，并热烈的“大邻人爱”注视静观着事势的变迁，以善处不久将展开来的新局面，深信这才是我们的当然的责务。

要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现势，实遭逢到了自有东洋历史以来的未有的危局。若此际中国朝野以仇敌视我日本，始终欧美依存的话，徒自招取东亚眼前的祸乱，永不能免白人种的侮蔑罢。我们本此见地，只今静视着东亚的现势，期望着善邻中国的人士归还东洋人的本然，和我们同进，同时遥祈善邻中国的朝野反省熟虑，有着手于国民的准备的必要，以防大祸于未然也。(中华日报)

(原载《月报》 1卷6期)

〔附〕一九三五年前后日寇在华北的经济侵略

一　松室孝良的“华北经济对策”

一九三六年冬天，在华北发现了一种怪文书，这就是日本关东军驻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那情报中，说：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发动满洲事变而占据之，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得稍缓和。然因尚有若干原料问题，短期中不能满意，尚须相当之岁月，经营与培养。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间亦难再行扩大，即不能与帝国生产率之增进相调和。帝国为确保满洲并使万全不能不努力满洲边境……

……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意易于进攻的地外区之缓冲设施。

……中国华北。……

将来，在我帝国有计划的指导与经营下，则原料与产量能增加三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长。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孙怀仁：“华北经济提携一瞥”，“世界知识”五卷五期，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二　一九三五年间所谓“华北经济提携”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中的一篇演说，掀起了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在表面上不会象大炮炸弹的那样容易引起中国一般民众的反抗，并且还可以博得某些中国士大夫的称赞，而明目张胆的“助桀为虐”。

最初日本对华经济进攻，——“中日提携”——的计划，打算分成五点：(一)中、日间互派考察团；(二)日本援助中国改良农业技术，杜绝洋米洋麦的输进中国；(三)中国生产大宗农业物，供日本工业之用；(四)增进中日间贸易，根绝排货运动，日本在华购棉花三千万元；(五)在上海设二万万元信用制度，以期两国贸易之圆滑。但这种计划不仅日本经济力量办不到，而且一时也无从着手。因此，这计划在一九三五年二月间，虽曾甚嚣尘上，但始终未见诸实行。

于是在是年（一九三五年）五月末，在华北发生了所谓河北事件的挑衅。六月初，发生了张北事件。这两次事件的解决，使日本军部在华北获得了更巩固的基础。于是，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计划，更修正得具体和积极了。这次修正案据说分为四点：第一，是对中国之农工业（工业如面粉、棉纺织业）由日本给予以技术上的指导；对中国之农产物，则应以增进日本工业之利用价值为前提。第二，是对中国之煤、铁、锑、钨等之开发，由日本之技术及资本为之。第三，是日本以技术资本开发中国之交通。第四，是组织一个中日贸易协会，算是“中日经济提携”的机关。

事实上，是年十月中，中、日双方的调查考察团，已开始仆仆往还。中国方面由吴鼎昌率领的赴日经济考察团与日本方面许多的实业考察团往还，其结果，“中日贸易协会”的企图，就愈见努力进行。同时，据吴鼎昌归国后的谈话，说中国已诚意要求日本指导工商业知识技能，而吴氏还认此为中国赴日经济考察团的一大收获。十月以后，华北风云又再告急，香河乱事发生，冀东伪组织的出现，日军占领丰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局虽日趋严重，而“中日贸易协会”之进行却分外起劲。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这历史的提携机关，竟宣布成立了。

这个“中日贸易协会”在日本是打算作为进攻它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不及的地方的机关。另一方面，日本在华北更有积极的提携方策。日本对于华北，本来计划设立一个特殊的财团（称为“国策公司”)来进行的。其后，关东军方面，主张由“满铁”担任成立一投资华北的中心机关。由这机关设立或扩充各种中日合办之产业公司，先办矿物、交通、贸易、植棉等事业。同时，关东军、“满铁”、大藏省，日本实业界，先后派人赴华北调查实际情况，以便着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间，这中心机关便决定了，称为“兴中公司”，暂定资本为一千万元日金，由“满铁”承担百分之七十，其余招中日商股。设总公司于大连，分设支公司于天津、上海、东京。营业目的，规定为中、日、“满”间相互之贸易及关于中、“满”小企业之

投资及斡旋介绍。此外，日本对于华北商业的发展更在天津设立所谓“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此公司以后并入“兴中公司”）等机关。又利诱旧日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按：汉奸高凌霨主持其事)、“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机关，从事活动。(孙怀仁：“两年来日本对华之经济新进攻”，“世界知识”四卷十一期，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三　一九三六年后敌在“华北经济提携”声中的资源掠夺

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由于中国实行白银国有政策，和美国与中国缔结中美售银协定，以对日威胁，这个“提携”曾遭受相当挫折。后来，又因为各地救亡运动的风起云涌，而更趋消沉。可是，自日本驻华新大使川越负着新使命来华，以至“中日华北经济协定”签定之后，华北经济的被攫取，便到了新的紧张阶段。这时候，正是日本准备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后时期。所以芦沟桥事变未爆发以前，我们如果仔细的注意了日本在华种种掠取资源侵夺产业的积极活动，则这次战争的爆发，就早在意料中了。

“华北经济协定”(按：这个协定据外电所传，是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宋哲元与田代在天津签订的，当时正是在成都及北海事件，九月二十三日中日交涉首次决裂以后。但当时宋哲元自天津回到北京时曾否认，谓未与田代签订任何协定。此项协定究竟有无，迄未能明，然据报纸记载，当时宋哲元确曾向田代表示在“共存共荣”、“平等互惠”原则下，一切均可进行。——编者）规定四大原则，八大具体项目，其内容可从日方所提五项开发华北经济的前提中约略看到：(一)修筑津石路；(二)筑塘沽、大沽两港；(三)改善海河水利；(四)开发农村，改良棉产，奖励羊毛；(五)恢复龙烟铁矿。日本军部方面的计划，则分为六大部分：(一)铁道；(二)矿山；(三)港弯；(四)棉产；(五)芦盐；(六)电气。这些项目中所列，正是华北主要的军需资源，铁、煤、石油、盐、棉花、羊毛。至于港湾河道的改善和铁道的修筑，只是为了便利这些军需原料的输日罢了。

“华北经济协定”签订之后，“兴中公司”在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和“满铁”三方面直接主持之下，用枪杆和资本双管齐下，便紧急地开始了华北军需资源的掠夺。

一、铁——日本军部对华北军需资源，首先看准了的，便是储藏量占关内总量百分之二十九的龙烟铁矿。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该矿即为“冀察政委会”收归国有，实际上却是代日本完成了第一步手续。继之，日方因为开办费二千万元没有着落，曾有一时不能开采之势。但是从日本内部妥协，决定旧债归还，尽先恢复铁矿和“汤山炼钢厂”，并规定以一千四百万元作为开办费之后，龙烟宝藏，便在汉奸陆宗舆奔走之下，受着“满铁”理事产业部长阪谷的指导，逐渐走上开采之道。一直到芦沟桥事变爆发的前夕，若不是因为我政府阻止的话，开采早就成为事实了。

此外，零星掠取铁矿的活动，有对于山东淄川、金岭镇铁矿的开采阴谋，及派遣奸细颜乃恩，冒充德人，收买山东掖县粉子山一带苦土的活动，等等（苦土制耐火砖用，为钢铁业必需品）。

二、煤和石油——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曾盛传日人和阎锡山接洽开发山西煤业的消息，后来晋绥当局决定守土抗战，这种传说也便中止。但是，日本方面的活动是决不中止的，“三菱人造石油会社”，特将资金增至五千万日元，便是看准了山西的煤，要求提炼石油，并且在

芦沟桥事变前二月，大坂某会社还特派工程师十名来调查晋、豫、冀、察诸省的煤藏量，和可以提炼石油的煤量。其调查报告云：(一)河北：井陉、石家庄、炼焦厂，副产石油，二十六年度有一五〇〇加仑；(二)察哈尔、绥远，可提炼石油的煤很少；(三)山西，可提炼石油之煤，藏量最多，(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北平"晨报"东京通信)。至于冀察境内的煤藏，则日本在战争前，简直以盗匪的形式来掠取。"柳江煤矿"，年产量在二五〇〇〇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仗关东军的力量，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据。其后，在去年五月间，虽经实业部下令该矿原主，制止出卖，但当时实业部的权力已经达不到那儿了。"长城煤矿公司"年产量可达一六〇〇〇〇吨，民国二十一年以来，即完全停业，去年（一九三七年）夏间，日方初则强占，继则经汉奸齐燮元出来调解，算由日本合资办理，实际上完全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此外，华商煤矿如"临城"、"怡立"则被日资统制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

三、盐——日本对于盐的取给，除根据"山东协定"占青岛盐产以外，其余百分之五十的不足额，差不多完全取之于长芦盐区。一九三六年，日本就以很低的代价抢购去芦盐七万吨；一九三七年四月间，又强迫中国方面订立合同，购买十万吨，在事变前一月即分批运往日本。在这十万吨合同订立以后，原定于五月二十一日再订第二次合同，再购十万吨，后来却因为中国政府态度的改变而中止。但是日本方面是并不甘休的，除派遣汉奸浪人逕行与盐户接洽收买盐产以外，且在塘沽一带任意霸占滩地，开辟盐田。此外，日方还嗾使伪冀东政府，恢复昌黎废滩，由"兴中公司"加以技术援助，自晒自售，供给日方应用。

四、棉花——日方对于华北棉花的掠取，是从改良棉种，统制产户着手。天津日领馆，且在天津设立"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更辗转经过汉奸之手，冒充中国人的名义，偷买中国土地作植棉之用（一九三七年，天津公安局曾处理好几件私卖国土的案件，并且这类私卖国土的事，据说有好多中国官吏从中渔利）。冀东伪组织则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几万顷的土地，为"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会社"、"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取华北 棉 花的团体，也纷纷成立了。同时，六家日本纱商，又成立了"华北棉花协会"，试行统制华北棉产。天津、青岛又成立了"棉花交易所"，以控制华北的棉市场。"兴中公司"更拟定了华北植棉的五年计划，以全部霸占我华北棉产为目的。

五、羊毛——因着绥东战局的失败，日本对于察绥毛产的全部吞并，曾一度遭受打击，但是事变前"日钟纺织会社"还拟投资三千万元，计划在张家口设立洗毛厂，以收买内蒙羊毛。

其他日本在华北掠夺军需资源的零碎活动，在事变前，更是五花八门。如在张家口一带，一方阻止口外马匹的内运，一方则大批购买。为着备战用铜铁的迫切需要，派了许多汉奸深入华北内地，收买废铜烂铁。且大批偷买铜元，私运出口。截止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左右，据一般估计，铜元走私出口者。约在五十万枚以上。

（何东辉：«华北军需资源与中日战争»，«反攻»2期，
1938年2月16日出版）

〔附〕一九三五年前后日寇在华北等地的武装走私

“走私”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恐慌所表现的一个新姿态，按“走私”(Smuggle)一辞的本义原是指“秘密地将货物输入某国，以避免完纳合法的税捐”而言。(To conuey goods clandestinely into a country in order to auoid payment of lcgal duties.)但现在我们中国所实行的“走私”，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是以某种特殊的政治势力为背景，公开的，强迫的，大规模而且毫无限制的以巨额商品向我市场倾销之一种特殊的“走私”，这是开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关税史上所未曾有之前例的“走私”。诚如字林西报特约通讯所述某商人的谈话：“君不能再称此为私运。因其实为自由贸易矣，就目下情形而观，不仅北戴河为自由贸易之口岸，甚至其沿海一带，亦均自由开放也”。(见5月2日该报)由这种走私之特殊性，我们便可以认识：第一，现在的走私决不是一个关税行政的问题，它本身即是一个政治的问题。第二，防止走私决不能责之于缉私自身，而必须根本消灭支持走私的特殊政治势力。若不此之图而仅在支支节节的缉私上设想，结果非但不能防止走私，反而会助长走私的凶焰；这也正象我们决不能以防止小偷的方法以对付明火执仗的强盗，是同一明显的道理！

“友邦”之所以策动大规模的走私，我们如把它仅看做是破坏我国的关税行政，固然是太小看了它，即我们看它是想借此来打击我国的民族工业，也依然是不够的。不幸在我国的论坛界许多人都仅把走私看成一个单纯的财政问题或经济问题；自然我们也承认推销日资本主义的过剩商品是走私者之主要的动机，但这却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中心企图，他们的中心企图是想把走私当为一种手段而达到另一种政治的目的，即实现广田三原则之一的中日“满”经济提携。我们还记得当今年三月间有田大使与张外长在南京恳谈后，有田返国曾说日本并不拘泥于三原则，“不拘泥”云者就是说三原则可以分别开来一个个拿来实施，而不必整个一套的批发。谁能否定华北防共协定之订立不是广田三原则之具体化的实现呢！走私问题也是一样，即“友邦”要用走私当为一种手段，以压迫中国自动地提出减低关税，或使华北关税独立化起来；但无论是中、日或华北改订关税都可以使中国走上中日“满”经济同盟的路上去，这是谁都可以看得明白的。看清了这点，则知我们想用一纸公文的“严重抗议”乞求“友邦”取缔走私，真可算得是“与虎谋皮”了。

在走私运动的发展上，我们又可以得到一种教训，即走私运动的开始和扩大完全是与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不抵抗主义相呼应的。我们知道，华北走私之开始发展是在东北沦亡以后，中国既不起来武装收回，又设立所谓“战区”以作缓冲地带，此时人造丝和毛织物的偷运便在华北出现，华南之福建，因有台湾籍民的掩护，私运也跟着登台，不过这时还不敢明白张胆，所以性质亦不严重。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塘沽协定订立之后，走私因有冀东战区为大本营，其势益见猖獗。但华北走私之变为公开的武装的性质，却还是在去年五月以后。例如据海关当局所发表，去年一年华北走私可分为三个时期：(一)自去年一月至五月底，其时日本及“满洲国”人，屡有私运银币之事，计四月至五月间银币私运约达十七万七千九百元。同时在这

时期中有两次私运事件，足以令我们注意的，即五月十七日及二十五日，海关侦悉有偷运银币之事，遂往缉捕，私运者自长城跃下因而受伤，据说他们是“满洲国”人民，日方遂提出要求，要海关赔偿损失五千元，并不得缉私队再在长城缉私，海关缉私，自此愈感棘手。惟此时海关走私，尚未见扩大，大规模之私运亦未见成熟。（二）自六月至九月中旬，这时日方要求，已由我国全部接受，寝至九月间，海关缉私队被迫不能在战区行使职务，同时沿长城一带缉私人员，亦被解除武装。至九月中乃有专事私运之石河转运公司出现，中国苦力之被雇者达一千名之多，公开走私，即于此开始。惟在此时期内除私运银币出口外，进口货尚只有人造丝一种，由北宁路运赴其他各处，路局方面迫于武力，惟有任其运送未能反抗。至九月间，形势益见扩大，是月九日，日军当局向秦皇岛海关税务司要求将所有海关缉私船只上所置机关枪一律撤除，虽经海关当局据理力争，而日方置若罔闻，海关迫不得已，惟有屈服。数日后日方又要求，在战区三英里以内，所有缉私船只，不论其武装或非武装一概不得行使，于是海关缉私船乃绝迹于“战区”。（三）自去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海关之缉私管理，已完全消失，日本海军当局完全否认中国三英哩以内之领海权，对于海关缉私船之搜查，视为海盗行为，以致缉私效力，全部消失，结果沿海一带自大连而来之私船，络绎于途，当局对之，惟有兴莫可如何之叹。今年一月以来，海运之外，又有陆运，海关方面虽迭请路局及日井协助，绝无效果。最近冀东伪组织自订税率以后，问题乃愈形复杂；日本当局，处处作难，谓货物一经冀东完纳，即不得再完他税，可见冀东所定税率，已为日方所许可也。

由上述海关报告看来，可知走私之所以演成今日空前的状态，完全是外交失败和不抵抗主义推演的结果。为海关缉私而可以答应赔偿私运的“满洲国”人损失五千元并承认缉私人员不得再在长城缉私的要求，此后走私者自然可以有恃无恐，肆无顾忌了，因为中国可以答应放弃沿海三英哩内之领海要求，私船之络绎于途，自然只有兴“莫可如何”之叹了。因为中国可以熟视冀东伪政府之存在，且每月能划拨关盐税之一部分的收入以维持它，日本自然可借“经径冀东完税，即不再完纳他税”为借口了。字林西报记者坦率地说：“就报告观之，海关缉私队现尽之职责，实未获其自己政府之助，此尤为不幸之事。……地方官对于缉私队，多无所助，有时且加以妨碍，实际不啻鼓励走私，……故海关缉私队对目前发生之局势，丝毫不负其咎，盖自己政府不予以保护，则缉私队显然无力以抵抗外国侵略者所张示之武力也。”

一方面在睦邻政策下可以解除缉私队的武装，可以放弃三英哩内的领海权，且可以容许为私运者之根据地的冀东伪政府之存在；另方面却想以津浦线的沧县、平汉路的长辛店设关，以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及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的章则来防止走私，结果岂止是缉者自缉而私者自私，且亦如扬汤而止沸，适见其舍本而逐末吧了。

关于走私所给予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论者已多，兹仅补充一述：走私影响之最显著的（然而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便是财政上的损失，据海关当局所发表，去年八月一日至今年四月底止，海关税收之损失约达二千五百余万元，而本年四月，仅一个月期，损失即达八百万元，“其情况之恶劣与数字之惊人，实为海关有史以来所未有。”关税本占我们税项收入百分之七十左右，而进口税收又为关税收入中最主要的项目，自东北各关被夺后，关税损失约达四千万元，已是中国财政上莫大的损失；现在走私一项，中国税收之减缩，又几乎等于东北各关之被劫夺，这在中央每年财政不敷已达二万万元以上的今日，该是多么大的压迫。走私所给予我国经济之第二种影响便是打击我国的民族工业，而其中最受致命伤的尤其是糖业与人造丝业。例如以糖业来说，华中与华北所销用的糖，有洋糖与粤糖两种，各由上海进口，

一般市价为白糖每担二十二元，红糖每担十八元，然而私货却只要十二元或十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六十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千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五月初就停业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后，广东糖厂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据上海该业同业公会报告，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去年有兴昌鼎源等二十一家。丝织机数计达二万部，现因私货倾销影响，已仅余六七家，机数三四千部，因为天津运来的绋葛绫，每匹只售三四元，而本埠厂家出产的，最低成本即须六七元左右。这样那有不破产之理呢！除糖业与人造丝业外，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航业更无一不受到走私的迫害，尤其为华北工业中心区之天津，各厂之不是关门大吉者即被日商所收买，报章上天天供给我们这项材料，无待赘述。比较"最不受走私影响的则为重工业，如各种机器及其他特种货物，而有公司代表直接在沪经理者，是以外国工业制造家，均不致受此影响，甚至有人趁此自由港之便利，亦实行大量输入以谋利益。"（见大公报）私货之中只没有重工业品，可惜重工业在我国不值一道，且得渔翁之利的亦是外商而非华商；比较算得起民族工业的却没有一样不受私货的打击。中国不单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而不能有保护的关税，且要受"超不平等条约"之压迫而"走私"亦变成了"自由贸易"，这不但在经济史上是创闻，即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史上怕也是开新纪录的吧。

现在走私之唯一的自然的限制，恐怕就只有中国民众的购买力了。当华北的走私市场已经饱和到超过人民购买力的限度时，它就必然地会向南发展，近日来私运之如潮地涌进徐州、蚌埠、芜湖、西安、郑州、包头等地，正表示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同时私运的货物，亦由量轻值重关税较高的糖、丝、卷烟纸进而为量重税轻的其他商品，因为纳很轻的关税终不若根本不纳关税。现在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策略，似乎仅是防止私货之南侵及在税收上想些补救的办法（如在沧县及长辛店增设税卡，在津郊南北通河子牙河汇流处小闸口设检查所等等。）但是我们必须认识，走私问题不仅是一个华中与华南的问题，也是全中国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经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我们固然绝对要防止走私之南渐，同时我们更要阻遏走私在华北之猖獗；我们固然不妨用各种方法以缉私，然而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忘记消灭走私之真正有效的手段还在于根本消除支持走私的特殊政治势力，即以武装的缉私对抗武装的私运。若我们想仅以支支节节的办法以保持东南半壁，或者甚至以减低关税来乞求强暴者的哀怜，则我敢相信非但东南半壁的市场决不能保，强暴者的怜悯决不可得，而且走私会进一步的深入到华中与华南，它必会把中国仅有的一点点民族工业基础打得粉碎，把中国的国民经济整个地摧毁得无以自存；那时，不但我们的"抵抗"准备会变得毫无前途，即令有人欲在小朝廷苟安朝夕，也将不可得了。

（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大量私货由冀东自治区运到天津，据海关的报告，从去年八月一日至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可以得出下列的统计：(单位包)

月　份	人造丝	卷烟	匹头	白糖	其他
8月	3,025	226	—	—	—
9月	4,020	510	680		
10月	3,978	842	2,509	4,410	329
11月	11,063	1,041	2,265	1,859	993
12月	14,674	424	1,055	71,529	416
1月	5,082	252	944	75,143	185
2月	1,262	561	1,151	40	428
3月	23,039	1,812	4,796	110,975	1,193
4月	23,477	507	7,631	208,601	7,508
共计	89,617	6,171	21,131	478,296	11,052

五月的情况更为猛烈，单从五月五日至十二日一周间的短时间内，据津海关的调查，人造丝就有一千三百万公斤，砂糖六百〇三万公斤，卷烟纸三万公斤，棉布三千捆，海杂货八千包，煤油，汽油四千七百七十五箱。五月十九日，更有白糖一万二千余包，人造丝二百七十余包，由北戴河，秦皇岛等处运抵天津。

此外“友邦”在华南策动走私的严重性也不容我们忽视。现在，“友邦”在华南也正拟在潮汕设立“私运组合社”，并且以汕厦为私运大本营，在广州等处，雇用浪人广开日本商店，据说于一个月之内此种商店已添设四十余家，而每月截获私货亦有四五十起。

私货并不限在口岸销售，它已经深入中国腹地。华北的私货，现在已由西经平绥线至包头，西南向而入郑州和陕西的长安，南向更至苏北的沛县，最近，甚至京沪的无锡南翔以及江北的南通等处亦已发现大批的漏税人造丝，据申报五月二十七日记载，五月二十日晨，由津开行之火车中有私运煤油一批，共三千六百箱，装往甘泉，张家口及宣化等地，同时并说五月十九日一天之内，由天津东站运往卫南、榆次、大同、新乡、徐州、顺德、前门、包头、西安、蚌埠、济南、周村、甘泉、张家口、宣化等处，共计白糖六千八百二十六包，人造丝一千一百九十六包，煤油三千六百箱，以及大批的卷烟纸等。

（秦伯瑞：«1936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
«中国国民经济»）

一九三五年前后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

（资料辑录）

在今年开端的一月间，东北方面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个也不算坏的好消息！当时上海各大报纸都载着这样的电讯：

“抚顺煤矿工人二千三百人，因工头二人为日人凶殴，十六日全体罢工，矿警开枪，击毙工人一。工人八百余聚众拥入总理室交涉，日总理明古江召矿警三百，包围开枪，死八十七名，捕去六百余名，死伤在矿区内枕借，无人过问。矿方强迫未罢工者复工，因矿井水满，迄十七未复。顷日指其中二十八名为煽惑祸首，将予枪决。”

这事是发生在“我们始终否认”其业已沦亡的远远的东北；同时比起“我们始终否认”的东北沦亡来，这事又是“一件不关紧要的小小动作”，因此，被捕的六百余工人怎样，被击毙的八十七名工人怎样，那些将予枪决的二十八名工人又怎样，我们就统统不得而知了！我们更这样想：国内定有不少“贤哲”的人们早已忘去这一事件，同时他们还更希望其他的人群也和他们一样容易忘去这“不快”的记忆！

最近山东淄川方面又发生了动因不同而结果是同样悲惨的惨剧：

“五月十四日济南专电：十三日早十一时廿五分，淄川鲁大公司煤矿第二坑七十五号开煤处发生大水，势甚急，坑内工人约四百余名，至晚未能救出，十九号开煤处有二百余工人亦未救出。六百余工人证明已全淹死，家属环井呼号，哭声震天。现积极打捞死工，约一周可捞出，实空前惨剧。”

鲁大公司名义上是中日合办的，实际上全在日资操纵之下。现在因为“工人家属五百余人包围事务所，怒号‘还夫还子’，几有暴动之势”，日本领事遂电请鲁省府派队前往弹压，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丧夫亡子的妇女们还不能为死者自由哀号呀！

（骆耕漠：«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见中国经济情报社编：«中国经济论文集» 第二集，1935年）

河南彰德矿区在今年四月份内曾发生两次爆炸：

“彰德讯：六河沟煤矿和顺井，于七日晚五时突然爆炸，声大如雷，重伤十四人，皮肉焦烂，截至十一日，陆续死去十一人。”（四月十四日“新闻报”）

“本县西北小寨煤矿，于廿七日工人正在工作之际，石头洞内突然透出火星，轰然一声，浓烟满布，火势甚猛，工人躲避不及，致死李黑只等十余名。身肠焦烂，骨质为灰，其状至惨”。（五月三日“北平晨报”）

这种不测的横祸，据我们从零星各报所已见到的，在去年一年间有如下表所载（遗漏当属不鲜）：

月	日	遭祸所在地	死伤人数	原因
4	26	安阳马窒沟	死十九人	失火
4	—	同上	死伤七十余人	失火
5	28	开滦矿井	死百余人，伤五十人	电滚走火
6	17	焦作中福公司	死伤三十人	因火爆炸
7	21	开滦马家沟	死伤数人	煤洞塌毁
7	24	长兴煤矿	已知死五人，余未详	爆炸
8	5	开滦马家沟	死一人伤十余人	—
9	19	同上	伤八人	—
9	—	陕县民生煤矿	死伤七十九人	凿井发水
10	14	安阳新庄村	死伤十一人	出水

（骆耕漠：«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见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二集，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全国工业灾害按照原因分配表

（中央工厂检查处）

灾害种类	发生次数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死伤总数	损失估计
爆炸	65	267	546	813	2,277,000
火灾	142	140	633	773	3,695,000
跌伤	460	53	417	470	
压伤	336	63	380	443	
撞伤	313	31	297	328	
灼伤	153	13	150	163	
轧伤	398	39	393	431	
击伤	426	55	544	599	
触电	55	32	23	55	
矿井水灾	2	542	464	1,006	4,200,000
矿井塌陷	1	160	14	160	110,000
溺水	5	75		85	
其他	299	36	263	299	
总计	2,655	2,506	4,123	5,629	10,272,000

（国民党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年鉴下»）

浙江长兴县矿区，其经营方式在中国还算比较完备的，我们就根据从那儿调查所得的作为例证吧：

“矿区工人大部分是河南省的农民，可以分成两大类，就是井上作工的和井下作工的；生活最苦的是煤井下面的工人了。他们的生命在在可以毁灭；煤气，井水，坍塌等等灾害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每一次上工，要在井中住上八个小时，八小时的里边，一些饭食却不能进口。黑黝黝的地狱里，只有一盏暗淡的电石灯，方是他们唯一的侣伴。他们每次拖着沉重的脚步，成群结队地走向井口的电梯，十几个人一次的就给那个怪物吞下肚里去，及至出来的时候，只见到三四人一次的在洞口伸出头来了！各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沉沉的死气，一点血色也没有，混身黑黑的活象书本上见到的黑夜叉。”

（1934.2.6.杭州“民国日报”）

前述“在在可以毁灭的生命”，一旦毁灭掉以后又怎样？前引报纸又这样告诉我们：

“有些工人为着要多得一些工资，每每做了上午六点钟至下午二点钟的工以后，晚上的十一时又在做着第二次工了，但是他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所在往往要害病。如果是死在矿外的工人，谁也不会有一点怜恤；万一在矿内给煤气井水等等灾患害死了，工人的家属就可向办事处领取一百八十元的恤金，这就是一条命的定价。”

象河南焦作矿区方面，一条命还只能卖得一百元。那儿矿工们之间有一个流行的歌曲就是用来刻画这一事实的：

“成神不成神？一两天登云；
下去一百块，上来千三文。”

这就是说矿工们下井的时候，就是有去死的决心，预备他们的家属去领一百元恤金；万一井水煤气没有把他们葬送，上来也只能得到一千三百文的微薄工资。当矿工们拖声挨气地哼着“下去一百块，上来千三文”的时候，其情景是多么凄惨呀！

（骆耕漠：《死亡线上的中国煤矿工人》，见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经济论文集》第二集，1935年）

全国各业失业工人数（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估计）

业别	失业人数	业别	失业人数
渔业类	7,500	土石制造业	
矿业类	31,402	瓷业	159,000
工业类		其他	134,500
丝业及丝织业	368,641	共计	293,500
布业	635,250	火柴业	151,000
纱业	46,795	其他	17,813
其他	7,300	业类未详	212,618
共计	1,057,986	合计	3,146,993
饮食品业		交通运输类	320,549
盐业	1,451,000	商业类	376,421
其他	13,478	业别未详	2,010,331
计	1,414,076	总计	5,893,196

（国民党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五年中国经济年鉴下》）

一九三五年前后的农村状况（资料辑录）

一　农村经济日益受帝国主义势力的压榨

1. 农业生产进一步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

中国的农业生产更进一步依赖于帝国主义，从一九三五年的对外贸易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下面是四种主要农产的输出货值：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桐　油	23,161,233元	30,261,269元	26,216,683元	41,582,879元
指　数	100	130.7	113.2	179.5
棉　花	32,180,105元	30,228,958元	15,200,879元	21,732,316元
指　数	100	93.9	47.2	67.5
生　丝	55,845,247元	57,287,933元	28,755,687元	40,537,926元
指　数	100	102.6	51.5	72.6
茶　叶	28,578,504元	34,210,037元	36,098,549元	29,624,184元
指　数	100	88.7	93.6	76.8

上列四种除茶叶一项仍为帝国主义的牺牲，继续猛烈的降落以外，其余三种都有或多或少的增加。一般人都认为这种增加是表示中国农业经济的"好转"，尤其对于桐油一项之打破历年纪录而为输出首位表示赞叹。很明显的，这种赞叹是带有血腥气和火药气的作用，是依赖了美国的福特公司和军火商人才得照应了这种军事工业原料的输出景气，棉花输出增加的意义也是一样，它并不是建筑在国内棉花生产的增加，和民族工业需要的剩余之上，而是在民族纱厂业者花贵纱贱的喊声和棉花生产大量减少的过程之中。下表为过去四年的棉产数量：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棉田（亩）	37,099,800	40,454,023	44,971,264	34,939,121
棉产（担）	8,105,637	9,774,207	11,201,999	8,197,688

（中华棉业统计会）

中国的植棉事业因为帝国主义的授意，政府当局的提倡和银行资本的援助，年来似有一日千里发展的趋势。一九三五年因为普遍全国的水旱灾荒，棉产竟减少了三百万担以上。但是棉花输出却增加一百万担以上，价值六百五十多万元。而这个输出的三分之一以上却是运到东邻日本去的（占一四,七七〇,四三九元）。中国的棉花生产究竟为谁生产是很明白的了。

（中国经济情报社编：«1935年中国经济年报»第二辑）

〔江苏〕南通一带棉区，资本帝国主义者趁着农村经济破产的机会，伸其经济的巨手，

将未成熟的棉花，用“期买”的形式先期购买，其所估的价格，更不及十分之三、四，这种高利的榨取，若按利率计算，实不在百分之五百以下。这样，不特贫农、佃农无以为生，即素称“小康”的富农，也日趋败落而濒于破产。

（王南屏：«江北农村实况»。见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1936年）

〔湖北阳新、大冶、武穴、蕲春〕四县所产苧麻既以日商为惟一主顾，而华商麻行营业又以日商为依归，于是关于价格的涨落，都以日商所定价格为标准，而麻贩更斟酌麻行开价向麻农收买。这样从生产者麻农之手，经过麻贩、麻行或单只麻行，而售与日商，其中每一转手，价格即被压低一成，那押低的总价差就是麻农所得被榨取了的部分。基于此种榨取关系，所以麻贩给与麻农的代价，每斤只在一，四〇〇——一，五〇〇文，麻贩售与麻行每斤却平白地增至一，六〇〇——一，七〇〇文，两者相差约二〇〇文即〇.〇四元左右。而麻行售与洋商的价格自然还比进价又要提高些。这里露骨地表示着贸易的层层剥削关系。

（江汉罗：«湖北省阳新、大冶、武穴、蕲春四县苧麻产销调查»，«国际贸易导报»8卷2号，1936年2月）

凤阳、怀远、定远三县出产烟叶，为皖北农家最大付业，每年收获约五、六百万元。……大宗销路，仅英美烟公司（现改称颐中烟公司）一家收买。该公司设厂于门台子（津浦路南段小站之一，距蚌埠四十五里），规模宏大，有东、西两厂，每厂装有烤烟机器，中、外职员五、六十人，工人五百余人。主要工作，为估计烟价，其权操诸外人。收买烟叶手续：预散烟售券，分发各烟农，上编号码，由各烟农持券入厂售烟，每日规定八百号，陈列一室，由外人按号估价，不得争执。因此一般烟农，多忍痛售脱，舍此无他厂收买。加以本年种户加多，收成丰富，供过于求，外人利用此点，故贬其价；往岁中等烟叶，每石售二十余元，今则十余元，相差过大。烟农辛勤数月，所获代价，仅能维持种烟肥料等费损失。本月（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引起多数烟农之不满，几与外人动武。该厂见事不佳，立时停止收烟。至十八日，各县麕集门台子之烟农，为数七、八千人。凤阳县长易李和深恐事体扩大，引起意外，并影响烟农本身甚巨，是日特由凤阳赴门台子，晤该厂外人，极力调处。结果十八日照常开市；烟价方面参照民三十三、四两年定价估计，方告无事。

（«皖北烟业丰收»，«农村副业»1卷6期，1936年9月）

中国一面代帝国主义从事军需工业原料的生产，一面因为普遍全国灾荒的侵袭，所以食粮生产除籼粳稻一项略有例外（这个例外，还不能越出一九三三年的数字），其余都大大地衰落了。下列三种主要作物的生产量很明显的表示出来：（千市担）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籼粳稻	940,431	879,017	696,852	870,537
小　麦	454,584	450,562	449,212	426,052
大　豆	131,009	145,428	112,891	100,379

（中央农业实验所估计）

苏浙皖赣素称鱼米之乡，因为一九三四年的大旱，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竟至缺米一千三百万石。华北和绥远等省因小麦歉收而陷在玉面飞涨的状况当中，华中各湘鄂赣川，华南如黔粤等省的人民亦都在挖食草根树皮和观音土的窘况之中。虽有几处偶尔丰收，但因国内的封建籓篱的障碍，甚至“江北丰收难运江南”，“皖北米也不能运济皖南饥民”。“饥饿壁垒”虽

然抵得过"关税壁垒"，粮食输入减少的趋势终于形成了逆转。洋米商人见利勇为，加以九月一日中法"越南商约"的签订，洋米进口税训令减征，于是粮食也就如洪水般涌进来了。(金单位)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米谷	101,283,994	77,340,151	33,432,639	50,909,951
指数	100	76.4	33	50.3
小麦	43,968,720	45,148,667	16,220,990	19,821,107
指数	100	102.7	36.9	45.1

(中国经济情报社编：«1935年中国经济年报» 第二辑)

2.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农村的劫取浩夺

最近又有（日人）以五千万元在天津组织大众农业公司，并于军粮城北塘附近租妥农田三万亩的消息。同时，据传津、塘一带沿海河两岸膏腴之地，及平津市内地皮，也多被日人买去。日本在华北可说业已获得土地商租、购买、租赁的实际自由权。

(«中国农村»2卷12期，5页，1936年12月)

从一九三三年起，就有许多日本浪人和汉奸分头在北方各省招工和拉夫。拉夫的办法，在冀东各县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的保护之下进行。招募的办法，主要地在河北、山东各县行使。单单一九三四年一年中间被招募去的工人就有三十八万八千人。……这班新去的工人，他们在东北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他们所受的待遇自然更坏。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他们上边有日本浪人当监工，汉奸当翻译，御用的刁刻的中国工人当工具，另外还有日本军队，层层地周密地监督着。他们天一明便工作，一直到黑暗夜还要点着汽灯赶工，每天工作最少在十二小时以上。不管严寒大雪，不管狂风暴雨，不准有一天休息。晚间随地而卧；日里连黄烟也不准吸一口。假使谁动作稍微慢些，监工和工头的木棒和皮鞭就立刻落到他的身上。至于工资呢，二三个月不发一个大，每天三顿稀粥或者臭高粱米饭，由工头供给。谁敢做声一句半句，日本军队就把他带去当共产党枪决。



(叶民：«东北劳动大众的亡国奴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

东方的恶魔，我们的"友邦"，为着要完全独占被占领地的经济起见，对于（察哈尔）商都第一步便实行了经济封锁底政策。本来，一般农民们为了还债、纳税等等的紧急需要，往往在秋收后就不得不出卖大半粮食。但在粮食充斥的本县市场内，谷物的价格是非常低下的，所以他们往往运往省外求得比较高些的价钱。可是，因为某国积极准备战时粮食，便禁止粮食外运了！同时，用着两种掠夺方式来努力收买农民的谷物。第一，农民要出售粮食，都必须售给他们指定的粮食收买机关；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之下，强迫收买，还用大斗小秤来惨酷地折扣你一次。比方：古历八月间运至晋北阳高的每斗麦子的价格是一元五角七分，除每斗二角的运费外，剩余一元三角七分；这里却只能卖得八角二、三分。农民们明知吃了大亏，但是在淫威之下，只好紧紧地捏着拳头，带着愤懑愁苦的面孔走回去。

其次，便是用政治权力征派粮秣；那简直和强盗的掠夺差不多。那些效忠恶魔的伪官方，确是令出法随，丝毫不苟；如果你交纳略有延宕的话，立刻就有伪组织的警察光临，一

条绳子拴了你去尝那铁窗子的风味；甚至于给你带上一个“反动分子”的头衔，置之死地。此外，还有当地的驻军，随时下乡打着“剿匪”的旗号，搜罗农民的粮食做马料，同时并假借着搜赃的名义，劫掠农民的金钱衣物。

…………

自从恶魔的铁蹄伸入到这里(商都)，和傀儡的组织实现了以后，不但未曾减轻了他们的税捐负担，反而益加苛重了！固然，表面上打的是免除杂税的旗号，然而实际上却提旧名目去掉，又翻出许多新花样来：什么建设捐呀，筑路捐呀，飞机场建筑捐呀，就是牲畜也迫会登记纳捐。……因此，农民们负担的税捐，每顷地比从前加重二倍半以上。每逢丘八老爷下乡收捐，一般无力交捐的农民，受打挨骂，当然是必不可免的了。甚至奸污妻女，翻箱倒箧，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劫掠无遗，有耕畜的牵走耕畜，无耕畜的便带你到县追收！

在苛重的税捐之榨取外；还要强迫种大烟。据官方的规定，每百亩田，要种大烟五亩；不足百亩的，按百亩种五亩的比例折算；百亩以上的照例递加。每亩抽烟捐五元，在播种前预先缴纳，不许不种；如果发现已纳捐而未种烟或少种的，即给你一个违背法令的罪名，来惩办你。

（任子寿：«傀儡组织统治下的商都农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动态»，1937年）

二　灾荒的持续普遍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鄂、湘、豫、冀、晋、陕、川、皖、赣、闽、察省水淹田地三六三，四九一，〇〇〇亩。黄河决口，长垣、濮阳一带尽成泽国，直至翌年三月，仍大水围城，灾情奇重。苏、皖、浙、鄂、豫、赣、滇、陕等十四省，三一三县，旱、水、蝗损失达十万万元。本年水、旱、蝗灾，农田被灾面积一千六百余万亩，损失约一千三百余万元，受灾九省一九五县。七月粤大风，倒塌无数，拔木沉舟。又十二省八十九县风霜灾，安徽旱，饥饿死者，不下数千人，逃亡者数百户。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年）

一九三一年的水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水灾，一九三四年的旱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旱灾，一九三五年是把这两个最大的灾荒合流了。

先看一下一九三五年的水灾情况：

一九三五年八省水灾（实业统计三卷六期）

省别	被灾县市数	被灾面积（方公里）	灾民人数	财产损失估计（元）
湖北	52	44,870	7,149,700	270,000,000
湖南	37	27,000	5,600,000	60,000,000
江西	50	21,600	2,297,300	110,000,000
安徽	13	1,200	304,600	5,566,000
山东	30	32,500	3,500,000	250,000,000
河南	47	7,000	1,593,000	60,000,000

河　北	3	200	200,000	3,000,000
江　苏	9	4,730	1,317,900	17,453,000
合　计	241	138,100	21,962,500	776,019,000

假使跟一九三一年比较则如下列：

年　分	被灾县市数	被灾面积（方公里）	灾民人数	财产损失(元)
1931	290	318,629	43,360,849	1,575,330,360
1935	241	138,100	21,962,500	776,019,000

从上列统计看来，一九三五年的水灾似乎与一九三一年相差很远，可是单从这许多数字来观察是不够的。因为一九三一年的统计调查固然只包括江、浙、皖、赣、湘、鄂、豫七省，而实际上有十六省；一九三五年的水灾区域也不仅上列的八省，此外如黄河上流的晋、绥、陕，长江上游的川、黔，珠江流域的闽、粤、桂都是不能忽视的。例如在陕西受灾县分就有十二县，广东有九县，灾民达二万多。

假使把有调查各县的各种作物的水灾损失成数来加以比较，那末一九三五年且有超过一九三一年的趋势。

年　分	稻	棉	高粱	小米	糜子	玉米	大豆
1931	38	24	29	29	—	—	—
1935	34	—	37	40	44	43	47

（一九三一年据一九三三年《申报年鉴》P.72；一九三五年据《农情报告》3卷11期）

再说到旱灾。因为水灾的来势凶猛，对于一切破坏的力量也特别强大，所以大家都把一九三五年的旱灾也都忽略过去了。事实上，就作物被害的程度来说，旱灾还超过了水灾。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一九三五年旱灾与水灾的比较如下：

名　称	损失数量1,000（市担）		受灾面积1,000（市亩）	
	水　灾	旱　灾	水　灾	旱　灾
稻	10,818	12,523	22,445	23,969
高　粱	5,106	9,492	7,187	8,358
小　米	5,160	10,468	7,738	10,057
糜　子	1,002	1,821	945	1,668
玉　米	5,801	7,611	6,460	7,753
大　豆	6,555	16,703	10,543	25,222
总　计	35,002	58,618	55,318	77,027

上表指示出无论从受灾面积和损失数量上说，旱灾都高过于水灾。可是这仅指作物受害的程度而言，至于实际上的损失，水灾总要比旱灾来得利害，因为洪水不能如酷烈的阳光一样，不仅把许多作物浸死，而且也把人畜和房屋，堤坝田基等都冲毁淹死了。

假使把一九三五年的旱灾与一九三四年的旱灾来比较，受灾面积固然不及一九三四年的广泛，可是从受灾区域内损失成数言，则一九三五年比一九三四年来得深度了：

损失成数比较

	稻	高粱	小米	糜子	玉米	大豆	棉花
1934	37	27	25	—	29	30	36
1935	37	37	35	38	38	47	—

（«农情报告»）

我们假使还要观察一下一九三五年中国灾荒的全面的话，那末其它许多灾害也是不可忽视的。残暴的风，三千六百万市担以上的作物被吹毁了，可怕的病和虫，也有三千二百万万市担以上的作物在"改良""推广""治虫"等等机关的注意之下被腐蚀和枯萎了。加以其他各种灾害的损失五千六百余万担，总计有一万二千万担以上的作物都被盲目的自然损害了。人类征服自然呢，还是自然征服了人类？目前的中国却属于后者！

（中国经济情报社编：«1935年中国经济年报»第二辑）

三　农民生活更加恶化

〔山东莱芜〕在恐慌中遭受了最大的威胁的，便是中农以下的农民层。农作物价格跌落，富农与自耕农的收入锐减，这是自然的事。尤其是莱芜的出口商品——姜、麻、花生等——的经营，一半操在他们手里，今因世界经济恐慌，姜、麻出口激减过半，因之价格亦猛烈惨落。在这两种情形之下，中农为支持自己的家庭，供国家及地方的税捐，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乞助于银行、钱庄及商人高利贷者之门。

至于半自耕农或贫农，那更不必说，情形是倍加凄惨了。从前他们还可借掠夺经营，以维持其家庭生计，现在连这个农业经营上最后的手段也失掉了它的效力。农民们没有娱乐和休息的时间，土地亦无休闲，农村疲敝，已达极点。复因农业之商业化，农民和市场发生了很密切的关系，他不得不急往市场抛售自己所有的农作物，又不得不从市场上购买价值昂贵的必需日用品，他们本来就是以借贷为生的，目前更遇着了一个银根吃紧的年头（东北丧失后，莱芜人在关外的经营全部丧失，每年的进款，特别是贫农的进款，因而断绝），那只有走上更穷困、更悲惨的道路。

（王毓铨：«山东莱芜县农村实况»，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1936年）

西南线陕西段调查区域内二十五县，各县农民生活之痛苦，有非外人所能想象者。盖前数年连年灾旱频仍，五谷不登，农民无法生存，皆拆售房木家具，及鬻卖儿女，以作纳捐及糊口之资。最近情形，虽稍转佳，然距充气恢复之期尚远。各地交通不便，产销失其调济，丰年谷多价贱，农民仅免冻馁，荒年谷少价昂，民食辄起恐慌，"匪"患频发，耕稼不宁，兵来剿"匪"，粮秣之供给，夫马之征发，无一不对于疲敝之农民生活，加以再度之蹂躏摧残。一般农民，能得布衣粗食，足以蔽体保温者，已属厚常；夏秋两季，农家儿女，十九裸体。农民普通食粮，为大小麦、糜子、谷子，或煮粥或磨粉，或制面与馒头等。每饭有盐菜数小

块，或略煮蔬菜瓜果佐餐，即为佳肴，淡食者亦常有之，肉食难得尝试。农民居住，多为土屋，亦多于土山、土邱之中，筑窑而居，以避风雨。土窑深可数丈，向外处有窗及门，后部虽通风，而光线甚缺。靠窗设炕以卧，炕内筑有窗管，连接锅灶，以取暖气。除此以外，家无长物，虽一桌一椅，亦多无之。

（国民党政府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陇海西兰线陕西段经济调查报告书》，1935年）

四川农村，连年饥馑，如合川四乡之农民，生活无着者，达十之七、八。人人有饥馁之虞，告贷无门，乞化无地，一遇灾荒，相率弃家远逃。仅就古蔺一县计之，去年(一九三四)已达一千余家。如在大竹各乡之所见者，饥民麕集，动辄数百成群，乃至一、二千之众，皆系本乡耕作农民，食粮告罄，饥馑侵袭，无以为计。此种惨况，无地无之。大多以豆叶菜根，暂时果腹，取食既尽，则继之以树皮、野草、苟延生命。殆至草根、树皮剥食罄尽，于是争掘白泥充饥，以续残喘。如南川、古蔺、遂宁、南充、武胜、合川、隆昌、内江、宜宾、江安等县，在去年饥馑中，白泥竟为成千累万饥民之主要食品。其觅食不得而饿死者，仅就古蔺一县计之，亦达三千余人。本年（一九三五）春荒爆发，眉山、彭山、丹棱、青神、宜宾、荣县俱已成灾。此外，如江安、铜梁、南川等处饥馑情形，则较之去年，尤觉严重。春荒突起，饥民多以白泥、芭蕉头、梧桐等果腹，无处觅食而饿死者，为数颇多。

（西华近代文献征集处：《四川农村崩溃实录，24年度饥馑前奏曲之春荒概况》，1—2页，1935年5月）

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八月，一万多饥馑农民，由溧阳飘流至无锡、南京去，而被当局阻止。河南西华二千名的灾民，为欲搭车前往武汉逃生，曾与铁路当局发生残酷的冲突。前年（一九三五）湖北万余啃草吞泥的农民，在武汉警军的枪刃下流血屠杀了。……

无可卖的东西的农民，仅以数元的代价把自己的子儿卖出去。西北地方的子女出卖，在许久以前即已特别有名，钻进农村收买廉价女子的都市的女衔，以十元上下的廉价收买少女，强制她们在都市卖笑。在天津子女的买卖价格是一元一岁，其中亦有十五、六岁的少女，仅以四、五元的代价出卖的。

（吴泽：《中国农业劳动现况及农业劳动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劳动季报》11期，1937年5月）

〔一九三四——三五年〕近几月来，报章上面自杀的新闻，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比较动人的如：江苏溧阳“一家八口闭门服毒”，自杀原因是“食粮已尽，告贷无门”；浙江常山江姓农户全家十五口目睹秋收无望，生路断绝，负债难偿，煎熬刺虻十余碗，各自吞服，死者七人”；长兴“农民王某因田禾枯萎，收成绝望，借洋一元购得砒霜，……一家共食，当晚毒发，一家七口毙命”，浦江某家“一家老幼十一口均服砒霜自尽，仅一十二岁孙不肯服毒。”这还是去年（一九三四）八月一个月中的消息。

（中国经济情报社：《农业现状》，见申报月刊社：《中国经济现势讲话》，1935年）

四　各地农民斗争此起彼伏

广东台山因各乡所派电杆电线多未缴纳，县府就派兵队下乡催收。距抵达温尔乡时，乃

通知该乡公所，转经安和村催收。该村实无法缴纳，县兵不由分说，即将该村父老数人拘县讯办。该村妇女大起恐慌，乃集妇女数百，各持镰刀棍棒拥赴温泉市，将乡长朱一毅住宅重重包围，迫令乡长交出人来。（香港“工商日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苏州也是这样，在去年（一九三六）的一、二月中，男子不消说，为了还不起租，已与武装收租保安队发生冲突，而素来怕怕缩缩的农妇也冲破数十年来的牢笼，表现出一番惊人的举动来。成群结队的，各持淘箩、布袋，要求乡镇长发给稻种。诸如这类的事实，实在举不胜举，为简便计，作成下面的表：（这是就国内六十九种报纸上有记载的事件，择要统计而成的）

关于抗租拒税的纠纷（一九三六年）

月日	地点	参加人数	对象	原因及实况	结果
1.4	苏州四娄村	300余人	催甲	因前年荒歉，而催租吏逼迫农民缴租，引起农民公愤，鸣锣聚众将催甲住宅拆毁。	报告警所。
1.5	苏州沈垫桥	未详	乡长	稻熟荒歉，而催吏毫无怜惜，聚众包围乡长住宅。	幸早发觉，未扰事端。
2.26	苏州斜塘	400余	催甲	抗租游行，高喊死不还租口号。	保安队吓呆。
4.	苏州郭巷	200余	催甲	因去岁荒歉，农民无以自食，而催甲催租严厉，农民将催甲房屋倒毁。	保安队弹压，农民亦不示弱
4.21	苏州斜塘	数百人	保安队	下乡催租，乡农不满，鸣锣聚众，拒绝反抗。	捕去数人。
4.27	苏州斜塘	2000余人	保安队	赴乡巡视，耀武扬威，乡民鸣锣聚众，与保安队肉搏。	死伤数人。
4.24	苏州斜塘	2000余人	镇公所	因荒歉减收，农民要求减租，聚众二千余人，结队涌往镇公所请愿。	公安局出发弹压。
4.24	苏州河村春庄	300余人	乡长	农民要求减租，迫令乡长领导请愿。	保安队弹压驱散。
4.24	苏州张王坟	农妇200余	乡长	各持灯笼火把，结队游行请愿。	
4.24	苏州胡家巷姚村	100余人	乡长	减租游行。	
4.25	苏州车坊乡	200余人		游行减租。	
4.22	苏州上潭村	100余人	镇公所	聚众游行高呼减租口号，开放土枪，向镇公所示威。	公安局出发弹压。
4.21	苏州郭巷吴盛等村	1000余人	各村	游行各村宣传减租。	公安局闻报急派警士弹压。
4.27	苏州斜塘	300余人	警队	减租游行与军警冲突。	
4.27	苏州车坊乡风雨村	1000余人	各村	宣传减租，游行示威。	保安队往干涉被农民包围。
4.27	苏州莲慕乡	1000余人	镇公所	结队至下塘请愿。	
5.24	苏州甪直松北乡	700余人	保安队	结队口号求减租，与保安队大打出手。	捕去四人。

续　表

月　日	地　　点	参加人数	对　象	原　因　及　实　况	结　　果
5.13	绍兴东合北乡	500余人	乡公所	乡公所勒逼农民缴自治捐，乡民不服起而包围乡公所。	
5.	津县五区	100余人	农垦公司	因农垦公司不给当地农民承种，无法缴租，聚众要求减租与军警冲突。	呈报县府。
6	苏州齐门外	200余人	警	农民不满保安队下乡收租，激动公愤，大起冲突。	农民死伤数人。
6	苏州各乡	400余人	保安队	要求减租与军警冲突，农民不满保安队下乡收租，激动公愤，大起冲突。	
6.	苏州娄门外	数百人	保甲长	因不满保甲长之催租引起风潮，聚众至保甲长家质问，并捣毁一切。	保安队赶至弹压，农民亦不示弱。
6.16	苏州齐门外渭泾塘	数百人	保安队	保安队勒令缴租，农民不服，与保安队冲突。	保安队长急报上司。
7	湘永绥	数百人	屯务军	湘西苗民，不甚租重之苦，乃结队抗租，与屯务军冲突。	当局设法处理。
7.	宜兴大浦镇	300余人	县　府	因不满大浦镇乡长，擅收公益捐，聚众赴县府请愿。	县长允往调查。
12.	江阴沙州	数百人	当　局	农民不满当局之苛捐，实行抗捐。	

（钱志超：«1936年的农民纠纷»，«农村周刊»，163期，天津«益世报»，1937年5月1日）

关于土地方面的纠纷（一九三六年）

月　日	地　　点	参加人数	对　象	原　因　及　实　况	结　　果
4.18	江苏扬州	200余人	建设局长	建设局征用民间土地，农民愤恨，结队至建设局请愿。	允报县府。
4.21	祁门	数百人	县长	祁门菜场因征用菜地，农民不服，引起纠纷，县长下乡，亦被包围。	
4.19	扬州	乡妇百余人		因不满土方工程处无条件征地，乡妇聚众向城游行请愿。	公安局长出为劝解始散。
6.25	青岛	300余人	日技师	因日人横行，圈地筑飞机场，农民群起反对，三百余农民各持锄头、铁耙包围日本技师。	当局派军队赶往弹压。
8.15	南京燕子矶	100余人	市府	泥滩洲农民为争垦事，向市府请愿。	为首者已送警部究办。
10.	铜山	数百	测量员	测量员下乡，测量土地，神气活现，农民不明真相，致起冲突。	保安队弹压。

（钱志超：«1936年的农民纠纷»，«农村周刊»164期，天津«益世报»，1937年5月8日）

现再将“中华日报”（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二日载的关于二十三年秋季各地抢米风潮概计引用于下，以窥抢米风潮广泛的一班。

地　　点	日　　期	参加人数
河南信阳东西关	8月2日	未　详
	8月15日及24日	未　详
安徽歙县西乡舍头	7月24日	未　详
安庆高河埠	8月8日	千余人
合　肥	8　月	未　详
相城太平桥	8月13日	未　详
江苏溧阳新芳桥	8月17日	数千人
金　坛	7　月	未　详
松江枫泾	7月25日	十余人
江浦桥林镇	7月29日	数百人
吴江震泽镇	8月1日	三百余人
浙江嘉兴贯村	7月14日	五、六十人
嘉兴王店镇	7月22日	千余人
又	7月23日	二千余人
嘉兴新塍镇	7月24日	数百人
嘉兴西乡	8月2日	大　批
嘉兴白鹤桥	9月1日	千　人
海宁硖石	7月24日	三百余人
又	8月25日	数百人
桐乡屠甸	7月24日	五、六百人
长兴蠡塘桥	8月6日	百余人
临安墅坞村	8月23日	百余人
嘉山第一区浦沿等乡	8月27日	二百余人
嘉善汉塘	8月29日	百余人
平湖乍浦	9月1日	七百余人

(张汉：《一年来的中国灾荒》，《中国经济》3卷1期，1935年1月)

青年学生的痛苦遭遇

——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

我中华人民之受困于专制政府者久矣，民国以还，国体改制，以民为主，吾民莫不三呼万岁，以为自是可得解放。乃以政客纵横，军阀混战，帝国主义者复从中挑拨，鼎革十余年，岁无宁日，人民所受之痛苦依然。

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相号召，遂于民国十五年提师北伐，南北既定，乃与吾民约法曰：

“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二十年六月一日公布约法第二章第八条）。人民除现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裁判(第九条)。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第十四条）。人民有发表言论、刊行及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十五条）。”

吾民于庆告政府政权奠定之余，相顾自幸，以为数千年专制之局，可告实际结束。国民政府与民众同休戚，必能履行约法，使吾民享受民主政治下人民所应有之最低权利。

讵料大局既安，政府诸公竟自食其言，而所谓约法者，乃不啻一纸空言。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声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杜重远先生系爱国志士，竟以“妨碍邦交”而受刑事审判。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焚书坑儒之现象，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所百思莫解者矣。

兹者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即行开幕，敝会等联名具呈吁请政府，其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诚以国势如斯，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存；桎梏一日早去，吾民即能早尽一分责任也。掬诚奉闻，诸希亮察。

标题为原编者所加

新税则实行后之反响

（一九三四年八月）

《申报月刊》记者

自财政部于本年七月二日公布新税则后，该税则将使国货产品，大受打击。于是沪上之纱布业、丝业、纸业、工商业等团业业分电政府，请收回成命，以维幼稚工商业之濒危命运。兹将重要电文，分志于后：

市商会　上海市商会以新税则中减轻各税，均足妨碍国内实业之发展，特于七月一日电呈行政院财政部，谓：

自七月一日修订进口税则颁布实施以后，沪市工商，奔走相告，咸指为实业复灭之先声。举其失常，约有数端：吾国工业基础，本在内外交迫风雨飘摇之中，论其情形，惟轻工业稍有悠久之历史，而重工业可谓尚未诞生，议论多年之中央机器厂，尚未知何时告成，即使短期内竣工出货，亦讵能尽供全国百叶之求，是机器为改进吾国工业所必需，在最近期内尚有奖励进口之必要，今则自税则二百四十四号至二百六十六号各项机械进口税，较前均有增加，不啻阻塞国内工业之建设，使举国日用所需，长此仰给于外人而后已，其不可一也。国内轻工业，论其范围之普遍，投资之金额，当以纺织厂第一位，此诚国民经济元气所存，宜如何设法维护；自上年五月关税改订税率增高以后，外纱外布，进口有相当之减少，不可谓非保育政策略收成效。所引为缺憾者，以外商在华设厂，遍于南北，其资金之富，技术之优，迥非华厂所能及。兼以现行棉纱统税系两级制，粗纱纳税较高，纱支愈细，纳税愈轻，均属有利于外商，是以华厂虽幸免舶来品之竞争，仍难脱外商之桎梏。一年以来，减工者减工，停机者停机。可谓纺织厂最厄运之一年，当局既不能改正税则制度，以期华厂得相当调剂，反于此次改订税则中，将外纱外布减低税额，以诱致其倾销，是华厂苦受外厂之压迫者，今乃并受舶品之排挤，双管其下，四面楚歌，譬如垂绝之人，而又加刃于颈，何以图存？非特此也，纱之原料为棉，国中所产，尚未能供给全国纺织之用，为朝野所习知，外棉进口，最初每担收税六钱，嗣改至八钱，嗣改至一两二钱，去年五月，增为每担收税两金单位又小数点一，今则改为每百公斤收五个金单位，较之税率最轻之时，相差殆七八倍，一方减税以轻外纱外布之成本，一方增加原料进口税以加重国纱国布之费用，在外人固正中下怀，在华厂讵非身濒绝境，其不可二也。外纸减税，当局非正式表示：谓因吾国无宏大纸厂之故，不知国内之无宏大纸厂，其最大原因为惧洋纸之倾销，自去年五月税率改订以来，壁垒较严，国内原有纸厂已有谋扩充者，如龙章纸厂已向国外订购新机，民丰上海亦纷纷增加设备，乃于此时霹雳一声，纸税突减，外纸有倾销之机，而国家又减税以招徕，国人虽欲投资纸厂。自亦具有戒心，故宏大纸厂之设立，必先当局有维护国产纸厂之决心，今乃执此为减轻外纸进口税之理由，毋乃倒果为因，绝此后投资之途。摧各厂现有之叶，其不可三也。溯查财政部钧部为此事呈院原文，略称为调剂海外贸易，对若干种进口货物，酌减税项是不啻一变相互惠之局，夫所谓互惠者，应有限度，第一对于国内基本工业，应视为一国元气所在，不当用作交换之品，果其外人要求及此，毋宁牺牲若干之海外贸易，所谓物有本末，事有轻重。举例而言：如暹、越、缅甸，俱为华侨最盛地方，海外贸易，似亦应当设法调剂，但此次洋米未闻减税，而对于各该殖民地之本国所产机器，且均加重税率，何独于制成品如棉织，奢侈品如海味，反以调剂一国之海外贸易为辞，偏有例外。第二互惠应有实际，吾国销

至海外之商品，多为原料，且系他国所必需，故事实上有惠而无互，故在惠之继续，决非涉及国民情感问题，今乃有人乘军事占领之余威，强欲我以怨为德，如果枉己徇人，遇事听命，何以为国，此尤不可之大者。根据上列理由，此次新税则中减轻各税，均属摧残实业命脉，增进外人觊觎，万无可以施行之理，钧院部果以民瘼为重，应请立罢前议，将修正税则中减低各税予以废止，仍照上年五月旧税则办理，庶国内实业，犹能勉延一线命脉。

（见7月6日新闻报申报等各报）

华商纱厂联合会　该会自接到修订新程率之消息后，即电呈行政院主管处，请维持原有棉类税率，全文如下：

“据上海日文报消息，现行税则有修改之说，并拟将进口棉布税率减低等情，窃以进口货物，棉类最多，故税率之变更，影响于棉业为优鉅。我国关税历来最低，致每年入超货值达数万万元，年来的海关税率迭经提高，进口货物因以激减，即以棉布而言，二十年进口约值一万七千万元，二十一年约值一万一千万元，二十二年约值五千六百万元，查二十二年进口货物，较二十一年减少百分之十四，而棉货独减少百分之四十八，实以上年五月增高进口关税，予外国棉货以严重之打击，此在税收虽受影响，然国家既减少一万万之漏卮，全国纺织工业及手工布业，亦因以莫能维持，其裨益于国脉民生者，非数字所能计算。以棉业先进之英国，近且有增税以限外布进口之举，若以我国工业之幼稚农村之凋敝及税率之轻微相较，尤应继续提高；以杜倾销而维国脉。设徒贪一时之关税收入，不惜将年来之增税成绩一一推翻，在政府固不免倒行逆施之嫌，在棉业实有崩溃复灭之惧。国计民生，将何所恃，为此恳请钧座垂念提高关税，保护实业，为近世各国共采政策，减低关税，以促国内实业之灭亡，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现行海关税则原有税率，即不增加，亦应维持，实深企祷”云云

（见7月5日新闻报申报等各报）

全国经委会棉业统制会对于进口新税率将棉纱一项，予以减低百分之五，以为于政府保育实业之宗旨，亦似颇多妨碍。

华商纸厂联合会　该会以新颁海关税率，减轻五五六号洋纸税率一项，与前相差甚多，特派代表，晋京请愿，收回成命，仍维持去年五月间颁发之纸类进口税率。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并于七月七日召集全体紧急会议，电请政府修订新税则，公推代表晋京请愿，并函银钱两业取一致行动。其他机器染织业，绸缎印花业，国货工业，棉花号业等工会以及工联会，市总工会，机联会等亦纷纷电呈政院，反对新税则之实行。

至日货进口，自新税则于七月一日实施三数日内数量激增，尤以上海为多。第一艘到沪之日货船，运来棉制品糖啤酒搪磁器等物，共三千二百吨，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运输营业，清淡已久，今皆加倍活动。驻沪日本商务参赞宣称，近四日来之贸易，已成新纪录。盖华商定购日本所产之海味与纸，共二千余吨，七月二日华商曾定购日糖二千包。

但七月十四日，财长孔祥熙氏，对于此次修订新税则，特发表谈话，谓：“此项新税则之修订，事前曾经中外各专家之详细研究，计时达六个月之久。并经财政部修正者达四次之多，财部决定后，提交行政院通过，再由中央政治会议审定后颁布，自信此新税则，能顾到各方之利害。至于新税则中机器加税一项，因我国国内，以前抚能自制机件者，今则已渐能自制，故加税以资保护．棉织品类之印花布匹，因我国无自产，所以酌减，凡此种种之增减，均极有理由云”。（真）

（原载《申报月刊》3卷8号）

一九三五年前后民族工业的厄运

一 一年来工业总趋势

从本年度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制了中国工业的生产统计。统计的材料根据是统税署的征税报告。统计的范围也就只限于烟、纱、粉、水泥及火柴等五种。如生丝、橡胶、煤等都告缺如。现在引用在下面：

年 度	卷 烟	棉 纱	麦 粉	水 泥	火 柴	总 指 数
1932年	107.2	111.3	75.3	44.6	92.3	82.4
1933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34年	87.8	113.4	112.6	102.6	92.6	100.4
1935年	92.8	107.8	129.5	91.8	81.6	100.3

统计的不完全性和不可靠性，我们姑置勿论。统计中包含着在华外资工厂的生产数字（它们的发展，恰恰跟民族工业的危殆，表示出相反的趋向），使我们考虑统计时要严加甄别这一点，也暂且慢说。就是这样，统计的总指数也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本年度中国五种主要工业生产是，一般地都日趋萎缩，日益缩小。其中以卷烟、水泥、火柴萎缩得更为显著，在相对意义上说，棉纱生产量的降低率也不能算少。整个工业显然尚窒息在恐慌的泥淖中。

但是，仅从生产指数上来理解本年度工业发展的趋势，却是完全不够的，完全非现实的。我们非从整个民族的立场上来观察中国工业，把中国工业危机和民族危机相关联起来考察不可。自然，我们这种考察决不忘记工业生产内部矛盾的发展。

本年度工业的发展总趋势，是踏上了丧失独立存在的殖民地境域的年头。

第一、内蒙和华北傀儡政权的形成，不仅减少了一般的工业市场，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使中国丧失了煤藏量百分之五十三，铁藏量百分之五十二，棉花生产量百分之四十二（察绥除外），小麦生产量百分之二十六。这种种工业资源的丧失，使中国的重工业无从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工业的建设，遭逢到无比艰难。在这样现势之下，国民经济建设的口号，也显然成为辩护人的欺骗。假使我们不能求得民族的彻底解放，"农业的中国"已经是钦定的命运。

第二、帝国主义已经到了用直接的武装来占领和拍卖中国民族工业的地步。这是表示民族工业真正的末路。申新七厂被汇丰银行非法拍卖，裕元纱厂因欠日债被迫清理，门头沟天佑煤矿因欠债为中日实业公司强制接管，长城煤矿以十万元为日本收卖；最可耻的，是柳江煤矿为关东军协助泰记公司所强抢而去，中国政府在"长期抵抗"之下竟无一办法。这些事实，决不是零星的个别的例子，而是具体地证明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已经进入到直接被掠夺被兼并的阶段。

第三、整个工业生产在本年度内，愈益显出半殖民地性来。这在大量的矿砂原料的强制输出上，尤其显得明白无遗（详见第三节重工业）。整个中国官僚、买办、银行资本家阶级，

都为扩大日本在华的经济势力而动员起来。一年来民族棉纺业都痛哭流涕地在大嚷棉贵，但本年度原棉外输竟达二一，七三二，三一六元之巨（一九三四年为一五，二〇〇，八七九元）。大家都苦于纱贱，但从八月一日起，日纱又得加入上海纱布交易所来和华纱公开竞争。好象金融家买办等非此不足表示他们已经遗忘九一八样子。从九一八起，象鼻山铁砂就停止运日；但到了本年，湖北省建设厅为了充裕税收，更为别的不便公开承认的原因，以每吨四元的低价，一口气售出十五万吨矿砂给日本，再又预抛一九三六年的十万吨。等到实业部用"有关国防及国家利益"的大帽子来制止，但是因为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已经允许，就毫无结果。现在象鼻山铁矿的烟囱又在冒烟了，但这只是对日本钢铁工业生产原料而已。现在福建省政府又在热心地开发安溪铁矿，矿质之佳，含铁达百分之六十六——六十七，已预定产出之矿砂"须售于日本"。这种公然的盗卖现象，使我们无法否认这是本年度工业生产的大危机现象。

第四、就民族工业本身说：固定资本的更新，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象，在本年度愈加微弱（自然，我们不承认有个别的与此相反的现象）。机器及工具的输入，一九三四年为三〇，一八六，一四八金单位，本年虽增至三五，四一八，八四七金单位，但其中占主要的是以英美资本为背景的实业部各工厂建设，和广东三年计划等，以及外资在华诸厂的扩充（由日本输入的机械，由四，七四五，〇〇八增至七，二八二，七六八金单位）；和固有意义的民族工业是没有关系的。民族工业中最主要的棉纺业，新厂增设和锭子增添等本年竟趋停滞；煤业更其是如此。其次各工业部门的生产量一般都是继续萎缩的，而销路的萎缩尤其更加扩大。假使销路萎缩更和土地大批沦陷相关起来，那末明年度的惨景更不堪设想。至于工业生产品的价格，大致从一月到六月都是向下直跌，六月到九月间都是长时间停滞着，九月以后受到通货膨胀的空气鼓动，已有回升气象，自从十一月四日新货币制度颁布后，更一致上升。这里，我们决不过低估计，中国的通货膨胀，使工业资本家对于无产大众得有更大的榨取的可能；同时，通货膨胀也可以造成一种假态的物价高涨。可是，第一，这种物价高涨是不坚实的；第二，通货膨胀更使中国城市与乡村间的纽带解体，经济割据性加强。人民购买力减低；第三，在华外厂势力的加强，特别是货币权出卖后英国在华经济势力的增强，都使中国工业的发展加上了一个新的桎梏。

整个中国工业发展已经立在危机的尖端上，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摧残、分割、争夺的直接对象，或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迫的作为大战的军需品供给而动员着。中国工业假使不能从民族危机中求得独立自主的解放，扫清其自身的矛盾，那末东北诸省民族工业的命运，正是它前车之鉴。

二　轻　工　业

我们已经明白了总的趋势之后，现在进而作各部门个别的深入的观察。这里先从半殖民地工业生产中心的轻工业说起。

1．棉　纺　业（略）

2．缫　丝　业

在第一辑的本报上，曾经指出中国缫丝工业已经完全解体。我们曾经说："现在残余的

丝厂，完全没有经常的经营，整个地依靠国外丝价的高涨，和有利的汇兑率。这种条件，使得缫丝业几乎离开了工业的领域，而趋向于商业的投机”（本报第一辑一一七页）。本年海外丝市的热闹，影响到中国缫丝工业能稍稍活动，于是政府便眉飞色舞的夸说蚕丝统制的功能，惯会唱应声调儿的学者，便手舞足蹈的欢迎丝业复兴的到来。但不幸今年的事实竟证明我们论断完全正确：缫丝工业完全趋向于“商业的投机”了。

一、海外市场的变动，使中国缫丝业有投机的好转，完全是海外丝市的左右影响。从一月到六月，海外丝价是一致下跌。纽约丝价从一月份开价一·四二元跌到六月份的一·三〇元左右，那时，中国缫丝业完全“冬眠”了。七月起市价上涨，到十月份达到二·〇八元的最高峰。主要的原因，第一是英美各国消费的增加，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四年相较，计美国消费增加七·五三%，英国消费增加一七·四%；第二是存丝的薄弱，计较去年减少七·五三%；第三是世界生丝主要供给国的日本产茧减收之故，共计较一九三四年减少九·一二%，较一九三三年减少二二%。

二、缫丝业现状：海外丝价高涨，当然也反映到上海丝价来。但这种反映，因为中国银贵金贱，外汇不利结果，被缓和了不少。到了十一月新币制实行之后，才迅速反映出来，但十一月以后，海外丝市又趋下降了。

三年来上海生丝价格（注）

丝类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三年
白厂经A级	616.45元	597.00元	784.00元
白厂经B级	575.90元	522.00元	674.00元
山东黄丝	527.08元	549.00元	709.00元
四川黄丝	508.12元	506.00元	672.00元
辑黑丝	457.00元	523.00元	614.00元
灰经	281.25元	302.00元	362.00元

注：根据上海生丝出口公会。

三年来广东生丝价格（注）

1935年	1934年	1933年
417.08元	395.00元	616.00元

注：转录自李述初：民国二十四年丝业之回顾。

由上面两表看来，丝价虽较胜于去年，但还赶不上一九三三年，当然更远在一九三〇年以下。

本年茧产大增，又因为政府强力的统制，所以茧价更滥贱如泥。浙江春茧改良种每市担价仅一七元，追后丝市飞涨秋期涨至二二元，晚秋三二元。

三年来江浙茧量及丝本统计（注）

年份	茧量	丝本			缫折
		春	夏	秋	
一九三三年	180,000担	650元	950元	800元	560斤
一九三四年	185,000担	484元	—	380元	450斤
一九三五年	193,000担	420元	—	545元	420斤

注：转录自李述初：民国二十四年丝业之回顾。

原料虽然这样低贱，但在六月以前，中国简直可说没有缫丝工业，一直等到海外市价好转后，才被动地被推动了。下面是江浙两省丝厂和丝车统计。（注）

年份	上海*		无锡*	
	厂数	车数	厂数	车数
一九三四年	31家	7,470	42家	12,866
一九三五年	33家	7,690	38家	11,396

年份	浙江**		总计	
	厂数	车数	厂数	车数
一九三四年	24家	4,800	97家	25,136
一九三五年	16家	4,111	87家	23,197

注：本表材料根据陆辉：一年来之丝业。*系八月底调查，**系九月底调查。

据上表看来，本年八月底止，开工家数及车数，尚不如一九三四年。但据李述初“民国二十四年丝业之回顾”内称，一九三四年同期之开工厂数为七二家，开工车数一八，五五〇部，故结果本年增加达二五%。两者数字，适相反对。但无论如何，由此也可知道，所谓缫丝业的兴盛，也是很有限的。到了十月，开工丝厂上海增至三八家，无锡四一家，浙江一〇家，计共八九家，丝车二万四千余部，为全年之最高峰。到十一月底，因为海外丝价趋跌，国内原料全被茧商和政府垄断，丝厂复又纷纷停工，仅有五十余家了。

本来，缫丝工厂实际上早已完全解体。这次因茧价低贱，海外丝贵，便群趋投机，仓促应付，根本说不上正式的工业经营，更说不上因自己努力改善，来争取国际市场了。李述初先生有一段话很足说明当前缫丝工业的特征：“二十四年丝价暴涨，乃引入一般投机者，蒯来尝试，用巧诈手段，置商业道德于不顾，有则席卷而去，亏则累及无辜，又复粗制滥造，损害华商海外名誉”。（上引文）。李先生如此指出现象来是对的，但他以为抬出“政府”云云，就可解决此种困难，则未免所望非人了。

三、茧产问题：缫丝厂原料不足的哀号，简直是绝命的呼声。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统制和大茧商的垄断。在江浙统制省份，譬如浙江，茧产不得自由卖出，非归政府收买不可，结果把茧价压低得异常惨酷。虽然秋茧价格稍好，但究竟产量不多。结果，丝市好转和蚕农毫无关系，反转被大刮了一层去。政府收得的茧，除自缫成丝，其价待估外，余便扣茧不发，

抬价居奇，弄得厂商眼看好机会迅逝，而无茧可缫，政府之外，坐享其福的是大茧商，他们有余资以大批囤积鲜茧，敲诈讨价，秋后每担茧价竟讨价在一百余元以上。现在无锡除大茧商薛寿萱的丝厂尚有茧可缫外，其余资本较少，购茧不多的丝厂，只好关门，说要待到明年六月春茧上场后再开工。现在，江浙政府向日本购买外种十余万张，令茧农育养，以便再发一次财。姑不论明年丝市如何，权在他人；即论这样的蚕茧统制办法，对于缫丝工业，究竟有多少益处呢？

四、外输生丝统计：最后来把本年被认为幸运的丝业来结束一下。自然，生丝出口比去年要好了，但比前年，比一九三〇年呢？更不知道明年又如何了！

三年来生丝出口价量表

年份	数量	价值
一九三四年	23,980担	23,522,534元
一九三五年	46,164担	35,594,970元

3. 面粉业

本年度，唯有面粉工业是比较景气的。这是因为两年本国内接续着大灾荒的结果。但和大量的洋米进口比较起来，灾荒对于面粉厂主的赐福，还是不足望其项背的。

本年度面粉的产销量均有增加：

三年来全国面粉产销量统计（注）

年份	产量（包）	销量（包）
一九三三年上半期	25,535,205	36,625,688
一九三四年上半期	27,615,679	33,506,569
一九三五年上半期	37,695,013	39,500,245

注：本表地域包括江、浙、皖、湘、鄂、赣、鲁、豫、冀、晋、察、绥等省。

计产量方面增加百分之三六，销量方面增加百分之一八。市场状况，也称不恶。从开岁到九月止，上海粉价平均在二元三四角左右。九月以后，因外麦涨价，本麦货稀，粉市更趋上涨。十一月份最高价达三·一三元，较去年最高价二·八八元，计增加〇·二五元。本年最低价的二·二四元（六月），也较去年最低价的一·九三（五月），增加〇·三一元。

本年面粉厂停业的共计三家（上海二家，南京一家），新开粉厂五家（山东二、河南二浙江一）。各厂减工停工，也颇不一律，粉业中坚的福新诸厂，在九、十月间因原料恐慌，曾长期停工。可见粉业的景气，是极不坚实的。此后粉业的前途，恐将特别黯淡。第一是华北原麦供给有断绝之虞，因为华北广大的原麦供给，已随土地沦陷，而为日本所控制。第二是市场缩少。江浙两省产粉运销华北者占百分之四五，此后出路，也大成问题。至于外输之继续惨缩（一九三四年的六三四，三四八元——一九三五年的四〇，九〇八元），灾荒景气后之

反射作用，也是都大需顾虑到的。

4. 火 柴 业

据统税署的报告，本年上半期火柴的产销量都是增加的，产量计增加百分之一三，销量计增加百分之九。

三年来全国火柴产销统计（注）

年份	产量	销量
一九三三年上半期	395,742箱	387,369箱
一九三四年上半期	317,475箱	319,557箱
一九三五年上半期	460,703箱	348,007箱

注：本表区域包括江、浙、皖、湘、鄂、赣、鲁、豫、闽、冀、晋、察、绥。

去年火柴的销量超过于产量，本年的情形恰恰相反。这种产销间的不一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在本报第一辑里已经指出，漏私火柴的增加，如何威胁中国的火柴工业。这种情形，在本年度尤其变本加厉起来。因为日本在华北和华南的军事控制力，都已经膨胀得多了。国际贸易局也承认，漏私火柴"为廿四年中火柴业之最威胁者"。但政府显然没有力量和决心，来保障自己的主权，以维护民族工业的一线生路。

虽然产量都有增加，但各火柴厂的减工，却仍是经常的现象。此外，停业者一家，长期停工者一家（均为上海）。新开厂四家，其中山东二家，河北一家，都以制造低级的磷化硫柴为主；另外是浙江绍兴一家，规模极小。

去年六月，安全保险一等火柴每箱上海售价五七·四元，到本年一月，已经跌到五一·〇元，到九月，再跌到四九·五元。十月起，同业联合加价每箱三元，十一月后，因法币施行，同业公议再提高每箱三元。但还不及去年六月份的市价。

火柴业自大中华成立以后，复和正大等厂合组四省联营处之后，一般有统制生产的趋向。自从本年两次共同提高市价见效以后，大家以为这种组织的确能解救火柴于危亡中的。但大家却不能忽视另一面的现象：有组织的火柴工业实行有组织的出卖。本年来屡传华日火柴业实行全般合作等（九月，上海日日新闻），虽然是查无实据，但究竟不为空谷生风的，我们不得不预为注意到的。

5. 卷烟及橡胶业

在增加卷烟统税的要求之下，财政部曾雷厉风行地严禁手制卷烟的生产。但是这对于卷烟工业，毕竟无甚帮助。在卷烟工业之内，英国资本家压倒的优势已被形成，而二级税制对华资烟厂的毒害，显然不是禁制手烟所能补救。我们在本年年初，竟能看到广东为卷烟增

税，而引起当地纸烟业的大罢业呢！

手制卷烟的盛行，正昭示我们人民购买力的降低；而这种廉价的代用品的制造，全部打击到以中下等烟为生产中心的华资烟厂。本年度烟业生产总指数竟大跌，为近数年来所未有。除一月份生产指数为一二一·七外，以后就络续下跌，五月份指数竟降到五五·七，我们还须注意，这是根据统税所作成的指数，其中包括着英资烟厂的产品的。

年来华资烟厂直接向产烟区域收购烟叶之举，差不多已完全停止。本年除南洋、华成尚派人少量收购外，鲁豫皖的烟产差不多全归英美烟公司独家收买，英商颐中公司在胶济路一带，本年无敌为敌。因为能够独家垄断市场，任意杀价，所以本年烟叶价格就低廉非常，每担有仅值十七八元的。这种情形在河南许昌的烟叶市上，特别显得露骨。而华资烟厂的原料需求，就不得不仰人鼻息。

至于橡胶业本年较去年更见衰落。上海橡胶业本年停业者两家，停工者三家。最近加入公会的橡胶厂尚有三十家，其中一家系本年新设。

各橡胶厂以制造套鞋、球鞋及热水袋为主，仅少数厂家能制造自由车胎人力车胎，至于汽车胎则仅大中华一家能够制造。这正在说明该业尚未脱离原始的阶段。但以一般工业的不能发达而言，该业的生产方向，很少有高级化的可能。例如汽车胎生产如不能和汽车工业相衔接，就很少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本年大中华为制造汽车胎，据说就亏本达三十余万元。

据国际贸易局向上海某大橡胶厂调查，该厂去年产量较前年减少百分之二〇，本年较去年又减少百分之二五。本年上半年的销量，尚不及去年同期二分之一。市价上半年较去年同期，计胶鞋跌价百分之一〇到一五；套鞋跌价百分之二〇。本年下半期已稍见恢复。在金融极度紧缩，市场日益狭隘下，该业前途，恐将每况愈下。新币制颁行后，原料价格更涨，出品的成本更重，销路就更少把握了。

三　重　工　业

1.　军事原料工业

半殖民地国家谈不上重工业，有的只是重工业的原料生产，或军事原料工业。中国恰恰全部代表这个事实。中国没有自己的钢铁厂机器厂，铁矿只是提供原料，煤矿也大部分在外资控制之下。近年以来，经济割据之风愈滋，粤晋都各自筹款建设工厂，其实际成绩和社会意义，已详第二章四节中，不复具论。至于实业部在长江流域所建设的七个工厂，除酒精厂于一九三四年已完成外，其余六厂，一年来喧喧嚷嚷，并无实际成果。自华北诸省被“提携”和“开发”以后，重工业资源丧失殆尽，复欲侈谈工业救国或国民经济建设，实已等于痴人说梦。

另一方面，中国手工业或机器所生产的各种军用品矿产原料，却为帝国主义备战的需要，而被积极地动员起来。有的由于借用外资的束缚，有的通过买办阶级的市场控制，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各种军用矿产原料，便日益增多地输送出国，下表差不多把这个倾向全部指示出来了：

二年来军用矿产原料输出比较（单位元）

种　　类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铁矿砂	3,161,636	4,809,849
铅矿砂	…………	3,582
锰矿砂	15,049	10,415
钨矿砂	6,315,349	6,698,145
锌矿砂	15,642	151,097
生锑	332,075	796,073
纯锑	3,607,914	6,786,441
生铁及铁砖	19	168

在国民经济的立场，矿产原料的输出，决不是良好现象。在国防意义上说，这些原料都有关国防，消极的作用也够增长侵略国家压迫弱小民族的力量，胡乱输出简直就等于汉奸行动。可是因为利之所在，难免就趋之若鹜。广西省府热心于开发铅锰，广东江西省府共同在争取钨砂，湖南省府为统制锑产，引起政客、官僚、大商人间的斗法，也确是可观。至于鄂省建设厅狂售象鼻山铁砂给日本，福建省府开采安溪铁矿，逕委日本全权办理，更是有目共见了。

本年上海每吨钨砂售价，超过纽约市价，锌砂每吨售价，超过伦敦市价。可是这对于该种原始矿业的经营前途，并无多大帮忙，只要看到湖南锑业联合处本年二月的垄断锑价后，引起水口山以下全省锑砂采开工业的崩溃，已足昭示一切。自从东北失陷后，中国几乎没有生铁生产，但本年度竟有生铁及铁砖之输出，虽为数甚少，但增加的速度却是飞跃的；以没有铁工业竟有生铁输出，也可以知道中国如何曲尽提供原料品的义务了。

2. 煤　矿　业

本年度外煤输入有继续减少的趋势，从一九三四年的五，六五七，七二二减少到四，四七〇，八七九金单位；华煤输出却反有增进，由一九三四年的六，二八七，四一五元增加到六，五九七，五〇二元。从上述的数字，过于迅速的引出乐观的结论，不免又要陷入皮相论的老调。输入的减少，主要由于东北军事工业发展后，煤产需要增多，同时为准备战争，而统制煤的输出。至于输出增多，主要是因日煤某种的缺陷，必须渗用开平煤，而大量吸收的结果。这证明煤产外输的增多，完全是被动的强制。

日煤、台湾煤、关东煤的输入，大体上都减少的。唯有安南煤的输入反趋增加。这因为中国政府提倡中法亲善，订结中法越约，将越煤每吨征税自关金二元九角减到关金九角的结果。中国的白煤业所受的打击自然很重，特别是山西阳泉煤所受的桎梏最为严重。至于萍乡煤运湘销售，湘省府须强征产销税三成；七月一日起河北省府核定矿税，均见增加，凡此都不过是表示封建政治关系的继续摧残煤业。运费的高昂，依旧无法解救。至于金融周转的

困难，虽实业部矿业金融调剂会在年底已核定借款五百万元，但前途手续尚繁，一时未见有大效果。

据本年实业部所发表的煤矿业调查报告说，中国境内煤矿投资总额二二四，一五二，〇二五元，其中，纯粹日资占百分之一一·七三，日英德俄与中国合资者占百分之四〇·〇五，纯粹华资者仅占百分之四八·二二。各企业中，仅百分之五使用最新式生产方法，百分之三〇部分的采取近代生产方法，而有百分之六五系用土著的旧式方法。这个统计活描出中国煤矿业的半殖民地性来。就生产总量而言，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间都是向上增加着，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停滞在同一生产水准上，毫无进步。一九三一年东北失陷后，一九三二年起每年产量便骤减一千万吨。去年全国产总量是二千万吨。

本年度中国新式开采的煤产量约共计一千二百万吨，其中无烟煤约一百五十万吨，烟煤约一千〇六十万吨，烟煤产量中，仅英资开滦，日资鲁大两家，已达六，一四三，〇〇〇吨，占总产量二分之一以上。

就烟煤说，产量超过销量，达七五八，〇〇〇吨。以一月和十月比较，上海煤价都是下跌的。中兴统煤每吨由一三·二元跌至一二·五元，开滦块煤由一一元跌至一〇元，博山统煤由一一·五元跌至一一元。井陉统煤由一一·五元跌至一〇·五元，长兴统煤由九·六元跌至八·八元。十一月起，因新货币制度实施结果，煤价都有投机的上升。但通货膨胀所诱致的物价高涨，是不坚实的，煤价也不能免此。

恐慌使整个煤矿业解体，特别是华资煤矿的内部机构，几已全部被腐蚀了。这个情形恰和东北的煤矿业不同。恐慌也已经波及开滦。开滦自本年十月起也限制产量，每天不得过一二，八〇〇吨，本年年底，且将五矿之一的马家沟矿（有工人五千名）停止开采，以减少产销差度。纯粹华资煤矿中向以中兴为翘楚，中兴从十月起也将产量从每日四，八〇〇吨限制到四，〇〇〇吨，则其他更不如的煤矿的实况，又可概见了。

华资煤矿除山东中兴，年来稍有改进（以该矿采煤效率言，一九三三年较一九三二年增加百分之五；一九三四年又较一九三三年增加百分之十八）外，大多数华矿的内部机构，差不多都积极衰颓下去。六河沟煤矿为华资煤矿中较大的一个，一九三二年产煤六九二，九〇二吨，采煤费三，四五四，九四四·九二元，到了一九三三年，产煤减至五一三，六八一吨，而采煤费反增至三，五八八，七一五·〇一元，所以每吨总成本由四·七四三元，增至六·九八八元。而所收买的土煤价格，则每吨反仅及三·九九元（一九三三年）。该矿每年利息支出，一九三二年数达六五四，九〇八·五四元，一九三三年产煤减少，利息反增支至七九七，七四八·一六元。就浙江长兴煤矿说，全部资产值一，七〇〇，〇〇〇元，而负债总额亦达一，五二五，六〇〇·〇九元（一九三四年底止）。每吨产煤成本费竟达七·九七元，运费在外，上海煤价仅值七·八〇元。在这种债务经营下，愈陷愈深，生产力难以改进。又如萍乡本为长江流域唯一大矿，本年度到处借款，以求维持，津浦线上名矿之一的烈山，停工经年，积欠员工薪资十余万，全矿水淹汪洋，几不能令人复能认悉此为华人所经营之煤工业！

中国的矿业劳动者的待遇，本来好比奴隶。恐慌期中，煤工所受的榨取，更难尽述。大矿如六河沟，中福，萍乡，烈山等均各欠薪三五月至十余月不等。欠薪的多发工资券或煤票；数月之后，矿方借口整理，复以低价收回，辗转循环，永无宁止，如烈山煤矿："会计主任实则以不筹现款，尽用支票（一个月期）之计，向人强兑煤票，每吨高涨六元以上，照

低抵四元原价收回，致使员工吃苦甚大。……接事迄今，已经十有一月之久，并未发过薪饷一次。平时仅恃煤票高价抵给贱价低售，员工饮泣。啼饥号馑，菜色骨立”（一九三五，七，一四日矿业周报）。至于象山东鲁大，因为矿方要省钱，将坑炭实柱一律扫清，酿成压死矿工四百余人的空前大惨剧，更是半奴隶的中国煤工的必然命运了。

3. 水 泥 业

严格说来，水泥工业不能算是重工业；因为它跟军事工业有相当关系，所以就放在这里来叙述。

本年度水泥工业异常不况，这种情况恰跟一九三四年不同，产量方面，一九三四年计共三，四一〇，〇〇〇桶，本年则为三，七七〇，〇〇〇桶，共增加三六〇，〇〇〇桶。启新、中国、上海华商等三家，产量并无增减，仅广东士敏土厂由三六〇，〇〇〇桶，增至七二〇，〇〇〇桶。这完全是经济割剧的效果。因为该省对省营水泥采保护许可制度，并征外省水泥大学捐等每桶约一元三角余。所以，能有良好的发展。近来因为地方军阀各自修筑公路碉堡，需用水泥颇多，有利可图，所以纷纷各自设立水泥厂，如山西省营水泥厂，四川建厅主办的巫峡水泥厂等，以图各霸水泥市场。中国水泥公司和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本年两家产量尚能一致。至于唐山的启新水泥公司，位在战区政变迭起，异国法令，万事掣肘，所以本年营业极为萧条，年底存货达五六十万桶，约占生产总量百分之三〇。由此也可见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半殖民地民族工业衰亡间，具有如何密切关系了。

本年水泥外输，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八三七元减到二四三元；在减低速率上，极足惊人。进口水泥，虽也少有减少，但已达八五四，八五八金单位之巨。这是因为粤汉北段的建筑，当局大批购进安南水泥，且给免税优待的缘故。

水泥市价的大跌，使该业群叹无红利可得。据国定税则委员会的统计，启新马牌水泥每桶一月价六・八元，十二月跌至六・二元。中国水泥每袋上半年为六元，下半年跌至三・五元，十二月回涨至五元。上海华商水泥每袋上半年五・六一七元，下半年减到三・九元，十二月回升至五元左右。建筑业的衰退，新工厂添设的停止，以及外泥倾销和市场割剧，使水泥工业难有乐观的前途可言。

（《一九三五年中国经济年报》第二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国内贸易的衰落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

蔡　正　廷

一　普遍全国的商店倒闭潮

（上略）

据本年 2 月14日日文报上海每日新闻所载：

近年来中国贸易概况（单位100万元）

年　　　份	对　外　贸　易	国　内　贸　易
1925	2,716	981
1931	3,677	1,189
1932	2,427	975
1933	1,957	936

上表所列关于国内贸易方面的统计，我们因为不知其从何根据计算出来，固然不能武断其正确的程度。但是，一般说来，上列数字可以表现出国内贸易衰落的趋势。

国内贸易衰落最具体的事实是各地商店营业的亏蚀和因为无法维持而纷纷倒闭。

先说华北：天津本是华北商业的中枢，但自本年春节以后，津市中等以上的商店倒闭百十余家，小商店的倒闭更无确数可计。北平本年春节以后，不能开业的商店为数很多。只就加入商会的商店而言，本年二月份停业的达八十多家，其它不在商会的商店停业的更比这数要多几倍。可是新开张的却是百不获一。到了三月，市面虽有渐呈活跃之象，开张营业的商店有二百五十八家，歇业的却有一百五十三家之多（天津益青报，4月 3 日）。据太原商会本年 1 月份的调查，当地去年歇业的商号共计五百零八家，新开设的有五百二十五家。歇业的商号原有资本约计三十七万九千三百元，亏损都在八成以上。新开设的，在家数上虽较歇业的为多，但其资本仅有二十三万三千二百五十九元，即较歇业商号原有的资本约计减少三分之一（大美晚报 1 月25日）。太原商业衰落的情形，到了本年春节以后，更形显著，那时报告歇业的仍有一百八十余家（福建民报 3 月 17 日）。榆次全县现在的城乡商号不及原有之半。

再说华中：上海是全国商业的总汇，这里虽有外人以及内地富豪纷纷到来，但因一般购买力低减，其商业的凋敝还是逃不出一般的趋势。上海在废历正月以后，倒闭的商店多至三百家（每日新闻 2 月 22 日）。在法租界大马路（自八仙桥到黄浦滩）的小小区域中，本年歇业的商号已达十七家之多。南京路是上海商业的宝座。在表面上，倒闭的商家确是并不算多，

但是特区地方法院关于控告南京路商家的讼案，却已达半数以上。按照法律，这些商家都有被封闭的资格。但如严厉执行，则整个南京路上更将表现其市面萧条之象了，当局也许就为了这点，只能马马虎虎敷衍过去（民报3月13日，时事新报1月27日）。汉口据市政府调查，各业赢亏情况，全市较大商店八千余家，其中填报亏折的竟在半数以上。歇业的竟有900家之多。九江据最近的统计，全市商店有881家，亏蚀的有268家。歇业的在过去五年中562家，其中在后三年歇业的有480家左右，近年来商业衰落的愈趋锐化可见一斑（南昌真实报5月1日）。

至于华南，则其商业衰落的情势也并不弱于华北和华中：

"广州商务繁盛……以故市内营业铺位，求过于供。……惟近年工商业凋敝之余，情势大变，商店铺位竟变而为供过于求……观以前商人千方百计欲谋一营业铺位而不可得，现在则剩余铺位，比比皆是，且有数月尚无人租受者，在新筑成的铺位，经过几年之后，仍无人过问"。（七十二行商报3月15日）

潮汕商业衰败状况仍是有加无减，……据商人言，本年清明节街前收账，不但旧账收不着，即新账亦收不到十分之二三。……因此一部分杂行遂不得不于本节实行收盘，自动停业，资本在数万元以上者达十余家。其它小资本者不计，其继续营业者亦均缩小营业范围。潮安自动停业或迫倒闭之商号，大小不下四五十家。"（香港工商日报4月8日）

福州的商业，因受去年政变的影响，其凋敝的程度更加严重。当废历旧年底总结账之时，各商号对钱庄所欠的折款无法归还。钱庄方面又恐催促过紧，酿成倒账风潮，只得允各商家改立期票。但是商家的困难，却初未因此而稍减。于是过期很久而它们所欠钱庄的货款仍未偿还。钱庄因此停出票账，不再放款。商家无钱添货，乃相率收盘倒闭。单就福州城内南大街最热闹的区域，从废历1月到3月倒闭的商店就有三十家以上，每家负债平均在万元左右。（中华日报4月25日）

二　特别衰落的商业部门

在国内商业一般衰落的情势中，我们还须注意到主要的几个特点，这就是金融（主要是指钱庄而言）绸缎业和米业凋敝的情形，特别来得严重。

金融业：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量入超，特别是内地农村对城市阶梯式的入超，这就使农村金融，以至乡镇，小城市的金融陷于异常枯竭的境地。各地商店因受农村购买力极度衰落的影响，它的营业总额不得不日趋减退。不错，在另一面，它可以用商业高利贷的方式，去剥削农民。但是这种方式在农民经济极度困顿的今日，有时也会碰壁。即它所放的账总有一部分是收不到的。因此，商店向钱庄方面所用的流动金，就每每不能如期偿还，甚至过期很久也不能偿还。这样在钱庄方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它对商店方面既恐"吃倒账"而不能催促过激，但它自身必然地就会感到周转不灵。结果，它不是拒绝放款尽量缩小营业范围，就是被迫而倒闭。前者不但在内地已为普遍的现象，即在上海也是如此，"上年银钱业向各商店开做往来户头，无论新旧，今年概须严格整饬。故此次元宵前后，往来开折，骤减三分之二，例如去年每庄六百家户头的，今年不过开出二百余户"（申报3月13日）。至于各地倒闭的钱庄在倒闭的商店中且已占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如就钱业本身而言，并与过去比较，则其急激衰落的情势更加显著。例如：四川渝市的钱庄在极盛时代共有六十七家，现在只剩十

余家，江苏镇江由三十余家，淘汰结果，只剩六家。广州去年倒闭的大小银号计有五十余家。

米业：近年来帝国主义在华倾销的货品，不但限于工业品或半制品，即农产品的输入也已增加很多。这种外国农产品，特别是米麦在华的倾销，再加上国内市场的割据性，运输事业的不发达，农民感于货币的饥饿，不得不以贱价出售其谷物，因此种种，遂形成了农产品，尤其是米的相对过剩而表现为谷贱伤农的农业慌姿态。在这种情势之下，受害最深重的，不用说，是农产物的直接生产者。除此而外，那就要算米商了。米商在米价跌落达到某程度时，它还可以运用垄断价格的方法（贱价向农民收买而高价出售）以补偿它的损失。但在米价的跌落超过了这种限度的时候，则任它怎样运用垄断的手段，都会无济于事，而不得不遭受损失了。安徽的芜湖原是全国闻名的米市，该市商业大部分是米业。1932年中该市的全部营业为9,164万，其中米业一项为5,282万，即占全部营业的半数以上。但是，芜市米业，近因洋米倾销两粤，遂使其输出贸易有日益衰落之势。1930年输出170万石，1931年242万石，1932年150万石，1933年为200万石左右。在本年为首五个月中，芜市所出口的米量，估计起来还不满六十万石。此种营业数字的激减，它所表现的衰落情状实在至堪惊人（上海民报，6月13日）。芜湖经营米量的商店约达二百家以上，其中尤以采运业的范围为最大，它们握着芜市米量出口的操纵权。它们可以按照籍贯大概分广、潮、烟、宁四帮。芜湖米市的盛衰，便以此种采运业的消长盈亏以为断。在过去，这种采运业的商号中，富有资力的共有二十余家，如今所存的只有十余家，其它都已先后宣告停业。因此，所谓广、潮、烟、宁四帮也就不得不瓦解了。（大公报3月13日）

绸业：在一般的商业凋敝中绸业的衰落也已具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同时，我们在绸业的衰落中可以看到三种意义。第一是一般购买力的减低，例如从前穿绸着缎的人们，现在只能用较次的衣料来替代。第二是外货人造丝织品的倾销，促使中国丝绸原有的市场日益萎缩。第三是一般技术的落后，更无法与外货竞争。至于绸业衰落的情形则如次：四川在数年前绸缎商号有八九十家，如今只有二三十家。扬州商业不景气，尤以绸缎业凋敝的情形最为严重，全城原有绸号七、八家，今年只剩二、三家。上海南京路的老九章绸缎庄，创办到如今已有六十余年的历史；规模的宏大可为上海首屈一指的绸庄；近因营业衰落不堪，已呈外强中干之象。结果，终于本年3月13日宣告停业。总计所亏确数当在四十万元以上。同样，上海小东门的何恒昌绸缎局，创办也已数十年，前昨年亏折甚巨，为数不下四五十万元，因此无法维持，已于2月14日宣告清理。又如产绸有名的浙江湖洲，去年的绸市销数在这几年中要算是最少的一年，即与绸市已趋衰落的1932年比较，也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五。

（下略）

（转自《中国经济论文集》1集）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热、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国领土，以“逆来顺受”的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令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

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靦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弟兄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傜、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民众作后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对于中国的进攻，正在急转直下。察哈尔事变之后，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实际上已经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贪欲，新的进攻的行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又开始了，请看它最近所提出的八个条件：（一）华北五省政治经济的完全独立。（二）国民党军队全部退出陕西与西北各省。（三）将临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完全变为非武装区域。（四）中国退出国联与放弃英美的一切援助。（五）承认“满洲国”与中日满三国的亲密合作，以创立远东政治经济集团。（六）停止全中国的一切反日运动。（七）集中中日两国的全力来进攻中国苏维埃革命，特别在西北的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八）日本代表有参加国民党大会之权利，来观察中国对中日亲善是否诚意。

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稍有天良的中国人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前面，决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与顺民。然而以蒋介石为罪魁祸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泰然不以为耻的答应了日本这些要求，轻轻把整个华北、整个中国出卖了！这是空前的出卖，这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蒋介石国民党又一次的证明了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卖国贼首领蒋介石的罪恶是屈指难数的。他血腥的镇压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屠杀全中国的革命战士；他不断的对于苏维埃与红军进行凶残的“围剿”；他取消一切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他组织法西斯蒂的流氓，摧残一切革命组织与社会团体，毒打与杀戮自己的敌人；他利用一切阴谋毒计，铲除异己分子，改编其他派系的武装队伍，以建立自己的清一色的独裁。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当清道夫，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支柱。

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与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一切“反蒋不能抗日”、“先反蒋后抗日”

的思想，是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其作用也不外给日本帝国主义做辩护。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后，即于同年十月开始了北上的远征。不论蒋介石如何的动员一切力量，在沿途追击、截击与堵击我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然而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还是战胜了一切空前的困难，消灭了敌人许多拦阻的队伍，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取得了会合，击溃与消灭了不抵抗将军卖国贼张学良的部队，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的到达西北，更使日本帝国主义张皇失措，加速了它并吞华北与全中国的过程，同时也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为日本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蒋介石、张学良，自然决不会放松我们，他们必然要动员他们的主力继续进攻我们，以帮助与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的武装干涉，这将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成为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中国工农红军现在是站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它坚决的相信，它是能够胜利的负担起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的。

全中国的民众们！全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只有全国民众的总动员与坚决的武装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抗日反蒋的最后胜利；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一切斗争的方式，不论是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军警罢岗、群众示威游行、游击战争、以至任何部队的反蒋战争，我们都应该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

全中国的民众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声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拥护中国苏维埃与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反蒋的英勇斗争，拥护中国共产党救国图存唯一正确的主张！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吞全中国！

打倒卖国贼汉奸蒋介石国民党！

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华北五省，进一步要并吞整个华北及全中国。反革命罪魁蒋介石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最近所提出的条件（条件见党中央宣言），将整个华北及全中国出卖。全中国人民现在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并进行下述具体工作：

（一）必须依据党中央的宣言，利用传单、标语、口号、会议等一切方式，在党员、红色战士、游击队员及广大的工农群众中进行普遍的、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指出陕甘苏区是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掠的前卫地位，号召他们集中一切力量，彻底消灭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的进攻部队，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抗日反蒋战争的胜利，方能最后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

（二）必须使我们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同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密切的联系起来。猛烈壮大我们主力红军，加强红军政治、军事的训练，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发展与巩固我们的党，是扩大巩固陕甘苏区，创立西北民族革命战争的巩固阵地与全国苏维埃革命领导中心的必要条件。

（三）必须在邻近白区加紧抗日反蒋运动的领导，将党中央所发表的民族武装自卫的六大纲领（即：一、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二、全国人民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汉奸的财产作为对日作战的经费，五、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六、建立武装抗日的领导机关），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形使之具体化与实际化。抗日反蒋的运动应该同白区广大群众的日常斗争密切的联合起来。

（四）必须加紧瓦解白军与争取白军士兵与中下级军官到抗日反蒋的战线上来，这首先应该是东北军；输送各种宣传品，派遣可靠的同志，利用俘虏官兵，到白军里面去，散播我们的主张与影响，组织他们的哗变与暴动。同时，应该利用军阀的一切冲突矛盾，推动反蒋军阀，爆发反蒋战争，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同一切抗日反蒋的武装队伍，在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作战协定。

（五）加紧少数民族的工作，特别是蒙古人民中的工作，发动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与汉人官僚军阀的奴役，同他们一切的反日反汉奸军阀的武装队伍订立作战协定。

（六）必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强对于武装保卫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与被压迫民族的最好朋友）的宣传鼓动与实际的组织工作。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节录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曼努意斯基的报告——

(一)关门主义的错误

第七次大会批准了共产国际总路线的正确性。对于世界形势及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前途有正确估计的，既不是资产阶级及其学者、经济学家、国家要人，也不是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家和政治家，而是我们共产党人，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具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优越的方法以分析社会现象。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曾断言将有“永久繁盛”时期的到来。社会民主党人则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代。

而共产党人却不同意这些言论，而声言资本主义世界自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大战起，即已进入了其总危机的时期。

事实证明了共产党人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及社会民主党的“学者”都断定永远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稳定。

但是共产党人反对这种观点，认定稳定是相对的、暂时的及过渡的现象。

事实又证明了共产党人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及社会民主党的科学又预言过，危机是永远消灭了，资本主义世界进到无危机的经济时期了。

而共产党人却回答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二九爆发了的世界经济危机，又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正确。

资本主义世界趋向于缓和阶级矛盾，趋向于渐渐改良工人阶级及劳苦群众的物质状况，并趋向于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及社会改良而建立“社会主义”——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各种改良主义者都这样想。

共产党人却以为不然：资本主义世界不是趋向于阶级矛盾的缓和，而是趋向于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化。如果工人阶级不从改良主义的影响之下解脱出来，不转上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那末，工人阶级及全体劳苦群众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将愈益恶化。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取消了工人阶级经过多年斗争所获得的社会胜利品，它不是准备了社会主义，而是准备了法西斯主义。

最近几年来的事变，证明了共产党人的正确。

考茨基说，在“超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征服弱国，是采用经济的办法，因此，就无须乎战争。帝国主义仿佛变成了柔顺而和爱的了。

而共产党人却回答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这一阶段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是不断的联系着，而这种战争比过去一切战争，更要巨大些。共产党人又说，如果无

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那末，资产阶级便会把无产阶级驱入战争的深渊。

事实证明了，正确的是共产党人，并不是考茨基之流。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在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道路问题上，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在成为共产国际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基础及决定共产国际的列宁、斯大林的总路线的世界工人运动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共产党人都是正确的。

然而这是否说，共产党人在各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条件下运用这种正确路线，没有犯过错误吗？不是的，并不是这样说。我们有过很多曲解正确路线事情，这种曲解，大半是宗派主义的性质，破坏了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政策。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十分坚决的打击了这些曲解。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象第七次大会这么严格的进行了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大会是不多的。如果以为第六次与第七次大会之间，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比共产国际发展的其他时期为多，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各国共产党已经长高大了，更能够用批评的态度以估计其斗争的道路，而且他们已经更显明更懂得他们在长大时所犯的“幼稚病”，那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揭发了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所不注意的和疏忽的各种弱点。例如我们有这样的缺陷：把一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机械的搬到别国共产党中去；在这里我们实在有许多疏忽，未能及时的把良莠分清；把我们运动中的良好经验加以国际化，这十分正确的任务便是“良”。然而为解决这个必要的与正确的任务，我们往往机械的处理我们运动中的问题，把共产国际最强支部的当前任务，也同样的向弱小的共产党提出；我们又时常没有顾到各国运动的特点，及其政治水平和革命成熟的程度，因而就产生了“莠”的错误。

就以共产党人在有群众的法西斯组织中的工作问题而论。不但责备共产国际，说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给以及时指示。然而这种指示是一般的，还需要具体的制订。如果我们一般的重述必须在有群众的法西斯组织中做工作，那末，事情并不会因此而推进。基本问题在于如何进行这种工作。这种任务的完成，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里，共产党人就有两种危险：或是一开始就让敌人把自己摧残，或是陷入迁就主义的道路，而有蜕化为取消主义的危险。关于这种工作，我们到如今还没有更多的经验，如果把这种经验公开来总结一番，这是很困难的事，因为这不只是教育我们自己的干部，而且也是向敌人泄漏了我们工作的方法，使敌人容易和共产党人作斗争。

布尔塞维克在帝俄时代的秘密工作经验，是极宝贵的经验，然而这种经验不能完全解决在极端恐怖条件下工作的意大利及德国共产党人之任务。不要忘记，法西斯主义，除了恐怖办法以外，还有其他一面——社会欺骗的一面，而愚蠢无能的俄皇制度是没有这种办法的；不要忘记，法西斯主义见到俄皇制度失败的教训，学会了斩断共产党人“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它创设了俄皇稽查处从未创设成的密布的侦探网，以防卫它自己的群众组织；不要忘记，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国家机关，比俄皇专制时的国家机关要强得多。在这里，单靠我们党的秘密工作经验，是不能解决一切的。

然而思想上的惰性以及爱用死板公式与模型的倾向，妨碍了深入事情的本身实质。他们不去了解共产党人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中工作环境的特点，宁肯借口于共产党人没有执行决议以解释一切。人们这样解释在法西斯国家中我们的群众工作之没有成功，已经好多年了，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解释的本身已成为死板的公式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第七次大会上对

于许多图式及死板公式给了有力的打击，而对于这个死板的公式则责备的很厉害。

法西斯国家中的共产党人，首先是意大利及德国的同志，要费尽心血造成有在群众的法西斯团体中进行布尔塞维克工作的真正模范。为顺利进行这种工作，必须把共产党在法西斯国家中的“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实行更严格的分工，其下层组织对于上层必须有更大的独立性，同时党的秘密领导机关对于在有群众的法西斯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的同志，加以更有效的督促，必须经过组织形式，保证作公开群众工作的下层工作人员的自动性和创造性之发展，并养成深入到有群众的法西斯组织中进行革命工人运动的“合法”干部——总而言之，在活的经验中求得季米特洛夫同志所说的“特洛依木马”的策略。在这种工作中，将在政治上养成群众实际工作人员的一队武士，即干革命大事业的人物，而推翻法西斯主义的伟大光荣，将来必定属于他们的。

其次，大会又批评了我们在工会工作中的弱点。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党以前也曾写了不少好的决议，而这些决议却未曾实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共产党人的恶意，障碍了这种决议的实现么？自然不是的。

事与愿违，乃是因为决议起草人，很少顾到实现这种决议的实际可能性；而决议的本身往往好象是一般指示汇集，并且只顾计到实现这种决议最高限度的顺利条件。而具体的实际情形，却完全不同，在共产党人的工会工作中，这种实际情形，一天天造成新的困难：开除他们，赶出工会，赶出工厂，以至失业痛苦等等。

起草这些决议案时的条件，后来改变了，但是人们还在重复老调子，以致言行更加分离开来。而这种现象困扰了工作人员，养成他们不甚尊敬决议案的习惯，减弱了他们斗争的意志，甚至连一些容易实现的和极平常的任务，都不能使之实现。

例如关于共产党在工会中必须有党团工作的问题，我们不知讲过多少次了！但是事情没有推动，这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成立了不大的工会，因之把共产党人锁在里边，与广大群众隔绝了，以致使他们作茧自缚，使他们陷于这样的工作条件之中，在那里本来就是完全一致的，因之党团也就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而党团会议也就是毫无目的的白费时光而已。

如果把共产党人放到别种环境中去，在那里，他们每天所接触的群众，还不是自己的群众，在那里，他们要在群众面前回答敌人的言论，他们自己要学会如何发表言论，拥护自己的主张，在那里，他们深刻的感觉到必须预先和一切与自己同思想的人商量妥当，才好抵抗改良主义官僚的攻击——那末你们以后就认不出，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责备的不会在工会中工作的人们。共产党人现在所争取的职工会的统一，除了其他的好处以外，还有一种好处，就是他能造成条件，以发展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和训练真正的群众领袖。

然而，这是不是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批评了关门主义的错误，因而没有充分估计到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呢？同志们，不，不是这样的。

社会民主党的大批工人群众现在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他们使我们的运动得到了一种新力量。在若干法西斯国家中，例如奥国，他们已经给共产党许多不坏的新干部，这些干部，就其战斗的品质而言，并不亚于共产党的基本干部，然而同时不要忘记，走向共产主义的群众，绝不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变成共产党员；要完全克服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就需要相当的时间；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残余还会影响新党员的意识，因此，就加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

这种危险之所以加深，还因为我们正走近资本主义世界的震动，走近事变的剧烈转变与巨大的阶级战斗，在这些战斗中间，那些在政治上欠坚定的头脑不健全的人是受不住的。同

志们，斯大林所说的风暴中的渔夫的警句，你们还记得吧？有种渔夫扯紧船帆，迎风破浪，勇往直前；而另一种渔夫却躲藏船仓之中，抱头大哭，随风飘荡……而我们愿意共产党做斯大林式的渔夫，不要做害怕大雷大风浪的渔夫。因此，现在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要有特别敏锐的警惕性。在共产国际的各支部中是否已经有了斯大林式的渔夫呢？同志们，是的，已经有了。

(二)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积极政策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策略立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现在无产阶级……必须实行革命的积极政策。……革命的积极政策，便是削弱资产阶级阵地的政策，便是破坏其帝国主义的各种设施的政策，破坏其进攻苏联的准备，破坏其向工人阶级的进攻，破坏把资产阶级专政变为法西斯化的企图；同时这一政策，又是巩固无产阶级阵地的政策。资产阶级对内对外的侵略，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上面现在十分紧张地表现出来。在反对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当中，无产阶级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以反对最凶恶的死敌——法西斯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务须把主要的火力去反对目前战争的挑拨者与罪魁的那些国家。在这些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各国内部各派资产阶级相互间的矛盾，但是应当以革命的精神来利用这些矛盾，切不可反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切不可减弱无产阶级自己的阵地。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当在那些决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及社会革命的各种社会派别、阶级及民族中，扩大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战线。过去有些劳动阶层，因为受了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影响，曾经动摇到反动方面去，并保证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取得了胜利，现在由于无产阶级这种重要的政策，及其对于事变进程之积极的参加，毫无疑义的，将会使这些劳动阶层重新回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所有这一切，便要求共产党适当的改变方针。……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派的政策之破产，共产党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同时对于工人运动命运的责任，现在都放在共产党员的身上。共产党不能只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团体，应当成为在各国国内以及全世界的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因素；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政策，消灭由于社会民主党政策所引起的无产阶级失败的不良影响；共产党应使无产阶级走出孤立的地位，在群众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的斗争中，共产党应当使群众得到显而易见的实际胜利，应当准备条件，使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获得最后胜利。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无希望与无前途的立场，共产党应当针锋相对地提出斗争与胜利的实际前途，以提高工人阶级对于本身力量的自信心，并使工人阶级在觉悟上深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当权人物，只是暂时的人物，而世界真正的主人翁，则为无产阶级。第七次大会决议的实质，正在于此。……

共产党人在民族战争中的三个责任

共产国际从……具体的立场出发以对付各国的作用，关于保护弱小民族及弱国（这些国家的独立性大受法西斯侵略之威胁）的问题，共产国际就通过了非常重要的决议。若是借口说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强盗的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将它们混为一谈，那是不正确的。

因此，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曾宣布受帝国主义大国侵略的弱小民族及弱国，有“保护民族独立的权利”。大会以全力指明，这类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而在这些场合，共产党人的责任，便在于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与站在这种斗争的前线，而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帝国主义敌人的失败。可是在这里，共产党人，第一，应当把民族独立的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如象中国苏维埃那样；应当武装全国人民，以便用雅各宾手段，用革命的办法来进行战争。

第二，为吸收全体劳动人民对帝国主义敌人进行最广泛的与最有成效的革命自卫起见，共产党人应该以全力进行斗争，扩大民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巩固工人、农民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以及争取少数民族真正与完全的平等。如果不完成这种条件，则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共产党人应该号召全体人民敏锐的警惕本国资产阶级，并组织劳动群众反对出卖祖国及人民的卖国贼。共产党人所以应该揭穿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因为它进行战争，而是因为它进行战争不甚坚决又不甚努力，而且采用不适当的方法，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且害怕民众而与帝国主义敌人实行妥协。……

统一战线不能没有斗争

……统一战线的实质，并不在于两党（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缔结某种形式的协定，在该协定有效期内，为划分工人运动的“势力范围”起见，两党暂行停止彼此相互间的斗争：这是你的势力范围，那是我的势力范围，谁也不妨碍谁，以便彼此相安过着邻友的生活，谁也不生气，谁也不得罪谁。只有小资产阶级看重其安逸太平生活的人，才能这样提出问题，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人，决不如此。协定及公约，都是辅助的事情，而统一战线的基本事情，是要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人共同发动以反对资本——共同的敌人，而这种发动的前提，是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转到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没有阶级斗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一大批群众尚组织在社会民主党及改良派工会之内，又因为这些群众尚为他们党的纪律和工会的纪律所约束，所以必须与这些团体缔结协定，以便应用统一战线去发动群众斗争，以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与战争。

不能认为统一战线的基本事情就在于揭破社会民主党中的反动分子。揭破那些破坏工人阶级的斗争之分子，固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打击拥护资本利益的工贼，那就不能顺利进行反资本的斗争。然而揭破这类分子，并不是目的的本身，而是附属于统一战线的主要目的的，统一战线的主要目的，在于动员工人群众进行反资本的斗争。

统一战线政策胜利底基本条件

……要预防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必须有下列四种条件：(甲)工人阶级本身要有战斗的积极性，并在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上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乙)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正确的领导劳动群众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丙)工人阶级对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有正确的政策；(丁)对于法西斯主义要有警惕性，及时地打击法西斯主义，并保持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主动性。这是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奥国及西班牙有没有执行这些基本条件呢？没有，这些基本条件并没有执行。第一个条件是关于无产阶级战斗力及实现统一战线。这个条件执行的怎样呢？西班牙及奥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否用以发展无产阶级的战

斗力呢？

奥国及西班牙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但没有巩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而且千方百计地削弱这种战斗力。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社会党人参加了联合政府，颁布了禁止罢工的法令，限制了工会的权利，实施了所谓维持社会治安的法令（现在西班牙就是按这种法令来裁判参加十月战斗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而且千方百计地削弱了工人对于保皇派及法西斯分子的戒备心。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战后一整个时期内实行了更恶劣的政策，即实行有系统地向资产阶级及法西斯主义退却的政策。

奥国社会民主党自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是参加政府的。当时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武器与兵工厂，在军队中、在警察中及在市政府中亦有巩固的阵地，在它指挥之下还有自卫团的组织，然而奥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十三年之内，却已一步步放弃了这一切阵地。它扑灭了一九二七年七月维也纳无产阶级的怒潮。它又懦弱地签订了著名的充登堡条约，因而给与了法西斯工会在企业中与自由工会有同等的权利。社会民主党下层工人要求停止这种永远不断的退却，而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则反宣布"林茨纲领"之指示，以劝告他们。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个纲领是命令等待资产阶级先下手，换句话说，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强固了，无产阶级薄弱了，才来动作……一九三四年二月，事情就是这样的。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斗争其第一个基本条件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二个条件——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正确的领导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当时西班牙工人阶级有没有这样的政党呢？没有。西班牙共产党，不错，是有正确的政策的，可是它那时还不充分强大，还不足以领导全国一切反法西斯主义力量的斗争。而社会党领导机关的路线又是根本不正确的。它之所以不正确，乃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从革命第一天起就没有去巩固无产阶级的阵地，反而削弱无产阶级的阵地。社会党没有用全力打击保皇派和法西斯的阴谋家，反而打击了工人运动的左派；没有没收大封建主及教堂的私有土地，以便消灭反革命的经济基础，反而在实际上保护了这些反动势力免受土地革命的侵犯；没有解散人民所愤恨的所谓"民军"，反而巩固了它，使之成为法西斯式的"挺进军"；没有在军队中肃清反动的军官，反而巩固了他们在军队中的阵地。这样的政策不是革命政党的政策，而是准备反革命胜利的政党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及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实行步步投降的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亦是如此。奥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西班牙社会党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是否知道他们引导工人到何处去，武装战斗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夺取政权吗？不错，工人要夺取政权，可是社会党的首领们却没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只是想吓吓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更容易同他们谈判。因此，无论奥国社会民主党，或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对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能有正确的政策，即是说不能执行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斗争所必须的第三个条件。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动摇不定的阶级，多半要看那一方面在坚决性上及力量上给以好影响，它就动摇到那一方面去。它也和农民一样，要是有些人自己知道往何处走，为什么走，走去想得些什么，以及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由此将得什么胜利，那末，城市小资产阶级就跟着这些人跑。可是一个政党害怕工人阶级的胜利，害怕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好象害怕自己的影子一样，这样的党，永不能引导劳动者获得胜利。正因为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害怕西班牙工农革命的胜利，所以它在政府中，不独没有坚决主张必须将地主的采邑分给农民，反而摧残了趋向夺取这种土地的农民运动。因此，在西班牙军队中当兵的农民子弟，未拥护在十月作积极斗争的西班牙工人，因此赫里·洛布主士反共和国的法西斯煽动，在天主教的农民群众中得到了响应。

现在来讲第四个条件：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警惕性，及时打击法西斯主义，以及反法西斯斗争的主动性问题。由上所述，可见无论在西班牙或在奥国，对于法西斯主义都没有警惕性；反而号召工人站在“宪法的合法立场上”，有系统的减弱了这种警惕性，也没有及时打击法西斯主义；反而在最不利于无产阶级而最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条件之下发动了武装斗争。而阶级战斗的主动性则被社会民主党交给了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就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

请看另外一个国家吧，那里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并不是只支持了几天，而是已经继续了数年之久，那里从未有过社会民主党，从未有过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群众组织，那里工人阶级没有象西班牙特别是奥国那样有多年组织上的训练，那里，工人阶级本身是不大的阶层，七年以来胜利地击退了军阀反动势力的进攻，击溃了敌人的军队，用他们的军火来武装了自己，创造了新的苏维埃区域，并且更加获得新的胜利，因为领导他们斗争的是共产党人——布尔塞维克。现在我们所讲的是现代殖民地革命史上惊人的一页，是中国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

蒋介石六次“围剿”红军，无论在军事上及政治上都遭受了失败。虽然中国红军，在一九三四年秋，在敌人占有优越势力的四面包围之下，不得不放弃了江西的中央苏区，可是现在红军在四川、贵州、甘肃、陕西、湖南及湖北六省占有广大的区域。正规红军虽已退出江西苏区，但游击队仍在那里活动。现在红军的战线已延长了一千公里之远，再加上红军具有极好的机动性，更使红军不易受敌人之攻击。

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从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为避免蒋介石飞机的轰炸起见，多半在夜间或山中行军，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必需的军需及车辆，渡过了许多深阔的河流，爬过了人迹不到的高山，这种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

中国红军的胜利，也证明红军与中国极广大劳动群众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因为这些群众尽力援助红军与蒋介石作战，同时也证明中国共产党策略的正确，因为他把军队的斗争与广大人民运动互相联系起来了，这种运动的形式之一，就是游击队在敌人后方的活动；此外又证明红军指挥部善于利用军阀营垒中的矛盾；又证明红军的战略，决不让敌人夺取作战的主动性，而是及时的以反攻的突击，击退敌方的进攻并在政治上挫丧敌军的士气。

然而中国苏维埃运动，直到现在还在主要的工业中心以外的区域发展，因而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上，苏维埃运动负有较重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竭力使苏维埃运动成为统一中国的政治中心，与领导全国人员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并在反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愿与决心捍御祖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各派军队成立真正的合作。为建立这种广大的反帝战线起见，中国共产党向各政党各派军队提议在下述条件之下缔结共同的作战协定以反对侵略的帝国主义者：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实现政治上的自由，武装人民，组织全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奴役者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反帝战线提出这样的政纲，并不是玩弄手腕。若是把保护本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事情来玩弄手腕，那简直是犯罪。可以同敌人玩弄手腕，但绝不可以对人民玩弄手腕，因为共产党人正是奋不顾身地保护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生命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亦只有共产党人才有权利代表人民说话，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朋友，因

为只有他们用自己的命运及生命来做人民事业的代价。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以中国共产党员来说，即是最受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一种人民的子弟来说，那就更正确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事业及其民族解放的纲领，证明它深刻地了解中国苏维埃对于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本国人民担负着伟大的政治责任，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担负着责任。只有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给以布尔塞维克的联系，只有这样勇敢地运用反帝国主义的人民战线，只有象中国共产党这样参加作战的领导，才能把中国革命的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才能求得中国的完整与统一，才能在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蒂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的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受尽了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些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

（一）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党与在反对农村中主要敌人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是由以下论点出发的：

1. “在革命失败以后，农村中的富农分子，时常站在反动势力方面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2. “当革命失败的时候，党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中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农，因此，若不对于一切剥削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没有坚决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贫农中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雇农及贫农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削与压迫的斗争”。

3. “党应与富农力争对贫农群众的领导，决不要使富农有可能利用群众扩大自己利益”。必须要坚决的为争取中农而斗争，使中农离开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影响。

四中全会后，党在各个苏区内所实行消灭地主、反对富农、联合中农、依靠雇农的路线也就根据于国际的这一指示的。党在执行这一正确的指示中，曾经得到了伟大的成绩，确立了党在广大农村中对于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

（二）但是目前的政治形势，同过去比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1. 现在是革命的时期，特别是民族革命战争紧迫的时期，不但工人与农民参加斗争，而且广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卷入革命的潮流，甚至有部分商人、资本家、中下级军官以及某些军阀，也开始动摇或表示同情于民族革命的斗争。

2. 在广大的地区内，已经建立了苏维埃的革命根据地，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正在迅速的散布到全中国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已经成了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争与阶级斗争中，已经有了极丰富的经验。革命的力量是大大的加强了。

3. 国民党统治使中国人民做亡国奴，使中国变为殖民地，使中国人民丧失一切民主自由的权利，使国民经济总崩溃，使生产力大量的毁灭，使水旱灾荒普遍全中国，使全国人民生活恶化，使他们破产、失业、饥饿与大批的死亡。这使全中国人民在实际经验中认识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没有出路，而转向苏维埃的道路。

（三）在这种形势之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因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在尽量扩大革命运动的范围，吸收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而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是在把富农推到反革命的怀抱中去，

是在加强反革命同我们斗争的力量。因此，这种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

长期的苏维埃革命运动的经验，更告诉我们在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常常造成消灭富农的倾向，以致影响到中农群众，使他们不安，他们对于发展生产力减少兴趣。这不但会推动富农积极起来同豪绅地主联合反对苏维埃政权，而且给他们造成了附和他们的中农群众。这种策略，也不能使白色区域的群众了解到：苏维埃政权不但在政治上比国民党政府要进步千万倍，而且也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下面，生产力才能够大大的提高，人民才可以安居乐业。而且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资本主义必然要相当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讲，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也已经不适当了。

（四）因此，在白区抗日反蒋、反苛捐杂税与军阀的斗争中，富农一般的是参加的。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但党无论何时、何地在这一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自己的领导权。党在农村中必须单独组织雇农工会，领导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斗争。不论在农民委员会或农民协会中，党必须单独组织雇农小组。必须到处组织共产党支部，加强他在一切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在斗争中，党必须在广大农民群众前面，有系统的揭破富农的动摇、不坚决、妥协投降与出卖的倾向，使基本农民群众在实际政治经验中认识，只有共产党真正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样来团聚他们在共产党的周围。党在领导白区农民斗争中的基本方针，是在使农民群众的斗争，转变为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

（五）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它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如某一乡村大多数农民要求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应当照普通农民一样，平均分得土地；但土地之平分与否，主要的决定于中农群众的赞成或反对。除统一的累进税外，苏维埃地方政府不能加富农以特别的捐款或征发。这样的改变，可以使富农对苏维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

富农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并无选举权，但可以参加反帝拥苏与互济会等群众的社会团体。至于依照过去政策，已经处理过的富农，则不必翻案，但如某乡、某村有多余的土地时，可给以相当的补偿。富农在违反苏维埃法令时，或进行反革命时，则依照苏维埃法律来解决。

对于那些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欢迎的，他们应该受到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告诉他们，只有为了苏维埃政权的最后胜利而奋斗，才是他们的出路；在国民党统治下，是没有出路的。

（六）苏区党在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中，应该特别注意加强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正确保护乡村工人的利益，并加强对于他们的共产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最后把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解放出来。

不是在富农前面表示恐怖，而是坚定的加强苏维埃政权在乡村中的支柱与党的领导作用，大批的吸收最好、最坚决的雇农工人与贫农到苏维埃机关中工作，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应在党内、党外加紧反对富农思想，在思想上使富农陷于孤立，这样，才能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政治局通过）

一 战略方针

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时状况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一）在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的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做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做抗日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的口号及行动。

（二）正确的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争（晋察绥方面）。

（三）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

（四）为坚决而有力的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很大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的指导之。

（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1． 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及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华中华南游击队

壮大起来时，称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

2．在一切省份发起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的提高到发展形势。

3．地方党对于游击战争，在白区是唯一的指导者，在苏区是主要的指导者。

4．大量吸收卷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及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

5．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

6．游击队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的结合起来。

7．提高游击战术。

8．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

9．游击队是苏区创造者。

10．使游击战争增加计划性。

(七)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注意如下的指导原则：

1．没有士兵的援助（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2．士兵的援助是可能的（亡国奴境遇，饥寒交迫，不得休息）。

3．把运动放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公开运动同秘密工作相结合。

(八)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九)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十)(略)

二　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一)战略的防御时：

1．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

2．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二)战略进攻时：

1．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

2．反对冒险主义：

第一，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的胜利是可能丧失的）。

第二，把阵地转移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到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

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

谓“机会主义动摇”(一九三二年党报),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第三，发展形势中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

第四，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上山主义”及“东北路线”是错了的（一九三二)。

(三)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1．反对只“打”不“走”的拚命主义；又打又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工农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五次“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了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2．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况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3．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的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的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5．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

6．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7．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连结到明天，把小的连结到大的，把局部连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下略)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瓦窑堡会议——

一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革命与战争的前夜。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的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四省，曾经引起中国反日的怒潮，这次它就采取比较隐秘的方式，即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下命令委任中国某些卖国军阀政客，作为它在华北的代理人，以达到直接武装占领华北。这种方式虽是比较"九一八"的方式更为奸猾与凶恶，但仅是过渡到直接武装占领与建立华北国及其傀儡政府的步骤，第二个满洲国傀儡政府是其必然的归宿。作为中国汉奸卖国贼集团的主要成份的许多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买办及银行资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亲日派，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组成分子及其赞助者，没有这一大群汉奸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是不能如此顺畅的。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血战到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亡人之国灭人之种的冒险事业的前进路上必然得到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于吞下了东北四省这些较小的炸弹之后，又着手吞下中国本部这个绝大的炸弹了。

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它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英国却想在求得日本的某些让步与妥协，使它的主要力量能够拿了去对付他的主要敌人：苏联、美国与意大利。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本部的行动，促进了中国反革命统治首先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统治之削弱与崩溃。一贯的卖国政策，不但使蒋介石丧失了某些社会的与群众的基础，而且缩小了他的地盘。同苏维埃红军长期的斗争，尤其是五次"围剿"与对于中央红军的追击，使他的兵力消耗了、疲劳了、分散了。以法西斯蒂统一中国的梦想，是宣告了最后的破产。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不利于蒋介石的分赃会议，蒋介石只有更加依靠出卖中

国以维持垂死的统治。但是他的出卖，将更促使他的统治加速度的走向死灭。这种情形，也就更加加深了蒋系军阀与其他军阀间的矛盾与冲突，增加了以新的形势与新的性质而出现的反蒋战争的爆发之可能性。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正当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局面的时期。自从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长江下游的一些苏区受到部分损失之后，现在是各地红军的新胜利，新根据地的创造，老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开始转入反攻，与新的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时期。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中央红军以十二个月工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纪录。并且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驰骋的十一个省区二万万以上民众，指出了解除痛苦救己救国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的革命种子。中央红军与二十六、七军会合之后，对于向着陕甘苏区进行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的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维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他同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新局面相会合，成为中国革命新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吞并，挽救中国出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这种民族革命高潮，是在中国革命经过历史上无数次的锻炼之下（主要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大革命）产生的，是在目前中国已经有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革命形势存在之下产生的，是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即将来临的形势之下产生的，是在苏联已经有着一切力量足以战胜侵略国家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它就将以特别广大，特别坚决，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与互相帮助的性质而出现。

无疑的，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千千万万人民的失业失地，千千万万的灾民难民，更使得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群众救死求生的日常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是在全中国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开始表现出来了。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

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争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冒险战争，无疑的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而中国与阿比西尼亚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无疑的要引导到世界的大革命。在目前革命与战争的前夜时期，已可明显看到世界反革命力量的削弱，与世界革命力量的增涨。在将来就是大战争与大革命，葬送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这一形势，使得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有力的帮手。同时中国革命现在就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则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阵势帮助着世界的革命。

这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也是一样。在有力量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日本工农及被压

迫民族（朝鲜、台湾），正在准备着伟大力量，为打倒帝国主义日本，建立苏维埃日本而奋斗。这就把中国革命同日本革命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会合起来。日本革命民众是中国革命民众的有力的帮手。

苏联也是一样。今日的苏联是有战胜敢于向他开火的帝国主义的力量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可完成，红军的威力），在向日本帝国主义使用一切和平方法无效（屡次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等），而日本反积极向苏联挑战的情况之下，苏联是准备着打击这个野蛮帝国主义者的。这就把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会合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

中国革命是处在有利的环境中，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尤其目前凶横直进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准备了决心和力量来对付中国革命的。在中国反革命集团方面，由于其统治力量之更加减弱，而不得不更加为虎作伥，投靠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向着革命的民众作绝望的进攻与决斗。把这一形势同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形势结合起来看，就知道中国革命保存了一种持久性。它向中国革命民众及其首领中国共产党指明：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罢，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持久艰苦工作罢。没有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军，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一切策略，一切努力，向着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准备了伟大的力量，就是准备了决战的捷报。

二　党的策略路线

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

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

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

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党在发动团集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三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由于不同意苏维埃制度与土地革命而同意于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的存在，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而产生的地方割据状态，由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现在还只在中国一部分领土上胜利，此外还由于汉奸卖国贼等民族反革命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严重性，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反日反卖国贼的方式，是多样的，参加斗争的分子的觉悟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放松一切机会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各种方式与各种程度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引导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阶段。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

为了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迅速组织起来，为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更广大的群众基础与武装力量，共产党的策略不是等待那些自然发生的抗日人民团体与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存在了，才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而是指导自己的党员在各方面努力去推动一切爱国的分子团体，阶层，阶级，党派，生产的与企业的，文化的与教育的，学生的与教员的，城市的与农村的，新式的与旧式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武装的等等力量，发起各种各样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团体（抗日会，抗日联合会等），组织各种各样反日反卖国贼的军队（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新的十九路军等），政权（苏区的抗日政府，人民革命政府），把这些团体、军队、政权，集

合起来，加上苏维埃与红军的力量，这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组成之后，在它的行动过程中，每日都要去发动新的团体，新的地方政府，与新的军队。一面不断淘汰动摇叛变分子，一面不断涌进新的力量，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成为不是腐朽的，而是有朝气的，不是软弱的，而是有伟大战斗力量的政府与联军。对于有些地方因为党的力量的薄弱所以没有经过党的推动与领导，或是因为离开苏区与红军较远所以没有苏维埃与红军参加，而自动产生的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那里的党同样应积极的援助拥护与参加。这就是共产党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工作路线。

因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他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这纲领如下：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求得这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纲的实现。

四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最广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在今天有着它的特殊的意义，就是苏维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胜利了，这是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基本上不相同的。九年来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胜利，使得新的反帝高潮得到了基本的力量，使得全中国人民有了希望，有了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手里争取自由解放与独立的活榜样，使得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固基础与根据地，保证了在新的大革命中能够坚持下去与走向彻底胜利，使得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有了中心支柱。

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

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彻底战胜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卖国贼。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愿意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一切革命的

小资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愿意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切为帝国主义及中国反革命所打击的很多小资本工商业，苏维埃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所及去保证他们。苏维埃老早就废除了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宣布了有利于一切小资产者的统一累进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白军官长(不分官级)，士兵，凡愿反日反卖国贼者，都有受苏维埃优待的权利。一切被国民党卖国政府所排斥裁遣的失业军人，苏维埃红军愿意给以工作。即使同红军作战者，一经解除武装，不问官兵，一律优待。其负伤者，一律医治。一切白军官兵，愿意在红军服务忠心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者，苏维埃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红军向全国愿意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事业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与武装队伍提议，共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不问何种武装部队，苏维埃及红军愿与他们订立抗日讨卖国贼的协定，如过去苏维埃红军与十九路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一样。但过去红军没有及时的用实力直接帮助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也没有积极要求）击破蒋介石对福建的进攻，这是不对的。今后对一切抗日讨卖国贼之友军，必须尽可能的给予以实力的援助，直至直接配合作战。要达到反对共同敌人的目的，苏维埃红军不但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同盟的友军之胜利与发展。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使得全国人明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国外华侨宣告：称赞他们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蒋介石辈虽然久已叛变革命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全民族爱国人民却继承了太平天国以来的英勇事业，决心挽救中国于危亡，而致之于富强隆盛之域。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胜利之日，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于奴隶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业。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为了顺利的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了保证民族统一战线中

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使之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贼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等。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只有这个先锋队的扩大巩固与善于使用，才能保证反日战争的胜利。为扩大百万红军而斗争的口号，在今天须使之紧密联系到挽救危亡迫不及待的反日战争的时机。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须扩大数百万红军才能济事，首先是扩大一百万。不但每个红色指挥员、战斗员、地方干部、苏维埃人员，而且是全国革命的人民，对于这一任务的积极努力，是十分重要的。红军技术条件的提高，技术与战术教育的进步，政治工作之深入与普遍，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集中，物质供给的保证，尤其是战略与战役指挥之合乎正确的原则（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都是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条件。

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而着重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域，附近区域，卖国贼蒋介石的区域，红军抗日根据地（苏区）及其附近区域的发展。一切游击队应以民族战争的面目而出现，密切地联系于农民群众的土地斗争。要使游击战争在反日反卖国贼的战争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党应使游击队都成为抗日根据地（苏区）的创造者，应使一切游击队所在区域建立脱离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统治的人民革命政权（苏区抗日政府，革命委员会以至苏维埃），应使游击队迅速扩大而成为抗日革命军，应使卷入反日浪潮的青年学生与革命士兵大量加进游击战争中去。应把党所领导的与非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在共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不扩大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即抗日红军的根据地，是不能成功的。只有把卖国贼统治着的土地大块的变为苏维埃领土，红军才有依靠，抗日战争才有后方。苏维埃领土中许多工作要力求做到完善的程度，实行正确的政策，把它铁一般的巩固起来，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羡慕爱护与仿效的地方。

一切卖国贼军队进攻这种抗日战争根据地与人民政权模范区的企图，应该予以无情的打击。粉碎与破坏这种反革命进攻，不但是抗日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的责任，而且是全国抗日人民的责任。党应号召全中国全苏区一切抗日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根据地而奋斗，号召这些人民反对卖国贼捣乱抗日战争的后方，反对卖国贼拦阻抗日红军的去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是党指导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没有千千万万在日本与卖国贼统治之下的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与革命民众大多数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党和苏维埃红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扩大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应使一切群众斗争从初级提到高级，从地方提到全国，从经常程度提到反日反卖国贼的政权与武装的程度。只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这两种斗争相会合，才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不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心的城市与企业中建立巩固的堡垒，利用一切公开的与半公开的可能，建立广大的群众组织。从估计具体环境，争取胜利结果（即使是很少胜利）的观点出发，去发展组织领导广大工人

群众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注意保护与教育企业中的干部，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争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是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原则。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不争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斗争的战线，是不能成功的。共产党与苏维埃一定要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解除农村封建压迫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几千万几万万的农民群众武装走上抗日讨卖国贼的阵地上去，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有源源不绝的补充，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反革命对于中国的主要掠夺对象——农民，变为反掠夺的中华民族革命军。在日本占领区域，及其附近区域首先是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然后从斗争的过程中依据于群众自己的经验，把斗争深入下去，进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党的基本原则，就是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没有士兵的援助，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数百万的军队，也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去进行士兵的工作。党应号召一切苏区人民，白区人民，红军战士，游击队战士，为着解决卖国贼军队而努力。几千万几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向着几十万几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兵士官长苦口劝说，亲友招致，书函责备，与口号鼓动，是没有不能感动他们的。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耕田的分土地，愿意抗日的当红军当义勇军。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拿自己的榜样和真诚的口号，给蒙古人、回人等被压迫民族看，你们也组织自己的国家啊！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卖国贼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打倒这个敌人啊！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并不是不择目标而随便放矢的，谁愿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又有利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抗日讨卖国贼的斗争者，苏维埃政府均愿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

一切政策，一切努力，为着反日反卖国贼的胜利。一切与此目标相违背者，均在排弃之列。这就是共产党与苏维埃的策略路线。

五　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这里，主要的关键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

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能够的，必须使它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

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因为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因此，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错误，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虽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压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斗争，牺牲农民夺取土地，工人兵士贫民改良待遇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利益，对同盟者惧怕使用言论批评的武器，惧怕率领群众逼迫同盟者走上革命的更高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一九二七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目前的反对右倾正是为得要顺利的克服"左"倾，彻底的击破关门主义，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的大胆的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使党不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使群众从争取日常的切身利益出发，提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位置。

六　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

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地位。事实证明，这样成份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除联邦共产党外，中国共产党站在光荣的先进的地位。

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份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塞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不从积极的革命斗争需要出发，而从恐惧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的击破。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已经涌出和正在涌出无数的积极分子与群众领袖，党的组织应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同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与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付干部与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之间活泼有生气的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不愿学习锻炼，不受指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着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该因为他们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他们以重要的工作。

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万岁！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民众，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呢？现在是我们中华亡国灭种的日子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北京及华北占去，他还要占全中国，要把四万万人都当亡国奴。亡国灭种的大祸压在我们头上了，危急情形到了极点了。

（二）四万万同胞都不肯当亡国奴，偏有一班汉奸卖国贼丧尽良心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来灭自己的中国，没有这班汉奸卖国贼，我们中国的地方是不会亡到日本手里的，不打倒这班汉奸卖国贼是不能保护中国地方的。汉奸卖国贼总头子是蒋介石，还有阎锡山、宋哲元一班大头子，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三）阎锡山同蒋介石、宋哲元打伙，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山西、绥远□了二十四年地皮，□得两省人民怨天恨地，他养了许多兵不去打日本，单来打同胞。他指挥孙楚、李生达等拼命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害得陕北人民妻离子散，最近得到惊人消息：阎锡山接了日本皇帝的命令，秘密把陕西卖去，又在太原开会，要趁黄河结冰大举进攻陕西省。因此黄河两岸人民纷纷告急，纷纷请求本会，出兵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救山西救陕西。

（四）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这个万恶的阎锡山，打倒阎锡山保卫抗日根据地，打倒阎锡山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倒阎锡山开通抗日前进路，打倒阎锡山救山西，打倒阎锡山救陕西，打倒阎锡山救华北，打倒阎锡山救东三省，打倒阎锡山剪除蒋介石的爪牙，打倒阎锡山响应全国抗日运动，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五）本会命令陕甘苏区的英勇的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抗日赤卫军、抗日少先队及广大的抗日民众，你们要坚决的保卫陕甘苏区，要扩大陕甘苏区，这是抗日战争的根据地，这是人民政权的模范区，谁要是派兵进来扰乱这个地方，你们就要全体动员，坚决奋斗去粉碎他。前方后方要彼此照应，后方要输送人员物品到前方去，前方要输送胜利品到后方来，使卖国贼阎锡山快些打倒，使后方更加稳固。

（六）本会命令黄河西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及民众，要趁着抗日红军主力打过山西去的时候，奋勇过河东去，踏平敌人堡垒，收缴敌人武装，夺取敌人船只，替主力红军运伤兵、运粮食、运枪械，号召山西人民打阎锡山，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着红军打大胜仗。

（七）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你们要在本会指挥之下，要在各级首长指挥之下，奋勇向前作战，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敌人顽强，我们一定要打胜他。你们要同一切革命人民联合起来，不问什么人，只要是愿意打日本、打汉奸

卖国贼的都要同他讲亲爱，我们只打日本同汉奸卖国贼，不侵犯革命人民一丝一粟。到处就要扩大自己的部队，招收一切革命民众到抗日红军中来，欢迎一切敌方官兵到抗日红军中来。现在时局很紧急，我们的工作要努力。现在时局很有利，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的大战争大革命快要爆发，苏联准备了力量打侵略者，中国各地红军、游击队大发展，工农斗争四方蜂起，学生示威普遍全国，白军士兵都想革命，军阀内部发生冲突，帝国主义之间要打大仗，一切都帮助着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英勇的打到山西去！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打倒阎锡山卖国贼！

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

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万岁！

打倒一切汉奸卖国贼！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万岁！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张副司令、于主席、王军长、何军长、董军长、万军长，并转东北军各师团长及全体将士：

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州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不喜欢东北军的。自东北军退出东三省以后，蒋介石总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整理的地方与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鄂豫皖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贼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蒋介石不但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且处处在压迫东北军。他不给东北军一块好地方，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东北军官兵的薪饷，那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东北军官兵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赡家养子更是说不上。

蒋介石的毒计还不止此。他把他自己法西斯蒂的党羽派到东北军内，监视东北军官兵的行动，到处挑拨离间、威迫利诱，破坏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以瓦解东北军。人员的补充，武装弹药的补充，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里是得不到的。

总之，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使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险不危险呢？东北军现在是在徬徨歧路上面，东北军现在是在困难的中间，东北军内部现在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军心涣散，上下不团结。东北军长此下去，好不危险！

试想，东北军的出路在那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

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那一个爱国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摩拳擦掌，挺身而出，愿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呢？那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

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那时，那一个中国人不愿意拥护东北军，爱戴东北军，在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东北军？那一个有热血的爱国男儿不愿意投效东北军共同杀贼，为中华民族伸义愤，争光荣？那一个东北军的将士不将成为全中国的民族英雄，闻名全中国、全世界？试问大丈夫立功救国，不当如是耶？

东北军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振华夏。假使当日以东北军的全力与中国人民的拥护而抗战到底，那东三省是早已收复了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如此猖獗的。但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重整旗鼓，发扬当时抗日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是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响亮的回答，也是东北军抗日的鲜明的口号。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他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顺孙，甘心作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的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的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的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查，加以判断。

书不尽意，敬布腹心，望公等熟思之。顺致民族革命敬礼！

毛泽东　彭德怀　叶剑英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刘志丹　刘亚楼
萧　华　高　岗　周恩来　林　彪　杨尚昆　朱　瑞　徐海东　郭述申
陈　光　彭雪枫　杨　森　阎红彦　等同启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自本政府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召号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来，全国人民纷纷响应，群起拥护，可见四万万同胞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谁也不愿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

但救国大计，事不宜迟，因此本政府今特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

为使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真能代表全国爱国同胞的意志，本政府主张在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之前，必须保障下列条件：

(一)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的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

(二)实行外交公开。

(三)取消国民党一切禁止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命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出版物取缔检查条令，禁止抗日命令等），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五)凡愿意抗日反卖国贼的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有公开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权利。

(六)确实保障一切参加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言论行动的自由与生命的安全。

同时本政府更认为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之后，必须立刻讨论并决定下列紧急问题：

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失地。

二、公开宣布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的完全无效。

三、立刻颁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

四、号召与帮助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对日作战，拿所有兵工厂军械库的武器来武装抗日的反卖国贼的人民。

五、正式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实现苏维埃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十大政纲。

最后本政府欢迎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苏维埃领土内开会，因为在苏区内，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都已彻底肃清，苏区是抗日的根据地，是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模范区。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总　司　令　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

全中国爱国的同胞们！

自华北五省名存实亡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正向着并吞整个中国的目标急进着。

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再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迈进。为了响应全国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抗日讨逆，为全国抗日同胞打先锋、申义愤。乃山西阎锡山甘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动员他的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万恶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则又以上十师的兵力，协助阎锡山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更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向北推进，以捣乱我陕甘苏区的抗日后方！

看吧！当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五省，日本与满洲国军队开入平津察绥时，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全部退出华北五省。但当红军东下抗日而危及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五省的安全时，蒋介石则又把他的军队调入山西，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现在谁都明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的新的阴谋毒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广田三大原则的具体实施。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协定，现在由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坚决执行了。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全国爱国同胞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想在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名义下灭亡中国，动员所有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向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进攻；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我们誓以全力消灭拦阻我先锋军抗日去路与捣乱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军队，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计划，以争取迅速的对日直接作战。我们更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国家于灭亡。红军抗日讨逆的胜利，即是全中国爱国同胞的胜利，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创立各党各派抗日的人民阵线！

反对中、日、“满”“联合防共”，灭亡中国！

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国的独立自由！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拥护红军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拥护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打倒拦阻红军抗日捣乱红军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
全中国人民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东征胜利与我们

（一九三六年五月）

周 恩 来

一、目前新形势与新事变

1．日帝分裂华北与向西急进；

2．世界的新阵势——日、德、意与英、法、苏，美国从旁观望着，反映在远东方面的争斗；

3．南京政府的新阵容——亲日派占了上风，出卖和分裂了华北，英帝渐渐积极起来与胡粤结合，蒋介石的新策略——但蒋介石现在仍然是卖国罪魁；

4．反日的新潮，涌现出“全国一致抗日”的要求，由这点出发，苏维埃红军在其胜利和政治主张下逐渐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

二、我们的任务，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1．要实现抗日救国会议，要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苏维埃红军在全国尤其在西北的胜利和发展，是有推动和决定的作用的。

2．粉碎敌人对陕甘的三次围剿之后，陕甘的敌人是缓进，山西敌人是封锁，日帝则在后督促和急进。因此，我们战略方针：（1）巩固的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2）大量消灭阻拦我们抗日的敌军，扩大红军；（3）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准备与日帝作战。在这一方针下，我们采取了东征的计划。

3．东征的胜利估计及其影响：（1）将要消灭阎锡山的一部或大部；（2）将可能创造出沿河东岸的大片苏区；（3）将调动河西的晋敌，减弱了河西敌人的力量，便于河西的发展；（4）将争取了抗日根据地向东扩大的先机；（5）将更加暴露了阎锡山的真面目；（6）将更加给群众看，红军是真正抗日的；（7）将掀起东方民众的抗日热潮；（8）将推动晋、直、豫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9）将推动着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实现；（10）可能引起南方敌人之前进与北方敌人之进援，主力不拒绝有利的回击，陕甘武装更要努力打击敌人保卫和发展现有苏区。

三、我们后方同志的责任

1．集中一切力量为着前线上胜利，主要是东线上的胜利；

2．开展其他战线上，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发展；

3．继续扩大红军与地方部队，完成原定计划，动员担架队、运输队，动员妇女做鞋子等；

4．努力春耕，增加生产，增进贸易，补充前方；

5．百倍加强边区、白区、白军中的工作，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到全中国去，首先是华北及沿海中心城市。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于瓦窑堡）

一 对东北军的估计

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

但东北军现在还处在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过渡的时期。现在一般的它还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指挥下的军队；蒋介石的爪牙法西斯蒂的政训处，在那里是处于合法的监督者与宣传者的地位。在另一方面东北军的最高领导者以及一部分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与诚意。中下级官兵中间的抗日情绪是很高涨的，这就便利于我们抗日救国的宣传与活动。

但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有的部分则处于最先进的地位，有的则转变的异常迟缓，有的则尚未开始转变，而在蒋介石法西斯蒂政训处的直接影响之下。因此东北军内部觉悟的程度也极不一致。但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并不能否定全部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的基本估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二 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就依靠于我们的争取工作。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目前超出于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去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但这并不排除对部分的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当觉悟程度不够的、自骄自大的、在蒋介石与政训处压迫与欺骗之下的部分的东北军，向我们采取积极进攻的敌对行动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可能有利的条件之下应给以打击。这种行动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这一部分东北军以教训，开辟以后在它内部能够顺利地进行政治工作的可能。所以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 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

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代理人，就是那个法西斯蒂的政训处。

我们在东北军全体将士前面，应该利用蒋介石每一丧权辱国的事实，来揭破蒋介石与他的政训处的每一欺骗。对于政训处每次所提出的反对我们的口号，我们必须给以及时的有力的答复。我们的答复应该利用铁一般的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必须集中火力向着蒋介石与他的政训处猛烈进攻，处处把东北军的全体将士同法西斯蒂的政训处对立起来，使政训处完全陷于孤立，处于四面楚歌的环境中。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把东北军中个别最忠实于蒋介石的分子放到汉奸卖国贼的走狗的地位，放到东北军中的内奸的地位，而受到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唾骂。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动摇的、中立的分子转变到抗日的战线上来。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东北军内部政治上的团结，更加巩固。

同时我们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训处内部的工作，在开展反法西斯蒂的斗争中。

当部分的东北军从部分的反蒋反政训处的斗争转变到整个东北军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反对法西斯蒂政训处的时候，也即是整个东北军公开起来号召抗日与实行抗日的时候。

四　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

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的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

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东北军中许多军官都是东北人，所以他们中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绪与意志，便利于我们同他们成立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成文的与不成文的方式（如互不侵犯，互相通知，互相协商等）.特别重要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同他们力求接近，向他们竭诚提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与方法；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应该给以最清楚的、详尽的与诚恳的答复；对于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应该站在友军的立场上，共同协商，以求得适当的解决，决不因为某些部分的冲突与误会而妨碍大局。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应逐步的把抗日救国的方针具体化，以引导有准备的抗日讨逆的行动。

为了加紧准备，以争取有利的发动时机，东北军的首长在目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以及政训处，采取外交上的应付的办法，是可以容许的，在发动以前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办法不应该使东北军在全中国人民的前面，失去抗日救国的政治立场，同时，凡同苏维埃红军有关的，应协商决定。

在东北军中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为了使东北军的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的力量。这样，个别上层官兵的叛变，不能影响下级的官兵，下级官兵可以拿他们的抗日的要求与情绪，去推动他们的官长走向抗日，坚定他们官长的抗日决心，而抗日的官长，也可以得到确实的依靠的力量。

下层统一战线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互不打枪或枪口朝天放起，一直到互相联络为止，下层统一战线应该对于东北军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表示消极怠工与敷衍塞责（如上级命令要筑堡垒，他们可不筑，或筑而不坚等）。

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一定能够使东北军在政治上坚强起来，加速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

五　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我们各级党部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的是从外面去影响东北军。我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谈话、联欢、慰劳、演剧等等方式，去影响东北军。这种方法开始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在东北军的内部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领导的核心，在内面进行工作。

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领导的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的核心。我们从外面去进行东北军的工作过程中，应该帮助东北军去发现、物色与教育一批东北军自己的勇敢积极的分子，使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坚强的核心，经过它来推动整个东北军中抗日救国的工作，同时也可以经过它来同法西斯蒂的政训处以及一切内奸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个组织首先应该普遍到各军师团中去。这个组织可以用"东北抗日军人社"或"东北抗日会""复东社""东望社"等名称。没有这个东北军自己的组织领导，东北军的工作是无法步伐整齐的与顺利的来进行的。

我们从外面对东北军中的工作，不但要找到个别的抗日的同情者与拥护者，而且要使每一个我们所找到的分子，本身在东北军中成为抗日救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我们不但要告诉这些同志以抗日救国的道理，而且要告诉他们以活动的方法与方式。我们要懂得，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是处在帮助者指导者的地位，而不是代替东北军包办一切。东北军的工作，要东北军中自己的积极分子与干部去办理；没有无数这类积极分子与干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力量，没有基础。

六　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

东北军中间，应该吸收最优秀的分子到共产党内来。东北军中凡愿意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发生横的关系。但共产党员的活动除党内生活外，应该完全是公开的。因为共产党员在东北军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与团结东北军中一切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使东北军成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军队。他们在东北军中完全以抗日的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东北军的领导核心中，应该有共产党的精干的小组，以实现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一切策略与决定。共产党的组织愈有力量，则东北军亦愈是坚强。必须排斥共产党的发展会瓦解东北军的思想。

在每一个可能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进行工作，并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将来开展的形势，我们现在即应该培养与训练一批专门到东北军中去的干部。

七　凡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

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的工作。党的支部干事会就是这一工作的领导者。但除了支干负总责外，支干中应该有一个同志去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由他去计划、组织与领导。经过党的支部，动员所有当地群众，妇女儿童、游击队、赤

少队去进行工作。区委、县委、省委都应该有专门的人或委员会（如省县）负责进行工作。

地方党在东北军中进行工作的方法，不应该是刻板式的，到处一样的，他们首先必须考查当地东北军的表现，内中政训处的活动，他们同民团的关系，然后采取适合于这种具体条件的方式。如果他们是捣乱的，抢夺的，捉人的，那我们应该采取坚壁清野与发动游击战争的方式以打击之，造成各种困难，以促使他们的觉醒。同时在这种行动中，我们依然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的工作（如到处发传单、写标语、喊话等）。对于我们游击队所俘虏的士兵，在解除武装之后，应很好的给以优待，然后放回（有宣传品则给宣传品，能写信则写信），并同他建立经常的关系。对于那些万恶的法西斯蒂小头子，或民团头子，如被俘获则枪毙之，并公布其罪状。如当地驻扎的东北军表现好，则可以用慰劳联欢等方式来争取它到抗日战线上来。

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它是站在敌人之上，它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它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它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受损失。它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种各样表现的东北军。

八　办事处与工作委员会的统一与区别

只有在东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只有东北军已经同我们有协约的地方，我们才设立办事处。办事处是一个专门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机关。在办事处的周围，应该团结许多东北军中的积极分子。它对于当地东北军的一切行动与情况有最清楚的了解。办事处的组织应该简单灵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该在政治上是很坚强的。办事处是地方性的组织，受地方党的直接的领导。凡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一切关于东北军中工作的情形，应该报告省或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取得经常的指示。

除办事处，在中央或省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下，应该有许多流动的小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这些委员会拿一定的部队做对象，那个部队移动时，它也跟着移动，使各种过去的关系能够经常保持与发展。凡工作委员会在有办事处的地方即同办事处合并在一处工作，办事处应受其领导。

工作委员会较办事处应该是更轻便与简单的组织。为便利工作与防止团匪与法西斯蒂的袭击，可采取化装等办法。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应该是坚强的。

九　向苏区群众说明我们对东北军的方针为保护苏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许多苏区的群众不了解我们对东北军所采取的策略，这是不足怪的，因为这种争取的方式是最复杂的，完全是新的方式，尤其是东北军中那些不好的表现，更使群众怀疑。

我们必须向苏区群众不断的解释这个问题，同时必须指出东北军中的觉悟程度是极不一致的，东北军同红军不是一个东西，因此我们对于它们的争取方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争取东北军与保卫苏区群众的利益不是冲突的，而是互相配合的，牺牲苏区群众的利益以争取东

北军不但是根本错误的，而且也无法动员苏区群众去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就是保卫苏区群众利益的重要一部分。至于某一地区因为受到了东北军的摧残，而就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而心存报复，这无异因为部分的利益，而牺牲整个革命的利益，这自然也是错误的。

在任何情况之下，党应该是群众行动的领导者，党应该掌握当地的群众在自己的手里。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武装，和游击队的创立扩大，在任何情况之下是必要的。在和平的时候，这些组织与武装队伍，进行和平的工作；在战斗的环境下，那我们就进行战斗的动员。一切群众的组织与武装，时刻应该准备着应付一切新的事变。绝对防止某一事变的突然的发生，而仓慌失措，而组织解体。这是最大的危险。

现在是战争的时期，苏区的党与所有苏区的群众，都应该有战争的准备。我们要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奋斗。

十　同党内关于东北军问题的错误倾向做斗争

关于东北军问题在我们党内现在有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倾向。

一种倾向，以为东北军既然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同红军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倾向自然是错误的，因为东北军与红军有很大的基本上的与性质上的区别。红军是从中国革命苏维埃革命中产生与壮大起来的革命军。而东北军则是有转变为抗日军队的可能的统治阶级的雇佣的军队（其他区别，不必多说）。

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我们放弃争取东北军的战斗任务，放弃提高现在的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的任务，拿对付红军的态度去对付东北军。但这些同志在东北军表现不好时（这种不好的表现到处会遇到）就表示悲观失望，对于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就表示怀疑以至反对。

另一种倾向，因为到处看到东北军中的一些不好的表现，一开始就怀疑以至反对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他们以为一切东北军同我们的联合行动，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要进攻苏区，达到它们消灭苏区的目的。这种倾向因东北军内部某些坏人的这种宣传而更加言之有据。这种倾向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他根本否认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抹杀了东北军同红军合作的一切事实，结果也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这两种倾向的错误的主要来源，即是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看到事情的本质而迷惑于一时一刻的现象。今天看到这部分东北军好，就说东北军和红军一样，明天看到那部分东北军表现不好，就说东北军根本要不得。这种朝三暮四的估计，使我们无法决定一个对于东北军的确定的方针，而始终摇摆不定。

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来执行党对于东北军所采取一贯的坚定的方针。

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为着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必须使苏维埃现行各种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性质。土地政策在苏维埃各种政策中，至今占着主要的地位。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自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苏维埃的土地政策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等），这种改变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苏区里面已经收得实际的成效。但是，为要使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现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的审查现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

因此，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如下的决定：

（一）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

（二）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

（三）对于下列各种小业主的土地，不应没收：

1． 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业主的土地；

2． 凭自己劳动所得积蓄起来的工人所有土地；

3． 生活情况很坏的小地主；

4． 原非地主，因失去劳动力而不得不出租土地的；

5． 将土地出租而自己仍受雇于人的。

右列各项小业主如有为汉奸卖国贼者，照汉奸卖国贼处置。

（四）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

（五）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如果在基本农民要求之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土地也当拿出一起平分，但富农应照一般平分条件得到土地（即与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

（六）对于大农业主（主要的不依靠地租剥削而依靠大量雇农经营土地畜牧的业主）的土地，因其生产方式带有进步的色彩，应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

大农业企业主的土地、牲口、粮食等，如多数农民群众要求平分时，应拿出平分之。

（七）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

（八）对高利贷宣布取消。由苏维埃政府颁布新的借贷条例，限制苏区人民借贷利率。但商业借贷及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

(九)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但无论何种出租土地的业主，均须废除旧时残酷的和奴役的出租办法，一律遵守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土地出租条例，无有例外。

(一〇)应改善农村工人生活条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专门的农业雇佣条例通行之。

右列各项决定在新开创的苏区中立即执行。老苏区已经分配土地的，照原办法不变更。实行这些决定的各种具体条例及其细则，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另行规定颁发之。

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日）

刘 少 奇

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在各种基本的重要问题上，都克服过来了。但立三路线之中的一个问题，至今还残留在党内，还没有完全克服过来的，那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因为这个错误长期残留在党内的缘故，因为在党内揭发与反对这种错误之斗争异常不够的缘故，更因为这种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与实际斗争中千百次重复表演的缘故，所以它给党、给革命的损害也最大。如果从今天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来看，那末，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就成了党的主要危险。今天的形势，是中国本部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入完全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愿意甘心作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那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不能前进。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过去若干年来所给予党的损害之具体事实，差不多每一个党龄较长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和参加过群众斗争的同志，都可以说出很多来。如果简单的说：那就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我们如在某些工厂学校创立了我们的组织和力量时，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它弄到塌台的。我们如果在反日或某种口号与纲领之下，创立了公开的比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组织时，不把参加这种组织的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弄到完全不能公开，只剩下几个“布尔什维克”的地步，是不止的。自然，还有根本就不到群众中去，仅仅坐在房子内空叫的关门主义。至于在党内斗争中对于这些事实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到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可以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作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戴上“和平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示在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术战略。六次大会的决议

说："准备暴动"，最近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说："蓄积工人阶级雄厚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大城市中所做的，恰是与这些决议相反。当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作好了，就要指挥这一个或几个工厂学校去和敌人决斗，要这些工厂学校单独的举行政治的罢工、示威游行（如纪念节），给予超过他们当时力量所能胜任的斗争任务，党内许多同志跑到这些工厂学校去，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等。结果就没有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我们开始创立一点基础和力量，就这样消耗和浪费掉，这就自然不能蓄积工人阶级雄厚的力量和准备暴动！所以每到一个伟大事变来临（如"一二八"、"九一八"）广大群众起来斗争时，我党常是感觉自己在群众中缺少基础和力量，而无从施展当时所提出的任务之痛苦。我们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知道只有那些已有的工作、组织和力量保存与巩固起来，才能在这些基础上去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我们同志常是急性的，不顾胜败的；不顾事后结果与影响如何，而是盲目的莽撞。结果不能不使得我们的工作环境与条件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在红军中，要保有与爱惜我们的力量，要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作战，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敌人较弱的一点，以取得胜利。那末，我们在白色城市中指导群众斗争，就完全是违反这种战略战术原则的。已有的力量，尤其是群众中的领袖与干部，不设法保存与爱惜，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只要是纪念节就和敌人作战，不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而盲目的爆发斗争，结果我们在红军的斗争中，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而在白区中心城市的斗争，则与此相反。

"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但问题是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群众的情绪与敌人的戒备和阴谋如何，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拿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为什么在形势与条件不好的时候，眼看着要受到敌人严重的打击不可停止这些事呢？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承认形势与条件也可能对示威有不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礼拜日，不管天晴落雨是要作礼拜的。结果过去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很难以计算。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表示在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如何使党的基本口号和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我们的同志常常不懂得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的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而常常是由群众去背诵我们的基本纲领和基本口号，或是提出今天群众还不了解还不能为群众所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强迫群众接受、强迫群众斗争。甚至不经过群众的同意，用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如党一样的，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允许的宣言、传单和文件，对于任何一次群众斗争，不管条件怎样，都是要机械的"坚持到底"（即坚持到任何力量都耗费尽了才止）。都是在形势极不利于战斗继续延长的情况下，他们都认为"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战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提议，都是机会主义。这样就使得群众斗争不能发动，或者在斗争发动后群众离开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或者放弃了某些胜利的条件、机会，使斗争受到打击，直到最后的失败。领导群众的方式与领导党的方式一样，群众团体

的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结果在侦探严密监视下，就没有法子不使群众团体的组织也缩小到和党一样。

当着群众或者某些派别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反对现政府时，只要他们的口号纲领不完全和我党一样，我们的同志常常是不积极去参加与援助这些斗争，达到他们的目的，并努力使斗争扩大，以实现更大要求。而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站在旁观的地位，忙于去批评这些斗争、口号和纲领如何不彻底！如何成为反革命的欺骗群众的东西，咒骂这些斗争的领导者，甚至号召群众脱离这些斗争，去侮辱殴打他们的领袖。结果，把这些群众和同盟者完全关在门外。群众或某些人要起来抵制日货，我们同志是忙于批评抵制日货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不去参加、赞助这些人抵制日货，使之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群众与某些人提出口号要枪毙王正廷，我们同志忙于批评这是反革命欺骗群众的口号。蔡廷楷、马占山起来和日本打，我们同志忙于批评他们是反革命，鼓动群众离开他们，而不积极去参加、援助他们，使当时反日战争胜利。某某人拿出钱来援助反日罢工工人，我们同志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反革命企图来收买工人；某某派提出工农商学兵大联合抗日，我们硬要把"商"字去掉。"九一八"日本武装占领了整个满洲，而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口号，首先是"拥护苏联"，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去。这样怎能使我党和同志走到广大群众中去？！

当着我们在某种部分的纲领和口号之下，团结了比较大的群众和各种派别的人在我们周围，建立真正的群众组织时，我们同志是又一个纲领之后再加上一个纲领，一次冒险斗争之后再加上一次冒险，把这些组织中的群众和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直到剩下我们同志几个人。上海工联、反帝同盟、民众抗日会、左联、社联以至许多工会，开始时都是有许多广大群众基础的，我们的同志总不会把这些组织的群众基础更加扩大，而只会把它缩小到完全没有群众。在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我们总不能容许其他派别有一个人和我们共事，而必须是"清一色"。我们夺取了黄色工会的群众和领导机关，我们是忙于把它"转变"成赤色工会，以至弄到消灭。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似乎是不许党外再有群众组织。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而我们同志常常是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的要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打倒一切豪绅、地主、资本家、富农，以至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别和黄色工会。我们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是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总的力量。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与半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去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来进行。但我们所作的恰与此相反。许多可以公开的工作，要拿到秘密机关来做，许多可以公开发表的主张、论文和刊物，我们要拿到秘密刊物上来发表，或是发行秘密的传单宣言等。我们忽视与放弃公开工作的可能，而把秘密机关无限制的扩大起来；秘密的刊物文件是特别长、特别多，一般文件的机械化、"八股化"，这样就使群众工作极端缩小，而使秘密机关到处膨胀，结果是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

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但我们所做的是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混淆错杂起来，这样就破坏了秘密工作，妨害了公开工作。甚至在秘密的刊物上宣布某些群众行动、某些群众团体、某些工厂学校为党所领导，在某些地方开了某些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某些事项，以便敌人来监视我们。在某些地方或工厂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组织时，我们的活动还可以避免敌人的耳目，但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完全无必要的散发党的秘密传单，写出党的口号，使敌人好从这些地方来找我们。公开的群众团体，不是设法让他更公开些，范围更广泛些，而是要使任何公开的范围都逐渐缩小，直到完全不能公开，甚至要把工人中一切灰色的公开的附属组织，都要转变成为赤色工会，叫什么"赤色工会的中心作用"。结果就是取消一切公开工作，使一切附属组织都秘密起来。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轻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估计不足，不了解"每一个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要机械的在群众经济要求上加上政治口号和政治要求。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而我们硬是一成不变的，这多纲领这多口号，少了一行也不行，结果是拒绝了这些同盟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也在党内组织问题上严重表现出来。反对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害怕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加入进党内来，尤其害怕某些军官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加入进党内来，在党内斗争上许多是过分的机械的，对于那些在思想上、理论上没有准备的同志，在工作中偶然犯到的错误，关门主义者硬要依照他直线的理论，说这是"系统的机会主义"，替他造出系统来。下层同志的自动性、创造性、自我批评是被抑制着，在党内造成了害怕犯错误，害怕犯右倾，害怕说话，不敢放手工作，故意要表示"左"些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在那里？负责者是谁呢？自然我们不能怪那些幼稚的同志，而是领导机关在党内斗争中犯了错误。不采取同志的、诚恳的爱惜同志和干部的教育态度，而许多是过分的打击同志与干部。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的党内斗争方式，认为是"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取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推动下级和干部的工作。我们没有在党内造成同志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并且欢迎批评，放手工作的现象。但这种现象是发展下层同志自动性与创造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这些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某些部分的群众和同情者对党表示某些疑惧，使许多企业中的很好的同志和群众离开我们，不愿见我们的面。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而在另外一方面，就帮助了取消派、右派向党进攻的资料，帮助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帮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消灭党的企图之实施。过去我们用力量最多，工作最多的地方——如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天津、北京这些最大的中心城市，受这种错误的损害也最大，在这些中心城市我们现在的基础也最弱。原因在那里？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的结果。

关门主义的根源，因为他们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要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他们对目前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在目前许多中间阶层、

社会的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他们不要统一战线。这些完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基础，形式上“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

“左”倾关门主义还常常作一种空洞的对目前形势夸大的估计，在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帝国主义与中国反革命力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时可以估计在这些地方似乎明天就要成为苏维埃区域的样子。所以他们敢于冒险，不必要作长期艰苦工作，聚集最雄厚的革命力量去和敌人决斗。一个工厂的罢工，他们可以从世界革命如何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分析起，要这个工厂和敌人立即进行决斗，似乎世界革命在当天就可以与这个工厂的罢工直接配合推翻一切的敌人，不必根据这个工厂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当着他们在上海举行一次没有成功的示威，甚至是受到很大损失的示威，他们一样可以估计到这次示威，如何是“成功的”，有如何深远的意义？如何影响了多少人？如何推动了革命、加速了反动统治的死亡？如何成为……的信号……以及还有什么一些缺点，如何要反对对这次示威意义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等。但在示威中被捕的大批干部，以及在组织上的许多损失，他们是看不见，不愿意看见。似乎这不算什么，不要紧，明天革命胜利，这些损失马上就可以恢复起来。这种空洞的夸大的对于形势的估计，常常成为冒险主义的基础。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没有想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现在，是有九年了，为什么上海、汉口、天津这些地方还没有变成苏维埃？倘若他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准备以九年的艰苦工作来聚集他们所需要的力量，那他们也许不会那样浪费他们的力量，而有积蓄力量和保存干部的必要了。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就在党内滋长起来，到立三路线时代发展到了最高的程度，在四中全会以后，是有了许多的改正，但在基本上没有转变过来。直到现在党内还是残留着，而这些错误的恶劣影响也还是残留着。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是不够的，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这种错误给予党的损害，有这样严重。在以前我们没有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以应有的打击，更说不上致命的打击。有些同志把工作和组织弄塌台，我们没有拿住每一个这些事实来研究，开展斗争，给这些同志以应有的必要的处罚，以教育同志。这就是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为什么能在党内严重的长期存留的原故。

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教育我们同志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的让我们的党、同志和干部跑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地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把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组织起来！虽然我们一些同志和干部在这里可能犯到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我们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党，有无数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干部与同志，提高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完全能够克服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完全不应该害怕这些错误以致裹足不前，我们要率领无数千万的革命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上去，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

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运动的原则（草案）

（一九三六年）

一、职工运动的路线：在每个企业，每个区域，每省以至在全国的范围内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的统一战线，实行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骨干。

二、行动统一的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资本家，反对一切内战，反对汉奸卖国贼及阶级敌人的进攻，要求改良生活待遇，要求集会结社罢工等的自由，要求有最低限度的文化教育基金，即是要尽力拥护工人阶级切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

三、组织任务：利用一切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取得职工会合法的存在，以便团结更广大的有组织的与无组织的工人，加以民族的阶级的训练，取消过去狭隘的秘密的赤色工会的组织方式，造成以统一的行动与阶级斗争做基础的统一工会，首先是大工厂和大企业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和企业里。

四、斗争方式：在大多数工人的要求与客观有利的条件下，发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依据客观情形，采取从请愿、怠工以至同盟罢工的方式；在日厂应多带民族色彩，以取得各方的同情与援助。要注意到争取斗争胜利的结果。在客观形势不利于继续斗争时，应该有组织的结束罢工斗争，以便准备下次的斗争。

五、建立中心城市与主要企业中的堡垒——交通、市政、军事企业——并要善于运用与锻炼这些堡垒。

六、斗争纲领：

（一）要求民主权利，实现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

（二）要求修改南京政府颁布的工厂法、工会法，并立即实现所允许的法令（如十小时工作制，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工资照给，工人疾病、年老、伤亡的救济等。）

（三）要求参加救亡运动的自由。

（四）规定最低工资，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反对刻〔克〕扣工资、欠押工资，资方出钱办理工人文化教育事业。

（五）反对民族压迫、侮辱，不分民族，同工同酬。

（六）撤退工厂内驻兵及警察等。

（七）保护女工、童工，女工产前至少需有四十天的休养，工资照给。设立托儿所，男女童工，同工同酬。

（八）厂方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经双方同意时，须发给解雇费。政府救济失业，□会内设立失业介绍所。

（九）反对包工制。

（十）反对养成工制，学徒期间不得超过二年，并须给相当工资，改良学徒待遇。

中华全国总工会

北平各校通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钧鉴；全国各报馆、各通讯社、各杂志社、各机关、各法团、各学校、各学生团体及全国民众公鉴：

频岁民族多难，失地丧权，已至于无可让步之地；近则北方各省复有组织特殊政治机构之酝酿。自叛逆殷汝耕倡乱冀东，汉奸益形活跃，背景所在，尽人而知。顾其范围，又岂止此！华北之经济利益，乃至于领土主权，转瞬将非我有。强敌已入腹心，偷息绝不可得。自治不幸实现，则在"防共自治"名义之下，敌骑可以恣意冲撞，即我民族覆亡之时。数年来之教训，"以夷制夷"既不可行，而"苟求偏安"又岂事实所许可？此时之势，抵抗为唯一出路，若犹高唱"协调、忍耐"，岂将俟破亡而后为"最后关头"乎？

吾民誓死反对断送领土及主权之自治行动以及任何变相之独立阴谋，以其纯为暴敌所一手造成者也。凡有倡言自治之人均为汉奸，民族之蠹贼，人人皆得而诛之。应请政府立即下令讨伐首倡叛乱之殷汝耕，收回冀东，以保持领土及行政之完整。虽然，今日之华北，敌方伸手攫取，而我政府果有何对策，地方当局具何决心，吾民殊不能了然。推而广之，我对敌之外交政策究何决定，吾民亦无从知之。国家之外交手段，自不能任意公开，顾外交大计，则未闻有不可告人者也。政府诚以民族存亡为重者，应即公开外交政策，更应与吾民以集会、结社、言论之自由，俾真正之民意得伸，而作为抗敌政府之后盾也。

今日而欲求生路，唯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不战固不得幸生，即一切局部抵御亦无裨于大局。吾民要求政府立即领导全国民众以四万万人之力量发展民族斗争；一方实行与一切被压迫民族，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敌国内以同情心对我之人民密切联合；并取消一切对敌债款，没收敌在我境内之一切财产及汉奸之逆产，以充实抵抗力量。民族解放之途径，舍此莫由。十一月十九日五全代会蒋介石先生对外关系演词中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吾民兹以今日之情形为问：和平岂尚有望？最后关头岂尚未到？若尚固执"安内攘外"、"生聚教训"之见，诚恐内部既不得安，外患又与日俱甚，将见国亡之后，适受敌人之"教训"，资敌人以"生聚"也。阿比西尼亚以褊小之国而能动员民众抵抗意大利之侵略，使其强敌不得畅所欲为；"九、一八"之变，我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四省之地，抵抗与不抵抗之悬殊如此。"一、二八"之役，我以局部作战，虽赖民众之拥护而造片段光荣，然卒有停战协定；长城各口之战，亦以局部抵御而留"塘沽协定"之羞，则又不动员全国之结果也。长城、淞沪诸战役，敌以倾国之师，挟械精饷足之利来犯，而犹在沪三易主帅，在长城迭受创击者，则以我民众之纷纷起立，无论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均予我军以援助也。向使当时即能动员全国，又焉至于有今日之形势哉！是知我之力固足以抵抗也，今而急起，事尚可为；若再因循，后将无及矣！

设今日而犹存"偏安"之幸心，以华北乃至于沿海之地事敌，挟财货退处隅陬，以为假我

数年，屯聚训练，然后有为，是何异于痴人梦想！敌蚕食以进，数年之后，隅陬之地亦将不免于亡，则岂具"国则必亡，我独后亡"之决心乎？设今日而犹行"佯战"之手段，驱地方军队作战，而中枢靳一弹而不给，且与敌交饮香槟，则局部虽坚苦支撑亦无能为力，终复产生停战协定，而亡国随之矣。故吾民深不愿思及二者，而惟冀政府出以动员全国抵抗也。

吾民置身危城，日受熬煎，顾瞻前途，已不能再事容忍，愿对政府作如左之请求，希国人共起督促之：

(一)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政府即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

(二)请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

(三)请政府动员全国对敌抵抗！

(四)请政府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

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
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各班代表联合会
国立东北大学级长会
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学生自治会
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
国立北洋工学院学生自治会
私立朝阳学院学生自治会
私立华北学院学生自治会
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
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学生自治会
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
私立北平今是中学学生自治会
私立北平艺文中学学生自治会
私立北平崇实中学学生自治会

同启

各地学生运动的怒潮

（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九日

北平国立、私立十五大学学生和中学学生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城内游行队伍遭到军警攻击，学生多人受伤。城外清华、燕京两校学生，因城门关闭未能入城，在朔风凛冽中坚持终日。二十余学生被捕。

十日

北平学生联合召集大会，决议全市学校自十一日起开始罢课。

杭州浙江大学学生开全体会议，议决：（一）响应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二）通电全国学校，一致响应；（三）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传反对“华北自治”。

武昌华中大学学生会电呈政府，请设法阻止天津“自治运动”，维护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十一日

杭州中等以上学生万余人，在朔风凛冽中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反对华北伪自治。

北平当局宋哲元为阻止学生运动，特派大刀队及手枪队分驻各大学门前，严禁学生出校。东北大学遭受武装军警检查，学生六人当场被捕。

十二日

上海文化界名人二百八十三人联名发表救国宣言，主张应以最大决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议决罢课一周，电慰北平被捕学生，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并举行示威游行。

武汉中等以上四十余校学生派代表开联席会，对华北时局作重要表示，并电政府，请以不丧权、不失土地为外交原则。

南京各中等学校学生自治协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反对华北伪自治。

十三日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再开大会，决定男生成立义勇军，女生成立救护队，并联络全市各校，自动停课一周，借以扩大宣传。

十四日

上海各大学学生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学生救国联合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电请政府保障正当爱国运动与言论。

西安各中等学校学生通电否认华北伪自治、声援北平学生运动。

十五日

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全体出发宣传。

十六日

北平各大、中学学生再度举行大示威游行，并在天桥召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各路游行学生均遭到武装军警杀伤，死伤达二百余人，多人被捕。

济南省立高中以上学生罢课，从事爱国运动，组织救国团，发表宣言及告全省同学书，并派代表联络其他各校，各校一致响应。

十七日

武汉中等以上学校五十三校组成救国联合会。

济南初中各校学生均加入罢课。

山东省政府为避免学生运动扩大，令济南各中学提前放假十八日。

十八日

上海八十余校中学生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华北伪自治运动。

南京大、中学生五千余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北平被捕学生，并赔偿医药费，保障学生爱国运动。

天津中等以上十一校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举行游行示威，并向市府请愿，要求代请释放被捕学生。

广州中山大学宣传队继续出发工作。

青岛"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

广西南宁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反对任何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自治运动"及伪组织。

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避免学生运动扩大起见，令济南所有中级学校提前放假，军警勒令学生离校，并派铁甲车监送学生返籍。

十九日

南京学生两万余人，二次举行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

天津学生界开始总罢课，反对华北伪自治。

广州全市学生成立救国会。

长沙学生开会，议决援助北平学生运动；并通电拥护领土与主权完整。

安庆安徽大学及各校均成立救国会，高中发起成立"安庆学生联合会"，并电慰北平学生。

厦门厦门大学学生通电反对华北伪自治组织，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

北平学生联合会开会议决反对提前放假。

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发表谈话，禁止学生一切罢课、游行、请愿举动；并令各地机关执行。

北平市长秦德纯再度召集各大学校长，交换制止学生勿再集会游行意见。

北平宋哲元再发告校长书，望各校制止学生运动。

二十日

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六千余人，于十九日夜间徒步出发，本日晨抵市府请愿，要求政府制止北平当局压迫学生运动，实行革命外交，保障言论、集会自由，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武汉七十余校学生分别在武汉三镇举行示威游行。空气紧张，为国难后第一次壮举。

长沙学生大游行，电请政府保障学生爱国运动。

梧州各校学生四千余人举行援助华北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决议敦促政府出兵讨逆，声援北平学生，会后游行示威。

河北省教育界通电反对"修改教科书"。

杭州各校学生推代表四百余人，拟乘车赴南京请愿，当局勒令沪杭路不准开车，交通被阻。

南昌中等以上学校组成救国联合会。医专学生通电声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

二十一日

上海五十一个中学学生成立救国联合会。

开封中等以上四十余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援助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

南京中央大学推代表十余人向行政院请愿，表示坚决反对非法自治。

天津各院校学生继续罢课，校长再发动告同学书。

广州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促成立救国会。

成都中学学生通电全国，反对伪组织，并电呈政府准许学生从事救国运动，惩办北平加害学生之军警。

北平社会局为制止学生运动，勒令各中等学校提前放假。

武昌学生千余人，因昨夜要求省府拨轮渡到汉口游行未果，在路边露宿，今晨仍继续请愿；同时汉口学生三千余人向绥署请愿，援助武昌学生。

上海妇女界代表千余人成立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并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

桂林学生六千余人、民众二千余人，举行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大会，会后作盛大示威游行。

二十二日

武昌学生两千余人渡江赴汉口，联合汉口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太原学生三千余人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抗日口号，市民极表同情。

扬州中学生千余人游行示威，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招待新闻界，并电慰北平各校学生，及发表宣言，请各界一致声援。

徐州学生联合会致电北平市长秦德纯请保护爱国运动，并释放被捕学生。

保定中等以上十余校学生向省政府请愿，并举行示威游行。

广西南宁学生会呈请当局转请南京政府实行公开外交，从速讨伐殷汝耕，释放北平被捕学生。

天津南开大学学生请愿团南下，在沧州被阻，教育部派代表前去劝阻返校。

苏州中学生游行示威。

二十三日

武昌二十一校学生八千人，二批渡江赴汉口游行，汉口四校、汉阳五校学生，整队欢迎，一同出发示威。

开封学生两万余人游行示威，慷慨激昂，并向省政府请愿。

安庆四十余校学生游行示威，情势激昂。

张家口学生联合会用书面向省政府请愿。

徐州中学生结队示威游行。

上海各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被阻于北火车站。

宁波中等学校学生游行示威。

宋哲元为解决当前学潮，迫令平、津所有学校，提前放假。

南通学生三千余人游行示威。

二十四日

上海学生在南京路举行盛大游行示威，遭受外国巡捕攻击，学生五人受重伤，数人被捕；三千学生赴南京请愿，乘车抵青阳港被迫停驶。

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发表宣言，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并主张学生一致维护华北完整，游行因遭干涉未成。法商学院被大队武装保安队包围，禁止学生出入。

开封大、中三十余校学生万余人向省政府请愿，提出严惩北平屠杀学生凶手，保护学生运动等要求，请转呈南京政府。

广州学生救国会关于华北局势发出通电，谓若再不以武力抵抗，则华北将成第二伪满洲国。

上海政府当局为制止学生运动扩大，宣布戒严。

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并游行示威。

二十五日

西安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并向省政府请愿，提出从速释放北平被捕学生，保护爱国运动。

芜湖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救国联合会，电呈南京当局讨伐冀东伪组织，并电慰北平受伤同学。

江宁县全体小学生二万五千余人，发表致全国儿童书，号召全国儿童参加救国运动。

苏州农业专科学校、东吴大学及附属中学学生，分别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

湖北应城学生及民众千余人为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游行示威，并向县政府请愿，县长怂恿保安队杀伤学生四十余人。

二十六日

上海赴南京请愿学生一部分二千余人至无锡被阻，二十七日被大队宪兵扣押于无锡中南大戏院，随即被押解回沪。

南通大学学生三百余人，欲乘轮赴南京请愿，被阻于天生港。

南京及武汉三镇奉南京政府命令，宣布戒严。

开封学生一万四千余人，索车赴南京请愿，在车站坚持两日，被迫回校。

河南焦作工学院学生四百余人，赴南京请愿，被阻于徐州。

信阳学生二千余人，向铁路当局索车赴南京，平汉路交通被阻。

二十七日

北平学生联合会召开慰劳被捕、受伤同学大会，并招待中外记者，大会决议反对社会局提前放假的命令，要求当局惩凶、赔偿医药费及保证学生有从事爱国运动之自由。

太原学生罢课三日，举行街头宣传。

南昌学生数千人示威游行，并向省政府请愿。

无锡全市学生为援助被拘留于中南戏院之上海学生，冒雨游行示威，并冲破宪兵防线至车站与上海学生会合。

张家口各校学生被迫离校回家。

重庆警备司令部禁止学生罢课游行。

二十八日

无锡各报为抗议警备司令部禁登学生运动消息，停刊一日。

南通大学学生因当局扣留轮船不准赴南京，在天生港坚持三日，今绝食一日抗议。

宜昌学生千余人示威游行。

北平学生联合会代表赴武汉大学等校，报告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经过。

二十九日

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为应城学生被保安队杀伤事件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议自三十日起总罢课，并派代表赴应城慰问受伤同学。

三十日

武汉、太原当局为制止学生运动，令各校提前放假。

常州学生千余人，至车站索车赴镇江向省政府请愿，结果被迫回校。

武汉四十余校实行总罢课。

三十一日

武汉学生代表启程赴应城慰问受伤同学。

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宣言

铁一般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已经到达最后关头了！“九一八”事变，在“不抵抗主义”下轻轻地断送东北四省，“一二八”的停战协定，徒然是增高了敌人侵略的气焰，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完全奠定了日本吞并华北的基础，冀北独立与冀察政委员会的成立，正说明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破碎沦丧了，最近在接受广田三原则二十一条的默契下，又来召开中日南京会议，这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整个中国殖民地化，同时也显示出我们政府的屈辱退缩。其他，如目前土肥奔走平津，公开宣布增加华北驻屯军，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华北问题又展开了新的阶段，也就是说，“华北国”不久要出现了！应着这种空前的危机，处在国防第一线的平津学生，发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英勇的示威斗争，不到一个星期，便掀起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怒潮，在这两次血的经验与教训里，我们一致认为，抗日救亡伟大任务，绝不是单独的学生所能胜任；因此平津学联发动了徒步南下扩大宣传团，使民众知道当前的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和救亡策略。这样才能使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大众，充分地觉悟到只有自动武装起来，共同抗日，才是活路。果然，我们的伟大行动是胜利了；徒步七百里，历时三星期，博得了民众同情，散下了抗日种子。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工友们！职员们！

北平两万爱国学生，于本月十六日，为了要求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在北平举行英勇壮烈的示威游行，而被狗肺狼心的汉奸宋哲元等，派遣大批武装军警，开枪屠杀，轻重伤以及被捕者达数百人之多！

现在，不但北平数万学生一致宣布罢课，继续英勇斗争，全国学生也一致起来，在天津、汉口、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罢课示威，响应北平学生救国运动。我广州六千铁路工人，与上海邮务和沪杭甬铁路工友，也召集群众大会，发出通电，援助学生，要求对日宣战，与武力讨伐殷汝耕等。同时，日寇和卖国贼、汉奸等，也在在准备更毒辣和更大的屠杀，来摧残压迫群众的爱国运动。

工友们！时局是空前的严重了！事变是非常的紧迫了！日寇现在正在加紧派遣军队入关，来灭亡我中国；汉奸和卖国贼正在加紧屠杀，摧残群众爱国运动。看啊！我赤手空拳的爱国青年，几十几十的被屠杀了！中国，是我们工人和全体同胞的祖国，青年学生，是我们爱国的同胞，难道我们眼看见国破家亡，同胞被人屠杀摧残，可以坐视不加以援救吗？

工友们！全国各业、各厂、各帮、各派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工友职员们！

起来！在各地，各工厂、车间，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要求惩凶，抚恤，并立即释放一切被捕爱国志士，立即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立即停止内战，武力讨伐叛逆；同时组织惨案后援会、工人救亡会，派遣代表到各厂、各业、各地、各界同胞和工友中，去接洽和号召组织群众，组织各业工人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广大群众追悼死难烈士。准备实际群众力量，来举行关车、罢工、同盟罢工以至于总罢工示威游行等，来反抗日寇武装进攻，来援助和扩大学生救国运动，起来实行雪耻复仇。

日本厂的工友们！起来！提出自己的迫切要求，举行反日罢工斗争！

工友们！职员们！一切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男女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们！

时机是异常紧迫了！我们要不分帮派，不分政见，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一致团结，来援助学生救国运动，来拥护和响应广州和上海邮务、铁路工人的救国运动，来积极领导学生的抗日义举。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红色地区工会的几十万工友，正积极举行集会、示威和募捐等来援助爱国的青年学生；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之下的非红色地区工会的工友，也都不仅积极愿意和你们一起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而且愿意和你们一起组织统一的工会。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一致团结，只要目前汹涌开展的学生救国运动，能够得到我全国工

人阶级的参加和领导，能够扩展到各农村和各城市中去，引导千百万工人、农民、军警、学生、商人参加，使运动发展和扩大成为全民族抗日救国的伟大联合力量，这不但可以打倒一切卖国贼和汉奸，而且也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

工友们！起来！恢复"五卅"的英勇斗争，继续"省港大罢工"的光荣传统，学习"北伐"时的经验和教训，一致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中华全国总工会（老工会）

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七年
抗日战争爆发前波澜壮阔的工人斗争

一　一九三五年底——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工人斗争大事记

一 九 三 六 年

这是上海工人运动新高涨的一年。自“一、二八”事变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外卖国亲日，对内加紧其血腥的统治，加以上海商业的极度衰落，使工人运动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间，工人仅在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起而反抗。那几年的罢工斗争，多半是反对资方解雇、减低工资或延长工时，斗争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而结果也是失败的多。尤其是日商工厂，三年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五年）的罢工斗争仅有三起。但到了一九三六年，由于农村丰收，上海工业逐渐恢复好转，特别是上海工人救国会与职业界救国会组织以后，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与团结，工人运动便开始了急剧的转变，到下半年罢工斗争便汹涌高涨起来，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七年而到达高潮。其中全市日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不仅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历年来的高压，而且影响了青岛全市日商纱厂的工人起而斗争，对于当时争取国内和平统一共同抗日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一九三六年全年罢工斗争共一二八起，较大的斗争如下：

一、英商和丰造船厂罢工：

原因：反对分作三班工作（即反对减工）。

人数：三百四十人。

日期：一月四日——二月二十四日，计五十二天。

结果：胜利，资方同意照旧分两班工作。

二、日商喜和纱厂一、二、三厂罢工：

原因：反对新调人事科主任，反对解雇工人。

人数：三千人。

日期：二月十一日——十三日计三天。

结果：失败，解雇工人十九名，给遣散费。

三、日商裕丰纱厂罢工：

原因：要求减轻工作。

人数：一千七百人。

日期：三月十日——十一日，计两天。

结果：失败，工人一百五十六人被解雇，其余无条件复工。

四、全市一百三十家翻砂厂工人罢工：

原因：要求缩短工作时间。

人数：一千二百人。

日期：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计两天。

结果：失败，无条件复工。

五、第四、六区十五家丝厂工人大罢工：

原因：要求恢复原有工资，减少工时。

人数：女工七千五百人。

日期：七月七日——十四日，计八天。

结果：胜利，全市丝厂女工工资自六月份起复原。

六、英美第三烟厂罢工：

原因：反对解雇与苛待工人。

人数：二千七百人。

日期：八月十八日下午——九月九日，计二十二天半。

结果：失败，无条件复工。

七、鸿兴袜厂罢工：

原因：反对资方解雇进步工人七名。

人数：三百二十人。

日期：九月九日——十月二十八日，计五十天。

结果：半胜利，一名女工津贴了一月工资解雇，其余六名罚停工一星期。

八、全市日商纱厂十万工人反日大罢工：

原因：反对日本鬼子历年来的高压，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

人数：包括同兴、上海、大康、东华、日华、喜和、公大、丰田、及内外棉等全市日本纱厂工人十万多。

日期：自十一月八日起至二十六日止，互相呼应，先后不完全一致。

结果：经过坚决的斗争与各界反日爱国人民的支援，最后获得胜利，一律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并改善了待遇，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

九、申新六、七厂、恒丰纱厂、永安一厂工人罢工：

原因：要求增加工资。

人数：二千多人。

日期：十一月三日——七日，先后不一。

结果：一律加工资一成。

十、新裕纱厂一、二厂工人罢工：

原因：要求增加工资。

人数：六百二十人。

日期：十一月十五日——十八日，计四天。

结果：工资加百分之二十五。

十一、恒大新记纱厂罢工：

原因：要求恢复原有工资。

人数：一千六百人。

日期：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日，计八天。

结果：由资方酌加工资。

一 九 三 七 年

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七月间，罢工斗争汹涌澎湃，此起彼伏，为历年来工运又一次高潮。"八、一三"以前七个半月中，发生罢工斗争共二一〇起。这个新记录足堪与大革命时期一九二六年相比。

本年之斗争有以下特点：①以丝织业为主，以棉纺为副；②从个别厂的罢工，扩大为产业性同盟罢工；③从经济性的罢工转为抗议逮捕的政治性的罢工，斗争极为激烈；④自七月份起罢工斗争案件锐减，因这时抗日战争已在华北爆发，工人为求团结抗日，故对资方采取谅解态度。

本年七月前较重要斗争事件如下：

一、英商公益纱厂罢工：

原因：反对解雇筒子间六十名工人。

人数：二千一百三十人（内女工一千七百人）。

日期：二月十五日——五月十三日，计八十八天。

结果：解雇工人发给解雇金三个月。

二、新裕一、二厂罢工：

原因：反对厂方无故开除工人。

人数：二千四百六十人。

日期：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二十八日，计三十五天。

结果：二厂结果未明，一厂无条件复工。

三、英商纶昌纱厂罢工：

原因：布机间工人要求加工资。

人数：二千二百人。

日期：三月一日——十日，计十天。

结果：失败。

四、全市丝织厂大罢工：

原因：要求改善待遇，增加工资。

人数：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九人。

日期：三月三十日——四月二日，计三天半。

结果：普加工资一成。

五、公益纱厂二次大罢工：

原因：反对新包工头开除工人。

人数：三千人。

日期：三月二十五日——五月十三日，共计五十天。

结果：胜利。

六、英电罢工：

原因：要求增加升工，并发给罢工期内工资。

人数：一千七百零三人。

日期：四月十八日——二十二日，计五天。

结果：胜利。

七、沪东丝织工人反迫害罢工：

原因：反对六月十六日三区警察局拘捕会员二十四名。

人数：厂数约三十家左右，人数几千人。

时间：六月十九日——七月十九日，前后一个月，逐步发展，逐步收缩，其中最短者半日，最长者四十六日，一般均在三日至六日左右。

结果：失败。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上海工人历年斗争大事记(初稿)》）

二　一九三七年五月工人斗争事件统计

日期起讫	地点	企业名称	方式	参加人数	原因	结果
1	宜兴	人力车夫	罢工	该县全体人力车夫	反对增加车租	不详
1	唐山	猪鬃业	怠工	一万八千人	因河头猪鬃毛捐稽征所征收捐税	不详
3——5	上海闸北	硝皮作四十余家	罢工	二百余人	因无故开除工人	大部分胜利
3	上海	勤工、大同、永盛等织绸厂	罢工	千余人	改良待遇	不详
3	上海	华商水电公司	请愿	全体工人	改良待遇	不详
3	武昌	震寰纱厂的起煤码头工人	包围煤船	百余人	反对解雇	不详
5	上海	鸿昌织绸厂	请愿	五百余人	要求改良待遇反对包工制	不详
9	上海	甡盛绸厂	怠工	全体工人	反对停开夜工	不详
10——12	常州	利源布厂	罢工	全体工人	改良待遇	不详
10——15	上海	英商公益纱厂	罢工	全体工人	反对开除工人要求良待遇	大部分胜利
11	广州	烟丝业	派代表交涉	二百九十余人	因不发工友逝世之葬殓费和不举行四月初三之宴会	不详
12	长沙	湘第一纱厂	罢工	全体工人	反对职工待遇暂行章程	不详

12	嘉善	窑瓷业	罢工	四十余人	增加工资	不详
14——21	上海	(西班牙商)上海皮厂	罢工	二百余人	反对开除工人	给一部分退职金
15	上海	美亚十厂	罢工	五百余人	四月十一日为要求与美亚各厂同等待遇开始罢工	部分胜利
16——24	上海	元泰、同诚、重阳织绸厂	罢工	全体工人	反对虐待工人	部分胜利
17	上海	大东南烟厂	请愿	全体工人	反对开除工人	不详
17	苏州	成衣铺	怠工	全县成衣匠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19	无锡	赓余布厂	请愿	全体工人	要求发红利(因该厂去年盈利20余万)	不详
21	上海	美丰织绸厂	怠工	一百二十四人	改良待遇	不详
21	上海	装御工人	请愿	数目不详	增加工资	详
24——25	上海	益友织绸厂	请愿	全体工人	改良待遇	不详
24	芜湖	中一纱厂	怠工	全体工人	要求增加工资	不详
24	上海	日商中山钢铁厂	罢工	全体工人三百余人	反对虐待	尚未解决
27——29	上海	金星自来水笔公司	冲突	八十余人	要求改良待遇	部分胜利
27	上海	鲜猪业	交涉	源顺等栈屠工人数不详	要求发给积欠工资	限八月底以前发清
28	上海	ABC中国内衣公司	冲突	二百余人	因要求增加工资后工人领袖被开除	不详
29	上海	三北、鸿安、宁兴轮船公司	交涉	全体轮机员	要求改善待遇	不详

(文化资料供应所汇辑，见开明书店:《月报》1卷6期，1937年6月)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中国是民众的中国，土地是民众的土地，不象在皇帝统治的时代，“朕即国家”，因内政外交上的失败，将一块一块的土地让给帝国主义的列强，还说：“宁给友邦，不给家奴”，叫民众连眼睛也不敢瞪一瞪。可是九一八以来，丧失了东三省，断送了热河，民众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国策底下，忍气吞声地待上三四年，以为政府应该收复失地，保守疆土，奈何东北四省未曾收复一角，整个的华北又将拱手让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以后，冀东的伪组织反而扩大，由外力策动建立了名存实亡的华北政权，敌人所派的无名总监，已将长驻天津，监视着接收冀察，更进而囊括华北。华北民众，全国的民众，是否仍旧保持着在皇帝统治时代不敢瞪一眼的态度，坐以待亡？

不！民众的态度表示得何等明白，一方面由外力策动华北“自治”的时候，使尽了百计千万，结果是出四毛钱一个买得几十个流氓乞丐，举行“请愿”，还被那不识时务的请愿者，供出了“我们是奉上头的命令来的呀！”另一方面，真正的民意，正在预备着全体武装，为最后的奋斗。所以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运动，便如电掣雷兴地起来；各地的学生运动也如崩山倒海地继续发展。他们费了父母的“血汗之资”来入学校，希望学成后做个社会的中坚分子，国家的柱石良材；决不是不知艰难的黄口稚子，决不是爱出风头的无聊政客，决不是浑水捞鱼的腐败官僚，决不是被人收买的捣乱分子，而是为爱国心所驱使，为民众争生存，愿意牺牲他们的光阴，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众的先驱，为救国的斗士。

中国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除非无耻的汉奸花言巧语来遮掩他们的卖国勾当以外，怕没人敢说华北靠得住还是中华民国的华北吧；那末，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应该一致起来，抗敌救亡，决不能再坐视已为先驱的青年民众，粉骨碎首，独立支持救亡的阵容。

很惭愧地负了北平文化责任的我们，平日将什么智仁勇呀！礼义廉耻呀！教化青年民众。这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我们应当实现所谓智仁勇和礼义廉耻最后的机会来了？我们期望着政府决定国策，已经挨过了四年，如今敌人得寸进尺，竟有所谓新二十一条如华北特别区、沿江沿海亲善区、某某三省独立区和其他的策划，都要在所谓“广田三原则”底下实现出来；那末不但华北重亡，整个的民族，快要沦为奴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还能等待么？还能迟疑么？还能埋头在一堆一堆的文化材料之中，进行着所谓文化救国的生活么？

事实告诉我们，除了我们等候着做顺民以外，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也是我们的责任，抵抗是敌人所最怕的；所以九一八以来，不断地压迫我们的政府，来制止我们民众的抵抗运动，这是敌人自己给我们的最忠实的证明；他知道这抵抗的力量，是不可轻视的，他知道我们民众是不肯屈服的，他知道我们政府会和平对付他的，所以用自相残害的方法，要我们政府来制止我们的抵抗。我们情愿中敌人的奸计呢？还是立即起来抵抗呢？

我们很知道一主张抵抗，双重的压迫立刻就可以加到我们的身上，他们加压迫于我们而

给我们的罪名，我们可以预想到的，便是“共党”呀，“通共”呀，这一些无上可怕的名义。但是我们为爱国心所驱使，决不因他们的诬蔑而改变！我们救国的行动决不因他们的压迫而挫折；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我们这时候才起来做救国运动，是惭愧到十二万分。现在上海的文化界已先我们而发动了；他们对国家的苦心热诚，他们认清了事实的真相，他们下了最大的决心，都是叫我们十二万分钦佩的，他们两次宣言提出的一切主张，我们完全赞同。他们第一次宣言所提出的八项主张，即是：“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我们承认这是保障中华民族独立自由最低限度的条件，也是挽救华北危亡的唯一出路。我们鉴于华北危机更严重的发展，坚决地反对正在进行中的广田三原则下的亡国外交，以及一切断送华北的新阴谋。

我们以抗敌救亡的决心，督促政府变更向来的妥协政策，不是与政府为难；我们对于现在负责者，不遵重民众的意思的误国行为，决不能承颜察色奉命惟谨；我们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族的生存而提出救亡的主张；在基于民意而产生的政府，应该完全受。

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是下了牺牲的决心，任何压迫，无所畏惧。我们希望：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不要偷安退缩，准备作亡国奴才。华北的民众，全国的民众，起来！赶快起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争取我们的自由！

马叙伦　邢西萍　武新宇　许德衍
许寿裳　黄松龄　刘　彦　刘尊祺
齐燕铭　严景耀等一百四十九人

（原载《大众生活》1卷14期）

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厌。”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华北教育界“最后一课”的决心，是值得赞佩的。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因为华北事件的教训，我们应该进一步的觉悟！与其到了敌人刀口放在我们的项颈的时候，再下最大的决心，毋宁早日奋起，更有效的保存民族元气，争取民族解放。

四年余的事实告诉我们：敌人对中国的侵略，决不是少数人的盲动和野心，而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积重难返的经济恐慌和赤字财政造成了它积极侵略的大陆政策。假如到了今日还有人想用妥协、提携、亲善、甚至游说的方式，希求敌人的觉悟，那真是与虎谋皮了！

争取民族的解放，不单是中国人民的天经地义，而是任何被压迫民族的天经地义。敌人的压迫愈严重，中国人民对民族解放的要求，亦愈高涨。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这样的一个神圣战争，世界上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会给我们以深切的同情。一切苟且因循的政策，都只有分散民族阵线，使敌人逐步的消灭我们。因此，我们主张：

（一）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

（二）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

（三）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

（四）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华北伪组织；

（五）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

（六）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

（七）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八）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

---

* 上海文化界马相伯等二百八十余人，鉴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迫，整个华北又将成为第二个“伪满”，特发表了这个宣言。

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沈钧儒　陶行知　章乃器　邹韬奋

自去年十二月九日学生救亡运动开始以来，这七个月中中国国内一般政治形势，显然有重大的进步和转变。在以前，我们是陷在互相残杀、互相排挤、互相猜疑的泥沟里；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明了，只有掉转枪头一致向外，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以前，安内和攘外的先后问题还起了很大的争辩；现在政府和民众却已逐渐在抗日第一的旗帜下面团结起来。这七个月中间，全国学生救亡运动再接再厉，全国及各地救国会相继成立。一般民众对于联合抗日，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热烈的要求，这是不消说得。此外政府对日外交，最近也比较的采取强硬态度。塘沽协定的正式披露，浪人走私的严重抗议，至少这两件事，表示政府不甘心屈辱到底。各地军事当局近来也开始有了觉悟。西南领袖最近公然宣布出兵北上抗日。宋明轩将军虽然在数月前，曾向日本屈服退让，但是对于日本军部屡次强迫要挟成立伪组织，却始终加以拒绝，这是值得赞许的。至于向来和国民政府对立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近也改变政治主张，以抗日救国为目前主要任务。就报纸所载消息，"工农苏维埃政府"已改为"人民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已改为"人民抗日红军"。这些事实，说明了现在全国人民，不论在朝在野，不论中央或地方，不论左派或右派，都已一致认识中华民族的当前大敌，只有一个。而在这民族大敌之前，政府和人民，中央和地方，友党和敌党，已开始企图建立全民的大团结。这全民的大团结一旦建立起来，不但可以挽救国家于危亡，而且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这是我们所馨香祷祝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隐讳目前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大部分人民对于团结救亡的认识，还不够彻底，对于全民阵线的信念，还不够坚决。因此，虽然大家都集合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面，大家依然是互相倾轧，互相怀忌，互相斗争。甚至有些人以为"抗日救国"只是一种时髦的装饰品；有些人以为联合战线不过是互相利用，至多也不过是一时苟合，所以今天是同志，明天可以成为仇敌。这种错误的观念，要不是立即纠正过来，广大的民族救亡联合战线，断乎不能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一定马上就会分裂。但是谁都知道，救亡联合战线要是不能建立起来，或者建立起来以后，立即四分五裂，抗日救国是决不会得到胜利的。抗日救国不能得到胜利，那么我们的前面自然只有死路一条。

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虽然大家都叫喊抗日救国，大家都在高谈联合战线，但是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甚至本来是一家人，现在为了联合救亡的缘故，也纷纷互相猜疑起来。例如，同是政府中人，对于国家根本大计，却不容许公开坦白讨论；同是热心救国的人士，却互相怀疑被某派某党利用。这事实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中，各人仍然是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大家难道已经把印度、

朝鲜亡国的惨痛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吗！

就我们个人数月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经验来说，我们因为完全站在人民救亡阵线立场的缘故，竟引起了各方面的怀疑猜忌。政府因为我们主张各党各派合作抗日，承认了共产党势力的存在，就怀疑我们是被共产党利用。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因为我们主张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就等于主张和国民党合作，便猜想我们是被政府收买。另一方面，中央因为我们同情西南抗日主张，就认定我们蓄意反对中央；西南当局却又因为我们求全责备，认为是替中央说话。这事实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当局，我们的一部分青年民众，对于联合救亡的原则，是怎样不够了解，不够忠实，不够热诚，不够信仰啊！照这情形发展下去，大家拿抗日救国作幌子，拿联合战线当作一件把戏玩弄，我们会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吗？

对于一切外来的怀疑猜忌，甚至造谣中伤，我们打算辩护我们自己吗？不，我们没有这个打算。我们已经决定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我们的身家性命都愿意。个人的毁誉更算得什么？我们发现了各种不同方面对于我们的误会，我们不仅毫不介意，而且更增加了我们的自信力。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受到各方面的误会和怀疑，这事实正证明了我们过去忠实于救亡联合战线的立场；正证明我们一面不放弃一点一滴的抗日力量，另一面又不放弃一丝一毫的联合战线立场；正证明我们一面愿意任何抗日势力诚意合作，然而同时决不愿意迁就任何方面。我们敢宣誓我们今后仍坚决地站在这救亡阵线的立场，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现在我们所担心的，却只有一件事，就是现在不论政府当局，不论人民大众，有一部分对于这纯洁无私的救亡联合战线，太不够理解，因不够理解的缘故，更不够忠实，不够热诚和信仰。因此，他们至今还是在互相残杀、互相攻击；即使表面上他们已经联合起来，暗下里他们也还是在互相怀疑、互相猜忌。这样，纵使他们在主观上是为了救国救民，客观上他们是破坏了联合战线，妨碍了抗日工作。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对于救亡联合战线的立场，太不理解的缘故。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联合战线的立场，有向政府当局和人民大众，作一番详细解释的必要。这不是为了表白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

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地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中央政府要是没有各地方当局的合作，固然谈不到抗日；但是地方当局，在和中央政府对立的状态之下，即使出兵抗日，也未必有胜利的把握。固然，抗日救亡是火烧眉头的急事，我们遇到敌军入境，就要立即抵抗，断不能等到全国总动员成功以后，方才发动。所以我们赞成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抗敌，赞成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在上海的奋发抗战，我们也赞成西北军在喜峰口、察哈尔的抗日战争。我们赞成这种局部的抗日军事行动，目的依然在能够推动全国大规模的抗日军事行动。否则，如果我们相信单靠局部抗日，或者一党一派的包办抗日，就可以得到最后胜利，依然不免犯了重大的错误，抗日救国要达到最后的大胜利，必然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我们所以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原因也就在这里。不然，我们要是相信国民党可以包办救国，我们只要加入国民党就是了，就不必谈什么联合战线。我们要是相信共产党可以包办救国，我们只要加入共产党就是了，也不必谈什么联合战线。我们主张联合战线，就是因为相信抗日救国的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方面单独所能完成的。

在联合战线上的各党各派，尽可以有不同的主张，政府和民众，中央和地方，也尽可以

有不同的意见；只要在抗日救国的一点上，求得共同一致，大家互相宽容而不互相倾轧，互相攻击，联合战线就建立起来了。那就是对于抗日救国，政府也还可以有政府的主张，民众可以有民众的主张。这并不妨害了联合战线的建立。只有政府压迫民众不许自由提出抗日主张，民众笼统地反对政府的一切主张，这样联合战线才不免于破裂。所以，互相宽容是联合战线的第一要义。为什么我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开会结社自由，也就因为大家是中国人。在共同抗日的立场上，必须互相宽容，互相容许自由发表意见，自由结合团体。要是没有这种宽容的精神联合战线根本就无法建立起来，更谈不到抗日救国。

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固然，在一个广大的斗争中，一部分不良分子利用联合阵线，假公济私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们一切的行动都坦白公开，这些假公济私的不良分子，立刻就会暴露出来，立刻就会被群众唾弃的。

即使是汉奸，要是一旦觉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也未尝不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时我们也断没有排斥他们的理由。而且我们相信，中华民族要不是生成奴隶根性，活该亡国灭种，决不会有人真正甘心做汉奸，许多汉奸都是因为为环境压迫，缺乏民族自信心，才不知不觉地造成了的。只有建立广大的救亡联合战线，恢复民族自信心，才能克服一切汉奸意识，消灭一切汉奸运动。

因为假定大家对于联合战线的前途，没有信仰，那么联合战线自然会不久就破裂，而抗日救国也断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过去的国共合作就是一个前例。但是假如大家真正能够诚意合作，对于联合战线的前途，真正有坚定的信仰，那么联合战线的基础只有一天天巩固扩大起来，直到抗日救国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就是在抗日救国完全胜利以后，这人民的大团结也不见得就会分裂。因为各党各派既然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奋斗，终于得到了共同的胜利，大家就变成患难朋友，许多本来不能谅解的事情，就可以谅解；许多本来不一致的意见，也就可以一致起来，那时中国才真正能够统一起来。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国家都是因为对外战争的胜利而促成内部统一的。这样看来，民族联合战线决不是一种短命的过渡性质的结合，问题只在于我们对于参加联合战线的态度，够不够热诚，对于抗日救国必然胜利的信仰够不够坚定就是了。

这是我们对于联合救亡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希望这个立场成为全国人民所采取的共同立场。此外我们为了抗日救国，对于中央及地方当局，对于各党各派，对于一般民众，谨以十二万分的诚意，提出我们的一些希望。我们不敢说这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但是至少我们是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向我国的当局和民众进言。纵使我们的主张过分坦白了些，我们想，同是中国人，当局和民众是一定都会谅解我们的。

（一）我们对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先生的希望　五年来，蒋介石先生历次表示埋头苦干，忍辱负重，准备抗日，这是天下所共闻的。我们也承认抗日要尽可能的作迅速而有效的准备；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只是准备抗日的方式。蒋先生屡次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式准备抗日，不管这主张对不对，但是五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个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惟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照这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已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蒋先生要是细心想一想，应该会知道这是何等失算啊。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在目前，敌人正在企图吞灭华北和福

建，民族危机已严重到万分。蒋先生处全国最高统治地位，应该赶快设法，作抗日救亡的真正准备。真正的准备抗日，决不是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而是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因此我们希望蒋先生马上做到下面几件事：第一、停止对西南军事行动；第二、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合抗日；第三、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这三件事做到后，"内"不必"安"而自"安"。随后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人力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要是不然，蒋先生置亡国灭种的危祸于不顾，依然继续剿共，继续内战；这样，蒋先生纵使一生埋头苦干，也不能见谅于天下后世，我们相信蒋先生决不会出此下策。蒋先生在二中全会报告救亡御侮步骤与限度，自然可以代表蒋先生的最近意见。我们读了那个报告之后，觉得对于和平绝望与牺牲最后关头的解释，是比较的具体了。他说：假如敌人强迫承认伪满的时候，或者从去年十一月以后，敌人再侵害中国的领土主权，而政治外交方法不能排除这个侵害的时候，这便是和平绝望的时候，也便是牺牲最后的关头。对外在这个限度里面，尽可能的进行准备，我们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再提出。除了这对外的限度之外，对内的停止内战和开放人民的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也是极端必需的。否则一面准备而一面自相消耗，结果就怕要所得不偿所失；政府昌言准备而限制人民自动起来准备，也不足以见谅于人民。这两点，我们是要重复提出，请蒋先生注意的。此外，蒋先生在报告中把中国和阿比西尼亚等量齐观，这在我们是不敢同意的。

(二)我们对于西南当局的希望　我们同情陈伯南将军，李德邻将军和白健生将军出兵北上抗日的宣言，我们认为这至少表明西南当局对于联合救亡已有了深切的认识。但是，我们却希望西南当局对于联合战线的立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认为西南当局应该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和中央取对立的态度。我们又认为抗日救国应该尽量容许人民自动起来干，换句话说，必须使人民有抗日言论及行动的绝对自由。其实这是西南当局向中央公开提出的要求，我们希望西南当局在他们直接统治的区域内，首先兑现。不然，西南当局脱离了中央，又脱离了民众，孤军抗日便决不会达到胜利的目的。我们还得指出：最近广东内部的意见分歧，就是因为广东的抗日势力，没有民众的基础；否则在民众势力的挟持和鼓舞之下，我们相信谁都不敢别有企图。我们相信西南当局，对于我们这意见，一定会虚心接受的。

(三)我们对于宋明轩将军和华北其他将领的希望　宋明轩将军和华北其他将领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的直接威胁下，他们都会有拼死抗敌的决心，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年以来敌军步步进迫河北、察哈尔、绥远，却不见华北军队有什么动静，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抗日本来必须全国动员，在全国未动员以前，地方军队局部的抗战，固然足以激发民族的抗敌情绪，但是我们所希望的不一定在于华北将领以士兵血肉作孤注一掷，而在于宋明轩将军等不再压迫学生爱国运动，不再逮捕殴打抗日的民众。不然即使有了喜峰口抗战的光荣，也无法教人们相信宋明轩将军是有抗日决心的。

(四)我们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希望　中国国民党我们始终认为是中华民族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主角。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是国民党；推翻袁世凯的独裁政权的是国民党；由广东出师北阀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的是国民党。所可惜的国民党自从掌握中央政权以来，历史的光辉上面，起了一层暗影。所最痛心的，在国民党统治下面，中华民国竟遭逢了从来未有的严重的

国难；我们的地图，已缺了一只角。但是谁也不应该把东北四省失陷的责任，全部卸在中国国民党的肩上；在野的党派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这里所谓各党各派，主要的，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这国共两党，在九年以前不是手挽着手，为着打倒北洋军阀，为着打倒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吗？我们不明白目前在共同的民族敌人的威胁之下，这已经分裂了的两党，为什么竟不能破境重圆。是因为这两党中间有了深仇宿怨不能消释吗？那么希望国民党反省一下，共产党员究竟也还是中国人。我们更希望每个国民党员都明白，对共产党的仇恨，不论大到怎样，总不会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更大罢。是怕联共以后，国民党会被共产党操纵利用吗？那么这全在乎国民党自身。因为国民党要是真正能够联合各党各派，坚决抗日，那么共产党即使要利用国民党，也必然会被民众唾弃的。现在共产党已经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国民党却并没有表示。这结果会使一般民众相信倒是共产党能够顾全大局，破除成见，这对于国民党是十分不利的。反之国民党要是一旦和共产党重行携手，共同抗日，国民党在民众中间的信仰，将要大大地提高。不然，国民党要是只打算一党包办抗日，这是国民党的自杀政策，结果只是替共产党造成机会。我们想，每个贤明的国民党员，每个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都会明白这一点的。我们还得指出，在国民党的阵营里面，已经侵袭进来少数的官僚政客。这少数的官僚政客，在过去曾经不断的破坏国民党的革命功业，在最近几年间，更是进一步的行进亡国的亲日政策。在这个亲日的官僚政客集团里面，殷汝耕已经公然变成汉奸了；此外许多没有公然变成汉奸的，他们一面在国民党里面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另一面背地里是诅咒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他们甚至曾经借敌人的势力，来压迫国民党。正和他们在国民党里面发挥汉奸作用一样，他们对于整个民族也是同样的发挥汉奸作用：一切政治上的秘密消息，据说都是经过了他们而泄漏给敌人的。他们要公然变成殷汝耕，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这一班官僚政客的存在，不但是民族的危机，而且是国民党的耻辱。国民党不肃清这一班汉奸化的官僚政客，是不可能取得人民的信赖的。

（五）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红军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于去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中国红军领袖也迭次发出通电，吁请各方面，停战议和，一致对外，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重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向来对国民政府及统治阶级，采取绝对敌视态度，现在却能够破除成见，主张和各党各派停战合作，那么其他中国人民自然更加容易消除意见，互相结合起来了。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发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主张的。这多半恐怕还是出于共产党里面的左倾幼稚青年的个别行动，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赶快纠正他们。此外，在某些地方，还有自称为共产党游击队的，任意

杀戮人民，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如果是隶属共产党，共产党应该严厉处分他们；否则共产党应该赶快声明，这种不守纪律的部队和共产党无关。

（六）我们对于一般大众的希望　说到最后，抗日救国的基本队伍，当然是人民大众。不管中央当局也好，地方当局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脱离不了民众。要是没有民众的参加，断然谈不到抗日救国。同时在救亡联合战线中，也只有民众是最热诚的，最坚决的，最坦白无私的。但是缺乏政治经验的民众，容易有一个倾向，就是只顾到目前的利害，而忘却那远大的目标。老实说，现在中国民众所受的压迫，并不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民众因国内政治不良所受的痛苦，是十分深刻的。有些贫苦的同胞，为了维持生活而被迫当汉奸，就是这缘故。所以，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我们仍旧要顾到一般民众的切身利益，例如办理救灾，救济失业，改良劳工待遇，取消苛捐杂税，都应当切实施行，以增加抗日救国的力量。但是我们所希望于一般民众的，就是目前我们民族的大敌只有一个。我们只有把这共同的大敌打败了以后，才能彻底解决一般民众的生活问题。所以在目前，我们只有暂时忍耐些，迁就些，避免为了我们内部的纷争，削弱抗日救亡的力量。至于目前民众对于政府的态度，我们认为应该竭力督促政府出兵抗日，而且尽可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只有在政府不顾民众，一味亲敌，甚至承认亡国条约的时候，民众方才可以起来一致反对政府。此外，我国民众文化的落后是不能否认的。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在教育最落后的广大群众，使他们踊跃参加救亡联合战线，而不仅在于推动少数前进的群众，作抗日的直接斗争。这一点我们尤其希望群众的领袖们加以注意。

以上是我们从实际经验所得来的一些意见，我们仅以十二万分的诚意，贡献给我们的当局和民众。常言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这些意见或者不免开罪各方面。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已顾不到一切。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这些话，能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研究和考察，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前途，是不会没有把握的。

最后，我们特地向贤明的当局，贤明的政党领袖，以及一切爱国同胞，背诵曹子建诗：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大会认为全国救国阵线，不久将有更伟大的开展；在这个开展当中，全国同志将要尽量采取公开的方式，一面争取自身的胜利，一面树立民族的生机。

大会在宣言当中，指出救国阵线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彻底团结共同抗日。全国同志在负担起来这种神圣任务的时候，责任是极端的重大，而不容许有丝毫错误的。

大会预料在这个新政策号召之下，救国阵线不但能得更广大群众的参加，而且能得各党各派的赞同。但是，这种预期的胜利，是需要我们有强大的主观力量，在很正确的策略的指导之下才能完成的。因此，大会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初步政治纲领，统一我们的主张，整齐我们的步伐。我们在接触群众以及和各党各派人物讨论时，便不至有空洞以至自相矛盾的弊病。为什么我们叫它是初步政治纲领呢？因为中国反日联合战线的完成，有待于各实力派的正式参加，而目下的人民救国阵线，还不过是一个基础。我们目下还只能要求各实力派在大体上接受我们这个纲领，作为遣派代表正式谈判的基础；而一个正式的政治纲领，是必须在正式谈判以后决定的。

大会坚决的主张：将来正式政治纲领决定时，必须订定程序，切实施行，而不能使之成为欺骗人民的口号。

一　基本认识

大会认为中国需要一个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革命，原为大众一致的要求；这个革命的完成，应该采取牺牲最小的手段，也是革命技术上的当然条件。在过去，就是在应该采取的手段问题上各方有了不同的意见；这种不同的意见，就造成过去民族阵线不幸的分裂。感谢日本帝国主义，它的无理侵略成了这种不同意见的统一，而这种意见的统一，就必然可以促成民族阵线的重新统一。

关于民族革命中对外的抗争，过去有人主张普遍的反帝，有人主张先单独的反英，还有人主张先单独的反日。然而，到现在，一切不同的意见都已经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之下，统一起来了。关于反日的手段问题，过去有人认为战争可以避免，有人认为战争势所必需。然而到现在，一与不同的意见，也都在“反日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则之下，统一起来了。

关于国内各种势力及各阶层分子的团结问题，过去的争论是更多，所感觉到的困难和痛苦也是特别的严重；而且已经常常引起重大的纠纷。这种纠纷，在目下也得着一个比较自然的解决。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使大家都下了“毁家纾难，舍身为国”的决心，都已经踊跃的参加反日战线。只剩了极少数最无耻的汉奸，变成了人民的公敌。在“有钱者出钱，有力

者出力”的口号之下，个人的力量都可能变成国家的力量；大家都站在同一的战线，对付共同的敌人；大家都一致为国牺牲，而不再说谁打倒谁或者谁被谁打倒。

在“反日第一”的原则之下，我们对国际的关系应该是如何的建立呢？自然，我们应该尽量的少树敌人。欧美列强在本质上，固然是帝国主义，但是在现阶段的国际形势之下，它们还不可能直接以大量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意孤行，坚决独占中国，尤其使令它们感到不满与危惧，因此，中国在外交上如能善为运用，它们是可能给与我们以相当援助的，至少可能维持它们一个中立。不过，我们也决不能对它们存着过大的希望，否则就可能遭遇着意外的打击，而取得可耻的失败。

我们不必是有爱于苏联，而实在因为在反日战争中，苏联的确是我们最必需，最可靠的联盟者。苏联在反日的立场，和中国完全同其利害，而绝对不可能联合其他帝国主义以侵略中国。过去，因为中国革命应该采取的手段问题，一部分人因为不满于俄国的革命过程而连带反对苏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以后，苏联与我国当局，又发生了许多不幸的冲突，一部分人更因为这种冲突而反对苏联。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能够重振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精神，实行抗日，中苏间的友善，是没有问题；同时中苏间的同盟，也是十分必需的，而且是十分牢固的。

二 共同敌人

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

国内敌人，既然只有汉奸，所以，除了汉奸以外，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各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

我们主张各实力派同时释放政治犯；主张大家捐弃前嫌，不咎既往。有些人过去即使曾有危害民族利益的行动，只要他们能毁家纾难，舍身为国，我们要同样的毫不歧视的认为同志。

三 政治制度

大会认为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是各国联合战线丝毫不能让步的要求。我们坚决反对以指导民众组织名义消灭民众组织，以统制舆论名义消灭舆论。

大会认为中央当局所颁布的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实在是联合战线的障碍物；这种足以引起纠纷的举动，决计不是爱惜中央的方法，而是恰好中了敌人的毒计。

大会认为在这国难空前严重的时候，含有“制乱作乐”意味的宪法，是多余的。我们很迫切的需要一个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同时很迫切的需要一个以普遍选举方式产生的国民救亡会议，很迅速的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救国政权。

大会认为国家力量的统一，是必需的；但是应该为敌而统一，以抗敌求统一；而不能为统一而统一，更不能以统一消灭抗敌。

四 外 交

关于外交，在原则上，我们是主张利用一切国际的矛盾，然而不能做国际矛盾的牺牲品；欢迎一切国际的援助，然而要认清友敌。在政策上，我们是主张联络欧美，联合苏联和

弱小民族。在方式上，我们是主张建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

我们要积极的运用民众外交力量，联合全世界反日、反战的人民势力；一面发展救国阵线的力量，一面增强抗敌战争胜利的把握。

我们认为中国外交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在事实上不能不有一个新的开展，这个新的开展，如果不采取上述的方式，便只有进一步向敌人投降的方式。

五 教 育

大会认为在目前，一切读死书的工具教育和读古书的麻醉教育，都是罪恶。我们马上需要大批的青年战士，去指导救国工作，去担任救国任务；所以我们不能在救国的意义之外，浪费一点一滴的青年脑汁，更不应该相反的消灭青年救国情绪。

大会认为我们应该以战时国民总动员为中心，推行国难教育的范围，不专限于学生，而要普及工农兵学商；国难教育的方式，不应该是形式化，机械化的，千篇一律的军事训练，而必须能够多方面的适应每一个人的社会本质和职业任务。国难教育的作用，积极的在提高民众抗敌情绪，训练民众抗敌技术；消极的须消灭种种一切的汉奸理论，如唯武器论，物质对比论等。

大会认为新文字的推行，是普及教育的利器，应该尽量使之普遍。

大会认为中小学校教师，——尤其是小学校教师，是战时领导人民最伟大的势力，必须立刻加强其组织，同时改善其待遇。

六 工 商 业

大会认为对于货物的苛捐杂税，以及一切足以割裂国内市场，阻碍货物流通的制度，应该立刻切实废除，以利工商业。

大会认为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而修改过的现行海关进口税率，以及特别有利于高级产品的现行卷烟及棉纱统税税率，是帮助外国资本打倒民族工业的工具，应该立刻加以纠正。

大会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主持下的武装走私，是目下对于工商业最严重的打击，应该策动全民族力量，彻底的加以制止，同时普遍抵制日货。

七 士 兵

大会认为在反日战争中，士兵舍身为国，是最大的牺牲者，所以必须立刻改善其待遇，并提高其抗敌情绪。同时，我们还得从速筹集大量的基金，作为对抚恤死难及受伤士兵之用。

大会认为义勇军是目下最前线的战士，是将来抗战中的人民武力，必须立刻扩大其组织，并统一其指挥。我们必须立刻筹集大量的军费，加以有力的接济。

八 劳 工

劳工是人民抗敌势力中最坚决，最有组织的成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大会认为过去劳

工政策的错误，便是用尽种种方法，分散劳工阵线，消灭劳工运动，使劳工势力涣散而变成帝国主义可以随意宰割的鱼肉。这种奴化的政策，是民族解放的障碍，是不能任它继续的。

我们要求立刻开放劳工组织，一面使数十万日本在华资本体系下的劳工，加紧反日反汉奸斗争，使之消极的可以摧毁日本资本势力的发展，积极的可以训练成功数十万的英勇战士；同时解除民族工业所受日本资本的压迫，另一面应该用国家的力量，改善民族资本体系下的劳工待遇，保障其生活，并提高其救国情绪；应该用法令规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作时间，暨最高最低工作年龄；应该铲除一切对工人的非人待遇和无理压迫，给工人以读书、说话、集会等救国自由。

九 农　　民

大会认为为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了解保存国土的重要，认识国家存在的利益，必须使耕者有其田；为要解决战时的粮食问题，必须促成合作农场之发展，以增加生产。

大会认为：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对于地主的合理生活，可由国家给以保障。大会认为对于农民的苛捐、杂税、兵差、工役，是最残酷的剥削，应该立即彻底废除。国家应该充分运用农民的有余劳力；但是必须给以报酬。

大会认为过去农业金融政策，徒为农村开一高利贷资本来源，徒为居间人增一垄断农产市场的资力，应即根本纠正，实行以低利资金，直接贷与农民。

大会认为农产物市价，必须加以稳定，使农民不至受意外的亏损，农民必须与以组织救国的自由，不能听任豪绅保甲制度，强施勒索。

十 妇　　女

大会认为占有人口半数的妇女，在救国阵线的任务，是十分重大的；在过去救国运动中妇女同志的努力工作和英勇牺牲，更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妇女的力量。我们对于一切足以阻碍妇女参加救国运动的无理压迫，以及志在消灭妇女斗争情绪和政治兴趣的主张——如妇女回家庭去以及妇女回厨房去的主张加以反对，因为那样，便要使战时能够动员的人数，减少一半。

我们主张妇女应有与男子同样的参加救国阵线的机会；在教育、政治、法律、经济、职业上，应实施男女平等待遇，以充实妇女力量，增强救国阵线效能。

十一 儿　　童

大会认为儿童是抗敌阵线中的预备力量，应该立刻普遍的加以训育与保护，使无饥寒流浪之苦。同时，国家应该即速布置安全地带，使在敌人武力威胁下的儿童，能随时迁避，集中训练，以储蓄国家之人力。

十二 国内民族问题

大会认为过去当局对其他较小民族的歧视，要使他们脱离民族阵线，甚至变成敌人的力

量；所以，对于较小民族的平等待遇，不能徒托空言，而应该见诸事实，大会认为过去只拉拢少数的王公和僧侣，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的普及于群众。我们不能容忍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时也不应该压迫任何弱小民族。

大会认为提高较小民族的文化水准，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但是应该利用他们原有的语言、文字；没有文字的，应该代为创制拉丁化新文字。我们对于他们的语言、文字和习惯，不能用威力加以统一与纠正；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应该加以鼓励，然而也不应以威力干涉。

十三 侨 胞

大会认为侨胞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个伟大力量，而同时是民族革命中的一个伟大力量；过去革命中侨胞的踊跃输将，已经可以证明。

大会认为在南洋及欧美各国的侨胞，应该从速加以严加严密的组织，使之能在救国阵线中成为国际宣传及经济供给的巨力。对于侨胞之合法权益，应加以保护。

大会认为在日本、朝鲜和台湾的华侨，多数因为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而已经成为反日阵线中最坚决的分子，应该妥为组织，其被迫回国者，应妥为安置。

大会认为在国防工业上有熟练技术之华侨，应从速敦促其回国；侵略国在中国招募工人，应该加以制止。

十四 失业及灾荒

大会认为在此国防设备十分紧急的时候，而依然要使几十万的受教育青年，几百万灾民和几千万的失业工农不能出卖劳力谋生，实在是一件最不合理的事情。我们立刻需要完成几千万条的壕沟，几千万个的地窖；为什么国家不能支出一笔经费，让他们去完成这伟大的功业呢？这种经费的支出，差不多全部是消费在国内的；因此，对于国家的力量是不会损耗丝毫的。

在全国总动员的意义之下，我们主张普遍救灾，彻底消灭失业，从速把灾民和失业大众组织在救国阵线之下，加紧巩固国防。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一九三六年）

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日甚一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东北四省既早已沦陷，华北五省与福建又危在旦夕。然而我国各派当局，至今尤未能顺应全国民众之要求从事实上表示团结御侮之决心。

在此时会，我们所愿掬诚为国人告者：对时局，我们要求政府当局加紧全国的缉私运动，竭力援助东北义勇军，严命冀绥当局坚决保持华北各项主权，并尽量资助华北国军物质上的缺乏。我们要求政府对北海事件与成都事件之交涉，不作妥协之让步，对绥东伪军之侵扰与北海日舰之威胁，迅速以实力应援各该地方之爱国军事长官。

我们希望全国民众尽力参加并辅助政府的缉私工作，援助东北义勇军，加紧一切救国运动。

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复杂多方面的，各阶层的；其在作家个人或集团，平时对文学之见解、趣味与作风，新派与旧派不同，左派与右派亦各异，然而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之立场亦许各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同为抗日的力量则一。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画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

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我们固甚盼全国从事文学者能急当前之所应急。但救亡之道初非一端，其在作家亦然。故在文学上我们宁主张各人各派之自由发展，与自由创作。

其次，我们主张言论的自由，急应争得。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紧。国民自由发表其救国意见，文学者自由发表其救国文艺，在今日已不仅为人民之权利，亦且为人民应尽之天职。除非不要人民爱国，否则，予人民发表救国意见之自由，在今日应属天经地义，无可怀疑。因此我们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概予废止。我们深信唯有言论自由，然后能收全国上下一致救国的效果，我们敢吁请全国的学者、新闻记者、作者与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

签名者：巴　金　王统照　包天笑　沈起予　林语堂　洪　深　周瘦鹃
茅　盾　陈望道　郭沫若　夏丏尊　张天翼　傅东华　叶绍钧
郑振铎　郑伯奇　赵家璧　黎烈文　鲁　迅　谢冰心　丰子恺

〔附〕美国赫尔国务卿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

为回答报纸记者询问关于华北“自治运动”,中、日双方关于此事的活动及美国政府态度问题，国务卿说：

在华北内和关于华北，现在进行着一项性质不寻常而可能有远大影响的政治斗争。关于此项斗争的报道中述及的人很多；此项行动是很迅速的，而且涉及广大地区；关于这事情意见各不相同；结果如何，没有人能够负责地说；不过，无论这事的起源如何，无论是谁干的，无论所采的方法如何，事实是很清楚的，有人在努力着——同时有人在抗拒着——要造成中国北部几省的政治地位和情况的重要改变。

中国任何部分的非常发展，应当而且必需地，不仅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关心，并且为所有在华有利益的国家所关心。因为所有“有约国”在中国，和关于中国的条约权利与条约义务，一般地说，是完全相同的。美国就是这种国家之一。

在上述地区内，美国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是相似的。在这地区有着，而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也关连着，相当多的美国国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

政治的纷扰和压力引起了不安和忧疑，容易产生经济和社会的失调。这样使得享受条约权利和履行条约义务均感困难。

美国政府对于这类问题的看法，不仅关于中国，而且关于全世界的都是人所共知的。在许多场合上我业已指陈，当着这个全世界政治纷扰和经济不安定的时期，美国政府以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原则及诺言保持信心是极关重要的。在国际关系上，必须有各种协定和对于协定的尊重，才能够产生为有秩序生活和进步所必不可缺的信任心和安定以及安全感。我们国家对它的传统政策的基本原则具有永恒的信心。美国政府恪遵它所签订的条约的规定，且继续邀请一切国家对于为相互及共同利益，以便利并调节缔约国间的接触为目的，而庄严缔结的条约规定，加以尊重。

（转自《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37年版）

〔附〕英国驻华大使关于支持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通告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为禁付现银昨发通告，兹特译录如下，原文云：

为通告事，照得本大使制定后列规例，合亟抄发，仰尔人民等一体遵照，毋违，特此通告。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兹根据一九二五年关于中国之法案第二〇九条之授予权。发布一九三五年法规第二号之"禁付现银规例"。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业经命令全国禁止使用现银，并以使用现银，为不合法行为。再查根据一八九零及一九一三年治外法权法案，及一九二五，关于中国之法案，本大使得订定各项规例，以管理本国人民，使其安居乐业，现在为推行前项中国政府颁布之命令起见，特订定以下规例，凡归本国最高法庭管辖之法人商号及公司，均应遵守毋违。（一）本规例内所称"人法"，系指居住中国境内或在中国营业或在前述一九二五年关于中国法案范围内之英国国籍人民商号公司而言。（二）凡个人或与其他英国人民或非英籍人民，共同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得处以三个月以内之监禁，或连带苦工，或处以五十磅以下之罚金，或处以监禁及罚金。（三）本规例应名为一九三五年禁付现银规例，按该法令，使英人之债券租约或其他财政契据内之银条款，均属非法。简言之，英政府已命收回流行之白银，而悉归国有，及使中政府之纸币，为公私义务之法币，英商银行，因此皆可有权不付出任何白银，此举之效力，诚非浅鲜云。

（周伯棣编：《白银问题与中国货币政策》）

〔附〕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讲演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蒋介石

此次大会开幕，一切工作业已过半，连日诸同志开诚讨论各项提案，一种精诚团结之精神，弥漫全会，实为国家前途最可庆幸之事。中正今日更愿借此全国代表聚首一堂之机会，对于年来吾国之对外关系，率直的有所披陈，幸诸同志悉心的加以检讨后，有切实的指示。

溯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还，继续不断的上海事件、华北事件，接踵而来，全国上下均陷于极度烦闷苦痛之中，中正受全党同志付托之重，担任中央常委，实感觉责任最大，痛苦更深之一人，惟吾人经过长期间国难之结果，深信全国已得到一种深切之体认。体认维何，即吾党三民主义之第一义，所谓民族运动，决非单纯的对外运动。盖民族运动应有内外两面，对外运动，仅为民族运动中之一部分，决不足以概民族运动之全，换言之，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恭按总理遗教，实早已昭示吾人，总理对外固主张为吾民族求自由平等，固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同时对内极力主张精神建设，物质建设，吾人每读《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各种遗著，总理向我全民族要求共同奋斗，为国家求自立自强之道，实随处皆是。而《民族主义》第五讲所以昭告吾人者，尤为明显，故吾人今日亟宜切实反省十数年来吾全国对一切精神建设物质建设所谓自立自强之道，究竟努力至何程度，尤应了解民族运动之两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若仅着力于一面之突出，必遭意外之挫折，此必然之势，今日之所欲披陈者一也。

其次，国与国间之关系，与个人与个人间之关系，完全不同，国家与国家间，决无百年不解之仇，征诸欧洲各国相互间，百年来之外交历史，或合或离，即其明证。盖国与国间之关系，事态复杂，范围广泛，决不若个人相互间之简单每有就一事件某一方面观察，似甲乙两国，决无可合之理，然更就另一事件另一方面观察，似甲乙两国又决无可离之道。此类情况，各国相互间实例甚多。故国际关系，纯系比较的，而非绝对的，易词言之，决定国际间离合友敌关系，应以整个的国家盛衰，及整个的民族利害为对象，不应以一时的感情，及局部的利害为对象。其间权衡缓急，比较轻重，以定决策，实为负责之政治家与革命党员应守之规范。吾人每遭横侮之来，惟有反躬自省，尝读《民权主义》第五讲，总理所昭示吾人者总括其意，以可以灭亡我中国者不止一国，此吾人不能不引为猛自警惕者也。因为此次空前之国难，自有其因果律，决非偶然发生的，孟子所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者，总理亦每引此以告吾人，苟吾人自暴自弃，而不能自强自立，则今日之友，皆成为明日之敌；反之，吾人果能自立自强，则今日之敌，未始不可成为明日之友，古人所谓自助人助，与自求多福者，皆此理也。吾人丁此国难之际，惟有努力于自助、自求而已，此今日所欲披陈者二也。

尤其是吾党“国民革命”之使命尚未完全成功，凡一国在改革过程中，一切对内对外之设施，多半与旧有之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或变化，故阻力之来，诽谤之兴，乃必然之势，吾人处此时会，应须注意者约有二点：一、应以完成“国家中心之基础工作”，为绝对的坚决的共同信条，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之冲突，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盖非常时期之外交，决非普通国家所用之经常手续，可资应付。其二、国际关系瞬息万变，机微莫测，每一事变发生，均有当机立断，迅赴事机之必要。试观欧洲战后东西诸国在革命过程中，内外两面所发生之困难与阻方，大都与吾国最近十年间之政象相同，然卒因全国上下有坚决的共同信仰，负责当局有立断的应付全能，故均能转危为安，国基大定，此今日所欲披陈者三也。

吾民族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盛衰兴亡，影响于全世界之和平及全人类之福利者至深且巨。各友邦之贤明政治家，必能见及于此，而我东邻日本，关于东亚之和平，与彼此两国之福利，亦必关心更切。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岂有他哉。诚能对国内为键全坚实之改进，对各友邦为坦白诚挚之周旋，自信必有内外相谅之一日，吾人于此可下一结论如下。

基于上述三项意见，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

〔附〕在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

蒋　介　石

各位同志：

今天大会所讨论几个提案，都很重要，尤其是西南方面，肖同志佛成等所提的“目前抗日救亡最低限度之方策”一案，格外重要。因为审查会经郑重考虑，认为无庸另有决议，现在议程已毕，兄弟代表主席团对本案报告几句。驻留两广诸同志的提案，其内容所举各点，可以说很重要，我们全会对这案，也十分重视。不过中央自从去年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差不多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救亡工作上用心，也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救亡工作上用力，今天大会对这案说毋庸另有决议之决议，一方面固然由于提案本身的手续没有完备，一方面也因为这几年来西南同志与中央太隔膜，完全不明白中央的情形，所以才有这个提案，现在乘这个机会，来尽情地说明一下。我们临到这个国难严重关头，应当不惜牺牲来御侮救亡，这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抱这种心理，就是全国的小学生也都念念不忘这一句话。可以说凡是中国人，谁都知道要救亡，谁都知道要御侮，但是御侮救亡，应采取怎样的步骤，最重要在定一个明白的限度，以为决定国策的标准。这个最低限度，就是去年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这句话。这几句话或者两广方面还没有明白，以为怎样才算是非放弃和平不可的最低限度，怎样才算是最后的关头，这是我们许多不来中央的同志们不明白中央方针的所在，现在我再把这几句决议的意思，就是所谓最低限度的解释，明白说明一下，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两广来的各位同志特别注意，以便回去之后，承中央意思，传达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是一点。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

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但是这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这是可为各位同志明白报告的。现在外交上的情势，更加复杂，记得在去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意阿战争，刚才发生，胜负未能悬断，世人当然同情于阿比西尼亚。不幸的结果，现在阿比西尼亚已经失败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阿比西尼亚是失败了，我们不能做第二个阿比西尼亚。我们要挽救国家的危亡，维护民族的生存，我们决不怕做阿比西尼亚。我们虽则不怕做阿比西尼亚，我们也不是愿意做阿比西尼亚。假使全国同胞全党同志，能够一律服从中央指挥，中国决不会做阿比西尼亚。我们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切处置决断，不能不特加慎重，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现在阿比西尼亚是亡国了，我们一方面看到阿国的精神，固然很同情，但同时想到阿比西尼亚人民，在空虚的国际评判之下，所受的侮辱，所受的痛苦，实在不开闻问了。现在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大权，可以说操在我们本党手上，尤其是全体中央委员，更要担负这个责任。我们是不是在此和平未到绝望之路，而自己偏要来走绝路呢？国家可以不致灭亡的时候，而偏要使他灭亡呢？我们是不是为了一时的意气，或希望个人的荣名，随随便便的孤注一掷，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完全去葬送呢？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本党同志，真是公忠谋国的人，我想决不出此的。我们很知道在两广的同志，尤其是两广的武装同志，因为不明了外交和军事的关系，更没有了解中央的方针和准备，致有过去种种隔膜误解和错误的行动发生出来。今天主席团提出组织国防会议一案，主要的意义，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各项决议办法，大家可以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所以现留两广各同志的提案，虽手续不完备及事实隔阂未能成立，而主席团的提案已够对其提案有相当表示，能够大家一致地去推行，也就可贯彻全国同胞同志的希望，这是本席在今天会议完毕时，对于主席团提案，及到会诸同志的苦心的一些说明，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两广来的各位同志，予以注意，并转达未到会的同志，一致了解。

（原载《东方杂志》33卷16号）

〔附〕中日外交的现阶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奥　松

月余以来，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日趋紧张，至九月杪十月初的一旬中，几已达最严重的阶段。在上海方面，因虹口事件的突发，日方故意铺张扬厉，造成了意外紧张的局面，战事

似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南京，川越和张外长的谈判，因双方意见分歧而陷于僵局，同时据露透社所传日本提出的要求以及同盟社所传东京的强硬态度，更激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空气，使中国民众皆为之激忿不安，中日的外交关系至是显已达到最后关头了。但自十月四日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来华，向川越大使传达三省会议训令后，表面形势始略见缓和，十月八日川越大使晋谒蒋院长，会晤后双方发表公报，佥谓中日两国间问题，仍可依外交常轨解决之。现在川越大使已准备与张外长重开谈判了，这样，在非常黯淡的局面中，似乎显示了一线的希望，不过谈判的前途如何，自然还是系于日本的态度与诚意。兹将最近中日交涉经过情形，分别略述如下：

路透社所传的四项要求 川越大使自九月初旬入京后，曾三次与我外长张群进行谈判，卒以双方意见分歧而告停顿。当谈判之始，张外长即表示日使如为交涉最近迭发之不幸事件，自可进行商谈，但拒绝讨论中日间其他问题云云。但川越大使不顾此点，仍向我提出要求四项，据路透电所传，此四项要求为：

(一)中日经济合作。

(二)华北冀察绥晋鲁五省实行自治。

(三)日本有权在长江沿岸各地及海南岛驻军以保护日本之利益。

(四)修改中国学校所用教科书，务将其中关于反日之宣传，删除净尽。

(按据十月十日“密勒氏评论报”所载，尚有第五项，即为：罢黜陈果夫，陈立夫，冯玉祥，孙科等。)

据外报所传，中国当时也曾提出对案四项（见十月十日“密勒氏评论报)：

(一)取消“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

(二)撤消冀东殷汝耕伪政府。

(三)取缔华北走私。

(四)撤退驻扎丰台及华北之日军。

川越对中国所提出之对案，深表不悦，认为这不啻是加于日本的“侮辱”,这样，谈判就因之停顿了。

自路透社发表此项消息后，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即向之大施抨击，谓其别有用意，路透社亦于十月二日为文答辩，谓系采自日文报，其原文如下：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昨日下午发表一文，对于路透社作剧烈之抨击，责路透电社在世界各处发表关于日本对中国提出要求之电讯，发言人谓此讯乃以别有用意，志在离间中日之幻想的宣传为根据，今或须取相当办法，制止此种行为云。同盟社亦已广播同样之抨击言论，查日外务省发言人所抨击之电讯，乃伦敦路透电社发至社界各处者，文曰：“路透社自伦敦外界方面探悉日本向中国提出之解决争端条件，内有，(一)扬子江各地点驻兵，以保护日侨之权利。(二)校订教科书，以防杜向中国学童宣传排日情绪之权利。(三)华北五省之自治。(四)中日经济合作，其特殊性质，尚未规定，闻英政府现由其驻东京南京大使密切注视中日谈判之进行。”查其他电讯社亦皆传出同样消息，而日外务省独对路透社施其抨击，迩来外间对于日大使川越在南京进行谈判时，提出之要求，谣言孔多，路透社对于此项谣言，向甚谨慎处之，路透社所发之电讯，泰半取材于日人报纸，盖迩来日文报纸登载南京谈判情形甚为详尽也。例如九月二十一日路透社曾引用《读卖新闻》所载之下列要求，(一)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省辟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仍享有对该区之宗主权，惟官吏之黜陟权赋税权军事统制权等均应移交地方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机会临时解决中日间交通合同之复杂问题，而尤重航空一项。(三)中国将九一八事变后对日货所施之税则，作根本的修正。(四)中国尽量聘用日人为顾问。路透社适于同日引日

外务省发言人之发言，谓报纸所载关于日本对中国所提出可能的要求之预料，大半根据于理想云。

有田外相的宣言 川越与张外长之谈判既陷停顿，一时中日形势甚形紧张，日外相有田于九月二十八日发表重要之宣言，谓“中国应速决定与日本携办与否！”

该宣言首谓自渠就任外相以来，渠力图调整日本中国间之关系，仍为东亚安定之先决条件，但不幸该项努力，均未获具体之结果，反之，各项问题均尚未获解决，而在两国间之关系上造成阴霾。

该宣言嗣于详述最近成都、北海、汕头、汉口、上海各事件后，谓中国当局于事端发生后发表宣言，作遏止排日暴动之担保，已非一次，但迄未有效，事实上日侨在华屡遭非可言喻之暴行，举其主要者，类此性质之暴行，不下十二件，均于最近十个月中发生。故在华日侨之生命财产，现受严重之威胁，深刻不安之情绪，流露于日侨间。许多此种不幸事件，均可谓系排日教育及其他方式之排日煽动及实行数年之排日政策之逻辑的结果，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均不能闪避其责任，即如华方所称其中数事件，为共产党图离间中日关系，但也不应如中国处置谋处殴击等事同样解决。仅解决事件本身，尚有未是，现即应采断然步骤，除其根患，以防复发生此等事件。一方面中国应实行遏止排日暴动，关于此点，吾人应牢记敦睦邦交之命令，证诸存在事态之情形，实无补于事，另一方面，应作更积极之努力，改善中日两国关系，铲除排日之根本原因，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如有必要，应付共产党威胁之方策亦应加以考虑，基于上述之精神，日政府现在与南京政府，作解决各项事变及调整中日关系之交涉，现尚未有若何进步可言。而同时又有同样不幸之新事变发生，日方固诚挚愿望从外交途径尽力获得和平之解决，而东亚安定亦得确实之保障，但日本民众及在华日人，佥以为对华继续交涉已属无益之举。设交涉就此中止，则在华众多日侨之生命财产，当然不能听其更遭若何危害，对于考虑万一时应取之步骤，自属必要。目前交涉之结果，必居中日关系更好转或更恶化两者之一也。

就目前局势言，中国对各项问题之态度，已不容再如过去游移于暧昧之中，而中国现立于紧要之歧途，应决定与日本携手与否，余竭诚希望中国无论有若何困难，需要克服，终能于友谊之感应中，坚握吾人之手云。

日方要求与蒋直接交涉 中日外交谈判停顿后，日本陆海外三省曾一再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展开新局面之办法，经讨论结果，决意进行外交办法，并由有田外相正式请求蒋委员长回京开始交涉，关于此点，舆论界皆有所抨击，兹举十月一日上海《字林西报》之社论于下：

> 当蒋介石将军回南京时，中日两国纠纷，继续谈判，自可减少一部分障碍。纵日方一再坚持，恐蒋氏终不克自行担负谈判之责任，中国方面已有一正式之外交部长，可以全权代表政府，将政府之意见，转达于日本，众所期待于此外交部长者，乃彼与日本大使共同谈判，如获有结果，当呈政府上级长官认可或批准之。如有放弃此途径，则蒋将军如未得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院，或国民政府其他上级官员之同意，对于中日事件，亦不能作任何决定也。如蒋将军专断出此，则为僭越权位，而必遭反对，其所决定之事件，亦绝不能履行。日方评论时局者，须察觉目前之谈判，乃两政府间之谈判，非如前此情形，为一政府与某一强有力军人间之谈判也。此种时期已成过去矣。蒋将军个人对于外交谈判，在中国方面固能生很大影响，但彼并不具有比外长张群更大之权力，而独使中国采取某种行动也。中国值此内政急待整理之时，复加外交紧迫，致使不能专力于主要工作，亦诚可悲矣。然外交之调整所不可忽略，尤以有影响于邻邦之国交者，解决更不可迟缓，但解决有正当之途径，若必坚持须由政府领袖谈判者，实属毫无理由，今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拒绝与有田外相谈判中国事件，而坚持必须由广田首相躬自处理

一切，则日方感想为如何，其情形又将奚若？

蒋介石氏当于十月五日回京，决予川越大使以拜晤的机会，但谈判之进行，仍当由张外长继续折冲云。

桑岛来华 日外相等以蒋院长在四五日内即可返京，该时川越大使当即晋谒谈判日趋紧迫之中日邦交问题，因决特推派桑岛东亚局局长携带海陆外三省当局会议所决定之具体案及新训令，赴南京传达于川越，以为交涉时之依据。桑岛当于二日晚自东京启程来华，过神户时曾对记者发表迷离恍忽之谈话，略谓："日本提交中国之建议，并非一种要求，其目的乃在以诚挚之方法调整中日关系，两国间僵局之是否打开，此与两国间关系之前途，有至关重要之利害，中国仍抱偏见，则日本不得不谋远虑以对付之，如谈判进行不能顺利，则日政府将取应付恶化时局之计划，惟吾人以为今在进行中之外交谈判，终不致归于失败也。"但据某外人方面消息，桑岛此次携带传达川越之海陆外三省当局新决议案，内容包含范围极为广泛，除要求中国实行广田三原则外，并罗列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之条项甚多，开中日外交史上之新纪录云云（十月三日华联电）。

桑岛于五日到沪后，即晚召集在沪日外陆海官佐会议，六日晨飞京晤川越，传达日政府之新训令。新训令之内容，日方拒绝发表，但闻外务省指示川越重新谈判时，对华之表面态度，已不若初时之强硬云。桑岛在华仅勾留四五日，即于十日匆匆返国复命。

川越谒蒋 十月八日上午十时，蒋院长在官邸接见川越大使，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曹宗武，与日本大使馆清水秘书担任翻译。双方互致寒暄后，川越大使首先陈述中日两国之前途，与东亚大局之关系，畅述所见，并言以中日两国关系之深切，亟应互维互助，以谋东亚局势之安定，与两国真正之福利。过去数年内，因种种不幸之事态，两国间疑虑日深，误会滋多，双方应各尽其最大之努力，消极的去除增进友谊障碍，积极的共谋互有利益之合作。蒋院长亦就中日国交之调整，说明其意见，大意谓就东亚大局着眼，两国国交之根本调整，在今日实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故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则国交之调整，必可有圆满之结果。对于近日各地发生不幸事件，虽中国政府警察权之实施，各有不同，而在中国领土内发生此等不幸事件，则不能不引为憾事。对于业经调查之成都与北海事件，中国政府准备依照国际惯例，即时解决。关于其他外交问题，蒋院长确告川越大使，仍应由外交部张部长与川越大使继续商讨，张部长之意见，即系政府之意见云。谈至十二时，川越大使兴辞而去。

蒋院长于会见川越大使后，发表其感想如下：

今日与川越大使接谈，所谈者虽均为中日两国之前途与东亚大局之关系，而未及交涉中之具体问题。但双方谈话精神，完全立于平等基础之上。川越大使之精神与态度，其诚挚坦白，实是钦佩。盖完全本于广田首相去年在彼国议会中所发表之方针，即在不威胁不侵略之原则，力谋调整国交之实现是也。以今日川越大使表现之精神，推而言之，则中日两国间问题，皆可不采外交正当途径以外之方式，而以外交常规，以平等基础解决一切困难，一扫过去之纠纷与黯淡之阴霾。盖人类本富于感情，惟有精诚，可以感召一切。余在去年春天由京入川之时，所发表对日本之感想，即以为如一方果能以精诚相示，则彼方必有以精诚相应之一日，深信余之抱负与期望，不难贯彻始终也。

同时，川越大使于会见蒋院长后，亦发表谈话如下：

今日会谈之内容，已如声明所发表，余获得蒋氏似在设法脱离当面之危机，并对调整全盘国交，抱

有非常热意之印象。交涉前途固非常困难，但并无绝望，尚在折冲，余或尚需与蒋氏会见二三次，亦未可知，惟日期犹未决定。至于具体问题，将与张外长交涉，但其日期亦未决定。总之，一般对于无论何事，即决定其为善或为恶，惟事件并不若是之简单；中日关系非常复杂，双方均具理由，故惟有渐次进行交涉，促进解决，要之余所获之感想，似可相当信赖蒋氏对于打开中日国交之诚意，故将更令彻底，由消极积极两方面为确立东洋和平计，拟向中日共同目标迈进云。

各报之意见 蒋介石氏与川越大使会晤之后，中外各报皆纷纷加以评论，日本报纸多以为前途尽多困难，遽难乐观。兹举东京《朝日新闻》之社评如下：

《朝日新闻》谓，中国对于调整两国关系之立场，系以维持领土主权及行政权之完整为原则，并实行不威胁不侵略，而日本要求之最重要者，则为（一）华北之特殊地位。（二）反共之共同战线。中国坚持其互惠平等之立场，高揭领土主权为护符，谈判前途，或将遭遇意外之难关云。

伦敦《孟郃斯德导报》亦曾著论批评蒋院长与川越大使会晤结果，内称：

中国不欲“吃耳光，陪笑脸”，此为一九三一年后之第一次。中国现已取沉静的决心之态度。……日本已寻常恫吓施诸中国后，今已暂时撤回其“要求”，而毫无所获矣。今谓日本将放弃对中国侵迫之态度，或中国不致续有让步，此实为鲁莽之猜度。但目前至少可言中国已不复加前之抱容忍态度矣。果尔，则此或将为远东事务之一转变点，日本军部领袖至是必将决定彼等是否愿冒险兴戎矣。

（原载《东方杂志》33卷21号）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徬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的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

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土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掠方式的变换，侵掠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他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亡需求统一与纪律，实为不可动摇的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近代国家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的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

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的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战。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

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的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的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抖起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象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则一定会又一次的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的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

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军 委 训 令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于志丹市）

红军在艰苦战斗行动中，不但消减了敌人，而且筹集了经费，大量解决了本身的供给，这是应该赞扬的成绩。但在筹款中，还存在着若干缺点，为使今后各部队在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之下，正确的执行筹款任务，以充裕增长着的抗日战争经费起见，特有如下的指示：

（一）过去有少数部队于筹款时，没有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之下，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甚至不知按照当地特殊的经济情形，细心谨慎地分析阶级，不但错把富农当地主没收了而且侵犯中农与贫农（如环县）。对兼商人的地主，连商店部分的财产，也有意无意的没收了（如定道）。这一类的严格错误，发现不少（现已在陕甘宁正大批的赔偿没收错了的富农中农与贫农），这一类非阶级路线的没收工作，足以妨碍统一战线的迅速开展，今后应严格注意纠正这些错误，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正确的进行筹款工作。对于地主阶级，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而愿意毁家舒难的，也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式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来，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收的范围或者要缩小了一些，但我们可从另一面求得补足，即用帮助抗日战争口号，向富裕阶层进行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使他们自愿输将。我们相信，只要工作做得好，筹款方面，会要比过去取得更多成绩的。

（二）在筹款中，必须顾到我们的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另外如某部在定道筹款，抓到土豪时，召集商界抗日救国会的全体委员（商人），当面拷打，迫使全体委员担保，第二天就追迫担保人代垫罚款，使商人怀疑、恐慌，以致携眷逃跑，这也是非常不好的方式，今后应正确的执行经济政策，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使其安心乐业，一面按照商业与商人情况，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三）红军所到之城市集镇，必须用各种方法使苏票在市面流通，对收受罚款捐款，要欢迎交纳苏票，所筹的现金白军及白区货币，尽可能的集中供给机关，转送后方，以为对外买货之用，但可斟酌情形，以一部分现金，用间接有效的办法，调济市面，使苏票更能巩固而普遍的流通。苏票是苏维埃的本位币，必须设法使之流通，而用直接无条件兑现的办法，使之流通，也会使苏票成为白区货币的附庸，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

（四）过去许多部队在筹款中，常与地方政权形成对立现象；如已成对立政权的地方，筹款仍由红军包办，使地方政权机关不能在没收工作中，发动群众，建立威信，如红军在定道近郊筹款时，不经过当地政府，就决定没收一家地主，地方政府晓得了，如告诉那一家不是地主，但部队的同志，不但不相信，也不重新调查，便进行没收，结果是打错了中农，这一事实，证明仓卒没收在有地方政权之处，而不经过地方政权，常会因忽略而发生错误的，至如某团政治处的同志将土豪代表带往地方政府赎土豪款子中途截收，那更是不好的，以后

凡已成立地方政权的地方，没收工作，由政府执行，但红军部队可派人在各该地方政府帮助工作，所筹之款，驻扎该地的部队，得酌量提取一部或大部分，如此，则部队的筹款收入还是一样，而地方政府的威信却由此建立了，且可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地方干部，培殖了部队离开后的筹款基础。

(五)红军日益扩大，军费的支出也日益加多，因此，财政会计必须统一，以便通盘筹画，集中支配，平衡地保证各部队的给养。过去有些部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与打埋伏的行为，应加纠正，今后规定主力红军由军或师供给部，地方红军由军或师或团供给机关负责，将所筹之款，除酌留自用经费外，多余之款解交总供给部，并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调济，其留下作经费之款，按月报告转账（即照数打领条给上级供给部，作为领到经费，同时将领条交上级作为缴解筹款，取得上级收据为凭），以便在会计上表现其筹款的情况。

(六)在进行没收时，注意搜集物品（如布匹等），以解决物质上的需要，是很重要的工作，过去各部队对这一工作，已得有相当成绩，但有少数部队，将没收的物品，无计划的任意的支配，而不作价转账，如最近某部没收了大批布匹，不缝制棉衣，却把来制成单衣夹衣发给部队了，虽然征集了资材，却表现支配的不适当。以后所没收的物品，应作价转账送后方，作为缴解筹款，其留在部队使用的，应作价转账，既免浪费，又可表现其筹款成绩，于财政收支数目上，才能确实。

总之，各部队应在新的策略与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运用新的方式，以加紧筹款工作，而所筹得之款，则需保证全部用在必须的用途，各级政治部要加紧对筹款工作的教育，培养筹款人材，以增加筹款效能。

至于经费支出方面，除了避免浪费，使分钱尺布用在抗日战争的必需上之外，各部队应正确的建立经常按时的预计算制度，总供给部应培养大批会计人材，分配到各部队，以加强会计工作，在总供给部之下建立审计处，以审核所属机关部队的收支，各部队每月多余经费，应按月退还（即上月余款，应在下月经费内扣回），以便逐月结账。

以上各项，望各部队首长负责督促，并建立经常的检查报告制度，务使充分执行为要。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总政治部主任　杨尚昆
中央财政部部长　林伯渠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一)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三)我们目前的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的，我们的主张同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

(四)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下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对他们的错误，决不放弃批评的自由。对蒋方应指出用内战决不可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争论应付之全国人民的公决。

(五)在对付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种态度最能争取广大抗日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在国民党区域中也便利于我们的活动。

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的身上了。

（二）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发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损害，而且日寇还巩固了它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份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的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它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

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的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赞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五）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坚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它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它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版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员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的领导成份，那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十）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的胜利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是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是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互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仃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仃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仃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方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仃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仃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芳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促，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舰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么？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么？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

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战，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

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未得抗日友军的同意时，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的决定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的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致以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　彪　贺　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穑　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肖　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　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　震　张子意　陈光道　王宏坤　黄　超　谢玉生　陈海松
陈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　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光瑞　周　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　瑞等同启

中共中央及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掠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极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极，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穑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万人同上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依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馀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

周恩来

甲　目前的形势——准备新的更大的战斗的过渡时期

一、日帝的迈进与西北汉奸自治的收买

二、蒋阎新的进攻及其特点

1．军事上（三十团兵力，东北军），经济上（粮食），政治上（做总统）所给予的困难。

2．协攻成为主攻——东北军之不复成为主攻。

3．隔断西北与隔断东北军。

4．不是围剿决战，而只是初步的进攻。

5．蒋阎的矛盾，日帝的压迫与反蒋运动均在开展着。

三、什么是东北军

1．东北军的历史的社会的条件。

2．东北军的现在环境。

3．东北军的教训。

4．东北军的出路——我们应该争取的。

乙　我们的政治任务与战略

一、争取西北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走向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建立。

二、战略任务——争取这一政治任务实现的战略方针，加紧准备的战略方针，而不是进行决战，即在军事上也不应进行决战——不决战也不远跑，而是：

第一，造成了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联系着任务是北通苏蒙，南吸二、四方面军。

第二，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友军。

第三、坚决的陕甘的游击战争。

三、这三种任务，是三位一体的联系着的三大任务，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首先要最广大的动员，以实现西北大联合，以争取对抗日蒋的先机，以实现围攻的下一个更大的战略方针。

丙　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一、悲观失望的右倾估计——丧失前途、逃跑、恐慌、局部、本位……

二、不认识目前是艰苦斗争的准备时期——任务、游击、创造、秘密、公开。

三、最紧张的工作作风——列宁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刻苦、热情、谦虚、科学（计划）、原则性。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遥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　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二）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也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三）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　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　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　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中央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恩来同志：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佑任、黄埔左派二陈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松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际，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的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

（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六）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附〕张学良、杨虎城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

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中略）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之一线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叩文。

（原载《张杨对时局的宣言》《文化周报》1卷6期）

〔附〕上海美商大陆报关于西安事变的社论

又据大陆报载云，西安变乱，举国上下，除疾首痛心而外，更复何言。据路透电称，张学良此次行动，系受其部下所挟持。吾人鉴于张氏自回国以来，与中央真诚合作之关系断之，深觉路透电社所称不无可信。据孔祥熙氏于接见新闻记者称，此次叛变，或由于张氏部下中少数将领，未能尽悉中央政策所致。然历来以反日旗帜为幌子。而为所欲为。已数见不鲜。然人民早已窥见其用心所在。则此次之不为所愚当可断言。证诸最近之两广问题，人民对政府热烈之拥护，当可证斯言之不妄。吾人渴求全国统一，吾人更渴求军事方面之统一。际此危急存亡之秋，及国际形势极度纷乱之际，西安变乱之军事负责官吏，容有不知。若真正之爱国分子，岂容有此种荒谬之行动，削弱国家之地位。中国仍在水深火热之中，幸赖蒋氏个人及国民政府领导之力，渐能去水火而登诸衽席。凡一切倒行逆施。不问其具何理由或出于故意或无心，皆足以危害国家。其自许为救国分子，而行动有背当局所秉持者。若能鉴及此层利害，则愈早愈妙。故吾人不惮费辞。敬向全国大声疾呼者，惟有统一之中国，方能发再容量，而亦惟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吾人自信已渐能接近此项目标。而前进途上，实不生力发生任何新的障碍。张氏分电蒋夫人及孔祥熙氏，担保委座之生命安全，斯则不幸事端中之好兆。然吾人绝不望当局采取急速之步骤，以获得蒋氏之安然返京。截至记者握笔草斯文时，甘肃陕西两省详细情形如何，犹无确报。一切论断，不易着笔。然衡诸东京二二六之政变，其情形当极轻缓，第吾人应深与注意者，厥为企图渔利之辈。全国上下应团结一致应付目前危机。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期内，达于解决。国际间将发生反响。当亦不可避免差幸伦敦方面，传来消息，颇抱鼓励之精神及乐观之空气，而远地各处之观察者，亦颇能持其正确之目光。复据伦敦方面具有观察远东权威之某方称，此次变动，确予中国以恶劣之打击。然绝非致命性质云云。各省政府中央仍贯彻其历来之忠信精神，当无疑义。目前各地如广东广西四川山东河北诸省领袖，已纷纷来电对中央矢诚拥护。京中已举行紧急会议，提出种种对策，应付目前事变。所望于人民者，能绝对信任中央，静待此事之结果，两广问题，结果异常圆满。故吾人虔望此次西北问题，亦得转危为安也。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如下：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氏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见。

（五）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在特赦令之后，仍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退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

（六）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反对日寇及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本党这种主张，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但总是遭到日寇及亲日派所反对。因此，我们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并以此作为造成灭亡中国的“防共协定”的资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奉化蒋介石先生，各省党、政、军首长，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公鉴：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亲日派，均认为千载良机，以"拥蒋"为名，挑拨内战，以遂其灭亡中国之阴谋。当时本党、本政府及全国人民，南京与各省抗日志士，均主张和平解决，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卒因蒋介石先生接受张、杨二先生之抗日主张，张、杨二先生亦均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本党、本政府深庆国内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从以完全实现，红军主力亦准备接受抗日命令，开赴前线，参加抗战。然而日寇及亲日派终不愿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见诸事实，当蒋介石先生一返南京，形势突趋险恶；在日寇援助下，亲日派一面扣留张汉卿先生，一面指挥已奉蒋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军又向西安进攻，企图爆发空前之内战，为日效忠。日寇与亲日派之阴谋毒计，凡属国人，已洞若观火。当此危急关头，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立场，坚决的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今日中国人心之向背，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寇之亲日派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全国人民团体与舆论机关，各武装部队，尤其是蒋先生及当权之国民党诸公与其大多数党员，亟宜一本救国志诚，起而裁制亲日分子，化内战为抗战，此其时矣。临电不胜企祷之至。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的演词——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

宋庆龄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焦灼地注视着它。中国已经被日本的侵略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最后牺牲已经不可避免。日本的挑衅已

使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并且在继续发展中。日本企图占领华北的种种努力是显然失败了。日寇进攻绥远的企图也已经失败，它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它的条件也没有成功。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这在我们的民族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

最不幸的，还有一些政客依然不了解实际形势而害着“恐日”病。他们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力量。这种错误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

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因为第一，它在经济和财政两方面都太脆弱，不能作持久的战争。第二，日本人民本身反对战争。日本人民政治活动的高涨，表示他们对于使日本劳动人民增加重担、沦为赤贫的黩武冒险政策是怎样地忧虑和愤懑。第三，日本兵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最后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国人民本身已决心抗战到底。

如果认为在远东的一般情势如此不利于日本的时候，日本仍能派遣十五至二十师兵力到中国来作战，那就未免荒谬了。日本以这样区区的兵力，永远没有希望达到它的目的的，而事实上日本的工业与后备兵力都不容许它派遣更多的兵力。这小量的兵力分散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不难被数量上占优势、并为自己的生命与国家而作战的中国士兵所粉碎。中国的士兵已经从侵略者手中拯救了绥远，他们一定也会拯救全中国。

胜利将属于谁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政府能够执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他在逝世前曾昭示我们，只有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

改善人民的生活是任何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几年来，铁道和公路建设虽然有一些进展，但人民的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进。

乡村中是一片贫困、疾苦和灾难的景象。我们的农民仍受尚未废除的封建残余势力的搜刮，以及苛捐杂税的痛苦。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城市中的失业问题正影响着劳苦大众。不仅工人的处境十分凄惨，青年知识分子也找不到工作。我们中国的青年虽然受了中等或大学教育，仍不免踯躅街头，得不到运用他们的知识的出路。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在于促进我国的农村建设和工业化。为要进行这项工作，必须遵循先总理遗教。政府必须解除对群众运动的钳制，发扬群众对建设的主动性和热情。只有这样，民生主义才能实现。我们决不能忘记，先总理常常教训我们，发动群众运动是一切工作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只有依照孙中山的遗嘱与遗训，国家建设和农村改进工作才能以高速度向前迈进。

实际上，要群众行动起来，政府必须结束训政时期，尽速召开国民会议，吸收有才能的人，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到政府中来。国民会议能否完成它的任务，全靠一种群众真能参加的选举制度。

为了便利选举，政府应立即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实行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并且把先总理遗嘱中的民主政府真正变为事实。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些个别人士仍然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

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

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人民都不愿打自己的兄弟，他们知道这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

虽然救中国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但是先总理曾指示我们，不要使我们自己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要与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合作。全世界都同情中国的抗日斗争。政府的任务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利用这种同情。

我在这里所说的，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已经去世的总理给我们的指示。我坚决相信如果政府能忠实地遵奉孙中山的遗嘱，并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执行他的三大基本政策，中国就能很快地从内部的骚乱与苦难中解脱出来，并且能获得全世界极大的尊敬。

（转自《为新中国奋斗》1952年版）

〔附〕宋庆龄、冯玉祥等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案

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后，革命阵营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凡属血气之伦，莫不椎心泣血。本党同志，负革命成败民族兴亡之大任，将何以对我总理在天之灵？将何以慰诸先烈不死之英魂？更将何以告数万杀身成仁残手断足之革命将士？吾等受总理付托之重，执行遗嘱，责无旁贷，苟且偷生，常自惭恧。每忆及总理当弥留之际，因关怀革命，泪盈两眶，不肯遽逝，凄惨情形，尤觉不堪卒想。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虽与本党向处敌对地位之中国共产党，亦愿停止危害本党政权之企图，拥护统一抗日，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为此特向三中全会紧急提议，以应付当前非常之困难，党国幸甚。特此提案。此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全体同志

提案人：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　科、鹿钟麟
石　瑛、张知本、石敬亭、李烈钧、朱霁青、梁寒操、经亨颐

（原载1937年4月15日《救国时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一）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国内战争，结果分裂中国，便利于日本之侵略与汉奸之卖国；一是国内和平，结果团结中国，便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对日抗战之实现。

（二）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

（三）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对此任务我们须给予极大努力。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即为执行此种新任务的具体方向。

（四）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条：

（甲）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丙）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丁）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戊）改善人民生活。

（五）如果国民党能够保证实行上列各条，即是说国民党放弃了他们过去的老政策，采取了上述的新政策，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全国形成了，对日抗战就有了基础了。

（六）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

（甲）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

（乙）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丙）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

（丁）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七）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这是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案与去年九月决议案的具体施行步骤之一部分。

（八）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份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

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但在全国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必须没收汉奸分子的土地。

（九）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彻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只能够执行这样的路线。

（十）总之中央的政策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全党的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民族阶级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而斗争。

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

（一九三七年三月）

周　恩　来

绥远局部抗战的胜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转机，都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尝试以严重的打击。十年来中国统治阶级与革命的民众之间的长期战争是停止了，现在正将进入中国政治历史新的一页，即在民主统一的基础上，巩固国内团结，加速准备抗战的一页。根据民主主义的根基，来召集国民大会，则将是这一页新历史的起首。

这一国民大会的召集，应该是国民党放弃一党政治的开始，应该是各省在民主政治下坚固的团结与统一的开始，应该是人民自己起来积极参加政治的开始，应该是各党各派真诚合作一致抗日的开始。国民大会的任务，不仅应该讨论和通过国家的民主宪法，给全民族以真正民主自由的权利，使中华民国真正成为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民主共和国，并且应该选出民主的中央政府，通过抗日的民族统一纲领，发动对日抗战，以代表全民族的统一意志。这样的国民大会，是全国真诚爱国的人民心坎中所希望的。但过去国民政府所颁布所进行选举的国民大会，是无法达到这一任务的。

过去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其代表选举法，显然仍是一党包办的选举，无所谓民主。他已经进行的选举，更是弊病百出，全国舆论甚至国民党内部多不直其所为，至广大的民众，则以悲愤的沉默，表示其反对。

国民党三中全会看到这一僵局，知道徒改会期决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于是授权常委会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惟至今尚未见明文公布。

为使国民政府的修改，不致再失人望，我们特提出下述的修改意见。

在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的原则方面，我们提出三个基本意见。第一，修改的目的，在使此次国民大会真正民主化，以便作此选举法召集的国民大会得以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纲领与发动对日抗战。第二，因国难严重，全国团结之刻不容缓，故国民大会可以而且必须如孙中山先生在十二年的主张，根据孙先生的主张则这次国民大会的代表，不仅应有区域选举的代表，且更重要的还应有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直接选出的代表。因为只有团结各种爱国党派救亡力量于国民大会之中，才能实现抗日的统一，也只有将这些代表与地区的代表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抗日的民主。第三，孙中山先生在其北上宣言中说："于会议（指国民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孙先生这一重视民权自由的原则，应成为今日实行国民大会选举的最高原则。准此，不仅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该修改，而且过去的选举，不论推选决选，应该一律作废，更应该立即实行开放党禁，释放全国政治犯（自然汉奸卖国贼除外），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的完全自由，确认男女平等，废止一切剥削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检查新闻条例等），以保

障人民及各政党团体真能获得“选举之自由及提出议案和宣传讨论之自由”。

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于国民大会组织法与代表选举法，更提出下列的具体意见。

(一)凡年满二十岁的中华民国公民，没有财产、文化、性别、民族、信仰等等限制，不须经过宣誓手续，均应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因为公民宣誓手续，既与信仰自由原则有背，而手续麻烦，尤使受压迫多年之劳苦人民，望而却步，更大违普遍平等的选举原则。年龄限制，亦极不适宜，因中国今日之社会条件，一般年届二十的青年，多已能够而且必须自食其力，多已能够为社会为民族国家谋幸福，其无须自食其力的则又多为大学生，因此，在能力和知识两方面说，已是有当选代表的资格。在剥夺选举权的限制中，关于背叛国民政府的字样，应改为背叛国家，因为民主国家，人民对政府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应许其有宣传讨论的自由，并且还有罢免和改换政府的权利。

(二)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应一律取消指定的办法，由选民自由选举，并实行无记名投票。这一问题很明显的：要抛弃过去一党政治，开放党禁，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就必须根本取消指定或圈定的钦定办法，并且不仅取消国民政府在候选名单中的指定办法，同样要取消国民政府在特种选举中对候选人的指定办法。

(三)代表总额应增加各党各派及学生会的特种选举。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不超过代表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并应估计到其他条件，由各该党依额自行选举。学生会名额应等于全国教育团体的代表名额，其选举资格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为合格。各党派经有直接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理由已如前述，这只是在民主宪法未公布前的办法，其目的原在集中全国有更多政治斗争历史和经验而能代表某一阶级某一部群众的人，来参加制宪，来共同决定民族统一的政治纲领。在各党派资格中的，我们提出有一年以上历史的限制，使过去为抗日为民主革命而奋斗的党，均能与当地的国民党同堂议事，其比例以党员数目为基本条件，并估计到其他的条件如党的历史及人民中的影响等等。代表产生方法，必定由该党自选，决不适宜用指定或聘请办法。孙中山先生在国民会议代表产生上，甚至主张“惟其（指国民会议）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其所指团体，政党是包含在内的。学生会之应有代表参加，孙先生在北上宣言关于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的代表资格上，已列各省学生联合会为九种团体代表之一，实因中国学生自五四运动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先驱，唤起民众的桥梁。而今日中国的学生，自九一八以来，其救亡运动的呼声，更普遍于通都大邑，深入到穷乡僻野，今各界人民团体党派均有直接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而独置学生团体于选举之外，这是团结中的极大缺憾，故必须将学生会加入特种选举，仅将其资格限于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四)推选候选人的手续，应一律改为由各地各团体开选民大会举出自己的推选人，以便其依选举区域或团体联合推选候选人。

选举推选人的办法，本不是直接选举制度，但在今天第一次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中，许多的党及民众团体处在长期的被剥夺自由而现在还没能取得公开的过渡期中可以作为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惟推选人的产生，决不应由固定的乡长、镇长及坊长或团体中下级机关职员来担任，形成行政人员及团体职员的垄断，这是与民主精神不能相容的。而应改为由选民大会根据公意自己举出推选人，然后由这些推选人，依照选区或团体联合推出候选人的名单，各政党在此选区或团体中，也得提出自己的候选名单，以便推选人的参考和选择。这样，选民的意见及选择的自由，政党及团体的提议，均能在这个候选名单中反映出来。当然，这只

是过渡办法，民主宪法公布后的国民大会选举，应该是彻底的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啊！

（五）东北四省的特种选举。应分出一部分代表名额留给现在东北四省奋斗着的革命团体及革命部队直接选举。其在各省的东北四省特种选举亦应废除由国民政府指定候选人的办法，而改由东北四省在各省居留的选民自己举出推选人，以便联合推选候选人。

（六）候选人的名额，照应出代表增加下列倍数，较为适宜：（甲）区域选举增加十倍；（乙）职业选举增加八倍；（丙）特种选举增加五倍。这些倍数的候选名单，即直接提交全体选民用无记名投票选出。

（七）参加职业选举的团体，不论其为合法或不合法，凡在选举法修改公布前成立并确实拥有会员的，应依照其同一职业，联合推选候选人，进行统一选举。照原选举法所规定之职业选举，以依法成立的团体为限，这种限制，只有国民党指导下及所登记的团体，才有职业选举的资格，一切被国民党压迫或封禁的，一切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登记或无从登记的团体，均将被剥夺掉职业选举的权利。这是最不民主最不自由平等的。现在依照开放党禁容许人民自由的基本条件看来，一切被查禁或不许登记的秘密职业团体，只要它不是汉奸卖国贼团体，今天均应容许其公开，容许其联合，容许其参加选举，并于选举中实现各团体内部的真正民主统一与团结一致，形成最下层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着联合的团体共同利益而奋斗。

（八）自由职业选举，应使著作家，文艺家，科学家等团体均分现有代表名额。

中国著作家文艺家在救亡运动中，不论从事著作和文艺的那方面，如文学、音乐、歌曲、戏剧、电影、美术等等，曾经在思想上宣传上尽他的时代先驱的作用，国民大会决不应将他们摈于自由职业的团体选举之外。

（九）军队被选资格，只应限在役军人，不应受其他限制。这是团结全国各武装部队，使之都能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的重要修改。

（十）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应实行特种选举，其代表名额至少应如宁夏、青海选出九人。陕甘宁苏维埃制度取消，实行民主制度后，其所在地区大于宁夏道与青海西宁道之和，其所管县治及人口亦较该两道为多，而政治条件则此边区已有普选制度的完备条件，故提出名额至少九人，实完全合乎实际要求。

（十一）关于选举舞弊及进行贿赂的惩罚，应从严处理。中国自有选举运动以来，几无一次没有舞弊和贿赂的现象发生。这本是封建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现为实现真正民选起见，这一污点必须从这一次国民大会的新的选举中除去。

以上各项，是对国民大会组织法主要的是对其选举法的具体修改，但不是逐条逐句的修改，容或还有未尽之处，但基本上我们已从原则说到具体。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修改，才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之发端，才能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的发动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

——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一　三中全会的意义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虽然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没有明确性具体性，没有坚定的方针，没有批评自己的过去的政策的错误，有许多非常含混的语句，但无论如何它是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

(一)在对内政策上——确定和平统一，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是停止了；对民主方面表示相当的扩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

(二)在对共产党问题上——虽然指责我们，但提出了四个条件，表示可以进行谈判，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原则上是相当接近的，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

(三)在对外政策上——在对日问题上，表示了“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才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比二中全会的“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是进了一步。

在国际问题表示愿意参加到和平阵线方面来，因此使“日德防共协定”在中国失败，而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将获成功。

(四)在行动方面——三中全会后，国民党执行自己的决议虽然非常之迟缓，但亦在开始。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内个别人员的更动，多少是表示对亲日派的不利。对绥远抗战表示援助，如阵亡将士之追悼大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没有再挑起内战的企图，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派财孔赴英，与苏联更接近等等，这些都是说明三中全会后国民党政策的开始转变。

因为国内外形势变动，追得国民党不得不放弃自己政策。同时，国民党政策的开始转变，又影响了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在国内则使内战停止后，团结御侮能更快实现。在国外则更加强和平阵线，而打击侵略阵线；加强太平洋的集体安全制度，而使日德防共协定更形孤立。

二　日本侵略中国的新政策

三中全会前日本在中国问题上遭受很大的失败：（1）进攻绥远的失败。（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日本挑拨内战的计划失败。（3）华北特殊化问题没有成功。（4）拉中国加入日德防共协定没有成功。（5）三中全会的结果更不利于亲日派。（6）英国在中国问题上胜利更促进英日的冲突。

由于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日力量的增加，日本国内冲突的尖锐（阶级与阶级间，政党与政党间），与日德防共协定使日本陷于孤立的状况，英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胜利，苏联与中国的接近。这些原因不能不使日本外交散播和平的烟幕弹。如是有所谓日本外交的新政策。这一新政策一方面想用各种方式来和缓中国的抗日运动，把南京引诱到防共协定中去。另一方面则组织中国内部某些军阀，以反对南京，还想用以华制华的办法，挑起内战。佐藤外交并没有放弃广田的三原则，他只想在新政策的掩盖下，利用时间，巩固在中国已得的地位，拆散中国的团结，而准备新的占领，以达到灭亡中国。

必须在中国人民面前揭露佐藤外交的实质，使他的阴谋无从实现，使中国将告成功的和平统一不为佐藤的阴谋所破坏。

三　争取民主权利是巩固和平与准备抗战的关键

三中全会后，中国形势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内战已经停止，南京已经转向抗日方面来。如果三中全会前一个时期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停止内战，一致对日抗战，那末争取民主权利的实现便是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的工作中心一环是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民主运动的实现。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国内政治，召集国民会议，开放言论自由，开放民众运动。今天的民主运动是为着抗日，同时是在抗日运动上表现出来。

四　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许多的共产党员，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流血和牺牲。因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民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民生主义，是与共产党的主张相容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现在依然赞助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继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精神。

国民党应当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吸收革命的分子进去，排斥亲日的和堕落的分子出去。

五　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

中日矛盾的尖锐化，把国内矛盾降低到次要地位，而中日矛盾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主要的矛盾。因为国内战争应该以适应抗日的大局为原则。因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去反对共同的敌人。

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下，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民主权利，这也是为着增强抗日力量。中共中央主张不分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给三中全会的通电，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及武装推翻南京政府的方针，就是把国内的矛盾服从于中日的主要矛盾，把中华民族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

国内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矛盾，也必须在抗日原则下求得解

决。当中央政权转向于抗日的方面时，地方政权的分裂，客观上将是有利于日本的。

六 揭露中国托派汉奸面具

中国托派在用"左"的空话，而实际上是日本的走狗，托派说三中全会一点转变也没有，托派说中国共产党投降了，托派说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不要抗日运动。他们的这些空话都是证明一个目的，就是他们要执行托洛茨基的指示"不要阻止日本占领中国"——在最近苏联公审拉狭克时，托洛茨基给季诺维也夫的亲笔信上就是这样写着。"托派为日本军部供给苏联的情报"（日本贵族院上的声明）。在西安事变时托派又帮助日本挑拨内战。托派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法西斯蒂的走狗，在中国问题上，则成了日本的走狗。

七 党的基本任务

有人以为和平统一后，我们的事情就好作，恰恰相反，正是和平统一后，我们的事情更多、更复杂、更麻烦而任务更繁重。我们由局部转向全面，由武器的批评转到批评的武器，由秘密的转向公开，由对立的转向合作的，因此我们的任务更加繁重了。

目前党的基本任务：1.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抗日救国的方针，对于民主权利的实现与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要环绕在抗日的问题上。2.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利用批评的武器，善用一切适当的斗争方式，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批评朋友的每一动摇，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3.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每个地区的坚强的独立的干部。4.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的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5.发展党内的民主，提高党员的干部的积极性、自动性、警觉性。6.加强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左倾"，因为这种倾向将使党脱离群众，因为它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左倾"最有效的方法，是揭破反革命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和阴谋。同时在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它表现与另一种政党同化，成为尾巴主义。

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

——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即是要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这些任务的完成，需要全民族的总动员，需要我党全体同志为这些任务而斗争的最大的牺牲精神与坚强意志。

当日寇侵凌，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与十二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新政策的提出，是由于本党首先把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列入了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的第一位，而把其他中国内部的矛盾放在从属的地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就是本党当时动员群众的口号，也就是本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最初目标。稍有常识者均能了解，本党所要建立的不是法国式的或西班牙式的人民阵线，而是中国式的民族阵线，一切说本党企图分裂中国，使中国成为第二西班牙的议论，其造谣中伤的作用，实是非常显然的。

根据于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内部的开始向着抗日救国方向的变化，本党从一九三六年八月即发表了"致国民党书"，提出了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目标。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主张"联蒋抗日"与"国共合作"。九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详尽的说明了这一问题。虽则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不理我们的提议而且继续调动大军向陕甘宁苏区与红军进攻，然而我们毫不动摇的坚持这个基本方针，并且再三声明我们当时的战争，只是自卫战，当此民族存亡关头，我们是坚决不愿同国内军队作战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本党本此方针，调解双方冲突，使内战得以避免，和平获得最后的胜利。本党对于联合全民族一致抗日的忠诚，至此才为全国各界所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的是全中国民族的胜利，也是本党新政策的胜利。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本党新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今年二月十日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即是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而表现的明确的方针。这一宣言证明：中国共产党确是把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当做了它在目前的唯一任务。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责任，共产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当做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最主要的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

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从这个观点出发，本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四项保证，决不能解释为所谓“共产党的投降”。这些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种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与许可的。首先因为这是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必要步骤。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需要全国各党各派间的互相让步与妥协，需要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这是本党两年来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所拥护与赞助的。其次，这种让步与妥协，决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也不是等于对于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创造的有组织的与有高度觉悟的革命力量放弃领导。保持本党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对于本党所创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领导，是本党对国民党让步与妥协的最后限度，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能容许的。最后，这些让步与妥协，不但不是束缚与削弱本党的发展，正是为了要使本党取得全国范围公开活动的机会，千百倍的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以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没有这个条件，民族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同时本党也决不因为今天的让步，而承认过去十年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努力是白费了的或错误的。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取消人民权利，屠杀革命群众，使中华民族暗无天日，使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扫地以尽的情况之下，本党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因为只有这一方针，才把国民党所抛弃的民族与民主革命旗帜高举了起来，才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及中国一切革命先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因为只有这一方针，本党才能继续动员群众，团集革命力量，创造中国革命的新的核心——苏维埃与红军，也只有这一方针，才把中国民族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与战士，保存了并锻炼了他们，才使中国革命的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中央能够继续去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正因为这一方针，所以今天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并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这样深入人心，在群众中发生了深切的信仰与伟大的力量。本党同志过去的牺牲奋斗，决不是徒然的。正是他们的热血与奋斗，创造出了中华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

然而本党决不自骄自傲。在目前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力量的重新结合，使联合全民族的力量成为可能时，使国共两党的合作成为必要时，本党毫不迟疑的向着我们十年斗争的对手，伸出友谊的手，这只是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追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乃至怀念于过去仇恨的报复、而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处处以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三中全会及其最近的实际行动，表示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与国民党爱国分子的压力下面，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了一些善意的愿望，对于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表示，对于国际和平阵线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对于本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并不表示拒绝，虽是这些态度在极端游移动摇、高慢自大、与对本党造谣诬蔑的措辞之下掩盖着。一切这些，证明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开始的转变。这种转变证明本党过去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的估计，及本党年来所采取的联合南京及蒋介石共同抗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一切这些也证明全国人民在本党号召之下，向国民党南京政府逼迫与要求他们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改取新的救亡图存的政策，已开始发生了效力。我们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开始的转变，是表示欢迎的。为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公开声明，象过去大革命时代一样，我们愿意坚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胜利，即对外独立解放的民

族主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民生主义的胜利，同国民党共同奋斗，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国共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得到了人民的信仰，而发动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也曾经因国共分裂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仰，造成了革命的失败。目前则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全国人民与国民党多数党员重复要求国共合作的时候，再行整顿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实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团结全国人民共同为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标而奋斗，乃是完全适合中国革命客观历史行程的光荣事业。

然而应当着重的指出，国民党现时的这种转变，还是非常不够的，非常迟缓与非常含糊的，还不过是在转变的开始。从这种开始转变到彻底的转变，从现在到全国抗战的发动，还需要战胜各种障碍与阻力，动员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到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才能达到目的。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时期，一个需要紧张全党的精神，整齐全党的队伍，以争取抗战发动与胜利的时期。

目前的时局，要求本党全体同志的最大的坚持性，与忍耐性，只有本党全体同志的坚持的工作，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才能争取与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走上最后决心抗战的道路，使全民族的抗战得以发动。胜利是不会自然到来的，空喊也是无用的。然而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彻底转变，以及全民族牺牲一切参加抗战的决心，也不是一天所得达到的。这就要求我党全体同志以最大的忍耐性，同一切急躁症与轻举妄动的倾向作斗争。胜利只能是持久的艰苦工作的结果，而决不是它的开始。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然而是一个持久的战争。

为完成目前阶段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的任务，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中日两国间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认定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坚信这个敌人我们是能够战胜的。但我党同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应该有足够的估计。它不但有着世界最侵略最野蛮德意两大法西斯国家的援助，有着全副武装的侵略军队，而且它经常采取各种麻醉愚弄欺骗与恐吓利诱的不同方法，来达到它灭亡中国的目的。尤其重要的，它善于利用中国的汉奸与亲日派，善于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最毒阴谋。它更会利用世界法西斯主义的警犬的托洛茨基派，来捣乱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些法西斯主义的警犬，今天正在公开的，或秘密的，依靠日本帝国主义，依靠汉奸，依靠中国各种黑暗势力，以至依靠国民党内一部分不觉悟的当权分子，进行着一切违反中国民族利益的肮脏事业。他们在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高举着“剿共”旗帜，赞扬武力解决国内的分歧，破坏国共合作，离间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企图组织中国内部的“防共统一战线”以灭亡中国。

全党同志对于日寇、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的阴谋活动，必须有最高度的警觉性与严密的戒备，对于他们一切挑拨内战、利用国内矛盾、以达到掠夺目的的阴谋诡计，必须坚决揭发，给以致命的打击。不论他们在任何好听的名词之下，不论什么集团，凡足以破坏我们团结内部共赴国难的企图，必须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

当然，除了中日两国主要矛盾之外，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阶级间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而且正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还仅在开始，而且非常迟缓，所以这些矛盾还是有相当的尖锐，我们的任务不是用强力去消灭一切矛盾，这些矛盾是无法消灭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

解决，而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这就是我们解决国内矛盾的尺度。

中央认为国民党开放全国党禁，发展民主运动，在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上说，在适当解决中国内部矛盾上说，都是必要的方法，因为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民众力量乃能发扬，敌人才能战胜。也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中国内部的矛盾才能用民主的方法求得适当的解决，在目前新阶段内，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应该指出：目前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是迫切地为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发动与胜利。也只有为了这一目的，中国的民主运动才能顺利的发展起来，以致走到彻底的胜利。把民主与抗日分开或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也是不会成功的。

应该指出：中国的和平统一，也只有在御侮救亡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而为了巩固和平，并以和平方法取得进一步的统一，又必须经过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自由权利的取得，才能达到目的。民国二十余年的历史，不但证明用内战统一中国的不可能，而且也证明用独裁统一中国的破产。只有吸收广大的人民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的权利，当权的政党与政府才有所依靠，以破除国内封建割据的局面，而取得最后的真正的和平，以抵御外寇的侵略，而取得外力与抗战的胜利。也只有全国人民的参予国家大事，才能使少数野心家独裁专制的企图失其根据，而使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得以产生，并将他放在巩固的基础上。

国内外形势紧急到了极点。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发扬过去十五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抗战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为了唤醒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依照目前的情况，提出能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切身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纲领。并为这些纲领的具体实施而奋斗。这种纲领的具体实施，不但不妨碍争取民族革命胜利的最高利益，而目标是为了这个利益，这些纲领的实施，成为迫切的需要。本党反对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的观点，指出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正是中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但本党认为他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只有这种改善才有助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的开展。

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以最大的政治警觉性，严密的去注意全世界与全中国的政治问题，从狭窄的局部的观点与事务主义中间解放出来。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党同志学习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方法去细心的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提出适当的主张、策略与口号，慎重的正确的解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要记住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这样正确的去领导目前的革命运动，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每一错误常能给革命以损失。大的错误可引到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教训，是我们不能一刻忘记的。为使革命胜利的前进，我党同志，应该了解他们自己所负担的责任之重大，在理论与实际斗争中努力学习，使自己能够胜利的愉快的完成当前的任务。

新的形势更要求我党同志迅速的彻底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

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以适合于目前的新环境。过去的武装斗争的方式，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方式，现在必须转变到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从武器的批评转变到批评的武器，从革命战争转到民主的与合法的运动，从同国民党政府对立转到同他们合作。我们还要使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同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适当配合起来，使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求得辩证的一致。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在旧形式中灌输新内容，旧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这种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的研究学习与创造，今天成为展开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关键。这里，我们要求全党同志很细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去接受每一个教训与经验，肃清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关于领导群众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方式与方法的恶劣传统，同时又必须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只有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方能保持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亦应依照各地的不同环境，采取具体方法使之活跃起来。党内民主性的扩大，自我批评的发展，集中领导的建立，都成为活跃党内生活的主要条件，在党取得半公开以至公开的可能时，这些条件更有充分实现的可能。但不论在何种环境之下，这些条件的实现，决不能违反于党的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决不能使党的铁的纪律有丝毫的松懈。在目前形势下党内铁的纪律，比无论什么时候都重要。同时更应特别注意党内老干部的重新教育与新干部的培养，加倍努力扩大与巩固自己的队伍，到处建立起共产党严肃的与坚固的堡垒。

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工作与模范的行动，去取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华民族的最后解放依靠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

（一九三七年春季）

（一）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与达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我们在统一战线区域内应该成为共同纲领最坚决的执行者，成为民族革命领导的核心。

（二）在统一战线区域，我们只能有一个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个统一战线纲领，应依照各地区不同的环境与群众斗争的情况而使之具体化。过去党的十大基本纲领，目前应该为统一战线纲领所代替。目前力争统一战线纲领的实现，正是为了要在将来能够实现十大基本纲领。但已经实现苏维埃革命的区域，则不改变已成事实。

（三）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变番号，接受统一指挥。但实际上仍应完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使之在统一战线中起模范作用，并成为共产党在全国活动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红军应该在统一战线开展过程中，使之扩大与巩固。在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苏维埃区域将实行同一的民主制度。

（四）共产党在原则上应该参加统一战线的政权机关。在那里的共产党员应该：（甲）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实现而坚决斗争。（乙）坚决的反对汉奸亲日派的阴谋，严厉的镇压他们的反抗。（丙）保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之成为自己依靠的力量。（丁）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并受党的严厉监督。因特殊环境关系，共产党暂时不利于公开时，则共产党员可担任实际工作，不争名义。

（五）对统一战线区域内的旧政权，不是采取敌对的、摧毁的斗争方式，而应该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办法，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压力，使之改造。把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进步的与革命的分子，来代替汉奸、卖国贼、贪官、污吏。但党应该有系统的使当地的实际权力操纵于当地群众的抗日救国会的手里。只有这样自下而上的压力，才能发生实际的效果。

（六）应坚决用抗日救国的名义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参加到一切有群众的团体中去，争取其中的领导。抗日救国的团体，同时应该为群众生活的改善与民主权利的实现而斗争。民众斗争与阶级斗争的适当联系，是使抗日救国运动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的主要关键。这里应该防止过早的、偏狭的关门主义，及牺牲群众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

（七）有系统的加强在城市工人中的工作，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的统一战线，实行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组织的统一。培养大批的工人干部，创立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建立党在主要企业中的堡垒。武装工人群众，有计划的派遣工人积极分子及工人武装队，到农村中去、军队中去，以加强无产阶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八）应坚决组织可靠的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武装及争取现存的武装（如抗日军民团等）在党及可靠的抗日派领导之下，派遣最可靠的、有能力的干部到那里去，在那里公开的

组织抗日军人团体及秘密的党的支部。用一切方法改造旧军队，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抗日的军队。对于不可靠的武装力量，应有严密的戒备，并设法改造之。

（九）应该吸收一切抗日力量到斗争中来，就是暂时的一天半天的同盟者都不放弃。对动摇不坚定的同盟者，应与之进行斗争。斗争的方式，可以从解释、劝告、批评、一直到公开揭破、群众的威逼与打击，对于公开反对与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分子，在斗争无效之后，应以汉奸卖国贼处理。这种斗争，应依靠在群众斗争开展的基础上，并应根据于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不然反会使自己陷于孤立。

（十）对各党各派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联合民族革命的左派（抗日派），争取中派（妥协派），打击亲日派。只有左派的力量愈是巩固强大，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愈是坚决大胆，同中派动摇不彻底愈是能够使用批评的武器，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愈是明确坚持与愈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则中派愈是向左摇摆，而最后转到抗日方面来。但在任何时候，切勿放弃对中派的警戒，严密注意它在每一转变关头的动摇叛变的企图，及破坏我们对左派的巩固团结的阴谋，使它在叛变成为不可避免时处于孤立的地位。各党各派的矛盾，应利用来推动抗日运动的前进，提高党的领导地位。党在某一派别、某一人物的掩护之下创造实力时，这个实力应该保障在党的领导之下。

（十一）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下，应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不放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共产党坚决为统一战线的纲领而斗争，决不同其他党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的组织中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实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

（十二）共产党的组织，目前仍应是秘密的。共产党员都应在抗日救国团体与组织中公开活动，在里面起核心作用。应指定一定的共产党员，完全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他们应该受当地秘密领导机关的指示。

（十三）共产党在现时更要保障党的纯洁一致，要加紧进行有系统的征收党员的工作。但同时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只吸收经过考查的工人、农民及学生入党。其他各阶层与各派别的个别先进分子要求入党时，则必须得中央及各地区的中央局与中央分局的批准。创造党内工人的骨干，教育老党员与新党员，使之能在新的环境下，活泼的、大胆的独立工作，是目前迫切的任务。

（十四）采取一切方法，取得世界和平阵线各国的援助，同人民阵线的国家、同苏联建立亲密的合作。善于利用各帝国主义间的一切矛盾，以加强抗日的力量。

（原编者按：这个文件是由中央发给各地作参考的，其发出日期未能查出，但大体上当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间。）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

（一九三六年四月）

KV（刘　少　奇）

一、中心城市与大产业中心，是反革命的支撑点，反革命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在这些地方，对于革命的防护也最严密，同时我党在这些中心城市与产业中的工作基础及组织基础又十分薄弱。所以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蓄积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胜负的时候，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

二、为着要蓄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只有这些组织和工作能够保存与巩固起来的时候，才能从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去扩大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我党的秘密工作。要使我们每次建立起来的组织和工作，不致于有任何的浪费，并使他们能够防御敌人的袭击，然后我们才能蓄积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

三、当着我们仅在某些几个工厂企业中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并能实际指挥这些工厂之工人大多数时，那么我们在这些工厂的工作任务应该是：(一)把组织更加巩固起来，培养与训练大批的工人干部和领袖；(二)去开辟其他工厂的工作和组织，派干部到其他工厂去；(三)分派积极的工人到农村中去，参加游击队、义勇军等；(四）参加一般的公开的社会活动。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在这些工厂中的堡垒保存与巩固起来，以便在这些基础上去开展我们的工作，避免单独的和敌人作战，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为着要争取群众，创立和蓄积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领导这些斗争从争取胜利(既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当在某种相当的条件下，"适可而止"的暂时停止战斗。为着争取群众斗争的胜利，对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完全拒绝（在原则上我们当然反对仲裁)，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以争取工人具体要求之实现，并使我们更能公开的指导群众斗争。

五、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是用了一切条文来反对工人阶级与束缚工人群众的斗争；但这个法律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用以欺骗工人阶级的；因此就不得不在这个法律上规定了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如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罢工，规定了比现在较少的十小时工作时间，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及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的抚恤、救

济等)。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所规定的利益，并就此可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才实际有益于我们，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如果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仅持"绝对反对"的态度，只在工人群众中去解说"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这样绝对的口号（这样的口号要在暴动胜利后才能实现)，那是等于一事不作，那是完全空洞的反列宁主义的关门主义（几年来反对工厂法的经验是如此)。

我们要一个工会法、工厂法，工会法工厂法上某些条文规定了工人阶级对于现状改善的那些好处，我们是马上要实现的，但这些利益规定得太少了，我们反对，那些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条文，我们反对，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所应采取的态度，苏维埃劳动法，在白区城市中目前仅仅是宣传煽动的文件。

六、不独是工厂法工会法我们应该利用，就是国民党的其他许多在工人中进行的运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纪念节的运动、以至儿童节的运动、植树运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利用这些运动，一方面使得国民党和资本家，更难反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使我们更能得到公开的地位，来领导工人的斗争，便易于使工人的要求和斗争得到胜利。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户，设澡堂，发新衣等得到胜利，就是很好的教训。因为他们不是采取关门主义，简单的绝对反对新生活运动的策略。

七、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的组织工人群众。在有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的同志和所领导的工人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一切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斗争。就是现在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我们就是仅仅只能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而能去进行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利用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灰色的名义，来公开的广泛的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青红邦、劝戒烟酒会（在里）以及其他旧色的新色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组织任务，过去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

在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如果情形允许的话，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立案)，能够允许我们在这些工人中，公开的成立新的工会，那么这种公开组织工会之可能的机会，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既然做这件事是极不痛快的，要受国民党各种严格的束缚（如呈请立案，国民党派指导员来，干涉工会的选举，圈定名单等)，但即使是在这种严格束缚的条件下，只有我们还能够借此公开去组织工人群众时，我们是必须要去利用的。我们不能害怕与拒绝去作这种不痛快的事，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在各厂各业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公开组织工会。如果国民党允许我们这样把一些工会组织起来很好；如果这样做国民党也不允许我们成立工会，那么我们就有事实宣布国民党工会法是骗人的。我们反对合法主义，但有些工作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去作的，我们为什么不去作？不去利用呢？

这种公开组织工人群众公开组织工会的策略，过去有人指责说："这是第三种工会"，机会主义的路线，这种指责是错误的。黄色工会的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我们都要去用力争取，为什么我们在某种条件之下，能够组织一个我们领导的工会，又不去组织呢？只有十足的关门主义，才放弃这种可能不去利用。如果我们要在赤色工会的全部纲领

被承认的条件之下才去组织工会，那只有在暴动胜利之后，这个纲领才有全部被承认与公开的可能，那在暴动之前，我们只有甘心满足于那种狭小的秘密工会的组织。

八、在黄色工会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形成与巩固革命反对派的阵地，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和位置，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上级、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如果在黄色工会中我们的工作得了全部的胜利（群众与领导机关都到了我们手里），我们亦不应该立即将这个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因为这是不存在的），应保持表面上的黄色工会的原状（如开会等仍应通知国民党，允许他派人来参加，工人要求亦可通知国民党，要他实现工人的要求）。尽力巩固我们所得的胜利，实现工人更多的利益，培养大批干部，只有到暴动之时，我们不需要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才公开转变为赤色工会。

九、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进行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货、参加抗日战争义勇军等）。我们要在一切工人中努力宣传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主张，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一切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起抗日救国，呼请全国各军队的军官士兵立即停止进攻红军、苏区等的内战，并联合一致去抗日，组织全国一致的抗日反卖国贼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要在各城市中设法联合一切工人的团体与各工厂工人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军。在武装抗日民族革命的战争的口号下，努力在工人中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动员工人到农村中去领导与组织农民抗日游击战争，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参加抗日反卖国贼的战争，特别要动员工人全部的向国民党的军队去进行活动（利用各人的亲戚朋友等关系），去组织和影响国民党的军队进行抗日战争，拒绝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尽可能派工人到军队中去服务，在军队中组织反日会、不参加内战同盟等。

在罢工委员会、反日会等组织中，过去我们排挤和打击可能和我们合作的各派工人的领袖是不对的，我们应在一定的纲领之下，诚意的和他们合作，提拔他们，鼓励他们，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与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立场上去领导群众斗争。对于他们的错误应采取善意态度批评。只有对于阶级中的汉奸分子，我们才应该坚决的驱逐。

十、要特别注意保存我们在群众中企业中的干部和领袖，党在工厂中的支部，不应该使全部同志都去公开领导斗争及进行公开的活动。一个同志一个同情者在公开领导一次至二次斗争之后，第三次斗争必须换人来领导，不能再要这个同志来领导了。而这个同志就仅在对于斗争同情的态度上来一般的参加斗争，就在群众中把这个领袖保存起来。这样我们可以在群众中保存许多领袖。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出许多新的领袖来。

十一、我们的许多同志在长期狭隘的秘密条件下工作惯了，现在要他们到广大群众中去，公开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要在复杂的环境下去对付狡猾的国民党、黄色工会领袖及各种反革命的派别，那自然可能发生许多错误，甚至要受他们的影响、欺骗、愚弄、威吓以至收买，而发生动摇，投降以至叛变。但我们决不应该害怕同志发生这些错误，而重复把我们自己关在秘密的房子中，只要让我们的同志到广大群众中去，到十分复杂的环境与斗争中去锻炼，只有这样才能锻炼出真正能干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领袖。

我们要加紧教育我们同志，不论在任何复杂变化的环境下，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纲领，我们与各派的工人合作，任何时候，我们在主观上是不放弃这些纲领的。虽然这些纲领，在白色恐怖下，是没有可能全部实现的，但只要一有机会与可能，我们就一分钟也不忘记，要部份的实现这些纲领。尽可能使工人中的要求接近我们的基本纲领，

我们与各派工人的合作，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去接受各派的纲领。相反，而是努力宣传我们的纲领去影响同盟者，无论任何时候，要保持我们行动的自由。对于同盟者的动摇、叛变与投降，要使用批评的武器，要不断的在下层群众中去进行工作，在群众中不断加强我们的组织和影响。同时党的政治纪律与警觉性，应更加提高起来，这样我们能够克服各种右倾的错误。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

刘 少 奇

□□兄：

前一星期写给你三封信，想你已收到了。这是第四封信，我想一般的说说过去的问题。从□兄来和我谈了以后，我觉得更有和你说说的必要。

问题这样的提出：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力量，准备暴动。六次大会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任务我们完成没有？十年来我们的成功在那里？失败在那里？

我们十年来的艰苦工作，有成功。我们组织了、领导了伟大的苏维埃运动，在广大区域内，没收分配土地，创立了强有力的红军。这个运动在去年以前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力量还是强大的存在着。此外党的理论水平提高了。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有进步。去年以来，党又有效的进行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这些是我们的成功。但是一般说来，从六次大会起，直至前年十二月转变时止，我们是没有完成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的。在白区，在城市，在工人中，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不独力量与暴动没有准备好，而且我们在组织上大大的削弱了。数十万党员牺牲了，还有数万人被国民党监禁着。

我们要问：为什么没有完成六次大会给我们的任务？主观、客观的原因在那里？

关于过去苏区工作的经验，遵义会议已有初步的结论，我现在不说了。现在我只就全国范围内的白区工作来说。有人认为过去的白区工作是失败了。我虽然批评了这种说法，但过细想想，我们过去在白区的工作，如果不是失败又是什么呢？我们白区工作的成功实在太少。

我们白区工作削弱的原因，客观上固然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的白色恐怖，然而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在主观上的错误。我现在要说的也正就是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因为这种错误是起始于十年以前，所以我现在也不能不从十年前说起。不过我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只能全凭记忆来说。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重要的会议，坚决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发动了全党的思想斗争。但我认为"八七"会议同时有下列的错误与缺点：(一)开始了"左"倾盲动主义；(二)开始了党内斗争的错误方法。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右倾的陈独秀主义。但是在失败前，在群众运动中，还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八七"会议反对了过去的右倾机会主

义，但是批准了过去的“左”倾错误，不独在理论上批准了，而且在组织上提拔了大批过去犯“左”倾错误的人。这就是“八七”会议后“左”倾盲动主义的历史根源。“八七”会议不是在两条战线上斗争。

“八七”会议及其以后，应该开展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斗争。但这是中国党第一次思想斗争，党的幼稚与理论水平的低下，都只能使我们更多的采用教育与说服的方法去进行斗争。而当时却采用了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意的打击许多同志，大批的惩办同志。这就助长了党内的派别斗争，引起了严重的无原则斗争，损伤了党。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吃过酒的人，头一次就吃一瓶白兰地，要损伤他的健康一样。俗话说是火力太强，过火。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李维汉的盲动主义与错误的思想斗争方法，结果是削弱了党的力量。

六次大会是正确的。它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又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反对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等。但六次大会是否还有缺点呢？我认为有下列缺点：(一)对盲动主义的批评和反对还不够，因为当时全党大多数所犯的错误，是“左”的盲动主义，但六次大会对这方面的打击还不够。这就成为后来立三路线的根源，(二)没有从政治上着重的提出，使党确定的转变成为秘密党。大会简直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本来由一个公开党转变成为秘密党、是一个最大而最烦难、最艰苦的任务。共产国际警告西欧各国党准备转变为秘密党时，是如何着重的三令五申的提出来，而我们从来就没有那样着重提出来过，这就使我们十年来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上，犯了一贯的严重错误。许多地方，我们党的组织几乎是长期被敌人摧毁了。(三)没有长期艰苦工作的准备。六次大会到现在是九年了。很明白的，当时是没有人想到会有九年的反动时期，而准备长期的秘密工作。“新的革命高潮不是遥远无期的”，“新的高潮的征象已经看见了”，这些话在当时说并非不对，但这也成为后来立三路线暴动政策的一个根据，急性病冒险主义的一个根源。同志们以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就没有长期艰苦工作的准备和打算了。

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央，立三路线所执行的政策，是违反六次大会决议的。没有去准备力量，聚积与增强力量，而是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这在四中全会有了结论。

四中全会反对了立三路线，是对的。但四中全会是否还有缺点呢？我认为有下列缺点：

(一)反对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异常不够。这就使实际工作（党与群众工作）中的立三路线长期继续着，直到最近。本来立三路线是继续“八七”会议后的盲动主义而来，在党内已种下深刻的影响，在当时几乎大多数的罢工、示威和纪念节的工作中都执行着，在极大多数的文件、宣言、传单以至群众的要求条件上都表现着。这些是立三路线的最重要部分。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三路线的理论——半托洛茨基主义，是立三在十一号决议的前后才提出来，不久就受到共产国际的指斥，在党内的影响还很微弱，清除它的影响还很容易。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反对了清除了立三路线的后一部分。完成这部分虽然是极重要，但比较易为的任务。而对于立三路线的前一部分，纠正他是极困难的任务，则只有很少的纠正甚至没有反对，后来还继续。这是四中全会的严重缺点。当我在莫斯科和后来回国时，都屡次提出过这一点。

(二)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同样没有足够着重的提出秘密工作问题，并将这个问题解决。

(三)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内斗争的方式，同样有错误，过火的与宗派主义的错误。许

多干部，特别是旧干部的被讥讽、被打击、是不对的。同时四中全会本来是反对“左”倾，但后来反对“左”倾的斗争不久就停止了，反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主要的错误还是“左”倾，结果我们放过了“左”倾。

因为四中全会有上列缺点，结果帮助了托派与右派。他们正拿着这些缺点向党进攻，进行破坏。

十二月决议的缺点与错误，在九月十五日的决议上已说过了，都是对的。但我们认为还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还是没有足够着重的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联系问题提出来；（二）对于白区工作中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的传统，毫无批评。以上两个缺点，在九月十五日决议上还是存在着，没有能完全补救。这就使白区工作的转变缺少根据。尤其是关于过去传统的转变。

因此，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有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策略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

从上述事实来看，“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十年来虽然经过许多变动，但在本质上是毫无变动的一直传遗到现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贯的。十年来是一贯的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成了一种传统，我从“八七”会议以来就是一贯怀疑与企图反对这种传统的。

* * *

我们现在需要来估计一下的，是四中全会以后至十二月决议以前这一个期间中央在白区的工作。

四中全会以后，国际给了中国三位一体的任务：建立苏维埃政府，加强红军，领导白区群众运动。这个任务中央是忠实执行了的。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红军加强巩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区的工作有一个大的改进。这是中央最大的成绩。正因为有这些成绩，所以在四次、五次“围剿”中能够和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并能够长征，一直到现在还保有强大的力量。因此，不能说中央在苏区的工作在总的方面是错了。如果在苏区的工作在四中全会以后没有这一个大的改进，那根本就不能与国民党作长期的斗争，不能长征，不能在现在还保有这样大的力量。但中央在苏区工作上，也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在群众工作上、在党内斗争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因此，使得红军与苏区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应该指出的是，四中全会后国际对苏区工作的一大批决议，我们是执行了的，虽然我们在执行中又犯了许多错误。

但是仅仅苏区工作，还不能说明中央的领导。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而中央在白区的工作就没有重要的成绩可说。因此，我们必须还得整个检查中央的领导。

我们从“九一八”事变说起。“九一八”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一个极重要的步骤。头一口就吞下满洲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但当时中央是怎样分析“九一八”事变呢？我们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革命。这是当时特别强调的两点。因此，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拥护苏联，拥护中国革命，反而把日本殖民地化满洲与中国不提，或不着重提，拥护中国领土主权不着重提。这样就使我们一方面很难领导

"九一八"后广大的反日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作宣传。日本帝国主义自己说，我占领满洲是要进攻苏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占领了大于日本七倍的土地"（日本代表在国联演说）。由中央的上述分析，自己就发展成为泽民同志的观点：认为以后红军作战的对象已经是日本的军队了，国民党只是偏师。

"九一八"以后，全国的客观形势急转直下，有利于革命。革命的形势，很快到来。在当时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国防政府，是可能的，当时江西的红军粉碎了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将陈调元等打得"片甲不留"，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到南京，捣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上海群众捣毁市党部等，组织法庭审判市长、公安局长、满洲马占山正在抗战，全国各地捣毁国民党，王正廷辞职，蒋介石下野出洋，孙科、陈铭枢等上台，声言要与共产党红军妥协，后来南京政府迁都洛阳，这一个客观的革命形势，虽然还有大的弱点，但是具备的。群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统治的蒋介石投降日本的一派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许多在野的派别和军队，同情推翻南京原来的统治者，或者中立动摇。大家都提出政权的问题，国防政府已被人家提出。在这时候，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我们和反蒋各派进行统一战线，联合与推动十九路军，提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正确的组织群众的进攻，红军采取配合行动，是可能使蒋介石不能回来复辟，并组织国防政府，领导对日作战的。

可惜当时这样好的形势，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统一战线的要求与提议，完全孤立，学究式的在讨论"民众政权，国防政府，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等口号。这样的形势毫不自觉的就放过了。不久，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下联合改组派复辟了，抗日运动、上海"一二八"战争受到镇压与破坏，蒋介石又重新组织对鄂豫皖红军的进攻。而蒋介石就在反共的口号下，进行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维持他的政权到现在。

本来在鄂豫皖的红军离开鄂豫皖以后，蒋介石组织四次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决战，全国抗日运动受到打击，在这时推翻南京蒋介石政府的可能，是暂时过去了的。但这时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到了。国际说中国有直接革命形势（是根据"一二八"时的形势说的），然后我们就很原则的照着说，中国存在着革命形势。而且不大加思索的照着说了好几年。

在"九一八"后，统一战线、抗日反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就应该采取的。但当时我们没有采取。国际送来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我们没有了解，没有在实际上坚持的去作，我们只是长期的把它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各派的武器。

在"一二八"前，政权的问题已经成了当时群众中实际的问题。应该用抗日的国防政府的口号，去对抗南京蒋介石的卖国政权。然而我们拒绝了国防政府的口号。在当时，国防政府的性质是什么？它不是当时南京的卖国政权，也不是苏维埃政权，而是各党派联合的抗日民众政权。这是当时广大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所以它应成为我们当时革命的主要口号。然而我们当时否认这种政权。我们所提出的是：或者是苏维埃政权，或者是南京的卖国政权。在这两个政权中间不能有什么别的，即是只有两个政权的对立，再没有另外一种政权能够和南京卖国政权对立。很明白，这就不能满足广大的群众的要求；广大群众是反对南京卖国政府的，但也还不愿意即时就来一个苏维埃政权。

我不说当时两个政权的对立不是事实，或者不需要。当时以及后来两个政权的对立，是事实，是需要，是特点。这并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我们忽视了当时广大的群众还站在这两个对立政权的中间，他们要求另一个民主的、抗日的政权去代替南京卖国政权，他们不满足于

两个政权的对立，而要求用抗日的、民主的政权去消灭南京卖国政权。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提出国防政府去代替南京卖国政权的口号。我们只提出两个政权的对立——当然不满足与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这在事实上就帮助了蒋介石政权的维持，帮助了蒋介石反共阵线的建立。

当时应该采用抗日国防政府的口号，动员群众，团结反蒋各派向南京卖国的中央政府进攻。但当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争取革命在湘鄂赣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指挥红军向湘鄂赣城市进攻，这在当时是不够的。这就放过了南京中央政府，使全国白区的群众和同志只望着湘鄂赣的红军，只动员群众去拥护与配合红军的进攻，而忘记了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去准备推翻南京卖国的中央政府。在当时不承认国防政府，动员群众去直接拥护与响应红军，表现是“左”的。但实际上只承认革命在湘鄂赣等省有胜利的可能，而不承认有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有推翻南京卖国政府的可能，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白区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对于马占山的抗战，对于“一二八”上海抗战，我们的估计与策略也是错的。

在“九一八”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过阶级矛盾，我们此时即应强调民族矛盾，但我们还是照过去一样强调阶级矛盾。

对于福建事变，对于人民政府，我们的估计又有错误。我们还是不承认如福建人民政府那样的政权（不是苏维埃也不是南京卖国政权），可以对抗和代替南京卖国政权，因此，我们的策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们既采取了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对反对南京政府的军阀战争就不应反对，且应利用，以便共同推翻蒋介石。但我们不利用，也不对。

到了西南事变与西安事变之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了重大的变动。日本要并吞中国本部，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动摇，企图改变过去一贯的卖国政策。在此时，国内革命战争是要便利日本灭亡中国的。所以，此时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应当停止。此时即应反对军阀战争。但我们在西南事变中还是采取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同情西南。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

从我们应付上述各种事变的情形来看，发现我们应付事变的能力还很差，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很少，我们的创造力、实事求是的本事还很弱。我们在每一个重要大事变的关头，都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给我们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已不够了。但我们没有新的建设，提出新的任务。

* * *

要估计我们过去白区的工作，说出了上述的事实还不够。必须还得着重的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

总的说来，六次大会是要我们准备力量准备暴动。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白区同样没有把六次大会这一个决定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我们忘记了这个目标，而以直接响应红军，作为白区群众工作与群众斗争的目标。国际说：“白区每一个经济罢工，都是对于红军最好的帮助。”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这一句话。我们总是忽视经济斗争。因为我们没有把准备与聚积力量作为白区一切工作的目标，如果我们在千百件行动与斗争中，没有加强我们的力量，而且大大损害与削弱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毫不警觉。我们的领导者还认为那是“对的”，因为

他们在行动中提出了直接响应红军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在这一点上说，我们在四中全会后，是没有执行六次大会重要决定的。在红军中"保存有生力量"，"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这是六次大会的方针，执行了，红军的力量越斗争越增加。但在白区，在全党，在一切工作中没有执行这样的方针，所以越斗争群众与党的力量越弱。这又对于党的威信和影响不好。稍为稳重的人离开我们，斗争中受了打击的人抱怨我们，坏分子就叛党、反党。

此外，盲动主义与立三路线的传统，还具体的表现在下列几个问题上：

(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关系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从"八七"会议以来直到现在犯了一贯的错误。开始，我们一贯的不重视这个问题。本来白色恐怖那样残酷，如果我们不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不使每一个同志很好的了解与运用这种联系，那我们就绝不能很好的工作，绝不能准备革命——甚至不能使党生存。正确解决这个问题，是在白区准备革命的前提条件，然而我们从来没有着重的提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绝大的政治错误。

我们在秘密工作上，犯了一贯的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我们常有意的用"怕死"、"害怕"等说话去批评同志。打击同志——竭力提倡同志的冒险精神、甚至夸奖。我们否认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认利用合法为右倾，为合法主义。

本来我们党的工作和纲领，一部分是能由公开的合法的团体和刊物来提出与执行的．那我们就应尽可能的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另外一部分不能由公开合法的方法来进行，那我们就秘密非法的来进行。但这是出于不得已，并非我们高兴如此作。因此，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完全分开，完全采取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由不同的干部来作，同时又使二者联系起来，配合为党的整个工作。我们的错误．就在于取消一切公开工作，能够合法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来作；在于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群众工作方式重复党的工作方式，公开工作的干部同时担负秘密机关工作。结果我们就完全没有公开工作，秘密机关就膨涨得骇人的庞大。这就帮助了侦探，群众工作和党均被破坏。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受的损害，是不可计算的。

过去我们说要把一切公开的群众附属组织，通通转变成为赤色工会，实际就是把一切公开团体转变成为秘密团体。群众不赞成转变，就不能不强迫，破坏民主原则。

立三说要争取公开，实际就是把不能公开进行的事情，扮蛮去公开进行。那完全是冒险，如占领会场、占领讲坛、占领马路等。

又有人说：不要去将就公开环境而降低党的纲领与口号。这句话完全用错了。就在这句话上，要同志强迫的将党的全部纲领与基本口号，完全搬在公开群众团体的宣言、纲领、传单和要求上，结果就使这个团体变成第二党。列宁"不为公开而降低党的纲领"的说话，是就整个党来说的，完全对。但我们的列宁主义者把这句话用在公开工作上，要公开的群众团体去全部提出党的纲领，完全错。中国党已经是秘密党，所以这句话完全不应提出。中国党没有合法主义，因为整个党是非法的。

一九二八年我就提出上面的问题，和许多同志争论了几星期，结果受批评、打击、撤职。一九三〇年在莫斯科又全部提出了上面的问题，结果也是受批评，仅仅在决议上采纳了一句"工会工作方式不要重复党的工作方式"。一九三一年提出公开组织群众工会，结果闹成"第三种工会"完功。十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一贯的，牺牲也是最痛心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正，还是多次的重复。

(二)关于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为聚积群众的力量，就要必须领导群众斗争。但在准备

革命的时期，发动群众斗争的目的，在于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觉悟，而不是马上向统治阶级实行革命的进攻与决斗，而是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与决斗。但我们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开始就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常常是为纪念节而罢工游行，或为直接拥护红军而罢工游行，虽然在这些罢工游行中，严重的损失了我们的力量也不顾惜。我们常常忽视经济斗争，不忠实为达到群众的经济要求而斗争。我们常常以"发动斗争"为满足，而不管斗争的胜败、结果及其影响的如何。我们常常是无条件的、无目的的坚持斗争到底，即使形势极不利，还要坚持。我们总不知道而且不许说，选择有利时机暂时结束战争。我们有套机械的观念——小斗争发展成大斗争，大斗争发展成为暴动；机械的要将每一个斗争提到最高的阶段。我们不准备斗争，不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只要是纪念节，只要主观上能够发动，我们就无条件的要发动斗争，否则就是"阻止斗争"。我们常常提出过高的要求，把政治要求机械的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我们在斗争中完全不进行统一战线，要故意的反对一切。我们故意鄙弃一切合法的斗争手段；本来有许多斗争是可以合法来进行的，而我们故意要非法的秘密进行。我们在斗争中总是不估计当时、当地力量的对比，来决定斗争的策略与方式，我们只是盲目的要"斗争！斗争！"或者空洞的分析世界形势、全国形势，而毫无联系的结论到某个工厂的罢工应当发动、应该坚持。我们在很多时候，整年的是为纪念节日而工作。这一切错误的结果，不管成败利钝，只管斗争的结果，使我们就常失败，甚至悲惨的失败。力量的聚积当然就绝不可能。

上述错误，我也从一九二八年起在上海、在莫斯科、在四中全会之前及后，都严重的、系统的提出来批评过。但结果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都是"对的"。决心继续下去，一直到现在。自然这种错误也是一贯的。还要用大力才能纠正。

在革命的传统与我们的工作上来说，北方是比南方落后些的。但我们否认这些落后。在反对"北方落后论"的斗争中，在河北、山东的平原暴动，使我们有重大的损失。

（三）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问题。我们在宣传工作上的虚浮、夸大、形式、刻板，也是一贯的，至今还未纠正过来。我们常使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分别不清，使公开的宣传工作与秘密的宣传工作分别不清，使对外的宣传工作与对内的教育工作分别不清。我们常常在刊物上不自觉的向敌人告密。我们常常不估计宣传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常常是烦琐，把谩骂当作战斗。这一切东西在白区还继续着。

（四）关于党内问题。过去在思想斗争中有许多错误，夸大右倾机会主义。甚至从沙子里面去淘出右倾来反对，代人造成右倾的系统，而忽视了对于"左"倾的反对。在思想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一贯是过火的。甚至以思想斗争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不采用教育与说服去推动工作。在斗争中带着了浓厚的宗派主义成份和成见。党内相互平心讨论的自由，可以说完全没有。党内一有不同的新奇的意见提出，就恐慌，就召集会议来斗争。领导机关工作的民主精神很差；每个党员与干部都在党内应有的权利，常常不被尊重；官僚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还严重存在。秘密机关工作人员本绝对不应随便调动，但我们提拔过多的新干部到秘密机关，人员流动极大，而公开群众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有也弄坏了。党内的机关和官衔实在太多。

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一贯存在着。本来秘密领导机关的任务，是帮助公开群众工作的同志工作。这种帮助，顶好经常用说明、用提议去实现，如国际对我们指示的方式，只有必要时才用"指示"、"命令"、"决议"等。就是对下级也最好经常用提议。但我们是用"命令"、

“指示”、“决议”等解决一切，即使最小的事。这就削弱同志的自动性与领导机关的威信。

党的纪律是必要的，但一切问题最好不用纪律与组织手段来解决，只在必要时、不得已时才使用一下。一切问题最好在政治上、原则上取得一致来解决，而不去使用纪律与组织手段。但我们相反，我们常常用纪律与组织手段去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是极小的技术问题。这就成为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这就使下面一切都要等待上级指示与命令，自动性与责任心缩到极小。上面没有命令与指示，下面就不动，上面有指示与命令下面就照办。在党内，我们没有使同志和干部更活泼，自动性更发扬。相反，我们造成了同志中一般的不活泼、怕说话、怕错误、怕负责的现象。

*　　　　*　　　　*

上述四个问题的错误，我认为是立三路线的传统，“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四中全会后在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这种错误当然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做事有了原则就够，是不必实事求是的。比如“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原则上并不错。但一拿到中国来实事求是的使用，那就“拥护苏联”的口号，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而“反对帝国主义”口号，能够动员广大群众。那我们应该用反对帝国主义口号去动员群众，而不要用拥苏口号去动员群众了，因为反帝即所以拥苏。然而我们硬要将拥苏的口号摆在前面最主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又责骂自己忽视反帝运动，这难道不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又如罢工要坚持到底，原则上并不错误，但在某些具体罢工中坚持到底是错的。然而我们常常只管原则，不去实事求是。

纪念节应罢工、游行、示威，原则上并不错，但在某个具体纪念节形势如果不好，群众动员不够，敌人准备了流血镇压，还要罢工、游行、示威就错了。但有人认为不必要估计当时形势，罢工、游行就得了。

决定一个工厂的罢工应否发动，应否坚持，主要要从本工厂本地方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世界形势、全国形势虽如何好，但常常不能决定这个工厂的罢工应否发动与坚持。而我们常常从世界形势、全国形势来决定罢工策略等。这是因为我们的同志还不知道如何具体的在每一个问题上来估计形势，以及什么是决定条件。

上述各种例子过去在党内无虑千万。

过去我们党内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占极重要地位，指导着同志的日常工作。这在同志中的影响很深。这也成为上述许多错误的根源。

上述这些错误长期在党内存在，千百次重复着，在一切刊物上、文件上连篇累牍的记载着，在千百次罢工示威中明白表现着，对党的损害极大。为什么我们负领导责任的同志没有发现，没有纠正与反对呢？为什么没有人起来批评反对，还拥护这些错误呢？这当然不能以感觉迟钝来解释，而是领导同志同样有这些错误思想，同样有这些错误。

我们十年来的错误，一贯是“左”的。

过去的错误是一贯的，也有系统的，也是机会主义的。但还没有如陈独秀、立三路线那样完整的机会主义，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起直至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一贯的机会主义。还不到

这样的程度。但不论在总的方面，在个别问题上，都有严重的错误。

四中全会后的中央，经过事变最多，但应付事变的能力还很差，创造力也还差。但对国际是最服从的。不过有时是机械的服从。

记得某某同志回国时，华西里夫向我们谈话，头两句话说：在中国党内，还没有如斯大林这样的同志。中国党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还不能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华西里夫的话还是对的。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广益，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更多的请示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犯许多错误，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骄傲与自满，在我们中是最坏的，最危险的，最无希望的毛病。为了成见与个人地位而来进行派别斗争，那是有意的破坏党。现在是要求我们抛开一切个人的怨恨，诚恳的，平心的商量和讨论。中国党还是要由我们这些人来领导，没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来。

* * *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变白区工作的问题。白区工作一方面需要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有十年来的传统要转变。这个转变最艰苦。过去遗留下来的恶果，我们都得吃下去。但这个转变还在开始，甚至有些地方还未开始。

为要转变十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有好些人要求检讨，甚至有同志对过去表示愤激。当然如要在党内煽动大的波浪与同志的愤慨，是不对的。我们还是要避免震动过甚，还要顾及中央的威信，还要顾及党外的威信，尤其在统一战线开始时。现在是采用如何的方式来批评过去？这种方式要能引起同志的注意与警觉，又需要避免过甚的震动。我觉得必须由你们尽速的发表一个文件，发到各地，这对现在的转变是有帮助的。

我这封信是消极的批评，你们的文件或者更多从积极方面说，有些问题或者暂时还不必说，但过去是必须批评的。

祝好！

□□三月四日

（这封信是我在五年前在天津秘密工作时，写给洛甫同志的一封秘密信，当时地区很小，红军亦不大，党的秘密工作问题是党在全国范围内工作与发展的极重要的问题。故向中央写这封信，想中央得到这封信后，对白区秘密工作有个指示以帮助秘密工作的转变，并接受我在十年关于秘密工作的一些观点，我避免在这里来全般大体的总结十年的工作，故我在许多方面没说到，但不久抗战发生，党的秘密工作问题降至次要地位，我自己亦离开秘密工作而到抗日的战场上来，这封信直到现在只有党内少数同志看到。现被中央指定为高级学习组八十三个文件之一，故仍不加改动的重印数十份发给组员参考。特此附注。——刘少奇）

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五月——

一 彻底的转变

同志们！

我们党与群众的全般工作在今后是要执行一个彻底的转变。

为什么要转变呢？

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坚决执行，已经引起了全国政治情况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转动。反动了十年的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转向抗日，两个政权的对立取消，国内和平在基本上实现，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极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来。这些变动，已经改变了并且今后还要继续改变我们全般工作的环境，同时也改变了我们在目前阶段中所提出的任务、口号和政策。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提纲中指出：目前阶段，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目前阶段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已经过去了。在今后我们主要的口号，应该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并且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我们需要在全国进行一个广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实际的建立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全然依靠于我们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

因为环境的变动，新的任务与口号的提出，使得我们党与群众工作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也必须随之而全部的执行转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种恶劣的传统，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并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一切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然而这种传统至今还没有在全党同志中彻底揭发，并给以应有的致命的打击与肃清，这在目前就特别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争取群众的多数。为了肃清这一传统于每一具体任务的工作中，就需要新的工作方式、组织方式、斗争方式的创造，须要党的组织工作的全般转变。

所以目前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是有两重性质的：(一)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转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前一种转变，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秘密的转到公开的，单独的转到与同盟者合作的"（毛泽东提纲）。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式逻辑转到辩证法。因此，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全般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斯大林同志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定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全党同志必须进行

极艰苦的工作与学习，来完成这一个伟大的布尔塞维克的转变！

应该指出，这一个转变从前年十二月决议发表以后，在党内就开始了的。现在要问：我们在这上面已经作了什么？转变达到了何种程度？

一般说来，党的政治口号与政治宣传在各地大体上已经转变了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党的政治影响已经无限制的扩大了，取得了极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然而组织工作的转变，则极不令人满意。在平津及华北其他几个城市固然已经开始从一切具体工作中去进行转变，并且已经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华北党扩大了，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也一直是发展的扩大的，没有将我们的工作基础与工作条件弄得更坏，相反，开辟了今后工作比较顺利的基础与条件。但在其他地方，或者还只是部分的开始转变，或者还完全没有转变，过去的一套，还是系统的无数次的被采用着重复着。因此使得这些地方党与群众工作至今没有什么进展，或者使已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的群众，重复又弄到解体坍台，或者变成极狭小的秘密组织。

党与群众工作为什么至今没有全般的决定的转变？

它的原因是：(一)我们和许多同志在过去没有了解这个转变是两重性的，是一个极深入极艰苦的转变。过去我们只在党内提出，形势变更了，策略也须要变更，这是一个比较易为的任务；而没有提出转变十年来为全党所坚决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因此，就没有使党内觉得有进行一个彻底与全般转变的必要，使许多同志感觉他们过去在党与群众工作中所熟习的那一套，是错误的，是需要改变的，因此他们在工作中还是自信的重复那一套。(二)我们没有尽量的彻底的具体的揭发与批评过去的恶劣传统，否定过去的原则，并且提出新的原则去代替，因此使得过去错误的原则，还是指导着我们同志的日常工作。此外，中央与各地党部的关系的不密切，也是转变迟缓的次要原因。

因为许多同志了解我们目前的转变，只是策略的转变，他们就以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满足。他们认为只要把过去的口号取消了，换上新的口号，他们就已经彻底转变了。再多一点转变，他们都认为是不需要的，因此他们口头上尽管千百遍的叫着统一战线，他们的实际工作又还是千百次的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如是使我们提出的需要在每一个实际工作中具体执行的新策略，经过他们就变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的空谈。

因此，为了要彻底转变今后的党与群众工作，我们除了在同志中解释目前环境的变动与新的策略任务外，还必须着重的揭发与批评过去历史传统中的错误。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般工作的问题。从总的任务起，一直到每一个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止，都或多或少的需要转变。这或者是由于要适应目前新的环境与任务，或者是由于过去本来就错了。

二　今后工作的目标与方针

我们今后一切工作总的方针与总的目标是什么呢？

自然我们一切工作的目标还是为了要准备党与群众雄厚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就是要使我党变成为伟大群众的党，要使千百万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这一个工作的总方针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是不变的。而且一切的转变，正是为了要更顺利的达到我们这个目标。但在过去是采取阶级反对阶级的政策来实现这个目标，而现在则采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过去准备力量，是为了暴动，为了推翻中国统治阶级的决胜斗争；而

今后准备千百万群众的雄厚的力量，则是为了要建立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领导权。这是改变了的。

自从我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暴动政策以后，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目标，就不是为了准备暴动；只要中国的统治者不加入日德协定与侵略阵线，不订立防共协定与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不会重新采取暴动的方针。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方针是不断的加强无产阶级独立的力量，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

六次大会以来，准备暴动的方针，是对的。然而在今天已经不对了。过去的错误，不在于采取准备暴动的方针，而在于进行没有准备的暴动与盲动。没有了解准备暴动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过程，需要长期聚集群众雄厚的力量，而在许多小的罢工示威中采取了冒险与盲动的政策，消耗了我们准备起来的力量，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违反聚集力量与准备暴动的方针。

过去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黄色工会等，采取破坏的政策与方针，是对的。然而在今后已经不对了。今后我们应该采取争取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黄色工会的方针。我们应该到这些组织中去，加强这些组织及其中的抗日派，改组这些组织，推动这些组织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并巩固与扩大它们的群众基础，使其成为抗日战争与群众运动的领导机关。

除开在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统治的区域以外，我们对于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在根本上不采取对立的政策。我们进行民主运动，领导群众运动，推动与督促国民党政权实行民主的改革与实行抗日，并批评他们的一切错误。但对于国民党中个别的亲日分子，投降日本，压迫民众，仍然应该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对于叛变民族革命的个别分子，仍然不应该拒绝采用武力对付的政策。

三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我们目前应该怎样来领导与扩大群众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呢？怎样来动员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运动呢？

最近全国各地的救国运动，同时就是群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也就是民主主义运动。这一个运动一年多来举行了很英勇而光荣的行动，产生了极广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国内和平与全国各实力派的联合，阻止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华北国”及侵占绥远的企图。这一个运动至今还是坚持着扩展着，在将来还要更有力的进行，那是无疑问的。

群众的救国运动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很光荣的成绩，但在组织上所获得的成绩是还很少的，这是目前救国运动的主要缺点。在华北的救国会，组织上虽然有一些扩大，但在其他地方反而缩小或涣散了。一般的是文化界学生界为它的主要群众基础。最广大的群众还没有参加。经常工作没有建立起来。

救国会为什么在组织上不能获得应有的成绩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客观的原因，国民党对它的禁止与打击，另一方面还由于下列的原因：(一)在它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关门主义，工作方式太狭小；(二)它所号召的游行大会等行动过多（如上海），或者还有些冒险的行动（如南京、温州等）；(三)它的下层组织基础很弱。因为上述的缺点，使得许多地方的救国会还仅仅是一部分积极分子的组织。还没有在组织上成为各种群众的真正抗日统一战线。

为要使救国运动更广泛的进行，使救国会的群众基础很大的扩大，纠正上述各种缺点是

必要的。同时必须：(一)努力建立自己的经常工作——如举办国难教育等；(二)设法使它的下层组织帮助各种群众本身组织的创立——如学生会、农民协会、工会、教育联合会等；(三)救国会的下层组织特别注意帮助群众解决切身的要求；(四)与各地方政府取得谅解，努力取得自己的合法地位；(五)在可能的情形下（如援绥运动）联合其他团体（如商会教育会等）组织临时的或永久的带救国性质的委员会。

我们的同志应将上列各项拿到救国会中去提议。

在目前群众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并不限于救国会，也不应限于救国会。所有一切学生的、工人的、文化教育界的及其他各界，均应分别的在本身利益上，在民主要求上，在抗日救国上进行统一与联合的运动。各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应该活泼的采用。

如果在统一战线内部包括了各党各派，内部意见的纷歧，是不能免的。这时，我们的党员应该：(一)忠实的执行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二)团结内部一切忠实执行共同纲领的积极分子；(三)对于每一重要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或者与积极分子共同提出；(四)对于其他各派的错误意见与错误行动实行批评；(五)拥护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我们的同志参加各派的统一战线，照上述各项去进行工作，就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争取领导权。

因为救国运动的发展，在一切群众一切团体组织中产生左派及坚决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我们的同志在统一战线中在一切组织中应该团结这些积极分子，并援助这些积极分子去担负领导工作。团结的形式尽可以活泼采用，尽可能在组织形式上不著痕迹。

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可能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我们应该促成国民党的改组，排除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加入。如此，国民党将变成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国民党不能改组时，我们也应该说服抗日的积极分子去加入国民党及其各派，形成国民党中的左派。

目前的救亡运动，同时就应该是民主运动。但过去救国运动中有严重的忽视争取民主的倾向，很少自觉的去为民主而斗争。争取民主是目前任务的中心一环，因此，我们要在救国运动中特别强调民主。如果群众对于民主的重要性还不了解，还不觉得民主对于抗日、对于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那我们就应该向群众详细解释，并在各种实际斗争中证明给群众看。

目前将到的国民大会与宪法，是民主运动中的基本问题，关联到每一个人的切身问题，我们必须号召群众来注意。在群众中进行讨论，提出要求，提出修改的意见，动员群众向南京请愿等。国民大会的选举我们必须参加竞选（如有可能），提出竞选的候选人与纲领进行宣传。同时我们必须动员群众来要求与提出各种个别的立法，并要求个别的民主权利等。

向国民党要求民主，同时在一切团体一切组织（如黄色工会及学校等）中，也应该要求民主，在一切救国团体中都应该扩大民主的范围。只有使广大的群众在各种组织中身受民主的训练，才能运用民主的权利。

四　党与群众的关系

为了要争取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我们必须正确建立党与群众的关系，正确组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学习在各种环境下领导群众的艺术。必须分别清楚，领导党与领导群众的方式根本不同，党内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方法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实际的了解，那我们就不要去幻想组织与领导千百万群众。

党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建立呢？

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认定自己是群众的领袖，而是群众认定他是他们的领袖），那就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钦定，由于党在理论上的定义或决议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的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正确。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心愿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就必须我们经过长期艰苦而正确的争取群众的工作过程，才能达到。

我们不是在组织上直接要求群众服从党的指挥，要求群众团体接受党的命令，而是要使群众自愿的接受党的政治主张。

我们要求群众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同时我们要尊重群众团体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意见。

当着我们的主张只有少数人赞成时，我们在行动上要服从群众多数，在主张上则保留我们的意见。然后当我们是多数时，方能要求反对我们的少数服从我们的意见。

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群众才会尊重我们，信任我们。

我们是以群众中之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并提出主张与办法，使群众自动接受，跟着我们行动，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与指挥群众。

这些是党员群众的正确的关系。然而我们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些。他要求群众服从他，而他可以不服从群众尊重群众。他以为群众领袖是可以自称的，是可以由党的决议任命的。他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取消群众团体的独立性，破坏群众团体的民主原则。这种错误，大大的妨害党去争取与组织广大群众。

另一种错误，是作群众的尾巴。当着群众的思想错误拒绝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就悲观失望，表示无办法，不去坚持的艰苦的批评群众的错误，解释我们的主张，刻苦的去纠正群众的错误，反而接受群众的错误思想，及作错误思想的俘虏。

正确建立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我党和国民党争取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国民党侮辱群众，不尊重群众的权利，命令与压迫群众，而我们则与国民党相反，群众就自然愿意亲近我们，抛弃国民党人，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

五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应该怎样联系呢？

这个问题实际就是秘密党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在各地的同志首先应该估计各地在各个时期的环境，依照这些估计来判断何种组织，何种工作，何种方式在当时当地是可以合法进行，何者只能半公开进行，又何者只能秘密进行。我们还应该调查各地有那些已经成立的合法团体，甚至是反动团体，甚至带政治性质的与群众有联系的机关（如乡民会议等），是可以派人去加入在里面工作的。只有这种估计与这种调查，我们才能正确确定当地到底有那些公开可能的机会给我们利用，并使公开的与秘密的工作配合起来。过去我们完全不作这种估计，结果弄出极大极多的错误。

一般估计我们今后工作环境的可能变动，如果和平实现，国共合作成立，那我们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将有更大公开进行的可能，虽然在全国各地程度上并不会一致。有些地方，合

法运动或将成我们的主要工作，另外一些地方或者只能半公开工作，或者公开活动的可能较少，秘密工作还是主要工作。至于在日本及汉奸亲日派统治区域，党的组织当然还是处在绝对秘密的环境中。我们估计这些可能的变动，我们要准备更大范围的去进行公开与半公开的活动，改组我们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互关系。然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还是我们今后工作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取消这个问题甚至没有降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只要环境允许，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采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去进行斗争组织和工作。秘密的党它的工作没有全部公开进行的可能，只能部分的公开进行。那我们就应利用这种部分公开可能去工作。那怕是一点半点公开机会，都是宝贵的。能够公开办一个补习学校，组织一个灰色团体出版一个灰色杂志，我们都必须去利用。但是有人说：这种部分公开我们不要，必须全部公开我们才来。因为我们的党纲不能部分公开提出(？)，他们过去就这样取消一切公开工作。

因着环境的变动，我们公开可能的机会，可以随之扩大或缩小。但我们的公开工作不要超过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以外去。因为超过这样的限度，就要使我们原来公开的组织及公开进行的工作，转入半公开或秘密情况之下。一般说，所谓公开工作，就是能够合法进行的工作。非法的事是很难公开进行的。利用合法并不是合法主义。我们过去在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中，认为所有一切需要合法进行的工作都是所谓"合法主义"，要把公开的灰色团体黄色工会等均转变为赤色工会（当环境不能允许时），使秘密的团体和人员去冒险公开，那是极错误的。

一般来说，群众工作是应当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而党内工作则应当秘密的来进行(如有可能也应部分的公开的进行)。但我们在党内工作的方法，绝不能拿到群众中去使用。我们在群众中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与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

在群众中公开工作的同志不能兼负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应当与秘密机关断绝关系，只与特别指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党的秘密文件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不要使敌人从公开工作的同志那里找到任何党的组织关系。

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不要登载公开群众团体的情况，不要使敌人从党的机关中找到任何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党与群众工作，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就是在于组织上混淆起来，方法上又完全重复着。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作；应该秘密进行的工作，又去冒险公开（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兼群众团体的职务等）。结果，使得应公开的不能公开，应秘密的不能秘密。如是党与群众工作都被破坏。

我们过去忽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没有在党内着重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极大的错误。列宁说："假使布尔塞维克党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不能保持联合秘密的与公开的斗争形式之职责——不能负责参加最反动的国会，及受反动法律所限制的各种组织，那么他们在一九〇八——一九一四年间，就决不能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中坚，自然更谈不到巩固与发展"（"左派幼稚病"）。中国党的事实证明列宁的话是对的。过去我们在白区的组织不能保持——更谈不到巩固与发展。

在目前我们一方面应该动员群众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允许救国会的公开，允许各种非法

团体的登记，允许言论、集会、罢工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利用各种灰色团体的名义去组织群众，加入各种已有的合法团体去进行工作。我们的同志在各种灰色的合法团体中应该忠实的为群众直接的要求而斗争，建立自己的信仰，争取群众，争取领导地位，但不要把这些团体转变成为所谓“赤色团体”，表面上还应保持它的灰色与合法。

在日本及汉奸统治区域，采用救国会等名义去组织群众是不适当的。在这些地方应以组织公开灰色团体及利用原有的合法团体为团结群众的主要方式。

六　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

为了准备党与群众雄厚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我们必须领导群众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目的，与群众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不同的。群众起来斗争，是为了达到当时他们直接的要求。但我们必须忠实的为达到群众直接的要求而斗争，才能实现我们组织群众与提高群众觉悟的目的。

当着我们去准备群众起来斗争时，我们必须详细的估计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敌我力量的对比，敌我的优点与弱点，并应预测斗争的结果。斗争中可能发生的变动与危险等。只有这样去详细了解与估计之后，我们才能正确的决定群众斗争所应取的策略。在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在发动群众斗争前，常常不经过这样谨慎的估计（时间上允许），盲目的发动斗争，是不对的。

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动员上去准备斗争，是为了要加强与巩固群众的力量，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准备好了之后，就应该慎重的选择发动斗争的时机。要选择与群众有利的时机来发动。如果时机于群众特别不利，就应该暂时避免斗争，等待有利的时机来发动（如可以等的话）。过去我们反对这种暂时的必需的等待，是不对的。

如果斗争发动，一般的应该坚持，应当扩大斗争的阵线，提高斗争的阶段，应当击破敌人的各种进攻与破坏，应当从各方面去逼迫敌人在群众面前屈服，答应群众的要求；但是如果当时的形势坚持斗争于群众不利，那我们就应当设法在部分胜利的条件下，或在不损害群众与损害最少的条件下，结束斗争，保存自己的力量以待下次斗争。如果要无条件的甚至无目的的坚持斗争到底，是不对的。

任何一次斗争都是要结束的。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依照客观与主观的情势，适时的结束斗争。因为斗争如果结束得不好，是可能前功尽弃的。

当着一个斗争过去之后，第二个斗争还没有到来的中间，在表面上似乎是休息的状态，在里面则是双方均在准备第二次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时机来加紧组织工作，加紧组织与配备自己的力量，以迎接第二次斗争。如果放松这样的时机，很可能在第二次斗争时失败。

在一次斗争胜利后，群众中常有看轻敌人力量，过高估计自己力量的观念，而产生骄傲与疏忽的情绪。但敌人在大败后，则常警惕起来，加紧准备力量，相机反攻。在此时领导的人如果不注意，就常常被敌人暗算而失败。过去这种教训很多。

在一次斗争失败后，群众中常产生悲观的情绪，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而敌人则常在此时继续进攻。此时应该迅速收集群众保有的力量给敌人的进攻以抵抗，方能保有群众的阵地。

当进攻敌人时，应该慎重，应有准备，应估计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任务。但是当敌人向群众进攻时，在各种情形之下都应组织群众起来抵抗。

在斗争中应尽可能的争取自己的同盟者，应分别主要与次要的敌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裂敌人的力量，来取得自己的胜利。在过去我们同志常不知这样来作。

斗争中提出的要求，应当是当时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而且是在当时情况下所能达到的要求。一次斗争不能满足群众一切要求，解决群众一切问题，只能解决一部分。因此过去在斗争中提出一切基本要求的办法，对于群众不见得是有利的，有时反而有害。

斗争的手段，我们不应当拒绝采用合法手段，如交涉怠工等，请愿也不应完全拒绝。合法手段不能见效，当然就应采取非法手段斗争。过去我们反对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对的。虽然在过去非法的斗争手段常应是主要手段。

除开当时主要的公开的斗争手段以外，还应该采用其他各种辅助的手段去进行斗争——如造成社会舆论，采用隐蔽的，上层谈判的手段等。斗争的手段是很复杂；只要于群众有利，我们应采用各种手段去斗争。

要注意利用在合法的口号之下去进行斗争——如在请愿的口号下举行示威，在旅行与赈灾的口号下举行示威等。

还有在进攻的口号下实行防御，在防御的口号下实行进攻，也是可以利用的。有时并必须采用。不过战胜敌人主要是依靠群众真实的力量；经常企图用一种夸大的空谈去吓倒敌人是错误的，达不到目的的。

斗争的发动，坚决转变和结束，应尽可能的经过参加斗争的群众民主的决定。这对于团结群众有极大的作用。

各种重要的纪念节应该发动群众起来表示，而且应该利用纪念节的帮助，发动群众为各种要求而斗争。但采用何种形式来表示与斗争？以及是否要在纪念节那一天起来表示与斗争？就一定要看当时的环境是否对于群众有利来决定。如果对于任何纪念节都机械的要群众起来表示与斗争，都机械的要举行示威罢工，不顾环境，不估计自己的力量，那就是错误的，过去曾经有过许多这种错误。

对于群众的自发斗争，我们应尽可能的去参加，给这些斗争的群众以帮助和领导。但我们不要放弃自己原来计划与经常工作，去追随自发斗争的尾巴跑。

在群众斗争中我们当然要用一切方法去获得与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但我们不应拒绝在群众中与有力量的各派来共同领导群众斗争，而且在斗争中要与各派合作，共同的为实现群众要求而斗争，如果这些派别不反对群众斗争的话。

在北方有些黄色工会的分子表示悔过，表示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但他们常常提出一些过左的口号来煽动群众。我们对于他们，一方面应赞成他们悔过，不拒绝联合他们来进行斗争；但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随着他们跑，要在群众中批评他们过左的口号。

我们在群众运动中不一般的提出“打倒资本家”，“打倒豪绅地主”的口号。但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为了对付这些顽强的资本家与豪绅地主，应该发动各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在这些群众斗争中，应该采取一切方法来分化地方政权机关与资本家豪绅地主之间的联络，要设法使政权机关不完全站在资本家与地主一方面来反对群众。

在群众斗争中我们不应该提出过高的当时不能实现的要求；即使群众有了雄厚力量，提出当时超过对方所能担负的要求，也是不好的。如果群众中自动提出过高的要求时，我们

一方面应该向群众解释，同时我们要从其他可能的方面来满足群众的要求。

七　争取与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争取与组织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党最基本的任务。

但现在我们在工人中的组织基础与工人干部，实在太过于薄弱了。多年来我们除开在个别的部门中建立了相当的基础外，我们没有任何成绩。因此，今后建立我们在工人中的工作，成为最重要最艰苦的任务。

目前提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全国各地去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人运动？虽然目前在客观上已经开始有了工人经济斗争的进攻形势。

如何开始呢？第一，我们要从最好的党员中特别是工人同志中，训练一批工人运动的干部，派遣这批干部去进行工人运动。第二，我们要在工业中心地区创办几个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人周报。第三，我们要在可能的地方创办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并竭力利用原有的职工学校、民众学校等。

目前我们要以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作为动员工人的口号，但我们同时要在反日与民主要求的口号下去动员群众，并使这两种口号联系起来。

在国民大会与宪法问题上我们要尽量动员工人来进行劳动立法运动。要求修改工厂法，工会法，规定八小时工作，最低工资，工会权利，失业救济等，同时我们要动员工人来争取工厂法上有利条文的兑现，利用工会法来成立合法的工会。过去"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的口号，是错的，是完全空谈。

对于黄色工会我们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在黄色工会中团结积极为抗日与工人利益而斗争的分子，争取我们在黄色工会中的领导地位。对于空招牌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动员群众去加入，利用这块招牌来组织工人。在各种无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如我们有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即应依照国民党与工会法所规定的手续成立新工会。黄色工会的自卫组织我们特别应进去工作，设法扩大其组织。

在工人中各种灰色的附属的组织，我们要去加入。并要设法成立这些组织，但必须完全公开的来进行，要使之包括多数群众，要满足加入这些组织的工人之原来的要求。

各学校中的教职员与各机关的职员，也是工钱劳动者，他们在生活上有很多要求，应该帮助他们成立工会性质的团体，为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斗争。

八　在农村工作中的任务

在农村中党与群众工作的转变最少。一年来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只在个别的地方有一些成绩。华北农村组织因暴动失败与破坏，有些还在恢复的过程中。

在国共合作成立后，土地革命的口号暂时成为宣传口号。抗租抗税分粮的口号，也应暂时停止。目前我们在农村中的主要任务是为改良农民的生活而斗争。为团结千百万的农民而斗争。

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要在各地农村中，提出各阶层农民的切身要求。这些要求要依照各地农村的特殊情况来规定。但一般的应根据下列各项：

(一)要求减租减税减捐。

(二)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办理农村水利，及其他公益事业（如修渠，筑堤凿井，修塘，修桥补路等)。

(三)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救济没有饭吃的穷人及老弱残废，办理平糶，办理积仓，及预防灾荒。

(四)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办理低利或无利借贷，救济缺乏资本的农民。

(五)要求地主及地方公款中拿出钱来，设立公共医药所，救济无钱生病的人，设立公共的阅报处及农村教育等。

(六)在训练壮丁时，公家要帮助农民及其家庭的伙食。

(七)增加雇工工资，改善雇工待遇。

(八)免除或减少向农民派粮派草。

除开上述各条外，在全国还要进行农民的立法运动，联合全国各地农民提出下列要求：

(一)要求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全国减租百分之二五，并承认佃农对于土地的永租权。

(二)要求国民政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减低间接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三)要求从国库中拿出钱来或发行公债，办理大规模的水利。

(四)要求国家拿出钱来，大规模救济灾民难民。

(五)要求国家拨一大批款项，拿到农村去办理无利借贷。

(六)扩大并设立农业技术研究机关，改良种子、土地及技术，扫除害虫。

(七)要求颁布保护农村雇工的特别法令。

上列各项应广为宣传，并设法联合各地农民向南京政府提出，尤其在国民大会选举运动中要宣传。

农民的合作社对于农民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动员群众来组织及加入。

对于乡村一部分真无饭吃的赤贫的农民。应该从各方面去要求救济，经过乡长、区长、县长报灾请赈，向有钱人筹募赈款，或要求地方举办公共工程，出外逃荒等。

这些农民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去抢与偷，我们是不能赞成的。但当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分粮斗争，我们还是要领导。

用什么方式去组织农民呢？很好的方式还是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雇工工会等。但这种组织如果不能进行，则应采取各种可能与农民了解的方式去组织，同时利用乡村中原有的各种组织。

在乡村中原有的组织，如保甲、民团、壮丁队、联庄会、祠堂庙会、及管理地方各种公共事业的组织等，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种组织，并设法获取这些组织的领导地位。

我们在乡村中要动员群众要求民主，要求保甲长、乡区长、民团及各种会社均须经过当地人民选举，人民并可撤换这些人，要这些人按期要向人民报告工作账目等。

小学教员在乡村中的作用极大，我们要组织小学教员的团体。

在山西我们要利用牺牲救国同盟去组织农民，并为农民的切身要求斗争。

在山东我们要与乡村建设运动合作，参加进去，帮助他们，使他们真能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并改良农民生活。但同时我们还应批评他们的理论。对于平民教育促进运动，我们也要参加，并帮助他们。

关于土匪、哥老会、红枪会及各种迷信团体，我们当然可以去进行工作，但必须有完全

忠实于党而不为他们所引诱的人去工作时才可以。如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要随便派人去工作。过去进行这些工作的成绩是很不好的。

九 广泛的组织青年

一年多来中国青年学生进行了极光荣的民族革命运动，并在这个运动中建立了一些地方的学生会，并形成了全国学生会的组织。北方的青年学生还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运动在全国是已有了不坏的基础。我们的同志，应该积极参加与帮助青年学生运动，扩大它的群众基础，加强他们的组织，并为青年学生的切身利益而斗争。

但过去的学生运动是还有下列缺点的：(一)对于学生本身利益的工作还太少，有的甚至完全没有；(二)学生本身的组织还很弱，许多还很狭小；(三)他们内部的分裂现象还没有克服，这虽然要由国民党青年来负责，但左派青年中过左的关门主义也加深了这种裂痕。这些弱点，我们同志应帮助他们来克服。

我们要在学生中提出下列的要求：(一)组织学生会的自由，思想自由，救国自由；(二)多给学生以实习教育，取消或减少一些对学生无益的课程；(三)保障学生在毕业后的职业；(四)减少并改善中学的课程；(五)津贴穷苦的青年学生。

北方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现在基本上还是民族解放运动中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但在它的纲领和组织上，还欠缺广泛，在它的工作中还残留一些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残余，但它应该成为广泛的愿意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青年群众组织。应该以抗日救国，争取救国自由，进行救国教育为它的纲领，在组织上也不应拒绝各派青年及某些愿意服从纲领纪律的青年团体加入。但它还应该保持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同志应在他们中相机进行上述的提议。

青年中的文化、娱乐、教育和体育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在青年中有系统的经常的来进行这些工作与组织。

各地基督教青年会我们必须去加入，进行救国的宣传组织并便利青年的救国工作。童子军的工作我们要努力去进行。

各种青年团体在抗日救国目标下联合起来，是必要的，我们应设法促成。

各种热情抗日救国的青年，应该组织他们自己的团体，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那样；但它的名称，它的组织形式，不必一样。关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特别应该组织起来。

关于儿童的工作，各地应给以注意，应该促成儿童幸福促进会等组织，为儿童的幸福与教育而斗争，并应吸引儿童来参加抗日宣传运动。

最近的妇女运动，是有一些成绩的。妇女群众已直接起来参加救国运动。我们应吸引更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抗日与民主的运动，在目前就应动员妇女来参加选举，提出改善妇女地位的要求等。

十 争取一切武装部队抗日

争取中国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我们今后在一切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方针，应该比过去不同。过去破坏这些部队，举行兵

士暴动、哗变等，是对的，但今后的方针，则是争取这些部队抗日，巩固这些部队，加强并改造这些部队成为抗日军的劲旅。因此我们可以不在根本上和各部队的长官对立起来。

在最近各地群众救国运动还有与军队对立的倾向，这种情形应即速改变。应学习北平学生的经验，坚持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派遣代表慰问，并向二十九军请愿等，影响到整个军队抗日的情绪，并改变了他们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应该动员热情抗日的青年去加入各种部队，尤其是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并宣传抗日。

设法输送各种救国刊物到军队去，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军队中的附属组织如有可能，即应该成立。

党在军队中应成立极端秘密的组织，争取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甚至个别的上级军官）到党的影响之下来，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为改善士兵生活而斗争，要求军饷火食公开，组织监督委员会，反对贪污人员等。这些是应该作的。一般的我们主张节省浪费，改善士兵生活。

十一　党的转变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及其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是唯一的保障。

(一)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的认真的发展党员。

在国共合作成立后，一方面固然给党以比较顺利发展和工作的条件，但同时资产阶级对于党内影响的可能，也大大的增长了。从内部来破坏党的可能，也增长了。为了保持党的独立、纯洁与一致，应当(1)提高新党员入党的条件，新党员要经过候补期的考查（工人可不经过）；(2)加紧对于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3)提高党的纪律，扩大党内的民主；(4)慎重的选择党的干部；(5)加紧对右倾尾巴主义倾向的注意。上述入党条件在秘密的环境下的党，可以放宽一点。

在有些地方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应依靠一些基本的党员与干部去进行。这些党员与干部是绝对忠实于党的，是可信托的，绝不应该随便调动他们。

(二)党内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应清楚的分开。党内一切工作与组织状况，比以前更应秘密些，不应该使同志互相知道，尤其是公开工作的同志。

党的机关应当很小。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组织与官衔。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尤其与公开工作同志的关系，应很技术的建立起来。这是秘密工作中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事。这种很小的秘密领导机关，即使在公开环境下，都必须保存。如环境有更大公开可能，只是群众组织与公开流动的同志去公开即可。

我们对于党的秘密工作，要有远见，要坚持，要忍耐，不能有丝毫的急躁病和疏忽。因为环境是变动的，今天觉得不要紧的事，但到明天也许就不行了。今天是要服从明天的。我们许多同志在过去就是没有远见，不能忍耐，害着不能容许的急躁病，过于疏忽。他们在今天甚至不估计到明天的情形，甚至不估计当时的环境去布置与进行工作，如公开征收党员，举行革命竞赛，进行突击运动，随便调动干部与改组党的组织等。我们以后不要随便再以“怕死”、“动摇”等话去批评同志，助长同志冒险的情绪。秘密机关中那种忙乱的状态，也是不能继续的。

在秘密环境下我们的组织如发生问题，即应暂时停止工作，风声紧张时，人员即应暂时

离开(如可能离开的话)。如果没有相当保障，一切工作都不要冒昧去进行。工作没有作好，不要紧，要紧的是机关无论如何不能破坏，我们应该特别小心。应建立巩固的秘密领导机关，虽经各种风浪，也不致动摇的。

对于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同志，应坚决执行纪律。

只要我们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得适当——秘密机关的工作井井有条，不疏忽，不乱来，那我们就能够对付奸细。现在奸细还要混入我党，我们除开特别小心考查外，主要的要使公开的与秘密的工作配合适宜，使奸细不能更大的损害我们。

(三)在可能条件下应该扩大党的民主，如领导机关多与同志通信，多征求同志对自己领导的意见，多取讨论的态度去实现指导等。我们不只是要在形式上执行一些民主手续，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的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的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党内的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是还严重的存在着的。这表示在不彻底从政治上原则上去解决一切问题，而采用组织手段与纪律去解决一切问题（有些人甚至离开纪律，就不解决任何问题)。表示在领导方式上的过分机械与绝对。这是一种极不民主的习惯。一切问题要从政治上原则上去解决；只有在政治上原则上解决以后，组织手段与纪律的采用才是对的。纪律在党内是必要的，应提高——但要在最后的时候去采用。

提高纪律，是提高同志服从多数服从组织的精神，而不是要指导机关经常用纪律去制裁同志。相反，指导机关制裁同志愈多，就愈加表示那里党内的纪律愈坏。

党有纪律，不表示在不许同志向党内发表不同意领导机关的主张，而表示在同志虽有不同的主张，还能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与执行领导机关的决定。

我们党正也因为有这种铁的纪律，才能使奸细很难破坏我们。惩办主义与命令主义是帮助奸细的。

党的集体领导，也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广泛的吸收了全体同志的经验与好的意见，才算是真正的集体领导。

党的民主集中制与个人负责制是必须同时采用的。重要问题应该民主的决定，但工作的执行则应个人来负责。工作机关应该有工作的秩序与工作纪律。机关的首长应该督促与检查工作。

真正的民主精神，与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的道德，是不能分离的。自私自利，是与大公无私相反的。自高自大，风头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这种人，他要居人头上，而不肯居人下，他要求支配别人的特权，他自己不受别人支配。他可以随便批评打击辱骂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他。他要别人服从他的决议，他自己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决议。他认为别人破坏集中原则是犯纪律，他不承认他自己破坏民主原则也是犯纪律。他只图自己个人的发展，甚至为发展自己而去妨害别人的发展。这是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党内的残余，这是与民主精神相反的。

扩大党内民主，首先就要我们的干部在精神上有民主的修养，在形式上作模范，然后才能在同志中群众中进行民主的训练。过去党内的同志与干部怕说话，怕错误，不敢负责，这

是在不民主的情况下造成的现象。过去我们主要的不是用说服与教育去推动同志工作，而是用斗争打击同志去推动下级工作。这不是民主的办法.这就使同志怕斗争,而不敢说不敢作。斗争只是对于那些坚持错误，不学习，不自觉的人，才是需要的。而且还是为了教育。

(四)过去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随便因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而撤消工作，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使许多同志，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发表出来，这就掩盖了同志中在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也就不能克服这种分歧。这样只能造成党内表面上的一致，妨害了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真正的一致。这样并不能减少同志与领导机关对立的现象，反而使这种对立加深加多。同志们就不会去帮助领导机关的领导，他们会挑领导的岔子。这样，无原则的斗争又有了基础。

表面看来没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并不是好的现象。

我们不要在思想斗争中去随便打击同志，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抹煞同志中原则上政治上的分歧。相反，正是要使同志能够充分发表他的意见，以便真正的消灭这种分歧。大多数的分歧意见，用说服用讨论是能消除的。

以后如因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意见而开除同志，应特别慎重。除非是他在组织上违犯纪律，不能纠正。

(五)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训练出大批的干部分配到各个战线上去，是党的中心工作。各地方要特别注意选择干部来受训练。

毛泽东同志在结论中提出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干部的标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并拿出全部忠心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且没有自私自利英雄主义等毛病。我们每一个干部应当按照这样的标准来修养。

我们是要把现有的干部以及新干部提高到那样的标准,这需要党与干部自己艰苦的努力，而不是用那种标准来考试我们现有的干部，把不够标准的黜职。很明白，我们现有的干部有各种的缺点，政治上的，能力上的，思想上的，意识上的缺点都有，甚至还带有旧社会各种污七八糟的残余尾巴来，然而现在就是要将这样的干部改造成为足够高度水准的干部。不能毁坏他们。这虽然是极艰苦的工作，但是能够作到的。因为我们还要改造全人类——将现在自私自利的人类，改造成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公无私的公民。

我们要经常考查干部，要恰当的分配各种干部的工作，给他们以能够胜任的任务，并在工作上帮助他们。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领导机关作了不少的错误，应该纠正。

提拔新干部在目前是重要的。但新干部要经过一定阶段来提拔，不能照过去一样随便提得很高，反而使他无法工作。

在华北已有新旧干部不融洽不合作的事情发生。这应给以注意。新旧干部各有不同的长处与缺点，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集体领导改善。

(六)在群众团体中的党员，还是应该建立党团。但党团应很技术的工作。各级党团应绝对服从各级党部的领导，服从上级党团的领导。党部领导党团时应该谨慎周到，应该和党团同志讨论一切，但不要在一切小问题上都去机械的决定。要活泼的领导党团，不是不给党团以具体领导。

(七)我们同志那种忙乱无章的作风，应该改变。应该抓住各时期中心的工作，分别各时

期各种工作的轻重缓急，有秩序的去工作。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实务精神，才能切实，才能真正推动工作与革命。我们同志对于一件工作想清之后，就应有抓紧这一件工作干到底的精神。只有革命精神与实物精神的结合，才能肃清空谈的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八）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彻底转变，虽然最近我们在宣传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过去我们一些同志常分不清楚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的区别，对内教育与对外宣传的区别，党的口号与群众口号的区别，党的宣传与群众呼声的区别。我们常把“武装拥护苏联”“武装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口号，去动员群众行动；常常在罢工要求上加上“驱逐日本出中国”；常把党内问题的文章登在对外刊物上，在对外刊物上宣布某些团体与行动为党所领导。这种事过去我们作过许多。同时宣传的刻板，形式，琐碎，夸大，不注意事实，不注意对象，文件的八股化，是一贯的传统。这些东西必须彻底肃清。

在今后党的理论研究与理论宣传，是更加重要了，这应该利用各种公开可能，组织研究会、出版机关等来系统的进行。

（九）最后，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表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我们的旧干部中它的毒最深。它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它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的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它使我们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使我们在群众斗争中盲动。它使我们在罢工工人的要求上加上拥护苏维埃红军，使我们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的上海“实行苏维埃劳动法”。它使我们把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不分，使我们的文件刊物公式化。它使我们在口里千百遍的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又千百遍的违反国际路线，执行立三路线。它使我们机械的处理问题，一切工作公式化、刻板化，使我们许多同志毫无生气，不去思索问题，考虑问题。由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发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

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用布尔塞维克主义来代替。怎样来改正我们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志们都应该学习，学习与教育，教育与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方法。只有这，才能使我们前进，才能使党与群众工作彻底转变。学习！学习！再学习！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我们是能克服过去一切的错误，率领千百万群众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国的。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洛甫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

一　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

我党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内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寇，实现民主共和国，并在这一统一战线内与民主共和国内取得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自内战停止，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合作以来，在建立全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显然有了很大的成就，但离开目的，还是很远。

根据过去两年来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经验，根据目前形势的特点，我们应该着重的提出下列问题，以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第一，目前统一战线的组织，一般的说来，还不过团结了抗日救国的左倾积极分子。这是很大的成绩，但这是异常不够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依靠这些分子的力量去争取最广大的中间群众到统一战线中来。不是到处单独形成左派的组织，使他们同最广大的中间群众隔离起来，以满足他们左倾的情绪与要求，而是耐心的坚持的去教育这些积极分子，消除他们同广大群众隔离的现象，纠正他们高慢的宗派主义与"左"的空谈，使他们真能深入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工人、农民与学生中去，成为他们中的活动分子与领袖。对于破坏统一战线的少数极左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对于各党派各阶层各阶级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也应该耐心的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即是为了某一具体行动的统一战线也好。只要同他们在最原始的与最初步的共同要求上行动起来，我们即有办法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从低级的统一战线转到高级的统一战线。

第二，必须根据中国各地的不同环境提出各种各样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共同要求，建立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组织，以促进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成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不要幻想以一个单一的口号与形式去组织所有广大的群众。这里，要反对关门主义公式主义与千篇一律。

目前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统一战线，实行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组织统一。在农民中，下级官兵中，小资产阶级中，也必须加强各种统一战线的工作，使工人农民下级官兵小资产阶级，真正成为我们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依靠的力量。

第三，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应该把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亲日派作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们一切斗争的火力应该集中起来向着他们。对于托派，应该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的方针。

这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亲日派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彻底，则全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愈是明显，斗争的力量愈是集中，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与分散愈

是加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愈能迅速的建立起来。

但切不要把那些目前反对共产党与不赞成我们的全部主张的人称做汉奸亲日派。许多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今天不一定拥护共产党，赞成共产党的全部主张。我们仍旧应该耐心的同他们进行统一战线，斗争的火力，必须集中在少数真正凶恶的与无耻的汉奸亲日派身上。

第四，我们应该成为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模范与支柱，成为它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只有我们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我们才能使全中国人民了解我们为民族事业的忠诚，引起他们对于我们的同情与拥护，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在我们的周围。也只有我们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地位自任，我们才能一切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为利益，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精神去解决一切各党各派各阶层各实力派间的纠纷与磨擦，使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与坚强起来。

第五，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斗争，相反的它是在斗争中生长与巩固的。对同盟者的不彻底、错误、动摇、消极、怠工、投降出卖，我们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斗争的方法，可以从友谊的劝告、诱导、批评一直到在反汉奸卖国贼的号召下公开的开除驱逐。斗争的总方针，应该是集中火力打击亲日派，孤立妥协派，务必使一切叛变统一战线的分子，当他们退出时完全陷于孤立。

应该明确的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的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政治经济的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借口统一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的观点，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

但必须指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提出过高的过左的要求，使统一战线过早破裂，是我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我们应该估计到群众的局部利益，但必须同时照顾大局。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也是中国工农小资产阶级目前的最高利益。少数部分先进地区，群众阶级斗争过早的与过分的突出是不利的。党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坚持说服群众顾全大局的方针。

第六，必须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适当的配合起来。上层统一战线是必需的。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本身的力量，同时便利于我们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所依靠的力量，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力量去联合上层与威逼上层，达到我们抗日救国的总目的。上层分子抗日救国的可能限度与对民众让步的可能程度，常常决定于下层群众的斗争的与组织的力量。

在上层与下层的斗争中，共产党可利用各种方法以达到双方斗争的适当解决。共产党站在保护群众利益的基本立场上，采取调解、斡旋与中间人的态度，在原则上是允许的。

第七，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但同时不要放松尾巴主义、投降主义，保证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的自由。

二　对国民党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关系

国共正在走向合作，但尚未达到合作的目的。

国民党正在开始转变它过去的错误政策，但并未彻底转变。

放在全中国人民前面的任务，已经不是用武装暴动的方法推翻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而是改组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使之走向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与民生幸福的革命三民主义的道路。这是从两个政权到一个政权，从暴动的革命到革命的改良的彻底的转变。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们应该发扬它的革命精神，规定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如像过去大革命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政纲所规定的那样，同时应该批评它的反动因素。我们表示我们愿意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奋斗。

对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我们以后不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而要区别对民族民权民生有利的地方与有害的地方。有利的地方，我们应该替他发挥，并要求兑现，有害的地方则应该批评。

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很薄弱。照现在的样子，它不能负担起坚决抗日救国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倾的革命分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与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应该向国民党指出，为担任御侮救亡的工作，改组国民党的必要，同时革命的民众应该自动的去加入国民党，改造与重新建立国民党下层的基础，再用下层的力量压逼上层，实行国民党内的民主以达到改组的目的。共产党员不应拒绝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之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的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应该看到，在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现在正在展开中。应该利用他们内部的斗争，拥护左倾的抗日民主的分子，以反对极右的分子，以达到改造国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本党公开的目的。对于国民党各派别（如CC，黄埔）可在个别的问题上与之采取统一战线的行动。

对中央与地方政权，我们的目的首先应使之民主化。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当权者的允诺与法令，以及一切合法的可能，发动群众运动，要求对群众有利的条文的兑现。对于当前的每一具体问题，如抗日救国，国民大会选举，民主自由，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等，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动员群众向当局提出，使其接受。一般的，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意见，不采取完全对立的方针，而采取要求改良的方针。

在国民政府允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或群众选出共产党员为代表时，我们原则上应该参加进去，利用国民大会的讲坛与自己的合法的地位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各种有利于民族国家及民权民生的提案，号召与组织群众，推动政府走向民主化。一切选举的会议我们均应利用，提出我们的要求与主张，取得广大群众的赞助与拥护。在选举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共产党在原则上可与各个抗日民主的派别实行合作。

如果国民政府开始发表抗日救国的共同政纲，并表示其实行此政纲的诚意时，共产党在原则上可以参加这样的政府。但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必须：(甲)为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乙)坚决反对汉奸亲日派企图，严厉的镇压他们的反抗；(丙)保护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使之成为自己依靠的力量；(丁)完全接受党的指示，并受党的严厉的监督。

当共产党参加政权时，共产党运用群众的力量，威逼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办法，决不应该放弃。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办法是应该同时并用的。没有群众的运动与群众的压力，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

对于地方政权机关的改造，在现在也可开始。号召群众反对地方政府中汉奸分子，贪官污吏，要求将抗日的，民主的，比较开明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分子去代替他们。在这种行动中，应该集中力量于反对最凶恶的个别家伙，分化统治阶级内部，利用他们间的每一矛盾，以达到目的。

我们的公开工作的同志或同情者，如有可能应该争取这类位置。他们到那里，不是也不能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而是以"好人"的面目出现。首先应争取那些最下层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位置，如保甲长，联保主任，乡长之类以及官办的有群众的经济与文化的团体。

争取这些位置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便利于为群众谋利益，便利于组织群众，或掩护党的群众的与秘密的工作。他们在为群众谋利益的基本立场上，可以调解人的资格调解双方冲突，向上敷衍应付。他们的行动，要以群众力量为最后依靠。

在国共合作实现，国民政府实行改造时，改造地方政权的机关成为我们最重要任务之一。不是拿工会、农会、救国会等群众团体来各别的代替地方政权机关，如像过去大革命时一样，而是依靠这些群众团体的力量来改造地方政权机关，使之民主化，使之成为代表群众的革命的政权机关。

应该立刻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分子的手中应该是目前我党的第一等任务。

在统治阶级容许我们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时，我们应充分的利用这种合法的可能，培植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争取我们的领导，然后以群众的威力，压迫统治阶级逐步退让，以扩大我们宣传群众与组织群众的自由。

在抗日战争已经发生的地区，可以超过地方政权所容许的范围，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大规模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实行民众抗战与游击战争。那时在当地成立代表各群众团体的临时统一机关，就成为必要。这种机关，当它集中一切抗战的任务在自己的手里时，必然要迅速的转变为当地民众的政权机关，但就是有着这样的机关时，仍旧不要忘记利用地方政权与改造地方政权的任务。

所有群众团体应该有自己的自卫的武装组织，如农民自卫军，或工人纠察队之类。

在敌人及汉奸统治的区域，应组织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等发展游击战争。

三　关于领导斗争策略的几点意见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说得很好。我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曾经讲到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参考。这些普通的原则，是同志们应该首先了解的。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每一个同志的普通常识。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在原则上是容易了解的，但在实际的运用上却常常发生极大的困难。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情形的极端复杂，使我们运用策略原则时，困难更多。

所以特别重要的，当我们的同志懂得这些原则之后，决不要机械的把这些原则当做死的公式去背诵，而是首先要真正细心的与谨慎的去分析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探求革命形势

的特点，体验群众的要求、痛苦与他们的每一呼吸与脉搏的跳动，再来决定适当的斗争的口号策略，工作的方法与方式。

我们的同志决不要自高自满，以为他现在已经懂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原则了。从原则到实际的正确的领导群众，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要不疲倦的虚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每一新的问题，要从多方面的去思索与考虑，然后定出最可靠的解决方法。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如何从错误中去学习去求得进步。只要今天我们有了进步，那过去所付的代价就得到了报酬。

我觉得我们同志中平常所犯的许多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贯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简直是由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知。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表示了英勇的模范，表示了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他们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因此犯了许多错误。对于这些同志，必须更多的耐心的去教育他们。

*　　*　　*　　*　　*

我们说要准备千千万万群众的雄厚力量以战胜日寇，争取民主资产阶级性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正确的。但怎样去准备呢？偷偷的准备吗？和平的准备吗？这种准备的方法，是应该尽量采用的。然而主要的要在斗争中去准备。只有发动、组织与领导群众的各种各样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我们才能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加强他们的组织力量。实际的斗争对于群众（对于我们共产党员亦然）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在斗争中，群众会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斗争中群众会感觉到团结自己与组织自己的必要，会学习如何向敌人进攻以战胜敌人，如何退却与防御以保存自己。也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他们会了解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群众不是从书本上学习，而是从斗争中学习。对于群众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自己的政治经验。

群众革命斗争的胜利，固然对于他们是最好的教育，但是失败，也同样的可以教育他们、每一次斗争的失败，在失败后敌人残酷的屠杀与镇压，对于群众常常是最深刻的教育。在失败后他们可以暂时的消沉下来，医治他们的创伤，但是他们将在新的条件下，以更高的政治觉悟与更强的组织力量爆发新的斗争。只要共产党员能够始终坚持的同群众在一起，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群众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泉源。

过去我们犯的某些错误，并不是在于我们领导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在领导斗争中犯了策略上的错误。

我在这里只指出领导斗争中的急性病的害处。

犯急性病的同志常常不了解在一次斗争之后，一般的说来，需要有整顿内部，组织训练与教育的时间。这是为了第二次斗争所必需的过渡时间。他们不了解群众斗争，也像世界上一切其他事情一样，是曲线式前进的。在波涛汹涌之后，必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白天紧张的操作之后，必然需要一个甜蜜的睡眠。想把斗争一直线的“提高”到革命完全胜利，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一定会碰壁。

在我们一部分青年同志中，的确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急性病，希望革命在明天就胜利。

所以他们不能细心的去考虑问题，不能耐心的去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而表示急燥虚浮与盲动。但是当明天革命发生挫折时，他们就立刻悲观失望，烦恼消极，从极左转到极右。这些幼稚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实际斗争中去教育他们，锻炼他们。使他们懂得革命是艰巨的工作，革命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但革命必然会胜利的。

这种急性病必须纠正。

其实天下的事，你越是急燥盲动，结果一定越是迟慢，越是达不到目的。李立三同志是一个犯急性病的人，然而他的路线，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我们不需要急性病，我们需要稳重的前进。我们要坚决的前进，要有阵地的前进，决不要乱碰乱撞。

这种稳重的前进，决不等于工作的散漫，不紧张，慢慢的干或听天由命。相反的，这种前进，要求我们最紧张的与积极的工作。没有这种工作，就是一步的前进，也是不可能的。特别在目前形势之下，我们更须要加速度的前进。

在斗争中准备我们的力量吧！以镇静的、坚持的、切实的、紧张的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艰苦工作，去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吧。

* * * * *

列宁说：“第一，革命阶级，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起见，必须善于使用一切（丝毫不能除外）社会活动的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须时时准备以极迅速地、突然地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别一种形式”（“左派幼稚病”）。

我们说过，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是改变了斗争的某些形式，但斗争还是继续者。我们共产党今天除自己公开声明停止的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的斗争方式外，决不要自己束缚在一定的斗争方式之内，这会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

即拿关于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来说。过去我们利用合法的斗争方式非常不够，或甚至于拒绝利用，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在新的形势之下，合法斗争的范围将更加扩大，甚至将来合法的斗争可能成为斗争的主要方式。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合法可能去开展群众运动。但这决不能因此就说，过去我们所做的非法斗争都是错误的，或者说现在我们不要非法斗争了。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现在提出的是减捐、减税、减租等类的改良要求，然而当统治者，剥削者不顾群众的合法要求，强迫群众交纳不能忍受的负担时，抗捐抗税抗租的“非法行动”不是仍然不能免吗？当饥寒交迫的灾民难民要求救济的合法行动无效时，他们不是有完全的权利去进行“吃大户”与“分粮”的非法行动吗？党不能不管。党应该给他们这类非法斗争以领导。

群众斗争的发展，常常逼使统治阶级实行让步。对于统治阶级光是说好话或哀求是不中用的。他们要求力量的逼迫。国民政府的开始走向抗日，没有全国人民的“逼”是不成的。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农民的要求的一点让步，没有工人农民的“逼”也是不成的。这种“逼”的方法，在过去是需要，在今天还是需要。革命团体与政党的合法与□合法的地位，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改革或改良，没有群众的行动，是不能实现的。一切世界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新的形势之下，就是武装斗争的方式，也不应拒绝的。但这不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而是自卫的武装斗争。谁能担保各地的政权及那些最凶恶的豪绅地主，不会用武装

的力量来对付群众斗争与群众团体呢？不要一刻忘记准备自己的力量。

*　　　*　　　*　　　*　　　*

只有我们在群众中坚持的工作，在群众中建立起我们的信仰，群众甘心情愿接受我们的指导，甚至为我们的主张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时，我们才能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取得了领导权。

我们说，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只是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并不是说共产党是天生的领导者，因此群众必须服从他的领导。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还需要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与艰苦的群众工作。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是因为共产党真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而不是因为他能够高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与他的那副“领导者”的架子。从领导者的架子到领导者，这中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尽可以少讲些（对外可完全不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类自夸自大的话。我们要尽量的谦逊些，更多的去努力于正确的政治领导与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人家能不能承认我们是他们的领导者，就看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程度。

但是我们的确已经取得了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时，我们也切不要因此就放肆起来，把共产主义的教条赤裸裸的搬出来在那里大谈其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赤化”，在今天完全不需要，而且只有害处。对于每一个在我们领导下的团体，我们切勿自己宣布说：“这是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体”。这种幼稚病应该最后结束了吧。

我们过去常常曲解“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的这句话，以为这就等于在群众中高谈共产主义。其实这种了解是错误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共产党员在群众中，应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与解释各种最平凡的问题。完全不用马克思列宁的一句话，然而这种分析与解释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我们现在常常说要拿民族革命的精神教育全中国四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这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暂时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正是要以马克思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来教育中国人民。也只有马克思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最后的解放。

少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耀眼词句，多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的内容吧。

四　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联系的问题，是关于党同群众如何联系的重要问题之一。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过去争论很多，但总是没有能够使它很明确的为同志们所了解。这是一个损失。

应该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不是什么始终不变的东西，而是依照革命形势与具体环境的变动而变动的东西。在白色恐怖的情形之下，在民主制度没有实现的情形之下，在白色恐怖转变到民主制度的过渡时期，两者的联系都是不相同的。更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同一时期内，在各个地区，这种联系也是不相同的，如在华北与华中、平津与上海。

在过去白色恐怖统治时期与现在民主政治还没有实现的时期，应该确定，第一，凡能够公开存在的团体与组织，主要的都必须是合法的（包含成文法的与不成文法的），换句话说，必须是为当地政权所能够容忍的。如官办的各种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军事等团体，群众自己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兄弟会、姊妹团、互助会、合作社、同乡会、学生自治会、文化教育的各种团体等。这类合法的团体，共产党自己也可以照样的组织，当然不能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的合法的团体的工作方式，必须是公开的合法的。

第二，凡群众的革命斗争（如罢工、示威游行、抗捐抗税抗租等），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但主要的是非法的，即开始是合法的斗争，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常常要从合法的转变到非法的。

第三，在领导群众非法斗争中产生的革命团体，可以依靠群众的力量存在一时期，如革命形势发展有利，则这种团体可以转变为公开或半公开，可以比较长久的存在与发展下去。如革命形势发展不利，那种团体必然要从一时的公开转向半公开或秘密。如果为了要求得自己的继续存在，则应该停止领导非法斗争而进行公开的合法的活动。所以争取公开的可能，决定于群众本身的力量，及当时的革命形势。

从上面三点，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为了进行公开工作，使公开团体能够存在，利用合法是主要的，“争取公开”是次要的。

在群众革命斗争中，非法斗争是主要的，合法斗争是次要的。

过去党内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由于没有清楚的指出这中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

过去有些同志强调了“非法斗争”，与“争取公开”，因而拒绝了“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这显然是错误的。

“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特别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在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与保持党同群众的联系上，有重大的意义。即在改善群众生活上，合法团体与合法斗争也可以多多少少给他们得到些利益，当然说不上，根本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这种“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当然不是改良主义或合法主义。凡主张共产党只要用改良的方法，而不用革命的方法，以为只要改良的方法，人民就可以得到最后的解放，这就是改良主义。凡主张共产党只要做合法工作，而不要做秘密工作，以为只做合法工作，即可达到革命的目的，这就是合法主义。但“利用合法”与“合法斗争”却是我们共产党革命工作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担任公开合法的工作的同志，不应该自己看轻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党的革命工作的一种，其他同志也不能因为这些同志只做公开的合法的工作，而批评他们为改良主义者，或合法主义者。这种批评，只是表示他们对于“利用合法”的工作方式的完全无知。

我现在单讲“利用合法”。

“利用合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即是到现存的公开的合法的甚至反动的群众团体中去工作，争取那里的群众。另一方面，即是我们自己组织合法的群众团体。

怎样在那些现存的群众团体中做工作呢？

首先要善于利用那些团体的纲领内同群众有切身利益的条文，利用他们领袖的好话，或提出最大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并争取这类条文的允诺与要求的实现。

只要在事实上证明我们确能替群众谋利益，我们就能取得群众的拥护。群众相信我们，决不是由于我们提出的口号过高过“左”，而是由于我们对于他们所提出很低的要求尽了力

量。只要群众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开始运动起来，不管他们今天在思想上怎样相信着他们的领袖，但如果他们的领袖，违反他们的利益时，那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中，必然会走到反对他们的领袖。

第二，我们必须物色与团结其中的积极分子，依靠他们去推动其他广大的群众。我们对积极分子不必要求过高，只要对于他们自己的工作肯奔走活动，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的分子，都是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也不必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团结起来，但无形中我们应该同他们有一种经常的联系与共同商量问题的机会。把积极分子从群众组织中分别出来的办法，只对于反动派有利。我们应注意教育积极分子，推动他们在群众中活动，告诉他们活动的方法，并吸收其中最优秀者入党。

第三，在我们已经取得群众的拥护之后，就要用我们能够依靠的群众的力量，取得自己的领导地位。有人说我们对于群众团体，不应该争取地位，这话不但对于革命的团体不对，即对于一切反动的团体，也是不对的。包办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固然是错误的，然而这并不能因此就得出我们不应占据领导位置的结论。问题不是领导位置不好，而是我们同志的工作方式不好。我们同志应该成为真能代表群众利益的领袖。当然，他今天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而是以群众的代表资格出现的。

第四，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根据于群众觉悟的程度，来同这个组织中最坏的最反动的领袖实行斗争。在开始工作时，我们决不要忙于反对群众原来的领袖，不论他们是如何的反动，因为如果我们开始就这样做，我们立刻会同他们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对立起来，使自己不能立足。这是最愚蠢的。开始时我们只应站在群众利益上发表意见，并且首先要推动领袖们来做。

在批评时，开始应该温情的批评，规劝的批评，忍耐的批评，根据群众意见的具体批评，使群众看到我们的批评是"仁至义尽"，而被批评者则是"不可救药"，使被批评者在群众中完全处于孤立。只有这样之后，我们才公开揭破他的真面目，必要时驱逐他出去。这要使群众看来是必要的与不得已的。但如果认为这种驱逐会危害于这个组织的存在时，则仍可与之敷衍。

如果这类领袖在群众压力下有转变时，则对于这种转变我们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而不是拒绝，但对于他的每一新的动摇与阴谋，必须经常注意并在群众中宣布与揭发。

第五，即在我们占领领导机关之后，我们仍然不应包办，而应尽可能的吸收其他党派中进步的与优秀的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并与之很好的合作。我们在工作中应处处采取民主的办法，处处依靠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只要群众相信我们的人，听我们的人的指导，虽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取得领导的公开团体中，以及在我们自己组织的公开团体中，要保持这些团体的长久存在，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一)这类团体，应忠实于自己原来的性质与任务。如合作社即应做合作社的事，工会应做保护工人利益的事，一切工作的方法，都是公开的与合法的。同当地政权要善于敷衍应付。

(二)这类团体中，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宗旨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可以领导群众的合法斗争，但不应领导群众的非法斗争。在群众非法斗争发生后，它应站在公开的与合法的同时为群众谋利益的立场上去参加，不要站在非法斗争的同一地位。应严守自己

可能活动的限度，不然即会有坍台的危险。

(三)这类团体中的所谓灰色团体（如合作社，储蓄会，文化教育机关等)，一般的不参加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斗争，必要时站在第三者地位给斗争的群众以某种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援助。

(四)这类团体内的群众或同志参加非法斗争时，不得用团体或团体代表的名义。

(五)团体中公开的领袖应完全公开，工作方式亦应完全公开。如果是党员也不要参加党的秘密组织，只同个别党的负责人接头。他对于一般的党员应守秘密。但他应受党的严厉监督，执行党的指示。党的指示必须适合于公开团体的条件，并且对于公开团体的领袖是能够实行的。公开团体的一般干部，应过党的生活，但可不担负党内一定的秘密工作。

(六)公开团体中应建立秘密党的组织，进行秘密工作，领导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斗争。党的工作应完全秘密。秘密组织同公开工作的同志不发生直接关系，除个别同志外，也不互相知道。

如果我们能够遵守这些原则，则公开的与合法的组织，必定能够比较长久的存在下去，虽是任何的疏忽与缺陷，仍然有给敌人破坏的危险。

凡是合法的与非法的群众革命斗争，主要的均由秘密党来领导。但党的同志在群众中仍然以群众之一员的面目出现。党的负责同志更应尽可能的不要在群众中突出，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在斗争中尽量推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来领导。万不得已时，也只要个别同志以群众领袖的资格出来领导斗争。已经出来领导斗争的同志，应坚决的与群众在一起斗争到底。但在第二次斗争时，第一次领导斗争的同志可表示消极，推动别的积极分子来领导。特别在恶劣的环境下，在那些中心支部内（如兵工厂、军队、交通机关等）党的同志应该深深的埋藏在群众中间，只做秘密工作，不把自己暴露出来。保存这些支部不受破坏，是党的严重责任。非法的甚至合法的群众的革命斗争，应建立另外的领导机关。如罢工委员会，罢课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的斗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只使非党的群众参加，推动群众的积极分子来领导。应力争这些机关的公开与持久。但随时应准备敌人的打击与转入秘密。其他我们的公开团体，应表示与这些组织没有直接关系。

上面所说的一切，是在白色恐怖下与民主制度还没有实现以前的办法。在民主制度开始实现，民主的合法斗争成为主要方式时，则那些在我们领导下的公开的与合法的团体自然都可以参加民主运动，那时如旧形式妨碍新内容时，即可考虑使用新形式来表现新内容的问题。

如果当时的形势容许这种转变，而且转变后的确有利，那就可实行转变。

在巩固党的秘密组织方面，还应注意严密党的组织，考查自己的干部，极大的注意党内同志们的政治面目，丝毫不放松思想的斗争，以防止奸细的混入。秘密工作对于同志们的要求是谨慎、细心、镇静、严肃与勇敢。所谓："胆欲大而心欲细"。

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地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应绝对的秘密起来。然而在条件顺利时，党应该有某些机关或某些领导同志同下层同志或组织更能接近起来，这可以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使工作更容易开展。但党组织必须准备任何时候的突变与敌人的袭击。

在抗日战争发生的地区，党的秘密组织，必须适合于战时的状态。

我这里的解释，当然还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同志们大家来补充。

五　关于党的领导工作

民族统一战线愈是向前发展，愈是扩大与充实，则在我们党前面所提出的新的问题与任务亦愈多。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与任务，我们首先要求各地同志，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仔细的分析与研究各地具体的环境与各地阶级力量分布的情况，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之下，正确的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

有些同志在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时，常常不会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出发，而从自己所想像的东西出发，把极端复杂的问题看成非常简单，或者为眼前的各种现象所迷惑而看不到事变发展的基本趋势与前途，天天摇摆于各种矛盾的倾向中间而无所适从。这就是他们在决定自己行动方针时的各种错误的来源。

为免去这种错误，必须充分的估计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多方面的去研究自己所处的环境，从各种变化多端的现象里把握本质的发展。

一般的说来，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以前，决不要轻易的下判断与决心，这里，多花费一点考虑的时间是应该的。与其因为匆忙而下错误的判断与决心，还不如稳重为妥当。即在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已经决定之后，仍然要多方面的注意情况的发展，根据工作中的新的经验与教训，来修正与充实自己的决定，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然而只要我们不自高自大，虚心的谨慎的去搜集材料，研究问题，同当地群众与同志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更多的努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困难还是能够克服的。

其次我们必须善于在组织上保证自己所决定的行动方针与工作计划的实现。斯大林同志说：

> "有些人认为：只要规定党的正确路线，当众宣布，用一般的提纲和决议发表出来，并一致通过，就可以使胜利自行到来，所谓自然而然的到来，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者和形式办公主义者，才能这样想。拥护党的总路线的良好决议和宣言，还只是事情的开端，因为决议和宣言只能表示取得胜利的志愿，而不能表示胜利的本身。在正确的路线已经提出以后，正确决议已经通过以后，为了取得实际的成功，就要加强组织的工作，就要组织实行路线的斗争，就要正确挑选人材，就要很好审查执行领导机关决议的程度。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决议，就会有受到严重损失的危险。而且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定出来以后，组织工作便决定一切，甚至于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就是说政治路线是见诸实行还是归于失败，也看组织工作来决定"。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内还存在着极大的弱点。甚至有人发挥这样的议论，似乎领导机关，只要政治上"领导领导"，就可以了，实际的工作不由领导机关来负责。这种观点是极端有害的。领导机关不但有责任决定行动的方针与工作计划，同时也有责任去领导自己的决定的实现。

加强党的组织工作与组织领导，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是目前推动党的工作前进的主要关键。

第三，在组织工作中首先碰到的是干部问题。正确的挑选干部，配置干部将决定党路线

之能否实现的命运。

挑选干部，第一，应着重于他的政治观点与政治面目。第二，还要看他的实际工作的能力。这是我们挑选干部的标准。如果以私人的与宗派的观点，来挑选干部，那合乎这标准的干部将被排除，党的路线将不能很好的执行或甚至于完全不能执行。这对党是非常有害的。

不但要客观的与大公无私的去挑选干部，而且还要根据干部的历史、能力、特长、兴趣等来适当的分配他们。适当的分配干部即是说，第一，使每一个干部能够称职，能够“如鱼得水”，能够最大限度的以自己的力量供献给革命。第二，使各方面的工作，由于干部的适当分配，能够以整齐的步伐前进，保障政治任务的完成。在分配干部时，还应该特别注意于干部的地方化的问题。当地的干部对于当地的情形比较熟悉，而且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工作办法也比较多。这类干部如无必要时以不经常调动为原则。外面的干部如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并不比地方干部真正高明时，切勿随便调去担任指导工作。

在分配干部之后，还需要经常考查他们，这要求我们不只是根据于他们的一些书面的或口头的报告，而还要根据于他们的实际工作的结果来考查。如果发现过去对于某一干部的认识有错误，或他的工作分配不适当时，那就应该审慎的来补救这种缺点。切勿固执成见，使事情受到损失。

但考查自己的干部，不但要从上层来考查下层，而且也要从下层来考查上层。即在秘密工作环境下，这种考查仍然可能。下层同志对于上层领导同志有意见，尽可大胆的提出，提出他们工作的错误缺点与指给他们改正的途径。如果上层同志根本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固执自己的错误时，那下层同志有权利要求把他们的意见转达到更高级的机关，一直到中央。上层工作的同志，为了改善自己的工作，不但不应拒绝下层同志的意见，而且相反的，应该要求下层同志，提出对于自己工作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与要求。

在我们党内应该坚决开展反对对于下层干部的要求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与问题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无心肝的那种态度。他们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意见，他们不去解决同志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敷衍了事。特别在秘密工作的环境下，下层同志冒了很大的危险到上级来，要求具体的指示，而这些犯官僚主义毛病的同志却漠不关心的去对付他们。这简直是罪恶。

第四，经常检查他们工作执行的程度，是推动工作前进，保障政治任务实现的重要关键。这种工作的检查，首先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正确的认识干部。这一点在上面已经说过了，这种工作的检查，第二，就在检查执行机关本身的优点与缺点。这种工作的检查，第三，就在考验党的决定本身的正确性与不正确的地方。所以工作的检查，是必要的。

在检查工作执行的程度时，最重要问题，就是发展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发现工作中的错误，确定其根源，分析产生错误的具体环境，细心的讨论与寻找改正这些错误的方法。这种自我批评，对于党的需要，正像空气太阳之于人身。

自我批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是改善工作的最有效的武器。它可以提高同志们的政治警觉性，可以在错误中教育干部，可以使党内生气勃发，而不是暮气沉沉。所以自我批评不是表示党的衰弱，而正是党的有力的标记。

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或者惧怕自我批评，或者把自我批评当做对某一个人的攻击。这两种倾向是互相补充的。因为他惧怕自我批评，所以别的人就要攻击他，因为别的人以自我批评为攻击个人的武器，所以他更是惧怕自我批评。这种错误倾向，也造成

了党内许多无原则的纠纷与派别斗争。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彻底纠正。

斯大林同志说：

> "布尔塞维克的义务不是掩饰他的错误，不时回避他的错误问题，而是诚实的公开的承认他的错误，诚实地公开地指出校正这些错误的途径，诚实地公开地改正他的错误"。

也只有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才能教育出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干部，才能够训练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领导者。互相掩盖，包庇，袒护，姑息，亲戚朋友般的互相原谅，只有损坏自己的干部。

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使党内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成为日常的必需品。自我批评的发展，不但不妨碍同志间亲密的关系，而且更能使同志们在原则上团结起来。

第五，在每一次检查工作之后，我们必须得出一定的结论，这种结论即成为以后工作的具体指示。这种指示，首先应该指出在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情况及推动工作前进的当前的中心任务（中心一环），这种指示更应该指示实现当前的中心任务时所必要的组织上的改变及人力上的重新配置。这种指示应简单明了，要有中心，使下面同志得到指示之后，能够更有把握的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任务。具体指示决不等于烦琐，决不等于代替下级同志规定一切细目，或毫无中心的议论到一切。这对于下级毫无帮助。

具体指示应该不但不阻塞，而且更能发挥同志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它一方面给了下级同志以具体的帮助，同时也并不规定一切细目，而使下级同志有根据当时当地变动着的环境实行机动的可能。

要经常给同志们以具体指示，同时要培养同志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责任心与能力。上级同志没有十分必要时，不要处处干涉下级同志的工作，下级同志也不要事事依靠上级。

但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即使不同意时，也必须执行。他们的不同的意见，应该经过组织向上级提出，不得在群众中表示任何异议。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最粗浅的一条道理。破坏这条道理，就是违反纪律。

第六，在秘密条件允许的情形之下，应该尽量的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集体领导的保证，问题的共同讨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的发展，意见的适当提出，一定的会议生活等，都是保证党内民主的具体办法。但是必须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行，丝毫也不能削弱党的铁的纪律，在任何方面工作的同志都须严守党的纪律，任何违反纪律的行动，都是给敌人以利益，给党以损害。

有人以为党的纪律就是惩办制度，因此以为反对惩办制度就是反对纪律。这种曲解必然走到党的纪律的漠视与破坏。党的纪律即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全部遵守。违反这一组织原则，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处罚不过是保证执行纪律的一种方法而已。

最近北方党内所发生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是必须立刻纠正的。

第七，党内教育问题，现在特别重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武装全党同志，是党目前争取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养成学习理论的兴趣，只有这一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正确的解决问题，而不犯严重的错误。

对于新的干部的党内教育，现在也成为迫切的需要。此外，每一个干部，应该获得必要的军事教育。

六 两条战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各种各式的左倾机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样，是生活在社会中间，因此它受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宗派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经过共产党内部最不坚定的分子反映出来。其次，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成分中无产阶级骨干极端薄弱，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还占多数，所以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容易在共产党中找到它们的社会基础。

一般的说来，中国国内工人贵族的成分是很少的。但生活上比较有保障的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与上层知识分子，是占着相当的数量。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至于那些下层小资产阶级，贫穷的知识分子，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盲动主义的社会根源。

此外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也是产生两种倾向的来源。列宁说：

> "见解纷歧经常的来源是社会发展的辩证性——在矛盾中和经过矛盾发展的辩证性……。活的生活，活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的种种矛盾，只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能够完全把握住。然而不言而喻的，群众是从生活中，而不是从书本上去学习的，因此个别的人群或集团，常常在单方面的理论和单方面的策略体系中，过分重视或提高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点或那点特征，过分重视或抬高这一发展的这个或那个教训"（全集卷十五，五页）。

再从主观方面说来，我们的党还只有十六年的历史，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还薄弱，斗争的经验还不够，这也是使党内经常发生各种倾向的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党内在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克服之后，常常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机会主义。所以两条战线的斗争，不是一天的或一个节期的斗争，而是经常的斗争，也是巩固党内布尔塞维克思想一致的最主要的武器。

一般的说来：今天我们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因为今天我们的任务还是在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而关门主义却障碍着统一战线的建立。

但是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险中，我们应该清楚的向同志们指出究竟什么是左倾关门主义，而不是拢里拢统把什么工作中的错误，都叫作关门主义。

什么是关门主义呢？列宁回答说：

> "我们在思想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没有办到这事情，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这件事情离开胜利还很远。仅靠先锋队不能获得胜利。如果整个阶级，如果广大群众，并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锋队的立场，这个时候想把先锋队派去决战，这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罪恶。可是想要真正整个阶级，想要真正广大的被资本所压迫的劳动群众都站上这种立场，仅靠宣传，仅靠煽动是不够的。还要有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这乃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
>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团体，共产主义的派别，它们目前的任务是要善于率领广大群众（而现在广大群众往往还是酣睡，消沉，守旧，暮气

沉沉，而没有醒悟）走上这种新立场，确切些说，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也要善于领导这些群众以便他们转上接近新立场”（左派幼稚病）。

关门主义即是不懂得怎样把各种各样觉悟程度极不相同的群众集团与阶层，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引导他们到共产党今天所要求的新立场。他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格式，满足于教条主义与“党八股”。他把群众中极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不去认真的了解群众而脱离群众，他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只能走直路，不能走弯路。他拒绝利用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没有耐心的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他把自己的愿望当做实际。简单的说来，关门主义的实质即是把领导先锋队的领导党的组织原则与方法，去领导群众。

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各个时期是不相同的。政治形势的变动使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也随之而变动。比如，过去我们反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正确的，现在拒绝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进行统一战线，却就变成关门主义了。所以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同对于时局估计的某种不正确的倾向联系着的。它有着一定的政治根源。但犯关门主义错误的同志在政治上可以完全同意党的政治路线，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可以妨碍着党的群众政策的执行。

我们党，过去在领导群众的某些策略原则上，与领导群众的某些工作方式上，犯过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一直到今天某些关门主义的错误，在党内还严重的存在着。

为什么这种“左”的关门主义，在我们党内过去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而现在新的形势下，又成为党内主要的危险呢？除上面所说的产生左倾机会主义的一般原因外，还由于：

(一)过去十年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统治在广大的群众中所造成的深刻的仇恨。现在国民党的转变又只在开始。他们根本不相信国民党今天有什么转变而且不肯相信国民党以后会有什么转变。他们反对同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

(二)我们党内过去设有严重的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在我们党内还存在着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为要消灭党内关门主义，必须：

(一)坚决开展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打破左倾总比右倾好些的观点。

(二)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会马克思列宁的方法来分析时局，学会马克思列宁领导群众的艺术。

(三)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骨干，提拔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

无疑的，这是困难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这不是一次的纠正，或空洞的叫骂一顿所能够解决的。这要无数百次的斗争、教育与学习。

然而在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投降主义，是群众运动中的尾巴主义。实际上也是放弃领导群众走向新立场的任务的。难道在过去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吗？投降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共产党，不是最危险的机会主义吗？牺牲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去谈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惧怕斗争等不也是露骨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吗？这类右倾机会主义的事实是很多的。

特别在国共走向合作，全国和平统一开始实现的目前阶段内，右倾的危险正在增长中。因此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应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尤其因为左右倾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是互相贯通的，左倾的分子，在另一种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右倾，右倾可以转变为左倾。左倾可以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而右倾又

可帮助左倾机会主义的发展。

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党应注意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与之斗争。在斗争中锻炼我们同志的政治警觉性，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真能拿马克思列宁的辨证唯物论去解决一切问题。只有政治警觉性与政治水平的提高，马列主义的武器的取得，我们才能征服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而保障党内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与团结。

然而思想斗争的方式是要注意的。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与教育，而不是打击。对某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然而思想斗争是决不能因为过去方式的不好，现在就不要，甚至放弃的。这种无原则的与市侩式的党内“和平共居”,是我们所不需要的。

每一个同志的错误思想，我们是应该克服的，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自己错误的意见。保留自己的错误意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某一同志同党的路线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相信他的错误会不断发生，会从各方面表现出来的。结果，总不能为党工作，而且对党一定有害无益。因此，如果党无法说服同志使他接受党的路线时，则这种同志可以最后“保留”他的意见，但可以不“保留”在党内。

相反的，如果一个同志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就是他承认了错误时，我们仍要在实际工作中考察他是否真正了解了自己的错误。所有我们党内的同志，切勿要以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态度，对付党内严重的政治倾向的问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7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510
SS号=10273509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目录
目录

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1936年12月1日）
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
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周恩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
中央给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电（1936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
〔附〕张学良、杨虎城通电（1936月12月13日）
上海美商大陆报关于西安事变的社论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1937年1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1937年1月8日）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
〔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1937年2月18日）&宋庆龄
宋庆龄、冯玉祥等关于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提案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1937年2月15日）
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1937年3月）&周恩来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1937年4月3日）
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
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1937年春季）
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1936年4月）&刘少奇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刘少奇
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1937年5月）&刘少奇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洛甫